

江澤民突然發問

李鵬六四政變的藉口

毛岸英入朝和遇難真相

還原周恩來

中共禁止的歷史

◎ 李清鋒

哈耶出版社



中共禁止的歷史

◎ 李清鋒

哈耶出版社

書名: 中共禁止的歷史

作者: 李清鋒

編輯: 張小申

校對: 吳西洋

版式設計: 黑茶客設計所

出版: 哈耶出版社

通訊地址: P.O.Box 795, Deer Park, NY 11729-0795, USA

電郵: hayachuban@yahoo.com

版次: 2013 年 6 月

ISBN: 978-1-936043-40-8

定價: HK169

版權所有, 不得翻印

未經書面許可, 不得擅自轉登該書內容

本出版物不代表哈耶出版社立場

目錄

- 7 中國錯失政治改革的黃金時段
- 21 李鵬六四政變的藉口
- 29 中共不得不考慮糾正“六四”歷史罪錯
- 40 流亡是一個了不起的學習機會
- 47 如果鄧小平能被騙，就不是鄧小平了
- 62 中鋒在黎明前死去：北京悼念“小平頭”
- 78 陳子明：追求民主憲政的人思想更成熟
- 87 社會主義大家庭為何必然分裂解體
- 99 毛澤東打倒劉少奇的政治武器
- 127 被幸災樂禍的“極左分子”陸平
- 134 用嚴謹邏輯和實證精神還原周恩來
- 151 提倡“五湖四海”的毛澤東搞了個“清一色”
- 176 解剖與還原“文革”中的解放軍
- 200 《林豆豆口述》：特殊環境的成果
- 223 紅小兵的家庭回憶：從中國棺材講到中國變遷
- 239 被打成叛國者的愛國者馬思聰
- 247 毛澤東精心策劃“陽謀”的步驟
- 258 廬山會議參與者的悔恨
- 269 中國“大躍進”結束了嗎？
- 279 “右派”的悲歡離合情感路
- 287 毛岸英入朝和遇難真相
- 306 韓戰戰俘潘海波的豁達與思念

目錄

- 314 中國文化所造就的“戰廢品”
- 321 斯大林為何同意金日成發動韓戰？
- 358 “兩蔣日記”將持續擴大影響力
- 370 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情在這裡都發生了
- 385 被流放與被遺忘的中共省委書記
- 398 革命並不是恒定不變和純淨無瑕的
- 409 江澤民突發問：西安事變如何總結？
- 420 哈金：在南京大屠殺史實中引入國際視角
- 431 怒火和淚水：專訪《南京大姦殺》作者素丹
- 438 他們是失敗的英雄
- 452 平型關戰役的不實之詞和易解之謎
- 467 平型關大捷功勞簿上不能只載八路軍
- 472 歷史敘述的奧秘何在
- 483 張東蓀“保全北平人民古物”真相
- 515 沒沾過皇上的光，只安於平民的樂
- 519 袁世凱百年沉冤，原因在兩朝政權
- 530 清末已在改革，為何爆發革命？
- 550 中國的崛起不遵循西方的血腥征服模式
- 558 後記

中國人多少年來盼望要政治轉型、和平過渡，盼到了1987年十三大的政改決策，機會多麼難得！既然如此，我們就要爭取讓政改方案得到通過。如果這一次不能通過，一拖下去，時過境遷，夜長夢多，不知道又要拖到多少年以後了！——改革者的擔憂不幸而言中

中國錯失政治改革的黃金時段

衆所周知的是，趙紫陽的秘書，是鮑彤；
鮮為人知的是，鮑彤的秘書，是吳偉。

2012年10月上旬，今年剛滿花甲的吳偉，於中共十八大前夕，從中國大陸來到美國，參加在紐約長島舉行的“胡趙精神與中國憲政轉型國際研討會”。他在大會發言中披露：“趙紫陽設想，政治體制改革不是一成不變的，內容也是不斷發展的，要通過三到四屆黨代會，逐步完成從革命黨向執政黨，從傳統政黨向現代政黨的轉變，實現共產黨自身的轉型。”

利用會議的間隙，《新史記》記者專訪了吳偉，聽他講述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後期中共高層嘗試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甘苦教訓。

未出茅廬就嶄露頭角

吳偉，1952年出生於吉林，16歲多就當了知青，後來當了五年兵；1977年“文革”後恢復高考，他考上了東北師範大學（當時叫吉



吳偉。（《新史記》記者高伐林攝）

林師大)政治系。苦讀四年，畢業後分配到吉林省委宣傳部，從那兒又考上中央黨校研究生。

《新史記》記者問吳偉：你是怎麼到了鮑彤身邊的呢？

吳偉說：1985年、1986年那幾年，我在讀中央黨校期間，和其他幾個同學組織了關於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研討小組，搞了一些活動。特別是1985年夏天，我們搞了一個全國規模的調查，有二百多個研究生參加。我起草了總報告，這樣就和陳一諮他們比較熟了。研究生畢業，陳一諮推薦我到鮑彤所領導的政改辦（那時還不叫這個名稱）去。1986年10月，政改辦成立的第一天，我就去報到、參加會議了。

吳偉對鮑彤評價挺高。他回憶說，雖然鮑彤是中央委員，又當了政治局常委的秘書，地位相當高了，但他從來沒有架子，第一次見面，他說，你就叫我“老鮑”吧。到現在吳偉也仍然叫他“老鮑”，叫他夫人“老蔣”。吳偉印象最深的是，鮑彤不搞拉幫結夥，在工作中又極為嚴謹，給中央起草文件，從角度、結構到文字，不知要改多

少遍，一個字、一個詞他都不放過。

如果不算臨時人員，這個研究政治改革的智囊班子，最多時大概有 30 多人。“一開始我和吳國光去的時候，領導不算在內，第一批只有七個研究人員。到十三大之後，正式成立中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編制有 20 來人，但實際上只有十六、七個，最後解散的時候只有 17 個研究員。”研究員都是副處級以上，要任命都是按照局長、副局長來任命，因為他們經常要到各省市調查，定個級別，到下面人家好知道按什麼規格接待，什麼級別的領導出面。

住了三個月“秦城招待所”

那年，吳偉 34 歲。他在陳一諮的具體領導下，投入對政治體制改革的研究。過了沒幾個月，1987 年年初，胡耀邦被中共元老們逼迫辭職，中央決定趙紫陽接替，代理總書記之際，吳偉被定下來給鮑彤當秘書，“我一直當到 1989 年的 5 月 28 日，官方把鮑彤抓起來，也把我和鮑彤的另一個生活秘書抓起來了。”

不過，吳偉馬上補充了一句：“也算不上正式抓吧”。鮑彤是被關到秦城監獄裏面，而吳偉等兩人，是在秦城三套院的第二套院，“算是個招待所”。

不管叫什麼，反正，他當時失去了人身自由。“主要是想通過我們調查鮑彤的活動。但是名義上是針對鮑彤的，不是針對我們的。”

吳偉在秦城那個“招待所”呆了將近三個月；生活秘書比他早出去一個月。三個月出來，已經物是人非。原單位中央政治改革研究室已經被中央明令撤銷。“但是所有的人不能走，要繼續清查、清理。當時由中直工委派出工作組，查‘黑手問題’，結果查來查去，根本就沒有！除了一個鮑彤被判刑七年、一個高山被判刑四年以外——哦，他們的問題後來都公布了，根本與黑手沒有關係嘛！”

其他的人呢？“我們研究室二三十個同志，只有一個受了‘警告’處分，其他黨員全部正常登記，沒有查出任何問題，包括我。因



鮑彤。2012年2月攝於北京。

為我做的是共產黨的工作、正常的工作，不是搞陰謀詭計呀。”

話是這麼說，在使用安排上，吳偉當然屬於不能再被信任的人了。他告訴《新史記》：“到清理的後期，按當時中央清查清理辦公室的說法，我們研究室的這些人，都‘不能再進入中央國家機關’。我被分到了中國大百科出版社，給我安了個‘編輯部副主任’。我原來是正處級，而這個副主任是副處級，”

吳偉要較真了：“我有意見啊，去找領導：你憑什麼給我降職？我犯錯誤了嗎？”

他回憶，領導上說：沒有呀，檔案裏並沒有記載你有什麼錯誤。吳偉追問：“既然沒有，為什麼給我降職？”他告訴《新史記》：我本來不會去爭這個，但這個時候，我不能不爭——因為人家一看我降職了，我要是沒犯錯誤，為什麼會被降職？

好在，在中國，不乏解決這類問題的辦法。“領導說，那你說怎麼辦？我說，我要爭當正職也不合適啊，我畢竟業務不熟呀。我說，加個括弧，寫上‘正處級’吧。”領導欣然同意這個下台階：“這可以！”

參與起草政改總體設想

在大百科幹了一年多近兩年，政治氣氛實在太壓抑了，得不到重用，也得不到信任。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之後，吳偉的一些朋友去了海南，1993年他也就索性捨棄公務員的待遇“下海”了，先後搞了幾個公司。“我不是經商的料啊，不知道是運氣不好，還是自己缺少賺錢的本事，幾個公司都做得不好。”2003年之後，他就不做自己的公司了，到朋友的公司去任職。年齡漸大了，就辭職，回家搞研究、寫文章。但他對鮑彤的尊重，卻是多年延續下來了。最近幾年，他還是常常去見鮑彤，長的兩個月，短的半個月，就會去拜訪聆教。

《新史記》記者問吳偉：你當了兩年多的鮑彤秘書，主要幹了哪些事？參加哪一個具體的政治體制改革研究項目嗎？

當時被安排在綜合組當處長的吳偉回憶：鮑彤當時明確交待：你在我這裏當秘書，但是還要參加研討，做你的研究工作。

他記得，當鮑彤秘書沒多久，就投入了起草剛剛代理總書記的趙紫陽關於遏止“反自由化”狂潮的“5·13”講話，“鮑彤下面有五個人參與起草，三個人寫第一稿，每人一部分——我也有一部分，然後吳國光統稿，政改辦的秘書長最後潤色。”《新史記》記者記得：1987年趙紫陽的這一講話出來，舉國大搞“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頓時偃旗息鼓，原來眼前的吳偉參與阻遏了這一逆流！

吳偉介紹，政改辦的綜合組，主要就是負責起草關於政治體制改革的文件，當時分了工：吳國光參加的是中共十三大報告起草組，一位副局長帶領吳偉等人起草關於政治體制改革的方案。

吳偉說，十三大報告和“關於政治體制改革的總體設想”這兩個文件是有區別的：十三大報告是對外公開發布的，主要是講虛的、講原則性的問題；而“總體設想”不講虛的，大部分是很實的，講操作性的問題：“要幹什麼”“怎麼幹”，像撤銷黨組，撤銷政法委，等等，全都列出來了。



在中共十三屆一中全會後，趙紫陽率新常委亮相。

對於比較虛的原則，大家都舉手贊成；一談到實的，分歧就來了。吳偉回憶說，趙紫陽原來打算“關於政治體制改革的總體設想”要在1987年10月的十二屆七中全會上通過的，以便隨後提交十三大審議，但是由於這個實的東西引起的爭議太大，“它太具體了，所以在全會上就不大能通過”，為了保證十二屆七中全會和十三大能順利召開，就沒有在全會上表決，改成了“原則同意”。十二屆七中全會公報這麼表述：“原則同意”這個總體設想，並把其中主要精神寫入十三大報告。

《新史記》記者查1987年10月20日通過新華社發布的十二屆七中全會公報原文，是這麼寫的，驗證了吳偉的說法：

全會討論並通過了《中央委員會向黨的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報告》，討論並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章程部分條文修正案》，一致決定將這兩個文件提請黨的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審議。

全會討論並原則同意《政治體制改革總體設想》，決定將這個文件的主要內容寫入中央委員會向黨的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報告。

我追問：你說當時“爭議太大”，那麼是關於政治性的爭議呢，還是關於操作性的爭議？當時黨內高層“左”的勢力、保守勢力還

相當強大。吳偉說，這個“總體設想”主要都是操作性的，原則上大家都沒有什麼意見，連十三大報告大家都通過了麼。

鄧牌政改與趙牌政改

吳偉回憶起八十年代投入政治體制改革的經歷，充滿了激情。

他說，當時高層有三個方面的政治力量，第一，是胡趙為代表的開明領導者；第二是鄧小平，作為黨內矛盾的仲裁人，一方面堅持改革開放，一方面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這麼“左右互搏”；第三就是黨內保守派。

吳偉認為，趙紫陽經歷過兩次大徹大悟。第一次是“文革”，他從共產黨傳統的階級鬥爭學說中掙脫了出來；第二次，就是從1989年之後，經過思考，他實現了向徹底的民主主義者的轉變。

如何看三年多的政治體制改革的過程？吳偉的看法是，確有雙重性：從目標上說，趙紫陽與鄧小平是並不一致的。現在有人批評說，那只是體制內的改良。吳偉說，但是對“改良”，也有兩種不同的認識：鄧小平提出政治體制改革的目標和他的措施，與趙紫陽提出的目標和措施是不同的。

這就是趙紫陽當時的難處——吳偉回憶說：鄧小平主張的，是對體制做些改良，在保持共產黨領導地位不變的情況下，革除體制內官僚主義呀、層次過多呀、職責不清或交叉重疊，以致互相推諉呀，等等之類的弊端，以提高行政效率。鄧小平從來也沒有認真想過在中國搞民主；而趙紫陽受命主持這場政治體制改革的探索，他是要實實在在推動民主；然而他又處在鄧提出的目標的壓力之下。

“但他還是將高度民主作為政治體制改革的長期目標，提出來了”。

吳偉說，趙紫陽接受了鮑彤和我們政改辦提出的方案——將政治體制改革設為兩個層次，把鄧小平的“提高政府效率”包括進去，然後把高度民主作為長遠目標。吳偉解釋，這樣一方面可以取得鄧小平的支持，另一方面又適合中國的現實發展需要。

他說，後來政改辦又提出，要實現從革命體制向建設體制轉



趙紫陽與鄧小平的改革設想不是一回事。

變，從革命黨向執政黨轉變。這“兩個轉變”的口號，趙紫陽也接受了。

吳偉在紐約研討會的發言中具體闡明說：趙紫陽在主持政治體制改革中提出一系列措施，遠遠超出了鄧小平劃定的範圍。他提出：黨的領導，是“政治領導”——這就擯棄了過去多年一貫制的“組織領導”和“思想領導”。鄧小平劃定的政改範圍是：黨政分開，權力下放，機構改革，提高效率，而趙紫陽主持制定的政治體制改革總體設想中，接過鄧小平“黨政分開”的口號，提出了一系列更新、更帶根本性的措施。

吳偉記得，當時趙紫陽的政改措施中還有很多內容，例如，他主張取消對文化作品的審查制度，發揮新聞媒體的監督作用，提出了開展社會協商對話，通過協調社會矛盾和社會團體之間的關係，取消黨對司法的直接干預……等等。

吳偉說，後來趙紫陽提出建立國家公務員制度，提出要有政務類和業務類的劃分，“這是關鍵啊，為將來實現公務員中立奠定一個基礎。”——不過吳偉緊接著就澄清說：中國現在實行的所謂“公務員制度”，遠遠不是當時設想的制度了！

吳偉還說，在中共十三大之後，趙紫陽又提出了幾條，例如，他提出：改造和加強思想政治工作——注意“改造”二字，不是過去所一貫說的“加強”。不過這一條，後來沒有在高層通過；吳偉介紹，趙紫陽又提出，開展廉政建設，“他看得很清楚，當時由於經濟上的雙軌制，導致腐敗盛行。”

恰恰這些，在“六四”之後，被鄧小平和黨內保守派指責為“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證據。吳偉說，“這也說明，趙紫陽所推行的這些舉措衝破了鄧小平的範圍，也成為後來鄧小平中止這場改革的原因。”

政改機會得來不易要珍惜

怎麼看待八十年代的政治體制改革的時機選擇問題？最近一段時間，國內也有人在反思八十年代的政改，有一種觀點認為，八十年代的政治體制改革的時機不成熟，所以最後就失敗了。對這一觀點，吳偉坦率地說：從總體上說，我無法反對，但我也不能籠統地贊成。為什麼？“因為時機選擇，並不是趙紫陽的選擇，而是鄧小平的選擇，趙紫陽只是被動地接受了鄧小平的安排，來主持制定方案，並組織操作。”“如果說時機選擇不成熟，那只是趙紫陽的改革在當時行不通；而鄧小平提出了十六字改革方針，如果趙照這條路去走，是可能成功的，他也可以照樣當他的總書記——但這就不是趙紫陽了！”

一直到“六四”槍聲響起之前，鄧小平一直在觀察，趙紫陽到底想幹什麼？吳偉說，“趙紫陽想幹什麼？他想堅持民主與法治！”趙紫陽在“六四”前夕再次提出：要在民主和法治軌道上解決問題，這表明他仍然堅持在政治體制改革過程中提出的一系列觀點。

吳偉認為，正是由於趙與鄧在政治體制改革問題上的分歧，在當時的實踐中，一方面體現了鄧小平的想法，一方面表現出實際操作者的想法。這二者的衝突，最後導致了鄧小平動手中止了改革。

鄧小平是黨內各種政治勢力博弈的症結。吳偉分析說，在當



趙紫陽的政治體制改革功虧一簣。

時黨內高層的政治生態格局中，鄧小平算是中間勢力：他主張改革的時候，就傾向胡趙；當他發現胡趙超出了他所能容許的範圍，他就出手阻止，站到保守勢力那邊。

吳偉認為，1989 年改革被中止是鄧小平主導的，但是黨內保守勢力從 1985 年之後持續不斷地反撲，已經醞釀了這個結果。“鄧小平最後表現出的政治態度，與陳雲、李先念、李鵬、姚依林他們，沒有什麼區別，達成了一致：對趙紫陽的政治體制改革，不能容許存在，必須扼殺掉。”

回顧往昔，吳偉十分感慨。他說，在政治體制改革方案的制定中，我們當時有一個指導思想：中國人多少年來盼望要政治轉型、和平過渡，盼到了這次政改，機會多麼難得！既然如此，我們就要爭取讓方案得到通過——如果這一次不能通過，一拖下去，時過境遷，夜長夢多，不知道又要拖到多少年以後了！

證諸 20 多年來的史實，可不就是如此嘛！到現在，領導人的政改思路和魄力，還難以企及中共十三大達到的高度！

吳偉回憶，當時要著眼於能讓方案通過，每一條、每一句，都必須考慮聯繫實際——必須考慮鄧小平這個“中國最大的實際”。吳偉告訴《新史記》：政改的方案，必須得到兩方面的理解：要讓鄧小平這個最高權威能夠接受，也要讓中國那些主張社會主義民主、主張保障公民權利的人能接受。難乎哉！

那個年代，陳子明和王軍濤他們也在積極鼓吹他們的主張。吳偉說，按現在的說法，其實我們都是主張“憲政民主”的。不過我們政改辦的這些人非常清楚：我們與他們，並不是在觀點上有什麼“根本區別”，而是位置不一樣：我們還在體制內，所以我們不能與上面搞翻了。“我們的目標是讓我們的政改方案能在中共黨代會通過——如果通不過，再好的方案也沒有用！”

吳偉說，有這樣一個目標，就要求我們和社會上鼓吹憲政改革的民主派“得有一個界線”。“當時鮑彤反覆地提醒我們，咱們內部，應該‘研討無禁區’，但是對外呢，就得講‘宣傳有紀律’，要讓人抓不住把柄。”

“長鬍子的黑手”子虛烏有

李鵬等中共保守派勢力，一直企圖從鮑彤所主管的智囊班子中找到攻擊趙紫陽的炮彈。吳偉對《新史記》記者指出：他們懷疑鮑彤和政治改革研究室是動亂的“後台”、“黑手”，從這裏開始搞鮑彤。但是查到最後，卻有很多證據證明他們的指控站不住腳。

“查來查去，中央政改研究室與‘動亂’根本沒有任何聯繫，沒法認定是‘黑手’！”

他說：“查到最後，和學生運動有一點聯繫的，只是我們那兒的高山，他在1989年5月19日，參加了‘三所一會’起草關於時局聲明的會議——高山本人是北京青年經濟學會的秘書長，他是以這個身分參加的這個會議。跟我們研究室，從組織上說，其實並沒有關係。”

吳偉還說，鮑彤對高山參加這個會，事先是不知道的；高山回

來以後對鮑彤匯報、向機關黨委報告了，結果，機關黨委批評了他，鮑彤也批評了他：你這不是給我們找麻煩嘛！本來紫陽就夠麻煩的了，你給我添了麻煩，更是給紫陽添了麻煩！

5月20幾號，李鵬的日記裏說，學生背後有“長鬍子的黑手”，還列舉了四個方面，第一個方面，就是指控趙紫陽通過鮑彤領導的中央政治改革研究室插手學生運動。吳偉指出，李鵬這個日記，是“2003年整理出來的，但到那時已經是鮑彤蹲監獄之後了，早都查得一清二楚，根本沒有這些事情嘛。可是李鵬照樣這麼說！”

李鵬、姚依林貪汙陳雲意見

吳偉向《新史記》記者証實，後來被怪罪到趙紫陽頭上的1988年“物價闖關”，確實是鄧小平的旨意，並非趙紫陽心血來潮，趙紫陽是搗了“黑鍋”。而這，正是元老干政最大的要害：權責不對等——干政的元老有權力卻不用負責任；在第一線工作的領導無權決策，卻必須承擔決策錯誤的責任。

吳偉在回答《新史記》記者的提問中，還披露了一些罕為人知的史實。他透露，政治局常委按照鄧小平的指令決定“物價闖關”時，陳雲曾經兩次表示反對。“過去沒有什麼材料說陳雲反對，但現在有了”。

陳雲何時提出反對的呢？吳偉對日期爛熟於心，張嘴就來：第一次，中央研究物價闖關這一重大決策，是1988年5月16日；兩天後，5月18日，姚依林到陳雲家報告給他，陳雲就明確表示了反對。“按說，陳雲是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他反對這一決策，那麼第二天，5月19日，中央常委開會，你姚依林作為中央常委、國務院常務副總理，有責任把中顧委主任的意見告訴所有常委吧？但他一句話沒說。”

一個多星期之後，1988年5月28日，李鵬又到陳雲家，陳雲又談到物價闖關，正式地斬釘截鐵地對此做出判斷：你們搞不過去。然而，“兩天之後5月30日中央政治局開會，你李鵬是中央常委、

國務院總理，有必要、也有責任向中央轉達中顧委主任這麼重要的意見啊，可他仍然一句話沒說！”

《新史記》記者問：李鵬與姚依林兩人，商量過要協調行動嗎？吳偉回答：這倒沒有證據來證明他們商量過。他們兩個人是不約而同地“貪汙”了陳雲的意見。

為什麼他倆會這麼步調一致呢？吳偉的判斷是：因為他們倆都知道“物價闖關”是鄧小平提出的啊，如果將陳雲的意見講出來，豈不是等於用陳雲來壓鄧小平？！——他們不敢撞在槍口上。“鮑彤就一針見血地說，他們兩個人是去向陳雲打小報告的，但陳雲一反對，他們就只好不辦了，只好不傳達。”

鄧小平、趙紫陽知道陳雲反對嗎？吳偉說，沒法證實，也沒法否定，因為直到趙紫陽去世，他沒有談過這個問題；看來鄧小平也不知道陳雲是這個態度。

《新史記》記者再問：陳雲講了兩次都沒有得到中央的反饋，會怎麼看？吳偉說，也不知道，“沒有資料證明”。他認為，這是“很奇怪、很詭異的一件事”。



陳雲反對物價闖關的意見並沒有傳到中央常委。

吳偉告訴我，中共十三大之前，中央常委討論人事安排初步意見後向鄧小平匯報時，趙紫陽說了一句話：我希望我當了總書記以後，中央只有一個“婆婆”——他這話的意思是，就鄧小平一個人發話，陳雲和其他元老的話，我就選擇性地聽。

陳雲不贊成物價闖關的意見，既然被李鵬和姚依林“貪汙”了，吳偉是怎麼知道的呢？是誰披露的？吳偉告訴我，“在 2005 年出版的金沖及《陳雲傳》裏提到了這事。”他問鮑彤，鮑彤說：“有這事嗎？我不知道。”其他趙紫陽的身邊人也都不知道，都覺得很吃驚。他們看了《陳雲傳》，裏面先敘述了陳雲的意見，然後說，中央（1988 年）5 月 30 日開會，通過了趙紫陽提出的關於物價闖關的安排，陳雲同志的意見沒有被採納。吳偉憤憤地說：“陳雲的意見趙紫陽都不知道，採納什麼呀！”（《新史記》記者 高伐林）□

李鵬《六四日記》坦白承認，殺害解放軍劉國慶、崔國政、李國瑞的不是學生，而是勞教釋放犯等壞人。事實證明，解放軍都懂得，這不是軍史上光榮的一頁，而是恥辱的一頁。

李鵬六四政變的藉口

不是學生殺害解放軍的

李鵬《六四日記》坦白承認，殺害解放軍劉國慶、崔國政、李國瑞的不是學生，而是勞教釋放犯等壞人。

1、在《李鵬六四日記》（1989年6月12日）中，李鵬坦白承認：“殘酷凌辱、殺害戰士劉國庚的凶手張建忠已被抓到。他是一名因盜竊勞教分子，是暴亂中‘北京市民敢死隊’成員之一。”

2、在《李鵬六四日記》（1989年6月14日）中，李鵬坦白承認：“在崇文門過街天橋殘酷殺害戰士崔國政的暴徒趙躍堂、楊世增、李衛東已經被抓獲。趙是湖北荊州地區流竄到京的農民，楊是某醫院工人，李是北京無業人員，曾被公安機關扣留過。”

3、李鵬在1989年6月15日的日記中坦白：“殘害李國瑞烈士的暴徒孟多已被抓獲歸案。孟多是北京無業人員，因扒竊被勞教三年。越來越多的事實表明，攻擊解放軍、搞打砸搶的歹徒，主要是那些以前有過犯罪行為、極端仇恨國家和政府的人。”

1989年6月19日的李鵬日記中明確寫道：“下午，由我和喬石、姚依林同志在紫光閣會見在平暴中英勇犧牲的三位烈士的親屬。三位烈士是劉國庚、崔國政和李國瑞。我對烈士親屬講，這些烈士在平暴中立了功，黨和人民感謝他們。我又說，在近兩個月的



《李鵬日記 VS. 趙紫陽錄音》

時間內，中央一直采取了克制的態度，在世界上還找不出這樣的國家。祇有在最後不得已的情況下，戒嚴部隊才進行了自衛。中央已製定了明確政策，認定卷入這場動亂的大多數人屬於人民內部矛盾，只對那些搞了嚴重打砸搶的、殘害解放軍的才堅決予以打擊。”

既然不是學生殺害解放軍，為什麼把正當的守法的學生靜坐視為“反革命暴亂”？即使出現了幾名勞教釋放分子殺人事件，性質上是三起刑事案件，而不是政治性質的“反革命暴亂”，更不能把壞人殺解放軍的孤立性個案定性為群體性“暴亂”。李鵬等實際上是栽贓誣陷學生運動是“反革命暴亂”，而視為罪證就是三個勞教釋放犯殺了三位解放軍。事後的《李鵬日記》證實所謂“反革命暴亂”是誣告、陷害是陰謀，目的是為“六四”這場以反改革、反趙紫陽為目標的軍事政變製造藉口。

為什麼不事先清除隱患！

既然李鵬承認“八九風波”中殺害解放軍的是一些勞教、刑滿釋放分子，為什麼事先不加以防範和適當處理呢？

1989年9月，我隨同國務院農村發展中心武少文副主任去東

北調查。武少文建國後曾任吉林省人民政府秘書長兼財政廳長、計委主任，“三反”中因“周持衡武少文事件”冤案中受打擊被判刑。吉林省周持衡省長及省委劉錫五書記也同時下臺。八十年代才徹底平反。武少文在吉林是名人，平反後被聘為吉林省的顧問。因此，到賓館探望武少文的省級領導絡繹不絕，其中包括分管政法的高嚴書記。此人後任雲南省委書記、國家電力公司董事長，被“雙規”後，由李小鵬接任。高嚴在天津被監管期間乘飛機逃往國外。

在長春的省委賓館裏，我當面問過高嚴：“高書記，為什麼長春沒有發生北京的‘六四’呢？”高嚴答道：“吉林省委采取了三條措施：第一，對靜坐的學生，省委請他們進入政府大院裏，關上大門，把學生與市民隔開。第二，如有學生擠上火車要進京請願時，省委領導到車站，每人包幹一個車廂，勸吉林學生下車，有什麼問題在長春解決。第三，清查全市的勞教、刑滿釋放人員，全部收留後，安置在長春市外。”吉林采取的最後一條措施，保證了長春市沒有出現北京那種勞教釋放犯殺害軍警情況。

面對劉國庚、崔國政、李國瑞三位解放軍在北京被刑滿釋放分子和勞教人員殺害的事實。請問李鵬、王芳，難道北京的公安部部長的智商不如吉林公安廳廳長嗎？中央公安領導部門的革命警惕性和保衛社會治安的經驗，還不如長春市公安局長嗎？李鵬總理的執政能力還不如外逃的高嚴書記嗎？這不能不使人懷疑：李鵬、王芳是不是有意放縱或利用這些刑滿釋放分子製造殘暴罪行、激化事端，人為造成“反革命暴亂”的表面現象，作為武裝政變的藉口？即使退一步看，李鵬、王芳事實上放縱了真正的暴徒，沒有采取吉林省公安廳的最起碼的淨化治安環境的措施，造成了三名解放軍被殺害的後果，至少是瀆職罪，應當撤職查辦。

有必要調動 20 萬大軍鎮壓？

三個刑滿釋放分子殺了三位解放軍，就能作為“反革命暴亂”定性的依據嗎？就需要調動 20 萬大軍鎮壓學生運動嗎？



“六四”遊行學生

“六四”有三名解放軍被殺害，凶手是勞教、刑滿釋放分子，而不是青年學生。人們更不會忘記學生遊行、示威、靜坐、絕食時，都有自己組織的糾察隊，學生沒有殺害解放軍。人們記得4月18日追悼胡耀邦大會結束後，學生請願代表是跪在人民大會堂臺階上請願的；向天安門城樓掛著毛澤東畫像潑油漆的三名湖南人，正是被示威學生扭送派出所的；即使西單軍車運槍暴露了，學生並未奪槍逃走，而是全部交給公安了，李鵬日記也承認槍支收回來了。正是天安門廣場指揮部的封從德等人，主動把學生撿拾的槍支交給公安部門的。所有這些事實證明，1989年5月至6月，學生運動是嚴格遵守黨紀國法的和平示威，學生沒有任何參與“反革命暴亂”的行為。沒有發生“反革命暴亂”的事實。沒有任何罪證。所以學生無罪。

在李鵬建議江澤民、丁關根負責起草的6月5日《告全國人民書》中承認，“出面製造打、砸、搶、燒等種種暴行的，主要是一些沒有改造好的刑滿釋放分子，一些政治性的流氓團夥，‘四人幫’的殘渣餘孽和其它社會渣滓。”在《李鵬六四日記》（1989年6月30日）中寫道：“戒嚴部隊在向天安門開進途中，有的官兵被歹徒以極其殘忍的手段殺害。某部排長劉國庚在西單路口被暴徒打死，又被澆上汽油燒屍體。某部士兵崔國政被暴徒從崇文門過街橋上扔下，澆上

汽油，活活燒死後，懸掛在過街天橋上。武警士兵李國瑞被暴徒殘害後，屍體被懸在阜成門立交橋的欄桿上。某部班長王其富等十名士兵，被歹徒將乘坐的軍車翻倒，向車上扔石塊、火把和燃燒瓶，六名戰士被活活燒死。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戒嚴部隊被迫開槍自衛還擊。”

事實上，王其富等十名士兵的軍車是自己開車不慎翻倒在公主墳西邊路上，著火後死亡六人，沒有抓住什麼歹徒。所以，李鵬也沒有舉出這些死者的姓名。劉國庚、崔國政、李國瑞是被勞教、刑滿釋放分子殺害的，《李鵬六四日記》已證實。這裏沒有學生的責任，沒有市民的責任，祇有幾個刑事犯在犯罪，怎麼能以此為據，定為“反革命暴亂”？怎麼就敢於向老百姓“開槍”、“還擊”，造成幾百名無辜公民慘死呢？

值得深思的事實是，被勞教釋放分子殺害的三位解放軍屍體，很長時間暴屍街頭，李鵬當局沒有按照解放軍在戰場上要冒死搶回烈士屍體，並且要按中國入土為安的風俗，很快安葬。讓解放軍慘不忍睹的燒黑的屍體，吊掛在過街橋天橋上，流出體外的屍體曝曬於街頭，當局主事者的革命人道主義何在？這是一種以死人壓活人的恐嚇、威懾方式，人為製造殺人有理、報復有理、自衛反擊的口實。李鵬等陰險目的是煽動軍人的憤激情緒。請問，那麼為什麼不讓學



同學們將收繳的槍械堆放在新華門前，之後更送往公安局並要了收條，以使當局找不到任何鎮壓的藉口。

生、市民以同樣方式抗議？北郊一位 12 歲小姑娘被解放軍開槍打死後，她的父親騎著三輪板車，拉著女兒屍首，質問解放軍：“憑什麼、為什麼打死我的 12 歲小姑娘？”那些坐在軍用卡車上的解放軍戰士低頭不語，無言可答，心裏也一定在思考。但是這位小姑娘的父親立即被捕。兩相對照，三位解放軍長時間暴屍街頭的事實，證明是有目的、有陰謀、有預謀的，也有人懷疑是故意製造的。應當公布殺害解放軍凶手的真相究竟是什麼？何人所雇用、派出？他們的供詞、最後的陳述、遺言是什麼？殺害解放軍戰士的三個凶手是否有後臺？極不人道的陳屍街頭的決策者是誰？應當查清和追查這個後臺老闆是誰？

製造謊言是為了發動武裝政變

從 1989 年到 2010 年，21 年了，李鵬的日記加了不少內容，可是 6 月 3 日的“反革命暴亂”的定性根據，還是停留在勞教犯張建忠殺害解放軍戰士劉國庚、公安機關扣留過的李衛東等殺害了戰士崔國政，以及勞教三年的孟多殺害戰士李國瑞三人這三宗案件上。李鵬自己也承認“越來越多的事實表明，攻擊解放軍，搞打砸搶的歹徒，主要是那些以前有過犯罪行為，極端仇恨國家和政府的人”《李鵬日記》供認，這些人肯定不是廣場上的學生。那麼，請問祇有這三個個案，就應當調動幾十萬大軍，用真槍真炮和坦克進入京城屠殺青年學生和平民嗎？

聯係《李鵬六四日記》中透露的陰謀：1989 年前的“前幾年”，李先念、陳雲、鄧小平在上海就多次密謀推翻趙紫陽為總書記的黨中央。那麼，所謂 6 月 3 日的“反革命暴亂”，祇是發動倒趙武裝政變的藉口。學生運動是單純的反腐敗靜坐示威，沒有“暴亂”，更不是“反革命”。真正煽動反人民、反改革的武裝政變，也可以稱“反革命暴亂”的罪人，正是李鵬及其後臺鄧小平、李先念、薄一波等人。至於《告全國人民書》中提到的出面製造暴行的有“‘四人幫’的殘渣餘孽”，李鵬日記中沒有舉出具體人名。本人可以檢舉一人，即徐

惟誠（曾任中宣部副部長），以《北京日報》負責人身分，參與起草挑起學生憤激情緒的《人民日報》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徐惟誠即“餘心言”——文革中的“四人幫”的主要筆桿子，這個寫作班子是打壓了不少知識分子的一根大棒，他確實在“八九風波”中起了極為惡劣的作用。

因此，“六三反革命暴亂”罪名是不能成立的，不是事實，必須平反。相應地，趙紫陽“支持動亂、分裂黨”的罪名，也是不能成立的，必須平反。強加給學生領袖的罪名也是不能成立的，通緝令、判刑的決定也是錯誤的冤案，必須平反。至於鄧小平、李鵬等人的罪行，應當清算。

解放軍都懂得是軍史的恥辱一頁

回顧“六四”，“鎮壓反革命暴亂”、“平定暴亂”這些令人瞠目的罪名，形成了極為緊張和恐怖的氣氛，三位解放軍屍體久久不處理，象懸在市民頭上的達摩克利斯利劍，復仇之火隨時可燃起。人們知道一場殘殺不可能避免，追查、逮捕民運人士，被判刑的命運在等待著他們。同時，三位解放軍屍體的慘狀，激發了年輕戰士對戰友的同情，對市民、學生的憤怒，使他們誤信了“反革命暴亂”的謊言。這樣人民解放軍變成了陰謀家殺害人民的工具。李鵬、

同學們將收繳的槍械集中送往公安局。



李先念在鄧小平支持下完成了“反改革的軍事政變”。但是，到了2010年，李鵬在《六四日記》中仍然堅持6月3日的北京出現了“反革命暴亂”，6月4日是鎮壓“反革命暴亂”的陳詞濫調。請問李鵬，你有什麼證據？除了三個刑滿釋放分子殺害了三位解放軍的個案以外，還有什麼新的拿得出手的證據嗎？沒有，一點也沒有。

2007年，在軍事博物館舉行了紀念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80週年的大型展覽，展覽的實物和放大的大照片中，沒有《李鵬六四日記》中大肆宣揚的平定“六四”、“反革命暴亂”的展品。解放軍三總部低調處理“六四”，只在一個角落有一位被壞人殺害的“共和國衛士”的照片，另兩位死者的照片都沒有展出。這場調動20多萬大軍的大型內戰，在軍史展覽中輕輕放過。事實證明，解放軍都懂得，這不是軍史上光榮的一頁，而是恥辱的一頁。張愛萍七位上將反對解放軍進入北京城區的意見，是正確的、正義的，他們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光榮傳統的真正代表。黨中央把“反革命暴亂”的定性，早已改為“八九風波”了，實際上承認是“風波”，是人民內部矛盾的群體事件。到了2010年李鵬仍然堅持是“反革命暴亂”，證明他是一個死不認錯的頑固分子，他不如軍閥段祺瑞，敢於下跪認罪。李鵬是一個沒有良心的石頭人、法西斯分子。（姚監復）□

薄熙來事件顯示出權貴資本主義發展至今，高官腐敗已經給中共政權造成巨大危機。“在執政者想遮醜不成，就得減壓，起碼將高壓鍋的閥打開一點，對‘趙紫陽’、‘六四’等敏感詞解禁，就是減壓行為，起碼是試探”

中共不得不考慮 糾正“六四”歷史罪錯

2012年2月中下旬，中國大陸網站上突然對“趙紫陽”、“六四”等敏感詞及相關文章解禁。有人評論稱，這是中共發出了政治改革的訊號，但中國資深媒體人高瑜在接受《新史記》專訪時提醒，給八九民運參加者、給趙紫陽、鮑彤平反，才說明共產黨真正要承認錯誤，也才能夠真正朝政治改革邁出那麼一步。

高瑜原任職於中新社，1988年10月擔任《經濟學週報》副總編。1989年6月3日與1993年10月2日兩次被拘捕，先後在獄中度過近七年，其報導精神受國際肯定，多次獲得國際獎項，包括世界報業協會暨主編論壇自由金筆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首屆新聞自由獎、全球20世紀新聞自由英雄獎等獎項，著有《我的六四》一書。

中共不得不考慮平反“六四”

自1986年年底以來，鄧小平等中共元老批鬥胡耀邦，逼胡下

台；1989年胡耀邦病逝，引發大規模學潮，最終導致“六四”悲劇。鎮壓發生後，“胡耀邦”、“趙紫陽”、“八九民運”、“六四”均成敏感詞，中國官方媒體對之都奉命冰凍，“六四”更一直是不得觸碰的禁忌話題。但2月底，中國網絡突然開放“趙紫陽”詞條和“六四”相關文字照片的搜索，網民也可登錄“趙紫陽網上紀念館”。清明節，200多位到趙紫陽故居悼念的民眾並未如往年一樣遭到當局的極力阻攔。

高瑜在接受《新史記》專訪時分析，糾正“六四”動用軍隊開槍鎮壓的歷史罪錯，是中共當局不得不考慮的事。“六四”至今已過了23年，民怨一直未消，加之社會貧富差距越來越大、人民和政府的矛盾尖銳，權貴集團越來越貪腐，都讓社會的這口高壓鍋面臨臨界點的危機，如今又發生薄熙來事件——共產黨執政63年最大的一樁醜聞，就讓原本就快爆開的壓力鍋更加沸騰。

前重慶市副市長、公安局長王立軍私逃美國駐成都總領館，外交事件雪球越滾越大，直到對薄熙來免職、停職，立案調查。薄妻谷開來等則因涉嫌英國人尼爾·海伍德死亡案，移送司法機關。

高瑜對《新史記》表示，薄熙來事件顯示出權貴資本主義發展至今，政治局層面官員的腐敗已經對共產黨政權造成巨大的危機，要解決這個危機，中央首先想到得減壓。“只有在一黨專政下，權力不受監督，才會出現這樣驚人的醜聞。共產黨想遮醜不成，就得減壓，起碼將高壓鍋的閥打開一點，對‘趙紫陽’、‘六四’等敏感詞解禁，就是一個減壓的行為，起碼是試探行為，看看民眾的反應如何。”

英國《金融時報》引述中共高層消息來源稱，溫家寶近年曾三次在不同的中共高層會議上，提出平反“六四”，但每次都遭到反對，反對最力者之一為薄熙來。報導稱，隨著時間的流逝，反對平反“六四”的官員逐漸減少，阻力也逐漸減弱，因此即將卸任的溫家寶可能冒險地假設，已到了能夠糾正歷史錯誤、推進政治改革的時刻。

高瑜卻對《新史記》指出，雖然胡溫上台後，已針對胡耀邦舉辦過黨內座談會，舉行過紀念胡耀邦90壽辰的大會，但對趙紫陽並

沒有進行過類似活動，今年也只是民眾清明時節到趙家悼念時沒有受到硬性阻攔而已，尚無法因此判定中央有平反“六四”與趙紫陽的意圖。高瑜表示，《金融時報》的消息肯定有來頭，是否中共有意放出的風聲，真實性無法確定。對於平反“六四”一事，從中國媒體上未看出跡象。

高瑜說，若高層真想平反“六四”，最起碼要改善鮑彤的待遇，不再軟禁他並恢復他的黨籍。“鮑彤今年 80 了，從監獄出來後已被軟禁 16 年，最近又生病，右眼忽然看不見，每天打點滴、打活血針，但鮑彤有什麼罪？他可以說是共產黨改革開放的功臣。”

鮑彤之外，高瑜認為趙紫陽本人也需要得到平反。“給他們平反，我就信你真正要承認‘六四’的錯誤，承認八九民運根本不是動亂、暴亂，才能說明共產黨真正要糾錯；要做到，就還是說話不算話。誰能做到這點，誰才能真正推進政治改革，才是邁出了那麼一小步。”高瑜對《新史記》指出，平反八九民運的第一步就是糾正共產黨動用軍隊屠殺和平請願的人民的罪行，下一步是找出殺人罪的責任人來，恢復所有當時被當作暴徒處理的亡者的名譽。

中共發出政治改革信號？

溫家寶自 2007 年開始多次呼籲中國進行政改，最近一次，為其任內最後一次記者會。溫家寶在會上表示，出於責任感，他近年多次談到政治體制改革，已較全面和具體。溫家寶強調“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的成功，經濟體制改革不可能進行到底，已經取得的成果還有可能得而復失，社會上新產生的問題，也不能從根本上得到解決，文化大革命這樣的歷史悲劇還有可能再次發生”。

高瑜對《新史記》說，雖然溫家寶多次談過政治改革，但是說在記者會上所言“談得全面、具體”並非事實。“2007 年溫家寶在兩會之前發表了他自己屬名的長篇文章，但那篇文章和政改沒有太大關係，只是常委會沒有通過的他的政府工作報告的一部分。關於政改，他真正談得比較具體的，是 2008 年 9 月他到紐約出席聯合國



高瑜(高瑜提供)

大會時，接受 CNN 採訪。當時主持人扎卡里亞給溫家寶看一張照片，就是 89 年 5 月 19 號那張著名照片——趙紫陽去看絕食學生，溫家寶站在後頭。從視頻可以看到溫家寶拿到照片後，緊繃著嘴唇，下巴不停顫抖，幾秒鐘後，溫家寶說我知道你的意思，相信問題與中國的民主發展有關。接著他談了民主和普世價值，就這次講得比較多。”

溫家寶接受 CNN “Fareed Zakaria GPS” 主持人扎卡利亞的專訪時，表示當討論中國的民主發展時，一般在三個領域討論這項進程：第一，需要改善選舉體系，使得政府的權力真正屬於人民，為人民服務；第二，需要改善法制體系，依法治國，建立法制國家，需要獨立公正的法制體系；第三，政府應該接受群眾監督，增加政府內部事務的透明度，特別要接受新聞媒體和其他團體的監督。但也需要漸進式地引進一種適應中國特點的體系。

高瑜對《新史記》指出，就溫家寶談的三點，實際做得如何？人民滿不滿意？當然是非常不夠的。在中共黨代會上對政治改革談得較具體深刻的，是十三大報告，該報告提出實施黨政分開、下放權

力、改革政府工作機構和幹部人事制度、建立領導人要和群眾的協商對話機制、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建設等內容，雖然鄧小平下令，十三大報告一個字都不能動，但實際上“六四”鎮壓之後這些內容全部被推翻，例如後來實行了省委書記兼省人大主任、黨的總書記兼國家主席，黨政再度合一。

“溫家寶最近說想把不同意見的人請進中南海，很多人都等著被他請。雖然他也請過科學家，但遠遠不夠。”高瑜認為，中共十八大迫近，今年的主要目標是維穩、控制言論，因此不太可能真正進行政治改革。

權貴資本主義成政改阻力

薄熙來出事後，有分析認為中國的左派力量明顯削弱，改革派力量相對突出。3月14日兩會閉幕記者會上，被視為中共改革派的溫家寶以強硬的話語為記者會劃上句點，震撼全場。

溫家寶回答路透社記者儲百亮有關王立軍事件的提問時，強調：“建國以來，在黨和政府的領導下，我國的現代化建設事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我們也走過彎路，有過教訓。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特別是中央作出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以來，確立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和黨的基本路線，並且做出了改革開放這一決定中國命運和前途的重大抉擇。歷史告訴我們，一切符合人民利益的實踐，都要認真吸取歷史的經驗教訓，並且經受住歷史和實踐的考驗。這個道理全國人民懂得。因此，我們對未來抱有信心。”

溫家寶一席話，被視為否定了重慶在薄熙來治理下的發展路線，亦即否定“文革”復辟的左傾路線。

高瑜對《新史記》說，她從沒想過“左派”有朝一日會翻天。“只有上個世紀六十年代的歷史條件才會發生‘文革’，現在哪有毛澤東那樣的政治強人？哪有一揮手全國人跟著走的帝王式領袖？哪有完全用個人迷信誘騙人民的大獨裁者？哪有能夠讓幾億人民表達愚

忠的歷史條件？‘文革’是煽動群眾、進行‘群眾專政’，搞全國動亂；跟現在中國強調穩定，把維穩作為硬任務正好相反。目前就是毛派煽動，也只是在一些場合燒南方系報紙，組織報告會，辦左派網站，不具備發動全國動亂的條件。”

高瑜也不認為現在中國高層有“改革派”和“反改革派”之分。高瑜回顧說，“六四”鎮壓後，鄧小平南巡講話，表明繼續要走改革開放的道路，此後中國一直循著這條路往前進，走到現在，建成的是權貴資本主義，以黨的各級領導為中堅，形成權力與財富結合的利益集團。“即便不搞政治上的改革，只搞經濟改革，要繼續前進，也應該是徹底市場化。”

但高瑜對《新史記》指出，現在這個權貴集團不願意繼續往前走，經濟上也只願意維持現狀。因為市場化要求民營、國營企業都有公平的競爭機制，權力必須退出市場。“國營企業當‘共和國的長子’，在各方面佔盡資源，虧空了，銀行印票子替你還，老百姓的存款一直趕不上物價的增長，存在銀行利息多年是負值，老百姓承擔所有損失，銀行和政府卻發著大財。”

高瑜說，利益集團也不願意退回到毛澤東時代，因為退回去，他們只能享受政治特權，如何能成為富可敵國的資本家？這些人最想維持現在這個最不公平、最不平等的經濟社會格局，還想榨取、掠奪更多的利益。真正希望變革的是底層的人民大眾。

高瑜對《新史記》說，就算是左派思潮的精神領袖薄熙來，也不能說他是要退回“文革”、實行毛澤東的“大鍋飯”，薄熙來讓“民不聊生”變成“官不聊生”，他用毛澤東的方式“黑打”，把文強一類貪汙資本倒出來，投資在民生上，因此重慶在所有省級市和直轄市裡的房價最低，解決城鄉二元問題也很扎眼：讓農民進城、給農民城市戶口，給農民補貼，有土地的還可以回鄉種地。

高瑜還說，雖然薄熙來的方式，還是強政府、強人政治，絲毫沒有納稅人的觀念，一切他說了算，不過他並非毛澤東式的平均制，也搞招商引資，讓重慶獲得外國資本，人民收入增加。

高瑜對《新史記》指出，溫家寶也關注銀行壟斷的情況，強調

要改變融資機制。3月28日溫家寶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時，決定設立溫州市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規範民間融資的發展。“我們可以看看他下一步會怎麼走。中國民間融資早就是不得已闖出的一條民間金融的道路，已經槍斃好多人了，吳英不是第一個。”

朱鎔基曾強力收縮銀根，並將非法集資10億、侵吞公款300萬的沈太福槍斃；2007年，原浙江本色控股集團有限公司法人代表吳英，因涉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集資7.7億被逮捕，2012年1月被浙江高等法院二審判決死刑。溫家寶提出規範民間融資，被視為對吳英案的回應。“所以你說誰是改革派？誰是不改革派？”高瑜說。

真正的對立是專制與民主

高瑜對《新史記》指出，若要談政治改革，首先，權力必須被制衡，政府要交出部分權力，受到人民監督，否則都是公、檢、法聯合辦案，警察抓人審人，法院審完執行，都是由一個黨委領導，沒有監



1989年“4.26社論”發表後，被激怒的學生立即舉行聲勢浩大的“4.27”大遊行。

督機制，劉曉波案、陳光誠案、趙紫陽案、鮑彤案都是“黑打”，都是中共一黨專制下維穩造成的冤案；其中劉曉波因為《零八憲章》被判囚 11 年，他得到諾貝爾和平獎，就是全世界對中國的譴責。

清華大學社會學系社會發展研究課題組、清華大學凱風研究院的《中等收入陷阱還是轉型陷阱？》研究報告核心人物孫立平指出：

“中國現在可能不是處在改革或轉型的途中，也不是處在中間性的過渡狀態，而是處在一種結合了新舊體制因素的‘混合型體制’定型過程中。在改革和轉型過程中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阻止進一步變革，要求維持現狀。對這種新的體制最理論化的概括也許就是‘中國模式’的概念。”

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秦暉也表示：“左右不可能超越，左右在世界上都有經典樣板，能達到標準就不錯了。真正的對立不是左右也不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而是民主與專制。在民主條件下既可以搞社會主義也可以搞資本主義，但在專制條件下，無論搞哪種主義都是最壞的。當今世界的問題是缺乏民主的世界治理結構。”

高瑜對《新史記》指出，她贊成以專制和民主作為關鍵的分野，美國、北歐、澳大利亞、法國、英國等國家，雖然政治制度不完全一



2009 年，香港舉行大規模的紀念“六四”20 周年大遊行。

樣，但都實行民主制度，權力有制衡、人民有選票，所以不管建設社會主義或資本主義，都可以做得很好，且不斷改進。

但在專制條件下搞社會主義或資本主義呢？高瑜說，毛澤東搞社會主義，政治運動一個又一個，結果餓死幾千萬人；鄧小平搞資本主義，建成了最壞的權貴資本主義——“問題的關鍵在於專制制度”。

“重慶的民生搞得比較好，只因為它正視了貧富差距巨大的現象，政府決策必須向民生傾斜、建設一大批公租房，這樣富士康等大企業就會從沿海搬到重慶，但政權還是完全集權式，所以造成‘黑打’，集權制度讓人非常沒有安全感。”高瑜對《新史記》說。

高瑜認為，薄熙來的“黑打”確實錯誤，但也是一黨專政的制度賦予他這樣的權力。對於薄熙來的作法是“文革”復辟的批評，高瑜認為，要問為什麼“文革”還有市場？1981年鄧小平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主要目的是為了搞權鬥、拉下華國鋒。她對《新史記》分析說，《決議》主要為了穩住毛澤東在黨內的歷史地位，並把“文革”的錯誤都歸給林彪和“四人幫”，鄧小平才能以正統傳人身分接班。“四項基本原則”就是對毛澤東專制主義的繼承，這才釀成了今天“文革”復辟的趨勢。“重慶和中央只是五十步笑百步，都是一黨專政，而不是改革派和保守派的問題。”

中央與民間矛盾越積累越多

“六四”事件至今23年一直未獲糾正，高瑜認為這是中共在維護利益集團和政權合法性的需要下，奉行鄧小平路線的結果。

“六四”之後經濟上獲得高速發展，是以剝奪底層為代價的，導致社會矛盾加劇、冤假錯案一宗接一宗，中共唯恐糾正“六四”，可能會引發大規模社會動盪，對歷次政治運動起連鎖反應，因此只能花上巨額的經費高壓維穩，其結果只能讓社會矛盾越積越多，社會這口高壓鍋的壓力越來越大。



“六四”20周年時，澳大利亞悉尼市中心貝爾莫公園舉行紀念活動。

高瑜對《新史記》表示，如果中國及早進行政治改革，根本不會發生“六四”——1989年學生提出的七條要求，歸納起來一是要自由和寬鬆的政治環境，二是“反官倒”。5月10日的政治局會議上，趙紫陽回應學生的政治要求，提出“在廣泛討論的基礎上，制定《新聞法》和《遊行示威法》”，就是試圖推進民主法治，推動政治改革，獲得常委胡啟立支持，但這一努力，被鄧小平强行中斷。

另一個是高幹子弟經商而引發的“官倒”問題。高瑜指出，趙紫陽提出讓人大立案，首先從他的兒子查起，而非交由中紀委調查，“這是正確的，因為人大是最高權力機關，後來在趙紫陽兒子身上沒有查到任何問題，連公共汽車票都算進去了，也沒發現貪汙”。

高瑜對《新史記》說，如果按照趙紫陽所提出的意見來執行，第一，不會出現“六四”鎮壓，第二，藉著學生的愛國民主運動，中國的政治改革很快能推展開來，但結果趙紫陽卻被批評為支持動亂，被拉下馬。“結果鄧小平一個人說了算，拍板定案，軍隊進城殺人，這是共產黨犯下的重大罪行，這樣的罪行還不該糾正？”高瑜說。

高瑜對《新史記》表示，胡溫上台之初，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教授，社會問題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嶸曾前往底層瞭解農民的需求，農民給出的答案是需要陳勝吳廣，于建嶸立即建議中央減

免農業稅，但農業稅免了，土地財政卻來了。因為農業稅原本為全球只有極少數國家才有的賦稅，農業稅一減，官員亂收苛捐雜稅的渠道變窄了，便開始掠奪農民的土地，農民和政府的對立與矛盾越加激化。

“農民都要打土豪分田地，打倒共產黨政權，像過去打倒國民黨那樣，幾乎要搞革命。誰保留了毛澤東？誰製造‘文革’重演的土壤？為什麼現在還有‘文革’危險？這不是共產黨自己造成的嗎？”高瑜質問。

雖然清明節前中共曾開放網絡敏感詞匯搜索，但不久後又以掃除網上造謠傳謠的名義，關閉新浪和騰訊等微博評論功能，且關掉16家被指造謠的網站，並將“六四”、“趙紫陽”等敏感詞都封鎖起來，連高瑜剛開一個多月的新浪微博也遭封殺。高瑜對《新史記》表示，中共的目的就是封鎖輿論。

“如果是公共話題，我認為謠言不算回事，謠言出現的原因，就是因為掌握公共權力的人信息不透明。如果官方發生事情，立刻公布事實，問題很好解決。而且，保障言論自由，不只保障發表正確言論的自由，也應該保障發表錯誤言論的自由。誰能保證自己的言論都正確呢？包括政府部門和領導人的言論，包括官方媒體的言論，都不能保證沒有錯誤。所以封網抓人，其實就是要全面封殺輿論。”高瑜說。

高瑜對《新史記》表示，中國若真的要政治改革，就必須改變專制體制，開放黨禁、報禁。1989年5月10日趙紫陽在政治局會議上提出的五條，就是要真正推動政治改革的措施，23年過去，政改仍沒有動靜。“中國今年走政改這一步的機會不大。但這仍是我多年來的期盼。”（《新史記》記者 柯宇倩）□

“得到了天空，失去了大地。”這段話雖然很有詩意、很浪漫，但聽在流亡者的耳中，卻很辛酸。好在，流亡生活讓吾爾開希見到了另一個世界，能跟最優秀的大師、思想家在一起，是流亡給自己的補償和贈禮

流亡是一個了不起的 學習機會

1989 年“六四”事件後，被列為“通緝犯”的學生領袖吾爾開希，展開了他的流亡生涯。多年來，吾爾開希三度向中國政府自首，希望回中國探望年邁的父母親，均未能如願。2012 年，吾爾開希在紐約對《新史記》記者回顧流亡生活時表示，流亡是一種精神酷刑，讓他“得到了天空，卻失去了大地”，但它同時也是一個了不起的學習機會，讓自己對民主的概念理解得更深刻。

21 歲就基本奠定人生

1989 年 4 月 20 日，在學運尚未成氣候時，吾爾開希與幾名朋友秘密籌劃，期望藉胡耀邦喪禮的機會，將學運組織化，因而發起了“北京師範大學學生自治會”及“北京市臨時學聯”，動員起 8 萬多名學生前往天安門廣場追悼胡耀邦。4 天後，“北京市臨時學聯”改名為“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高自聯），成員為北京 50 多所高等院校學生自治會，由吾爾開希擔任主席，其中 9 所院校被推選為常



吾爾開希（《新史記》記者柯宇倩攝）

委院校，“高自聯”也成為 1989 年民主運動中起到核心作用的組織。

一場鎮壓讓形勢翻轉了過來，“高自聯”被官方貼上“非法”、“煽動和組織反革命暴亂”的標籤，吾爾開希也在“六四”事件發生後的第 9 天，6 月 13 日，成了北京市公安局對 21 名學生運動領袖的通緝令中排在第二的在逃犯；而營救民運人士的“黃雀”行動也在秘密進行。

吾爾開希先逃到澳門，再經由香港到法國。2011 年 1 月初病逝的香港支聯會元老司徒華曾透露，吾爾開希父親是蘭州軍區空軍軍官，吾爾開希被通緝後，是乘坐父親所駕的蘭州軍機到珠海，司徒華得到吾爾開希在珠海的消息，立即安排接人。

營救吾爾開希的行動三次才成功。第一次，風浪太大，船無法靠岸，但對方仍要收取 20 萬元的費用；第二次，對方表示有解放軍在附近，無法接到人，卻也要收 20 萬；第三次終於營救成功，於是，

李永達帶著總共 60 萬現金，前往香港一家酒店贖回吾爾開希，隔日，吾爾開希就坐飛機去了法國，然後前往美國哈佛大學進修。

在美國期間，吾爾開希認識了在美國求學的台灣人陳慧玲。吾爾開希最後選擇與陳慧玲一同回到台灣，兩人婚後在台中市定居。近年來，吾爾開希的工作重心，已從一名政治評論家，逐漸轉移到科技業上。

吾爾開希在接受《新史記》訪問時回憶，1989 年時，他是一名學生領袖，從此基本奠定了 21 歲之後的人生，會是一名中國民運人士、中國的反對派，對於這個身分，吾爾開希認為自己不僅有高度的責任，也有高度的認同感。

但無法再踏上故土，仍是吾爾開希心中的一個遺憾。吾爾開希說：“流亡是一種精神酷刑，因為在國外流亡的這段時間，無法回到自己的祖國、被迫與家人分隔。”同樣因“天安門事件”而流亡海外的遠志明說過一句著名的話：“得到了天空，失去了大地。”吾爾開希對《新史記》說，這段話雖然很有詩意、很浪漫，但聽在流亡者的耳中，卻很辛酸。

為什麼要三次投案自首

在海外流亡多年，吾爾開希心中最放不下的就是年邁的雙親。吾爾開希自 1989 年底，便與家裡保持聯繫，但仍舊無法彌補無法親眼見到雙親的遺憾；就連吾爾開希舉行婚禮，他的父母都無法參加，因為其父母被限制出境，無法取得護照；至今，吾爾開希已與家人分隔 23 年。

他在海外流亡期間，父親兩次病危，母親中風，促使吾爾開希下定決心用投案自首的方式，希望回國與父母見上一面。

2009 年 6 月 3 日，吾爾開希試圖入境澳門，表明自首意願，並希望中央駐澳門聯絡辦公室協助他返鄉探親，但澳門治安警察局拒絕吾爾開希入境；

2010 年 6 月 4 日，吾爾開希欲進入中國駐東京的大使館自首，

遭到日本警方逮捕，隨後被釋放；

2012年5月18日，吾爾開希前往美國首都華盛頓的中國大使館，第三度自首，仍不得其門而入。

在自首前，即使明白被拒絕的機率要遠遠大於被接受的機率，但因為被接受還是有一線可能，吾爾開希仍決定一試。“如果要做政治博弈，一定要做各種各樣的概率分析。相信所有在海外的人都能認同，對共產黨的預估，都不是百分之百準確。我們是它多年來的對手，已經相當瞭解它，因此對它的預估應該是相當準確的，但即使這麼瞭解，我在自首的時候都沒有把握它一定會按照自己的預估來拒絕我。”

吾爾開希對《新史記》回憶，在澳門第一次試圖自首前，他曾進入過澳門，如果當時能再度入澳門，他已準備好走進中聯辦，在此情況下，吾爾開希認為中共是可能將自己抓起來的，他說，本來民主運動，尤其是這種以政治反對派的身分來撞擊體制的民主運動，就要有付出代價的準備。

“如果真的可以回到中國，就是回去坐牢，但坐牢是有價值的，就像台灣早年很多異議份子坐牢，我們都知道是有價值的。”1989年時，吾爾開希沒有試圖推翻共產黨，他們只是用和平、理性的方式，向中國政府提出對話的要求；23年過去，吾爾開希仍試圖開啟對話，哪怕是透過起訴書和答辯的方式。

吾爾開希對《新史記》表示，他想通過投案這件事，向全世界凸顯幾個訊息：一是中共的荒謬，例如中共既然通緝他，當他自首時，卻將他拒絕於門外；而共產黨又不允許吾爾開希的父母出境探望兒子，只要有人性的人，都會覺得辛酸、荒謬。吾爾開希相信，每個人也會認可他對共產黨的指責：野蠻、原始，與一個崛起大國的形象完全背道而馳。

第二，中共今天如此強大，使得全世界，包括美國、西歐、日本在內，都似乎得面對一個蠻橫、強悍、霸道的中國，不得不讓步；但仍有很多如吾爾開希一般的人，不怕去坐牢，不怕面對這樣一個中共——而不怕它的人，它會怕。

“天空”美好在學習機會

即使無法與父母見上一面、即使必須忍受失去“大地”的辛酸，但流亡生活讓吾爾開希見到了另一個世界。

吾爾開希對《新史記》表示，流亡提供他們這些流亡者一個相當好的學習機會，這也是“天空”的美好所在，“在中國，我們不可能有這麼寬廣的視野。”

他說，“如果一腔熱血的天安門學生如果沒有被鎮壓，如果我們沒流亡，如果高自聯能合法存在，繼續在中國推動民主，像後來波蘭的團結工會，也會是一個很精彩的人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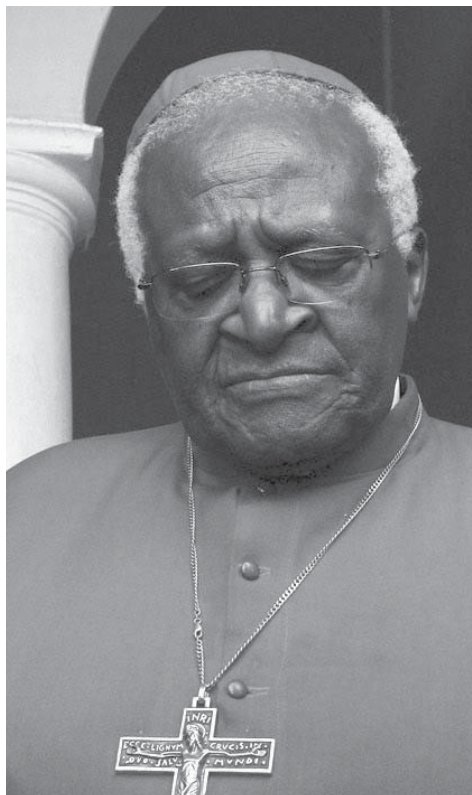
但流亡帶給流亡者的，是更開放的眼界與更多的學習機會。吾爾開希流亡後，與許多大師面對面接觸。例如他見到了在中國時就相當景仰的圖圖主教，得以直接感受圖圖主教的個人魅力，從而也更關注圖圖主教的思想言論。

身為南非開普敦聖公會前任大主教、首位南非聖公會非裔大主教的圖圖主教，自 1980 年代起就致力於廢除種族隔離政策，追求讓黑人在南非能擁有人權。1984 年，圖圖主教為此獲得諾貝爾和平獎。

在南非完成轉型後，圖圖主教仍持續推動種族和解，他推動成立的最重要組織為“真相與和解委員會”，從 1995 年成立到 2003 年完成使命，委員會在南非各地進行了 2 萬 1 千多場聽證會，收集了 7 大冊資料，作為日後追究責任的依據。身為維吾爾族的吾爾開希，對這類事件所帶來的衝擊和啟發，有更深的感觸和思考。

圖圖主教外，吾爾開希也見到了顏色革命之父夏普 (Gene Sharp)，與之面對面談話、探討在專制體制內推動民主化的問題，吾爾開希說，能跟最優秀的大師、思想家在一起，是流亡給自己的補償和贈禮。

吾爾開希對《新史記》表示，1989 年時，他們並不真正理解民主是什麼，相信今天中國大部分的老百姓，對民主的理解也是很粗



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圖圖主教。

淺、模糊的，不過，即便是粗淺、模糊的理解，仍然扣住核心，雖然他們沒有在民主社會裡生活過，但卻知道“不民主”是什麼滋味，他們對專制的感受是深入骨髓的。

流亡過程讓吾爾開希有機會生活在民主社會裡，對民主有更全面、深刻的瞭解。吾爾開希分析，他過去居住過的三個地方：法國、美國、台灣，都各有民主特色：法國是發源地、美國是旗艦、台灣是華人的新興民主化社會，其中，因為吾爾開希被台灣所接受，得以親身參與台灣的社會發展，因此對台灣民主的思考和理解，又深刻得多。

吾爾開希對《新史記》表示，身為“六四”學生，為了追求民主、自由，而失去了自己的自由；背井離鄉，卻被甩在最自由、最民主的地方，這可說是歷史給他開的一個玩笑，卻也是上天賜給他的一個機遇，能讓他在這樣的時候來思考、瞭解、學習民主，因此他認為自己

有責任，也很願意擁抱民運人士這樣的身分。

如果人民不滿權力分配模式

中共更換領導人，不少人期待在新總書記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國，將朝持續政治改革的方向前進。吾爾開希認為，中國若要發生變化，還是必須靠來自中國內部的力量。

權力結構的變更、權力高層的轉變，這些都有可能導致巨大的社會和體制的變遷。

吾爾開希指出，權力更迭的過程中發生體制改變的例子比比皆是，在此情況下，薄熙來倒台會有什麼政治後果、黨內保守派和自由派之間的衝突能不能讓中國走向民主化，都是值得關注的議題。

但黨內的變革絕對不會是偶然的，必定有很多必然因素的推動，吾爾開希表示，這些必然因素中，最值得努力的著力點是：改變中國社會對政治體制所規劃的權力分配模式的態度。如果人民對這樣的分配模式有相當程度的不滿——更重要的是：不配合——轉變發生的機率就會提高。

“比較簡單的說法是，等到老百姓對於你給他規定的角色非常不買帳、而且用行動表達出來時，這個壓力就是直接的。中國畢竟是專制國家，他面對壓力通常的反應是壓制，但在權力轉變過程中，在野心家、同時也可能是改革家輩出的時代，人民的不滿可以是推動社會變遷的阻力，也可以是助力，到時能否真正完成我們民運人士期待的民主化變遷，很難說；但是否會朝這方面走得近一點，很有這個可能。”（《新史記》記者 柯宇倩）□

八十老人姚監復說：我探望被軟禁中的趙紫陽時，問他：學潮中是不是陳希同、李錫銘他們合夥欺騙了鄧小平，所以鄧才決定戒嚴？趙紫陽回答：如果鄧小平能被他們這些人欺騙，那就不是鄧小平了！我向陳希同轉述了趙紫陽的這句話。這句話說到陳希同心裏去了！

如果鄧小平會被騙， 就不是鄧小平了

《新史記》記者 10 月上旬在於紐約長島舉行的“胡趙精神與中國憲政轉型國際研討會”上，與專程前來的姚監復重逢。也巧，他出生於 1932 年 10 月 9 日，再過三天就是他的八十大壽。不過，紐約的會議還沒結束，這位忙碌的老人就要趕往歐洲參加一個人權會議，他的生日要在旅途上度過了。

姚老自稱“一目瞭然”——這句成語用在這裏，表明了樂觀自嘲的心境，更概括了一段“文革”中不堪回首的慘痛往事：姚監復被打成“現行反革命”，被開除黨籍、撤消黨內外一切職務，“文革闖將”每天用硬橡膠包著鋼絲的鞭子打他，打瞎了他的右眼，把他流放到湖南西洞庭湖農場“隔離審查、勞動改造”……

用僅剩的一隻眼睛，姚監復卻努力看清變幻莫測的歷史與現實。2012 年堪稱他的豐收年：元旦，他執筆整理的胡績偉《胡趙新政啟示錄——並對“新民主主義”進行剖析》在香港出版；6 月 1 日，他專訪整理的《陳希同親述：眾口鑠金難鑠真》在香港出版；這一年，他還發表了許多評論。



姚監復在“胡趙精神與中國憲政轉型國際研討會”上發言。

在紐約會議期間,《新史記》對姚監復的專訪,是從他本人及家族的“文革”遭遇談起的。

“文革”中母親被砍死

姚監復能活到今天,他自己也覺得不可思議。

姚監復的父親原為國民黨上校,淮海戰役中,父親參加起義;母親為小學教員。抗日戰爭中他隨父母撤退到四川、甘肅、陝西。抗戰勝利後到江蘇蘇州。1949年後在哈爾濱工業大學讀預科、本科,1957年畢業,分配到中國農業機械化科學研究院。年輕的姚監復,已經走遍華東、西北和東北,見多識廣了。

然而,遇到“文革”,他如同遭受雷殛。談到家庭經歷的悲劇和母親賀書華的死,姚監復聲音低沉。

當時,他因貼過幾張農機研究院領導的大字報,被農機研究院

裡的“革命群眾”揪鬥，胸前被勒令必須掛著“反革命分子”的牌子，行動失去自由，無法與死去的母親見最後一面。他最小的妹妹姚蜀平是目睹者，後來寫了一篇迴腸蕩氣的《兒女祭》，文中寫道：

……只見母親身穿一身破舊的香雲紗衣褲，那是陪伴了她幾十年，黑色早已洗成黃色，膝蓋處還打著補丁的舊衣褲。她赤著腳，手臂和兩腿裸露出的地方是明顯的傷痕。頭髮更是被剪得不成樣子，有的地方齊髮根沒了，有的地方留下幾縷長髮，卻讓血跡粘在一起。而她的頭，卻是偏向一邊……

兩個火葬場的工人，抬著母親屍體走到卡車後面，四手一掄，屍體就被扔到了卡車上。他們轉身又去抬第二具屍體。我看他們走遠，不由自主地登上了司機座的踏板，伸頭向卡車裏張望……母親的面孔竟然就在我眼皮底下，離我不到二尺。啊！我清楚地看見了，她的脖頸上有一道長長的刀痕，她是被砍死的！我還看清了那一頭剪亂的白髮，那滿身的傷痕……

姚監復的父親被趕出北京，勒令回到原籍，膽戰心驚又牽腸掛肚地過了兩年。1968年清理階級運動高潮中，姚監復單位的專案組派了兩人，不遠千里來到安徽大別山腳下的小村莊，對老人講，你的兒子污蔑江青，已被定為“現行反革命分子”。老人得知自己第二天也將在公社大會上被批鬥，當晚就自縊了。

若干年後，姚監復才獨自來到父親墳前，放下妹妹1986年在雜誌上發表的《兒女祭》，及五包香煙、五個蘋果。1990年，兄妹五人，在北京西山金山陵園，為父母修了一座衣冠塚。

姚監復告訴我：母親死後的慘狀給了妹妹強烈刺激，後來她晚上時常從惡夢中驚醒。“所以她執意要離開那塊傷心之地，再怎麼困難也要到美國來，要入籍定居……”

《新史記》記者查到，姚蜀平是讀科技史的，1963年畢業於中國科學技術大學近代物理系，先後在核工業部和中國科學院高能物理所和政策管理所工作。1985年首次向國內介紹台灣學者柏楊和李敖。姚監復告訴我，她的知識面相當廣，八十年代初第一次來到美國，在美國哈佛大學科學史系任訪問學者，研究為什麼那麼多外國人

能獲諾貝爾獎，中國人在中國就不能？她研究出一個重要原因是：如果在現實生活中被告知要當“螺絲釘”，要做“馴服工具”，那麼進了實驗室，能有自由的想像、獨立的追索和創造性的發揮嗎？“她寫成了文章，許良英推薦給《自然辯證法》雜誌用了。但是教委就把她當成重點了：當科學家就不能學雷鋒？宣揚學雷鋒就阻礙了中國科學發展？——在中國，這些說法都犯忌呀！”

姚蜀平 1989 年再次赴美講學，先後曾在美國史密斯學院、弗蘭克林·馬歇爾學院和本特立學院任教。在物理學史、中國科學院院史、中國留學史及現代化等方面做過研究，參與電影劇本《李四光》、電視專題片《共和國之戀》創作，發表過長篇、短篇小說和散文等。

在中國，什麼都是政治

姚監復本人大學畢業後，到了農業機械化科學研究院。這樣一個機構，本來與政治離得甚遠，但在當年的中國，又有什麼不與政治扯上瓜葛呢！研究院安排他搞鑄造工藝、農業機械化的情報，後來安排他到秘書科當副科長，又要他搞農機化的技術經濟研究，從技術、經濟、社會、文化發展的視野中觀察農業機械化。這本來都不是政治任務，但農業機械化最後也成了毛澤東與劉少奇路線之爭的一個焦點。

姚監復在《農業機械化：毛澤東打倒劉少奇的政治武器》一文中，回溯了 1966 年初，毛澤東繼文藝戰線批“海瑞罷官”、“三家村”揭開“文革”序幕以後，又怎樣在經濟戰線上，從農業機械化入手批判劉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姚監復認為，1966 年 2 月，毛澤東給王任重的信與王任重給劉少奇的信，實際上，形成“文革”又一啟動工序。關於這兩封信，《新史記》雜誌第 8 期已經做過詳細介紹。

姚監復對《新史記》記者說，1966 年 2 月爆發的一場延續到“文化大革命”之後很長時間仍在爭論的農業機械化問題，在一些指標、期限、方針、路線不同觀點爭論的背後，隱藏著一場更重要的“姓社

姓資”的大爭論；在明面上是討論 20 年還是 25 年或是更長時間才能基本上實現農業機械化的問題，實際上準備了一頂是不是堅持反對和平演變、資本主義復辟的大政治帽子，1966 年 2 月毛澤東向劉少奇在農業機械化問題上開火，也是 8 月“炮打司令部”另一場預演，是繼批《海瑞罷官》、批彭德懷之後，直接批到劉少奇頭上的安排。

姚監復說，直到“文革”過後，黨中央《關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明確指出，“1980 年基本上實現農業機械化”的口號是“脫離實際”以後，人們才接受了農業機械化不是“革命運動”，而是社會、經濟、技術發展過程的觀點。

姚監復對《新史記》記者強調：地域性差異極大的中國，機械化只能是“選擇性”的，選擇的主體，只能是農民自身：“最終要由他們來決定，究竟要不要機械化？什麼時候要機械化？”

姚監復關於“1980 年實現農業機械化的口號肯定實現不了，也根本不應這麼提”、“要由農民來選擇要不要機械化”的觀點，讓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潤生聽到了。杜潤生把“知天命”之年的姚監復，調到了自己手下。後來，他又將姚監復關於應該由農民自主選擇是否機械化這一思想，寫進了 1983 年的中共中央一號文件；時任國務院總理的趙紫陽，在一次談科技的場合也闡述了這個意見。姚監復說，“本來農業部等部門是不接受這一思想的，慢慢也改變態度了”。

見陳希同緣於表姐送書

姚監復與陳希同，本是“兩股道上跑的車”，他這樣一位公共知識分子、一位聲譽鵲起的自由派意見領袖，怎麼會與在“六四”之後一度被某些異議人士提起來就咬牙切齒、恨不得食其肉、寢其皮、又是個“貪汙犯”的陳希同扯到一起，幫這位前中央政治局委員、前北京市委書記出了那本《陳希同親述：眾口鑠金難鑠真》（以下簡稱《親述》）？

姚監復對我細述原委：認識陳希同，與自己的表姐鍾鴻有關。

鍾鴻也是個名人。早年畢業於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後來出版過詩集《夢未了》、《百花吟》、散文集《尋美、尋樂、尋情》，尤其在戲曲方面著力甚多，創作並上演了舞臺京劇《雪映古城》《玉碎名園》《站上風雲》《黛玉葬花》《鐵杵磨針》等；她還主辦了大型刊物《中國電視戲曲》，組建了北京市的京劇昆曲振興協會和電視戲曲協會……她最著名的作品，是電視戲曲劇《曹雪芹》，獲得了1991年度的“飛天獎”。

“我這個表姐寫了一本自傳，題為《風雨半枝蓮》，其中回憶到陳希同。”——《風雨半枝蓮》這本書於2007年出版，兩位著名作家王蒙與叢維熙寫序，當時頗有影響。

原來，陳希同1948年進入北京大學中文系唸過書，1952年從基層調到北京市委工作之後，與也在那裡工作、文化背景相似的鍾鴻認識。鍾鴻後來被打成“右派”之後，陳希同對她表示同情。她寫《曹雪芹》的電視戲曲劇本時，遇到很多困難，手中掌管越來越大的權力的陳希同支持她寫，資助她，這部作品終於獲得了成功。“她在自傳中就寫了這一段經過，對於幫助自己的人，她銘感於心，儘管這本書出版的時候，陳希同已經鋃鐺入獄了。後來，她聽說陳希同保外就醫，就想送一本給陳希同。”

受表姐之託，姚監復設法打聽到了陳希同住在小湯山療養院，2011年元月，居然聯繫上了。姚監復告訴陳希同，表姐鍾鴻要送書給他，問能不能登門拜訪。陳同意了。

姚監復告訴《新史記》記者，一見陳希同，陳就開門見山地強調，自己不是貪汙犯。說他貪汙、判他的刑，完全是個冤案。“所謂貪汙50萬元的禮品，是準備捐獻給北京人民藝術劇院的藝術發展基金會的”，“我打的借條也都俱在”，根本不是據為己有。

陳希同對姚監復詳細介紹了此事的緣起，其實是江澤民的指示：江澤民由李錫銘陪同視察了北京人民藝術劇院後，知道人藝經濟上有困難，就通過中央宣傳部門、北京市委宣傳部，給陳希同捎來口信：希望陳希同市長抓一下文藝工作，幫助人藝解決困難。

陳希同安排讓市委宣傳部長兩次去人藝調查研究了一個月，認

為必須改革，打破大鍋飯制度，改變待遇太低局面。陳希同兩次批示撥給幾十萬元，來解決設備老化，老演員宿舍問題等。又正式經過北京市委、市政府討論同意，創建了一個藝術發展基金會。陳希同向董建華募來 100 萬美金，約折合 800 萬元人民幣；向李嘉誠募來 1300 萬元人民幣；動員市內捐獻，北京市旅遊局捐了 50 萬元……“我動員別人捐獻，自己怎麼辦？在我的名下有一些國內外友人捐送的禮品，按規定可以上交，也可以捐贈，作為善舉，財政上是允許的合法的。”

判決陳希同貪汙罪行時所列出的主要罪證是：陳希同將禮品據為己有，計畫貪汙 50 萬元至 100 萬元，實際上已貪汙十幾萬元。陳希同申辯說，將禮品登記入賬後，擬湊夠 50 萬或 100 萬元，再捐給這個基金會。

借條又是怎麼回事呢？《親述》中說：“我要秘書收集一下，從外事辦借來禮品，打了借條，估估價。……這些禮品，在市外辦有借條。市外辦主任來看我時講，這些借條都在外事辦保存著。我請西單商



《陳希同親述：眾口鑠金難鑠真》。

場經理、建外友誼商店經理商量過，估價值多少錢，如何出售這些禮品，以便轉變成捐贈給人藝基金會的現金，他們都回去向黨委傳達過，這些人證俱在。”

“我能騙得了鄧小平？”

陳希同第二個急欲澄清的是，他是不是謊報軍情欺騙了鄧小平？姚監復對《新史記》記者回憶，“我曾經在探望被軟禁中的趙紫陽時，問過他一個問題：學潮中是不是陳希同、李錫銘他們合夥欺騙了鄧小平，所以鄧才決定戒嚴？趙紫陽當時回答我說：如果鄧小平能被他們這些人欺騙，那就不是鄧小平了！我 2011 年見陳希同的時候，就向他轉述了趙紫陽的這句話。這句話說到陳希同心裏去了！他一拍大腿：對呀！我完全同意紫陽同志的意見！像我這樣的人能騙過了鄧小平，那豈不是貶低鄧小平、把鄧小平說成一個昏君、庸君了嘛！”

姚監復獲得了陳希同的信任，陳希同同意談出自己的經歷和許多想法，由姚監復記錄整理。據姚監復看來，陳希同並沒有要洗刷自己“六四”責任的想法，他說“我做了‘六四’的報告，是上面讓我做，我就做，我承擔責任”。陳希同澄清的只是“李鵬日記”中說他是“北京戒嚴部總指揮”，他說自己並沒有擔任過這個職務。

姚監復認為，陳希同作為“六四”當事人之一，盡可能將他認為的歷史事實講出來，講清楚，然後由讀者判斷是否真實，是否可信，該如何評價，“我贊成他這種態度”。

陳希同在《親述》中，對判決書加給他的幾乎所有罪狀都給予反駁，他說：“陳良宇認罪，我不認罪”。他自己的案子，是“1、文革後最大的冤案”，“2、最荒唐的錯案”，“3、最不得人心的假案”，“4、最不大人道的大案”。

《新史記》記者問：陳希同是否希望通過這本書披露自己的看法呢？

姚監復介紹：“陳希同跟我有一個‘君子協定’，他說：2011 年 12 月 31 日之前，你不要發表。我遵守了約定。這一年過去之後，我希

望發表，陳希同還是要求我不要發表，因為他正在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訴關於他的‘貪汙犯’的問題，他希望申訴得到一個回答：是重新審判呢，還是維持原判？有了回答之後，再決定是否公布這本書。他還表示，想修改一下、審定一下，保證百分之百符合他的原意。但是我考慮，書稿寫出來一年多，他都沒有修改，現在他也不大可能修改了。再說，我也快 80 歲了，該把大家需要知道的事情公布出來了。我沒有遵從他這個意見，在今年（2012 年）出版了這本書。”

姚監復強調，《陳希同自述：眾口鑠金難鑠真》出書之後，陳希同要求說明，並不是他主動要求出書的。“陳希同說他是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堅定的共產主義者。所以這本書，不是陳希同要求出版的，他沒有洗清罪責、改變觀點的意圖。是我本人決定印出來，給讀者和關心和研究歷史的人思考的。”

《新史記》記者問：“保外就醫”的陳希同，是否有人監管？姚監復說，沒有看到。他的行動相對是自由的，在北京城裏可以到處走動。但他的司機，應該負有監管他的職責吧。

姚監復查過療養院的來客登記簿，上面記載，前中央政治局委員、前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王漢斌，胡耀邦的兒子胡德平等人，來看望過陳希同。

衆所周知，陳希同在當市長時與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一直關係不睦。但是“冤家路窄”，李錫銘健康日益惡化，也住進了小湯山療養院。既然同在一個院裡，兩人見過面。

姚監復告訴《新史記》，陳希同說，李錫銘託人捎話願見陳，陳就去看了他，對他說：“把我打入監獄，不是你的意思。”“聽了我的話，這時，他的眼睛裏充滿了眼淚。半天他說不出話，他對我心有內疚。”

李錫銘對江澤民、李鵬則近乎破口大罵：“江澤民是一個大政治騙子、投機分子。”“李鵬是個大混蛋。”

“六四”是一場武裝政變

姚監復在這次“胡趙精神與中國憲政轉型國際研討會”上多次發言，其中也透露出不少令人深思的信息。

姚監復說，2004年3月到5月，我曾多次前往北京富強胡同6號趙紫陽家看望趙紫陽。那時趙紫陽已進入生命最後時日，離2005年1月17日去世，只有不到一年的時間。

姚監復披露，趙紫陽說：“六四”是一場無計劃、無組織、無領導、無綱領的群眾性自發行動。但後來我讀了李鵬的“六四日記”，才知道，“六四”是一場有計劃、有組織、有領導、有綱領的反改革的武裝政變。

姚監復解釋說：李鵬日記中透露，“六四”前的春節，鄧小平、陳雲、李先念就在上海研究，怎麼把趙紫陽搞掉——趙紫陽是黨代會上當選的總書記，你們幾個老人要把他搞掉，這不是政變嗎？還有，1989年5月，李鵬要開會把趙紫陽搞掉，鄧小平說，不行。等軍隊進城以後，有把握了再說——這不是政變嗎？

姚監復說：後來上面找我談話質問這個說法，我就說，這個說法不是我發明的，是我根據李鵬日記分析的。

鄧要趙認錯復出被拒

姚監復在會上還披露了一件祕辛：“六四”後，趙紫陽並不是沒有復出的機會，鄧小平至少兩次派人給他傳話，要他出來工作。但趙紫陽拒絕以檢討、認錯換取復出。

姚監復說，1990年，鄧小平就派人帶話給趙紫陽，說你可以出來工作。趙紫陽回答，如果是到政協這樣不能幹事的單位，我不去；如果要我當總理呢，我肯定比李鵬幹得好。

1991年，鄧小平又派人去告訴趙紫陽，要他出來工作，當總書記都可以考慮，但有個前提：你得認錯。趙紫陽回答，沒有必要重新認識，我的認識到此為止了。“所以，他真正是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的中國英雄！”姚監復說。

姚監復還轉述：1989年5月19日，趙紫陽去天安門廣場看學生

之前，在院子裏轉，他的秘書在後面跟著，聽見他說：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他早就做了思想準備了。而且他給家里人開會說，我要做這樣的選擇，你們都要受影響，你們同意嗎？家里人都支持他。

姚監復指出：我覺得在中國這種世俗社會追求名利權位的情況下，應該學習趙紫陽的道德風格，“他將一個領袖的道德倫理視作高於責任倫理”。

姚監復回憶說：

2004年3月的一天，我去看趙紫陽，他鼻子裏還塞著氧氣管。告別前我說：紫陽同志，我要走了，最後告訴你一句：李銳同志跟我說過，中國共產黨的總書記，都是以作違心檢討下台的，只有兩位總書記，一位是陳獨秀，一位是你，沒有做違心的檢討。聽我講後，趙紫陽拔下了氧氣管，走到我跟前說：“是你說的嗎？”我說：“不是，是李銳說的。”他非常興奮和激動，轉過身，兩隻手向上舉起來——姚監復講到這裡也將手舉起來，模仿趙紫陽的姿勢學著他的話說：“哈哈！陳獨秀，陳獨秀！”

姚監復講完這段往事，又補充說，聽了李銳這個評價，趙紫陽心情十分興奮，“他很高興地跟我合影，要（女兒）雁南照相。雁南說，給你照了好幾張了，可以了吧。趙紫陽說：哎呀，膠捲又不是你的，照吧！”“他在軟禁中，心情一直非常壓抑，但那一次，他非常高興——中國的領導人，都很在乎歷史對自己的評價。”

姚監復說：丁東後來對我分析說，這個細節，反映了趙紫陽的心態：他希望歷史最後認可他。你姚監復把一個黨史專家的評價當面告訴了他，他心裏非常滿意。

多嘴導致“禍從口出”

姚監復很健談——用他自己的話說，叫作“多嘴”。在沒有言論自由的中國，自古以來就有“禍從口出”的古話，樂於表達，給他帶來了不少麻煩。大躍進、大煉鋼鐵年代，學鑄工專業的姚監復在向黨“交心”時，忍不住多說了一句：“我們研究院一千人，平均工資是多少錢？兩個禮拜這麼‘炒鋼’，工資是多少錢？還有六個蘇聯教授也跟



陳希同與姚監復合影。
(姚監復提供)

著這麼‘炒鋼’，這個是多少工資？”這話惹得大家哄堂大笑。誰也沒料到，1959年廬山會議批彭德懷，他就有一條“反黨言論”，說大煉鋼鐵“得不償失”。後來批他，就說你姚監復膽子多大？連彭德懷都只是定性說大煉鋼鐵“得不償失”；你呢，還定量計算出來，論證大煉鋼鐵到底怎麼“得不償失”！？

就因為這句話，上級給他一個“重要任務”，到劉胡蘭公社去勞動鍛煉。“而且把戶口帶過去了”。他的戶口本上，迄今一直寫著是從山西文水縣劉胡蘭公社遷回北京的。

“文革”中，姚監復在劫難逃，同樣是因言罹禍。

不過，姚監復看來是“江山易改，本性難移”了。

“江澤民跟老太婆過不去！”

姚監復告訴《新史記》記者，前人民日報社社長兼總編輯胡績偉

老先生 2012 年去世之前，跟他多次談話。胡績偉的認識是有一個變化過程的。他認為，胡趙新政，就是新民主主義：從 1938 年到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當時的中共根據地推行的都是新民主主義政策，一直到 1953 年之前，都是如此。胡趙十年，也就是重建新民主主義社會。

“但他從希望變成失望，又變成絕望”：羅斯福的“四大自由”，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都沒有實現。

胡績偉思想改變了，提出廢除“三個一”：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後來加了“一個黨軍”）的法西斯制度；再後來他的思想更進一步，認為錯誤的根源不是蘇聯，而是更早的馬克思、恩格斯——他們對時代的性質和任務，都判斷錯誤了，資本主義的喪鐘並沒有敲響，在幾個世紀之內，資本主義都還將繼續發展，如果一定要在條件不成熟時搞社會主義，就必然有人很科學、很理性地起來反對，而當權者就會把他們打成敵人——迄今以來的歷史不都證明這一點嗎？

姚監復說，鄧小平自己說過，什麼是社會主義，我說不清——你“說不清”怎麼堅持？又為什麼將別人打成“反社會主義”？

姚監復在會場上有一番話更引起哄堂大笑：

中共早就反對蔣介石的“一個領袖”，把總裁、委員長、總統什麼帽子都往頭上戴。那麼為什麼鄧小平說：毛主席在，毛主席說了算；我在，我說了算；什麼時候你江澤民說了算，我就放心了？一個人說了算，於是毛澤東搞“反右”、“文革”、鄧小平搞“六四”，江澤民就整法輪功——難怪人們說：毛澤東、鄧小平跟青年學生過不去，江澤民跟老太婆過不去！

“我沒權利不出版這本書”

姚監復這種性格，不可能不跟官方幾次發生衝突。姚監復講述：

2011 年 10 月 10 日，中央宣傳出版領導部門，通過我所屬的黨組織，正式通知我：“你有一本書（指胡績偉著《胡趙新政啟示錄——並對“新民主主義”進行剖析》，要在香港，由鮑彤的兒子出版（指鮑樸的新世紀出



《胡趙新政啟示錄——並對“新民主主義”進行剖析》
(胡績偉, 鮑彤序, 姚監復編)

版社)。有關部門通知你，不要出版這本書。”

我回答：這本書不是我的書，作者是胡績偉，出版不出版這本書，只能由作者作出決定。我只協助記錄、整理、編輯了胡老的談話，我沒有權利決定出版或不出版這本書。另外，出版這本書的單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正式合法出版社，享有出版自由的法律保障，按照“一國兩制”原則，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律，新世紀出版社有權決定出版或不出版某一本書。我也不能代替一個香港的正式出版社做出不出版胡績偉《胡趙新政啟示錄》的決定。

領導轉而提出：“你能不能做工作，不出這本書？”我當即指出，按照共產黨組織的原則，是垂直領導，不能橫向干涉。胡績偉是96歲老人，有74年黨齡的原人民日報社長、總編輯、人大常委教科文衛委員會副主任，不屬於農口黨組織管理的老黨員、高級幹部。如果我以農口單位的研究員、普通黨員的身分，去勸阻胡老不出這本書，或者我干涉香港新世紀出版社的出版自由，他老人家一生氣，把此信息上網，暴露出最高宣傳部門

破壞言論、出版自由和“一國兩制”的方針，不就成了國際新聞和大笑話了嗎？那時，最高領導責怪下來，我們作為傳話人和當事人，能夠承擔這麼大的責任嗎？

我建議我的直接領通向發令者轉達我的態度，作為黨員，我將如實地準確地執行上級黨組織交給我的任務，傳達宣傳出版部門領導的意見給胡績偉。但是，為了避免口頭傳達重要指示的誤差，我希望發令者給我一個書面文件，明確這是中央哪一級領導或者哪一個業務領導部門，還是某一位具體工作人員的指示。要說明是什麼理由不准胡老出這本書？這本書收集的大部分文章都是已經在港刊上公開發表過，為什麼這本書卻不能在香港出版？

姚監復 2011 年 10 月 26 日得知，中共宣傳出版部門認為他的“態度是好的”，因為他表示，可以如實轉達上述意見給胡績偉。但是，拒絕了給予書面文件。（《新史記》記者 高伐林）□

提起 1976 年清明節“天安門事件”中的“小平頭”，經歷過那個年代的人都記憶猶新。被當時的《人民日報》點名的“小平頭”劉迪，因病去世後，生前好友紛紛表示，要像劉迪一樣，為實現中國民主化進程，盡到一個公民的社會責任

中鋒在黎明前死去： 北京悼念“小平頭”

劉迪這個名字，或許人們感到比較陌生；但是提起 1976 年清明節“天安門事件”中的“小平頭”，經歷過那個年代的人都記憶猶新。

參加“四五”運動中被《人民日報》點名的“反革命分子‘小平頭’”劉迪，因病於 2011 年 10 月 18 日去世。用他的好友的話來說，“中鋒在黎明前死去”，並評價他“一生清白，沒錢沒車沒房，兩袖清風，有情有義有德”。

2011 年 11 月 6 日上午，劉迪追思會在北京召開。

參會人員都是劉迪生前的親朋摯友、同學故交。其中有曾與劉迪一起參加 1976 年“四五”運動和“八九民運”的同仁、原《北京之春》編輯部成員和原《今天》編輯部成員，以及劉迪生前長期擔任志願者的“自然之友”代表等。謝小玲代表弟弟謝小慶參會，劉迪夫人張永冠女士和劉迪姐姐劉衛平女士代表家屬到會。

追思會由畢誼民主持。劉迪姐姐劉衛平首先介紹了劉迪的成長經歷；與會者從不同角度回憶了與劉迪相處的歲月和經歷的人生，表達了對劉迪的深切思念與崇高敬意。與會者一致感受到，懷念劉



“小平頭”劉迪遺像。

迪，不僅是對死者的讚賞與評價，更是生者反思自我的機會。在當下物欲橫流和信仰缺失的社會環境中，更顯示出堅持理想、恪守人格和信仰是多麼重要。與會者表示，要像劉迪一樣，為實現中國民主化進程，盡到一個公民的社會責任。

本刊摘選部分與會者的發言。

他是一個英雄，一個功臣

畢誼民（原《北京之春》編委，“四五”運動與“八九”民運參與者）：

1978年我在《偉大的四五運動》寫作組，書由北京出版社出版發行，組織召集編寫的是“童懷周”，有十幾個人參加了這個工作，其中有鄭曉龍、嚴江征、李舟生，還有嚴家其等人。我們找已經平反的參加“四五”的人士，周為民、陳子明、王軍濤、賀延光、孫慶柱等等搜集資料。還有很重要的工作是，要到各個機關去調查事件過程，比如北京市公安局預審處。我和嚴江征去的，手持蓋著大紅章的北京出版社介紹信，去公安局查受迫害人士：你們抓了多少人呀？這些人現在是怎麼處理的？據我們瞭解還有人給關著呢，例如北航的一個



1976 年清明節前後在北京爆發了民衆悼念周恩來、反對“四人幫”的“四五”運動。

人，他是因為天安門“四五”事件進去的，但給他打了別的罪名，我們後來寫內參以後，這人給放了。聊起劉迪，預審員說起兩個事情，劉迪在裏邊，從來不說違心的話，這個評價是很高的；再一個是，因為沒抓到劉迪，就抓他父親。他父親在裏邊就說了，我為我兒子感到自豪。

那時在劉迪家住的時間比較長，他夫人張永冠在廊坊上班，一週回來一次，我和劉迪朝夕相處，還住在一個屋，當時我和劉迪“同居”時間要超過他夫人，但是他對我一點沒有講過他父親。我就知道他家庭環境很好，父親是教授，還是聽別人說的，當時一月就好幾百塊錢的工資。劉迪是一個內斂的人，他對功名利祿看得很淡，不拿來炫耀。我以後才知道他父親有這麼大的成就，對社會對人類有這麼大的貢獻。

劉衛平（劉迪的姐姐）：

劉迪是 4 月份生病的，8 月份住院，10 月 18 日夜裏 23 點 51 分

去世，走的時候很平靜。他住院時間很短，後期非常虛弱，當時也沒有力氣跟大夥兒談話，甚至也沒有力氣去聽別人說話，也就不願意朋友們去看他。我在這兒就代表他對大夥兒表示歉意。有些朋友想看他最後沒來得及去，希望大家記住他和大家在一起的好的時候，那種美好的時光。我女兒說，我們家族只有兩個人在中國歷史上為社會做了事情的，一個是她姥爺，就是我和劉迪的父親劉雋湘。他是在北京和平解放前，中斷學業從哈佛回到北京，保護了人民的財產，和平解放後，單位完整地交到了人民政府的手裏，屬於功臣之一；再有我女兒的大舅舅劉迪，“四五”時在天安門做的事情，他自己不認為自己是英雄，他說我是趕上了，如果別人趕上了也會這樣做。

我的女兒有孩子，劉迪沒有自己的子女，我女兒說，她的孩子也是劉迪的後代，不管他們將來在中國還是在什麼地方，她都要告訴她的孩子他有一個舅爺爺。我也說過，我的孩子的孩子也是你的後代，希望能繼承家族的血脈，民族的血脈，傳承下去，不管是在世界的哪個地方，血脈不絕，我小弟弟的兒子也是他的後代。

周為民（原《北京之春》主編，四五運動參與者）：

我們和劉迪，和在座的很多人聯繫，是因為“四五”運動，後來才有了《北京之春》。《北京之春》這批人最大的特點是兩個：一個是大部分人參加了“四五”運動，是被抓的這批人；第二呢，這批人大部分還是共產黨的子弟。在《北京之春》的人裏，沒想到劉迪是第一個離開我們的人。這兩年參加追悼會的次數比較多。前幾年是送我們的叔叔阿姨、父親母親。這幾年又開始送我們的同輩人，前年是老包，去年是白南生，沒想到今年這麼快劉迪就離開了。《北京之春》那段時間印象比較深刻的就是在劉迪家裏印刷後幾期：最早在呂嘉民家裏印過，後在閔琦家裏印，後來就跑到劉迪家裏印。給我印象比較深的是劉迪那時正在準備考研究生，那時印得也慢，大概兩三天才能出一期。劉迪把考研究生的時間耽誤了，因此後來再也沒有機會回到學院裏去。

我還有感觸就是，我們這代人呀，反思起來看，還有我們生長的

那個毛年代的痕跡。儘管我們也很堅決地反對這個東西，但是不知不覺在自己身上還有很多那個年代的東西。

挺身而出，有情有義

楊東平（“自然之友”理事長）：

我用兩個概念來表達對劉迪的評價。他挺身而出，成為那時“四五”青年的一個符號，這不完全是一個個人行為，我們在座的許多是從“四五”走出來的。他當時還是一個知青，對“四五”運動和那一代人的評價，是怎麼評價也不為過的。在中國社會危機最為深重的時候一些青年人挺身而出，劉迪——天安門廣場的“小平頭”，成為永傳歷史的一代人的形象，非常難能可貴。越是在今天，這種敢於承擔、敢於挺身而出的精神就越為珍貴。這種衝擊、批判社會的力量主要是青年，這種精神今天並沒有消失，今天還是有新一代的青年在繼承這種精神。特別表現在維權律師，浦志強等跑到臨沂去的這批人，他們是在延續“四五”精神。從“四五”走出的這一代和這種精神還是要傳承下去，也正在得到傳承，這是令人欣慰的。

第二呢，劉迪有情有義。朋友們回憶他時往往並不強調他鬥士的那個形象，強調他是重情重義、樂觀透明。我們個人接觸是90年代初，“自然之友”做中國環境意識調查，劉迪、李南，還有幾個人作為志願者參加了。在這種工作中體現出他的另外一面，非常認真嚴謹低調。今天這種精神是非常可貴的，也是一種比較珍貴的資源，挺身而出，仗義執言，重情重義。因為今天社會，道德塌陷，文化混亂，物欲橫流，這麼一個背景下，劉迪的精神、人格愈來愈顯示出他得價值不同凡響，這正是我們懷念追思他的地方。

邵明瑞（原《世界文學》雜誌社）：

辦《北京之春》是嚴家其把這些人搞到一起的。當時這個民刊雜誌為什麼能印出，就是因為我是搞出版的，負責兩個刊物，《世界文學》、《世界文學動態》。外文印刷廠我非常熟，我把稿子拿去，那時

民刊想鉛印很困難，因為全是公家的，沒有一點民間、個人的東西。和我很熟的人還有點猶豫，我說這個稿子沒問題，現在看來仍然沒問題。後來出了，出了馬上就被封殺了。後來我到香港去了，他們評論那個期間的出版物，特別提到《北京之春》這個刊物，印刷水平很高。現在印刷也未必趕上那個水平，因為外文印刷廠的設備比新華印刷廠還厲害，對外出口的，那時達到那個水平相當不錯了，現在我手頭沒有，全分掉了。（主持人：大概印了1萬本）那時要冒很大風險，都要公家蓋章。（陳子明：嚴家其後來帶了幾十本，到理論務虛會上散發了。）

我為什麼沒被抓，出了《北京之春》之後，上邊馬上就知道了，一調查外文出版社，一下到我們單位社科院去了。我們單位一個人事處長很不錯，保我，說老邵很不錯，部隊出身，解放以前參加革命的，他只是幫助出刊物。他擋了駕，這個人已去世了。公安部有我的檔案，我只是邊緣人士。

關於“四五”、“西單民主牆”，我曾親自跟鄧力群講過，有很多資料很重要，應該保留下來，這是我的建議。但是大家知道，鄧力群是比較保守的，他謝絕了。資料都沒了，後來我就不介入了。

“四五”成功在黨內外結合

曹思源（生前友好，獨立學者）：

我第一次知道劉迪是在江西景德鎮，生產隊裡，晚上聽廣播：“北京發生了反革命事件”，廣播員說有一個“小平頭”，我不知道劉迪——這是遠距離接觸。若干年後，考研究生考到北京來了，和呂嘉民同學，同班。和周為民，小畢，還有徐曉，都接觸了，才跟劉迪有了近距離接觸。

我認為劉迪是中國特殊時代無名英雄的代表。現在很多人知道“小平頭”，他就代表了那個時代。要幹嘛？那個時代要推翻“四人幫”！這個太重要了！那個時候中國是苦不堪言的（賀延光：和現在朝鮮差不多）。“四五”運動幫了共產黨一把！如果再搞下去沒有“四五”

運動的話，那肯定打內戰呀！葉劍英和王洪文他們要打內戰呀，全國四分五裂了，共產黨可能就垮台了！“四五”運動救了共產黨，救了鄧小平。沒有“四五”運動，“四人幫”打黑槍就把鄧幹掉了，我看是極有可能。因為鄧小平好厲害，“四人幫”都怕他，把他幹掉算了，鄧小平上台還得了？由於有“四五”運動，促進了華國鋒下決心，把四個人抓起來（主持人：他看到了民心所向）。對，這個民心所向怎麼顯示出來的？當然是以無名英雄“小平頭”代表的，當然也包括在座的：小畢、周為民，子明……也都是這個時代的無名英雄，對共產黨對中華人民共和國都有不可磨滅的功勞。

很可惜啊，“六四”付出的代價比“四五”要大！今天不是理論分析，有感想麼，區別在什麼地方？劉迪和你們這些朋友所代表的“四五”運動和黨內的改革結合起來了，所以才有後來的粉碎“四人幫”和三中全會這些變化，這是一個規律啊。社會要有重大的突質的變化，恐怕需要內外結合。“四五”就是代表了內外結合。

你們確實是歷史的功臣，不管人家怎麼不瞭解，一瞭解了就會有公平的評價。

第二點，劉迪壯志未酬！我住石景山，劉迪到我家去過好幾次，我深感惋惜就是劉迪希望改變的沒有改變。現在怎麼辦？我們還是應該去“酬”！我發現有點可怕，人各有志，誰都有自己的想法，現在很多人都不考慮那個“志”了，不管國家大事。好多人，包括老家的人，都反覆勸我：老曹呀，你不要傻了，你還動那個腦筋幹嘛呀！他們看我總是睡不醒的樣子，眼睛布滿血絲，說你還拚命幹什麼，你要保自己的命，國家不要去管它（主持人：趕快回老家弄幾個官窯）。現在人要保命，要身體好——當然這也有合理成分，當然要身體好，身體不好走得太早也可惜了。但是我們現在接觸的人都沒有“四五”的精神啦，沒有要粉碎“四人幫”的那種鬥志啦，我認為，追思劉迪的時候要有這種壯志。壯志被嘲笑，我認為不好，還要繼承，我看到材料，口頭的，文字的，都說中國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敲桌子）怎麼辦？《炎黃春秋》11期，就提到了粉碎“四人幫”35週年，很多人認為我們國家矛盾重重，認為最好的辦法來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拯救中國，



學者曹思源。

回到了“文革”前的狀態。這個想法就很可怕了，這不是歷史大倒退嗎！

究竟怎麼辦？再來一次“文革”還是再來一次“四五”？我想，如果挽救中國恐怕還是要走“四五”的道路。“四五”的特點是黨內黨外結合，不搞結合，一刀兩斷，斷不了呀！中共有 8000 萬黨員，這都是我們的同胞我們的戰友啊，不能統統放到對立面去，那不行的。我帶來一篇文章，我對“美國之音”的談話，我建議黨內改革，分權制衡，紀念謝韜老的文集裏有全文，我特別強調現在需要黨內改革。有的人看了說，你傻不傻呀，這共產黨還救得了麼？救不了！哈哈！一個救不了，一個不值得救，該不該？很多人截然對立，這樣結果推不動啊！我們還是要走“四五”道路，內外結合，讓中國前進，讓老百姓的苦難有一個終止啊。

劉迪用喇叭喊話 表現出超前意識

徐曉(前《今天》編輯部成員):

剛才老曹講他是在景德鎮聽到“小平頭”這個名字,我是在半步橋監獄聽到的。我是1975年1月被抓的,監獄每天晚上7點到7點半聽廣播,每天會發一張報紙。但那幾天廣播就停了,可能廣播就有那個內容,不讓我們知道吧。還老聽到樓道裏的聲音,開門關門,我們窗外是犯人提審的必經之路,後來就把窗戶用墨汁塗上了。後來廣播了也看到過期的報紙了,就知道了。後來等於跟劉迪在王八樓是鄰居了,還有小玉。

1976年12月30號我被釋放,我和“四五”沒有關係,把我算成跟反“四人幫”有關的案件。中央有個精神,必須要在年底釋放,凡是跟“四人幫”有關的,放我是在最後一天。參與“四五”的人我覺得等於幫我了,否則不知道還要在裏邊呆多久。我一共呆了23個月,將近兩年。

另外我看到資料,劉迪當時並不是有準備的要去天安門做一個指揮,因為是沒有組織的麼,我聽說是一個青年拿著半導體喇叭在廣播,劉迪遠遠看到警察在向這個人靠攏,他為了保護這個人,覺得這個人可能被抓,他就把喇叭奪過來,成了一個現場指揮。那個人再也沒有出現過,據說這麼多年也沒有人來認領這個位置。

當時劉迪用喇叭說了幾句,說大家不能亂,第一不能打人,第二不能破壞公物。我體會兩點,第一,劉迪代人受過,他自己沒有那種英雄主義情結,但是他會在別人有困難有危險的時候挺身而出。還有一點,那個現場,我們那時還年輕,現在會有這個意識,可當時誰也沒經歷過那麼大的群眾運動,這一代人是紅衛兵起家的,但是劉迪當時能說到這兩點,我覺得他有非常好的素養。

說到劉迪的父親,我看了資料才知道他父親是中國一個非常重要的生物製品專家,現在輸血是抽出來把紅細胞白細胞分離,再輸回人體,這樣獻血對人的傷害就更小。這個技術是他父親推動的,研究時是60年代,他去世9年後,國家有了法規,關於獻血的法規,就

是他們當時制定的。

劉迪的父親是被湯非凡邀請回來的（劉衛平：湯當時是所長，他是湯手下的骨幹之一）。湯非凡是沙眼病的衣原體的分離者，他使砂眼的發病率從 90% 下降到 10%，這個絕對是夠諾貝爾醫學獎的。國際上有提名的，可是外國人根本就不知道湯非凡已經在反右中自殺，死了 20 年了。

從劉迪身上看到本分和血性

陳子明（原《北京之春》編委，四五運動與八九民運參與者）：

我跟劉迪兩個人聊天，次數不是很多，但是有一次聊的時候，我詳細問了他怎麼被抓的。他被抓以及“四五”當天的一些事情，我還是有一些資料的。“四五”當天我對劉迪沒有印象，他什麼時候拿的話筒呢，我沒有印象，我印象中廣場至少有兩支話筒，一個在人民大會堂那邊，侯玉良就拿著念“致人民解放軍信”；小灰樓那個話筒，是我從工人民兵手裏搶過來的，在這個過程中，臉也破了，流了血，我之所以當上群眾談判代表跟這個有關係，搶了話筒還負傷了。我們從工人民兵頭上爬過去，我也喊了幾個口號。劉迪講他是看到一個戴眼鏡的人有危險，他去想把他保護下來，這個人呢，我有印象，他當時起了相當的組織作用。我沒有認出劉迪來，以後再見到他也想不起來那天有沒有接觸。

我知道劉迪是怎麼被抓的。當時有一個叫侯玉良的進小樓談判的人，有人寫文章說四個，有人說五個，嚴家其寫四個人，四個人的名字是知道的，孫慶祝、我、侯玉良、趙世堅，即使有第五個人，不知道是誰了。我的印象是五個人，侯良玉起了很大的作用，談判出來後也自稱是“首席代表”；他當時要求跟前人把名字給他留下來，像小孫，就把他名字留下來了，這樣侯玉良被抓後順藤摸瓜就把小孫也抓了。劉迪和我呢，歲數大一點，經驗豐富一點，我 1975 年已經是“反革命”了，我知道我不能再被抓住，要抓住肯定會給運動帶來麻煩，所以我根本就沒留名字就走了；劉迪呢，留了個假名字。後來劉迪說對

他的全國通緝就是這個假名字和真照片。官方並不知道他叫劉迪，抓捕地點就是在泰安那兒。為什麼知道他是劉迪呢，據說是他一個街坊看到通緝令照片，說這不是劉迪嗎！我是親口問劉迪的。

我這篇文章裏面說，劉迪是一個不太愛寫東西的人，他也不在乎歷史怎麼去評價他，也不在乎給歷史留下多少文字，表現出他的這種瀟灑倜儻。但是很難得的是在 2006 年編一本“四五”運動 30 週年文集時，他跟張平、小孫做過一次訪談，我給起了一個名字：“四五運動是中國人正氣的表現”。我概括了三個詞：本分、犧牲、正氣。

本分，我覺得劉迪在這個問題上和吳思是相通的，吳思說權利、利權，這些對“right”翻譯都不到位，比較到位的是“分”或“本分”。劉迪在這裏也講到本分，他說做工是工人的本分，種地是農民的本分，但是本分不限於這個，因為本分是個權利的概念，也有一定的義務的概念，所以他說：“奮起造反是每一個有良知的中國人的本分”。他去參加“四五”運動他認為是一個本分，我覺得非常重要，奮起造反是古今中外都共通的概念。他在訪談中引了毛澤東的名言，“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他又講了中國自遠古時代就有民主傳統平等傳統，堯舜禹都是禪讓繼承，中國傳統文化也提倡反抗暴君，反抗暴政，武王伐紂就是一種正義的行動。孔孟之道也是鼓勵反對暴政，從這個角度說，造反有理這句話是對的。孟子講過，“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所以我說孟子、美國獨立宣言的作者傑斐遜、馬克思、毛澤東，乃至隱士劉迪都一致認為：反抗暴政是一種本分，一種權利，我們應該這樣理解本分。

第二個意思，劉迪在這裏還講了一個詞，他說，我參加這次運動就像許多北京青年是出於一種義憤，一種血性。我覺得血性很重要，血性就是犧牲精神，過去犧牲就是祭拜祖先時要殺生，就是要見血。劉迪就是一個有血性的男兒。你別看他平時喜歡調侃，喜歡一些很瀟灑的事，但他也是一個有血性的中華好男兒。他說當時我們沒想那麼多，也知道肯定要失敗，失敗了也沒好果子吃。當時許多參加“四五”運動的人，他們把自行車牌子都摘掉，這種行為本身就表明



學者陳子明。

他們意識到這種抗議行動是要敗的，如果認為會勝利的話還摘車牌子幹什麼呢？他是有這個犧牲的準備的。他認為作為中國人的一個本分，暴政到了這樣一種程度，他如果沒有一點犧牲精神他對不起歷史，對不起祖先。我寫著文章時“谷歌”了一下，“谷歌”到嚴家其的悼念文章《劉迪參與了兩次天安門運動》。文章寫道，“我在想劉迪為什麼要參加兩次天安門運動？答案是，劉迪的胸中燃燒著一團正義的熊熊火焰，他知道在中國大地上正義一定會得到伸張！”嚴家其本人也是參加兩次天安門運動，在座的很多人也參加過兩次，但我還是要說劉迪是我們之中最富有正義感最具有犧牲精神的人。

我的文章和剛才周為民說的很一致。1979年夏天《北京之春》編委中有幾個人是要考研究生的，一個呂嘉民，一個我，一個劉迪，我們三個人。呂嘉民那次就和老曹一起考上研究生了。我考清華大學，但是因為我沒有學高等數學，覺得自己自學能力很強，自己看看東西就行了，沒想到考了49分，沒做很多題，就沒考上。第二年我下決心好好弄，做了許多題，結果考了個95分，考上了科學院的研究生。但是當時劉迪知道當局已經要鎮壓“民主牆”要取締這些民刊，原來的

印刷地點在這種壓力下也就不能再用，就把印刷場所放到他家。他是非常有犧牲精神的，作為要考研究生的人，把這些東西放到家裏就意味著要有大量投入，作為一個主要的操持人他要工作，這件事他的犧牲是非常大的。當時南京大學一位教授跟他已經有聯繫，很願意要他，如果他考的話也不是很難的，他這是為了《北京之春》的生存而犧牲了自己的前程。

充滿正氣的俠義精神

第二件事，“六四”之後我也被判了很重的刑。但是有外國記者問我，你“六四”那天在不在廣場，我說我不在，實際上整個“八九民運”過程中我就去過一次天安門廣場。我知道有兩個人一直在廣場，一個是後來寫出兩本關於鎮壓“六四”的書的吳仁華，他現在在美國，他是天天跟學生在一塊兒的。劉迪呢也是很多天在廣場，當時我們都不知道的，但是廣場上的學生知道，劉迪主動給他們當顧問，也說明他的犧牲精神。

第三點呢，我把劉迪去世告訴我媽媽，我媽媽大吃一驚，她也很熟悉劉迪，我就有點奇怪了：你怎麼會認識劉迪呢？“六四”以後我和劉迪見面次數很少，我出獄後不主動見人，別人來見我，我很歡迎，在我那種嚴管狀況下，我有個原則不主動找人。但是之虹跟我媽媽和劉迪見面的次數反而比我還多，這說明了什麼呢？當你需要幫助的時候，劉迪就出現了，當你向劉迪表示感謝的時候，他就消失了。我說這就是劉迪，這就是劉迪身上所繼承和發揚了的中國自古以來的那種俠義精神。大家都說在遇到困難的時候就可以見到劉迪，在我身上也是個生動的體現，在王軍濤身上也是個生動的體現。劉迪也給侯曉天、王軍濤的父母很大的幫助安慰。非常難能可貴。

劉迪強調一個正氣的概念。他說江澤民“講正氣”很可笑，中國現在一切以權為中心一切向著錢看，這都是邪氣。正氣與邪氣的交鋒也是貫穿整個中國歷史的，雖然我們現在看到邪氣很重，但是我們不用失望，因為中國人的正氣這是有幾千年文明傳統的，也是不時就

會冒出來的。因為這個正氣是蘊藏在人性的深處的，它是不可能被什麼東西消滅的，它只是被掩蓋，但它不可能徹底被消滅。我最近寫過幾篇文章，我就強調，現在已經是“九一三”以後了，是“四五”前夕了，中國人的正氣現在正在一個積蓄的過程中，如果沒有一個疏導的辦法，它像“四五”運動那樣爆發出來那是必然的。我們為什麼要紀念劉迪，要弘揚劉迪的精神，實際上也就是弘揚中國的正氣，我們要走向一個新的紀元需要這樣的正氣。劉迪正是這個正氣的一個非常好非常好的代表。

孫慶祝（原《北京之春》編輯部成員，“四五”運動參與者）：

76年那時我還小，18歲吧。“四五”那天廣場上有幾個人很讓人注意，印象中有三個人，一個叫王維衍的，針織廠的一個工人，後來聯繫不多；還有一個戴著白框眼鏡，穿一身藍衣服，從上午10點到下午，非常活躍；我見到劉迪大約是中午，他穿件洗得發白的藍衣服，比較莊嚴，領子扣都繫上了，戴一雙白色絨手套。中午從小樓談判出來以後，剛才子明說的，我和侯玉良互相留下通訊地址，其他人就沒什麼聯繫。關進王八樓以後直到粉碎“四人幫”，12月5號我和周為民同一天放出來，印象很深，咱們是一批，你還在那兒組織大家操練，早晨跑步，賀延光也是，劉迪可能晚吧。

剛才談到正氣、正義，我覺得在劉迪身上非常充分，我給他寫了挽聯，這麼幾句話：

真人劉迪：

不煙不酒不淫不娼不驕不阿不移不屈；
敢怒敢言敢愛敢恨敢想敢幹敢闖敢當；
無私無畏無怨無悔無欲無求無後無錢。

畢誼民：

我再加一句：最後他連身分證都沒有。

當年廣場上的風雲人物，報紙上都有報導，賀延光、周為民、劉迪……“小平頭”成為一個象徵。平反後，許多人還進入體制內，在團

中央，王軍濤、韓志雄、周為民、賀延光是候補委員。老周說過，劉迪是特別淡薄名利的，我悼念劉迪文章提到老周，“周為民，原清華大學團委副書記，校黨委委員”。老周就說，這個東西不要這麼註明，這好像有一個官本位的情結吧。我寫這個為什麼要註明一下呢，就是想說，當時在體制內給你這樣的榮譽，有這麼好的一個發展空間，可是這些人為了我們社會的民主憲政，社會進步，一直保持著一種獨立的人格，沒有任何功利情結，你們自己從體制內出來。

中國又到了“四五”前夕

老鬼（馬波，《血色黃昏》作者）：

我和劉迪接觸不是特別多，但 80 年代就認識了。那時我那本《血色黃昏》在好些出版社碰釘子，出不了。後來鄭義看了，他特別肯定，但是他說你必須大改，徹底改，說暴力、黑暗面太多了，要增添一點光明面。當時我也說服不了鄭義，我說也不想改了，要真實地反映我們內蒙那段生活。不知道怎麼回事劉迪知道了，逐條反駁鄭義，他說真實第一，不要“高大全”，不要增加光明面，就這樣保持原樣，不要媚俗。我印象特別深，跟劉迪也不特別熟悉，我需要他幫助，他就幫我說話。鄭義看了劉迪的意見後就說行，不用大改了。

還有，今年春天《我的母親楊沫》要再版，有個徐阿姨，我想找，劉迪說，行，我陪你去找。約好一個時間，他從三間房騎車到北師大，我一看地圖有 50 多里地，跟我一塊開車到永定門，白跑一趟。我請他吃飯，死活不肯，這是我惟一一次和他一起吃飯。

賀延光（著名攝影師，四五運動參加者）：

我和劉迪認識是在出獄以後，接觸並不多，這些年各幹各的，但是在我心裏他一直是我非常敬重的人，是我們這一代人的代表人物。追悼會上那句話非常好：“劉迪和我們在一起”。我們要把劉迪的精神，對民主自由、法制孜孜不倦的追求，影響下一撥人，這是我們這撥人的責任。“四五”就是建國幾十年來第一次大規模的群眾反對



中國著名攝影家賀延光在微博上發布親友追思劉迪的照片。

專制的運動，自發的群眾運動，我們不是有組織的，還是要把這個精神傳承下去。現在這個情況我想——老曹我不知道我這感覺對不對啊——和 1975 年真的差不多（曹思源：有同感，有同感，甚至更過）。後來網上要追“謠言”，我說你們追什麼“謠言”，1975 年中央就發文件了，“七、八、九謠言四起”，三個月謠言滿天飛，層層追查，最後追查他媽一年多把你們自己弄掉啦。很多社會現象，對社會不滿，制度不滿，不是一層人的事，是層層人，沒錢的人不滿，有錢的人也不滿，老百姓不滿，官員也不滿，我的感受是非常強烈。但是我能做什麼，個人的能力都有限。

昨天我跟了一個帖，說只要有平台就要表達，不管你是誰給我提供平台，我覺得這種精神是一代人的。我們是從左到右從混沌到清醒，這個反思過程一定要讓下一撥人瞭解。我現在也想和“四五”相比，包括許多年輕人，至少是比我當時還清醒，因為我當時去天安門是覺得反正得有人出來，能幹多少事幹多少事，當時是那個感覺。現在很多人，學者專家教授甚至年輕人、40 多歲的人——例如昨晚我參加一個“讀庫”聚會，參加的人，歲數我看都比咱們小，也相當厲害，至少比我參加天安門運動時還清醒。（畢誼民 等）□

現在老百姓對當年學生提出的反貪汙、反官倒、要民主的需求更大；社會精英的思想比當時更加深化，但知識份子也分化了，一部分人成了“中國模式派”

陳子明：追求民主憲政的人思想更成熟

2012 年，是“六四”天安門事件 23 周年，這一天到來前的兩個多月，媒體披露溫家寶多次在中共高層會議中，試探性提出重新評價天安門廣場學生運動的消息。中國學者、異議人士陳子明在接受《新史記》專訪時認為，這一消息是有意放出的風聲，想觀察外界對此作法的評價。陳子明說，20 多年前中國知識界的討論主軸是憲政民主，如今知識界有了分歧，學生對政治的關注度也降低，但要求走民主憲政道路的人比從前更堅定、思想更成熟。陳子明相信，“六四”終會平反。

陳子明為中國科技大學研究生院分子生物學研究生畢業，曾擔任民辦的北京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所長，為民主牆與民刊運動、高校競選運動的積極參與者，倡導中國民主憲政。1988 年出資接辦《經濟學周報》，任報社總經理，1989 年後成為政治犯，被中共指控為“六四黑手”。目前居住在北京。

當今學子更重視個人利益



陳子明。（陳子明提供）

許多中國民運人士將方勵之稱作“精神導師”，方勵之的逝世，令平反“六四”與讓海外民運人士返回中國的話題重新回到人們的視野。陳子明對《新史記》表示，“六四”鎮壓本來就是錯誤，就算是作決策者，心裡也有數，知道將會是自己歷史評價上的一個污點，那些協同者就更清楚這一點。

1989年，胡耀邦猝然辭世引發了學潮，參與者高喊自由、民主、反官倒，但《人民日報》的“4·26”社論將學潮定性為“資產階級自由化動亂”，招來學生更強烈的反彈，最終導致官方的鎮壓行動。

陳子明表示，現在的老百姓對當年學生提出的反貪汙、反官倒、要民主的需求更大。“我被長期看押時，看押者有的是下崗工人，他們說，當年學生讓我們罷工，我們沒去罷，現在如果有學生起來，我肯定要上街。所以從客觀上來說，現在的形勢比當年有利。”

但從主觀上來看，現在要爭取民主、要反貪，卻不一定比當時更有利。陳子明對《新史記》指出，現在學生的思想狀況、心理結構都與當年有所不同：當時的學生在社會上帶有一點貴族色彩，有“天之

驕子”的心態，對政治的關心度較強，對就業等個人問題看得較淡；現在的學生在總人口中佔的比例，與當年相較提高了好幾倍，畢業後的前景不明朗，因此對個人利益的考慮也較多，真正關心政治、願意在這方面有所付出的學生，與 23 年前比起來少了。

中國知識界在這 23 年間也發生了變化。陳子明回憶，1989 年“春夏之交”前夕，中國知識界要求走憲政民主道路的態度已經比較明朗，當時像《河殤》那樣向往西方發達國家所代表的“藍色文明”，在思想界是壓倒性的思潮。1988 年底到 1989 年，知識界開過幾次幾百人的民間會議，幾十人的會議舉辦得更多，這些會議的主調，都是呼籲中國走憲政民主的道路。

知識界的行動在當時也獲得學生的支持。1989 年 1 月 6 日方勵之發表了致鄧小平的公開信，呼籲釋放魏京生，引發知識界的三波簽名行動，近百名知識分子聯署支持。陳子明對《新史記》指出，要求釋放魏京生，就是希望當局實現當時“北京之春”運動所提出的民主要求，這些活動當時得到學生的大力支持。

陳子明指出，社會精英現在的思想比當時更加深化，要求走民主憲政道路的人比從前更堅定，對於如何走世界化、民主憲政模式的作法、階段性、在各個領域的子目標、總目標等等這些問題，都有更清楚的認識；但另一方面，知識份子也出現分化，一部分人成了“中國模式派”。

“中國模式派”在近 20 年來中國經濟的良好發展下逐漸成形，所謂“中國模式”，泛指改革開放後，尤其是“六四”事件後中國的經濟與政治發展模式。陳子明對《新史記》解釋，20 多年前，大家都要“過河”，不管怎麼改，每個人都覺得中國必須到達“彼岸”，現在的中國模式派則不想“過河”——他們認為中國模式就最好。

陳子明表示，中國模式派，實際上是沿襲毛派、法西斯主義、日本軍國主義的潮流而下；在現今知識界的分歧下，知識界對學生的影響也不再只是一元化，如今的學生不像當年的學生那樣齊心，與此有關。

溫家寶在常委中喜歡說人話

2005年，胡耀邦誕辰90周年時，中共官方對胡耀邦“解禁”，不只中共中央舉行了紀念胡耀邦的座談會，給予高度讚揚，《胡耀邦傳》也在全中國的新華書店發行。

2010年4月15日，溫家寶也在《人民日報》上撰文追憶胡耀邦，該題為《溫家寶：再回興義憶耀邦》的文開頭指出：“前些天，我到貴州黔西南察看旱情。走在這片土地上，望著這裏的山山水水，我情不自禁地想起24年前隨耀邦同志在這裏考察調研的情形，尤其是他在興義派我夜訪農戶的往事。每念及此，眼前便不斷浮現出耀邦同志誠摯坦蕩、平易近人的音容笑貌，胸中那積蓄多年的懷念之情如潮水般起伏湧動，久久難以平復。”

溫家寶的悼念文共3000多字，該文也是中共領導人首次在胡耀邦的忌日所發表的紀念文章，文末特別提到他在胡耀邦發病期間與之的互動，以及在胡耀邦逝世後對其家庭的關懷，通篇充滿感情。

溫家寶在“六四”時並未握有太大的影響力，但之後坐上政壇的重要位子。陳子明對《新史記》回憶，溫家寶當時說過什麼話、做過什麼事、思想觀念又如何，在他看來都不大清晰，最有印象的，就是他跟著趙紫陽上廣場看學生時的情景。

另一位在“六四”之後扮演重要角色的政壇人物為薄一波。陳子明說，整個八十年代，薄一波都是鄧小平和陳雲之間的牽線人，權力相當大，能壓住胡耀邦、趙紫陽，不論是鄧小平或陳雲，都與薄一波有工作上的淵源；1945年日本投降後，中共中央成立晉冀魯豫中央局和晉冀魯豫軍區，鄧小平任書記和政委，薄一波是副書記和副政委；陳雲1950年代主持財經工作時，薄一波則是副手，鄧小平或陳雲都對薄一波有較大的信任度，薄一波的思想也介於鄧小平和陳雲之間。

陳子明對過去的溫家寶印象不深，但近幾年的溫家寶，他覺得就清晰許多。陳子明對《新史記》表示，溫家寶是常委中比較喜歡說“人話”的人，說人話的人總比說“黨話”，或說一般人聽不懂的話要



“六四”的記憶。

強，要給予鼓勵。

在溫家寶 3 月 14 日的記者會後，陳子明撰文表示，對比一下溫家寶答記者問與吳邦國在去年人大會議上所說的“五不搞”，就能清楚明白什麼是“人話”，什麼是“黨話”，但是，溫家寶的話說得還不夠，當回答《華盛頓郵報》記者關於在中國進行直接選舉的問題時，溫家寶只是簡單重複了 2011 年的說法；因為溫家寶不願意用“黨話”來搪塞，但如果在這個問題上講“人話”，就等於打自己身邊人的嘴巴，他也做不到。

陳子明也強調，肯定溫家寶講話有“人味”，不等於肯定他的改革家地位，他期待在溫家寶任期的最後階段，不僅講“人話”，而且辦“實事”，為中國的憲政發展做出自己的貢獻。

雖然溫家寶近年多次提及政治改革的話題，但多半被認為只停留在口說階段，還未見到實際的改革。如今溫家寶不只丟出政改議題，還可能已經呼籲平反“六四”。英國《金融時報》引述中共高層的消息指出，溫家寶近年曾三次在不同的中共高層會議上，試探性地提

出平反“六四”，以啟動他最近多次提倡的政治改革，但溫家寶每次提出建議時都遭到反對，反對最激烈者之一為薄熙來。薄熙來父親薄一波在 1989 年時一再要求鄧小平採取強硬立場，將軍隊調到天安門。

報導將中共高層對“六四”問題的立場大致分為幾類，第一類人反對以任何形式重新評價“六四”，他們是主張鎮壓並從中獲益者，第二類是受到傷害者，第三類則是未受到影響者。文章指出，隨著時間的流逝，反對平反“六四”的高層逐漸減少，例如薄一波在 2007 年逝世，因此反對此事的阻力也逐漸減弱，因此即將卸任的溫家寶可能冒險地假設，中國已到了能夠糾正歷史錯誤、推進政治改革的時刻。

陳子明對《新史記》表示，《金融時報》的消息有一定的可信度，是有意放出來的風聲，想試探外界的評價。對於反對平反“六四”的一類人，有分析認為是以周永康為代表的江澤民一派，陳子明表示，周永康指揮的部門直接負責維穩，所以反對平反“六四”並不奇怪，“但當我跟這個部門裡的個人接觸時，也有人表示不反對平反。”

對胡溫推動改革抱悲觀看法的人，認為不論是改革或是給“六四”和趙紫陽平反，都不會在江澤民還在世時真正有所行動。江澤民被認為是鎮壓“六四”的最大受益者，在 1989 年被元老選中接替趙紫陽。也有人認為，胡溫新政之所以搞不成，就是因為江澤民在各領域都安插了自己的勢力，阻礙改革。

陳子明對此持有不同看法。他對《新史記》記者分析說，在推動改革上，江澤民不一定是阻力，如果胡溫確實有這樣的想法，或許江澤民也有這個想法；如果胡溫想實際執行，江澤民可能也會同意。“我從來不認可把江胡矛盾作為分析現在中國政治的一條主線，因為人際上的派系不等於是路線上的派系，兩者並不能清楚地區別開。”

陳子明曾提出“代際政治”理論，他認為在中共領導班子的同一代人中，雖然每個人代表的派系不一、擁護的觀點各異，但政治分野主要還是在兩代人之間。陳子明先前接受《明鏡》採訪時解釋過：“‘代際政治’是某些國家在一定歷史時期內的一種特殊政治現象，意思是主要的政治分界線並不是在同一代人中，而是在兩代人之間。”

陳子明指出，在發展中國家，特別是中國，同一代人間的派系劃分，往往沒有上一代人與下一代人之間的政治分歧深刻。“政治上的派系之間，同一代人的差異不大，只涉及到誰進局、誰進常委、誰進書記處、誰當省市長等等，他們的政治路線、思想底色沒太大差異。就算是國民黨與共產黨，國民黨也很容易進入共產黨，反之亦然，因為他們這一代人有類似的追求，要中國獨立、實現工業化，但他們與上一代人，不管是革命黨還是憲政黨，就有很大區別。”

“六四”一定會被平反

2月底，中國大陸網站突然開放“趙紫陽”詞條和“六四”相關文字照片的搜索，清明的頭一天，官方的中新社發表了題為《胡耀邦墓前清明祭》的文章，被新華網、人民網等近百家媒體和網站轉載，文章透露在胡耀邦逝世後23年裡，胡耀邦陵園共有80多位黨和國家領導人以及200多位省部級官員前往悼念，其中很可能包括胡錦濤和溫家寶。文章的刊登，被視為胡耀邦其人其事，已經徹底被解禁。

中共對趙紫陽其人其事的管制也有所放鬆，以往清明節到6月4日時，總有民眾前往北京趙紫陽故居進行悼念，多數時候悼念無法順利進行；但今年的清明節，200多位到趙紫陽故居悼念的民眾並未如往年一樣遭到當局的極力阻攔，網民也可登錄“趙紫陽網上紀念館”悼念。

陳子明曾以“中國人脖子以下的自由增加了，脖子以上的自由減少了”來比喻中共對言論自由的管制。雖然2月開放敏感詞的搜索，但沒過多久，中共開始加強“掃除網上造謠傳謠”，恢復嚴格審核，抓捕所謂“造謠傳謠者”，封閉新浪、騰訊，再次禁止“六四”、“趙紫陽”等詞匯的搜索，“趙紫陽網上紀念館”也無法登錄。

曾被網友瘋傳的網路歌手“紅衣大叔”新歌《浩然正氣趙紫陽》，在優酷上已搜索不到，該歌曲高唱“浩然正氣趙紫陽，鐵肩傲骨震八方，一片丹心天可鑑，勤政為民做榜樣。堅持真理愛人民，兩袖清風

國忠魂”、“撥雲見日魂兮歸，平反紫陽舉國歡”。

陳子明對《新史記》表示，網路一鬆一緊是平常現象，現在應不會有大的變動。“現在的政法部門、宣傳部門兩桿子，人事都沒有變動，所以我不期望它現在有大改變，大的變化還是必須先人事履新，才可能產生，現在的變化，只是探探水。”

薄熙來被拉下馬後，有人說改革派底氣更足了，陳子明認為這點是否屬實還要觀察，但是以薄熙來為代表的毛左派，可以確知是受到沈重的打擊。

陳子明說，敏感詞匯的解禁乃至評價，都是歷史潮流，不管中共怎麼鬥，這張牌最終都要出的。中共高層正在醞釀拋棄歷史包袱，對下一代領導人來說，肯定要觸及這個問題，現在的疑問是，胡溫這一代會不會想提前出手。

當局對“六四”話題有限度開禁，有分析認為是想測試民意或黨內大佬的看法，為傳說要推行的政治改革試水溫，胡溫適時對網路放鬆，也可能有警告另一派的意味：讓他們看到，胡溫一旦訴諸民意，將能得到一定程度的支持。

陳子明對《新史記》分析說，警告意味是可能有的，畢竟胡溫手上沒有沾血，也不是“六四”鎮壓的直接受益人，做網路解禁的動作，得分也能得多一些；但對於“六四”直接受益人來說，要他們做這樣的動作，就會更痛苦。

陳子明認為，網路解禁後的民意，清楚顯示了對民主憲政發展的期待。對於建立中國民主憲政平台，陳子明抱持樂觀態度，他認為體制外缺乏像胡錦濤這個年齡層的一代自由派知識分子，因此胡錦濤從中無法聽到什麼肺腑之言，到了習近平、李克強的年齡層，體制內外有共通人生經歷和學習經歷的人多了，使得雙方互動的可能性增加。在他所接觸到同年齡層的副部級以下官員、企業家和學術界人士，絕大多數人對於中國民主化的前景，都抱有期待。

至於“六四”的平反，陳子明也表示樂觀。“‘六四’終有一天會平反，這是沒有疑問的，跟我打交道的法官、檢察官、公安局的人，從1991年開始都私下跟我說‘六四’肯定要平反的；法官判完刑，跟我



北大博士生參加
八九學生請願。

私下談時，都說判刑是沒辦法的事，是上級的指令。”陳子明認為，如果不重新評價八九民主運動，政改思路無法貫徹。

陳子明對《新史記》表示，中共對網路的壓制總是不太容易收效，因為人有變換語言方式的能力，也有主觀判斷能力，例如周永康的代號是“康師傅”，“六四”的代號為“8 乘 8”，在創新詞匯不斷出現的情況下，中共肯定無法完全壓制；而如果人心不改變，就一定會將不滿表達出來。

“從前一般人的文章登不上報紙，也沒有自己民間的一個陣地，只能嘴巴說說，現在有這樣的网络平台了，只要這樣的陣地還在，就一定是中國憲政民主化過程中的重要工具。”至於“六四”，陳子明認為，如果中國的年輕人能逐漸重新認識“六四”，網絡上的呼籲增多，對當權者也會形成一股推力。（《新史記》記者 柯宇倩）□

一般現代國家間的關係，講的是利益；社會主義國家間的關係，不講利益，講主義。毛澤東與赫魯曉夫爭的就是，誰是正統的馬克思主義。利益可以切割、可以讓渡，主義之爭卻是無法調和的

社會主義大家庭 為何必然分裂解體

——記沈志華教授夫婦在華盛頓演講

2011年8月15日，華東師大冷戰國際史研究中心主任沈志華教授和夫人李丹慧教授，在美國華盛頓的伍德羅·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舉行新書發布會，《新史記》記者前往聆聽，並在其演講間隙與沈志華交談，向他贈閱了最新一期《新史記》。

50年到100年才能趕上美國

這天下午其實是兩個活動，沈志華夫婦的英文新書《一邊倒之後：冷戰時期的中國及其盟友們》（After Leaning to One Side: China and Its Allies in the Cold War）發布，是第二項議程，第一項，是“華東師大一威爾遜中心”冷戰研究美國工作室的啟動儀式。

華東師大朱自強副校長率領了十位教授、學者和官員專程前來參加這一美國工作室的啟動儀式，伍德羅·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的負責人和



沈志華教授。

相關學者也悉數出席。雙方官員彼此一通感謝，禮節雖屬必要，官式寒暄不免沉悶。但沈志華教授走到麥克風前，幾句大實話讓人們提了神：

他說，我從來沒有在這種場合講過話，不知道說什麼，既不能談毛澤東，也不能談金正日。但我想說：我們要向美國學習——毛澤東講過“以俄為師”麼，那麼，“拜美國為師”也是應該的。

沈志華指出，美國在人文科學方面，要遠遠地超過中國。前不久聽美國電台廣播，中國在人文科學方面在國際上總的排名，在 20 名以後——我想這不包括中國的冷戰史研究（眾笑）。我不知道這個統計的根據是什麼，但是我想這個排名，還是符合實際的。這就是軟實力、軟科學。中國在這方面一定要加強。我覺得，中國在這方面要趕上世界先進水平，恐怕還要 50 年到 100 年。最後用毛主席的

一句話結束：好好學習，天天向上。

在場的美國人眉眼都笑得不見影了，上海來的官員和學者們雖然也咧了嘴，但神情卻掩飾不住幾絲尷尬。

沈志華教授被稱為“史學界的傳奇人物”。他當過兵，做過工，上過最高學府，進過國家監獄，下海經商發財後，再回到學術界。他碰上千載難逢的機會，以別人不曾有過的大手筆，出手從莫斯科購回大量蘇聯秘密檔案，確立了其中蘇關係史和國際冷戰史頂尖專家的地位，近年來除出版大量研究專著（部分著作與李丹慧合著），還主編《中蘇關係史綱》、《一個大國的崛起與崩潰——蘇聯歷史專題研究》《蘇聯歷史檔案選編》（36 卷本），並與楊奎松共同主編八卷本《美國對華情報解密檔案（1948–1976）》。

沈志華在這個工作室正式啓動前幾個月就來到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擔任客座研究員，李丹慧教授也在這裏做過研究。

以下是根據錄音整理的發言，未經發言者審閱。

中蘇分裂的核心原因是什麼？

沈志華：今天是我新書的發布會，其實從中文的角度講，“新書”的內容已經不新了，是我與李丹慧 2003 年以來研究的成果。要譯成英文，搞來搞去搞到了現在。我這裏簡單介紹一下這本書的背景，然後介紹我們一本真正的中文新書。

《一邊倒之後》主要是想描述一下、追蹤一下：在中國倒向蘇聯、加入社會主義陣營以後，這個陣營的發展和變化。本來我設想的是三個方面：一個是中國跟朝鮮的關係，這是我做的；一個是中國跟越南和東南亞的關係，這是李丹慧做的；還有一個，是中國與東歐，像匈牙利、波蘭、南斯拉夫的關係，這是我們倆一起做的。但是後來中國跟東歐這一塊給刪掉了——他們說，這本書太厚了。

我們的結論，基本上有這麼幾個：

第一，中國和所有盟友的關係，都受到中蘇關係的影響；朝鮮與越南差不多，不過經常更狡猾一些，手段更機靈一些，所以得到的好



關於冷戰的研究專著，封面不約而同都是紅色基調。正中間一本就是沈志華夫婦的英文新著。

處更多一些。朝鮮與越南在中蘇友好的年代和在中蘇分裂的年代，都在中蘇兩邊獲取了最大的利益。

第二，在中國向蘇聯一邊倒的時候，毛澤東設想的是，別人都向他一邊倒。他最得意的時候，就是 1957 年底——從 1956 年蘇共二十大到 1957 年，發生了幾起非常重大的事件，一個是蘇共二十大，一個是波匈事件，一個是蘇聯的反黨集團事件。在這三件事發生之後，毛澤東因為幫助了赫魯曉夫，在社會主義陣營中的地位陡然升高。他以為，所有的社會主義國家都會倒向中國。但毛澤東沒有料到，1958 年到 1962 年，中蘇一分裂，所有的盟友都離他而去！到 1976 年毛澤東去世時，中國的盟友只剩下一個，就是朝鮮。後來鄧小平一搞改革開放，朝鮮也跑了。最後的結果，與毛澤東的預想正好相反：他希望所有的盟國都倒向中國，但他們全倒向了蘇聯。

第三個，中蘇分裂的根本原因、核心原因，就是因為中國共產黨

和毛澤東的地位不斷地上升，挑戰了蘇聯共產黨和赫魯曉夫原來在國際共運中的地位。這樣，雙方的爭議和分歧就是不可調和的了。

這就是社會主義國家間的關係，和一般現代國家間關係的最大的區別：一般現代國家間的關係，講的是利益；社會主義國家間的關係，不講利益，講什麼？講主義。毛澤東說：我掌握著馬克思主義；赫魯曉夫說，蘇聯掌握著馬克思主義。他們要爭的就是，誰是正統的馬克思主義——因為，誰有了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誰就有了發言權，在社會主義陣營，就能當頭。這是他們爭論的核心問題。正因為如此，他們之間的鬥爭是不能和解、無法調和的。利益可以切割、可以讓渡，主義卻不是你對，就是我對。

第四點，埋藏在中蘇關係、中朝關係、中越關係、中國和所有社會主義國家關係背後的根本問題是，社會主義國家關係並不是現代國家關係，不遵循現代國家關係的最基本的政治準則，例如，利益，領土，公民權利，安全等等，這些都不講；他們之間的關係，從中國傳統的角度講，帶有宗法性，其實就是一種“家庭關係”，所以社會主義大家庭裏面，家長制、老子黨，是不可避免的現象。

在共產黨的話語體系當中，描述他們之間關係最常見的一個詞，就是“兄弟”。兄弟關係，也就是家庭內的關係。美國中央情報局當時分析說，中蘇不可能分裂，為什麼呢，因為分裂對他們兩邊都不好，而對他們的敵人有好處。毛澤東和赫魯曉夫誰也不是傻子，都知道其中的利害，兄弟倆都不想分家，都知道一分家，咱們這個家都敗了。然而問題就是：誰當家？兄弟倆誰也不讓，最後就還是只能分家，一人當一個家吧。

上述這四個觀點，在我們已經出的這本書裏都有表現，但又不是特別清楚，主要在我和李丹慧最近剛剛完成的新作《冷戰與中蘇同盟的命運》中闡述。我從1945年寫到1959年，就是中蘇最後一次當面吵架；李丹慧接過去，從1960年寫到1973年。全書一共是140萬字，涉及所有事件的細節。我們差不多把中國和俄國的關於中蘇關係的檔案全部搜索了。同時也參考了台灣的檔案、美國的檔案和東歐的檔案——我們論述的主線的基礎，都是原始檔案。估計明年



沈志華對筆者認真地說：“不查到第一手材料，我根本不敢下斷言。”《新史記》雜誌封底的“提升判斷力”仿佛正是大家的共同願望。

年初能出版——如果中宣部不阻攔的話。

倒向毛澤東中國的只是少數派

李丹慧：沈志華從大的方面介紹了情況，我就講一些具體的問題。

他剛才講，中蘇兩黨爭著當家，最後只能分家、各自當家完事。實際上中蘇分開當家不再爭了，是在中國調整對美政策之後——七十年代初期。我根據我新掌握的檔案文件和我的採訪、一些口述歷史材料，根據對這些材料的解讀，在這裏談一談我最近研究的中蘇兩黨、兩國爭奪第三世界的新思索。

1964 年中到 1965 年初，中蘇分裂的關鍵時期，毛澤東有一個

大的思路轉變。決定另起爐灶，脫離蘇共領導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一方面，領導各國的左派黨，進行國際共運；另一方面，與蘇聯爭奪第三世界。總的目標，是與蘇聯爭奪對世界革命的領導權。

這個時期，有兩條線索是並行發展的。一條線索是堅決反對蘇共召集世界共產黨和工人黨會議。但 1965 年越南戰爭升級後，蘇聯還是召開了新的世界共產黨和工人黨會議，有 19 個國家的黨參加。

蘇聯召開這個會議的主題就是，號召社會主義陣營的國家、國際共運各黨，聯合起來支援越南，反對美國。而中共拒絕參加這次會議，最後導致中蘇兩黨的公開分裂和國際共運的正式分裂。

與此同時，中共、中國在援越抗美這個問題上，陷入了一種比較被動的局面。在這個過程中，毛澤東隨著外交政策越來越激進，一個特點就是大力支持第三世界、特別是東南亞國家的共產黨，從事武裝鬥爭。比如緬甸共產黨，中共派了軍事顧問團（在緬共人民軍裏將之叫作“訪問組”）；中緬兩黨還簽訂了協議，中共派了二百多現役軍人到緬共人民軍裏，被稱作“國際支左骨幹”；大量知識青年到緬甸參加人民軍，被叫做“褲腳兵”——捲起褲腳，趟過河去，到緬甸參軍從事武裝鬥爭。

再比如對馬來亞共產黨的支持。馬共當時生存在泰國和馬來西亞邊界地帶的泰國一方，按照中國的革命理念來分析，他們既不開闢根據地，也不主動挑戰馬來西亞政府，實際上是依靠“泰國反動政府、幫助泰國的資產階級當局維持地方秩序”，同時向中共伸手要錢。中共卻大量援助資金，馬共領導人陳平說，數中共給他們的錢數到手軟！後來他們不敢接受這麼多錢，因為他們做不出很大的成績麼，退回了一部分錢給中共。

對印尼共產黨，中共是支持他們走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的。1965 年發生“9·30 事件”，印尼政府鎮壓印尼共產黨，屠殺了一百多萬共產黨人，這件事在毛澤東看來，是好事——壞事變成好事，給印尼共產黨走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提供了條件，特別是，證實了蘇聯修正主義路線的失敗——想與資產階級政府妥協、談判是不可能的，他肯定要鎮壓你。

再一個，是鼓勵世界各國的左派共產黨、工人黨力量，分裂出去，不管你大還是小，成立黨也好，成立小組也好，不管力量多麼薄弱，有沒有作為，是不是真正的革命理念……只要你表態反對蘇聯修正主義，我就支持你。所以就發生這樣的情況，拉美一個小左派黨的游擊隊領導人，一直向中國尋求援助，中共也一直支持、援助他們，到後來有點煩了，說你們應該自己解決經費問題。游擊隊領導人反問：我們怎麼解決？中共說：打土豪分田地呀！他們說：可這是違法的呀！（衆笑）——他們完全沒有、完全不理解中國的革命理念，只是反蘇，中國就支持他。

所以中共另起爐灶，領導各國的左派黨進行鬥爭，其實能聽從領導的，還是少數黨。

中國導致了亞非國家分裂

並行發展的第二條線索，就是與蘇聯爭奪第三世界。毛澤東這個時候特別強調一個理念：反對帝國主義的運動、民族解放運動，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也可以稱作世界革命的第一階段，在這個階段，這些民族國家的資產階級領導人是可以領導這個國家進行民族解放運動的。這一理念，為中國當時爭取亞非民族主義國家，提供了一個理論基礎。

在這個階段，1964年中到1965年初，中國參與籌備第二次亞非會議期間，中國是堅決反對蘇聯參加亞非會議的，說它不是亞洲國家，排斥它“干預亞非事務”。

毛澤東認為，亞非民族主義國家中，大部分是中間派。1965年，毛澤東和胡志明談起來，甚至對胡說：我們可以組織亞非國家中的左派和中間派開會——這就明顯地表明了中國要和蘇聯爭奪第三世界國家。

第二次亞非會議，大部分亞非國家還需要得到蘇聯的援助，所以籌備期間有一半國家是贊成蘇聯參加的。中國這個時候採取一種比較僵硬的方針，說如果你們贊成蘇聯參加，中國就退出亞非會議。

中國的這種態度，直接導致了第二次亞非會議的流產。其結果，是亞非國家發生了分裂。

中國要爭奪第三世界國家、要領導亞非國家，實際上能領導的還是少數國家。

不管是領導左派國際共運，還是爭當第三世界的領袖，總的目標，還是要當世界革命的領袖——中國要成為世界革命的中心。簡而言之，隨著中國的外交政策越來越激進，認為亞非民族主義國家實現民族獨立之後，要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就必須由無產階級領導，要有無產階級專政。這一套理論，就使中國又失去很多亞非國家的支持。在“文革”期間，中國這種外交激進導致在國際上陷入某種孤立狀態。直到上個世紀七十年代初期，中國調整外交方針，扭轉極左外交，打開與美國的關係，中國與亞非國家的關係又發生了新的改變。這段時間，實際上是中國與美國一起在對抗蘇聯。

斯大林欺負毛，毛向赫魯曉夫撒氣

沈志華：回答人們提出的一些疑問。

第一個問題，中蘇分裂，是否有兩黨、兩國領導人的個人因素？我是這麼看的：

毛澤東與赫魯曉夫兩人的個人脾氣性格，對於中蘇分裂，起了很大的作用。但從比較長的時段來看，其實，就算換一個人，結果可能還是一樣。劉少奇性格比較柔和一些，不太願意與蘇聯將關係搞僵，但是在核心的問題上，他與毛澤東做法不一樣，看法是一樣的。

從另一個角度看，毛澤東的脾氣那麼大，其實欺負他的是斯大林。赫魯曉夫並沒有欺負他，給他很多好東西，但他把氣都撒在赫魯曉夫頭上了——對斯大林他不敢這樣，斯大林越欺負他，他越一邊倒。

下一個問題，朝鮮戰爭結束的原因，斯大林去世確實是最重要的條件。斯大林不死，後邊的形勢不可能拐個彎，轉一個方向。但是不是因為斯大林死了，毛澤東可以自己拿主意了，所以朝鮮戰爭才



沈志華、李丹慧(左三)新書發布會主席台。

結束呢？並不是，而是因為斯大林死了，蘇聯領導人改變了政策，而且迫使中國改變了政策，才結束了朝鮮戰爭——那時候毛澤東還是要聽從莫斯科，雖然斯大林死了。

第三，中蘇關係破裂是不是不可避免的？我個人看法，從長期的發展來看，早晚中蘇是要分裂的。因為中蘇關係中存在的問題，跟所有社會主義國家彼此關係中存在的問題是一樣的，是結構性的弊病，病是在骨頭裏頭的，什麼時候爆發，說不準，但早晚要爆發。社會主義國家關係不可能長久親密。那麼，“結構性的弊病”是什麼呢？——就請看我們的新書吧。（衆笑）

中國外交政策毛澤東一人說了算

第四，中國參予朝鮮戰爭，為什麼沒有看到中國人反對？在金日成攬掇斯大林打朝鮮戰爭時，毛澤東很不滿，這有三個不同的層面。第一，1950年5月14日到15日晚上，我們沒有看到任何材料說毛澤東表示反對，但是我想，沒有這方面的材料，可能是他沒有跟誰說，但

實際上他心裏非常不滿的，只不過，（他感到）說了也沒有用。

為什麼我這麼講？有兩個證據，一個證據，是那年的10月2日，毛澤東曾經起草了給斯大林的電報，雖然沒有發出去，那個電報中國在刊登的時候，刪掉了一大段話，沒有刊登出來。這段話講的什麼？第一，我早就料到要出事，早就跟金日成講過，他就是不聽。怎麼樣？現在出事了吧？——這只是在一個電報裏。第二個證據是，1956年中朝關係比較緊張時，毛澤東把過去積壓在心頭的憤怒全都爆發出來了。中共開八大，崔庸健代表金日成到北京來祝賀，毛澤東對他講：當時我對你們講了帝國主義可能干涉，為什麼非要打？彭德懷和李克農在旁邊幫腔說，你說，朝鮮戰爭究竟是誰發動的？是你們，還是美國人？崔庸健都傻了，說，你們怎麼能提這種問題呢？這不是都說好了的嗎？

第五個，關於中共黨內在對外政策上是否有分歧。我看了很多文件，也跟許多學者談過，我的基本判斷是，中共黨內，有不同看法，沒有不同政策。為什麼？因為在中國，外交問題，毛澤東是不允許別人染指的，只能他一個人說了算。劉少奇從來不發言，而周恩來就是個工具。

李丹慧：我與志華的看法是一樣的。中共其他領導人在國際戰略問題、外交問題上，只有跟不上毛澤東思路的狀況，在毛澤東思路確定之後，中共領導人就馬上跟上去。即使看法上有分歧，也馬上统一到毛澤東的思路上來。

沈志華：鄧小平時代，差不多也是這樣。而現在就比較麻煩了，現在在外交上不同的想法可能導致不同的政策——我說的是九十年代以後，中國外交的決策的特徵。

聯美抗蘇，導致中越反目

李丹慧：簡單說一下中蘇關係和中越關係之間的聯繫。

中越關係嚴重受到中蘇關係演變的影響。越戰升級之後，蘇聯也調整了對越政策，加強援助越南，這一時期蘇越關係越來越密切。

中國是非常反對越南接受蘇聯的援助的，而且，從某種程度上說，中國希望越南共產黨服從中國的反蘇路線，這就引起了越南共產黨的反感，中越關係逐漸疏遠。

到 1970 年代初，中國調整對美政策，越南勞動黨就更加生氣了：我在和美國打仗，你居然和我的敵人去搞緩和、去交朋友？！越戰結束之後，雖然這時的蘇越關係越來越密切，但是中國要維護自己在國際共運中的形象，所以要繼續支持越南勞動黨統一南越的武裝鬥爭。在這種情況下，形成了這麼一個狀況：蘇聯和中國繼續同時援助越南進行統一的戰爭。越南這個小國，首先實現了民族統一。但是越南統一之後，它是印度支那地區的大國，又和蘇聯結成盟友，就對中國構成了南部邊防的新的威脅。

第二個因素，是鄧小平要進行改革開放，首先選的合作對象是美國，也就是說，只有與美國在一起，才能改革開放成功。所以中美抗衡蘇聯，一個重要交鋒地區，就是印度支那。鄧小平那個時候說，越南就是東方的古巴——說這個話，把中國放在什麼位置？他的意思就是說，中國就是東方的美國。所以 1979 年初，中國要出兵教訓一下越南，也向美國證實，我在印度支那地區，幫助了你牽制了蘇聯的力量，以此推動中美關係的發展。中美關係發展的最終目標就是，落實到中國國內的改革開放。（《新史記》記者 高伐林）□

1966年2月毛澤東給王任重的信與王任重給劉少奇的信，實際上，已經公開發動了這場借農業機械化之名針對劉少奇的反對“走資派”的鬥爭，形成“文化大革命”的又一啟動工序

毛澤東打倒劉少奇的政治武器

——記沈志華教授夫婦在華盛頓演講

1966年初，毛澤東繼文藝戰線批“海瑞罷官”、“三家村”揭開“文化大革命”序幕以後，又在經濟戰線上從農業機械化入手批判劉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戰略目標都是“炮打司令部”、“打倒中國的赫魯曉夫”。

在“文革”中一場批判劉少奇“先機械化、後合作化”反革命修正主義理論的鬥爭，實質上是50年代初期批判劉少奇鞏固新民主主義制度、反對農業社會主義思想的繼續。從1966年2月毛澤東給王任重的信與王任重給劉少奇的信，實際上，已經公開發動了這場借農業機械化之名針對劉少奇的反對“走資派”的鬥爭，形成“文化大革命”的又一啟動工序。最終打倒了劉少奇，造成了十年浩劫。同時，兩封信和湖北省委關於農機化的“設想”，將農機化與政治鬥爭相聯繫，作為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階級鬥爭手段，主觀地確定1980年湖北省“實現農業機械化”和全國“基本上實現農業機械化”的目標，造成不必要的浪費與損失。1978年以後，重新確立實



農業機械化是客觀經濟過程。

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將農業機械化作為客觀經濟過程，才使農機化穩步、健康發展。

一、毛澤東的“先有合作化，然後才能使用機器”的理論來源，及劉少奇對農業社會主義思想的批判和“重工業建立之後，使農業機器化”的思想

毛澤東 1955 年在《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中肯定“農村中的改革將還是以社會改革為主，技術改革為輔”，斷言“在農業方面，在我國條件下則必須先有合作化，然後才能使用機器。”這個理論同文革中批判劉少奇“先機械化、後合作化”論點針鋒相對。毛澤東的論點實質上是有理論來源的，即所謂“不通過資本主義制度的卡夫丁峽谷”的設想；同時正是對 1951 年劉少奇批判農業社會主義思想的反批判。

在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可以看到對落後國家利用農村公社能不能直接進入社會主義的不同看法。

1881年馬克思提出“不通過資本主義制度的卡夫丁峽谷”，在回答查蘇利奇的信中寫道：俄國農村公社的一個基本特徵是“土地公有制”，它“構成集體生產和集體佔有的自然基礎”，這使它有可能直接地、逐步地把小土地個體耕作變為集體耕作，並且俄國農民已經在沒有進行分配的草地上實行著集體耕作。俄國土地的天然地勢適合於大規模地使用機器。農民習慣於勞動組合關係，有助於他們從小土地經濟向合作經濟過渡。”“給予它以實現大規模組織起來的合作勞動的現成物資條件。因此，它可以不通過資本主義制度的卡夫丁峽谷，而吸取資本主義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它可以借用機器而逐步以聯合耕種代替小土地耕種。”“如果它在現在的形式下事先被引導到正常狀態，那它就能直接變成現代社會所趨向的那種經濟體系的出發點，不必自殺就能獲得新生命。”（注1）

1882年1月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俄文第二版序言中進一步明確提出了問題和答復：“俄國公社，這一固然已經大遭破壞的原始土地公共佔有制形式，是能夠直接過渡到高級的共產主義的公共佔有制形式呢？或者相反，它還須先經歷西方的歷史發展所經歷的那個瓦解過程呢？”“對於這個問題，目前唯一可能的答覆是：假如俄國革命將成為西方無產階級革命的信號而雙方互相補充的話，那麼現在的俄國土地公社所有制便能成為共產主義發展的起點。”（注2）

但是，12年後的1893年10月，恩格斯改變了看法，在給丹尼爾遜的信中寫道：“在俄國，從原始的農業共產主義中發展出更高的社會形態，也象任何其他地方一樣是不可能的，除非這種更高的形態已經存在於其他某個國家並且起著樣板的作用。”（注3）1894年1月恩格斯又說：“當西歐人民的無產階級取得勝利和生產資料歸公有之後，落後國家才可以利用原有“公社所有制的殘餘和與之相適應的人民風尚作為強大的手段，來大大縮短自己向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過程。”（注4）從原來的“能夠直接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公共佔有制形式”的判斷，改變為“從原始的農業共產主義中發展出更高的社會形態”是不可能的結論，是恩格斯分析俄國農村公社瓦解

與俄國資本主義發展等現實情況，深思熟慮得出的。

在半個世紀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劉少奇又一次提出了恩格斯反思過的問題。早在 1949 年 6 月劉少奇就認為：“只有在重工業大大發展並能生產大批農業機器之後，才能在鄉村中向富農經濟實行社會主義的進攻，實行農業集體化。”（注 5）

1951 年 7 月 3 日，劉少奇對山西省委《把老區互助組織提高一步》的報告批示：“在土地改革以後的農村中，在經濟發展中，農民的自發勢力和階級分化已開始表現出來了。黨內已經有一些同志對這種自發勢力和階級分化表示害怕，並且企圖阻止或避免。他們幻想用勞動互助組織和供銷合作社的辦法去達到阻止或避免此種趨勢的目的。已有人提出了這樣的意見：應該逐步地動搖、削弱直到否定私有基礎，把農業生產互助組織提高到農業生產合作社，以此作為新因素，去‘戰勝農民的自發因素’。這是一種錯誤的、危險的、空想的農業社會主義思想。山西省委的這個文件，就是表現這種思想的一個例子。特印發給各負責同志一閱。”

在劉少奇作出這個重要批示之前的 1951 年 4~5 月間，他曾對薄一波、劉瀾濤明確指示：現在採取動搖私有制的步驟，條件不成熟。沒有拖拉機，沒有化肥，不要急於搞農業生產合作社。按照劉少奇的意見，華北局針對山西省委“農民的自發力量是發展了的，它不是向著我們所要求的現代化和集體化的方向發展，而是向著富農的方向發展”和“對於私有基礎，不應該是鞏固的方針，而是逐步動搖它、削弱它，直到否定它”的意見，在批覆中提出“不同的判斷：用積累公積金和按勞分配辦法來逐漸動搖、削弱私有基礎直到否定私有基礎是和黨的新民主主義時期的政策及共同綱領的精神不相符合的，因而是錯誤的。”“提高與鞏固互助組織的主要問題，是如何充實互助組的生產內容，以滿足進一步發展生產的要求，而不是逐漸動搖私有制的問題。這一點必須從原則上徹底搞清楚。”

劉少奇 1951 年 5 月 7 日在全國第一次宣傳工作會議的報告中說：“在 3 年準備之後，我們來一個 10 年計劃。到 10 年之後，新中國的面貌就要改變，那時我們將不但有強大的農業，而且有我們自



1949 年秋，劉少奇夫婦在中南海。劉少奇提醒防止“空想的農業社會主義思想”。

己強大的工業，使中國變成一個富足的國家。到那時，我們的國家才可以考慮到社會主義專政的問題。”“山西省委在農村裏邊要組織農業合作社（蘇聯叫共耕社），這種合作社也是初步的。”“這種合作化是有社會主義性質的，可是單用這一種農業合作社、互助組的辦法，使我們中國的農業直接走到社會主義是不可能的。”“那是一種空想的農業社會主義，是實現不了的。”“我們中國黨內有很大一部分同志存有農業社會主義思想，這種思想要糾正。”

1951 年 7 月 5 日，他又強調“離開城市工人階級和強大國有工業，不能有農業集體化。單純依靠農民來實行農業集體化的思想

是錯誤的，是幻想。”（注6）

劉少奇的沒有拖拉機，沒有化肥，不要急於搞農業生產合作社的論斷，和10年之後有我們自己強大的工業，才可以考慮到社會主義專政的問題的觀點，是容易引伸出“先機械化、後合作化”的推論的，但是劉少奇這個重要論點，主要是從“鞏固新民主主義制度”的理論高度出發，反對錯誤的、危險的、空想的農業社會主義思想。歷史的悲劇在於，劉少奇的正確觀點在毛澤東的錯誤批判之後，成為劉少奇“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的罪證。被“文革”的造反派提煉、變形的“先機械化、後合作化”的口號，成為強加到劉少奇頭上的一條反革命罪狀。

劉少奇的反對農業社會主義思想的批示，受到毛澤東的堅決反對，並且在5個月後的1951年12月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不但提出“要援助農業互助組和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發展”，還提出“在農民完全同意並有機器條件的地方，亦可試辦少數社會主義性質的集體農莊，例如每省有一個至幾個，以便取得經驗並為農民示範。”再發展到1958年，就出現了“共產主義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橋樑”的“人民公社化”了。這樣，就把1893年恩格斯反思過的“從原始的農業共產主義中發展出更高的社會形態……是不可能的”科學結論否定了，最終遭到歷史規律、經濟規律、自然規律的懲罰，黨、國家，特別是人民遭到了災難。

平心而論，劉少奇並沒有明確提出“先機械化、後合作社”的方案。事實上，劉少奇是站在反對農業社會主義思想的理論高度，在1951年就公開反對黨內危險的、空想的錯誤思想和過急地合作化。

至於劉少奇關於農業機械化與工業化先後關係，他早在1950年《國家的工業化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一文中，提出過中國工業化過程的一個主要觀點：第一步“以發展農業和輕工業為重心。因為只有農業的發展，才能供給工業以足夠的原料和糧食，並為工業的發展擴大市場。……在農業和輕工業發展的基礎上，也可以把勞動人民迫切需要提高的十分低下的生活水平提高一步”，接著強調：“只有在這一步做得有了成效之後，我們才有可能集中最大的資

金和力量建設重工業的一切基礎，並發展重工業。只有在重工業建立之後，才能大大地發展輕工業，使農業機器化，並大大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注 7）這裏，劉少奇提出了農－輕－重的發展順序，先以農輕為重心，在“重工業建立之後”，才能“使農業機器化”的正確思路，這符合農機工業發展不能超前於重工業和工業化的發展，農業機械化不能超前於工業化而孤軍前進的客觀規律。而毛澤東的合作化指導思想確實是農業社會主義思想，劉少奇的上述思想才是正確的、可行的。

二、50 年代初期堅持新民主主義的理論，提出“我們的基本口號是：民主化與工業化！”

在 1948 年 6 月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公開批判南共、波共以後，東歐各國清洗“鐵托分子”，將“人民民主制度”改為“執行著無產階級專政的職權”、蘇維埃制度和人民民主制度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兩種形式”。

毛澤東在 1949 年 1 月會見米高揚時已提出：“在工農聯盟基礎上的人民民主專政，而究其實質就是無產階級專政。”（注 8）在毛澤東這年 7 月 1 日發表了《論人民民主專政》的同時，劉少奇 7 月 4 日向斯大林提出報告說，新中國將實行工人階級領導的，工人、農民與革命知識分子為基礎的，小資產階級與自由資產階級及其代表人物和政治派別參加的人民民主專政。它“不是資產階級專政，也不是無產階級專政”。他認為，建國後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主要矛盾是“與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及與國民黨殘餘勢力的矛盾。”“有人說：在推翻國民黨政權或者實行土地改革之後。中國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便立即成為主要矛盾，工人與資本家的鬥爭，便立即成為主要鬥爭。我們認為這種說法是不正確的，因為一個政權如果以主要力量去反對資產階級，那便成為或開始成為無產階級專政了。這將把目前尚能與我們合作的民族資產階級趕到帝國主義那一邊去”，並尖銳地指出這是“冒險主義政策”。

他在回國途中向東北局幹部會上作報告，批評“東歐搞無產階級專政，我們就也要搞無產階級專政”的觀點是教條主義，明確指出：“我們要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和資產階級合作，所以不能建立無產階級專政而只能是人民民主專政。”

1949年9月21日，劉少奇在第一屆人民政協會議上指出，“把社會主義的前途寫進共同綱領的建議是不可取的，因為要在中國採取相當嚴重的社會主義步驟，還是相當長久的將來的事情。”（注9）1949年9月29日通過的《共同綱領》肯定：“中國人民民主專政是中國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及其他愛國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政權。”實際上以法律形式肯定了“人民民主專政—新民主主義”的理論和國家權力組織結構。

雖然斯大林懷疑中共走南斯拉夫道路，蘇聯駐華總顧問科瓦廖夫認為中共親美反蘇的人現正得勢，而人民政府的組成，民主人士佔的比例很大，實際上變成了各黨派的聯合會；但是，劉少奇仍堅持新民主主義思想，1951年2月28日，在北京市人大會上講話說：“經濟建設現已成為我們國家和人民的中心任務。但是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建設必須有新民主主義的政權來領導和保障。”“我們的基本口號是：民主化與工業化！在我們這裏，民主化與工業化是不能分離的。”

在1951年3月黨的組織工作會議上，劉少奇明確提出“鞏固新民主主義制度”的口號，並把“為鞏固新民主主義制度而鬥爭”規定為“共產黨員標準的八項條件”之一，為會議所通過。

劉少奇在1951年3月《共產黨員標準的八項條件》中明確地提出了新民主主義、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制度的要點：“新民主主義革命一般地不破壞私有財產的制度，但社會主義就首先要在工業中然後要在農業中破壞私有制。在農業中組織集體農場，只能依靠工人及貧雇農，不能依靠一般農民，只是團結農民。”他還認為“鄉村中互助組、互助會、合作社，就是社會主義經濟方式之一，是半社會主義。不怕犧牲自己一點，努力為合作社工作，就是社會

主義。”（注 10）

這樣，他提出的“共產黨員標準的八項條件”中，認為“中國共產黨現在為鞏固新民主主義制度而鬥爭，在將來要為轉變到社會主義制度而鬥爭，最後要為實現共產主義制度而鬥爭”。（注 11）即黨和黨員要為“鞏固新民主主義制度”而鬥爭，一般地不破壞私有財產的制度，而合作社是社會主義經濟方式。這樣的認識，可以理解為合作化慢一點、放後一點。但不是“先機械化後合作化”，而是先鞏固新民主主義制度，將來再轉變到社會主義制度，實質上是“先新民主主義，後社會主義”。

但是，毛澤東很快就尖銳地批評劉少奇的“鞏固新民主主義制度”的觀點。在 1952 年 6 月批示：“在打倒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以後，中國內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的矛盾，故不應再將民族資產階級稱為中間階級。”即已成為革命對象、階級鬥爭的對立面。

1953 年 6 月，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提出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過渡時期總路線，嚴厲批評劉少奇“確立新民主主義秩序”為“右傾觀點”。1953 年 12 月，毛澤東審定的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宣傳提綱”確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標誌著新民主主義革命基本結束和社會主義革命的開始。在《關於目前政權性質問題的指示》中說：“人民民主專政實質上就是無產階級專政”，但在公開場合仍然提人民民主專政。到 1954 年 9 月第一屆人大通過的憲法提出“依靠國家機關和社會力量”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建立社會主義社會的任務。選出的國家最高領導人全是共產黨員，產生了斯大林希望的“你們就可以組織一黨政府”，（注 12）完成了由“新民主主義的人民民主專政”向實質上就是無產階級專政的轉變。

劉少奇接受了毛澤東的尖銳批評，放棄了自己的“人民民主專政—新民主主義”思想。

因此，對劉少奇的“先機械化，後合作化”的批判，實質上是為批判他的“鞏固新民主主義制度”、“不能建立無產階級專政而

只是人民民主專政”、“經濟建設是中心任務”，把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作為主要矛盾是“冒險主義政策”等一系列正確觀點而羅織罪名。

但是，在後來，特別是 1966、1971、1978 年三次農業機械化上堅持“1980 年基本上實現農業機械化”的口號，宣傳毛澤東批評劉少奇這十年“抓得不大好”，正是脫離實際、脫離國情，從階級鬥爭、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將工農聯盟建立在農業機械化的基礎上”，同備戰、備荒、為人民聯繫起來的理論出發，認為“實現農業機械化的問題，不僅是一個重大的經濟問題，而且更是重大的政治問題。”（注 13）這樣，就將農業機械化這樣一個經濟、社會、技術的發展過程，人為地、主觀地貼上“階級鬥爭”的政治標籤，作為群眾運動、政治運動而推進，全黨動員，出現脫離中國國情的高指標、高速度、高損失的負面效應，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三、毛澤東從階級鬥爭觀點提出農業機械化發展戰略和“1980 年基本上實現農業機械化”的戰略目標，是脫離實際的失誤



毛澤東對“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的說法很不滿意。

在“文革”緊鑼密鼓敲起序幕的1966年2月19日，毛澤東給王任重的信中提出：“用25年時間，基本上實現農業機械化”，這同他1955年7月31日在《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中提法在期限是一致的：“估計在全國範圍內基本上完成農業方面的技術改革，大概需要4個至5個五年計劃，即20年至25年的時間。”要求達到的目標改變了，從“在全國範圍內基本上完成農業方面的技術改革”縮小為“基本上實現農業機械化”，但是實現目標的最終期限，由“20年至25年”改為“25年”。幾乎同時，在毛澤東寫信給王任重的第二天，1966年2月20日，由王任重給劉少奇寫信，兩次提到毛澤東同意王任重和湖北的意見：“主席批了我們關於農業機械化的設想。徐業夫同志把原件送給你了。”“希望八機部不要搞‘托拉斯’，這樣便於發揮地方的積極性。……這個問題向主席報告了，他表示贊同。”而《劉少奇選集》中最後一篇文章的題目正是《試辦托拉斯》，肯定了托拉斯，認為試辦托拉斯的目的，就是要使“整個國民經濟更有計劃些，更有組織些”。（注14）

實際上，從農業機械化和辦托拉斯兩個方面，毛澤東通過王任重給劉少奇以壓力、批評和警告，“目前是抓緊從今年起的15年。已經過去10年了，這10年我們抓得不好。”劉少奇在王任重寫信後三天，迅速地而被動地給周恩來、鄧小平寫信，建議將《湖北省委關於逐步實現農業機械化的設想》，毛澤東批語及王任重的信，“發給政治局、書記處各同志，並發給計委、經委、建委、科委、物資部、八機部、華北局李雪峰、劉子厚各同志研究，並準備意見，幾天以後，中央召集一次會議討論這個問題。因為這個問題牽涉的方面很多，所以應當這麼辦”。劉少奇仍然天真而認真地把“這10年我們抓得不好”的農業機械化問題，當作一個複雜的牽涉方面很多的經濟問題來一步步研究、準備意見、討論。而毛澤東實際上早作好部署了，在1966年3月12日對劉少奇3月11日的信作了極為具體的回答，主持會的人選、時間、地點、人數、規格都作了定論，小計委余秋里、林乎加去湖北，“同湖北省委共同研究農業機械化5年、7年、10年的方案，並參觀那裡自力更生辦機械化的試點。——如

果讓各中央局各省市區黨委也派人去的話。似以管農業書記一人、計委一人去為宜。總共也只有大約 70 人左右去那裡開一個 7—10 天的現場會。”把劉少奇認為“牽涉的方面很多”的需要多個中央部門、書記處、政治局和各中央局、各省、市、區黨委認真研究的農業機械化工作會議，簡化為 70 人的“7—10 天的現場會”，即學習、照搬、複製湖北制訂 5 年、7 年、10 年的農機化發展規劃。

至於各地的規劃，毛澤東提出“大約今年 8、9 月間召開的工作會議上才有可議”，“若事前無準備，那時議也恐怕議不好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毛澤東集中注意力修改《林彪委託江青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和寫了《堅決進行一場文化戰線上的社會主義大革命》的政治鬥爭批語的 1966 年 3~4 月時，1966 年 3 月 11 日劉少奇給毛澤東的信中，明確提出“湖北省委這個文件暫緩轉發各地”。他提出“在有各在京副總理參加的中央常委會上談了這個問題，大家意見，要小計委就這個問題對有關各方面情況先摸



1958 年 7 月 18 日，劉少奇在濟南農村視察。

一摸，提出一個方案，中央再來討論，並要提交下一次中央工作會議加以討論，以使各地方的努力更加符合實際。恩來同志已要小計委派人到湖北，同省委共同研究他們的方案，先在湖北進行試驗”。

（注 15）即要先在湖北進行試驗，要更加符合實際，要提出方案。中央討論，中央工作會議討論，因此暫不轉發文件。

而在第二天的 3 月 12 日毛澤東即回信：要開現場會，8、9 月的工作會議才有可議。劉少奇似未理解，仍未轉發。在緊鑼密鼓地起草“516 通知”時，1966 年 4 月 10 日，才批轉湖北文件，“中央對《湖北省委關於逐步實現農業機械化的設想》的批示”也肯定要將這種計劃草案“提交今年 8、9 月間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討論”。

1966 年 8 月確實如期召開了中央會議，有名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但是討論的不是各省農業機械化計劃方案，而是通過中央“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決定”（16 條），劉少奇在天安門上就靠邊站了。“炮打司令部”火藥味很濃的中央全會過後，1966 年 8 月 16 日，周恩來對本擬開 7 ~ 10 天的湖北農機化現場會，一直開了一個月開到北京大學大字報現場的會議作了講話，他反覆地檢討：“我們認真抓農業機械化，是主席看了湖北省委的報告，寫信給中央在北京工作的同志，中央同意給主席復信後，主席又寫信，中央在 4 月 10 日轉發了湖北文件，在批示中，把主席思想表現出來了。這才開始認真抓全國農業機械化，按綱要說，我們晚了 10 年，按十中全會說晚了 4 年，這次才認真抓。”“主席說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要用 25 年的時間基本上實現農業機械化，從主席 1955 年提出到現在，過去 10 年了，只有 15 年了，足有三五、四五、五五年三個 5 年計劃，要基本上實現農業機械化。過去 10 年，我們抓得不好，主席批評是很寬的，實際上抓得很不好。我們在中央做實際工作的抓計劃、政府、農業工作的同志來說，抓得很不好。當然也做了一些工作。”“很明顯，我們沒有完全瞭解主席思想，後來到主席那裡開會，才把主席批示作為中央批示發給地方，說明趕不上，要趕緊學習，趕緊跟上，認真實踐。我們跟主席一道工作，有時，毛澤東思想舉得不高，錯誤是經常會犯的，當然不是站在對立立場上。”“農業機械化如果（主

席思想)學得不夠,跟得不緊,就有差距,但是發現了就跟上去。小計委抓得比較好。希望各省市、大區,各部共同努力。”“我們要拿出愚公移山的精神,學習老三篇,不要15年,一定能大大提前,搞得好,10年略多一點。但現在還是提15年,口號不要提過高,時間爭取提前。”(注16)周恩來的講話,可以確實反映出“跟不上”毛澤東的戰略布置和戰略思想的檢討心情,至於毛澤東《炮打司令部》大字報打中的劉少奇,連在群眾大會、農機化現場會作類似檢討的機會也沒有了,永遠被剝奪了。

因此,從某一個角度看,毛澤東選擇武漢,從湖北省委逐步實現農業機械化的設想開炮,是他部署開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一步重要的落子,從經濟方面進行政治批判,確確實實打在劉少奇的要害,這是同他堅持鞏固新民主主義制度、認為過急地農業合作化是空想社會主義、工業化以後才能農業機械化等等觀點,不能與毛澤東的階級鬥爭為綱的理論同步,甚至相對立是密切有關的。1966年2~3月毛澤東關於農業機械化的信,在“文革”前夕發出,絕不是一著閑棋,在8月與八屆十一中全會同時結束的湖北農機化現場會絕非出自偶然,偶然性寓於必然性。實際上,在“機械化抓得不好”問題上的批判,從1966年2月開始,同1965年末對《海瑞罷官》的批判,同時從意識形態戰線與經濟建設戰線發起了對所謂“資產階級司令部”的進攻信號。所不同之處,在湖北的進攻矛頭直指劉少奇本人而不是死老虎彭德懷。當1966年8—9月成立中央文革小組時。在上海批“海瑞罷官”的張春橋、姚文元和操縱者江青成為領導成員。在武漢提出“湖北省委農機化設想”和反對托拉斯的王任重也被吸收為文革小組成員。得到毛澤東覆信(信中直言農業機械化“這10年我們抓得不太好”),實際上批到劉少奇頭上的王任重,能擔任文革小組副組長,當時受到與各省省委書記完全不同的政治待遇,這可能不是偶然的。

這種從階級鬥爭角度,揭發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炮打資產階級司令部,揪出“睡在我們身邊的赫魯曉夫”的“文化大革命”前夜的槍炮聲中,劉少奇似乎還沒有意識到矛頭直指自身,在布置



1958 年，毛澤東、王任重參觀沼氣利用展覽。

農機化的會議上，還當作需要多方面、多部門、多位同志“研究”、“準備意見”、“討論”的純經濟問題，“因為這個問題牽涉的方面很多，所以應當這麼辦”，遲遲不批發湖北文件。周恩來在 1966 年 8 月 16 日，毛澤東在天安門接見紅衛兵的前兩天，還認真地檢討，自己“跟不上”、“抓得很不好”，同時還是將農業機械化發展規劃作為計劃問題、經濟問題，提出余秋里的總結，“當然不是沒有什麼可斟酌的地方，主席歷來教導我不要爭數字，幾年來引到數字中去了，就要犯錯誤。”“現在還是提 15 年，口號不要提過高。”最後還諄諄教導：“我們今後一定要遵循毛澤東的教導，堅決按照黨的八屆十中全會提出的，計劃數字應該實事求是地（而不是主觀主義），因地制宜地（而不是千篇一律）、及時地（而不是拖拖沓沓）、有重點地（而不是分散力量）、慎重地（而不是輕率）來正確處理這個任務。做一

切工作都應該是這樣。”（注 17）婉轉地提出了自己的見解。

即使如此，周恩來到 1969 年 8 月 13 日，在接見全國建設縣農機修造廠工作會議代表時的講話中，也不得不違心地批判劉少奇的“先機械化、後合作化”。周恩來說：“1951 年當時是有爭論的。當時山西老區有的領導主張土改後緊跟著搞互助合作，當時已有試辦的了，陝北是變工隊，劉少奇說經過合作化不可能，那經過什麼道路呢？他就提出要搞機械化。”“一進城七屆二中全會就講到這個問題嘛，土地革命徹底完成後，就要搞農業合作化，走社會主義道路。（有些人的理論是）土地改革以後先機械化，後合作化，結果是個體經濟大發展，從農業合作化問題就可以看出，他們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有人提出現在提倡農業合作化是實在的空想，是反馬克思主義的東西，實際上他們是反馬克思主義的。”（注 18）

這樣，周恩來不僅在政治上、思想上與劉少奇劃清界限，同時也改變了 1966 年 8 月提出的“口號不要提得高”，計劃數字應該“實事求是（而不是主觀主義）、因地制宜（而不是千篇一律）”的正確方針，在政治壓力下不得不提出堅持用 25 年基本上實現農業機械化，“要看今後的 11 年。每省、每縣、每社都要基本完成。山地那麼多，沼澤、沙漠，各種類型機械要跟上。從常規到高級的收穫、加工、運輸、電動、殺蟲、塑料薄膜都要，將來一個縣搞個小化肥廠是需要的。10 年把這些事都完成是大事。”（注 19）因此，從上到下、從中央到基層社隊，全黨動員，為完成“1980 年基本上實現農業機械化”這個脫離實際的口號而努力奮鬥，以巨大的投入、沈重的代價換來了明顯的成就和嚴重的教訓。

四、毛澤東與劉少奇關於農業機械化和農業合作化爭論的教訓

回顧、反思毛澤東對劉少奇的批評：“農業機械化我們這 10 年抓得不太好”，和一系列有關農機化發展指標、方針、理論的爭論，至少有以下幾方面的失誤是值得思考與討論的。

1. 對中國農業機械化發展目標提出了脫離中國國情、違反農業機械化客觀發展規律的過高、過急、全國一刀切的脫離實際的指

標。

在 1966 年 2 月 19 日毛澤東給王任重信中提出“用 25 年時間，基本上實現農業機械化”，即從 1955 年算起，1980 年要在全國範圍內基本上實現農業機械化。而在王任重提出的報告中是更高的指標：湖北全省實現農業機械化，把“基本上”三字也不要。到了 1980 年 7 月，農機部楊立功部長以答《農業機械》記者問的形式指出：“1980 年基本上實現農業機械化，是多年來全國人民共同為之奮鬥的目標。現在看來這個要求是不切合實際的，也是難以實現的。”“本來就不大可能，現在更不可能達到了。要求過急是不行的。實踐證明是達不到的目標就降下來，不應該再堅持這個口號了。”

實際上，毛澤東對基本上實現農業機械化提出過更高更急的指標：1958 年提出我們的任務是：在 7 年內（爭取 5 年內做到）基本上實現農業機械化和半機械化，實現農業生產力的大發展。”（注 20），即要求在 1963 年或 1965 年基本上實現農業機械化和半機械化。

1959 年 4 月 29 日毛澤東在《黨內通信》中又指出：“農業的根本出路在於機械化。要有 10 年時間，4 年以內小解決，7 年以內中解決，10 年以內大解決。”即要求在 1963、1966 年小、中解決，而在 1969 年大解決，即基本上實現農業機械化。

毛澤東特別讚揚的、中央批轉的《湖北省委關於逐步實現農業機械化的設想》（1966 年 2 月 5 日）提出的指標是：“在 5 年、7 年、10 年的時間內，在全省基本上實現農業機械化和部分的化學化、電力化是否可能？我們認為經過努力，是可以實現的。從今年算起，力爭在 5 年、7 年、10 年內（從第一個五年計劃算起，就是 20 年左右的時間），在全省實現農業機械化，完成黨中央和毛主席交給我們的偉大歷史任務。”在“設想”文末，還提出了更高的指標：“20 年左右時間，在全省實現機械化。”（注 21）即將毛澤東預計的 25 年時間又縮短 5 年，即在 20 年時間基本上實現湖北全省的農業機械化，甚至全省實現機械化。因此，這個具有高指標特徵的設想格



毛澤東在武漢。

外受到毛澤東的高度重視，確定在湖北召開全國農機化現場會，起到了以湖北高指標的典型，幫助、壓服各省群起而效之的作用，使失誤由局部擴展為全局性長時期的失誤。特別是毛澤東批示中要求各省區“應當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做出一個5年、7年、10年的計劃”，就是帶有政治性指令性的要求。

在1958年10月18日，中央批轉農機部向中央、主席的第一次報告批示中還提出更高的實現農業現代化的指標：“從1958年起以10年至15年的時間實現農業現代化，即實現農業機械化、水利化、化學化、電氣化的總任務和4年小解決、7年中解決、10年大解決的機械化的步驟來擬定，要儘可能地促進農業技術的改造，不斷提高農業各方面的勞動生產率，促進農業生產的不斷躍進。”（注22）實際上，毛澤東提出的一些高指標，已為黨中央接受，形成新成立的農業機械部的中心任務。因此，它不可能不為落實這個難以實現的高指標而艱苦奮鬥，以很高的代價、巨大的投資獲得與投入不太相稱的重要成就。

2. 違反農機工業作為工業的客觀經濟發展規律，強調地方為

主，“八機部不要搞托拉斯”，造成農機工業布局分散化、小型化、低效益、低水平重複建設的嚴重問題與後遺症。

在 1958 年 4 月 8 日中央政治局批准的《關於農業機械化問題的意見》中，對農機工業布局提出的方針是：“農業機械的製造（包括機引農具、新式畜力農具和改良農具），除了大型的和技術要求較高的農業機器以外，一般的應該以地方工業為主。由各個地方或者經過各個協作區，根據當地的條件和需要，自行安排；中央有關部門在技術和經驗交流方面予以幫助。”（注 23）這樣，實際上是把全國農機工業的總體布局的統一規劃，分散為地方為主、各省為主自成體系。

在 1966 年 3 月 12 日毛澤東給劉少奇的信中強調農業機械化“此事只能以各省、市、自治區自力更生為主，中央只能在原材料等方面，對原材料等等不足的地區有所幫助……為了農業機械化，多產農林牧副漁等品類，要為地方爭一部分機械製造權。……一切統一於中央，卡得死死的，不是好辦法。又此事應與備戰、備荒、為人民聯繫起來，否則地方有條件也不會熱心去做。”這已經將“地方為主”提高到備戰的政治、軍事高度了。

對毛澤東的“地方為主”、各省自力更生發展農業機械化和農機工業的思想領會得最深的王任重，於 1966 年 2 月 20 日給劉少奇的信，儼然是上級命令下級、代傳“聖旨”似的口氣，“主席批了我們關於農業機械化的設想。徐業夫同志把原件送給你了。我對這個文件在文字上又作了一點修改，望你批轉時按這個修改過的稿子。另外就是對於地方辦的農機工廠，希望八機部不要搞‘托拉斯’，這樣便於發揮地方的積極性。關於地方農機產品的分配辦法，要早日定下來，以便地方心中有數，全面安排。這個問題我向主席報告了，他表示贊同。”（注 24）

在這樣的政治壓力、組織壓力下，原來在 1965 年主張試辦托拉斯的劉少奇也只好退卻了。他說過：“你們說當前工業管理上的一個突出問題是個‘散’字。什麼叫‘散’？就是沒有組織起來。我們的國家計劃是粗線條的。辦托拉斯就是要組織起來。不只是一



劉少奇、周恩來與朱德。

個企業要組織起來，一個行業要組織起來，整個國民經濟都要組織起來。你們考慮一下，一個市，一個省，全國，這麼多的工廠，怎麼很好地組織起來？要算總帳。試辦托拉斯的目的，就是要解決整個國民經濟更有計劃些，更有組織些。有些行業的大批發站，歸托拉斯比較合理。組織起來，就可以搞專業化、標準化、系列化，提高質量，增加品種，降低成本，提高勞動生產率。這樣，對國家有利，對地方有利，對整個社會都有利。”（注 25）有了毛澤東給王任重的信和王任重給劉少奇的信，這些意見也只能不提了。1965 年 5 月 6 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批轉的國務院農林辦公室、八機部、農業部關於改進農業機械化工作管理體制的報告中，提到“成立全國統一的農機銷售公司。其任務是：統管全國農機產品的銷售工作，實行托拉斯式的經營管理方法，以克服全國各地銷售業務過於分散、中間環節過多的現象。”雖然這是根據譚震林同志的提議，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同志的同意，並經總理指示，經過農辦、農業部和機部共同協商的共同意見，由中共中央、國務院正式批轉的文件。有了王

任重轉達的主席表示贊同八機部不要搞“托拉斯”的給劉少奇的信，一切提議、同意、指示、批轉的報告，都成為泡影、隨後成為“文革”的批判對象。

因此，農機工業在地方為主、自力更生發展的方針下較嚴重的“散”的問題，只能越來越嚴重，為了急於在 10 年、15 年基本上實現農業機械化，只能更“散”，為後來的農機工業的技術改造、結構調整留下了致命的後遺症。

3. 將農業機械化這個經濟、技術、社會發展的過程和農機是先進的生產力要素，納入階級鬥爭範疇，拔高為“實現農業機械化，是黨在農業問題上的根本路線，是一場偉大的革命，是關係到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鞏固工農聯盟，加強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復闢的大問題。我們要深入持久地開展革命大批判，不斷地提高路線鬥爭覺悟的政治鬥爭”（注 26），致使農業機械化的發展戰略、目標、速度在上相當長時期進入誤區。

農業機械作為先進的生產力要素，能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和有利於土地生產率的增加，受到農民的歡迎。但是，如果把農業機械化作為兩條路線、兩個階級、兩條道路鬥爭的標幟，以政治壓力和群眾運動強令實現脫離實際的主觀主義、千篇一律的指標，如“1980 年基本上實現農業機械化”的口號，帶給農民和農機戰線職工的是得不償失的教訓與失誤的損失。

在“1980 年基本上實現農業機械化”的戰略目標上，毛澤東以王任重的湖北省委 4 年、7 年、10 年實現農業機械化的設想，批評劉少奇這 10 年抓得不太好，此事需與備戰、備荒、為人民聯繫起來的政治壓力，強行推廣到每個省，甚至周恩來也不得不在 1966 年連聲檢討後在 1969 年表示“我們在執行主席農業政策上，就是機械化抓慢了，因此提出“今後 11 年（即到 1980 年）每省、每縣、每社都要基本完成（農業機械化）”、“土地那麼多，有沼澤、沙漠，各種類型機械要跟上。”（注 27）更可以理解各地對實現農業機械化的目標的盲目性與狂熱性之嚴重。這主要是“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鬥爭的政治壓力下，對農業機械化這個技術、經濟發展過

程，作出歪曲、變形的理解與規劃，出現了非理性、非經濟的一系列錯誤判斷與決策。

不僅在農機化戰略目標上，而且在推廣具體機具上，也常採用“左”的政治壓力。1958年4月16日《人民日報》社論《提高雙輪雙鋤犁的效用》中，分析“雙輪雙鋤犁不能推廣的主要原因，是當生產資料的個體私有制改變為集體公有制的時候，當推廣雙輪雙鋤犁來代替舊犁並鞏固集體公有制的時候，一些富裕農民對社會主義的抵觸情緒及農民的保守思想和習慣勢力的一面，就在某些農村工作幹部的思想上反映出來，他們對雙鋤犁不懷好感。再加上右派分子們從中興風作浪，就一度形成了反對雙鋤犁的一股逆流。業務部門本身也有一部分幹部存在著右傾保守思想，或者缺乏革命的朝氣和勇氣，或者是心中無數，因而在小颱風和反冒進的逆流中沒有硬著頭皮頂住，從而形成了退縮不前的混亂局面。”雖然，這種適於東北幾匹大馬牽引的雙輪雙鋤犁，也不是全國所有耕地，一律都能用雙鋤犁耕。但是，社論最後仍然要求，“各地廣大農村工作幹部都要根據當地推廣計劃，積極地大力推廣雙鋤犁。一定要人人都做促進派，個個會用雙鋤犁，讓每部雙鋤犁都投入生產。讓我們在今年



王任重得了毛澤東的聖旨，給劉少奇的信很不客氣。

農業生產的大躍進中使雙輪雙鋤犁的推廣和使用，也來一個大躍進。”在這樣強大的政治壓力面前，出現雙輪雙鋤犁的推廣和使用的“大躍進”，當然只會給國家和農民帶來巨大的損失。

再如插秧機剛剛出現，《人民日報》1960年6月14日的社論就認為：“今年我們便可以使70%左右的稻田插秧工作實現插秧機械化。”這個目標，在52年以後的2012年也沒有可能達到。對於各種機械一定要標準化、系列化、通用化，這是一條工業生產高質量、低成本的裝備和便於使用、節約運行費用的共同規律，但是社論熱情地歡呼：“截至目前止，全國已出現兩千多種插秧機，既有土的，又有洋的和土洋結合的；既有結構簡單的，又有結構精密的；既有人力或畜力帶動的，又有用動力機械帶動的，真是百花齊放，萬紫千紅。”為什麼在全國形成了轟轟烈烈的運動？社論說是由於“在插秧機的創造過程中，各地黨委堅持政治掛帥，對右傾保守思想、脫離實際和盲目崇拜外國的資產階級思想進行了必要的批判，從各方面鼓勵、支持廣大勞動人民的創造，國家也在技術上、物質上給予大力幫助”的結果。這種政治壓力下的群眾運動，絕不能說沒有一點正效應，但是技術上、物質上大力幫助造成的巨大浪費的負效應是有目共睹的事實。

“文革”還未正式開始，就認為農業機械化“不僅是一個經濟問題，而且是一個政治問題”（1966年2月5日〈湖北省委關於逐步實現農業機械化的設想〉），《人民日報》1966年4月9日發表這個《設想》的“編者按”提高為“更是重大的政治問題”。《設想》還將農業機械化、農業問題與“解決5億多農民的問題”聯繫起來。認定是“逐步縮小城鄉差別、工農差別，這對於鞏固工農聯盟，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陣地，防止‘和平演變’、反對資本主義復辟，都是關係極大的問題。”將農業機械化同防止和平演變、反對資本主義復辟相聯繫，是《設想》的重中之重，是一根能致人於死命的政治大棒。而《設想》中直接提出的尖銳問題：“要不要農業機械化的問題，在大多數同志中，已經解決了。但是，什麼時候才能實現農業機械化，如何實現農業機械化的問題，則還沒有解決。”從毛澤東的批

示由王任重給劉少奇的異常程序看，毛澤東是肯定王任重不僅解決了“要不要農業機械化”的問題，湖北省委的設想還解決了“什麼時候”和“如何實現農業機械化”的問題，有必要在湖北召開現場會。而劉少奇則是“大多數同志”之外的少數了，“抓得不太好”（毛澤東語）或“抓得很不好”（周恩來語）的代表人物了。《設想》提出“是努力爭取在20年至25年內實現農業機械化，還是等等再說呢？是依靠集體經濟和地方工業潛力，走自力更生、勤儉創業的道路，還是單純依靠國家投資和供應機械呢？我們認為，應當肯定的是前者而不是後者，應當持積極態度，而不要消極等待。”這就將持積極態度、執行自力更生、勤儉創業、大搞群眾運動要在20—25年內實現農業機械化的正確路線的“我們”，劃在讚揚《設想》的毛澤東一邊，就同“消極等待”的劉少奇劃清了界限——劉少奇認為農業機械化“牽涉的方面很多要研究、討論”，直到1966年2月23日給周恩來、鄧小平的信中，還沒有明確表示同意2月19日毛澤東給王任重的信中再明確不過地強調“用25年時間，基本上實現農業機械化”的具體期限。對毛澤東的嚴厲批評：“已經過去10年了，這10年我們抓得不太好”，似乎仍無動於衷。怪不得1966年3月12日毛澤東針對劉少奇3月11日的回信中不無理由地說：“若事前無準備，那時議也恐怕議不好的。”

由此看來，1966年2月由《設想》引發的一場延續到“文化大革命”之後很長時間仍在爭論的農業機械化問題，在一些指標、期限、方針、路線不同觀點爭論的背後，隱藏著一場更重要的爭論：姓社姓資的大爭論，在明面上是討論20年還是25年或是更長時間才能基本上實現農業機械化的問題，實際上準備了一頂是不是堅持反對和平演變、資本主義復辟的大政治帽子，是《設想》所說的“一個政治問題”，《人民日報》1966年4月9日“編者按”所指出的“更是重大的政治問題”。這樣，可以看到，1966年2月毛澤東向劉少奇在農業機械化問題上的開火，也是8月“炮打司令部”的另一場預演，可能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啟動工序，是繼批《海瑞罷官》、批彭德懷之後，直接批到劉少奇頭上的周到安排。絕不是簡單的就

農業機械化談農業機械化問題，這樣實際上就把農業機械化納入政治鬥爭的棋局，將農業機械化作為階級鬥爭的工具、武器，用來炮打“資產階級司令部”、批倒、打倒“黨內最大的走資派”。它在“文革”初期、中期和後期都在階級鬥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至於農業機械化這個生產力要素的發展，對農業生產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那也是事實。不過，代價極大，效益較小，口號實現不了。

五、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實事求是地評價與放棄“1980年基本上實現農業機械化”的口號。按照客觀經濟規律確定一系列正確政策，逐步地有選擇地推進農業機械化

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華國鋒主持中央工作，仍然堅持“兩個凡是”，在1978年1月召開了第三次全國農機化工作會議，堅持脫離實際的“1980年基本上實現農業機械化”的口號和“全國農、林、牧、副、漁主要作業的機械化水平，達到70%左右”的高指標。同時，把“文革”中批判劉少奇“先機械化，後合作化”的政治運動，轉變為深入揭批“四人幫”，批判“四人幫”是破壞農業機械化事業的罪魁禍首，是他們“整個篡黨奪權陰謀活動的組成部分，妄圖搞垮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制度的物質基礎”，繼續認為農業機械化是一場“偉大的革命運動”。直到黨中央《關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明確指出，“1980年基本上實現農業機械化”的口號是脫離實際的以後，農業機械化不是“革命運動”，而是社會、經濟、技術發展過程的觀點，才逐漸為更多同志與領導所接受，逐步採取了一系列有利於農業機械化健康發展的政策，主要是：

農業部1979年9月14日向國務院、黨中央的請示報告，“1980年基本上實現農業機械化”這類口號不宜再提了。提出農業機械化必須與農業的區域規劃和耕作制度的改革緊密結合，與開展多種經營和發展社隊工業結合、同農業的專業化、經營的多樣化結合。1979年8月28日黨的十一屆四中全會《關於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中提出“要積極地有計劃地開展農業機械化”，不再提“1980年基本上實現農業機械化”。以後在趙紫陽公開的正式報



1975 年的宣傳畫。

告中和中共中央關於農村問題的一號文件中，提出“有選擇地推進農業機械化”，以選擇性機械化戰略替代了脫離實際的全國基本上實現農業機械化的戰略。

鄧小平 1980 年 5 月 31 日提出“廣義的機械化，不限於耕種收割的機械化”，1982 年 4 月 27 日國務院通知，農業用拖拉機從事非營業性運輸的範圍，打破拖拉機不可以從事運輸的界限。1984 年 2 月 27 日國務院發出關於農民個人或聯戶購買機動車船和拖拉機經營運輸業的文件，允許農民個人從事營業性運輸，包括貨運和客運。再次打破了拖拉機不能從事運輸的桎梏和大型生產資料、拖拉機不能私人購買的框框。

從客觀決策上，不再將農業機械化作為階級鬥爭的手段，大搞“革命運動”、“群眾運動”限期完成政治任務的指標，而承認農業機械化需遵循客觀自然規律和經濟規律，要按照科學的農機化區劃

確定不同地區的農機化重點、步驟、方法與機具系統，採取選擇性機械化戰略。

在微觀決策上，允許農戶個人購買農機，農業機械化將根據農民個人的經濟效益由農民選擇合適的機具、發展速度、規模與經營組織形式，領導部門只是在農民選擇的基礎上進行再選擇、加工、引導。是市場而不是長官意志決定一切。

因此，建國 50 年來的後期 20 年，農業機械化的發展在接受了過去 30 年正反面經驗的基礎上有了更多的成功經驗與新的成就。

回顧過去，往事如煙，劉少奇當年提出的鞏固新民主主義制度、批判空想的農業社會主義思想的正確性，被“包產到戶”的成功實踐所證實。鄧小平提出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批判劉少奇的“先機械化，後合作化”的論點，實際上是錯誤地批判在發展生產力的基礎上改變生產關係的正確觀點，劉少奇提出的“我國的基本口號是民主化和工業化”，仍是值得思考的。人民公社化和孤軍深入的“1980 年基本上實現農業機械化”戰略，是一朵不結果實或得不償失、留下沉重後遺症的花，從反面證實了劉少奇反對空想的農業社會主義的正確性和歷史意義。也證明地域性差異極大的中國，只能選擇性機械化、現代化。這些歷史教訓，證明了毛澤東左傾路線是完全脫離中國實際和客觀規律的，帶給中國的是大災難。

農業機械化將按照客觀歷史規律、經濟規律、自然規律，曲折地、艱苦地但是勝利地前進，而不是按照某個人的主觀意志確定或變更其發展道路與目標。人民是歷史的主人，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被稱為“人民大救星”的毛澤東實際上是大災星。一切裁判中，最公正的裁判是時間，是歷史。

（1998 年第一稿，2012 年修改）（姚監復）

注釋：

- 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9 卷，第 431、451 頁。

- 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26頁。
- 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148頁。
- 4,《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02頁。
- 5,《關於新中國的經濟建設方針》,《劉少奇論合作社經濟》第47頁,中國財經出版社。
- 6,轉引自余廣人:《對劉少奇鞏固新民主主義制度的再認識》,《炎黃春秋》,1998年8月。
- 7,《劉少奇選集》下卷,第5頁。
- 8,《新華文摘》,1998年6月,第76頁。
- 9,《新華文摘》,1998年7月,第77頁。
- 10,《劉少奇選集》下卷,62-63頁。
- 11,《劉少奇選集》下卷,第62頁。
- 12,《新華文摘》,1998年6月,第78頁。
- 13,《人民日報》,1966年2月5日,編者按。
- 14,《劉少奇選集》下卷,第474頁。
- 15,《毛澤東建國以來文稿》第12冊,第21--22頁。
- 16,《中國農業機械化重要文獻資料彙編》,第625頁-626頁,北京農業大學出版社。
- 17,《中國農業機械化重要文獻資料彙編》,1988年4月,第625-626頁。
- 18,《中國農業機械化重要文獻資料彙編》,第627頁。
- 19,《中國農業機械化重要文獻資料彙編》,第628頁。
- 20,《中共中央關於農業機械化問題的意見》,1958年3月22日成都會議通過。4月8日政治局會議批准。
- 21,《人民日報》,1966年4月9日。
- 22,《中國農業機械化重要文獻資料彙編》,第247頁。
- 23,《中國農業機械化重要文獻資料彙編》,第181頁。
- 24,《中國農業機械化重要文獻資料彙編》,第617頁。
- 25,《劉少奇選集》下冊,第473—475頁。
- 26,國務院1971年12月3日關於加速實現農業機械化問題給毛主席、中共中央的報告。
- 27,《中國農業機械化重要文獻資料彙編》,第628頁。 □

“何等好也”的“全國第一張大字報”之所以能夠橫空出世，並為毛澤東所利用，是其來有自，絕非偶然的。

被幸災樂禍的 “極左分子” 陸平

——也談“第一張大字報”的合力

最近，聶元梓在回憶“全國第一張大字報”時說，它的恰逢其時的出籠以及所產生的瘋魔般的效應，絕非今天一再重複地“造反”二字所能涵蓋的，這裏面既有一個老共產黨員對黨中央發動文革的“五·一六通知”和“防修、反修”偉大號召的正常反應，也有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在北大歷次運動中所造成的積怨爆發所致。這多種合力的結果，才有了“第一張大字報”的出世。其中，作為陸平個人在北大所作所為，積怨甚多，也是不容忽視的“合力”之一。

不學無術 執掌北大

陸平(1914 – 2002)，男，原名劉志賢，又名盧荻，吉林長春人。1933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4年至1937年在北京大學教育系學習。1957年10月任北京大學副校長，同年11月起任北京大學黨委第一書記，1960年3月至1966年6月兼任校長。

陸平還有個比他小四歲的弟弟劉居英，是開國少將。“一二·九”



“一二·九”運動時的陸平

運動中，這兄弟兩人都是北大學生領袖。抗日戰爭中，陸平從延安奔赴晉察冀邊區，劉居英則留在山東，後轉戰東北。12年後，兄弟重逢，才發現兩人都在鐵道部肩負重任。1951年劉居英入朝，歷任中朝聯合鐵道運輸司令部副司令員兼朝鮮鐵路軍管總局局長、中朝聯合前方鐵道運輸司令部司令員、中朝聯合鐵道運輸司令部司令員兼政委，還獲得過朝鮮一級、二級國旗勳章。陸平則任鐵道部政治部主任、哈爾濱鐵路局局長。陳賡去世後，劉居英開始執掌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陸平則在打倒馬寅初後出任北京大學校長。北大一張大字報點燃全國“文革”之火後，陸平與劉居英雙雙下臺，新時期後又相繼復出。

正如聶元梓所講，陸平很左，1957年反右，北大是重災區，教職工打成右派的90人，學生右派421人，共計511人。但毛澤東仍不滿意，嫌北大當時的校黨委書記江隆基手太軟，就把鐵道部的陸平派來擔任校黨委書記。到了這年10月以及來年春季，不少的單位就已開始對右派進行甄別了，也就是給明顯搞錯的、不符合右派標準的人摘帽，可北大卻反其道而行之，偏偏又搞了一場三個月的“右派補課”，補劃右派173人，總數達到了699人。其中教職工110人，學生589人，佔到了總人數的7%。

江隆基“反右”不力，在黨內挨了批判，調任蘭州大學校長。文

革之初，就不明不白地死去，很可能是遭人謀害。北大歷史系教授鄧廣銘教授曾說過，江隆基無論如何也是教育家，不像陸平那樣不學無術。陸平到北大後，指揮批判馬寅初校長，不久就取而代之，正式當上北大校長。這兄弟倆同時掌管中國兩所頂級大學，在中國也算是奇特的政治現象。

聶元梓講述與陸平的恩怨

2010年7月28日，聶元梓在北醫三院病房講述她與陸平之間的個人恩怨：

我1960年6月來北大工作，是大哥聶真與陸平聯系的，先到經濟系，1963年春又到哲學系。我與陸平本人並沒有個人恩怨。平心而論，陸平對我還不錯，我原先住在人大哥哥聶真處居住，北大一蓋新樓，陸平就給了我一套。我對陸平有三條意見，一是官僚主義，個人作風不好，我到北大哲學系之後，有一個系幹事叫李繼霞（音，具體名字記不得了），多次向我反映，說陸平有男女作風問題，每天中午都乘無人時到一個女幹部（單身）寢室去。我聽了，祇是一笑置之，這樣的問題，沒有真憑實據，如何勸說？結果這位女幹事把陸平的問題反映到上面去了。前幾年，一個搞檔案的作家見到我問，認識李繼霞嗎？我說認識啊，他說翻查檔案時，查到了當年李繼霞



聶元梓

向上面反映陸平男女關係的材料。二是宗派主義，連劃右派，都不是以“右派”標準來劃，而是以人來劃線的，關係好的，看著順眼的不劃，不順眼的就多劃。所以，北大自江隆基下臺、陸平上臺後所補劃的“右派”，大都是冤假錯案。第三個意見，現在看來是我的不對了，太左了，那就是我認為陸平抓階級鬥爭不力，當年中文系盛行讀《紅樓夢》，男學賈寶玉，女學林黛玉，我看著很不舒服，認為這是校黨委抓階級鬥爭不力的結果。

陸平很善變，整人很厲害。1958年秋，根據上級的指示，以北大、人大兩校師生組成了一支近三百人的隊伍，專門去外地考察人民公社，由兩個院黨委共同領導，李醒塵和汪子嵩就在這個調查組裏。當時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存在很多問題，下去的人給兩校黨委邊彙報邊評論，最後整理成《問題彙編》，說了不少人民公社的弊端，陸平也在其中。後來北京市委的《內部情況簡報》把調查組的《問題彙編》全文刊載，並且加上大字標題——“人大、北大部分師生惡毒攻擊三面紅旗”，矛頭指向當時北大副校長和第一副書記



陸平（右一）陪同周恩來參觀北大

鄒魯風。這時，陸平馬上變臉了，讓北大參加調查組的人做檢查，揭發鄒魯風。並把原來兩校黨委還開過歡送會的調查組，說成是“背著兩校黨委搞的反黨活動”。鄒魯風經不住批鬥，投湖自殺了。自殺前的頭天晚上，鄒魯風與陸平曾有過交流，但第二天還是死了。所以，鄒的死與陸平有關聯。前年，李醒塵來我這裏就說過，對人民公社提意見時，陸平的議論最多，調子最高，一轉臉，他自己又最左，整人最厲害，此人真是善變啊。

最新材料揭露陸平“極左”

比陸平大五歲的鄒魯風（1909～1959），是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參加革命的老黨員，也是“一二·九”運動時，流亡到內地的東北大學的學運領袖。在北平學聯期間，他曾受地下黨委託，到上海找到魯迅，托魯迅轉交北方局給黨中央的重要信件。他也是仰慕魯迅，才改名鄒魯風的。全國解放後，鄒魯風調到高等教育戰線工作，歷任東北人民政府教育部副部長、中國人民大學黨委副書記、副校長和北京大學副校長等職。1959年10月26日鄒魯風被逼自殺時，剛及49歲。

2010年5月，內地東方出版中心出版了一本原北大國際政治系教師陳哲夫的《我在北大六十年》，裏面有“對北大、人大的人民公社調查組的大批判”一節，詳盡敘述了陸平在這次導致鄒魯風自殺的事件中的極左表演。

書中說當時對調查組展開大批判，是北京大學反右傾的重要任務，黨委書記陸平親自掛帥，被揭發的如“公社辦得太大了，太早了”，“食堂辦得有點冒進”、“幹部作風粗暴”，都成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論。開始矛頭祇是指向汪子嵩等三個組長，後來有人提出“能不能往上揭？”與會的黨委書記陸平斬釘截鐵地說：“揭！揭！”於是，矛頭又指向了鄒魯風。

10月27日，鄒魯風自殺的消息傳來，陸平感到的卻是憤怒，他用手猛地拍了一下桌子，罵道：“媽的，叛徒，拿紙筆過來，開除黨

籍!”一個工作人員拿過來了紙和筆，陸平就立即起草了開除鄒魯風黨籍的決議。那時候，自殺是軟弱的表現，是對革命、對黨的叛變行為。陸平的所謂憤怒，只不過想表現一下他堅定的無產階級黨性。

回憶錄寫道，鄒魯風死後，家人要求給鄒的墓前立一個碑，竟不被批准。鄒夫人只好在一塊磚上寫著“鄒魯風之墓”的字樣，放在墓前。而且這件事是保密的，在北大祇有少數黨內幹部知道，廣大的北大師生無從知曉。據說後來某系的一位教授因事到八寶山去，突然在一個墓前發現了一塊寫有“鄒魯風之墓”的磚頭，十分驚奇，回到學校後問，沒聽說鄒魯風去世呀，怎麼會有“鄒魯風之墓”呢，會不會有兩個鄒魯風？一位北大的黨委第一副書記、副校長就是這樣悄悄地走了。

歷史學家眼中“可悲的陸平”

歷史學家王曾瑜先生是 1957 年考入北大歷史系的，陸平比他晚來幾個月。他在自己回憶錄中，也有一節“可敬的馬校長和可悲的陸平”，對陸平有過這樣的評價：

有一位鄒魯風，1957 年是人大副校長，1959 年調任北大副校長，曾做過一次全校報告，就銷聲匿跡了。直到很晚，我才瞭解其內幕。原來陸平和鄒魯風為了配合大躍進，曾派法律系畢業班組織一個調查組，結果調查報告的結論竟與彭德懷一致。反右傾開始，陸平就把調查組的右傾問題全盤諉諸鄒魯風，狠整的結果，鄒魯風終於自殺。鄒魯風在充當反右派指揮官時，只怕也根本不曾料到，自己兩三年後竟有此下場。通過陸平這件翻手為雲覆手雨的勾當，我終於領悟到一個道理。我們從書本上學到的是“革命同志”之間精誠友愛，患難與共的關係，但事實上至少還有另一種你死我活的殘酷的人際關係。處在陸平的地位，他不往死裏整鄒魯風，又如何得活？如果再提陞一點，是可以稱之為你死我活的定律。

陸平狡猾地躲過了反右傾一劫，卻難逃文革一劫，一個最標準的反右派、反右傾的左派，轉瞬間又成了最標準的右派、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親歷了極厲害的批鬥。據說，他在文革後甚至不願路過北大的校門，以免追憶自己當年不堪迴首的痛楚。但他對自己當年傷害、整死了那麼多無辜者，嚴重損害了數以萬計的北大學生的學業，卻並無追悔之意，從無致歉之語。

聶元梓說：我們這個階段的北大人，偶而談及陸平，不約而同地極有惡感。記得大饑荒年代的夏季，我與化學系的一位同學在校園內正好與陸平相遇。他夾著一個當時顯示高幹身分的大黑公文皮包，短袖衫下，腹部豐厚的脂肪上下顫動，與廣大學生們的餓瘦形象成了鮮明對照。我的同學用上海話說：“看見伊個肚皮就促氣！”文革之初，聽說陸平挨鬥，北大人往往幸災樂禍。一位化學系同學當時對我說，他最遺憾的就是畢業證書上是陸平的名字，而不是馬寅初的名字。

縱觀陸平到北大後的行為，先是給“反右”鬥爭加碼，株連無辜師生；再就是擴大反右傾鬥爭，逼死副校長鄒魯風；接著又批判馬寅初，讓自己坐上北大第一把交椅。如此所作所為，豈止可悲，而是可恨了。正如王曾瑜所回憶的，“文革之初，聽說陸平挨鬥，北大人往往幸災樂禍。”這種“幸災樂禍”，也正是聶元梓所說的“合力”之一。由此看來，“何等好也”的“全國第一張大字報”之所以能夠橫空出世，並為毛澤東所利用，是其來有自，絕非偶然的。（韓三洲）□

周恩來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忠臣良相”符號，林彪是“當面喊萬歲，背後下毒手”的“陰謀家、野心家”符號。二人做了同樣一件事，在周，人們就說成是“忍辱負重”“違心”之言；在林，人們就說是“心懷鬼胎”

用嚴謹邏輯和 實證精神還原周恩來

專訪中共黨史專家司馬清揚

“半路出家”這句話，用在從山東農村一個農民家庭走出，年紀輕輕就成為美國有機化學博士，並在美國從事科技工作的司馬清揚身上，十分貼切。十年前，他絕對想不到自己會成為中共黨史專家，竟在短短兩年多內一口氣出版了三本關於林彪和周恩來的研究專著：

《新發現的周恩來》（與歐陽龍門合著，明鏡出版社）

《找尋真實的林彪》（與丁凱文合作，中國文革歷史出版社）

近 50 萬字的上下冊《穿越歷史的迷霧——周恩來與林彪》（明鏡出版社）

司馬清揚坦承，最開始，是在網上看見有些人寫的黨史人物和事件的文章，覺得論點和論據大有可議，於是跟帖質疑、討論。慢慢地，在辯論中激起了興趣，一發而不可收了——那時，他的網名叫“簑笠翁”。

司馬清揚現居加州。2012 年 6 月 30 日，《新史記》記者撥通

《新發現的周恩來》(司馬清揚、歐陽龍門著,明鏡出版社)



了電話,對司馬清揚進行專訪。

我的書被當局列為要嚴加管理

新史記: 司馬清揚先生,您是從什麼時候、由於什麼契機,對林彪和周恩來問題發生興趣的?

司馬清揚: 我來自農村,爸爸媽媽都在農村。在國內讀了中科院的研究生,到美國來讀有機化學的博士。在美國的工作都是科技方面的,基本上與文科不搭界——在國內時,考歷史、政治,我都是不及格的(笑)。

2003年、2004年左右,在海外中文網站上,我讀到溫相的文章,覺得他講的有些內容不合乎邏輯,就去反駁他。反駁過程中,我查資料,對黨史尤其是林彪問題也就慢慢發生興趣、積攢了一些資料。後來我回中國或者旅行時,每次都採訪一些人、結識一些人,又認識了丁凱文、汝信、何蜀這些人,也認識了舒雲。其中尤其

是澳大利亞來自台灣的學者孫萬國（莫納什大學中國研究系主任、教授——編者注）對我幫助很大。

我覺得，應把過去歷史寫錯了的，正過來；把人們認為是正的歷史，翻過去——這兩者其實是一回事，就是尋求歷史的真相。我先與歐陽龍門寫了關於周恩來的書，又跟丁凱文合作寫了林彪的書，最後獨自寫了周恩來與林彪對比的書。有了前兩本書，寫這第三本就比較容易了。

新史記：我們看到您的書中列出了大量的註解，一一標明資料來源。您是怎麼弄到這些資料的呢？除了標出的這些，您是否還有不便列出的獨家第一手資料來源？

司馬清揚：對，我盡可能註明了資料來源。多是我去哈佛大學、去柏克萊大學等查到的。我住的地方離柏克萊不太遠，柏克萊關於“文革”的資料蠻多的。

有一些是獨家通過某些比較特殊的渠道獲得的資料。比如我引用過部隊的一種內部文件叫《工作通訊》，寫林彪時用得很多，寫周恩來時也用上了。這是軍隊發到師或團以上單位的，他們內部出了一套書，我搞到了這套書。

2012年5月29日，中央有關單位又發了一個通知，列出了要求各地嚴加管理、加強注意的書目，上面又有我和我的書籍的名字——值得指出來的是，我寫的有關林彪的書籍並不包括在此通知內。顯然國內對於林彪的討論已經相對寬鬆，周恩來的研究尚屬外人不能涉入的“禁區”。

搞黨史的人，最好是理科背景

新史記：您作為研究者，是否採訪了很多黨史知情人？例如，“913”當晚在場的林彪女兒林豆豆和她的丈夫張清林？

司馬清揚：沒有見到。說實話，我也不覺得見他們有多大的意義。

新史記：為什麼會這麼覺得呢？

司馬清揚：因為……林豆豆從個人身分、精神狀態、情感傾向上來看，使她透露出來的信息，有一種強烈的個人因素在內。所以照我個人看法，可信度不是特別高。所以我一直沒有去找他們，覺得沒有多大用處。

新史記：這就牽涉到一個大問題了：您是根據什麼，判斷資料的真偽來決定取捨？

司馬清揚：拿到一份資料，怎麼判斷它可信不可信？有些東西很好判斷，根據史實、考證，以及根據邏輯，就足以推斷。例如，林豆豆說，賀龍死了之後，林彪大哭了一場。以賀龍和林彪的關係，他是不會為賀龍的死而大哭的。最開始代表毛澤東出來整賀龍的，就是林彪出面；在1966年9月8日軍委常委會議上宣布賀龍罪行，傳達毛主席說的賀龍這個人“靠不住”，“他會造反”等等。他怎麼會為賀龍哭呢？

在賀龍平反的過程中，周恩來去找北京軍區政治委員廖漢生，要他寫一個關於賀龍沒有犯過原來被指責的錯誤的證明。其實，從法律等各個角度來看，以廖漢生與賀龍的千絲萬縷的聯繫，不應該要他來寫，他當這種證人，沒有公信力。同樣的道理，從歷史研究的意義上看，像林豆豆作為當事人的親屬，對她講述的情況要更加審慎地核查。

國內出的《毛澤東傳》《周恩來傳》，儘管動用了好多人力、好長時間去編寫，但是中間還是有好多錯誤。例如，《周恩來傳》中說，周恩來和鄧小平對毛澤東發動“文革”不滿，在杭州會議上，當毛澤東向周恩來和鄧小平試探問起彭真的事，周、鄧都做了否定的回答。在高文謙的書裏也這麼講。其實這根本是沒有的事：鄧小平沒有參加杭州會議，他到西北去了。將許多人講的時間、地點一聯繫、一對照，就能判斷很多事情的真假。

我一直認為，黨史是很有邏輯性的學科，搞黨史的人，最好是理科生——需要邏輯嚴密麼。寫史要注意兩點，第一是轉述別人的話，千萬不能跟自己的分析、推測混為一談；第二，一定要註明資料來源：任何一個說法、一個邏輯判斷，都不是憑空而來的，不能閉



《找尋真實的林彪》（丁凱文、司馬清揚著，中國文革歷史出版社）

門造車。

寫黨史，我從來不認為要“十年磨一劍”——十年寫一本書。根本不需要那麼多時間，我這幾本書，都是八九個月就寫成了。

現在有人寫歷史，就像寫小說，把密室裡兩人私下對話都聽見、都寫出來了，不僅寫出對話，甚至寫出人的神情、姿勢、動作……好多人都犯這種錯誤，包括辛子陵。歷史，絕對不能這麼去想象。我不認為趙無眠那本《真假周恩來》是本史書；甚至高文謙的《晚年周恩來》，也不能算一本史書——裏面心理的描寫、推測太多。同樣，高華的《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的來龍去脈》也脫不了這個窠臼。大致是我國的史學寫法之傳統，《史記》就是一典型。

新史記：中西方史學界從源頭開始，包括被視作“泰山北斗”的中國的太史公司馬遷、古希臘“歷史之父”希羅多德，著作中都有極多的文學描寫甚至虛構，在對史實的描寫中，夾雜著神話、傳說、或是那種在

現今歷史學家看來根本不能算是歷史的寓言故事，甚至有時還添了些由作者創作的虛構故事。古人之所以把這麼多非史實放進歷史著作中去，是因為他們對“歷史”的理解和看法與我們大為不同，不光是記敘某個歷史事件本身，而要透視涵蓋產生那種事件的文化。

現代西方史學界也有不少著名學者十分重視敘述，例如柏克萊大學魏斐德教授、耶魯大學史景遷教授，但是一旦“講故事”，就難免受到“虛構”之譏。您怎麼看待這個問題呢？

司馬清揚：胡適說過：“歷史家需要有兩種必不可少的能力：一是精密的功力，一是高遠的想像力。”但是如何運用想象，是很大的一門學問、技巧。我並不是說想象力在歷史研究中不重要，考古中更要運用想象力。但這種想象力，一定不能是具體的史料，比如說，林彪出走，到底是主動的還是被動的？從林彪自己上車、上飛機……等史實，我可以推斷他是主動的；但是不能用想象力去嫁接、去虛構，這二者有明顯的區別。很多人就犯了這個錯誤，居然有林立果在蘇州的密室對話！又不註明資料來源，就這麼寫出林立果怎麼講怎麼講。

我不認為司馬遷的古老做法是正確的，不認為歷史是個任人解說的小女孩。我想用一個最簡單的劃分方式：你不是當事人，你怎麼知道他的心理活動？我想還是要用“實證”的方法。一個人吃了蘋果，寫下他吃了蘋果就是符合歷史的，要說他吃了蘋果很高興，或者其實他並不樂意吃蘋果而更想吃橘子……他心裏如何如何想，這些若沒有充分依據就不能寫到書裏去。如果周恩來沒有談到自己的內心感受、思想鬥爭，你就不能寫——你不是周恩來嘛。各人有各人的觀點，這是正常的，但是不能違反這個規則。

從“符號”中解脫周恩來林彪

新史記：您能否用比較簡明的語言，對我們的讀者，概括您對周恩來的看法，對林彪（及林彪事件）的看法？

司馬清揚：我因為比較喜歡林彪，就去看關於他的許多史料；

他與毛關係密切，於是我又看了關於毛的許多史料。林彪對個人崇拜有不可推卸的責任，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但是我發現好多事情後來發生了扭曲：好事情明明是林彪做的，放到周恩來頭上；壞事明明是周恩來做的，放在了林彪的頭上。

記得有一次我與一位朋友爭論，我問他，你說林彪搞個人崇拜，他講了哪些話？他舉了一個典型的例子，林說了：“毛主席的話，句句是真理，一句頂一萬句”。我說：“一句頂一萬句”確實是林彪講的；但是“句句是真理”是周恩來講的——《解放軍報》一個編輯專門講了這件事，他說有人打電話來發指示講了這句話，這位編輯沒有提名字，但我經過採訪，確認他說的“有人”就是周恩來。再如，稱頌毛澤東思想是當代馬克思主義的“頂峰”這句話，周恩來也比林彪先講。

至於迫害劉少奇、迫害賀龍，都張冠李戴栽到林彪頭上。而像“解放”老幹部這些好事，都安在周恩來頭上。

我在歷史研究中，特別注意到“符號現象”的問題。

何謂“符號現象”呢？“文革”初期北師大女附中副校長卞仲耘被該校紅衛兵打死，人們都相信後來被毛澤東接見的宋彬彬涉案，這就是將宋彬彬當成了“文革”紅衛兵暴行的符號了，而並不去真正瞭解她在打死卞仲耘上是否有具體罪行。周恩來和林彪，事實上也成為了這樣的符號：周恩來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忠臣良相”符號，林彪是“當面喊萬歲，背後下毒手”的“陰謀家、野心家”符號。從符號出發，遮蔽了對其複雜言行的真實瞭解。如果二人做了同樣一件事，在周，人們就說成是“忍辱負重”“違心”之言；在林，人們就說是“心懷鬼胎”。人們認定的這種“符號”是否真實？就得要史料證明，不能大帽子一扣就了事。對任何一個黨史人物，我們都應該採取同樣的標準，有一分材料說一分話。

我不認為黨史“說不清”，黨史很多事件是可以說清的。關於資料的運用有兩點，有一次我去台灣中研院近代史所做報告，我在聊天時就問所長陳永發：你寫《中國共產黨七十年》那本書的時候，怎麼區分浩如煙海的史料的真偽？舉一個例子，鄧小平出訪蘇聯，

遇到了匈牙利事件，政治局會議上，鄧小平建議“出兵鎮壓”。我問：你怎麼知道這條史料是正確的。他說，憑直覺。寫一本書，有上千個資料，不可能一一查證。我寫這三本書，每一本都超過兩千個資料來源，我不可能都查。多是憑直覺。像鄧小平建議出兵，我覺得是可信的，可以聯繫到“六四”，他有這個思想基礎；後來他說的“不爭論”，也是一脈相承——不跟你辯論，就是對不同意見就壓下去。他骨子裏就是這麼一種人。

所謂“直覺”，雖然當時只是瞬間選擇，但卻是建立在讀了很多資料、懂得很多歷史資料的辨認方式這個基礎之上的，並不是憑空判斷。

關於資料，有一個例子。《毛澤東傳》中說：毛澤東 1976 年 6 月 15 日講：“和平交不成就動蕩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風了。”但實際上，這句話是 1976 年元月 15 日講的，到了 6 月 15 日，毛澤東已經無法說出連貫的整句了。為何將之推後整整五個月？這裏面是有玄機的。玄機就在華國鋒地位的變化。元月 15 日，中央副主席還是王洪文排名在華國鋒的前面，而到了 6 月 15 日，就是華國鋒排名第一了。毛澤東這句話是告訴身邊的人，我死了之後，國內要發生動蕩。傳閱件有個傳閱名單，第一給誰，第二給誰……在元月份，王洪文排在傳閱件的第一位，說明毛澤東對他還是推心置腹的。國內中共寫黨史的人說，毛澤東從 1974 年就不相信王洪文、對他失望了。事實上，不是這麼回事。如果照實說是元月 15 日講的這番話，人家就會發現，王洪文直到這時還是受到毛澤東信任的，就透露出國內黨史界的說法並不真實。所以要改成 6 月份，來突出華國鋒才是毛澤東最信任的，這就圓了過去的謊。

國內黨史資料很多都有這類問題，包括“毛傳”這樣應該最權威的書，為了政治原因，改動一下時間、地點，很常見。就需要有洞察力，需要有一定天賦。做任何事情，需要有興趣，也需要有天賦，這兩者缺一不可。

周恩來在毛澤東面前徹底奴化

新史記：作為數本關於周、林著作的作者，您認為，哪些問題上發前人所未發，最具獨到創見？

司馬清揚：我覺得恐怕要算對周恩來的揭露。對周恩來，有種一廂情願的看法，說他布了一個局，埋下了後來逮捕“四人幫”的伏筆，還有人說毛周之間怎麼怎麼鬥。我的看法恰恰相反：所謂“布局”、“毛周有鬥爭”的說法沒有史料依據，是將周作為一個“聖人”來神化。

實際上，周對毛非常恐懼，唯唯諾諾，一切都遵照毛的意旨、經過毛首肯才去做，周對毛是徹底的奴化。這裏我舉兩例吧。

第一個，關於章士釗。周很清楚章與毛大半輩子的關係，但即使清楚，在沒有得到毛的允許之下，周也什麼都不敢動。1966年8月27日，章士釗家被抄，他是一輩子抽大煙的，抄家時把他抽煙的工具給抄走了，沒有了煙具對年紀這麼大的章士釗來說意味著什麼？！抄家之前他就給毛、周寫了信要求保護，毛沒有批示，周也就沒有行動；煙具被抄之後，他又給毛寫信，毛澤東8月29日做了批示，周恩來看到批示，才採取行動，派了部隊去將章宅保護起來。

另一個例子，是把功勞刻意地安在周的身上。比如，說周保護了哪些人，有周的保護，他們才活了下來云云。其實這也是誤導。周保護什麼人，完全是根據毛澤東的旨意。《周恩來年譜》說，周恩來做了批示，要求對鐵道部長劉建章改善監獄待遇。實際上是怎麼回事呢？一開始劉建章寫了給毛的申訴信，他女兒一直想通過周，遞到毛澤東手上。但周既不處理，也不轉遞。後來這件事被王海容知道了，她說，你們把信交給我，我去交給毛主席。她交到了毛澤東手上，毛做了批示，周才根據毛的批示，也做了批示。《周恩來年譜》對中間這一大段，都不寫，直接就說是周保護了劉建章。這完全是誤導嘛！這樣的例子太多了！

周與毛的關係的大轉變，並不是在延安整風中，而是在1958年“反反冒進”之後。在延安整風之中，周還沒有徹底淪落到毛澤東的工具的地步。到“反反冒進”才如此。用心理學的觀念來解

釋，周已經完全磨滅了原來的角色任務。

新史記：周恩來對毛俯首帖耳，摧眉折腰——如何解釋這種行為？他早年不也是憂國憂民的熱血青年嗎，怎麼就蛻變為對毛唯命是從？以他的睿智、他對毛打了一輩子交道的洞察，究竟他是內心有誤區，真心認為毛澤東確實就是無比英明偉大的領袖，必須將自我完全泯滅地服從，還是出於自保權位的心理呢？似乎都說不過去呀。

司馬清揚：革命隊伍中每個人都是革命戰車的一個部件、螺絲釘。如果不是主動退出的話，最後必然被磨損，也就是說，不外乎兩種結局：一個是主動離開，一個是被動離開。參與革命的人，主動離開的非常非常之少，都是獻出終生——並不意味著有什麼進步性、正義性，主宰的是一種盲目性。確實，其中有人是爲了追求理想，但是歷史輪迴了幾千年，被壓迫的人起來反抗，除了失敗者之外，最後也成了壓迫者，這種現象，百試不爽。熱血青年有熱血這是事實，但歷代熱血青年最後變成了什麼樣的人，他們也是清楚的。毛、林、周也是這樣。他們確實有拋頭顱灑熱血的獻身精神，初衷是要創建一個新社會，但是他們很清楚歷朝歷代這些反抗者最後都變成了統治者，他們自己也會成為這樣的統治者，有統治者也就有被統治者，如果不想成為被壓迫者，就得成為壓迫者一員，就得“獻身”到底——被磨損到底。

我可以舉陳伯達來作為周恩來的參照。陳伯達參加革命來到毛澤東身邊之後，特別是中共九大前他起草了主旨是發展生產力的報告草稿，就受到毛澤東和江青的一再歧視、調笑，張春橋、姚文元他們也都跟著嘲諷他。按照我們的理解，你陳伯達要是個聰明人，就該激流勇退呀，但他沒有！周恩來也是如此：1958年請辭總理，那麼後來為什麼不請辭呢？陳伯達不主動退出，周恩來不請辭，是一個道理，那就是參加革命之後，要主動退出，得下很大的決心，只能是到死方休（周），或者被迫退出（陳）。這是一條單行道、不歸路。在你成功的過程、不斷攀升的過程中，你已經落井下石多少次、傷害了多少人，如果不想發生在自己身上，你就必須時刻當心提防——這就成了慣性。慣性使然，可以解釋很多事情。



周恩來對毛澤東唯命是從。

這種慣性，讓你一方面不離開革命隊伍，一方面又不斷採取某些手段，維護自己的地位。林彪也是這樣啊，他很早以來就不喜歡參加很多會議，但他並沒有放棄對紅四軍、紅一軍團等等的領導權。他不參加會，不等於他不抓權，這是兩回事。

另外一個，是關於名節的考慮。周恩來對喬冠華說：你們不要在我的臉上畫叉叉，就是因為這一點：他不希望看到自己被打倒的結局，所以他要維護自己的形象。但是在一個獨裁者之前，只有兩種可能，一個是成為獨裁者的工具，一個是被獨裁者整得粉身碎骨。

在這些人當中，唯一一個例外、做得比較成功的是朱德。不過，朱德是在長征之後，甚至更早，在井岡山時期，就被架空了。他在井岡山開頭與毛爭論了一段時間，創建中央蘇區的時候，兩人的爭論就基本上沒有了。朱德所謂“第三條道路”，早就拜伏毛澤東了。

新史記：朱德最近重新回到人們的視野，海外出版了好幾本對朱德的研究專著。

司馬清揚：《朱德別傳》《現代老子——朱德》這些書，我都看過，我覺得：寫書的時候，最重要的就是要用哪些材料去證明，材料的選擇很重要。作者對朱德的史料還是把握不全，縱觀那段歷史時期，朱德就沒有多少時間真正擁有兵權：周恩來到蘇區之後，掌管軍事；到了延安之後，毛澤東和彭德懷聯手，實際掌握了軍事指揮權。

是否真的掌握兵權，要看以個人名義發出的電報。要推崇朱德的指揮才能，就必須要有朱德指揮戰役的電報，否則就沒有說服力。中國出的不論是《朱德傳》還是《朱德年譜》，都缺少這方面的材料——看看彭德懷的資料，可以作為對比，彭德懷指揮戰役，有很多電報。朱德就很少。這些寫朱德的書，最缺的也就是他關於軍事方面的電報。

檔案若公開很可能有顛覆性

新史記：研究中共黨史人物時，很多人都痛感檔案被官方壟斷，資料不全。

司馬清揚：是的，像林彪突然成為中國的第二號人物，到底是主動的還是被動的？史學界爭論了很久，形不成統一的意見，因為缺乏關鍵性的材料，只能各說各話推測。“文革”初期，吳法憲的回憶錄中寫到，周恩來、汪東興和林彪在飛機中坐了半個小時，到底談了什麼？周怎麼當面說服林彪同意從後台來到前台，從一個軍事領導人，轉變成為一個政治領導人？是周主動說服，還是林想爭取主動？都沒有材料，我們無法做出判斷。周、林從來沒有說過這件事，現在又都已過世，只剩了汪東興一個人，他要不講，就成了不解之謎。

再比如“913”當晚，毛周是決定如何對北戴河的林彪採取措施的？周去見毛的時候怎麼談的？一片空白。可能就是他們兩個人

密談，當時就沒有記錄，事後也沒有。林彪的飛機起飛之後，毛周又是怎麼互動的？我們缺少這些材料，就無法確鑿地說毛周是如何決斷的：是走一步看一步？是以不變應萬變？還是採取主動？

我可以這麼說：關於林彪問題，我們根據目前的材料所得出的各種結論，很可能到更多機密材料曝光、解密之後，被完全推翻或者推翻一半。中國的檔案管理制度決定了，我們在寫這些書的時候，所依據的很多材料可能並不是真實的，只能根據材料的更新、改變，去不停地修正自己的觀點。現在有很多學者，可能是面子拉不下來？總是不願意去修正自己的觀點。新材料出來之後，他還要堅持舊觀點。比如高華，在有關林彪的新材料源源不斷地湧出來之後，仍然把自說自話的辛子陵的章回體小說體裁的《林彪正傳》當作圭臬。

毛、林、周的複雜互動

新史記：你在書中寫到了林彪與周恩來二人的關係，以及毛、周、林等人的互動。

司馬清揚：我認為林彪與周恩來的關係從來就不是親密的。周對林，要看毛的臉色行事，受毛與林的關係的左右，當毛與林的關係親密時，周與林的關係也就親密。而且，根據中共高層的政治生態，周與林也不可能形成真正親密的關係。

值得注意的是，周對林有敬畏——林有霸氣，周對林很客氣，即使林還沒有成為二把手之前，位居其上的周，對林也還是很尊敬的。看李銳的《廬山會議實錄》，就可以看出這一點。林很有主見，他覺得你講的不對，會當面頂你。在軍事上的天賦，也使他形成了一種霸道的風格。在軍事上，他只能當一把手，不能當二把手。在蘇區的時候，他就對毛澤東提出：應該這麼用兵，不能那麼布陣。建國之後，周恩來去跟林彪打交道時，口氣都是詢問，不是下命令。

建國之後，毛從來沒有到周的家裏去過；但曾到劉少奇家中去看劉少奇；他可以將林彪送到大門外；周每次去林那裡，林一定將

周送到門外。這就說到林對周，有一種學生對老師的態度，不是說有多麼親密，但林彪執弟子禮。

毛、林、周三人在歷史過程中的關係不一樣。林對於毛，是有大恩的，從蘇區時代，在毛受到冷遇、落難之時，他就給毛送吃的，給毛挑選馬匹，等等；而周對毛，不僅沒有大恩，而且曾經整過毛。毛澤東是睚眦必報的，他會記恩，更會記仇。林有資格對毛使性子，在政治局會議上當面頂撞毛至少三次；而周自從“反冒進”之後，從來沒有這麼做過。他沒有這個資格啊！

林彪這個人，你會覺得，有時很迂腐。他見到張治中、李宗仁，都像學生見老師，非常客氣。前面說他有霸道一面，但他也講尊卑之序。對劉少奇也是如此。劉少奇從二號人物被降為七號人物之後，開中央工作會議期間見到林彪，他問我的事情如何處理？希望儘快有個組織結論，林彪的態度很恭敬，說我們確實是應該抓緊。劉少奇做了檢查之後，只有林彪一個人上去握劉少奇的手，說你的檢討很好。林彪是個很複雜的人，讓人看到很多矛盾。林彪對部下，在打仗的時候，非常嚴肅，但是平時對部屬很溫和；蘇靜中將到林家，就像到了自己家一樣，這兒摸摸，那兒看看。林彪坐在沙發上，他就坐在林彪對面，自己拿個壺喝水，很隨便。蘇靜被打成“林彪死黨”，他就對專案組說，我就是“林彪死黨”，你們愛咋辦就咋辦！毛澤東一聽反而說，這人不錯，放了吧。後來就沒有再整他。周恩來卻恰恰相反，很多人說他怎麼怎麼溫和，實際上他對部下態度相當粗暴。

不打仗，林彪的怪病都來了

大家都知道林彪孤言寡語，但是有一次粟裕來訪，八九點鐘就到了，到晚上還沒有聊完，談了整整一天。林彪自己想談的，就哇啦哇啦講個不停；對於不感興趣的事，他就不開口了。說他怕風、怕太陽吧，他帶他兒子視察的時候，在烈日下走了一個小時；他去井岡山，走得很快，在山頂上，風很大，他在那裡站著眺望，站了十幾



司馬清揚：人們所瞭解的陳毅形象很不全面。

分鐘。所以我覺得這裏有心理因素，想做的事，他就什麼風呀水呀太陽呀，都不怕了；不想做的事，風呀水呀太陽呀就全來了，就病快快的。

新史記：有人會解釋為“政治病”。

司馬清揚：林彪確實身體上有問題，也有些精神不正常之處，我在書裏沒有寫得很詳細。比如說他的“潔癖”，就很奇怪：他在很長時間中不洗澡不洗臉，但他接見人握過手之後第一件事，就是找衛生間“洗手”。他做事也很有條理，在“文革”中救邱會作、李作鵬，都顯得很精明。

我看，林彪是有一種精神憂鬱症。病是從1950年就開始的，從蘇聯回來之後很短時間，他就不能工作了。這是怎麼回事呢？我分析是這樣的：參加萬米長跑，如果實際上早跑過了一萬米，但你告訴他還沒到、還沒到，他會一直跑下去；如果你在八千米就告訴他“你跑到了萬米了”，他立馬就倒下去了。一個人本來每天都要鍛煉，突然不鍛煉了，他反而很快就垮了。戰爭如果打下去，林彪會堅持下來；但戰爭一旦結束了，林彪的精神支柱，他腦子的著力點，

就都失去了，人很容易就垮了。

林彪對周恩來是看得很透的。我覺得，林彪在“913”之所以要深夜起飛離開，其實並不在乎去哪裏，他只是得知周恩來要來了，他要避開周恩來。周恩來到哪裏都帶著大量官員，他若帶著大量人馬到北戴河，就可以將林彪控制起來。而林彪只要避開周恩來，到其它城市都可以很自在，都不會感到受威脅，因為毛澤東不可能公開跟林彪決裂麼。

陳毅反過毛卻與毛關係不錯

新史記：你這本書寫完了，再寫什麼呢？還打算繼續研究周、林問題嗎？或者將視野擴展到黨史、文革史其它人物和課題？

司馬清揚：寫周恩來與外交部。我已經出版的兩本與周恩來有關的書中，寫到外交部很少，只在第三本書中，有一個小的章節，寫到周恩來與外交部的“文革”。寫周恩來與外交部，也涉及陳毅與周恩來的淵源，從早期黃花塘事件，要一直寫到“文革”結束、喬冠華。材料搜集很困難啊，外交部本來就是一個國家機密特別多的單位。所以這一本我寫得很慢。

黨史人物中被編造得最厲害的、離真實最遠的，一個是周恩來，一個是陳毅。陳毅完全不是人們所以為的那樣，他的形象很不全面。人們並不瞭解，陳毅的心胸很狹窄，在中共建政之後幾次重大鬥爭中，他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像高饒事件，像1958年軍委擴大會議反教條主義鬥爭，還有“文革”期間……由於官方材料不公開，以致於人們對他的理解是有偏差的。你知道陳毅有一首詩吧，“大雪壓青松”？

新史記：“大雪壓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潔，待到雪化時。”

司馬清揚：對，就是這首《冬夜雜詠》第一首，1962年的《詩刊》第一期發表的。但到底是反映什麼？

新史記：一般認為，是用青松來象徵在六十年代三年困難時期、

“帝修反大合唱”當中，中國共產黨人堅定不移的大無畏精神。

司馬清揚：對，這是官方的解釋。實際上他表達的是對毛澤東的忠誠，他認為毛澤東發動大躍進的決策是對的，造成大饑荒、餓死那麼多人，他堅持這麼認為，說要知道毛澤東的正確，須“待到雪化時”。我這種說法是有根據的：陳毅私下與別人聊過這首詩。他講，毛主席就是一棵大青松。歷史上陳毅是反對過毛澤東的，但陳毅與毛的關係一直相處得還不錯。我相信，他們之間一定有些我們目前還不知道的事，維繫著他們之間的關係。“反右”期間，陳毅是大大地支持毛澤東的，並不是像人們所以為的，陳毅多麼多麼愛護知識分子——很多人找陳毅，要求陳毅幫他們說句話，陳毅都沒有做。

我這本書，周恩來、陳毅和外交部，三個方面都會涉及。

新史記：謝謝您，祝您新書成功！

司馬清揚：再見！（《新史記》記者 高伐林）□

羅榮桓對邱會作說：軍隊的老資格，數總後最多，他們做不了什麼事，卻是提意見的“專家”。你也是個老資格，還是個年輕的老資格，又是很有用的老資格。現在要你整天去和那些老資格們打交道，從你的性格來說，是一個難題

一直提倡“五湖四海”的毛澤東搞了個“清一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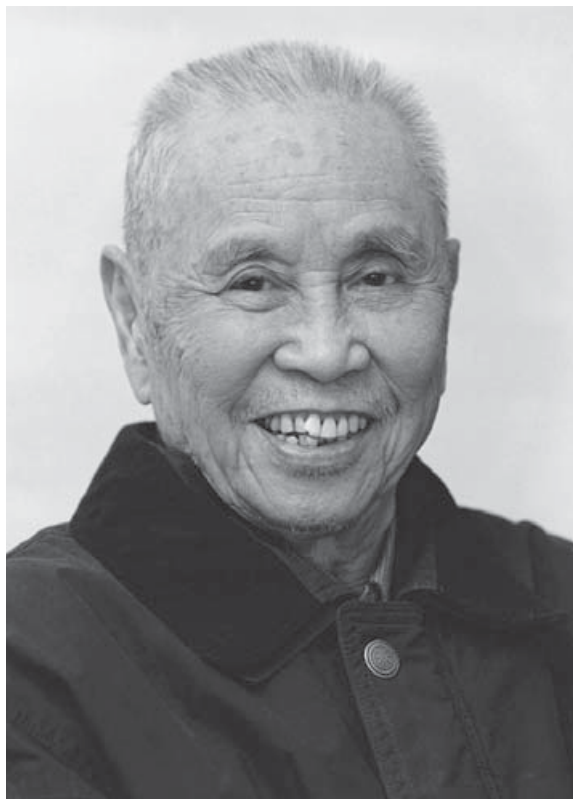
編者按：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總後勤部長邱會作的兒子程光所著《歷史的回顧：邱會作與兒子談革命經歷和若干歷史問題》（香港北星出版社出版），用父子對話的方式敘述了許多他親歷的重要歷史事件和接觸的歷史人物。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

經作者程光授權，《新史記》選載該書第十七章“新軍委成立”。小標題為本刊編輯所加。

邱會作（1914—2002），江西興國人。1928年參加革命，1929年參加紅軍。參加了中央蘇區一至五次反“圍剿”和二萬五千里長征。中共建國後，他於1955年被授予中將軍銜，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解放軍副總參謀長、總後勤部部長等職務。1971年“913”事件之後，邱會作被打成“林彪反黨集團”成員被拘押，被開除黨籍、撤銷職務，1980年“兩案”審判，他被判處有期徒刑16年，後保外就醫。2002年逝世。

對話者“子”係程光，“父”為邱會作。

軍委班子林周提名毛澤東認可



2002年春節，邱會作人生最後一張照片。（作者提供）

子：1959年7至8月，中共中央在江西廬山召開了八屆八中全會，批判彭德懷的“右傾機會主義”，做了《關於以彭德懷同志為首的反黨集團的錯誤的決議》。隨後又在北京召開軍委擴大會議，揭發批判彭的“反黨罪行”和“資產階級軍事路線”。

父：八屆八中全會期間我正在高等軍事學院學習，我參加了軍委擴大會議。會後，我被任命為解放軍總後勤部長、軍委辦公會議成員。

八屆八中全會後中央決定對軍隊的統帥部進行改組，總參謀長黃克誠、總後勤部長洪學智等人因為和彭德懷的歷史與現實關係，不能再任職了。

後來，周恩來在中央決定了我任職時和我談過一次，他說，八

屆八中全會結束前，毛主席在廬山上對他說：“你對軍隊幹部比較熟悉，找些什麼人到軍委來辦事，你物色一下。林彪同志身體不大好，讓他先休息幾天。”

子：林彪原來請病假沒有參加廬山會議。

父：毛主席在會上做出了搬開彭德懷的決定以後，林彪才被匆忙叫上山。林彪對於中央決定由他主持軍委工作，事先沒有一點思想準備。毛主席叫周恩來參與挑選新一屆軍委工作人員，既有毛主席的信任，也是從現實情況出發。

對總參謀長的人選，周恩來曾提到許光達和劉亞樓。毛主席說，許光達可以考慮。劉亞樓能力可以，但作風霸道，還可以考慮其他的人。

周恩來找了長期擔任解放軍總幹部部長的羅榮桓，羅提出了一條建議，儘量維持軍隊人事安排上原來的歷史背景，即總參謀長最好由紅軍三軍團或紅二方面軍的幹部擔任，總後勤部長則要從紅四方面軍的幹部中選，這樣有利於黨和軍隊的團結。羅榮桓提的總參謀長候選人是裝甲兵司令員許光達或北京軍區司令員楊勇；總後勤部長候選人是副總參謀長王新亭、海軍副政委王宏坤。

周恩來把情況向林彪通了氣。林彪認為決定國家和軍隊這樣重要的幹部，提出的人讓毛主席滿意，得到他的同意才能定下來，並建議和周一起到毛主席那裡去談。林彪和周恩來交換了意見，向毛主席提議，羅瑞卿擔任總參謀長，我擔任總後勤部長。劉少奇、鄧小平都在場，也贊成這個提議。毛主席說：“你們很會選人，羅瑞卿當總參謀長，這個提議好！恐怕只有林彪同志才能想得出來。”毛主席又對林彪說：“你就不怕羅瑞卿有刺？”

周恩來說：“羅瑞卿是林總的老部下，老上下級關係了，這次林總又親自提議對他委以重任，他對別人可能霸道，對林總不會。”

子：看來周恩來對林彪和羅瑞卿的關係很瞭解。

父：毛主席接著說：“邱會作的情況，在座的恐怕要數總理最瞭解。此人長征中我就認識，年輕的時候是一個很好的幹部。”周恩來說：“我和邱會作在江西瑞金就認識，他在紅軍總供給部，到

延安以後，作了軍委供給部長，一直在我們身邊工作，所以主席也瞭解他。他後來到前方打仗，也不錯。他最大的優點是愛動腦子，幹勁也大。”毛主席又說：“現在對軍隊的事，總理過問得多，挨彭德懷的罵不少。我是‘轉業’了，一點也不‘參’了。你們選羅瑞卿、邱會作到軍委來辦事是合適的。”

葉劍英要我“吹一吹”毛誇我

子：中央決定你任總後部長時，你還在高等軍事學院學習。

父：周恩來把我叫到他那裡“吹風”。他先把政治局常委會的情況介紹了，然後說：以前我要你到國家經委當副主任，你卻要學習。我同意你先學習，然後再到國務院來。現在這個“君子協定”不行了。你當總後部長，這是我和林總不約而同提出來的，毛主席對你很讚揚。軍隊後勤工作和國務院有密切的聯繫，過去彭德懷就知道向我要錢，向我發脾氣。現在你把軍隊裏的事情辦好，讓我省事放心了，就是對我很大的幫助。

1959年8月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一些軍隊的元帥列席，討論中央軍委改組。會議決定：軍委常委由毛澤東、林彪、賀龍、聶榮臻、朱德、劉伯承、陳毅、鄧小平、羅榮桓、徐向前、葉劍英、羅瑞卿、譚政十三人組成。毛澤東任中央軍委主席，林彪、賀龍、聶榮臻任副主席，林彪主持軍委日常工作。會議還決定瞭解放軍統帥部新領導的任命，也就是對軍委總部進行改組，這個決定於1959年9月26日向下面發布。

子：根據中共中央的建議，全國人大常委會已於1959年9月17日通過了國務院副總理林彪兼任國防部長、羅瑞卿任總參謀長的任命。不久，中央又公布了對你的任命。

父：那次政治局擴大會剛結束，葉劍英立即叫我到他的家裏去。我一進門他就說：首先恭喜你當總後勤部長了，但更要恭喜的是，你得到了毛主席很高的評價。我曉得他很早就認識你，但他對你這麼瞭解，卻不知道。毛主席說，你在年輕的時候就能幹。長征



本文作者程光與父母親合影，2002年攝於邱會作夫婦住處——陝西省委第一幹休所大門前。這是作者最後一次和父親合影。（作者提供）

中，中央縱隊過雪山草地沒有餓死人，你出了力氣。到了延安，你搞供給，搞生產，他印象也很深，說你沒讀過什麼書，但從實際工作中學會了總結經驗，複雜的事辦得有條有理。

葉劍英建議要把毛主席對我的評價對外“吹一吹”，說這是個“資本”嘛！比什麼“老資格”的本錢都大。

子：這次軍委統帥部改組，除了林彪，羅瑞卿也是關鍵人物。

父：我和羅瑞卿早在中央蘇區就認識，到了延安就熟悉了。

1938年羅瑞卿結婚時，分別邀請了一些朋友吃飯，專門請了李富春、葉季壯和我一次。1944年初，我從華中根據地回到延安，要我去中央黨校任副秘書長，我為了學習，曾請羅瑞卿為我到上面去“說情”，不當副秘書長，他熱心地為我辦了。1945年抗戰勝利後，我去東北工作，路過張家口時我的牲口的腿受傷了。我愁得沒有辦法，只好找了羅瑞卿。他親自陪我到馬廄裏去，幫我選了一匹好牲口送給我。1949年第四野戰軍從東北進關攻打天津之前，在北平以東召開高級幹部會議，羅瑞卿以華北軍區政治部主任的身分也參加了。他不但親自看了我，還請我們幾個和他好的朋友去吃飯。1952年“三反運動”，羅瑞卿到廣東省檢查工作，他遇到棘手的事，單獨到我的宿舍同我商量，可見他對我的信任。

子：林彪提議羅瑞卿任總參謀長，一定有他自己的理由。

父：羅瑞卿一直是林的老部下，曾擔任林彪組建和領導的紅一軍團的師長、保衛局長等重要職務。到了延安之後，中央決定成立中國工農紅軍大學（後改稱抗日軍政大學），林彪任校長，他挑選羅瑞卿為教育長，主持教務工作。紅一軍團出了不少名將，林彪一直把羅瑞卿當成是紅一軍團的代表人物看待。而羅瑞卿辦事、說話，在高級幹部的心目中通常也被認為是林彪的代言人。林彪和羅瑞卿的關係要比彭德懷和黃克誠的關係深得多。林彪提名羅瑞卿當總參謀長，外人看起來有些突然，但知道他們之間關係的人，都認為這是必然的結果。

陳毅說他“很崇敬林彪同志”

子：1959年8月中旬，中央軍委召開了有軍長、師長和政委一級幹部參加的軍委擴大會議，傳達貫徹八屆八中全會精神。這是歷史上有名的“批彭”會議。

父：劉少奇代表黨中央在會上講了話，說彭德懷思想上是“右傾機會主義”，政治上有“個人野心”，“想奪權”，對彭德懷的問題說得非常嚴重，而且表達了個人的憤怒，為“批彭”定了調子。與會

者對彭德懷等人發起了激烈的揭發、批判、鬥爭，火藥味非常濃。

會議上，元帥們紛紛帶頭發言，支持毛主席對彭德懷的批判，擁護由林彪主持軍委工作。其中，我對陳毅的發言印象很深，因為他除了表態以外，還對林彪進行了宣傳。陳毅列舉了一些事例，說林彪如何能打仗，說他很崇敬林彪同志，由林彪來主持軍委工作，完全可以信任。

子：我聽軍史專家說，陳毅這次講話有留檔，讚譽得比你說的更高。

父：軍委擴大會議開到9月中旬時，毛主席到會講了話，對彭德懷進行批判，說他從來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只是我們的同路人，彭德懷是資產階級分子、投機分子，混在我們黨內。

批彭我不奇怪，批朱我吃一驚

子：可是毛澤東還讓彭德懷留著政治局委員的頭銜，還被稱作“同志”。

父：9月中旬中央軍委在中南海懷仁堂開了一次大會，林彪作了總結講話，是從軍隊革命化建設講起的。“革命化”這個口號對我來說並不陌生，但由中央主要領導人把它作為軍隊建設的方向提出來，就引起了我的注意。林彪講話不久就轉向批判彭德懷、朱德了。林彪對彭德懷的批判，是黨的八屆八中全會以後高級幹部人人必講的“官話”，而他對朱德的批評，連我聽起來都感到新奇。

林彪對彭德懷說的不很多，說彭德懷有意見不向毛主席當面說，背後裏搞活動，反對毛主席……還說，毛主席是我們偉大的領袖，領導人民取得了打敗蔣介石、奪取全國政權的勝利。沒有毛主席的領導，我們現在還不知道在哪裏受罪。為了黨、國家和人民的利益，我們要絕對服從毛主席的領導。反對毛主席的，都應當批判。

和批判彭德懷的態度相比，林彪對朱德的批評很嚴厲，當時朱德就坐在主席台上。林彪對朱德批評的大意是：朱德同志有領

袖欲望，人大常委會委員長不願意當，想當國家主席。朱德同志總認為自己的功勞很大，其實在戰爭年代，朱德同志名義上是總司令，但他是一個假總司令，我軍的總司令向來都是毛主席……

林彪對朱德的批評，我有理解的一面，但又有吃驚的一面。我軍的“總司令”向來都是毛主席，是毛主席說了算，朱德不是一個“真總司令”。對此，我軍高級幹部都清楚，因而對到會的人震動並不大。但林彪指出朱德有領袖欲，不服從毛主席，震動就很大了，像我這樣的高級幹部都有點吃驚。

子：中共中央很快就發了文件，批判了朱德，這個文件發到了縣團級。我費了些周折，知道了朱德在軍委擴大會議上的檢討，說他歷史上犯過路線錯誤和幾次支持過路線錯誤。在這次廬山會議，他對彭德懷“反黨的野心家的本質認識不夠，光從好的方面去想，同時和他們在思想上又有共同點”……

父：我沒有參加廬山會議，對於彭德懷怎樣和毛主席發生了劇烈的衝突，朱德又是在哪兒得罪了毛主席，知道得很少。我後來還是從劉亞樓的口裏知道了一些。

那次軍委會議後不久，劉亞樓帶著“老大哥”的口吻對我和肖向榮說：朱德是總司令嗎？朱德是彭德懷的總司令！在廬山，朱德支持彭德懷，在這上面朱德才是真正的總司令。為了集中力量解決彭德懷的問題，毛主席把朱德從彭德懷那裡分出來。這次林總對朱德的批評，不是林總個人的意見，是毛主席叫他在大會上說一說的，林總是為毛主席和黨中央在代言。毛主席這樣，就給我們大家吃了一把“阿斯匹林”藥片，感冒的鼻子通氣了，可以聞到更多的氣味了。

那次會上聽了林彪的講話，會後又聽了劉亞樓一席解釋，我對林彪提出“革命化”理解了。現在提出了軍隊要“革命化”的口號，就是要求解放軍忠於黨、忠於黨的領袖毛澤東。

子：朱德在我黨我軍歷史上有巨大貢獻，這樣對他，太不近人情。

父：是呀！是朱德保存了南昌起義部隊的殘部並帶上了井岡山，從而保留了共產黨在大革命時期培養的軍事精華。毛主席提出中

國革命要走農村包圍城市進行武裝鬥爭的道路，朱德是這條路線最早的發起者和領導者之一，是毛澤東的第一位合作者。1929年初紅軍從井岡山下東征，在我的家鄉鬧革命，建立了紅色蘇維埃政權，我雖然是個剛參加蘇維埃革命的少年，但也知道“朱毛”是紅軍的帶頭人。1945年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會場主席台的正中掛的是“朱毛”並排合一的頭像。從那以後，他們的像作為中國共產黨領袖並排懸掛。儘管毛主席在黨的第七次大會後實際上搞的是“毛劉（少奇）”合作，而不是“毛朱”合作，但過去的歷史不能改變。正因為這樣，就更加促使我仔細想了，現在許多事是根據現實政治的需要提出的，而歷史並不完全是那樣。對“朱德問題”，毛主席叫黨內的要人在重大問題上代表他向外面傳話、吹風，用他個人的影響力來左右黨內的思想，這樣的事以後越來越多了。

子：新一屆的軍委工作機構裏，總參謀長、總政治部主任、總後勤部長“清一色”是紅一方面軍幹部，基本上是林彪紅一軍團幹部在執政。

父：過去一直提倡“五湖四海”的毛主席，這次搞了個“清一色”，絕不是什麼偶然，是他從彭德懷與他對抗的事情中得到教訓後的重大決策。林彪提出以忠於黨、忠於毛主席為實質的解放軍的“革命化”建設，正是這種組織保證的內涵。

羅榮桓說我是“耍大刀的”

子：你是什麼時候知道你的新任命的？

父：1959年9月中央政治局下發了關於新軍委組織變動的通知以後，羅榮桓代表中央找我正式談話。這是按規定履行的組織手續，也是老上級和我談心。

我們剛見面，羅榮桓就說：“先要向你做檢討！我們在四野共事幾年，現在又是管軍隊幹部的，可是我竟然不如毛主席、周總理對你瞭解。”羅帥先問：“毛主席說，總理曾把你的腦袋保了下來，給我們今天留下了一個總後勤部長。是怎麼回事？”我簡要地說了，1934年我參加紅軍退出中央蘇區的準備工作，國家保衛局局長鄧

發怕我‘開小差’泄密，要對我殺人滅口。周恩來聞訊後下令停止行刑，把我的命保了下來。

羅榮桓說，王明路線危害巨大！你的命能保下來，是周總理正確執行黨的政策的结果。他很感慨：“周副主席一個決心，讓你多活了二十多年，你真命大！”

談話進入正題後，羅榮桓先向我宣布了中央的決定，傳達了毛主席、周總理對我的鼓勵，也談了林總和他本人對我的看法。

羅榮桓說：“我比林總更早一些時候就認識你了，1947年八縱隊歸東北軍區指揮後，我對你的瞭解就多了。我和林總交換過意見，在幾個主要問題上，對你的看法是一致的。”羅榮桓對我的工作歷史情況，從他認識我的1947年新式整軍運動說起，說了遼瀋戰役、平津戰役、衡寶戰役，一直說到廣西剿匪、中南軍區的工作……雖然是談心式的漫談，但他還是給予我較高的評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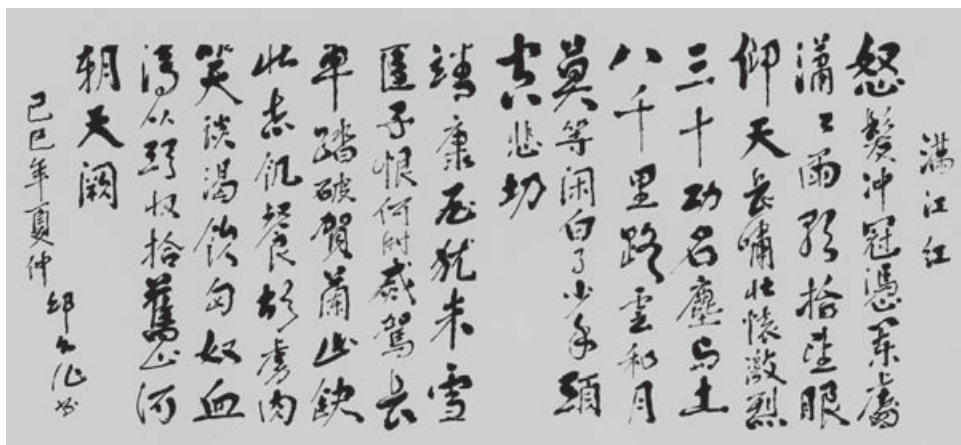
子：他對你的情況這麼清楚？

父：新中國成立後，羅榮桓就是軍委總幹部部長，大家都知道他對軍隊高級幹部熟悉，但對我的個人歷史這麼瞭解，知道的那麼多那麼細，還是讓我驚奇。

那一天，他還談了幾件過去我所不知道的事。

羅榮桓談到錦州戰役時說：開始我們對八縱缺乏信心，打算把你們和七縱對調部署。野司決定我到你們那兒看一下再說。我看到了你們部隊的求戰情緒，如果換下來了，幾年也翻不了身，再加上各師領導對你的信任，我回來同林總商量，決定不對調了。八縱在錦州打得很好，特別是後半截打得更好。為了讓你們在遼西會戰中打得好，不背思想包袱，就沒讓你們知道曾要把你們撤換下來的事。

羅榮桓談到平津戰役後的《南下工作指示》時說：1949年初四野在北平開會，你提出要搞“三個教育”，即對部隊進行“革命到底的教育、正確對待南方地下黨和游擊隊的教育、艱苦奮鬥的教育”，有較高的思想性、政策性，你的發言被寫成四野《南下工作指示》的主要內容。毛主席看到《指示》後問我（羅）：“你們這個《指示》不像是書生們寫的，像是有實際工作經驗的人寫的。”主席知道



邱會作書法作品——岳飛的《滿江紅》。(作者提供)

情況後說：“果然如此，早知此人”。後來，中央把四野《南下工作指示》轉發全黨全軍，作為勝利完成解放戰爭的重要指導文件。在毛主席那裡能得到讚揚的有思想性的東西很不容易。

子：這都是表揚，沒有批評？

父：羅榮桓說，毛主席和中央領導對你說的都是好話，但你並不是沒有缺點。以我的看法，你優點和缺點是“長”在一起了。你對問題看得透徹尖銳，是個優點，但過於尖銳了就可能片面，就是缺點了。我對別人說過，你的思想方法是使“刀”的。四野有幾位老資格的縱隊政委，你們大致可以分為兩類：“耍大刀的”和“耍小刀的”。你是“耍大刀的”，大刀揮起來，一下子就開闢了一個大局面，又能獨當一面，難能可貴，但你的刀一揮起來，不小心可能會傷人。吳法憲、梁必業他們是“耍小刀的”，在上面既定的工作範疇內，他們能把事情雕刻得很精美，不足的是難單獨撐起一個大局面。現在你到總後去，工作上的事我很放心，但擔心你會得罪那些老資格。軍隊的老資格，數總後最多，他們做不了什麼事，卻是提意見的“專家”。老資格是我軍的歷史現象，當然你也是個老資格，還是個年輕的老資格，又是很有用的老資格。現在要你整天去和那些老資格們打交道，從你的性格來說，是一個難題，但我相信你能夠

正確處理好的，我現在只是向你提個醒。

軍委辦公會議不是會議是機構

子：新的中央軍委日常工作，採用“辦公會議”的形式，別出一格。

父：由林彪提議，經軍委常委同意，決定在中央軍委之下設立“辦公會議”。它名為“會議”，實為一個組織機構，是在軍委常委會領導下的權力執行者，也是軍委的日常辦公機構。軍委辦公會議對中央軍委常委會負責，但名義不對外。凡是軍委辦公會議審議決定的事項，按問題的性質、大小、內容的不同，分別用中央軍委名義或國防部、各總部（聯合或單獨署名）的名義發布。軍委辦公會議成員列席中央軍委常委會會議。

中共中央批准了軍委辦公會議組成人員：羅瑞卿、譚政、肖華、楊成武、我、肖向榮，1960年5月增加了張愛萍，1961年1月免去了譚政。

子：這是組成人員，它的職責範圍呢？

父：用一句話概括，就是軍隊日常工作的“總管”，稍微具體一些，有以下幾方面：

第一、及時貫徹中央軍委的決策和指示精神，並具體化地組織實施。

第二，學習、傳達、貫徹黨中央、國務院的有關方針、政策、指示。

這項工作得到了全軍領導幹部的熱烈擁護。不少人說，過去對中央裏的事，只知道“外面”的（看報紙），現在可以知道“裏面”的（聽傳達文件），我們軍隊現在和黨中央的距離比過去近了。我認為，過去彭德懷和黃克誠不太注意這一點，而羅瑞卿則很重視。羅擔任公安部長，直接在毛主席和黨中央國務院領導下工作而形成的習慣，現在把它帶到軍委辦公會上來了。

第三，討論、審議、處理全軍各部門上報給中央軍委的文件和請示。

各總部要用中央軍委名義向上請示或報告的文件，都要先經軍委辦公會議討論審議，其中重要的問題要提交軍委常委審議，一般的事務則由辦公會議處理。

第四，審議各總部和各軍兵種的請示報告。

各總部除了具體業務問題以外，凡涉及到全軍的方針、政策方面的文件，都要經軍委辦公會議討論、審議批准後才能下發。

第五，審議軍隊高級幹部任免事項等。

子：軍委雖然有個辦公會議的形式，但開展好工作必須要“主帥”和“主將”合作得好才行。

父：林彪和羅瑞卿互相信任和密切的關係是軍委辦公會能有效地工作的保障。

林彪在辦公會議成立的軍委常委會上旗幟鮮明地支持羅瑞卿，說明了辦公會和羅瑞卿在軍委的地位和作用。他說：在中央軍委的領導下，成立一個辦公會議，是個很好的辦法。這不是平常說的“辦公”的意思，是一個集體領導的組織機構，羅總長是辦公會議的主持人。由他任中央軍委秘書長、總參謀長，毛主席、黨中央放心，全軍高興。我和在座的不少人同羅總長都是老同事，他很有領導水平和組織能力，也有建設軍隊的經驗。我身體不好，具體管事有困難，我就委託給羅總長了。在羅總長主持和領導下，辦公會議的同志應當大膽工作。

子：這是林彪放權給羅瑞卿了。

父：雖然羅瑞卿只是軍委秘書長、總參謀長，但是從軍委辦公會一開始，羅瑞卿就行使著軍委副主席林彪的部分權力，他對軍隊的實際領導作用比其他一般的元帥要大。

林彪對羅瑞卿支持和信任，羅對林也非常尊重和聽話。至於羅瑞卿對林彪的宣傳，是很多的，可以這樣說，別人說過的讚揚林彪的話，他都說過；別人沒有說的，他也說了。羅瑞卿常講：“林總歷來同毛主席親密合作，在我黨我軍是享有崇高威望的領袖之一。”“林總的名字，敵人聽了害怕，我們聽了親切。我們能在林總直接領導下工作，是最大的幸福！”我覺得羅瑞卿說的話發自肺腑、

是真摯的。

軍委辦公會議僅僅是中央軍委的辦事機構，但開展工作沒有多久，就受到了各總部、軍區、軍兵種各級領導的支持和擁護，在全軍上下享有很高的威信。

子：它剛成立就這麼快受到全軍上下支持和擁護，很不容易。

父：我看原因有這麼幾點：

第一、軍委辦公會議有職、有責、有權。它既掌握著全軍的大政方針，又有權力及時處理各種問題。軍隊日常工作有了辦事的地方，有了請示報告的“衙門”，有了負責解決問題的“管家”，大事小事都能很快處理和落實。

第二、它作風民主，辦事注意調查研究。它對下面的請示報告，凡是沒有搞清楚，從不草率做出決定，很注意耐心聽取下面的意見。辦公會議有自我批評精神，每年都要召集一兩次軍委辦公會擴大會議，請各部門各地的領導同志來，大膽發揚民主，廣泛聽取意見，不斷改進工作。

第三、它講究工作效率。它一般每星期開一兩次會，有大事急事則立即開會。辦公時間有長有短，長的時候甚至連續二十四小時開會。如1962年中印邊境自衛反擊戰期間，軍委辦公會議夜以繼



羅榮桓元帥說：邱會作是“耍大刀的”。

日地集體辦公，對下面的請示報告能夠及時、明確、具體地給予答覆，指揮這次帶有複雜國際政治背景、地理條件非常不利於我軍的局部戰爭取得了完全的勝利。軍委辦公會議辦事議事，踢皮球的現象幾乎沒有。

總後的老資格盯著部長交椅

子：軍委三總部這次都有變動，總後勤部和總參謀部一樣，是換了核心領導。

父：中央關於我的任命，我感到很突然，匆忙中斷了在高等軍事學院的學習去就職。我出任總後部長，在中央非常順利，但辦具體手續時，卻在主管部門總政和總後遇到了些阻力。

廬山會議批判彭德懷後，總後領導層就估計洪學智不能再幹了，紛紛猜測誰來當部長，或希望誰當部長，一時間消息很多，活動頻繁。

很快，中央對洪學智等人的處理進行了傳達，因為事情突然，總後政委李聚奎和參謀長胥光義宣布他們兩人先把業務工作抓起來。大家議論說，這等於李聚奎宣布自己是政委兼部長了。

子：李聚奎長征時就是師級幹部，是軍隊的老資格。

父：解放戰爭時期他曾任東北軍區西線後勤司令，四野南下後當過東北軍區後勤部長，又是現職的總後政委，不少人認為總後部長非他莫屬。

總後副部長張令彬也是老資格，總後一些老夥計說他“陪了”三個部長了（楊立三、黃克誠、洪學智），不會陪第四個了。正在這時，羅榮桓找張令彬談話了。羅和張一起參加秋收起義上的井岡山，羅是連隊的黨代表，張是司務長。羅榮桓長期以來一直關心張令彬，所以在中央決定我的任命後，羅榮桓找他談了話。後來我聽張令彬說，羅帥簡單介紹了幾句廬山會議的情況後就說，“邱會作當部長，是周總理、林總提名的，毛主席十分贊同，中央很快就會公布任命。你和李聚奎協助邱會作工作”。在延安我當中央軍委供

給部長時，張是兵站部副部長兼政委，我們的關係一直很好。

我要當總後部長，和某些人期盼的不一樣，於是就到總政主任譚政那裡反映“群眾意見”，說我在八大二次會議上搞“老資格論”，影響很壞。譚政解釋說，那次會上是普遍性地批評擺老資格的人，不是批評某一個人。為此譚政找李聚奎說，你是老同志，要帶好頭，不要亂想，你是總後政委，支持邱會作是你的責任。

黨委第一書記人選有一番波折

但事情並沒有完結，因為還有總後黨委第一書記人選的問題。上屆總後黨委書記由黃克誠兼任，後來由洪學智接替，任總後黨委第一書記。不知何故，在我到職前的一次總後黨委常委會上匆忙地“推選”了黨委第一書記。那時我的黨組織關係還在高等軍事學院，只能列席。會議由李聚奎主持，胥光義先發言提議選李聚奎為第一書記，說他在總後“資格最老、軍銜最高、經驗豐富，又是政委，當第一書記理所當然”。一時沒有人表態，好像是默認了。這時財務部長湯平發了言，有點激動地說：“中央調邱會作同志來當部長是主事的，我選邱會作同志為第一書記，李聚奎同志為第二書記。”

子：湯平在關鍵的時候對你支持，難能可貴。

父：張令彬已從羅榮桓那裡知道了中央的“底”，又不願意當眾駁李聚奎的面子，說“總後黨委第一書記不是我們可以決定的，應當由黨中央、中央軍委指定。”總後副部長饒正錫、張賢約馬上附和張令彬的建議。

那次會上，雖然沒有正式投票選舉，但在一些人心中是有“票數”的：我得了二票，或是“一票半”（湯平、張令彬）。搞提前開會的人有點“心虛”，於是向中央軍委報告：“新的總後黨委常委會由李聚奎、邱會作等人組成，黨委第一書記請中央軍委指定。”

子：他們有意地將李的名字排在了你的前面，表示了既定政治順序。

父：總政組織部接到總後黨委的報告後，向譚政主任呈報件上

寫了意見：“從總後的報告提名並從資歷來考慮，李聚奎為第一書記，邱會作為第二書記。”譚政點了頭。羅榮桓一見這個文件，發了脾氣，把譚政和總政主管組織工作的副主任叫去很嚴厲地說：“總政對上頭的精神沒吃透，你們提的總後黨委第一書記的意見，與中央和軍委的意圖相違背！”羅榮桓是有修養的人，我聽說他發脾氣的事不多。

不久，中央軍委常委召開會議，議題之一是總後黨委的組成，我作為軍委辦公會議成員列席軍委常委會了。譚政說：“總政從領導工作的需要和能力考慮，提議邱會作為總後黨委第一書記，李聚奎為第二書記。”

羅瑞卿是思想敏銳的人，看出了事情的蹊蹺，說了一番話：總後黨委第一書記當然應當由邱會作同志擔任，這是中央的意見，無須再討論。但從總後向上的報告中，可以看出領導幹部的思想狀態。據我所知，總後在黨委第一書記的問題上，思想相當混亂，舉止也不光明正大，有“想當官”的壞風氣。在所謂的“提前推選”黨委第一書記的會議上，出現了三種意見：一種是正確的；一種是論資排輩，這是總後領導幹部中的主要傾向；還有一種人，事不關已，放棄權力。

子：羅瑞卿和你共事剛開始，就在關鍵的時候給了你支持。

父：賀龍說話乾脆：總後有人愛擺老資格，要擺，還擺得過我？要依靠他們去搞後勤工作，我們就沒飯吃囉！

葉劍英最能體會我的處境，說：總後的老資格是一個很大的負擔，軍委應當幫邱部長一把勁，管一下那些老資格，要想辦法把他們分散一些。軍事科學院也是老資格集中的地方（葉兼任院長），前不久，我和院裏幾位不管實際工作的老同志們談了一次，向他們提出幾點：要量力而行讀點書；搞好身體；支持在位的同志做好工作，不要去妨礙他們……總政要有人做老同志的工作，特別是做總後的老資格們的工作。

子：葉劍英當時在軍委中權力小，幫不上你大忙。

父：他理解我的苦衷，卻無法給予我具體的幫助。六年之後，

葉劍英取代羅瑞卿出任軍委秘書長，把李聚奎從總後調出去了，這是後話。

一年前受了彭德懷批判、很少說話的劉伯承也發了言，他贊同葉劍英的主張說：我們黨的老資格集中在軍隊，對他們我想到三種辦法：一、安排榮譽職務，讓一些老資格只須出名，無須出力；二、我們配備幹部的思路要改變，過去是以老帶新，以老為主，現在要改為以新為主，容納一些老同志一起工作；三、要勸一些能力弱、身體不好的老同志退下來，安心休息。總後那樣那麼多老資格集中在一起，軍委要注意解決。上次政治局會上，毛主席、周總理對會作同志的評價很高，請羅總長向在座的同志傳達一下，對大家也是一個教育。

林彪最後講：“從現在的情況看，統帥部的幾大總部，總後是比較弱的。總後的工作是繁重的，中央軍委和總參、總政都要支持邱會作同志把總後的工作搞好！”賀龍插話對我說，“搞不好就打屁股！”

對彭德懷問題林彪定了三條線



1999年，老戰友邱會作和李作鵬。

子：1959年毛主席領導的反對彭德懷的鬥爭重點在軍隊，會涉及很多高級幹部。

父：軍隊中有一批有影響的重要幹部旗幟鮮明地擁護黨中央的決策，堅決和彭德懷鬥爭，如林彪、劉伯承、聶榮臻、葉劍英、羅瑞卿、肖華、劉亞樓、黃永勝、賴傳珠、楊成武等。

也有一些受彭德懷、黃克誠影響深或是和他們歷史關係密切的高級幹部態度曖昧，有的甚至怕牽連到自己，比較沈悶。

子：在全國大張旗鼓地反右傾、反彭德懷的政治風頭上，怎樣對待他們，是非常重要的政策問題。

父：林彪對此持慎重的態度，這在廬山上就有了體現。林彪是後上廬山的，在會議後期對彭德懷進行了嚴厲的批判，但林彪在重大問題上是敢於說明事實和承擔責任的。比如，毛主席要清算彭德懷的歷史舊帳，提出長征途中彭曾在會理會議上叫他放棄軍事指揮。林彪出來說，那是他向彭提的建議，是對紅軍的戰術方法的不同意見。這樣一來，毛主席就沒有再追究彭德懷這個問題了。在八屆八中全會上，如果這個“罪名”一旦成立，彭德懷“反毛主席的歷史”會追溯得更長久，處境就更難，受牽連的高級幹部會更多。

林彪在處理彭德懷的問題上定了三條具體的“線”：1、對彭德懷問題的性質，堅決執行中央的決議，軍隊不准有任何新的提法；2、彭德懷一案，不准隨便“順藤摸瓜”揪人，不准把和彭德懷在工作上 and 歷史上的人事關係與這次政治運動聯繫在一起；3、要穩定高級幹部，不能輕易調動。

子：毛澤東指責彭德懷有個“軍事俱樂部”在軍內，但這次只動了鄧華、洪學智、萬毅、鍾偉等少數人，打下去的人還沒有地方多。

父：林彪上台以後的政策是穩妥的，對軍內反對彭德懷的鬥爭作到了“既堅決、又防止了擴大化”。

彭德懷下台後，“對高級幹部要穩定”被林彪當作一項重大政策在掌握。他在一次軍委常委會議上說：軍委對幹部不能輕易變



李聚奎

動，更不能隨便調換。軍隊的團結穩定，主要體現在對高級幹部的使用上。高級幹部一換，中級、下級幹部接著都會換，這樣上上下下幹部就惴惴不安了。現在的高級幹部有個別人是不稱職的，有調換的必要，但也要在適當時候再作通盤考慮，妥當安排。凡是這次配合中央的要求進行調整的幹部，特別是對本人做了不利調整的，對他們都要做好思想工作，儘可能放下思想包袱。

和彭德懷、黃克誠關係密切的一批高級幹部，如出身於紅三軍團的張愛萍、劉志堅、彭紹輝、甘泗淇、楊勇等都仍然受到器重。

林彪實行穩定高級幹部隊伍的政策，我還記得一個例子，就是成都軍區司令員的人選。成都軍區司令員賀炳炎去世後，總政曾三次提出繼任的人選，都沒有通過，後來還是林彪點名黃新廷為司令員。對此，羅瑞卿轉達了林彪的話，他說林總有指示，由於歷史原因，我們的軍隊是“合股”而成的，我們必須尊重這個歷史，在實際工作中要考慮到這個歷史。只有軍委對領導幹部的使用做得好，才能把多股合成一股。1955年劃分十二個大軍區的時候，成都軍區被當成是紅二方面軍的象徵，該軍區司令員的人選，就要注意到這

種不成文的格局。

讓我說內心話，黃新廷和總政提的另幾位司令員人選比較來說，從資格上能力上都處於下風，但黃新廷是原紅二方面軍的幹部，這一條是他被提陞為司令員的有利因素。後來有人說，林彪處處都搞紅一軍團山頭主義，那是不實事求是的。林彪親自提名黃新廷任成都軍區司令員還有另一個含義，就是向原紅二方面軍的總指揮賀龍表示了團結共事的意願。

新軍委成立後，還有一個如何對待所謂“落後”幹部的問題。當時有兩種態度：總政有些人要肅清處理，必要時殺一儆百，而林彪、羅瑞卿是儘可能拉一把。那時，總政對一位打仗很出色的高級幹部因生活問題要嚴厲處理，絕不姑息。對此，羅瑞卿在一次軍委辦公會議上有個講話，他說：今天我們要討論的單子裏（指議題）有對×××的處理問題。總政提出的意見令我感到很不安。我昨晚去和幾位常委商量過，向他們談了談情況。他們有重要指示，總的精神是，對幹部要看本質，要看大的表現，也要看他的歷史。對幹部的缺點、甚至某些嚴重錯誤要批評幫助，但決不能打擊。只要對幹部採取打擊的政策，領導上就一定犯錯誤。總政今天提出的對×××處罰的議題我提議撤消，由總政黨委重新審議。

子：×××可是一位有名的戰將呀，多少得考慮他的功吧？

父：雖然對×××“給了出路”，開除黨籍、撤職降級後搞到地方一個小農場去了。但是羅瑞卿轉達的軍委常委們的話幫了其他好多幹部。我記得總政對王建安（濟南軍區副司令員）、郭鵬（新疆軍區副司令員）也要給予嚴厲紀律處分。那時有一批高級幹部，例如陳再道、陳士渠、聶鶴亭等人都是老“運動員”，經常被總政整一整。軍委多方做工作，保護了他們。

總政對涉彭德懷案的人很苛刻

父：總後於1959年10月召開了有各軍區、軍兵種後勤部長參加的批判彭德懷的黨委擴大會議。

子：這後來被說成是你“批洪”，列為了你的罪狀。

父：這是軍委和總政布置下來，總要搞呀。洪學智每天出席會議時都坐在主席台上，大家的批判發言，多是些合情合理的話，相當一部分講的是“官話”、“套話”，沒有什麼罵人的話。總政派副主任劉志堅參加總後黨委擴大會進行指導，一些事要報告總政。會議上洪學智的檢討在我們這裏可以了，但在總政那裡總是過不了關。

和中央軍委的精神相比，總政處理和彭德懷有關人員的具體措施相當“左”。他們和林彪、羅瑞卿相比，對人比較苛求。廬山會議後不久，總政就下達了一系列文件。

子：現在可以查閱到，1959年11月初，中共中央向全國轉發總政關於貫徹黨的八屆八中全會和軍委擴大會議的《當前情況和工作部署的報告》。該報告說：“在傳達貫徹會議的過程中，各單位發現和揪住了一批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和階級敵對分子。截至10月19日止，各單位報來這種對象有黨員幹部847人，佔這些單位幹部總數的千分之一強……”這大於同期國家機關的比例和人數。

1959年11月底，中共中央又批轉了總政《關於劃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標準和處理辦法》，是把它當成了批判彭德懷的對全黨的指導性文件。總政領導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鬥爭中非常積極。

父：那個文件是對人非常嚴厲的。

子：此文件中規定了以下幾種人可劃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1、公開散布對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不滿言論的；2、為彭德懷辯護的；3、歷史上多次犯錯誤，這次借提意見向黨進攻的；4、思想一貫右傾，自1958年大躍進以來又有嚴重右傾言論，學習八屆八中全會精神後又不做檢討的。要對這些人採取開除黨籍，轉業處理，調離要害工作崗位等措施。”

父：總政對彭德懷案的人從思想批評轉為組織處理，而且有些“擴大化”，在全軍和全黨帶了頭。

子：這裏有沒有特別的原因？

父：彭德懷是個務實的人，他不喜歡專“耍嘴皮子的”人（指某些政工幹部），在學習蘇聯軍隊時期，軍隊的政治機關受到歧視和壓制，政工幹部很不得意，甚至取消政委的“一長制”都有人提了。因此政工幹部普遍對彭德懷很有怨氣。處理彭德懷案，政治機關負責審查“犯路線錯誤的人”，有了決定他們政治生命生死的權力。從反彭德懷開始，總政和各級政治機關整人的權力大了。廣大幹部，甚至是高級幹部，開始對他們怕了。

在彭德懷案中，總後開始只有洪學智，後來又增加了蘇煥清（總後營房部部長）。他們直接由總政負責審查、定案和處理。因為我參加軍委辦公會議和列席軍委常委會，對林彪、羅瑞卿的想法比較瞭解，因此我建議：對洪、蘇二人，總後黨委不參加審查工作，一切交總政辦。對我的提議，多數人同意，而李聚奎、李耀反對，決心要對“彭黃洪”進行鬥爭。在當時的政治氣氛下，我對他們的意見很難表示不同意，只好沈默。

李聚奎抓住彭、洪不放有私心



2003 年，李銳對程光暢談兩次廬山會議的比較。（作者提供）

子：李聚奎要鬥爭彭德懷、洪學智，必定有他的原因。

父：據我看來有三條：1、歷史上李聚奎曾受到彭德懷的壓抑。李是彭德懷領導的平江暴動的參加者，自認是有功之臣，卻沒有得到彭的重用。不僅如此，後來一軍團和三軍團交流幹部時，李又被彭德懷“交流”出去了。李在一軍團當師長沒當下去，變相地降了職權。2、李聚奎和洪學智共事，認為洪辦事獨斷，眼裏沒有他這個政委；3、李聚奎那幾年很不順，他原是國家的石油工業部部長，1958年中央決定大力發展石油工業，從總後調余秋里去當了部長，把李聚奎撤下來安置到總後，李的思想壓力之大可想而知。

子：這一次李聚奎總後部長沒當上，黨委第一書記又沒當，很“背運”。

父：換到誰的頭上，都得考慮中央有對自己是否器重甚至信任的問題，或許他想在鬥爭彭德懷的大是大非問題上表示鮮明的態度，以求中央和軍委改變對他的看法。

總政治部專案組經過近半年的審查後，提出了對洪學智的處理意見並報告中央和中央軍委。決定洪學智撤消職務，離開軍隊，轉業到吉林省農業機械廳任廳長。在審查期間，總政對洪學智抓住“小辮子”不放，洪的檢討稿在總政那裡總是通不過。總政逼迫洪學智承認有和彭德懷密謀反對毛主席的意圖和活動，洪學智堅持沒有那回事，總政死死抓住這個“要害”。就在這時，洪學智發現了我不同於李聚奎要揪住他不放的態度，就到我家來請我幫個忙。我和洪一起研究了牠的檢討，應洪學智的請求，我還偷偷為牠修改過兩次檢討稿，對稿子“加了一點工”，幫助牠解脫。第一次是，在措詞上認錯很沈痛深刻，但堅決不承認有與彭德懷密謀反毛主席的事，這次檢討在總政那裡過不了關，打回來了。第二次，承認和彭德懷關係密切，對密謀反毛主席的問題避而不談，不說有，也不說沒有，檢討同樣過不了關。後來，我建議洪學智直接找總政主任譚政去說說情，試試看。他同意我的意見，但他覺得自己不好出面，託我為牠去說情，因為我很受譚政的器重，個人關係也好。

我私下裏專門去找了一次譚政，我的意見譚聽進去了。洪檢討不過關的事就不了了之了。

中央對洪的處理手續需要一定的辦理時間，直到1960年四月下旬洪學智才離開北京。我交代過，其待遇要按原來的規格不能變，在他沒有離開總後之前，一切按過去老規矩辦，生活上儘可能滿足。洪學智去吉林時，提出要把他的吉姆轎車帶走，我請示羅瑞卿為他辦了。臨行前我舉行了送行宴會，除對他本人和家屬進行了照顧之外，專門給他掛了一節運輸傢具行李的火車車皮，還派專人護送。我對洪學智認真按照中央的決定辦事，但又儘可能寬鬆。

子：現在回過頭來再看，當時處理黨內鬥爭的風氣還好。

父：總政對蘇煥清的審查時間很長，審查的負責人是軍事檢察院檢察長黃火星，審查重點是東北解放前，抓蘇煥清和黃克誠有嚴重“貪汙”問題。蘇煥清是黃克誠的老下級，黃克誠曾擔任新四軍三師師長，蘇是後勤部長，關係很好。這次審查蘇，實際上是向黃去的。

總政審查組想從蘇的嘴裏搞出黃克誠“罪行”的線索。蘇煥清如何交代的我不清楚，似乎總不能滿足總政專案組的要求，不能得出審查結論。黃火星兩次找我商談該怎樣辦。我說：“既然搞不出什麼東西，能否按照1952年‘三反’後期時‘一風吹’的政策辦，我看這個政策是很成功的。”結案後，總政示意我對蘇煥清要降職使用，但是我不同意，繼續讓他擔任營房部部長。雖然蘇煥清沒有蒙受不白之冤，但總政主要領導因這件事對我很有意見。（程光）□

解放軍為毛澤東的“文革”路線“保駕護航”，有了軍隊的支持，毛澤東一步步推行他的“文革”大業。但是，軍隊既是毛澤東發動、推行“文革”極左路線的工具，可最終卻成為埋葬毛澤東“文革”路線的積極執行者

解剖與還原 “文革”中的解放軍

“毛澤東在文革前夕對軍隊的部署”“總參‘八二五事件’與賀龍的倒台”“林彪葉劍英等對軍隊幹部的保護”“‘二月鎮反’及‘軍委十條命令’的出台”“‘王關戚’的倒台與毛澤東對各地軍頭的安撫”“軍隊製造的大屠殺血案”“軍委辦事組與江青集團的關係”“林彪對中央文革滲透軍隊的防範”……

拿起這本沉甸甸的大開本《解放軍與文化大革命》（丁凱文著，明鏡出版社），封底提示詞撲入眼簾。44萬字的專著，揭示和論述的是，毛澤東麾下“無產階級專政的柱石”解放軍，與二十世紀中國史無前例的大動亂，這二者“剪不斷，理還亂”的緊密又複雜的關係。

“文化大革命”掛名“文化”，運動之初，確實許多人誤以為這是“筆桿子”的事。但後來才醒悟，不對了，“文化”只是毛澤東的“藥引子”，其實他是對中國政治、社會、思想等等方面的全局性大手術，而其中“槍桿子”最是須臾不可缺。

談到“文革”中的解放軍，呈現在我們面前的是一系列看似相



2006年在紐約一次
關於林彪問題的演講會上的
丁凱文。(高伐林攝)

反的現象：沒有解放軍效忠，大動亂未必發動得起來；然而，沒有解放軍出面，大動亂勢必不可收拾；林彪主管的解放軍受到毛澤東嚴格的管控，然而，林彪又恰恰嚴防毛澤東最信任的江青等“文革”極左派插手軍隊；毛澤東自己說了“文革”的矛頭，是“混進黨裡、政府裡、軍隊裡和文化領域的各界裏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卻又反手一掌打下幾個秉承他旨意的“文革”功臣，要求“還我長城”……

軍隊在“文革”的表現和作用、以及與各種勢力的互動，毛澤東、林彪、周恩來、江青和軍內衆多人物的種種表演，在丁凱文的這本《解放軍與文化大革命》中都有詳盡的描繪；而上述一系列矛盾現象，在丁凱文看來，也有其一以貫之的內在邏輯。

現在，這本書已經上市，說是“填補了軍史研究和文革研究兩方面的空白”，也不為過。《新史記》記者向旅居美國紐約長島的作者丁凱文先生提出專訪的請求，丁凱文慨然允諾，用書面形式回答了提問。

從研究林彪到研究解放軍

新史記：丁凱文先生，你好。我們已經是老相識了，採訪過你很多次。我們知道，你很早就對林彪問題感興趣，投入了很多心力，獲得了很多成果。你為什麼會對“解放軍與‘文革’”這一課題感興趣？

丁凱文：我從2002年開始從事林彪事件的研究，2004年主編出版了《重審林彪罪案》（上下，明鏡出版社）一書，2007年主編出版了《百年林彪》（明鏡出版社）一書，2011年與司馬清揚合作出版了《找尋真實的林彪》一書（香港中國文革歷史出版社）。林彪在“文革”中被毛澤東樹為接班人、副統帥，被譽為毛澤東的親密戰友，是“文革”發動後中共中央唯一的副主席，同時又是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負責為毛澤東掌管解放軍，乃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研究“文革”中的林彪就離不開對軍隊的研究。

然而，眾所周知的原因，“文革”的研究在國內仍然有著種種的限制，仍然被鄧小平“宜粗不宜細”的緊箍咒所束縛。因而，不僅有



丁凱文編著《百年林彪》。（明鏡出版社）

關林彪的研究難以開展，軍隊與“文革”之間的關係同樣難以開展。正是由於國內學術界受到政治上的限制與束縛，學者們難於從事這方面的研究，即使某些學者不畏艱難、冒著風險寫作，也難以在國內發表，更談不上暢所欲言。此外，有關軍隊方面的研究還有可能事涉軍事機密，這方面的資料披露更加有限，更限制了這方面研究的深入進行。然而，總體而言，政治上的限制是這一研究課題難以進行的最主要因素。正如中國大陸學者何蜀先生在本書序言中所說：

“中共宣傳部門經常用一句自欺欺人的話來掩飾自己對輿論的箝制和對憲法規定的公民權利的踐踏：‘研究無禁區，宣傳有紀律。’好像他們對獨立的、自由的學術研究還十分寬容，並未設立‘禁區’。然而，他們把所有的報刊、出版、廣播影視直至網絡都統統視為‘宣傳陣地’捏在手中，根本不容違背他們意志的研究成果有自由發表、出版的機會，這樣一來，研究還有什麼‘無禁區’可言？”所以，軍隊與“文革”的關係一直缺乏系統、認真的研究，仍然屬於一片空白。

有感於此，2011年《找尋真實的林彪》出版後，我就思考在這方面下功夫。可以說，正是因為林彪事件的研究，促使我將目光集中到解放軍與“文革”的關係；在思考林彪在“文革”當中的所作所為時，也思考林彪在這場運動中是如何處理、解決軍隊與“文革”複雜的關係。由此，也自然而然地涉及到解放軍在整個“文革”中的活動與作用。

首部專著全面研究這一課題

新史記：以你所知，國內外有關這一題目有哪些研究成果？

丁凱文：國內外全面、系統、客觀地研究解放軍與“文革”關係的書尚沒有。據我收集，只找到一本名為《“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解放軍》的書。該書出版很早了，1989年由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出版。該書完全按照鄧小平欽定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調子曲解歷史，分為上下兩編，上編描述林彪與江青的勾結，泡製《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瘋狂從事破壞活動，製造“揪

軍內一小撮”，打倒劉少奇等“黨內走資派”，殘酷迫害軍隊老幹部，如朱德、彭德懷、賀龍、陳毅等。此外，該書還特別渲染了林彪、江青是如何妄圖篡奪黨和國家最高權力，而他們的陰謀活動如何遭到黨內軍內老幹部的抵制和反對，他們的反革命企圖又是如何被毛澤東、葉劍英們所識破和粉碎。該書的下編，則涉及解放軍的“三支兩軍”、武器裝備建設、保衛國家安全、支援國家經濟建設、援越抗美等。在軍隊與“文革”的關係問題上，此書僅在涉及“三支兩軍”部分略有價值。所以，通觀該書，作者隱去毛澤東在“文革”中的主要責任，將“文革”的全部罪責歸咎於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的陰謀活動，如此之作只能視為曲學阿世、混淆視聽的範本，與他們口口聲聲強調的實事求是毫不相干。

雖然如此，國內外仍然不乏學者就軍隊與“文革”的某些具體事件上的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如何蜀關於四川重慶地區武鬥事件的研究，吳迪關於內蒙古地區“文革”的研究，丁抒與孫言誠關於青海“二二三事件”研究，徐海亮關於武漢“七二〇事件”的研究，何蜀關於“揪軍內一小撮”的研究，曉明關於廣西“文革”的研究，余汝信關於軍隊與“文革”關係的研究、舒雲有關林彪事件的探索等，這些成果都豐富和推進了軍隊與“文革”這一課題的研究。此外，國內學者卜偉華、史雲主筆的、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第六卷、第八卷（第七卷尚未出版），在有關軍隊與“文革”的部分也都有較為精彩的論述。這些成果都是我在研究、寫作之中不可或缺的參考著作。

將帥受迫害，都歸罪林彪？

新史記：這一課題比“九一三”事件、比林彪問題，涉及更廣泛的範圍、更浩瀚的資料、更複雜的情況，你針對的誤區、你想解決的問題是什麼？

丁凱文：確如你所言，解放軍與“文革”的關係，相比起林彪事件的研究所涉及的面要更廣泛、更複雜，要作一番全面、客觀的論述

頗為不易。我們面對的是幾十年來官版歷史的老套套，即“‘文革’是領導人錯誤發動、被兩個‘反革命集團’所利用”那一套陳詞濫調。在這種情況下，不少歷史的真相被遮蔽、民眾被誤導。歷史成為官方御用文人們的調色板，根據不同時期、不同的需要而任意加以塗改。“文革”中許多軍內重量級人物遭到不同程度的迫害，諸如羅瑞卿、賀龍、楊勇、廖漢生、楊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等等，官方無一例外地將他們的倒台歸因於林彪、江青的陰謀活動，刻意隱匿了毛澤東、周恩來在其中所起的關鍵性作用。再比如，“文革”中的軍委辦事組，其主要成員是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官史在論及“文革”中的軍委辦事組時，總是將他們歸進“林彪反革命集團”，將他們視為林彪篡黨奪權的工具，將他們的所作所為視為反革命陰謀活動，而無視黃吳李邱等人正是由於“二月逆流”黨內、軍內元老被毛澤東趕下台後，得到毛澤東的批准而參與中央碰頭會的活動，成為這些元老們離開中央政治舞台後的延續，更無視他們日後成為抵制江青等“文革”極左派的政治力量。黃吳李邱等人日後被打成“林彪死黨”、或曰“林彪反革命集團主要成員”，完全是中共政治上的需要。這些都是官史上所沒有或刻意曲解的。通過對這段歷史的論述，我希望讀者能夠重新認識這段被嚴重扭曲的歷史和這些歷史人物。

業餘研究的專家

新史記：我們知道，你有一份全職工作，只能業餘寫作，那麼你是怎樣查尋、搜集海量的史料的呢？

丁凱文：我從事林彪事件與“文革”史方面的研究，確實都是利用自己的業餘時間，白天要上班，下班後還要忙家務事，寫作基本上是靠晚上、週末和假期，可以說是抓緊和利用一切可能的時間來進行，從2002年起到現在已經走過了十個年頭。我在這十年當中不斷地積累有關方面的史料，有不少資料是自己花錢買的，有一些是朋友們送的，另外紐約法拉盛圖書館有很多中國大陸和港台出版的中



丁凱文與司馬清揚合著《找尋真實的林彪》（香港中國文革歷史出版社）。

文圖書，借閱方便，還有一小部分是從互聯網上下載而來。

這些史料大致分為幾部分：

第一類是官方出版的傳記、年譜和官史，如《毛澤東傳 1949–1976》、《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周恩來年譜 1949–1976》、《周恩來傳》、《葉劍英傳》、《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史》第六卷；

第二類是回憶錄，如《吳法憲回憶錄》、《李作鵬回憶錄》、《邱會作回憶錄》、《心靈的對話——邱會作與兒子談文化大革命》、《王力反思錄》、《徐向前回憶錄》、吳德的《十年風雨紀事》、《落難英雄——丁盛將軍回憶錄》、陳曉農編纂的《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徐景賢的《十年一夢》等；

第三類是資料彙編、論文集，如宋永毅主編的“文革”光盤、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主編的《“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李德、舒雲編的《林彪日記》、宋永毅主編的《文化大革命：歷史真相

和集體記憶》、啟之、何蜀主編的《溫都爾汗的幽靈——林彪事件》，也有我本人主編的《重審林彪罪案》和《百年林彪》；

第四類是研究型著作，如王年一的《大動亂的年代》、何蜀的《為毛主席而戰：“文革”重慶大武鬥實錄》、高文謙的《晚年周恩來》、啟之的《內蒙文革實錄：“民族分裂”與“挖肅”運動》、徐海亮的《武漢“七二〇”事件實錄》和《東湖風雲錄》、宋德金《真實的林彪：林彪秘書最後的回憶錄》、閻長貴、王廣宇《問史求信集》、司馬清揚、歐陽龍門的《新發現的周恩來》、舒雲的《林彪事件完整調查》等等；

第五類則是散見在各個雜誌、報紙上發表的文章，如香港中文大學的《二十一世紀》，國內的《炎黃春秋》、《百年潮》、《黨史博覽》，以及一些電子雜誌，如《華夏文摘》“文革”博物館增刊、《記憶》、《往事》、《昨天》、《楓華園》等。再有就是一些網站，如“華夏文摘”的“文革博物館”、“林彪·軍隊·文革”等等。

通過長時間的搜集，我積累了大量的有關軍隊與“文革”方面的資料，雖然還談不上全面、完整，但是我們不能在等待中蹉跎掉寶貴的時光，只有一步一步地先幹起來，對眼下能夠搜集到的這些資料進行認真的分析，從而描繪出一個軍隊與“文革”關係的大致輪廓。也就是何蜀先生在序言中所言：筆路藍縷、填補空白。

八大軍區司令對調有玄機

新史記：能否對我們的讀者講講你研究寫作中的典型例證，例如，你如何通過研究，否定了某一種陳說，或者，怎樣通過比較，驗證了某一條證據？

丁凱文：1973年底毛澤東搞了一次八大軍區司令員的對調，我相信很多人對此都是知道一星半點的。但是毛澤東為何要在此時搞這麼一個大軍區司令員的對調？毛澤東到底想達到一個什麼樣的目的？這卻是官史方面所隱匿不提的，似乎只是毛澤東一個人心血來潮，於是就讓這些大軍區司令員大搬家。



丁凱文多年來蒐集“文革”與黨史軍史的書籍。(丁凱文提供)

但是，這其實是毛澤東在林彪事件之後搞的一次“削藩”活動，它針對的是這些大軍區司令員們“藩鎮割據”和“擁兵自重”。

林彪事件後，1972 年的清查過程中，江青發現了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濟南軍區司令員楊得志、福州軍區司令員韓先楚，曾在 1970 年 8 月的廬山會議上，分別給毛澤東和林彪寫信，提出“犯錯誤的人”不能參加中央工作，要下放基層勞動，矛頭實際上對準“文革”極左派的代表人物張春橋。只是由於後來廬山會議的風向轉變，這些信被送給林彪而壓在林彪處，沒有上繳。江青發現這些信後，告狀告到毛澤東那裡，這三位上將不得不在中央的壓力下作檢

討。雖然毛澤東後來表示不再追究此事，但是卻在 1973 年夏安排姚文元找了上海市委的寫作組，重印了《史記》中的一些人物列傳，如《陳丞相世家》、《絳侯周勃世家》等。

毛澤東發現他所鍾愛的“文革”極左派們，乃一幫手無縛雞之力的文人，即使給了王洪文、張春橋等人軍隊的職銜，也根本駕馭不了這些“驕兵悍將”，而這些人未必與“文革”極左派一條心，毛澤東百年之後難免他們不會擁兵自重，不聽調遣。只有採取“削藩”的手段，使他們脫離原有的地盤，才能打散他們的勢力。這次對調，只調司令員，不換政委，這幾位司令員到了新的地方後也不再兼任地方的黨政一把手。這的確是毛澤東的老謀深算之處。

毛澤東搞大軍區司令員對調，不僅僅是針對許世友等人，也是針對北京軍區司令員的李德生。過去人們一直不解，為何身為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李德生要被調到瀋陽軍區當司令員，而且毛還派紀登奎和李先念找李談話，要求李“辭去中央副主席”一職？王洪文在秦城監獄裏向邱會作談及事件的原委，由此我們得知李德生在中共十大上“當選”為中共中央副主席，卻遭到來自江青陣營的反彈，江青、王洪文認為這是對他們的潛在威脅，故要求毛澤東調開李德生。但是李德生是毛澤東“文革”中發現的支持“文革”運動的軍隊將領，具有一定的代表意義，又是十大上剛剛當選的黨中央副主席，貿然拿下李德生頗有不便，而搞這麼一個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正好可以瞞天過海地將李德生從北京軍區司令員的位子上調開，放到瀋陽去，由毛遠新督管，也為張春橋騰出了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的位子。毛澤東正是通過這一系列的手段和措施，借以達到培植“文革”極左派的目的。

毛澤東把軍隊拉進了泥淖

新史記：你這本 44 萬多字的書剛剛出版，很多人還沒有來得及閱讀。你寫到了“文革”對解放軍從人事、宗旨、構架、軍事思想、作風甚至指揮系統等等方面，有哪些影響，造成哪些改變，解放軍的介入，對“文



楊得志上將。

革”又起了怎樣的作用。這裡你能否簡要說說，本書最主要的新意、最挑戰過去成見的是什麼？

丁凱文：以往的官史在論述解放軍與“文革”的關係時，主要強調的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的相互勾結和對軍隊的破壞，軍隊元老們對軍隊的穩定所起的作用，特別是著力渲染了“二月逆流”中老帥們如何與“文革”極左派對抗，還有就是毛澤東如何一舉粉碎林彪篡黨奪權的圖謀，以及葉劍英等人如何撥亂反正，在毛澤東死後一舉粉碎“四人幫”……等，官史可說是千篇一律。然而，證諸“文革”史，我們卻發現正是毛澤東本人把軍隊一步一步拉進“文革”的泥淖。“文革”之前，毛澤東就號召“全國學人民解放軍”——惟毛澤東並未直言全國人民學習解放軍什麼，而是籠統號召。解放軍在林彪的領導下大搞造神運動，學習毛主席著作，神化毛澤東思想，對毛本人大搞個人崇拜，毛澤東對此甘之如飴，他號召全國學解放軍，就是要全國人民學習解放軍“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用毛澤東思想武裝全國人民的頭腦，按照毛澤東的意志將中國變成一個烏托

邦式的國家。

“文革”開始，林彪採取了不介入的態度，不許軍隊介入地方“文革”運動，但是不久毛澤東就嚴令軍隊必須介入地方的運動，要支持左派，即“支左”。特別是在“三支兩軍”的過程中，軍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毛澤東和中央文革碰頭會的領導下，軍隊參與了地方政權的重組，也就是搞了“三結合”、“大聯合”，各地軍管會、革委會大都是軍人。這一時期，黨就是軍，軍就是黨。軍隊是毛澤東手中的得力工具，既要支持造反派奪權，又要維護社會的穩定。然而，毛澤東卻從未制定過任何一個可供識別的標準——誰是革命派？誰是保守派？全憑軍隊指戰員自己摸索。如此一來，軍隊陷入地方的派性鬥爭，導致軍隊無所適從，動輒得咎，許多軍隊幹部捲進鬥爭漩渦不能自拔，此後他們也是命運多舛，不少人被批判、清洗、打倒，甚至死於非命。解放軍為毛澤東的“文革”路線“保駕護航”，沒有軍隊的介入，全國大亂；有了軍隊的支持，毛澤東則一步步推行他的“文革”大業。但是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軍隊既是毛澤東發動、推行“文革”極左路線的工具，可最終卻成為埋葬毛澤東“文革”路線的積極執行者。在毛澤東死後不久，在葉劍英、汪東興等軍人的支持、操控下，華國鋒發動了宮廷政變，一舉擒拿了“四人幫”，終結了毛式“文革”路線。毛澤東如地下有靈，不知該作何感想？

課題太大，難以完整體現

新史記：寫這本書，與你以前所寫的書相比，有什麼特別的難點嗎？

丁凱文：我以前的著述主要是圍繞林彪和林彪事件，相對說來研究對象比較集中。而軍隊與“文革”的關係，是一個非常大的課題，本書有44萬字，但也沒法包羅萬象。雖然我們對“文革”中軍隊高層的動向有了較為深入的瞭解，有關方面的研究也較為深入；但是放眼全國，特別是鑒於各個省、自治區和直轄市情況各異，發展嚴重不平衡，軍隊介入“文革”活動也千差萬別，甚至千奇百怪，我們無法用“一刀切”的方法一言以蔽之。其實，軍隊在每個省、自治

區和直轄市，以及在中央、國務院各部委的“支左”和軍管的過程，都可以寫出厚厚的研究專著。研究不僅需要深入到軍隊參與各省、市、自治區革委會的籌建，介入各派群眾組織之間的活動，完成各項工農業生產計劃等，還要深入到各個部委、機關、廠礦、企業、廣大的農村和學校，那些大大小小的軍宣隊、軍管會以及軍代表們在“文革”中的具體活動、演變等。此外，各地的野戰軍、地方部隊，乃至各區、縣人武部門在“文革”期間的活動也都是值得研究者們關注的。所有這些，皆非一本書所能完整體現。這方面的研究還有待於更多史料的披露，更多當事人的回憶，以及更多的史學研究者的參與。

新史記：對，我本來還想問你，你覺得還有哪些問題沒有論述清楚，打算如何進一步探討？但你剛才的回答也已經涉及這些了。

丁凱文：比如說軍管，是與“文革”造反奪權相伴而生的，在中央認為不適宜造反奪權的省、市或國家機關部門，大都實行了軍管，如中央機關、國務院的各個部委，特別是那些涉及國防工業的機關、部門等；還有不少地方派駐了軍代表，日後又演變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這些軍宣隊、軍代表是如何選派的？他們在革委會、軍管會又是如何工作的？他們後來的結局以及是非功過的評價，等等，這部分的研究顯然還是相當薄弱的。毛澤東在“文革”中樹立的典型“六廠二校”，由於缺乏相關的資料和當事人的回憶，儘管我們在大的輪廓方面有所瞭解，但是卻缺乏深入、細緻的研究。

“文革”的前三年是解放軍介入“文革”運動最直接、最集中的階段，軍人奉命參與“三支兩軍”，參與各省市、自治區、直轄市的革委會的成立，書中對此作了論述，但只能挑出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省份予以評述，這也算是一個遺憾吧。

解放軍在“文革”中參與了“鬥批改”運動，這一時期主要是各地的軍管會、或軍人主導的革委會執政。這個問題目前研究也尚嫌薄弱。我在書中專門開列一個章節予以論述，主要涉及“文革”中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一打三反”運動和清查“五一六集團”運動，此外，還有各地軍管會、革委會對群眾組織的鎮壓。由於這些

運動都是在黨中央的直接領導下進行，各地軍人都是具體執行者，這些運動導致大量無辜的民眾遭受迫害，株連甚廣，持續的時間也很長。由於這方面所披露的資料有限，我在寫作過程中只能盡我所能加以論述，希望今後能看到更多的史料，以便日後對此書有所修訂。

“林彪”已不再是禁忌詞

新史記：從你最開始編纂《重審林彪罪案》到現在，已經十年了，對林彪以及林彪領導的解放軍，在你和眾多人士努力下，人們的認識有了相當大的改變。

丁凱文：沒錯，林彪事件研究已經有了相當大的突破和進展。就本世紀之初，在國內“林彪”還是一個不能隨意碰觸的名字，甚至還是網上的一個禁忌詞，都不能隨意提及或評論，人們只能按照官方定下的調子人云亦云，抑或根本就是以訛傳訛。人們被官方幾十年來的宣傳所熏陶、洗腦，要想全面認識真實的林彪頗為不易。所以，我們要做的首先就是還原那段真實的歷史。這方面明鏡出版社做出了巨大的貢獻，陸續出版了《重審林彪罪案》、《林彪與文化大革命》、《林彪事件完整調查》、《百年林彪》、《林彪畫傳》、《百問九一三》、《林彪元帥最新相冊》、《林彪日記》、《穿過歷史的迷霧：周恩來與林彪》，以及《林豆豆口述》等，正是由於這些書籍的出版，有關林彪的研究得以推向深入。這幾年香港出版了原林彪手下大將吳法憲、邱會作和李作鵬等人的回憶錄，使得我們可以更深一步地研究“文革”中的林彪。我在2011年與司馬清揚合作出版了《找尋真實的林彪》，試圖將這些年來有關林彪與林彪事件的研究作一個階段性的總結。

如今在互聯網上，網民可以對林彪和林彪事件各抒己見、暢所欲言，我們所寫的關於林彪和林彪事件的文章，也廣為流傳。雖然國內官方的各種報刊尚不敢對“文革”中的林彪有全面、客觀的評論，但是已經無法阻擋互聯網上人們對林彪的熱議。當年毛澤東、



“文革”照片：解放軍“三支兩軍”。

鄧小平給林彪扣上的“篡黨奪權”、“陰謀政變”、“南逃廣州、另立中央”等罪名現在成了網民譏諷的笑柄，除了正版的《中國共產黨黨史》第二卷還維繫著這些搖搖欲墜的陳詞濫調，人們在心目中早已不把它當回事了。

林彪：“文革”助力變阻力

新史記：研究了解放軍，是否有助於進一步認識林彪事件真相、林彪功過，撥亂反正？

丁凱文：搞清楚解放軍與“文革”的關係，林彪在其中的作用就能得到更清晰的認識。“文革”運動是毛澤東親自發動和領導的，林彪在“文革”發動前後曾大力吹捧毛澤東，在製造個人崇拜的造神活動中出了大力，也被毛澤東硬拉上“文革”的戰車，樹為親密戰友

和接班人。林彪在“文革”初起時推波助瀾，起了很壞的作用，不可否認這是林彪的一大污點。

但是林彪還有其另一面，即保持軍隊的穩定，不許軍隊介入“文革”，後來在毛澤東的嚴令下，軍隊不得不參與“文革”，而林彪一直處於被動地位，從不主動出頭，一切具體的工作都是周恩來領導的中央文革碰頭會來操作。有關這方面的研究，大家不妨讀讀我和司馬清揚合著的《找尋真實的林彪》，和司馬清揚寫的《穿過歷史的迷霧：周恩來與林彪》。

“二月逆流”之後，林彪成為抵制江青等“文革”極左派的重要力量，這種抵制和鬥爭在中共九大前後就已開始，九屆二中全會上達到高潮。正是由於毛澤東發現林彪在“文革”一事上並非與毛一條心，林彪不僅不是毛澤東思想上的繼承人，甚至也不是毛組織上的繼承人，毛澤東在世時就敢於出手收拾張春橋這個毛澤東“文革”紅人，那麼一旦毛澤東去世，毛的“文革”大業就會被徹底清算，此時的林彪，在毛澤東看來，已經從“文革”初起時的助力變為阻力。

所以，林彪的倒台不是林彪要“篡黨奪權”，而是毛澤東要在有生之年扶植起“文革”極左派，搬掉林彪這塊擋路的“石頭”，於是就有了1971年8月毛澤東的南巡和由此而引發的“九一三事件”。這個大致的輪廓應該是較為清晰了。當然，在一些具體的問題上還可以繼續深入下去，如毛澤東在南巡過程中，是否得到了有關林彪一家活動的情報？如確有此類情報，是些什麼內容？林立果在當時都有哪些具體活動？當事人是否還留有回憶？如時任空軍副參謀長的王飛、前南京空軍政委江騰蛟，還有林立果身邊的心腹李偉信等，他們的回憶將有助於我們更深一步地瞭解“九一三事件”的具體情況。

在“文革”中有過也有功

新史記：那麼，你今天如何看待林彪、解放軍的歷史功過？

丁凱文：林彪早年作為中共軍隊的卓越將領和其對中共建國的作用，中共官方現在基本上還是承認的，並不諱言林彪的主要貢獻；

1959 年廬山會議前毛澤東發動的各項政治運動也很少見到林彪的身影，這點應該也無異議。1959 年後林彪開始主管解放軍的工作，但是到六十年代初期，林彪身體不佳，除了主要關注於軍隊的建設，國防戰備和政治思想工作等事宜外，鮮少涉及其他政治活動。林彪是在 1965 年底才一步步捲入中共高層的政治鬥爭和“文革”運動。

林彪一生最大的爭議點，在於製造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捲入“文革”漩渦，林彪領導下的軍隊為毛澤東的“文革”大業保駕護航。林彪在“文革”中曾說過“毛主席的話一句頂我們一萬句”，但是林彪還說過“毛主席要負一萬分責任，我們只負一分責任！”——我向聽到林彪此話的人核實過。這說明，林彪對毛澤東“文革”責任問題有清醒的認識。

林彪對“文革”的認識，對江青等人的認識，也是經歷了一個過程的，林彪與江青極左派的明顯對立，始於 1967 年初，在防止江青等造反派插手軍隊事務上，林彪幾乎是寸步不讓，哪怕不得不犧牲自己的重要手下。九大報告稿的分歧和爭論是林彪、江青政治理念



江青與周恩來。

對抗的一個高潮，1970年8月的廬山會議則是矛盾的徹底公開化，廬山上的鬥爭實質上是1967年初“二月逆流”的翻版。應該說，林彪對江青集團的認識，在中央高層內部是比較早的。他們同江青極左派的對抗，雖然失敗了，但其歷史功績不能被人們所遺忘。江青等極左派勢力一直無法有效地控制軍權，這個罩門恰恰產生於林彪時期，所以，即使林彪倒台，江青等人也無法找到現成的人馬及時地填補軍中空白，而軍隊的力量成為日後粉碎“四人幫”的堅實基礎。因此而言，林彪“文革”中有過也有功。

關於解放軍在“文革”中的歷史功過問題，我們必須看到，軍隊是“黨軍”，始終處在毛澤東的絕對管控之下。解放軍是在被動的情況下執行了毛澤東和中央軍委的命令，介入了“文革”運動。在那個混亂的年代，軍人們幾乎無所適從，按照自己的理解“支左”，卻常常是支持了“保皇派”，而非“造反派”，可以說動輒得咎，軍隊領導人也如走馬燈般地換來換去，軍隊的正常工作被嚴重打亂，軍事訓練無法完成，軍隊院校工作受到嚴重破壞，軍隊作風敗壞，軍民關係惡化等。但是由於有了軍隊的介入，國家在動亂中還是逐步趨於穩定；在工農業生產中，軍人也常常扮演重要的角色，諸如軍隊每年派出大量官兵參與“三夏”和“秋收”的農業活動，對農業生產貢獻極大。特別是在毛澤東死後，在軍隊領導人主導下一舉粉碎“四人幫”，終結了毛澤東禍國殃民的“文革”運動。沒有軍隊的參與，中國不知道還要再混亂和沈淪多長時間。

林江之間是“權力之爭”嗎？

新史記：很長時間以來，有一種說法：林彪與江青兩個集團又勾結又爭奪，彼此之間是“權力之爭”，你所說的林彪對江青一夥的抵制，是否可從這個角度來解讀呢？

丁凱文：1981年6月，中共中央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決議》就“文革”中林彪與江青的關係，作了如下闡述：

“林彪、江青等人，他們組成兩個陰謀奪取最高權力的反革命集團，

利用毛澤東同志的錯誤，背著他進行了大量禍國殃民的罪惡活動”，因而決議的結論是：“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由於中共官方的這個定性，林彪與江青之間的關係就被定格為“相互勾結、相互矛盾”。最新版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如是說：“林彪集團和江青集團都是在人為製造階級鬥爭的環境中，在黨的民主集中制受到破壞的條件下，為爭奪權力而發展起來的。……但是，野心家、陰謀家的相互勾結、相互利用總是短暫的。”“隨著九屆二中全會的臨近，兩個陰謀集團的鬥爭愈來愈尖銳和表面化了。”（見該書下卷第 835 頁）

把林彪與江青的關係片面地解讀為“兩個陰謀陰謀集團之間的爭權奪利”最符合官方的觀點，官方決不會把周恩來、葉劍英等老幹部或軍內元老與江青的關係解讀為“爭權奪利”——原因無它，周恩來、葉劍英們屬於好人範疇，按照“歷史問題決議”，周、葉等人與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進行了各種形式的鬥爭”。顯然，這是對歷史的歪曲。評論歷史人物，我們只能用一個標準，而非多重標準。“文革”中的林彪、周恩來、葉劍英等人同屬老幹部陣營，用一句通俗的話來說，林彪等人屬於中共的功臣集團，而江青、張春橋等人猶如毛澤東的外戚、內侍等近臣集團。“文革”開始時，他們全是毛澤東的支持者、擁護者。一來毛澤東在中共歷史上形成了很高的威望，二來在意識形態上他們並無根本的分歧。但是隨著運動的深入發展，局勢越來越超出想象，越來越混亂，越來越難以控制，林彪這些中共功臣集團成員的認識就發生了變化，逐漸認識到這個運動是國家的災難，應該設法及早給運動剎車，使國家回復到正常的發展道路上。在這一點上，他們與江青等毛的近臣集團發生了不可調和的矛盾，從“二月逆流”、“軍委八條命令”、“廬山會議”，乃至鄧小平上台後搞的整頓等等，都與毛澤東的極左路線格格不入。

林彪集團對“文革”的認識，對江青等人的認識也是經歷了一個過程的（這個問題，我在書中做了較為詳細的論述），他們與江青集團的明顯對立始於 1967 年初，九大報告稿的分歧和爭論是兩個



林彪塑像已經在中國多處矗立。

集團政治對抗的一個高潮，廬山會議則是矛盾的公開化。林彪嚴防江青等人把手伸進軍隊，就是防止他們在搞亂全國的同時再搞亂軍隊，有了穩定的軍隊，即使國家再亂也出不了大問題。實際上，中共在九大之後就沒有再發生大規模的動亂了，從這一點上而言，軍隊功不可沒。此外，軍隊從沒有主動擴張自己的權力。軍隊的職責是一切行動聽指揮，林彪和中央軍委在“文革”期間從未給下級部隊直接下過奪權的命令，各省、市、自治區的奪權都是在毛澤東的號召下進行，由江青主導的中央文革碰頭會主持，軍隊僅僅是在中央表態之後隨大流而表示支持。事實上，在奪權初起時，軍隊大都支持了保守派而非造反派，引起毛澤東、江青的不滿，不少軍隊領導人還慘遭厄運。

評價林彪及中共的功臣集團，要看他們與毛澤東、江青等極左派們產生分歧和對立的原因是什麼，看他們的政治主張是否有利於國計民生。毛澤東、江青推行的是蘇聯斯大林烏托邦式的極左路線，而林彪則希望國家回復正常，而非一味堅持“繼續革命式的路線

鬥爭”，在這一點上，林彪與江青等人有著本質的區別。所以，林彪與江青等極左派的鬥爭與“二月逆流”中的葉劍英、與日後搞整頓的鄧小平是一樣的，值得充分肯定。如果我們承認葉劍英、鄧小平等人與江青的鬥爭是正確之舉，我們有何理由把林彪與江青的鬥爭劃為“另類”，說成是什麼“兩個反革命集團的權力之爭”呢？我相信，如果林彪按兵不動，在廬山會議上養精蓄銳，不去發動那場批判張春橋的鬥爭，那麼日後毛澤東一旦撒手人寰，林彪一定會主動出手一舉粉碎“四人幫”，開創中共的新局面。可惜的是，歷史沒有給林彪這一機會。

官方學者怎麼自圓其說？

新史記：十年來，你研究林彪提出了若干不同於官方幾十年來定論的見解，得到什麼樣的迴響？是否也受到質疑和非議？

丁凱文：研究歷史是追尋真實的過程，我們當然不能說我們的研究就一定是完美的，其中會受到史料、思想認識等方面的影響。但是，官史卻絕對是有問題的。我們說，歪曲和篡改歷史，雖然一時有用，但終究還是有限的。劉少奇在“文革”中被押送河南開封，被中共中央定性為“叛徒、內奸、工賊”，被永遠開除出黨，此時的劉少奇無疑是黑暗政治中的最弱者，而毛澤東玩弄權術整倒對手則處於最輝煌的巔峰。但是劉少奇一句話“好在歷史是人民寫的”道出了一個簡單而深刻的真理：歷史不是毛澤東寫的，也不是哪個最強勢的領導人寫的。那些強加的污垢遲早會被清理乾淨，那些寫在各種“通知”、“報告”和“決議”上的白紙黑字必然成為歷史的罪證，玩弄權術的人最終會被歷史無情嘲諷和揭露。

現在有越來越多的人認同我們的觀點和看法，迄今為止我還沒看到過具有官方學者背景的人正式發表過與我們商榷的文章，我想一方面他們可能仍然受到無形的約束，不能暢所欲言，另一方面那些史學工作者們必然面對一個尷尬的局面，即在官史與眾多新史料和觀點面前如何還能自圓其說，其困難度是可想而知的，所以還不

如乾脆保持沈默。

實際上，我回國時也接觸過一些史學工作者，從他們對我的友善態度中，我能體會到他們的真實態度和想法。《炎黃春秋》雜誌的一位副主編劉家駒在文章中這麼評價我們的書：“這些年來，研究林彪的人越來越多。凡是有志者找上門，我是來者不拒，都誠心接待，告之他們我的所得，提供資料，安排介紹對當事人的採訪。他們中大多是國內外讀者十分信賴的。其中值得我推崇的，一位是澳大利亞華裔學者孫萬國，他的《古有竇娥，今有林彪》較真實地反映了‘913’事件始末；另一位是美籍學者丁凱文，經他多年搜集匯編的《重審林彪罪案》，集納了國內外知名學者對林彪事件提出的質疑和評述，引起世界輿論的強烈反響；還有一位是從未謀面的美籍華人司馬清揚，他是化學博士，用業餘時間從大量史料中研讀梳理中共人物，和丁凱文合作寫出《找尋真實的林彪》，又獨立著述了《周恩來與林彪的終極對比》（該書出版時定名為《周恩來與林彪》——《新史記》按），他的分析是深入的，公正的，能獨到真實地握住林彪的政治品貌。在眾多記敘林彪的著述中，我認為他的書令人折服。”有了這樣的評價，夫復何求？

當然，我們也面對了一些攻擊和謾罵。某些海外激進文人對林



葉劍英元帥

彪與“文革”缺乏認真、紮實的研究，而沈溺於道德方面的指控，指責我們關於林彪的研究是“封建流毒還沒有肅清的體現”，是“進行一種政治宣傳”，是“熱衷於對政治人物進行打倒或翻案”等等。因此，我們被戴上了犯有“文革病”的帽子。還有人甚至乾脆說“為野心家翻案不得人心”。這些人的指責絲毫沒有涉及到我們在“文革”和林彪事件研究中的具體問題，而是泛泛而談地否定我們的研究成果。我要對這些人說，你們難道不能堂堂正正地寫出一篇學術性的文章，讓我們在學術上作交流或商榷，而非躲在某個角落裏放冷箭？我還想說，站在政治正確和道德正確的制高點上所做的批判，並不能代替歷史的研究，還不如真正靜下心來踏踏實實地從事學術研究來得更有意義。

爲什麼我感到責無旁貸？

新史記：你下一步研究寫作什麼？可否簡單介紹一下你的背景？

丁凱文：我想我還會繼續從事“文革”史方面的研究吧。我出身於一個史學世家，從小在北京大學長大，上小學和中學時正處於“文革”期間，雖然那時年齡尚小，但對北大的“文革”運動已經有了很多感性的認識，如北大的紅衛兵運動、兩派鬥爭、“文攻武衛”、父母“文革”期間下放參加“五七幹校”，批林批孔、反對師道尊嚴等，再加上那時小學的一個班主任也是個極善搞極左運動的年輕人（現在據說該人當了北京市某區的區委書記），整人頗有一套，因此我從小對“文革”的極左運動就有切身的體會和感受。上了大學，當了研究生仍然感受到極左思維的陰魂不散，那種對學術的踐踏、封鎖，愚民政策，不能講真話，只許唱讚歌，以及無所不在的“文字獄”，都令人倍感窒息、深惡痛絕。

舉個例子，我在上大學時為了寫畢業論文，需要瞭解抗戰時期國民黨的對美政策，需要參閱北大圖書館藏有日本人古屋奎二所寫的《蔣總統密錄》，該書存放在北大圖書館內部閱覽室，不開放給學生。但是為了寫好論文，不得不找系裏開證明，再找圖書館有關領

導簽字，即使如此仍然受到諸多刁難。區區北大的一個內部閱覽室尚且如此，就更不用提國家檔案館、中央檔案館了。由此我更看清了中國的所謂“學術”的真面目。

到了國外後，終於有了一片自由的天空，也更開闊了眼界，對於歷史的研究，我有一種責無旁貸的感覺：國內無人敢研究的人物，我們在國外可以研究；國內無人敢問津的研究課題，我們在國外也可以涉獵。這裏沒有學術禁區，沒有三令五申，沒有“秋後算賬”，更沒有文網高懸，唯一的“紅線”，只是學術的良知。也許我的研究還不夠完善，有些問題的深入還有待更多史料的出現，但是只要認真去做，就會將其向前推進一步，拋磚引玉總是會有結果的。所以，我相信只有不斷持續下去，“文革”歷史的研究就會有越來越多的成果。（丁凱文 《新史記》記者 高伐林） □

劉家駒批評《林豆豆口述》一書的整理者舒雲“為了‘豐富’書的內容，對舊文做了大量的‘翻新改造’，摻雜當今詞語，虛擬情節細節，隨心所欲地演繹”。舒雲寫來回應文章，並公布大量林豆豆信件影印件，回應劉家駒的批評

《林豆豆口述》： 特殊環境的成果 ——兼覆劉家駒《我寫林彪傳的遭遇》

《新史記》编者按：中國大陸學者、作家舒雲女士整理的《林豆豆口述》一書 2012 年 8 月由明鏡出版社出版之後，尤其是在《新史記》第 9 期摘選其中兩篇林豆豆的申訴文章之後，在海內外林彪研究和“文革”研究學者中引起不同的反應。《炎黃春秋》副主編劉家駒先生在一些媒體上撰文，對《林豆豆口述》及其整理者提出相當尖銳的意見，明鏡相當重視，在旗下的明鏡歷史網、明鏡新聞網都予以轉載，以期引起更多學者、專家和關心歷史的讀者們關注。

劉家駒先生在文中說：

“與這些真誠的、有責任感的學者相比，舒雲走的是一條邪路。署名‘舒雲整理’的《林豆豆口述》在香港出版後，我知情很晚，是豆豆的夫君張清林打電話給我，指責舒雲在書中弄虛作假，編造史實，未經他和豆豆的允許就貿然出書。張清林很是憤然，表示準備對舒雲提出侵權訴訟。我問豆豆是怎麼回事？豆豆說，舒雲沒對她說過出書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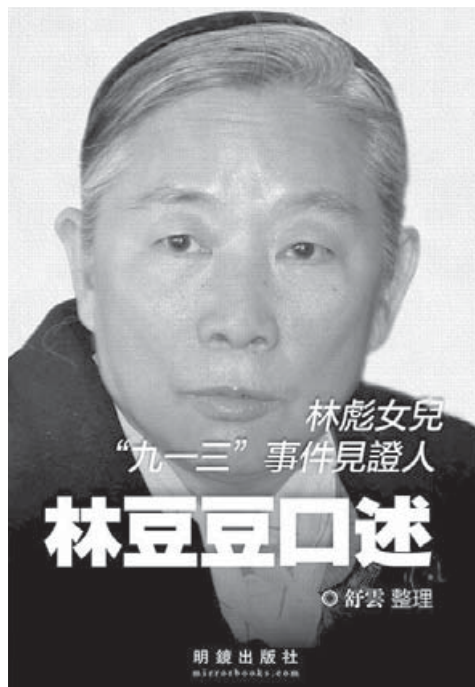
更不知書的內容。正好此時，我的一位朋友弄來這部書，她看了，說是一部大雜燴。我趕緊借來一讀，內容確實雜亂，大都是用舊文組裝。”

“為了‘豐富’書的內容，舒雲對舊文做了大量的‘翻新改造’，摻雜當今詞語，虛擬情節細節，隨心所欲地演繹。其中《給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黃火青的信》，就是舒雲‘深加工’‘整理’出來的，其內容的混亂，讓人難以卒讀。”

劉家駒還說：“舒雲卻求利心切，在書中大膽妄為地編造情節，又竊走我寫成的資料加以濫用，失去了學者應有的人品和操守，玷汙了史學研究真誠的風氣。”（以上引文均摘自劉家駒《我寫林彪傳的遭遇》，《炎黃春秋》2013年第3期）

《炎黃春秋》在劉家駒文章的《編後語》中介紹，“本文原為作者質疑舒雲的《林豆豆口述》一書所寫的文章，題為《從舒雲整理的〈林豆豆口述〉說起》。因讀者不太熟悉書中內容，經作者同意，從中截取了作者寫林彪傳的艱辛歷程的部分。”

《林豆豆口述》一書的整理者舒雲，寫來本文，並發來大量林豆豆



舒雲整理的《林豆豆口述》由明鏡出版社出版。

信件影印件，回應劉家駒的批評。

《炎黃春秋》雜誌在 2013 年第 3 期上刊登了劉家駒《我寫林彪傳的遭遇》一文，該文最後部分涉及我整理的《林豆豆口述》一書，對我出版此書提出質疑和批評。其實，這篇文章並非劉先生首次發出。早在 2012 年 12 月 21 日，劉先生就在北京一份電子雜誌《往事》上以《從質疑〈林豆豆口述〉說起》為題對本人提出批評。隨後，劉家駒先生又在香港一份政論雜誌《前哨》2013 年第一期上再次將《往事》上的文章原封不動地予以發表，只是將題目改為《質疑舒雲“整理”的〈林豆豆口述〉》，文中另擬了一些不同的小標題。該文指責本人將林豆豆當年寫的《給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黃火青的信》“翻新改造”，“摻雜當今詞語，虛擬情節細節，隨心所欲地演繹”，是本人“深加工”“整理”出來的。對於這種無端的指責，本人自 2 月 23 日起連續在自己的博客（舒雲探訪‘九一三事件’）裡貼出林豆豆原文予以澄清。原以為這場爭執會因此而停息，但是沒想到 3 月劉先生在國內頗有影響的刊物《炎黃春秋》上發表《我寫林彪傳的遭遇》，文章最後部分畫蛇添足地將與該主題毫無關係的我再次拿出來予以批判，作無謂的指責。為此，本人不得不撰文予以澄清。

《炎黃春秋》作為一個正規的、有影響和有擔當的刊物，既然發表批評人的文章，按照學術規範就應該允許被批評者公開答覆。但是，我兩次主動聯繫該雜誌，但卻沒有得到任何回應。為此，我不得不付諸公道，並表示遺憾。

我為何出版《林豆豆口述》

驚心動魄的“九一三事件”已經過去整整 42 年了，官方長期以來控制了林彪事件的宣傳口徑，但是近十幾年來有關方面的資料和研究如雨後春筍層出不窮，相關的書籍不下幾十種，有的研究還相當深入。但是，作為林彪事件的直接當事人林豆豆，人們卻幾乎聽不到她的聲音，人們所瞭解的僅僅是官方當年下發的系列《粉碎林

彪反黨集團反革命政變材料》中的林豆豆，這些材料裡的林豆豆被官方戴上“大義滅親”的桂冠，1971年9月18日發出的中央57號文件如是說：林豆豆“在緊要關頭揭發林彪、葉群、林立果私調飛機、陰謀叛國投敵，為黨立功”。然而，幾十年來，林豆豆從未認可官方賜給她的這頂“桂冠”，無論是在毛澤東時代還是粉碎“四人幫”之後，無論是面對“組織上”的巨大的壓力還是“兩案審判”的特殊時期，林豆豆都一如既往地堅持自己的觀點，從未動搖。作為一個追尋林彪事件真相的探索者和研究者，我有這樣一份責任，將林豆豆多年來所堅持觀點原原本本地告訴世人，讓更多的讀者、研究者更深一步地瞭解林彪、林彪事件，也更深入地瞭解那段不堪迴首的“文革”歷史。

我整理《林豆豆口述》的目的，也是為了要說明，林豆豆並沒有沉默，並不是某些不瞭解真相的人所認為的林豆豆說假話，更不是像某些人所渲染的“林豆豆說不出什麼像樣的內容”，40多年來，她一直在努力還原“九一三事件”的真相。

本人在《林豆豆口述》編者按中寫下了這樣一段話：“1980年林豆豆從《人民日報》上得知審判‘兩案’的消息，被鄧小平發配河南鄭州的她決定到北京為黃吳李邱辯護，但是未果。林豆豆在和總政‘兩案’取證組三人的長時間的談話，她認為林彪是冤枉的。林彪既沒有想害毛澤東，也沒有想南逃廣州，更沒有想北逃蘇聯。在幾天的談話後，林豆豆口述，林豆豆愛人張清林記錄，將申訴材料寫出來，交給中央。因為監禁中寫的材料全被抄走了，林豆豆身體極不好，斷斷續續地寫了很長的時間。除了上交，他們還留了幾十份底稿，裝進一個小黑箱子裡。我在成書前幾次尋找這個小箱子，而張清林因搬家不知道放到哪裡去了。幸虧90年代初我得到了其中最主要的幾份，於是構成了本書的主體，第一次公開發表。”

林豆豆的這些資料可以看成當事人對那段歷史的個人認識和回憶，是那個特殊歷史環境下的產物。上個世紀80年代初期，林豆豆沒有任何資料可以參考，他們甚至還生活在黑暗當中，受到嚴密的監控，毫無人身自由。作為個人的申訴材料，它們難免存在這

樣或那樣的問題，如個人回憶不夠準確，一些評述不夠客觀，急於為父親申冤而疏於理性的思考等等，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更何況這些申訴材料還可能涉及“文革”當中的某些要人，而這些人在粉碎“四人幫”後仍然活躍在當時的政治舞台上，林豆豆在申訴時也不能不有所顧忌，無法暢所欲言。然而拋開這些內容，我們還是可以看到許多人們以往不瞭解的歷史，值得研究者們在從事“文革”史研究時認真思考、借鑑。

我如何收集該書資料

我見到林豆豆的時間，大概是上個世紀 90 年代前後。以後又多次見過她，她介紹並帶我採訪解放後林彪第一任秘書姜樹華，空軍 34 師服務隊副隊長孫福榮等。林豆豆也到我家來過，送給我一本《我所知道的葉群》。就在這時我有幸看到了林豆豆的四本上訴材料，有幾百頁之多，字跡秀氣工整。作為資料，我有意複印保存了一份。開始時我一直以為這些都是出自張清林的手跡，因為張清林對我說過申訴材料都是林豆豆口述，張清林抄寫。我將《林豆豆口述》的部分原件貼在我的博客（舒雲探訪“九一三事件”）上之後，澳大利亞莫納士大學的孫萬國教授來函告訴我，他也保存有林豆豆的三件草稿複印件，字跡顯得較亂，有增刪的痕跡，信紙背面甚至也寫滿了字。他還告訴我，我貼出的原件就是林豆豆的親筆抄件。

80 年代中期，林豆豆在邱會作大兒子邱路光鼓勵下，到北京上訪，住在萬壽路中央組織部招待所。邱路光帶林豆豆去見時任中組部副部長的曾志。在曾志幫助下，時任總書記的趙紫陽在林豆豆來信上作了批示，同意林豆豆回北京，後來林豆豆被分配到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

林豆豆到北京上訪，隨身帶著裝滿上訴材料的小黑箱子。因為怕丟了，曾在邱會作大兒子邱路光那裡放過幾天，也曾存放在林彪秘書于運深家中。于先生告訴我他看過林豆豆的全部申訴材

料。為了慎重起見，我在打印出《林豆豆口述》的書稿後請于運深審閱了一遍。于先生也證實，我公布的是林豆豆的原件，除了個別文字的整理，沒有增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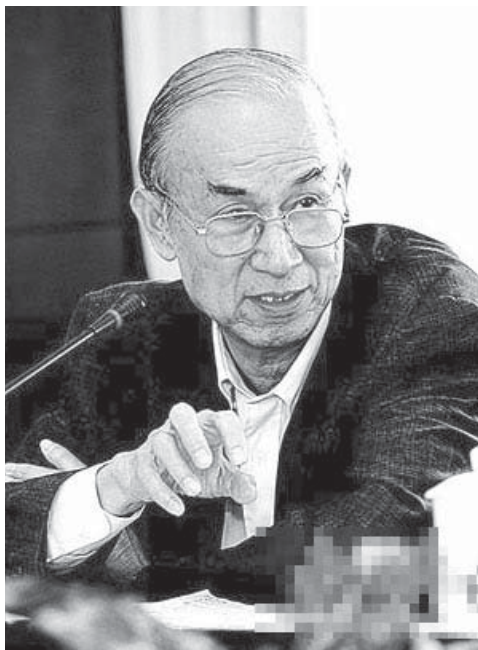
一言以蔽之，這些材料都是出自林豆豆和張清林的手筆，是極為珍貴的手稿，記錄了那個特殊年代他們為林彪冤案奔走呼號的聲音。我對這些申訴材料懷有很深的感情，引用過其中一些片斷。隨著這些年來我在林彪事件探索、研究方面的進展，我心中常有一種想法，即將林豆豆當年向中央申訴的內容、將林彪事件發生的前前後後的過程向社會披露，讓廣大的民眾知曉那段曾經發生過的歷史，知曉林豆豆在當年特殊環境下所做的一切。即使這些材料還存在這樣或那樣的不足，我還是希望原汁原味地奉獻給讀者，讓廣大的讀者和研究者去鑑別，而非永久地封存在我的箱底。

劉家駒對我的指責並非事實

劉家駒在《我寫林彪傳的遭遇》一文中，借張清林之口說《林豆豆口述》一書“弄虛作假，編造史實，未經他和豆豆的允許就貿然出書”。這絕不是事實！就在2013年3月上旬，我曾就此事當面問過張清林。張清林否認他說過舒雲“弄虛作假，編造史實”。我再進一步追問，劉家駒自稱《給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黃火青的信》裡關於“七二〇事件”的內容是劉本人所寫，那麼這部分內容到底是誰寫的？張清林說他曾當面對劉家駒說過，給黃火青的信是“我（張清林）和林豆豆寫的”。

至於劉家駒所謂張清林說“未經我和豆豆的允許就貿然出書”，也不是事實。在整理《林豆豆口述》之前，我分別給林豆豆、張清林打過電話，講了出書的意願，並想從他們那裡得到更多的手稿。林豆豆說：“《爸爸教我怎樣學會寫文章》一文，他們要發表也沒有經過我。”言外之意是默許了。

我又進一步問林豆豆：“李晨所著的《世紀風鈴》（2004年台北天箭出版）一書首次披露了你關於‘九一三事件’寫給中央的報告



前《解放軍文藝》副主編、現任
《炎黃春秋》副主編劉家駒先生。

（這份報告出自林豆豆的申訴材料，收入《林豆豆口述》中）。林豆豆告訴我，這份材料披露出去並沒有經過她同意。

因為林豆豆並沒有反對，我便開始整理林豆豆的上訴材料。但是林豆豆的四份上訴材料，成書似嫌不夠。我又幾次找過張清林，問他他手中是否還有其他申訴材料，張清林說由於搬家多次，有的材料已經找不到了。我只好到國家圖書館尋找林豆豆的舊文，把我所能蒐集到林豆豆舊文也一併編進書裡。

《林豆豆口述》由明鏡出版社在香港出版後，社會反響很大，多次被《亞洲週刊》列為香港十大暢銷書之一。2012年底，林豆豆曾向友人推薦過兩本書，一本是我整理的《林豆豆口述》，另一本是林豆豆和近代史研究所劉樹發共同主編的《林彪軍事文選》。此外，在出版《林豆豆口述》前後，我幾次當面與張清林談話，張清林從來沒有對我說過因為該書的出版要起訴我。所以劉家駒的“張清林很是憤然，表示準備對舒雲提出侵權訴訟”之說根本不成立。

我在《林豆豆口述》後記中說：“《林豆豆口述》整理完後，並

未經林豆豆本人審閱，個別處有刪節，書中的錯誤由整理者負責。”我遵照“尊重史實”的原則，只是對林豆豆申訴原件作了個別文字的訂正，絕沒有添枝加葉，更不可能弄虛作假！

白紙黑字勝於滔滔雄辯

劉家駒先生在《我寫林彪傳的遭遇》文中並未列明本人是如何“翻新改造”和“深加工”整理的林豆豆口述。本人只好將《往事》和《前哨》上劉先生的文章找來，將劉先生對我的批評和林豆豆的原件作一比對，請廣大讀者鑑別一下本人是否做了任何見不得人的事情。

1、劉家駒文中說：“整理者為了‘豐富’書的內容，對舊文做了大量的‘翻新改造’，摻雜當今詞語，虛擬情節細節，隨心所欲地演繹。其中《給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黃火青的信》，就是舒雲‘深加工’‘整理’出來的。其內容的混亂，讓人難以卒讀。我在1986年採訪林豆豆時，就見過這封信的底稿。那是在1980年中央宣布決定公開審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後，豆豆寫出的《給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黃火青的信》，文中都是申訴人有條有理地用事實為林彪一案的冤情作出辯護，沒有譴責批判的用語。舒雲為出書，篡改了原信說理的主旨，變成了一篇聲討特別法庭的檄文。比如，在信的開頭‘熱烈歡呼的是最高人民檢察院準備就江青反革命集團案提起公訴’之後，先讚揚‘極大地顯示了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的尊嚴與權威，有利於克服‘凡是’經學的巨大障礙，從而推動氣勢磅礴的思想解放運動’，繼而問責黃火青：‘您關於林彪一案的講話……是否保留有‘君過臣代’之類封建主義因素？是否做到了‘法不阿貴’？’這些豪言壯語既與全文基調不符，也不是林豆豆當年所用。”

那麼，請看林豆豆《給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黃火青的信》原件（見209頁影印件1）：

2、劉家駒文中說：“舒雲在改動的信中，竟然用了盛氣凌人的

口吻：‘有的同志……利用政治特權，並使這種特權深入到包括文藝界的社會政治生活各個領域，恃權凌法，不僅先入為主，而且先聲奪人……’

請看林豆豆原件（見 211 頁影印件 2）：

3、劉家駒文中說：“我僅舉幾例。如：‘江青哭哭啼啼來找葉群，說‘反革命分子’已經快衝到主席住處，高喊‘抓住那個胖子’！

‘打死那個胖子’！他們喊的那個胖子就是主席……’這是我的原文，舒雲照抄不誤。”

請看林豆豆原件（見 213 頁影印件 3）：

4、劉家駒說：“又如：葉群對邱會作說：‘我勸 101（林彪）也去武漢，他說：‘鬧這麼大的亂子，我就不去，也沒本事處理。總理心臟不好，勸總理也不要。江青為什麼自己就不能去？’對我的這段文字，舒雲略加修飾，改為：‘林彪氣得發抖說：一個領袖這樣不爭氣，幹這種……鬧出這麼大的亂子！我就不去，也沒有本事處理這些烏七八糟的事。這是他自找的，我是個軍人，不能跟著他去丟那個醜。你（指葉群）也不要。總理心臟不好，每天累成那樣，勸總理也不要。現在國家這麼亂，有那麼多大問題需要總理來處理。主席在那裡為了出風頭，胡來，弄得中央領導只顧忙他個人的事去了，弄得黨不黨、國不國了！’“葉群在旁邊一直小聲勸他（林彪）說，你小聲點呀，這些話要是被竊聽了，不得了呀。”

請看林豆豆原件（見 214 頁影印件 4）：

5、劉家駒說舒雲竊取了劉的未完成稿，添加進《給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黃火青的信》一文中。劉說我的原文是：林立果說，主席在武漢演這場戲，整陳再道，不是整陳再道一個人，而是為了做給軍隊看的。那麼多群眾互相殘殺，死於非命，地方那麼多老幹部和陳再道等軍隊老幹部被鬥得那麼慘，家破人亡。他還在尋歡作樂！這太重色輕國了！與幽王無故點烽火有什麼區別？！總理、首長（林彪）和軍隊把他救護出武漢，他不放心，也可能不好意思回北京，卻去了上海，住在最高級別墅裡，由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他們陪著。可是他一天也離不開……就叫汪東興用專機把劉某某等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黄火青同志

从九月廿八日《光明日报》上读到您九月二十七日在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上的建议和发言，对您的建议和发言，我们首先表示热烈欢呼，也感到震惊和遗憾。热烈欢呼的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准备就江青反革命集团^案提起公诉，这是天经地义，天经地义的了，极大地显示了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尊严与权威，有利于克服“凡是”经学的巨大障碍，从而推动气势磅礴的思想解放运动。这一思想解放运动顺应历史发展的任何势力也不可能使之根本逆转的必然潮流，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在这一思想解放运动中，必将解决全国人民早就迫切盼望解决的对大串生献给了中国的毛泽东同

地址：郑州市航海路东段

电话：3314

电报：3314

http://www.cen.cn/50222

影印件 1-1

一语道破真实情况，应当揭露一切支吾搪塞和障眼手法！使人民群众非常清楚地了解问题的实质。”您的讲话，是否回避④和掩盖了十年“文化大革命”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的根本真相？您的讲话显然是带政治性的，可是，“正视真实情况，这在政治上永远是最好的唯一正确的原则。”您关于林彪一案的讲话，是否符合马列主义的这一基本原则？是否保留有“君建臣代”之类封建主义因素？是否做到了“法不阿贵”？林彪没有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谋害有伟大历史功绩的毛泽东同志，反诬其为罪；江青席生一伙谋害、诬陷林彪，倒莫其无罪。这是否坚持了“对于任何公民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允许有任何特权”这一检察工作的基本原则？是否受了某种利害和封建个人迷信

地址：郑州市陇海中路东段

电话：22106 22009

blog.sina.com.cn/sy2222199

影印件 1-2

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阶级的革命”，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理论，关于“基本路线”、“全面专政”、“一分为二”、“斗争哲学”，关于把党和国家领导人当做所谓“帝修反在党内代理人”¹⁶等理论存在着根本分歧。

封建个人迷信时期江青、康生他们对此倒是非常敏感，以至由于这种根本分歧引起了越来越激烈的党内原则斗争。闭眼不看其党内原则斗争的举目共睹的严酷事实，执行法律怎么说得上忠实于事实呢？

“陈旧的东西总是力图在新的形式中得到恢复和巩固。”有的同志由于封建专制主义的遗毒等种种原因，利用政治特权，并使这种特权渗入到社会政治生活的各个领域包括文艺界，¹⁷搞独裁，不仅先入为主，而且先声夺人。

地址：郑州市航海马路东段

电话：23106 22559 22448

电报挂号：4111

影印件 2-1

人，总是无视事实真相，把自己的双手洗得干干净净，然后把脏水泼在林彪一身。借以转嫁和掩盖真凶的早已引起人民普遍愤慨的现实和历史的官僚主义、封建买办主义、宗派主义种种特权。不准别人讲事实，不准接触真实情况，回避平反的事实，回避多次事实的惨痛教训，回避吸取教训的严重责任。把客观存在的事实作随风转舵的、按我所需的解释，采取假花假木，张冠李戴甘江青、陈希一伙惯用的手段，把林彪上面那句话中带根本立场、观点性的“我们原事”四个字拦腰砍掉，重新编了一句话。七七年中央文件早就出现了这样的一段奇文：

“‘的干部’的这个反革命政治纲领（指“老干部——民主派——走资派”），是《林彪

地址：郑州市陇海马路东段

电话：23106 22559 22148

电报挂号：1111

61

自带部队劝阻群众，汪东兴他们要求毛泽东离开武汉。毛泽东不同意，但又不准让群众知道他住在那里。汪东兴、姚依林等人向北京告急。周恩来知道后，从北京劝毛泽东马上离开武汉。在北京的江青也劝毛泽东离开武汉。毛泽东还是不肯离开。这时江青哭哭啼啼来找叶群，说“反革命分子”已经快冲到主席住楼，高喊“揪住那个胖子！”“打死那个胖子！”他们喊的那个胖子就是主席……江青哭死哭活地要求林彪、叶群视自去武汉保证毛泽东的安全。总理视自找了林彪，他们商量怎么使毛泽东离开武汉，以保证他的安全。

叶群对林彪说：武汉形势非常严重，主席的安全面临很大的危险，总理召开紧急会议，提议你出面给主席写封信，劝主席及时离开武

001213 83 11

地址：郑州市陇海马路东段

电话：23106 22559 22148

电报挂号：1111

41

江青要你和我也去怎么办？大祸了！

林彪气得发抖说：一个领袖这样不争气，干这种丢脸的丑事，闹出这么大的乱子！我就不去，也没有本事处理这些乌七八糟的事。这是他自我的，我是个等人，不能跟着他去会那个丑。你也不要去。总理心脏不好，每天累成那样，劝总理也不要去。现在国家这么乱，有那么多大问题需要总理来处理。主席在那里为了出风头，胡来，弄得中央领导只顾忙他个人的事去了，弄得党不党、国不国了！谁的话他也不听，他更不会听我的，我什么事也管不了，我也没办法——

叶群在旁一直小声劝他说：由你小声臭呀，这些话要是被家听了，不得了呀。你脑子里也千万别装这些东西，不然，你这个性子，到时

地址：北京市晓海马路东段

电话：23106 22559 22148

电报序号：4111

影印件 4-1

候整不住，就冒出来，就闯闯大祸了！

林彪还是大声说：江青自己为什么不去？

叶群说：她还怕不是怕死，现在群众恨死中央文革了，她去了，群众照样揍她。

叶群说：我也不愿去。如果主席真有那种丑事，去了我怎么说话？

林彪说：保证主席的安全，避免流血事件发生，你立即告诉陈再道，吴法宪，余立金，要部队不惜一切代价绝对保证主席的安全，保证避免流血事件……

接着林彪根据他和周恩来磋商的结果，看了武汉地区的军事地图后，立即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劝其速离武汉，并派刚被揪斗过的邱会作和余立金同志带上去立即乘飞机去了武汉。

林彪、叶群找他们专门谈了话，要求他们

地址：郑州市陇海马路东段 电话：23106 22559 22448 电报挂号：4111

人立即送到上海，藏在一個小樓裡，怕江青知道，弄得江騰蛟、余立金很為難。他把好心好意保證他安全的陳再道弄到北京鬥得那麼慘，他疑心太重了！他容不得別人對他有任何不同意見，除了江青和幾個“秀才”，他誰也不相信。

請看林豆豆原件（見 217 影印件 5）：

一葉而知秋。以上劉家駒指責舒雲“翻新改造”和“深加工”的所有內容均出自林豆豆的親筆！舒雲實在沒有這份能力和必要，編造林豆豆的申訴材料。更何況，當事人林豆豆和張清林都還健在，舒雲有什麼理由和膽量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偷梁換柱？如果劉先生依然指責舒雲弄虛作假，那麼請劉先生拿出自己的證據，證實舒雲提供的以上林豆豆原件是假的，而非空口說白話胡亂入人以罪。

順帶一提的是，本人從未見到過劉家駒先生所言的未發表的《驚破毛澤東的霓裳羽衣曲》，何來抄襲、剽竊之說？本人手頭的林豆豆、張清林幾百頁的原件上也沒有劉先生的一筆一劃，說我“偷抄草稿冒充史料”，實乃子虛烏有。

邪路乎？正路乎？

劉家駒先生在《我寫林彪傳的遭遇》一文中，盛讚了幾位林彪事件研究的海外學者。其實，這幾位學者也是我極為讚賞和尊敬的學人，而且他們幾位同樣也是我的朋友。然而，劉先生竟然指責說“與這些真誠的、有責任感的學者相比，舒雲走的是一條邪路。”真不知此話從何說起。

舒雲在林彪事件研究中到底走的是一條什麼路？我可以問心無愧地說，我走的是一條艱辛、曲折，但又是光明正大的路。

20 世紀 80 年代初經中央書記處、中央軍委審批立項《彭德懷傳》、《賀龍傳》、《聶榮臻傳》、《葉劍英傳》、《陳毅傳》、《徐向前傳》、《劉伯承傳》、《羅榮桓傳》等八位元帥傳記，由當代中國出版社出版，林彪卻被排除在外。朱德是黨和國家領導人，他的傳記由中央文獻研究室負責。至於解放軍出版社，沒有出版元帥傳的任

后门，后门就被好闹哄的群众堵着。叶军是金事后对我说：“真是好险啊！就是几分钟！”

部队严格按照曾视察机场的周总理的指示，不叫口号，安静坐在地上甘受求，层层围坐在机场四周。部队有的干部要求毛泽东见，部队毛泽东没露面，也没吭气，在那非常紧张、肃静和神秘的气氛笼罩下，悄悄径直上了飞机。本来，早在“文化大革命”前就有毛泽东不能坐飞机的中央决定，这次因无法通过火车站，据说特殊紧急，要求毛泽东破例坐飞机了。在李立军甘陪护下，按照毛泽东的要求，飞机直抵上海。汪东兴、张改英安排刘素媛去上海，把她和密藏在一个高级小楼里。毛泽东由张青格、姚文元等人陪侍。我亲眼听到当时空四师的江腾蛟和李立军等人是怎样为刘素媛的。

地址：郑州市陇海马路东段

电话：23106 22559 22148

电报挂号：4111

事件真相中，比较起来，还只是件小事。关于此事，我不在观瞻，均听他人所说，且记忆有限，以核实为准）。

但是林主席说：主席在武汉这场戏，在陈再道，不是陈再道一个人，而是为了做给军队看的。那么多群众互相残杀，死于非命，地方那么多老干部和陈再道等军队老干部被斗得那么惨，家破人亡。他还在寻欢作乐！这太令人轻蔑了！与幽王无故莫峰尖有什么区别？！总理、首长（指林彪）和军队把他救护出武汉，他不放心，也可能不好意思回北京，却去了上海，住在最高级别墅里，由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他们陪着。可是他一天也离不开女人，就叫汪东兴用专机把刘（刘少奇）立即送到上海，藏在一个小楼里，怕江青知道，弄得江腾蛟、

地址：郑州市陇海马路东段

电话：23106 22559 22148

电报挂号：4111

影印件 5-2

務，更不可能出版《林彪傳》。至於劉家駒提到的王長龍，已去世多年，他生前在解放軍出版社負責出版將帥回憶錄。

中央軍委指定八位元帥曾經工作過的單位組成編寫組，聶榮臻曾在華北軍區工作過，他的傳就由北京軍區政治部負責，魏巍擔任組長。1985年聶榮臻傳記組重新成立，還是由魏巍牽頭。我有幸參加了《聶榮臻傳》的編寫工作，負責撰寫聶榮臻建國初期和“文化大革命”兩章。經中央辦公廳主任批准，我得以到中央檔案館查閱史料。在我查閱的大量史料中，我讀到過八屆十二中全會的原始記錄。我還到軍委檔案館及一些相關檔案館查檔案，蒐集到了很多寶貴的資料。同時，我採訪了幾百位老同志。戰爭年代有“林聶不分家”的說法，我也先後採訪了林彪秘書夏桐、譚雲鶴，總參軍務部部長蘇靜等，林彪和葉群的親屬林肖俠、葉鎮等。他們在談到聶榮臻時，也談到了林彪。我也聽到部分老同志對《聶榮臻回憶錄》中關於林彪的部分不滿，認為林彪並非如今官方所描述的那個樣子。所以我在寫“抗美援朝”和“文化大革命”部分時，特別注意不醜化林彪。當然我寫的是初稿，我沒有權利定稿。

從上個世紀九十年代起，我開始重點關注林彪與林彪事件，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林彪還是一個不能逾越的禁區，從事這方面的研究不僅面臨了諸多意想不到的困難，而且還有相當大的政治上的壓力。為了逐步衝破禁區，我先從“林彪事件”中的小人物著手，走訪林彪256號專機師的家屬、親友，以及那些受到牽連的專機師成員，經我走訪的當事人有幾百位之多，我記錄下他們的回憶，不少人還留下了錄音、錄像、照片等資料。在2002年的《報告文學》上連載了我寫的《噩夢“九一三”——“九一三”幾個小人物的命運悲劇》，後來我又寫了《“九一三事件”謎中之謎》，這兩篇文章均收入丁凱文主編的《重審林彪罪案》一書。2006年8月，明鏡出版社出版了我的《林彪事件完整調查》；2007年5月，明鏡出版社出版了我的《林彪畫傳》；2009年9月，明鏡出版社出版了我與李德先生合作編著的《林彪日記》。2011年9月，明鏡出版社出版了我的《百問“九一三”》等。

已故史家王年一教授這樣評論我的《林彪事件完整調查》：

“所有接觸過林彪事件的人，不論觀點如何，都有一個共識：疑點太多，且難於破解。研究林彪事件，何者最為重要？用一句老話來說，要‘以事實為根據’。事實是根本，是生命，是第一位的。對同一個事實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但畢竟‘事實勝於雄辯’。充分的、確鑿的事實可以說明一切。中國史學界過去討論過‘論從史出’和‘以論帶史’的問題，結果認為史學研究只能‘論從史出’，離開了事實只能胡說。舒雲女士正是抓住了根本，她努力在弄清事實上下功夫。現在呈現在讀者面前的這一本書，就是她心血的結晶。不管林彪事件如何複雜，在事實面前，一切胡說無所遁形。‘海納百川，有容乃大’，舒雲著眼、著力於採訪、調查，但並不摒棄分別人的發掘。幾方面的素材揉合在一起，乃成‘全景式的大曝光’。把一切放在陽光下，讓世人判斷。”

馬學磊在香港中大《二十一世紀》雜誌 2010 年 2 月號撰文《難以撥開的歷史迷霧》，該文說：“林彪事件真正能夠研究清楚，做到還原歷史的本來面目，需要檔案資料的大量開放和黑匣子的成功解密。但是，檔案資料的開放是很難的，而且即使開放了，檔案資料曾否被篡改也難以確定；何況黑匣子現在更不知身在何處。所以，這一事件的澄清看來會遙遙無期。但是，我們不能因此便放棄對它的研究。我們還要在資料不斷豐富的基礎上，站在公正的立場上，繼續探索。舒雲的這本著作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儘管有這樣那樣的不足，但是作者畢竟豐富了資料，而且提供了研究的新方法，開闊了研究的視野，對於這一事件的進一步研究，還是有一定作用的。”

對於本人所著的《林彪畫傳》，葉群的弟弟評價是他看到的林彪傳記中最好的一本。王年一的評論是“真實”、“深刻”、“忠於歷史”、“生動”。王老最後說：“舒雲是多產作家，她參加了《聶榮臻傳》的寫作，出版過《大將羅瑞卿》、《百戰將星楊勇》，寫過《林彪事件完整調查》。觸類可以旁通，水到則渠成，憑她多年對軍旅的瞭解和研究，成就了本書。我預祝本書成為經得起時間考驗的

佳作。”

身居美國的林彪問題研究史家丁凱文也對本人的著作給予很高的評價。丁先生曾發表《在歷史的細節上下功夫——讀舒雲〈林彪事件完整調查〉》、《林彪百年誕辰的最好紀念——讀舒雲〈林彪畫傳〉》、《一部極有價值的林彪年譜——讀〈林彪日記〉》。這些文章均發表在海外電子雜誌《華夏文摘》增刊“文革博物館通訊”上。

除了林彪事件研究之外，本人的研究還涉及到許多“文革”中的重要人物，如李雪峰、楊勇、羅瑞卿、許世友、傅崇碧、鄭維山、汪東興、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王洪文、張春橋、江青等，寫了幾十篇有關“文革”方面的文章，發表在國內一些重要刊物上，如《百年潮》、《黨史博覽》、《文史參考》、《神劍》、《廣州文藝》、《新華月報》、《文史精萃》等，還有不少文章發表在海外電子雜誌《華夏文摘》增刊“文革博物館通訊”上。不懷偏見的人都可看到這些文章或書籍，不戴有色眼鏡都會承認本人這些年來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果。

從 2005 年起，我在新浪網開辦了博客《舒雲探訪“九一三事件”》，這是國內第一個探訪“九一三事件”的平台，現在每天都有新博文，目前已有 4000 多篇博文。點擊量逐年上升，從每天幾百幾千到現在每天一兩萬，累計已達一千萬以上。

我走的這條路可以說是艱辛、曲折的，為此我付出了無數的心血、精力，自費走訪了全國各地所能找到的“九一三事件”當事人。

“九一三事件”過去幾十年了，當事人星散各地，尋找每一位當事人都非常不容易。有時打幾十個、幾百個電話才能尋找到一位當事人，約好了見面。但等你千里迢迢趕到，有時當事人卻改了主意，讓我吃了閉門羹——請人談“九一三事件”，不是談“過五關斬六將”，而是談“走麥城”，我非常理解。

我每年要外出採訪幾次，都事先做好“功課”，爭取順路多跑幾個地方，多採訪幾位當事人。為了節省旅費和時間，我都是夜間在火車上邊走邊睡，白天安排採訪。

眾所周知，探訪“九一三事件”需要承擔極大的政治風險和壓力，我的博客被“自願”刪過，我也被請喝過幾次茶了。

但是我堅信這條路絕對是一條正路，而非邪路。比起那些只會按照《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決議》和鄧小平“兩個凡是”來詮釋歷史的所謂學人，我充滿了自豪和自信。我更相信我走的這條路不僅帶給世人更多、更寬闊的視角看待我們的歷史，同樣也是對歷史研究的一份重要貢獻。

我信奉實事求是，不隱惡，不溢美，不說謊。當然，我的寫作與研究難免還存在著這樣或那樣的缺失，以及材料和認識上的局限，也還遠遠談不上盡善盡美，但是我堅守了學者應有的人品和操守，堅守了史學研究的真誠的風氣。這條路即使再艱難、曲折，我還會繼續走下去，因為它是我心目中唯一一條正確且光明的正路！

（舒雲） □

清明前，黃文廣在父親墳前點燃了自己的書以表祭奠。他說，撰寫這本書的目的有三，第一，希望償還對父親的虧欠；第二，希望在身為美國移民與擁有中國文化背景之間，找到平衡點；第三，希望讓美國讀者更瞭解中國——瞭解不應該僅是從政治體制上瞭解

紅小兵的家庭回憶： 從中國棺材講到中國變遷

一個強制火葬的時代，一位害怕死亡並堅持土葬的高齡祖母，演繹出一段跨越 30 年的家族故事。美國華裔作家黃文廣的英文著作《紅小兵：家庭回憶錄》（The Little Red Guard: A Family Memoir, Riverhead 出版）以幽默的筆調、流暢的情節、鮮明的人物，描繪出家庭中傳統與現代的衝突與中國的變遷。

獨特的題材：祖母的棺材

對大部分人來說，童年時陪伴自己入眠的，不外乎是父母親、童話書或布娃娃，但黃文廣早在 10 歲時，就有一樣特別的“床伴”——祖母的棺材，一放就是 16 年。《紅小兵：家庭回憶錄》就從黃文廣祖母朱秀英要求土葬說起。

短短三頁，黃文廣已將祖母的個性與形象生動呈現。1902 年出生的朱秀英有老腦筋，又帶著迷信。老人相信墓地的好風水能為黃家帶來幾世繁榮，這份對風水的堅信，造就了她對入土為安的執



黃文廣。(明鏡記者柯宇倩攝)

著，朱秀英甚至認真考慮如何成為回族人，以實現她的土葬願望。

對於祖母的要求，黃家歷經多次爭執，但爭執中，仍一步步地準備祖母的後事，有一日，棺材終於出現在黃家，從此陪伴黃文廣入睡，“新成員”來到的第一晚，黃文廣輾轉難眠；當時的黃文廣心想，身為一名紅小兵，他應該守護毛主席的革命部署，而非守護祖母的棺材。

黃文廣在接受《新史記》專訪時回憶起祖母，笑道：“她身體健康時，會說自己怎樣怎樣死，當她身體開始衰弱時，突然怕死了。地震時，我們說最不怕死的應該是她了，因為她有棺材，但她很害怕，叫我一定要背著她。”

朱秀英凡事以兒子為重心。當肺結核奪走丈夫生命後，她從此守寡。從小受紅色教育的黃文廣問祖母，是否覺得自己是孔子思想的受害者、被迫守寡時，黃文廣原本期盼祖母咒罵封建制度，但祖

母卻帶著不可思議的表情答道：“管什麼孔子？我只是不想讓兒子受後爹虐待。”

朱秀英的人生道路充滿挑戰，在這條崎嶇不平的路上，她展現出過人的韌性。丈夫逝世後，大兒子也遭死神眷顧，於是朱秀英將所有心力都放在小兒子黃志有，亦即黃文廣的父親身上。她帶著小兒子逃過長江洪水，逃過日本侵略，也逃過盜賊肆虐，到了山西，又抵達陝西，做過乞丐，也當過幫傭，直到中共接管中國。

“文革”時，政府打出“不能讓死人與活人爭地”的口號，禁止土葬，祖母的願望成了黃文廣家庭的爭執焦點，祖母的傳統、父親的矛盾、母親的現實思考，衝撞出一次次的火花，家庭成員見證著彼此的內心掙扎、見證了每個人的成長，也見證了生活如何跟著時代變遷而改變。

黃文廣對《新史記》說，其實，一開始《紅小兵：家庭回憶錄》只是個短篇。黃文廣總覺得自己身在一個最平凡的家庭，到美國後才發現原來他的家庭故事很奇特、有著許許多多的插曲，因而興起了寫短篇集的念頭，寫了一陣後，他發覺應該先觀察美國讀者是否對這樣的故事感興趣。

於是黃文廣在《巴黎評論》上發表了一篇以祖母棺材為題材的短篇，一個多月內，竟收到 30 多封美國讀者的電子郵件，許多人說，從黃的祖母的身上看到自己祖母的影子，雜誌編輯甚至讀得落淚，“我想，也許真能找到一種共鳴？”黃文廣於是決定將故事寫成長篇。

夾縫中的父親

黃文廣寫《紅小兵：家庭回憶錄》的目的之一，就是把故事獻給父親。黃文廣的父親黃志有在聽到母親的要求後陷入兩難，一來擔心自己的政治前途，二來又覺得有義務完成母親的願望。

1942 年飢荒歲月之後，黃志有成了共產黨的忠實支持者。1959 年開始，黨的書記鼓勵年輕人對官員提意見，改進黨的領導，



傳統中國的家庭長幼有序。

黃志有照辦了，被批評的書記從此對他態度冷淡，之後又以黃志有回家照顧摔傷腿的母親為由，說他將家庭擺在革命的前面，將黃志有革職。

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與孩子的生活，黃志有仍交出了入黨的申請表，1972年真當上了黨員。但是當聽聞朱秀英要求土葬，黃志有兩難極了。最終，盡孝道的義務佔了上風，黃志有從此背負起規劃母親後事的使命。

在黃家，朱秀英代表傳統，黃文廣象徵現代，夾在中間的父親，既有傳統精神，又有現代思維，處處透露出矛盾情緒。原先追隨共產黨、當上文化局幹部，因說了真話被革職，從此變得小心翼翼；雖然自己加入中共，但對兒子“要求進步”卻又警告再三。

從小學到高中，黃文廣都是紅小兵和共青團的幹部，但當黃文廣在政治活動上花了越來越多的時間時，黃志有擔心了，他提醒：“政

治像浮雲，重要的是學習真正的本事，能終生不忘、終生受益的本事。”在父親督促下，黃文廣學了各式各樣本事：書法、針灸、太極拳、小提琴……

對於在共產黨教育中成長的黃文廣來說，不只祖母的觀念老舊，父親也被他歸在老一代裡，當時的黃文廣，一點也不想成為父親那樣的人，但隨著年齡增長，他越漸發現自己身上有父親的影子。黃文廣對《新史記》回憶，當時中國處在“文革”到改革開放的過程中，父親代表老一代，他代表新一代，所以有點瞧不起父親，覺得父親一輩子活得很沒價值，如今回想起來感到愧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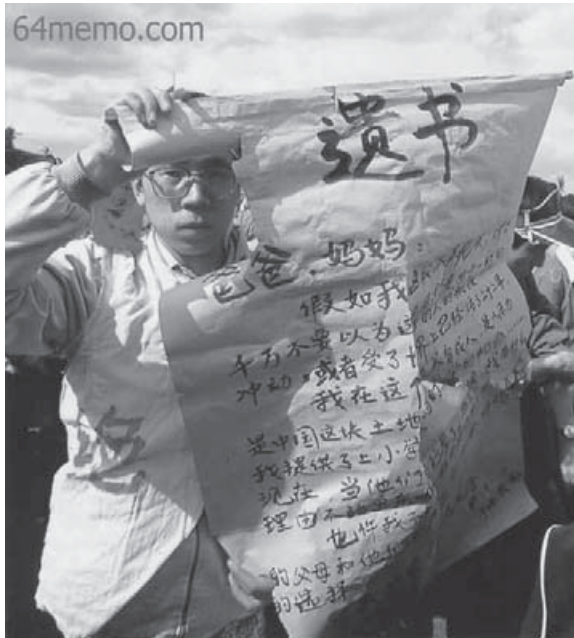
七十年代初期中國加入聯合國、尼克松訪問中國後，毛澤東指示幾所學校恢復教授英文課，才能幫助中國在國際舞台上與“帝國主義對抗”。1964年出生的黃文廣，是進入西安外語學校的第一批小學生，在該校一路升到高中，他所聽到的第一個英文單字是 socialism（社會主義），第二個單字是 revolution（革命）。

進入青春後，黃文廣總希望遠離家庭、遠離西安，考上復旦大學英語系後，黃文廣的願望實現了，在新環境、新思想的洗禮下，黃文廣的眼界也越來越開闊。他告訴《新史記》，從小，在中國傳統的教育下，他一方面聽從父母的指示，但另一方面卻想找機會逃離父母的管教，“文革”後，他是家裡的第一個大學生，也進入了中國一流大學，更覺得父母的觀念老掉牙，產生叛逆心理。

但父親多次的諄諄告誡，最後被證實是明智的決定——包括對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那一年，黃文廣正在復旦大學求學，學潮開始時，復旦的學生都不再上課，許多人自發上街，黃文廣回憶，感覺就像爆發了革命。

帶著滿腔熱血，黃文廣從上海趕到北京，但父親生前要黃文廣別出風頭的告誡在耳邊響起，6月4日前，黃文廣回到上海，躲過了北京的鎮壓。黃文廣對《新史記》說，若當時沒聽父親的話回上海，在那樣的激情氣氛下，他6月4日當天肯定會在天安門廣場。

黃文廣解釋，他想從一個普通參與者的觀點來看“六四”。“我現在會從另一種角度看‘六四’。當年我們確實富有激情，但不是民



學生絕食，意味著與中國傳統告別。但是，中國文化已經滲透到了生命根部。

主鬥士，沒有西方講的那樣崇高，也不是中國政府說的‘動亂份子’。我不覺得當時我們有多大的理想抱負，我只是一個積極、普通的參與者，參加‘六四’並非純粹為了政治，是覺得反腐敗是很愛國的行為，同時也因為大家都上街，有一種好玩、衝動、好奇的情緒。”

黃文廣說，“六四”對他來說是個成長轉折點，“六四”後他真正開始成熟、開始思考中國的出路。

寫書的原因之一：紀念父親

1988年父親去世時，黃文廣剛進入復旦大學新聞研究所。開學前，父親已臥病在床，黃文廣原想留在家中，但父親要黃文廣去求學。“你的前途更重要，”黃志有說。

高學歷沒教會黃文廣在喪禮上怎樣緬懷父親。那天，葬禮來了200多人，父親公司的領導講完話後，輪到身為長子的黃文廣講話，但他讓台下幾百雙眼睛失望了，曾幫同學寫過檢討書、替他人執筆演講稿的黃文廣，那一刻什麼話都說不出來。

“一方面因為過度悲痛，一方面也覺得沒什麼可說的，從小的教育就沒教導我們如何表達自己的感情，所以我當時竟想不出一句想講的話，只好行三個禮就下去。”

黃文廣對《新史記》說，家屬發表講話是葬禮很重要的一部分，因此大家都很吃驚，家人更覺得相當丟人。多年後母親與兄弟姊妹都不肯原諒黃文廣，“後來母親經常說，她參加某人的葬禮，誰根本沒上過大學，但說起話來都把人講得哭了。所以我多年來一直有種內疚，覺得虧欠我父親，在近幾年的尋根過程中，我越來越能體會到父親對祖母的孝道，還有對我年輕時的教誨。”

黃文廣將葬禮時沒說出口的話，寫進了書裡，黃文廣對《新史記》指出，寫《紅小兵：家庭回憶錄》一書，除了為父親正名外，也是對父親的報答。“寫書是一個很好的心理追尋過程，在整理記憶、修改書稿時，能把我跟父親、父親跟母親、母親跟祖母之間的關係慢慢理順。過去我不能理解父親為什麼花這麼多時間安排祖母的喪事，現在可以理解了。”

黃文廣 1982 年進入復旦大學後，1984 年前往倫敦學習，在還沒有太多留學生的時代裡，黃文廣的海外經歷對家人來說是件非常令人驕傲的事。1986 年，黃文廣自復旦英語系畢業，本有機會成為一名重要領導人的外國事務助理，但在父親堅持下，他並未踏進政治圈，而是回到陝西師範大學教授英語和英國文學，同時兼差英語家教。隨後，黃文廣又回到復旦，修讀新聞研究所課程。

1988 年，黃文廣在上海認識了來自美國的訪問學者克勞利（Robert Crowley），1989 年底，黃文廣在克勞利的協助下，取得美國伊利諾州桑格蒙州立大學（Sangamon State University in Springfield，現為伊利諾大學春田分校）研究所的入學許可，1990 年 2 月，黃文廣前往美國。

到美國後的黃文廣得以完全用自己想要的方式過生活。頭五年，一心想進入主流社會，與中國文化幾乎完全隔絕，他避開了最愛的豆腐和麵條，學著喜愛意大利麵；他模仿國家公共廣播主播的聲調，好擺脫中國人說英語的口音，黃文廣也儘量不到中國城、儘量不

與其中國移民在一起，甚至他的夢境都變成英語情境。取得公共事務新聞學碩士後，黃文廣在伊利諾州議會擔任記者，之後轉任企業公關，接著進入《紐約時報》……

1995 年黃文廣被《紐約時報》派駐回中國時，中文已講得很吃力了。“我像所有新移民一樣，當時就想成為一個美國人。我還被朋友笑話，說英文講得比中文好。”黃文廣對《新史記》回憶。

黃文廣對《新史記》表示，小時候不覺得祖母棺材和故事對自己的影響如此之深，當自己年歲越來越大，才越漸發現過去這段經歷在人生中所佔的份量。

隨著黃文廣年齡的增長，他發覺過去的經歷就像自己的中文口音一樣難以拋棄，一位俄國教授對黃文廣說，他年輕時幾乎已擺脫俄文口音，但當他年歲漸增，口音又漸漸回來了。對黃文廣來說，記憶的回放比口音的恢復更明顯，小時候的回憶經常一幕幕在黃文廣的腦中播放，清晰到他必須停下手邊的工作，讓回憶盡情湧現。

與許多華人接觸後，黃文廣發覺中國的印記在自己身上越發彰顯，他體會到，中國文化的影響是一輩子的。黃文廣對《新史記》說，他開始思考什麼才是真正的美國移民——“不應該是一下子就忘掉自己的文化、拋棄自己的根。”

現在的黃文廣，既對美國文化相當瞭解，也在自己身上保存了中國文化的根基，他在各大主流媒體都能非常愉快地講述華人的歷史。他體會，當他自豪於擁有中國文化的同時，思想也很美國化，因此他比一般美國人有豐富的精神生活。

從五、六年前開始，黃文廣上班時接觸的是美國的文化與政治事務，下了班後，黃文廣對中國的食品、文化、政治越來越感興趣，同時也逐漸關心起自己的家庭。帶著尋根的想法，黃文廣開始創作《紅小兵：家庭回憶錄》，並藉創作重新審視家庭成員的關係以及中國根源和家人對自己的價值和影響。

最痛苦的不是創作過程

2008年，黃文廣所在的公司關門，他失業了，在找到新工作之前有9個月空檔，他就利用這段時間醞釀寫書，專門回了西安兩趟。黃文廣認為，西安之旅是尋根的一個過程，他也回到祖母的祖籍地河南，瞭解過去大家族的歷史，找到過去的親戚，例如小時候被人販子騙走、後來嫁給煤礦工人的姨媽。

從姨媽的經歷裡，黃文廣領悟了祖母堅持和祖父葬在一起的原因。共產黨執政後，被誘拐的婦女都可回到自己的家庭，黃文廣的姨媽確實回到家了，但卻發覺那裡已經不是自己的家，她決定返回礦工家——那個有自己丈夫和孩子的家。

姨媽告訴黃文廣，自己所遭遇的最大悲劇不是被誘拐和虐待，而是失去母親，“就像我的母親，你的祖母不希望再獨自一人了。”姨媽說。

在尋根之旅時，黃文廣也獲知了一些從前一無所知的故事，像父親11歲時曾與一名16歲姑娘成婚，黃文廣的父親從未對他提過這件事。

黃文廣花了一個月的時間寫完《紅小兵：家庭回憶錄》草稿，又以一個半月修改作品，黃文廣告訴《新史記》，其實最煎熬的不是創作過程，而是醞釀過程，他曾有兩個多星期幾乎夜夜失眠，許多往事歷歷在目，各種情緒不斷湧出，有的是內疚，有的是氣憤。

此書最後一部分，描述黃文廣母親王桂英的晚年生活，屬於“虎媽”一型的王桂英，對黃文廣的管教相當嚴格。對於黃文廣祖母的土葬要求，王桂英總站在反對立場，在講求政治背景和出身的時代，王桂英總替家人的前途著想。

黃文廣對《新史記》表示，自己小時候不是母親而是祖母帶大的，因此與母親的關係一直較緊張，在寫作過程中，他也慢慢能理解母親的想法，以及為何母親與自己是這樣的關係。

從小與朱秀英相依為命的黃志有，母親的份量不言而喻。黃文廣在書中寫道：如果把“妻子和母親同時掉到水裡，你會先救哪一個”的問題丟給父親，相信父親的答案一定是先救母親。黃志有從沒帶妻子去看電影、去吃頓飯，或僅是散散步。

黃文廣認為，父親與祖母的關係就像英文小說《兒子與情人》所描述的故事一樣，書中的母親出身於一個有教養的家庭，之後嫁給一名礦工，在礦工變成酗酒狂後，母親也對丈夫感到非常失望，因而將所有的愛集中到兩個兒子身上，但大兒子不幸死亡，因此母親只好將所有的愛集中到小兒子身上，小兒子與母親關係太密切，沒法繼續愛其他人。

“祖母對父親的影響如此大，兩人一直住在一起，我覺得父親可能一輩子沒愛過母親。”黃文廣對《新史記》透露。但即使父母親吵架那麼激烈，誰也沒說過要離婚。

黃文廣的母親在黃志有去世一年後，與一位姓馬的男士開始交往，“沒有人像他那樣對我這麼溫柔體貼。”王桂英說。兩人最終克服了所有的流言蜚語，舉行了婚禮。黃文廣告訴《新史記》，母親每次講起與馬的交往，眼睛就發光。“我想那是她真正的愛。”只是沒想到九個月後，母親又是獨自一人了。

黃文廣認為，《紅小兵：家庭回憶錄》中最悲劇的其實是母親，“祖母等於我的代母親，所以我和母親實際上沒有正常的母子關係，丈夫和兒子對我她的愛都被剝奪了。”

從父親處得到文學啟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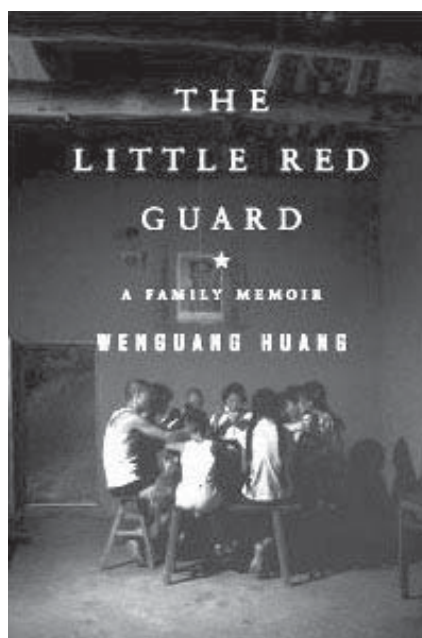
目前居住在芝加哥的黃文廣，白天擔任某企業美國總裁的講演稿撰寫人，平時則給《華爾街日報》、《紐約時報》、《基督科學箴言報》、《芝加哥論壇報》、《巴黎評論》等媒體撰寫中美議題的評論，2003年開始，黃文廣投入翻譯書籍的領域，第一本翻譯書為中國作家廖亦武的《中國底層訪談錄》，隨後有《上帝是紅色的》等，中國作家楊顯惠的《上海女人》（Woman from Shanghai）也由黃文廣翻譯成英文。

黃文廣對《新史記》表示，他試圖用娓娓道來的方式，自嘲式幽默、低調的手法來撰寫故事。“這才是真正的人生：人生不都是戲劇化、高潮迭起的。”

黃文廣開始對文學產生興趣，可追溯至小時候父親的口述故事。黃志有是個京劇戲迷，飽讀古書，經常對兒子講述各式各樣的故事，《紅小兵：家庭回憶錄》中不時穿插傳說故事，令整個故事更加生動。

黃文廣記得父親講述過，賣瓜的孫鐘由於幫助三名灰白鬍子的神仙，得到他們的回報，兒子孫堅後來統領吳國。黃志有想藉由故事鼓勵兒子幫助他人、孝順長輩，故事也確實對黃文廣影響極大：每當見到街上的遊民，尤其是灰白鬍鬚爺爺或衣衫藍縷的奶奶時，都要猜想他們的真實身分是否是仙人，而黃文廣通常確實會丟下幾塊錢，若有時忽視他們，則感到愧疚。

1976 年發生了許多事，先是周恩來病逝，接著發生唐山大地震，9 月時，毛澤東逝世，也在這一年，黃文廣有機會讀到許多舊書。10 月時，黃文廣的學校停課兩個月，在空蕩蕩的家中，黃文廣開始翻找父親的櫃子，發現一大疊 1950 年代京劇雜誌和書籍，黃文廣對《新史記》說，“文革”時代處於無書可讀的極度乾渴，因此父親的雜誌與書籍帶給他的影響很大。那段時間裡，他經常一讀就是幾小時。



《紅小兵：家庭回憶錄》

黃文廣收到《紅小兵：家庭回憶錄》的樣本書後，覺得一件大事告終，特地安排回西安一趟，在清明前把書燒給父親。黃文廣表示，他撰寫這本書的目的有三，第一，希望償還對父親的虧欠；第二，希望在身為美國移民與擁有中國文化背景之間，找到平衡點；第三，希望讓一般美國讀者更瞭解中國——這樣的瞭解不應該僅是從政治體制上瞭解。

讓美國讀者產生共鳴的故事

黃文廣對《新史記》說，過去許多談中國的書，講的是作者如何在“文革”時受迫害，但黃文廣身在一個普通人的家庭，“文革”中並未受到很大衝擊，因此他著重在中國如何從毛澤東時代走到改革開放，並從中找出一個美國人也能引起共鳴的部分。“雖然美國與中國政治體制不一樣、文化根源不一樣，但家庭觀是一種共性，其實真正的中國人和美國人沒有兩樣。”

黃文廣在積累多年的文字功力和洞察力後，第一次以作家身分闖蕩文壇就受到相當的關注。《紅小兵：家庭回憶錄》一書4月26日上市，上市前已掀起一股熱潮。《出版人週刊》(Publishers Weekly)將此書評為2012年春季10大最佳回憶錄；《基督科學箴言報》(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把此書列為2012春季最值得關注的非小說之一；《奧普拉雜誌》(The Oprah Magazine)將此書排為春季推薦10本書的第二名；《圖書館期刊》(Library Journal)則列此書為10大關注回憶錄之一。此書也被《舊金山記事報》(San Francisco Chronicle)選為最佳開頭語書籍之一。

4月26日書籍上市當日，《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金融時報》、《芝加哥論壇報》、《芝加哥太陽報》等多家媒體也刊出書評。

黃文廣對《新史記》指出，在華人故事中找到與美國文化的共通點，是他認為書籍成功的因素之一。“很多美國婦女讀者，對中國一點都不瞭解，但她們很喜歡這本書，因為這主要是一個家庭故事，

只是剛好發生在中國。”

黃文廣對說，他一直在探索如何把華人的文化介紹到美國。“目前很少有寫華人的回憶錄進入美國暢銷書行列，一個中國國內的海外文學經紀人曾告訴我，華人作品很難進入美國主流市場的原因，是因為很多中國的作品‘沒有腿’，沒辦法走出文化的障礙，跨不出中國或華人圈。”

“所以我沒有拚命講葬禮的細節、拚命講孝順，而是描寫一個人的成長、描寫對家庭成員的再認識，家庭的衝突和愛，從中找到共通的話題與價值觀。”黃文廣對《新史記》表示，希望這個關於人性、關於親情的故事能跨越文化隔閡，讓每個人都能從中找到共鳴。

至於華文讀者，黃文廣認為更能從故事中找到自己過去的影子。“這本書主要是對我父親一個再認識的過程，但我也想探討家中三個人物：父親、祖母與母親之間的關係，因為現在這樣的家庭結構很多，當父母忙碌時，祖父母幫忙照顧孩子，這話題對華人來說會更有共鳴。”

黃文廣在書中反映了幾個大事件，包括周恩來、毛澤東與胡耀邦的逝世，以及後者所引發的“六四”事件。黃文廣對《新史記》說，這些都是他一生中的轉折點，一點一滴改變著他的生活。

從共產主義到自由主義

黃文廣成長的時代，也是許多觀念相互摩擦碰撞的時代，“文革”時家庭倫理遭破壞，丈夫和妻子互相檢舉，兒女也能批鬥父母。從小受共產黨教育的黃文廣，在學校學得、在外面聽到的是一套，回到家後，對父母盡孝道的觀念又被放到第一位。

到了復旦大學後，黃文廣開始變成自由主義的追隨者，但在倫敦學習時，黃文廣坦承他的國家主義情緒又時常湧現，從小在學校習得的觀念並非能輕易抹去。

“我們受教育在‘文革’後期，被洗腦蠻厲害，但社會長期封閉後，我們又遇上鄧小平的改革開放，與上一代比起來，我們的世界

觀還沒完全成形時，就接觸到外來東西。我 20 歲到英國，後來到美國，在思想形成中，接受到各種各樣的思想，所以現在既有對小時候洗腦的記憶，又有西方的東西。”

黃文廣對《新史記》表示，他可說是受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影響的綜合體，但他也瞭解到，不管政治情勢如何變動，家庭都是社會中的穩定環節，而父母對兒女的愛，不管何時都能成為一個人的依靠。

或許就是因為成長過程中經歷許多思想的碰撞，黃文廣認為自己更有獨立思考的能力。“現在再看一些中國發生的事，更可以用客觀角度去看它，我如果在國內待著，可能看不到錯誤點或不理解事件的原因。”

黃文廣發覺的一個有趣現象是，許多在美國有成就的中國移民，反而是從小接受共產黨爭取平等、反對資本家教育的人。“這些人現在都比資本家更資本家。”黃文廣笑道。

下一本書談文學啟發

目前已習慣用英語思考、以英語寫作的黃文廣，認為用英文寫故事比用中文還簡單。“英文適合用來寫具體的故事，而不是用來描述華麗、張揚的事。”但用英語寫作、主要瞄準英文讀者市場，就必須在某些地方多作些一點解釋，好讓不了解中國背景的讀者更能享受故事。

黃文廣對《新史記》說，如果《紅小兵：家庭回憶錄》準備出中文版，他將加入一些華人更能理解的部分，並刪掉一些英文書中的段落。他說，他將從頭改寫，如果純粹把英文翻譯成中文，並沒有太大意義。“中文版的目標，是記錄我們這一代人的共同經歷，不過中文版的推出還在商議之中。”

曾獲 2007 年筆會翻譯基金獎的黃文廣，譯作可見於《巴黎評論》、《哈波斯》、《亞洲文學評論》等刊物。他將中文作品翻譯成英文時，也不會一字一句翻譯，而是會進行改寫，他說，中英文的寫



黃文廣：用英文寫故事比用中文簡單。（明鏡記者柯宇倩攝）

作思維非常不同，翻譯是一個再創作的過程，並不是英語能力好就能當翻譯的，譯者本身必須是個很好的英文作家，才能正確、流暢地將作者的原意表達出。

黃文廣目前正在構思第二本書。他對《新史記》透露，這一本將講述自己如何受到文學啟蒙。書中人物之一是一位比他大 10 多歲的女孩，喜歡寫作，喜歡外國文學。

在第二本書中，寄宿學校也會是個重點。“現寄宿學校在中國很普遍，我想講當年在寄宿學校的故事，通過故事讓讀者了解中國文化的特點、年輕人成長過程。”與《紅小兵：家庭回憶錄》一樣，黃文廣不打算從政治角度寫下一本書。不同的是，第二本書會是自傳體小說，而不是像第一本，百分之百是真實故事。

《紅小兵：家庭回憶錄》是個由風水觀念帶出的故事，黃文廣在書中花了許多篇幅描述祖母、父親、親戚與鄰人對風水的態度，

他自己則是年紀越大越相信風水。“雖然有迷信成分，但不必去追究到底是真是假，我不會特別在意所謂奇蹟是否發生。”

黃文廣對《新史記》說，他對風水的“相信”，是認為它對活著的人確實有存在的意義。“葬禮、婚禮都有各種各樣的儀式，特別是葬禮，要披麻帶孝、嚎喪、祭七七四十九天，對在世者來說，是一種很好的心理慰藉，也是很必要的過程。”黃文廣說，當人們行各種儀式時，就寄託了哀思、緬懷，覺得對於死者盡了些責任，放下內疚。

“就好像祈禱，當人無助時，總希望找到一個依靠，讓人抱有希望、解除心理負擔。”

黃文廣在書後提到了西安快速的城市化。這樣的轉變有正面意義，也有負面功效，過去三、四年回一次西安的他，如今每年都回去，最近一次是今年3月，每回西安一趟，黃文廣就越對自己的根，感到驕傲和瞭解。

不過，西安的負面轉變仍在持續。黃文廣對《新史記》介紹，西安給他的印象就是一個很古老的城市，遺憾的是，他每次回去都深深感受到西安在現代化、物質化過程中，主要是金錢、功利取向，許多中國文化的標識，遭遇被剷除的命運。“例如祖墳，它是相當神聖的，是一個與家族根源連結的東西，但現在中國人一心往錢看，把過去相當優秀的東西給拋掉了。”

黃文廣感慨，海外的人拚命尋找自己的根，國內的人卻破壞這個根。“現在到法國去，可以找到1800年代的紅酒店，但到大陸去，找不到百年老店。不過，追求發展和保留傳統之間的問題，是每個國家都會遇到的。”黃文廣對此也很無奈。

身為一位海外華裔作家，黃文廣認為自己得以從外部世界去看中國的過去，且看得更清楚、更客觀，同時可擺脫一些太過激情的情緒，但挑戰是如何讓自己的故事打動這些處在不同體制和文化下的讀者？這是黃文廣持續學習和努力的目標。（《新史記》記者 柯宇倩）□

“馬思聰的創作主題就是思鄉、愛國，三次到海外，三次又回到中國大陸，美國大使請他到美國，他都不去，結果‘文革’時被打成叛國者，被釘在叛國的十字架上……他內心痛苦可想而知！”麥子說

被打成叛國者的 愛國者馬思聰

與馬思聰一家有密切往來的前中新社駐紐約高級記者麥子，出於對中國著名音樂家馬思聰的敬仰，不但辭去工作，還六次自費買機票飛回廣州，協助籌備馬思聰音樂藝術館。在馬思聰誕辰百年之際，麥子對《新史記》回憶與馬思聰交流的往事，他嘆息，如今最令他感到可惜的，就是馬思聰的一家五口已完全凋零。

為弘揚馬思聰精神殫精竭慮

被譽為“中國小提琴第一人”的馬思聰，其動人的旋律陪伴著許多中國人的成長。2001年10月29日，馬思聰音樂藝術館籌建辦公室在廣州掛牌；2002年5月17日，該藝術館在廣州藝術博物院揭幕，500多平方米的空間裡，展出馬思聰的生平照片、手稿、過去使用過的鋼琴、小提琴、舊居模型等物。

馬思聰音樂藝術館能建成，要給麥子記上很大一筆功勞。本名麥啟凌的麥子，60年代畢業於中山大學中文系，擔任中新社駐美國高級記者達18年之久，是馬思聰在1985年獲得平反後，第一個



馬思聰

採訪馬思聰的記者，麥子在接受《新史記》採訪時表示，他從此寫了很多關於馬思聰的報導，並與馬思聰成了忘年之交，與馬家亦關係密切，因此當“馬思聰音樂藝術館”的想法出現後，麥子毅然決然提早退休，自費買機票飛了六趟廣州，與同是資深新聞人的魯大錚一起為馬思聰遺物的捐贈和建館奔走。

1912年5月7日出生於廣東海豐的馬思聰，是中國20世紀傑出的作曲家、小提琴家、音樂教育家。麥子在其中穿針引線，終讓馬思聰的全部遺物，包括700頁的手稿、葉淺予、張大千等人的字畫、三把名貴的小提琴，都捐給了馬思聰音樂藝術館。其中有一把是意大利的200多年古琴，全世界已所存無幾，一把在梅紐因手裡，一把在馬思聰手中，馬思聰不論走到哪都帶著它。此外，一些大陸孩童寫給馬思聰的信，馬思聰收到後將信轉給麥子，麥子後來連同馬思聰的親筆稿都交給了馬思聰音樂藝術館。

馬思聰是中共建政後第一任中央音樂學院院長。他11歲時就跟隨大哥馬思齊赴巴黎學習小提琴，15歲時考入巴黎國立音樂學院小提琴班，是中國第一個留學該學院的學生，也是年紀最輕的留學

生。兩年後，馬思聰回到中國，在南京、上海、香港、廣州、台北等地舉行音樂會，被譽為“音樂神童”，1931年，馬思聰重返巴黎學習作曲，1932年，創辦私立廣州音樂學院並任院長，翌年出任南京中央大學藝術系講師，4年後被聘為廣州中山大學教授。

馬思聰創作了大量不同體裁、膾炙人口的樂曲與歌曲，代表作品有小提琴《思鄉曲》、《西藏音詩》、管弦樂《山林之歌》、《晚霞》、歌劇《熱碧亞》、管弦樂《阿美組曲》等，其中《思鄉曲》最廣為流傳。

麥子對《新史記》表示，馬思聰的藝術造詣非常高，其最著名的《思鄉曲》，是當時大陸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對台灣廣播的開播曲，每天早上都回蕩著深摯悠揚的曲調；當時大陸少年兒童唱的《中國少年先鋒隊隊歌》，也是由馬思聰作曲。

出國是政治，回國也是政治

但這樣一位遐邇知名的藝術家，在“文化大革命”時卻被逼得走投無路。

麥子對《新史記》指出，1948年，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到馬思聰的住所，告訴他，“中國就要落到共產黨手中……如果你願意把美國作為你的第二祖國，我馬上就可以把你和你的家屬送到美國。美國的大學，樂於聘你為教授”，但馬思聰拒絕了。

留在家鄉的馬思聰，卻沒有想到，在“文化大革命”中竟被打成“牛鬼蛇神”、遭批鬥抄家。紅衛兵宣稱馬思聰“姓馬，就應該吃草”，逼著德高望重的院長跪在地上啃草，他的肉體受到極大摧殘，人格受到極大凌辱。無處容身，被逼無奈，1967年1月與妻兒冒險偷渡到香港，再搭專機到美國弗吉尼亞，最後居住在費城地區。

馬思聰到美國後，在紐約舉行了中外記者會，告訴大家為什麼自己逃離中國，他親身經歷的“文革”血淚交迸的真相，轟動一時。中國公安部在馬思聰出走後寫了《關於馬思聰投敵案請示報告》，嚴厲追查，幾十人因而入獄。麥子說，馬思聰在上海的二哥跳樓身亡，

岳母、侄女和廚師相繼被迫害致死。

“文革”噩夢終於結束。1984年10月，中央音樂學院向公安部、文化部提交三份報告，希望給馬思聰平反，11月，時任中央音樂學院院長吳祖強到美國拜訪馬思聰，這是馬思聰離開中國18年後見到的第一位以官方身分前來拜訪的大陸人，其後，馬思聰的作品終於得以在大陸演奏，但他本人想回大陸的心願卻遲遲無法實現。

麥子對《新史記》表示，馬思聰抵達美國20年間，一直想回中國大陸；1985年，馬思聰獲得平反，當時馬思聰已在美國待了19個年頭，他對麥子說，他好像蘇武牧羊19年，只是“美國不是貝加爾湖”。馬思聰還說，他全中國都走遍了，但他沒去過西藏，他很想到喜馬拉雅山巔拉琴，讓全世界都聽到他的琴聲。

“但他的情況複雜，比如台灣不想他回去。”麥子解釋說，台灣時任僑委會主任曾廣順和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理事長谷正綱都曾打越洋電話，勸馬思聰不要回中國大陸，因為馬思聰是受共產黨迫害後偷渡出來的，一旦返回中國大陸，會動搖他們“反共復國”的基礎。

“在馬思聰居住的費城，有六個社團請他們全家吃飯，也規勸他不要回去。當時的《世界日報》發表多篇社論，都在勸馬思聰不要回中國大陸。”麥子對《新史記》說。

另一方面，麥子認為中國大陸在讓馬思聰回國的事情上也做得不好。馬思聰的歌劇《晚霞》到台灣演出後受到矚目，馬思聰希望該劇也能到大陸演出，當他把台灣演出的光碟交給北京後，卻石沈大海，因此馬思聰對大陸所謂“對他好”的說詞抱持懷疑。

1986年秋天，馬思聰終於計畫返回中國大陸了，但沒多久就病倒了。1987年，馬思聰生病住院，後轉為肺炎並引發心臟病，醫生以為開刀後馬思聰的病情將好轉，但馬思聰竟在手術台上過世，當天是1987年5月20日。

馬思聰逝世後，骨灰一直安置在費城附近的華盛頓公墓，2000年，馬思聰夫人王慕理心臟病發過世，2002年，馬思聰女兒馬瑞雪病逝，母女的骨灰同樣放置在華盛頓公墓。2007年，在麥子協助下，

馬思聰夫婦的骨灰終於越過太平洋，回到他朝思暮想的故鄉，安葬在鹿湖之畔。

一介書生戴帽何其多

麥子對《新史記》回憶，他自兒時開始，便“認識”了馬思聰。
“我還沒讀書時就唱《思鄉曲》，很動人的一首歌，但當時並不知道作曲者是誰。之後，我唱《中國少年先鋒隊隊歌》。第三，馬思聰在中山大學教過書，我也是中山大學的學生，1960年，馬思聰跟老婆到中山大學演出，我沒錢買票，就趴在窗口聽他們的演奏，那是我第一次親眼見到馬思聰。”

馬思聰到美國後，在美國發表聲討“文化大革命”的劇本，麥子看到劇本後十分感動，對馬思聰的愛國情操很是欽慕。當麥子知道馬思聰獲得平反後，他馬上跟馬思聰聯繫，成為他平反後第一個採訪他的記者。

1994年榮獲全美“最佳新聞報道一等獎”的麥子，在中國當過編輯、教師，也是一名作家，著有《馬思聰最後20年》和以馬思聰為主角的長篇小說《懸崖上的愛情》，以及《鏡頭對準美國》、《美國名校巡禮》、《美國華人群英錄》等書。1984年進了中新社後，麥子採訪過許多名人，包括江澤民、李鵬、克林頓、布什、張學良、趙曉蘭、林青霞、劉曉慶等。

麥子告訴《新史記》，馬思聰從中國大陸出來20年，一直不願接受大陸記者採訪；而因為馬思聰被認為是叛國逃美，因此即使大陸記者採訪了，也無法在大陸媒體刊出。

別的大陸記者無法採訪到的馬思聰，為何接受麥子的採訪邀約？麥子講述了經過：“當時其實我不知道他人在哪裡，所以就試著從大使館、領事館打聽，他們給了我馬思聰弟弟馬思宏的電話，馬思宏又給了我馬思聰的電話，讓我試一下。”

電話打通後，麥子用廣東話對馬思聰說，他曾是中山大學的學生，一下子拉近了兩個人的距離，也順利約定採訪。麥子對《新史

記》說，能不能採訪到重要人物，就看記者的本事，他當時已經是老資格的記者，採訪過很多名人，也累積了一定的聲譽。

“一個記者靠的就是寫出的報導不能誇大，也不能縮小，必須符合受訪者的想法，如果亂寫，下次就沒有採訪機會了；相對來說，如果稿子寫得好，下一次的採訪就好辦了。”麥子這樣總結。

麥子對《新史記》回憶，他第一次拜訪馬思聰時，送了一束鮮花給他，接著用廣東話祝賀他：你獲得平反了，叛國的帽子摘了。馬思聰很高興，同時也感嘆：自己一介書生，沒想到會給他戴這麼“光榮”的帽子。

麥子印象中的馬思聰，為人正直，不會阿諛奉承，也不善言談，不會滔滔不絕。不過，與馬思聰熟識後，馬思聰開始向麥子吐露更多的心裡話。除了一直想返回中國外，馬思聰很反感葉永烈在《馬思聰傳》中寫他“住老人公寓、靠救濟金生活、門可羅雀、晚景淒涼”云云。馬思聰說，這樣的描述，讓他有何顏面回去見江東父老？

周恩來最遺憾的兩件事之一

這幾年，麥子主要為“馬思聰音樂藝術館”奔走，曾任馬思聰基金會秘書長，藝術館建好後，麥子也功成身退，現在則擔任美國商會副會長、廣東省海外交流中心的海外理事。

這幾年麥子也寫作了關於馬思聰的兩本書。其中以馬思聰為主角的小說《懸崖上的愛情》因寫到“文化大革命”等敏感情節，最後的版本被刪了兩萬多字，麥子對此感到相當無奈。

麥子對《新史記》表示，馬思聰在美國 20 年期間，生活比較儉樸，除了演出就是創作，寫了 7000 頁的手稿，包括兩個歌劇——《晚霞》、《熱碧亞》、一個芭蕾舞劇，以及許多有愛國思想的歌曲，想把過去失去的創作時間都要回來，連舊金山音樂學院想聘請他當教授，他都因為想專心創作而予以拒絕，可惜《熱碧亞》剛創作完就逝世。

“馬思聰人生最後 20 年是他比較集中創作的時期，他的創作主題就是思鄉、愛國，馬思聰是個愛國主義者，三次到海外，三次又

麥子的小說《懸崖上的愛情》涉及“文革”被刪兩萬多字，麥子相當無奈。（《新史記》記者柯宇倩攝）



回到中國大陸，美國大使請他到美國，他都不去，結果‘文革’時被打成叛國者，被釘在叛國的十字架上；一個愛國者，被打成叛國者，他的內心痛苦可想而知！”麥子說。

麥子對《新史記》回憶，1971 年中美建交前夕，美國國務卿基辛格到北京，與周恩來會面，與馬思聰私交密切的周恩來說，這一生有兩件事讓他深感遺憾，其中一件事就是馬思聰 50 多歲了還離鄉背井跑出了國。

目前畫作可賣到天價的中國著名畫家葉淺予，亦是馬思聰的好友，他曾說過：“馬思聰不欠祖國什麼，而那些篡國奪權的人卻欠他很多很多。”詩人柯靈則說：“在‘文化大革命’的祭壇上，傅雷老舍的死最沉痛，馬思聰的逃亡最慘烈。”

麥子感嘆，現在中國已經很少提及馬思聰，年輕一代對這位偉

大的音樂家不了解，當麥子到各大學演講時，問學生：馬思聰是誰？台下鴉雀無聲，一名學生問：“馬思聰是不是馬克思的什麼人？”只有一名學生後來才說：“是一名音樂家。”

麥子至今仍致力推動馬思聰的各種紀念活動，讓馬思聰的精神永存人們心中。2012年，麥子等人在紐約舉行了一場馬思聰紀念會，播放電影，吸引了100多人參加；美國的新澤西、賓州等地也都有紀念活動或演出。

如今，馬思聰的兩個女兒、一個兒子都已逝世。2011年12月9日，馬思聰在世上的最後一個孩子馬如龍，因為患肺癌全身轉移而病逝。馬思聰身後如此蕭索，是令麥子最感遺憾的事。（《新史記》記者 柯宇倩）□

先是毛澤東一再鼓吹鳴放，解除人們顧慮，而後提出中共要整風，最後請黨外人士幫助整風——這一套連環計顯得非常完整，合情合理。這時毛澤東從前台退到後台，他就像一個漁夫布了網，放長線，然後等待時機，等待魚兒上鉤，隨時收網

毛澤東精心策劃 “陽謀”的步驟

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揭露了斯大林的罪惡，這個行為卻衝擊了遠在中國的毛澤東，從此赫魯曉夫像幽靈似地跟著毛澤東，讓他寢食不安，之後所發動的重大政治運動可以說與赫魯曉夫現象都有著千絲萬縷的關聯。毛澤東認為赫魯曉夫現象的產生是接班人問題沒有解決好，匈牙利事件和波茲南事件的發生是因為肅反不徹底而引起的，因為還有那麼多的反革命沒有搞掉。因此，要使赫魯曉夫似的人物絕跡就必須深挖隱藏的反革命分子。毛澤東經過深思熟慮精心策劃了一場大“陽謀”——反右鬥爭。

大張旗鼓宣傳“雙百方針”

1956年4月28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以上提出：藝術問題上的“百家齊放”，學術問題上的“百家爭鳴”，也就是大家熟悉的所謂“雙百方針”，應該成為中國發展科學、繁榮文學藝術的方針。



毛澤東 1957 年 2 月 27 日在最高國務會議上作“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講話。

5 月 2 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又把“雙百”方針提出來。5 月 26 日，當時的中共中央宣傳部長陸定一在中南海懷仁堂召開中國著名的自然科學家、社會科學家、醫學家、文學家和藝術家共兩千人的大會上，做了《百家齊放、百家爭鳴》的報告，之後經毛澤東親自審閱修改，於 6 月 13 日在《人民日報》上發表。陸定一說：

中國共產黨對文藝工作主張百家齊放，對科學工作主張百家爭鳴，這已經由毛主席在最高國務會以上宣布過了。……要使文學藝術和科學工作得到繁榮的發展，必須採取“百家齊放，百家爭鳴”的政策。文藝工作，如果一花獨放，無論那朵花怎麼好，也是不會繁榮的。

我們的歷史證明，如果沒有對獨立思考的鼓勵，沒有自由討論，那麼，學術的發展就會停滯。反過來說，有了對獨立思考的鼓勵，有了自由討論，學術就能迅速發展。

我們所主張的百家齊放，百家爭鳴是提倡在文學藝術工作和科學研究工作中有獨立思考的自由，有辯論的自由，有創作和批評的自由，有發表自己的意見，堅持自己的意見和保留自己的意見的自由。

9月劉少奇在中共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作政治報告時，重申了黨的“雙百”方針：

為了繁榮我國的科學和藝術，使它們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黨中央提出了“百家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科學上的真理是愈辯愈明的，藝術上的風格是必須兼容並包的。黨對於學術性質和藝術性質問題，不應當依靠行政命令來實現自己的領導，而要提倡自由討論和自由競賽來推動科學和藝術的發展。

陳其通不懂毛澤東的心

毛澤東如此別有用心地大張旗鼓地宣傳“雙百”方針，但是響應者寥寥無幾。這是由於毛澤東執政以來，發動了不少政治運動，而知識分子總是運動的對象，在每一場的政治運動中不是被整得灰溜溜的就是被打掉精神的脊梁骨。胡風事件就是一次旨在打壓知識分子的“文字獄”，為此不少的年輕有為的知識分子獲罪而入獄，這事件發生在兩年前的1954年，全體中國知識分子對此還是記憶猶新，心有餘悸，個個成了驚弓之鳥，失魂落魄。還有誰敢“鳴”和“放”？大家都“怕是個圈套，搜集些思想情況，等又來個運動時可以好好整一整”。只有個別的年輕人，初生牛犢不怕虎，在“雙百”方針鼓勵下，寫一些所謂“偏激”的作品。如王蒙的《组织部新來的年輕人》。另一些人不明事理而反對“雙百”方針。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長陳其通及其同事馬寒冰、陳亞丁、魯勒四人聯名於1957年1月7日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我們對目前文藝工作的幾點意見》。陳其通等人認為：

在過去的一年中，為工農兵服務的文藝方向和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



陳其通(右)當年差點壞了毛澤東的“陽謀”大計。

創作方法，越來越很少有人提倡了。

真正反映當前重大政治鬥爭的主題有些作家不敢寫了，也很少有人再提倡了，大量的家務事、兒女情、驚險故事等等，代替了描寫翻天覆地的社會變革，驚天動地的解放戰爭，令人尊敬和效法的英雄人物足以教育人民和鼓舞人心的小說、戲劇、詩歌，因此，使文學藝術的戰鬥性減弱了，時代面貌模糊了，時代的聲音低沉了，社會主義建設的光輝在文學藝術這面鏡子裡光彩黯淡了，甚至使有些小品文失去方向，在一些刊物上反映社會主義建設的光輝燦爛的這個主要方向的作品逐漸少起來了。充滿著不滿和失望的諷刺文章多起來了。

毛澤東暗地下達反右動員令

“鳴”不起來“放”不起來這種狀況，是毛澤東所不願意看到的。他提出“雙百”方針本意在於“引蛇出洞”，但是眾多的知識分子顧慮叢生，三緘其口，不放不鳴，採取消極的態度。再加上不明底細的人的反對，“雙百”方針將有夭折的可能。為了實施“陽謀”，

毛澤東只好親自出馬現身說法，使大家相信“雙百”方針是出於真心而不是甚麼“誘餌”，他採取了四個措施。

第一個措施：毛澤東在黨內高層大談階級鬥爭的嚴重性和尖銳性。1957年1月下旬，毛澤東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說：“去年這一年，國際上鬧了幾次大風潮。蘇共二十次代表大會反斯大林，這以後帝國主義搞了兩次反共大風潮，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也有兩次大的辯論風潮”。

“關於蘇共二十次代表大會，我想講一點。我看有兩把‘刀子’；一把是列寧，一把是斯

大林。現在，斯大林這把刀子，俄國人丟了。哥穆爾卡、匈牙利的一些人就拿這把刀子殺蘇聯，反所謂斯大林主義”。“蘇共二十次代表大會赫魯曉夫的報告說，可以通過議會道路去取得政權，這就是說，各國可以不學十月革命了，這個門一開，列寧主義就基本上丟掉了”。

“蘇共‘二十大’的颱風一刮，中國也有那麼一些螞蟻出洞。這是黨內的動搖分子，一有

機會他們就要動搖……黨內黨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人捧得好呀！開口波茲南、閉口匈牙利。這一下就露出頭來了，螞蟻出洞了，烏龜王八都出來了。他們隨著哥穆爾卡的棍子轉，哥穆爾卡說大民主，他們也說大民主”。

“還有資產階級，還有地主、富農，還有惡霸和反革命。他們是被剝奪的階級，現在我們壓迫他們，他們心懷仇恨，很多人一有機會就要發作。在匈牙利事件發生的時候，他們希望把匈牙利搞亂，也希望最好把中國搞亂”。

“如果脫離群眾，不去解決群眾的問題，農民就要打扁擔，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學生就要鬧事”。

毛澤東在這次會議上大談特談國內外，黨內外的階級鬥爭，繪聲繪色地說明階級鬥爭的嚴重性。實際上是一篇反右的動員令。蘇聯的階級鬥爭影響到國際共運，影響到中國。既然“螞蟻出洞了”，“烏龜王八都出來了”。那麼該怎麼辦？那就將螞蟻、烏龜、王

八們揪出來。這就是毛澤東的主導思想。他給黨內高層先打個招呼、讓他們有思想準備、免得亂了自己的陣腳。

毛澤東這個講話當時沒有公開，作為黨的機密，一般人無從知道，二十幾年後人們才在《毛選》第五卷中看到。當時人們如果知道這個講話的話，可以斷定不會有人去“鳴”、“放”了。

批陳其通以推行“陽謀”

第二個措施：批評陳其通等人的文章。毛澤東在省市自治區書記會以上強調階級鬥爭的同時沒有忘記他的“陽謀”。他還極力推行“雙百”方針、掃除妨礙“鳴”、“放”的阻力。他說：“陳其通等四位同志對文藝工作的意見不好，只能放香花，不能放毒草。我們的意見是只有反革命的花不能讓它放，用革命的面貌放，就得讓它放。也許這四位同志是好心，衷心耿耿，為黨為國，但意見是不對的”。2月27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批評並明確表示不贊成陳其通等四人的觀點。同時還批評了《人民日報》長時間內對陳其通等人的文章不表態的做法。當時的《人民日報》社長鄧拓聽了十分緊張，於是急急忙忙從來稿中找出一篇批評文章登在3月1日的《人民日報》上，並請作家茅盾寫文章批評。茅盾在3月18日在《人民日報》上發表文章說：“他們（指陳其通等人—筆者註）的文章缺乏說服力，批評方法是教條主義的，其結果不但不能對小資產階級思想作有效的鬥爭，而且給讀者以‘百家齊放，百家爭鳴’原來是弊多利少的印象，給廣大的在‘百家齊放，百家爭鳴’方針下鼓舞活躍的知識分子一瓢冷水。……陳其通等四位同志反對小資產階級藝術思想。我極端擁護他們這一個主張，而且我以為這應當是我們文藝思想戰線上的一個重要課題。但我們要進行這一思想鬥爭時，要小心提防回到教條主義的老調，要同時大力反對教條主義；簡單地採取禁止‘放’和‘鳴’的方法，不能解決問題。……我們的工作方法是讓大家來‘放’來‘鳴’，開展自由討論，從討論中加強馬列主義的思想教育”。

在3月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毛澤東再次批評陳其通們的文章。

4月4日《人民日報》集中發表了一組讀者來信，批評陳其通等人的文章。當時的中宣部副部長周揚也於4月9日在《文匯報》上以答記者問的形式，批評陳其通等人的錯誤。11日《人民日報》予以轉載。

一時間鬧得沸沸揚揚，不久馬寒冰引咎自殺。

陳其通等人不知底細，發表了自己的看法，雖然這些看法按現在的標準來看是左得不能再左了，本應該符合“左王”毛澤東的意才對，沒想到，這一次陳其通等的文章卻阻礙了毛澤東的當時的策略，影響了毛澤東的“陽謀”。毛澤東需要“鳴”，需要“放”，這樣才能引蛇出洞，所以毛澤東必須極力反對陳其通等的觀點，為“鳴”、“放”掃清道路、讓“陽謀”得以順利實施。

毛澤東：王蒙的小說寫得還不夠

第三個措施：為王蒙《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辯護。王蒙當年22歲、在“雙百”方針的鼓舞下創作了這部小說。該小說描述了青年幹部同官僚主義的區委書記進行鬥爭的故事。這在當時是很難得的事，一般情況下是不允許的。黨是偉大、光榮、正確的化身，而黨的幹部則是這種偉大、光榮、正確的具體形象，因此，小說一發表就受到責難和圍攻。毛澤東在各種會議上一邊批陳其通等的文章，一邊大聲疾呼支持王蒙。他說：“最近北京有一個戰役，有幾個解放軍在那裡圍剿王蒙（指的就是當時總政治部以陳其通為首的那四個人，他們站出來對王蒙提出批評）我要替王蒙解個圍。王蒙又不是我的兒女親家，我也不是想偏袒他。他寫了一個小說，叫《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有人問我贊不贊成那篇小說，我告訴他，我很不贊成！因為他寫的還不是影射中央。我就奇怪，中央為甚麼不可以影射呀？中央的官僚主義也可以反嘛！我說過我對這個小說很不贊成，是因為小說寫得還很不夠。他們沒有把我的意見傳達下去，現在拜託你們諸位，千萬千萬把我的意見傳達下去……”。

毛澤東還說王蒙的小說“有片面性，又有反官僚主義的一面，我



毛澤東曾為 22 歲的王蒙的小說《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辯護”，但王蒙仍然被打成“右派”。

看他寫得相當好，不是很好，他暴露了我們的缺點，不能用李希凡的那樣的批評。他李希凡現在在高級機關，當政協委員，吃黨飯，聽黨命令，當了婆婆，寫文章就不生動了，使人讀不下去。我們黨威望高，靠黨的威望，官僚主義就橫行霸道違法亂紀，是不是該加以改正”。

第四個措施：毛澤東親自出馬闡明“雙百”方針的意義。1957年2月27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作了《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講話。他說：“國內形勢是疾風暴雨的階級鬥爭是時代已經過去了，黨內命令主義、官僚主義、關門主義還很嚴重，中共中央決定早日開始整風，希望黨外朋友幫助，但決不強迫別的民主黨派參加”。所以人民內部矛盾是社會發展的基本動力。今後處理矛盾的公式是團結－批評－團結。而“雙百”方針是正確處理人民矛盾的根本方針。這個講話當時沒有發表，這裡大有文章，不發表是為了以後便於做手腳。在反右期間所發表出來的內容則是面目全非，邏輯混亂，矛盾百出，前言不對後語了。

毛澤東在這次會上的講話，不僅內容新鮮而且幽默、風趣、生動，讓人興奮、舒暢、輕鬆、愉快。但是同樣是這個毛澤東在1月底省市自治區書記會議上著重談階級鬥爭的嚴重性、就可以看出其中隱藏了禍心。

傅雷讚嘆毛“馬克思主義到了化境”

緊接著3月5日，召開全國宣傳會議上進一步貫徹“雙百”方針。在會議期間還召開了新聞出版界部分代表座談會。會上毛澤東說：“說共產黨不能領導科學，這話有一點真理。現在我們是外行領導內行，搞行政領導、政治領導”。毛澤東認為這在當時是迫不得已的，將來這種狀況是需要改變的。

接著，毛澤東開始南巡，加緊“陽謀”行動。3月16日離開北京，17日在天津、18日在濟南、19日在南京、20日在上海，4月初到了杭州。極力推銷所謂的“雙百”方針，真可謂不遺餘力。經過毛澤東一番表演，努力的推銷，他的“雙百”方針還真的讓不少人相信了。翻譯家傅雷在參加全國宣傳會議以後給其兒子傅聰的信中寫道：

他的馬克思主義是到了化境的，隨手拈來都成妙諦，出之以極自然的態度，無形中滲透聽眾的心。……滬上文藝界半年來有些苦悶，地方領導，抓得緊，彷彿一批評機關缺點，便會煽動群眾；報紙上越來越強調“肯定”，老談一套“成績是主要的，缺點是次要的”等等，……毛主席大概早已嗅到這股味兒，所以從1月18日至27日就在全國省市委書記大會上提到百家爭鳴問題，2月底的最高國務會議更明確的提出，這次3月12日對我們的講話更為具體，可見他的思考也在逐漸往深處發展。他再三說人民內部矛盾如何處理對黨也是一個新問題，需要與黨外人士共同研究；黨內黨外合在一起談，有好處，今後三五年內，每年要舉行一次。他又囑咐各省市也要召集黨外人士共同商量黨內的事。

他的胸襟寬大，思想自由，當然國家大事掌握得好了。毛主席是真正把古今中外的哲理融合貫通了的人。

4月30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召集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座談，請大家幫助中共整風。他說：“現在是新時代和新任務，階級鬥爭結束，向自然開戰”。他號召民主人士揭露教育、衛生等部門的官僚主義，並責成專人就民主黨派人士有職有權和學校黨委會問題專門開會徵求意見。這進一步表明毛澤東對“鳴”、“放”和共產黨整風

的態度。

在毛澤東一再鼓動大家鳴放的同時，4月27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指示提出“我們正處在一個新的劇烈的偉大的變革中，黨在實現自己目標的鬥爭中必需同時改造自己；而執政黨的地位使許多黨員容易採取單純的行政命令的辦法去處理問題，一部分人還沾染了特權思想。因此決定進行一次以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為主題，以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為內容的整風運動。5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中共中央關於開展整風運動的指示。5月4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請黨外人士幫助整風的指示》。

這樣一套完整的部署算是完成了。先是毛澤東一再鼓吹鳴放，解除人們顧慮，而後提出中共要整風，最後請黨外人士幫助整風。這一套連環計顯得非常完整，合情合理。這時毛澤東從前台退到後台，他就像一個漁夫布了網，放長線，然後等待時機，等待魚兒上鉤，隨時收網。

可憐的中國知識分子雖然此前已經被毛澤東整得靈魂出竅，顧慮重重，疑問甚多，但他們愛國之心不死，正義感未泯，最終還是被毛澤東的“陽謀”所欺，他們還是相信了毛澤東的“誠懇”，參加了“鳴放”，結果被打成“右派”。

吳宓看透“毛公有事於天下書生”

在“反右”前幾乎沒有人看出毛澤東這一套欺世盜名，無恥之極的政治變戲法。這也不能怪罪善良的知識分子，因為誰會想到，一個國家最高領導人居然會如此言而無信，道德品質會如此低下呢？

在此，應該提到一位偉大的學者，他不像其他知識分子那樣被毛澤東的言論所迷惑，更不像傅雷那樣單純，始終保持著清醒的頭腦，這個人就是西北師範學院教授吳宓。吳宓在鳴放座談會前就識破了毛澤東的變戲法。他認為毛澤東上述的做法是一種圈套、一個陷阱。他看到了毛澤東又要加害中國的知識分子。當他看出毛澤東的“鳴放”的真正目的時，當即把他的忘年交張紫葛請來，對他

傅雷這樣的書生識不破毛澤東的用心，終於被打成“右派”，“文革”初期夫婦雙雙自殺。



說：“古人說過又說：言甘而幣厚，其心叵測。今要開門整風，下一紙之，表一下態就夠了，何用如此剩詞大噪，千呼萬喚，言之懇懇，促之諄諄。而其鼓動對象，厥為民主黨派與知識分子。……毛公有事於天下書生”。這句話毫不含糊，一針見血，道破了毛澤東的“陽謀”。他對張紫葛說參加座談會，最好保持沉默，但不說話可能辦不到，那就歌功頌德。這樣能不能躲過這場劫難，還不一定，要看撒下的網有多大，如果你在網內，即使這樣也逃不過去。

張紫葛教授在座談會上完全按吳宓說的方式去做了。在會上只講好話，不提意見，結果還是被打成“右派”。張紫葛到院黨委書記那裡責問為甚麼把他打成“右派”？院黨委書記反問道：你不是“右派”難道我是“右派”？這就是毛澤東的“反右”運動！（日本／日吉秀松）□

1959 年廬山會議過去 50 年了。2009 年在國內沒有舉行公開的大型紀念會，記錄廬山會議惡果的《墓碑》成了禁書，人民公社化餓死 3750 萬人的數字被攻擊成“謠言”。但是，廬山會議列席人員是否夜闖美廬、是否向毛主席下跪，反倒成為“熱門新聞”

廬山會議參與者的悔恨 ——愚蠢的忠誠和忠誠的愚蠢

前言

在 2009 年的中國，沒有開會紀念廬山會議 50 週年。而 2010 年北京張傑、上海朱承嘉等人卻接連撰文直接攻擊廬山會議的受害者李銳。這是反常的怪事。

1959 年李銳不是中央委員，卻受到了開除黨籍的嚴重處分，比彭德懷還重。除了廬山會議上李銳檢討了自己“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錯誤以外，最大罪名是鄧小平看到李銳前妻范元甄揭發李銳的材料後的結論：“太惡毒！燒掉！”所以，至今李銳不知道范元甄檢舉揭發的內容。我估計有不少直接涉及毛澤東的材料，如李銳後來講的：毛澤東思想正是早年接受的康有為“大同書”的思想，象斯大林晚年，一手遮天；以及在延安時，有人講毛澤東是“鐵雞巴”之類的話。廬山會議後李銳被開除黨籍，此處分比彭張黃周還重。還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勞改、老婆離婚，受盡折磨。

但是，改革開放、平反以後，在胡喬木支持下，李銳寫出了《廬



本文作者姚監復，係原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研究員。

山會議實錄》。這是一本傳世之作，至今還沒有另外一本更權威的講廬山會議的史書。張、朱等人不責怪廬山會議上那個暴君毛澤東，不指責暴政和極權制度，也不批評誣陷者（如對毛澤東煽風點火的林彪、柯慶施、李井泉，或說彭“裏通外國”的劉少奇），卻集中攻擊李銳。路見不平，我也輕吼一聲，談點看法，歡迎批評指正。

忠誠，但是太愚蠢

張勁夫、張愛萍都是令人尊重的老人。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的張勁夫悼念張愛萍將軍的文章中，回憶到他們倆在1959年廬山會議上都參與了批判彭德懷的那場不光彩的鬥爭，都舉手，同意把彭德懷打成“軍事俱樂部”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張勁夫悔恨地回憶和深刻地總結了這段令人痛心的、但是無法修改或掩飾的歷史的一頁，他對自己的定性是“愚蠢的忠誠，忠誠的愚蠢。”

忠誠，但是太愚蠢！50年前廬山會議參與者沒有一個人（包括彭德懷）敢於投反對票，也沒有一個人敢投棄權票，像陳少敏在開除劉少奇黨籍的會上趴在桌子上不舉手那樣。為了形式上表面上的統一團結，為了維護毛澤東的絕對權威，為了忠誠於領袖個人，可憐的中央委員們把實事求是、真理與良心全都拋棄了、消滅了。廬山會議的精神，就是張勁夫指出的：忠誠的愚蠢、愚蠢的忠誠。既愚忠又太愚蠢的中央委員和列席的人士，無一例外！

當代人的墓碑只有誰？

有位俄國詩人認為沙皇制度下，逝者的墓碑上只有三個字：暴君、烈士、叛徒。斯大林專制制度下克格勃的一個頭頭加了兩個名字：劊子手、可憐的女人。1959年廬山會議上的中央委員中當年沒有烈士，則統統是劊子手或者叛徒，都叛變或違背了入黨時的誓言和共產黨黨章規定的黨員義務，也違背了所有共產黨共同的“黨歌”《國際歌》的教導：“要為真理而鬥爭”，在威權壓力下，沒有一個林昭、張志新式的共產黨員，沒有一個人（包括彭德懷）敢於不批判彭德懷。彭德懷敢於為億萬農民鼓與呼，在1959年毛澤東批彭德懷以後，中央委員中有哪一個人敢為彭大將軍鼓與呼？毛澤東定為彭德懷“軍事俱樂部”的成員們，那一個敢不認錯、不醜化自己、不批判自己、不為自己戴上政治大帽子？

1959年廬山會議的全體參與者，在精神上都被打倒了，跪在毛澤東的神像前，俯伏在暴君腳前，全都趴在地上了，何止於跪下！完全不是“寧願站著死，絕不跪著生”的英雄。可以自我解嘲的理由是：“為了黨的團結，防止分裂；為了領袖權威、為了解放軍的權威，寧願批臭自己。”張勁夫後來又承認是“忠誠的愚蠢，愚蠢的忠誠”。歷史上的愚忠，忠於皇帝個人的封建傳統，教育了人們，不必忠於真理、民族大義、國家大局和人民生死的天大道理。寧可造成非正常死亡3750萬人的慘劇，也要忠於毛澤東的個人權威和錯誤路線。這不僅是忠誠的愚蠢，而是毛澤東主犯造成的世紀大



李銳。

慘劇的從犯與共犯。為什麼不批這個挾天子把好人都變成從犯的制度？毛澤東對於認錯、投誠者、起義揭發者，可以利用，但絕不原諒——降將不武，降帥都殺，一個個被整死。彭德懷、張聞天在文革中的下場是悲慘的，周惠未列入反黨集團名單，毛澤東留他做省委書記，但他必須繼續狠反右傾，打擊同夥。而連中央委員都不是的李銳，卻受到了最嚴重的處分，被開除黨籍，比廬山會議的彭、張、黃、周（小舟）還厲害。周惠認為李銳有“欺君之罪”，第一封給毛澤東的揭發信謊報軍情。鄧小平看了李銳前夫人范元甄的揭發，認為李銳的言論“太惡毒！燒了”。究竟是何原因，李銳被開除黨籍、勞改，至今還是一個謎。李銳認了罪，寫了“我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罪行”的信，精神上思想上趴在地上了，還受那麼嚴厲的懲罰，毛澤東的心真狠！這將教育我們後來人，應有對弱者的同情心和是非、善惡辨別能力。應當認清這個黨不是現代政黨，而是“現代的青紅幫”（胡繩語）、“政治就是不要臉”（林彪語）。

最黑暗的毛澤東時代的最黑暗一頁

最專制的傳統同最革命的理論相結合形成最黑暗的毛澤東時

代，1959 年廬山會議是最黑暗的歷史的一頁。

為什麼會出現廬山會議上那個“偉光正”的黨和黨中央委員並不光彩的一頁？李慎之的分析是準確而深刻的：“只要抓住中國的文化傳統這個內因與馬列主義影響這個外因，其實也不難做出有說服力的解釋。總之是世界上最最最最革命的理論與最最最最專制的傳統相結合，使中國形成了最最最最黑暗的毛澤東思想之三十年的統治。中國傳統的專制主義變成了極權主義。”（《八十三封書記——許良英、李慎之 1998—2003 年通信錄》，同心同理書屋，2008 年 4 月）

革命宗教化的毛澤東思想是“最革命的理論”、“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頂峰”，被神化的毛澤東是紅太陽、全世界革命的領袖，毛澤東的話，一句頂一萬句，道統與法統集於一身的政教合一、黨政軍民學的最高統治者，一聲令下，全體忠誠於領袖的中央委員都俯伏於當今聖上的腳下，全都趴下了——不僅僅是跪下，而且奉最高統帥之命令，一起打倒昨天的元帥、今天的敵人，批倒批臭。過上幾年，重複一次批鬥，只是被打倒的敵人正是前幾年的凶手，劊子手變成叛徒（或者烈士）。

——1958 年彭德懷元帥批劉伯承元帥、粟裕大將；

——1959 年賀龍元帥批彭德懷元帥。留任中央軍委副主席的只有賀龍與林彪。朱德等副主席職務被免；

——1966 年林彪先打倒賀龍元帥、彭德懷元帥、羅瑞卿大將，再批判朱德、陳毅、聶榮臻、徐向前元帥；

——1971 年朱德、陳毅、聶榮臻、葉劍英元帥再共同批判、揭發葬身異國的林彪；

……

元帥之間互相批判、揭發、鬥爭，社會上文鬥和武鬥、造反派和保皇派鬥爭、省軍區與野戰軍鬥、新文革與舊政府鬥……各派都打著最革命的旗號，誓死保衛毛主席、誓死捍衛毛澤東思想，實際上保護最專制、極權的最黑暗的封建法西斯制度。1959 年的廬山會議正是中央一場黑暗而殘酷、無情無義也無理的政治悲劇。在

這場悲劇中，無論扮演了什麼角色，是沒有下跪的英雄，還是趴下的狗熊，是叛徒還是劊子手，都是毛澤東砧板上的祭品、貢品，充分體現出忠誠的愚蠢和愚蠢的忠誠，具有中國特色以及奴隸順從、卑怯的奴顏媚骨和奴才打手的本色。這是“一個黨、一個領袖。一個主義”的法西斯獨裁製度下的必然產物。

如果有一位中央委員在廬山會議上膽敢為彭張黃周仗義執言，肯定被毛澤東打入“反黨集團”，塞進“軍事俱樂部”！會後開軍委擴大會批彭黃，有一位北京軍區參謀長為三軍團澄清了一個事實，當場被剝去肩章，押出會場。還有一位軍官為彭說話，在江蘇定為現行反革命，文革中被槍斃了。在極權主義無法無天的專政條件下，不下跪求饒，只能當烈士。

“斯大林晚年”的爆炸性問題

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上完全失態了。彭德懷說華北座談會“操了我40天娘”，毛主席不顧身分，也罵起“操娘”的粗話：“華北座談會操了40天娘，補足20天，這次也是40天，滿足操娘要求，操夠。”（李銳《廬山會議實錄》增訂本第199頁；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6月）還悲痛地哀嘆：“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我一個兒子打死了，一個兒子瘋了。我看是沒有後的。”（同上，139頁）毛澤東指責彭德懷組織“軍事俱樂部”、“武文合璧”，有計劃、有準備、有組織、有目的地反黨、反中央、反毛主席，寫信是“犯上”的反黨綱領。彭德懷說：“我沒有律師辯護，你們像法庭審判。”（同上，245頁）但是“斯大林晚年”問題揭發後，局勢更嚴重了。據李銳回憶說在1959年8月9日第二組會上張聞天交待，同彭德懷“講過要注意斯大林後期的危險（說到這裏，會場頓時驚訝不已）”（同上，第275頁）；8月10日彭德懷也揭發張聞天：“在廬山三次到我樓上來，他講過毛澤東同志厲害，講過斯大林的晚年，講過獨裁”（同上，280頁）；8月10日“黃克誠被一再追逼，突然看見我（李銳）走進會場，（而且我後面還跟著羅瑞卿），我又不是這個組的，他當

然馬上產生這樣的錯覺：‘李銳一定和盤托出。’黃克誠只好講了以下幾點……‘關於斯大林的話，彭德懷沒有同我談過，別的同志說過。’於是立即被追問：‘是誰？’黃克誠說：‘李銳，在 23 日講話後那天晚上，他們三人來我處時，李銳問過我：現在我們是否像斯大林晚年？我說：不能相比。’李銳說：‘斯大林晚年’這話卻不是我說的。黃克誠沒有記錯。肯定是我們三人中（周小舟、周惠、李銳）有人說了。”陳正人馬上到周小舟所在組，問周小舟：黃克誠已交代，你們三個人 23 日晚上談了現在是斯大林晚年，反右會出瘋子，你說了沒有？小舟答：“我說了。”我心裏坦然，假如把我搞成反黨集團的成員，肯定是個錯誤。李富春、廖魯言問：“‘斯大林晚年’是指什麼？”小舟說：“這次就是 180 度大轉彎，從反‘左’到反右。毛澤東同志多疑，獨斷專行，自我批判不夠。”陳正人隨即回來說周小舟承認了，這話是周講的。（同上，275 – 277 頁）從上述情況看，高壓狀態下，除了周小舟坦然以外，其他人不是揭發坦白，就是批評打壓。廬山會議的責任，只能怪暴君、暴政、暴虐制度。不能怪彭張黃周，也不能怪連中央委員都不是的李銳等人。

廬山會議的深層次秘密是什麼

1959 年廬山會議過去 50 年了。2009 年在國內沒有舉行公開的大型紀念會，記錄廬山會議惡果的《墓碑》成了禁書，人民公社化餓死 3750 萬人的數字被攻擊成“謠言”。但是，參加會議的列席人員是否夜闖美廬、是否向毛主席下跪，反倒成為“熱門新聞”，有點象電影的主題思想無人關心，粉絲們關心的花邊新聞是女演員的情人懷孕了。人們浮躁了、淺薄了、低級趣味了……為什麼不能關心如下的問題？

——為什麼 50 年中間，只有一本李銳記錄廬山會議真相的《廬山會議實錄》？為什麼至今沒有一位與會的中央委員認真地、如實地、詳盡地寫出《廬山會議真相》的書？

——為什麼官方的黨史機構、宣傳部門、檔案館 50 年後還不



元帥之間互相批判、鬥爭。

敢公布“1959 年廬山會議完整檔案與會議記錄”？

——為什麼官方沒有公布廬山會議後 1959 – 1961 年全國非正常死亡的人數？如果 3750 萬人不準確，準確數字是多少？胡繩的《中國共產黨 70 年》公布了一年的死亡數字是一千多萬。那末，三年呢？這個非正常死亡事件的責任者是誰？同 1959 年廬山會議和毛澤東的錯誤有什麼關係？

——1957 年反右派鬥爭，封住了知識分子的嘴巴和良心，1959 年廬山會議的反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鬥爭封住了黨員、幹部、高級幹部的嘴巴和良心。這是不是出現文革十年浩劫的思想基礎？為什麼黨內民主會被破壞成 1959 年廬山會議模式，一直延續到文革中和文革後的 1987、1989 年批胡趙的領袖一言堂的獨裁模

式？這個黨的制度有什麼問題？是不是成為現代的青紅幫？

——1959年廬山會議的顛倒黑白、指左為右、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鬥爭方式，使全體中央委員被訓練成“愚蠢的忠誠”的表決機器，使暴君的暴政得勝，而且以最革命的理論、最準確的路線形式留之於黨內鬥爭史中。這樣，1966年發動文革的十六條，中央全會通過、九大全體通過開除劉少奇出黨，除了陳少敏沒舉手，只差一票，全體通過；撤銷胡耀邦、趙紫陽職務，都是全票通過。除趙紫陽對免職理由保留意見以外，無一票反對。這樣的民主集中制，有民主的實質內容和民主的程序與形式嗎？為什麼生活會、八老會就可決定總書記的去留、上下台，這是那個朝代、什麼幫派的幫規？不總結廬山會議的教訓，悲劇必然重複上演，值得未來接班人警惕的是，如果不接受1959年廬山會議批彭和1987、1989年批胡趙的教訓，不對趙紫陽平反、不對“六四”平反，將來必然會再次出現一位陰謀家將採用廬山會議的方式顛倒黑白，利用中央委員愚蠢的忠誠和忠誠的愚蠢，發動政變再一次打倒第×屆總書記。

我想起朱厚澤針對“2009年上書”的講話——對於這份談經濟問題，講4萬億投資用途，並表態支持胡錦濤的“上書”，朱厚澤不贊成。朱厚澤本人並未簽名。他說：“‘兩頭真’這後一頭‘真’，還要受實踐的檢驗。”我理解，他認為，現在，對歷史和現實問題，一定要講真話，是非分明，立場鮮明，說話不含糊，不必曲意逢迎，不再講違心話。對於過去在歷次政治運動中自己的揭發、檢討、自我批判，也講真話如實公布，邵燕祥的《我的人生敗筆》一書和李慎之的歷年檢討、揭發材料都公之於眾，李銳的《廬山會議實錄》也談到他給毛澤東寫信檢討，做了《我的反黨反中央反毛主席活動的扼要交待》。這樣做，講真話，並沒有損傷邵燕祥、李慎之、李銳的人格形象。馮亦代也寫過他奉命密報右派言論的書，這是一種懺悔，也應歡迎。總之，那是在那個毛澤東時代的政治悲劇，那種極權制度下的人性扭曲。今天，兩頭真，講真話，如實揭露真相（包括自己）是為了廢除這種人吃人的制度，徹底根除這種“羅馬鬥獸場”式的殺死、害死對方自己才能活下去的政治鬥爭的人生戰場。

在廬山會議上，除了暴君和劊子手，大多數人的內心都是“忠誠的愚蠢，愚蠢的忠誠”，都是一些可憐的男人和女人，當了打手，包括打自己。至於不知來自“四人幫”、“三種人”還是第二次文革派從陵墓發出的暗器，這是歷史必然。有人一定要反對民主派，一定要醜化之、挑撥之、破壞之。似不必過於認真，立即應戰。見怪不怪，其怪自敗。否則，正中奸計，上了圈套。

以史為鑒，防止悲劇重演

2008年我參加在紐約召開的紀念大躍進50週年的學術會議時，楊繼繩等人作了報告，講到了人民公社化使中國餓死了3750萬人的悲劇，而且出現了“人吃人”的慘劇。一位令人尊敬的白髮蒼蒼的老華僑提出異議，他說：“我們多少年在美國受欺壓、被人看不起，現在祖國強大了，我們挺起胸膛做人了。為什麼你們要在美國宣傳中國餓死人的歷史？為什麼要講‘人吃人’這種令人吃驚的事？”王軍濤、王丹等人做了解釋後，他似乎還不理解。我又補充了一段話：“我們討論中國歷史的真實事件，是為了研究歷史教訓，為了讓‘人吃人’的悲劇不再在中國再次重演。究竟是什麼原因，在和平年代、正常年景下中國餓死了3750萬人？是印度的諾貝爾獎金獲得者森博士講的原因：官僚主義制度下，信息不通、上面判斷錯誤嗎？還是由於反右派鬥爭、反右傾機會主義鬥爭，使全黨、全體幹部在政治上都只能跟著毛澤東發瘋似地大躍進、大辦公共食堂、人民公社化，幹部被迫說假話，害死了人？”美國人、海外華僑同情1989年天安門事件無辜死難的青年學生，這種高貴的精神，令人感動和感激。但是，1959年反右傾鬥爭後非正常死亡人數超出1989年天安門事件死難者近萬倍的3750萬人的生命，同樣是值得懷念的。對於僑胞們對此事的冷漠，我也感到不理解。

對於幾千萬無辜的冤魂，我們希望找到一個說法，希望他們得以安息。我認為這不是醜化中國，而是愛護中國，希望揭露歷史真實，要求有罪的領導人承擔責任、承認罪責、做出道歉，這是正義的

要求。中共領導人要求日本領導人對侵略戰爭反省、認罪、道歉，是為了以史為鑒。為什麼不能反求自己，認真反思建國 60 年、建黨 90 年來自己對人民犯下的嚴重罪行呢？為什麼不能公開道歉、誠懇認罪呢？現在能夠闖進政治思想禁區，公開透露、爭論、揭露 1959 年廬山會議事件和黨史、國史中的重大問題，是好事。查明、公布真相，只是為了以史為鑒，展望未來，建立真正和諧的社會。一個不尊重自己歷史、隱瞞歷史真相和不承認歷史上的錯誤和罪惡的民族，是一個可悲的沒有前途的民族。至死也絕不發“罪己詔”的毛澤東作風，過去害死了幾千萬人，如果不改，還將害死更多的人。（姚監復）□

《餓鬼》與《天安之城》，在作者貝克眼裏，竟然被一個中國人耳熟能詳的詞而聯繫在一起，這個詞，就是“大躍進”。半個世紀之前的“大躍進”造成中國生產力的極大破壞，而這次對北京進行的超大規模的重建，貝克看到了又一個可怕的“大躍進”

中國“大躍進”結束了嗎？

專訪英國作家賈斯帕·貝克和中譯者姜和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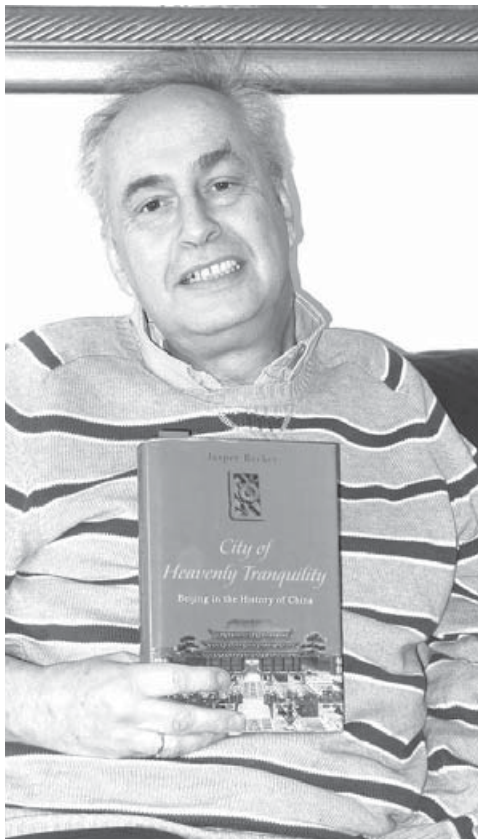
“我八年前第一次見到賈斯帕·貝克，是在北京，他在那裡擔任駐華記者，精神旺盛，充滿活力！這次是第三次見到他，他瘦了，滿臉疲憊，看來是太勞累了，比他的實際年齡更顯老相……”賈斯帕·貝克著作的中譯者姜和平女士，這樣對我介紹。

是太累了，還有時差，賈斯帕·貝克(Jasper Becker)的日程太緊，以致《新史記》記者不忍心對他問得太多。這位英國作家、《餓鬼：毛時代大饑荒揭秘》(Hungry Ghosts: Mao's Secret Famine, 以下簡稱《餓鬼》)一書的作者，從英國飛到華盛頓，參加兩天“緬懷中國大饑荒 50 週年國際研討會”，會後他立即前來新澤西看望居住在這裏的姜和平。第二天一早他就取道華盛頓回英國。

2012 年 2 月 18 日，明鏡記者撥通電話，對貝克和姜和平先後專訪。

西方記者中的“中國通”

貝克曾在北京居住多年，對中國情有獨鍾。他曾擔任《南華早



賈斯帕·貝克手持
《天安之城》英文版。(姜
和平提供)

報》駐北京記者站主任、英國《獨立報》駐北京記者，並為《衛報》、英國廣播公司(BBC)等撰寫過多篇關於中國的報導，除了《餓鬼》這部專著，貝克還在在1992年出版了《失落的國家——蒙古啟示》(Lost Country: Mongolia Revealed)，2002年出版《中國人》(The Chinese)，2005年出版《流氓政權：金正日和北朝鮮迫近的威脅》(Rogue Regime: Kim Jong Il and the Looming Threat of North Korea)。

他的兩本著作《餓鬼：毛時代大饑荒揭秘》與《天安之城：北京的帝國渴望和現代惡夢》(City of Heavenly Tranquility，以下簡稱《天安之城》)的中文版，都由香港明鏡出版社出版，譯者都是在普林斯頓大學分子生物系工作的姜和平。

姜和平不是文史科班出身，卻成了貝克兩本書的譯者，這是因為姜和平一讀到《餓鬼》，就深深為貝克對中國人投注的關注和感

情感動了。她經歷過中國上個世紀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的大饑荒歲月，雖然她當時生活在首都北京，屬於中央要確保糧食供應的城市，但也聽說過“三年自然災害”，或多或少有所瞭解。讀到貝克的書，她為當年中國人遭受的苦難而震撼，也為這樣的史實卻是由一個外國人披露而愧疚。她急切地想為仍然被蒙在鼓裏、活在謊言中的同胞做點什麼，“那時我特自不量力，就跟貝克聯繫，自告奮勇說，我來翻譯這本書。”雖然此前，她從來沒有翻譯過這類選題，但很快貝克同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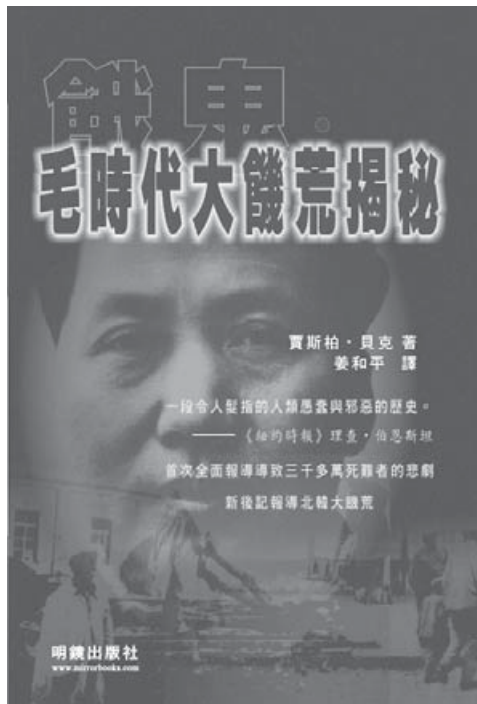
說起來有繞嘴：一個住在中國的英國人用英文寫了本關於中國的書，一個住在美國的中國人將之翻譯成中文。

在姜和平翻譯期間，她的美國丈夫要去北京講課，她跟著一起回了北京，第一次見到貝克——那是 2004 年。“那次我很緊張，心裏總擔心著，他一聽我這爛英語，還不嘀咕呀：你這英語水平還翻譯我的書吶？”但是夫婦倆見到貝克，氣氛挺融洽，打消了她的顧慮。

2006 年，姜和平又跟著去講課的丈夫一起回北京。這時《餓鬼》中文版已經譯完出版了，她就儘可能多帶一些書，回去贈給朋友、同學，也給貝克帶去。“那次回北京，跟貝克見了兩面，一次是他發起一個 party，一大幫人，都是在北京的外國人，主題是‘懷念三十年代’，參加者都得穿上各自本國三十年代的服裝，他的夫人穿上了旗袍，他呢，穿了西裝，打著領結。他邀我們參加，我說，我哪兒有三十年代的服裝啊？他挺寬容，說隨便你穿什麼。我們就去了。他說，這次人太多，沒時間跟我說話，再約一次吧。後來就在一家餐館見面細聊。那時他正在寫《天安之城》，全部激情都在那本書稿的題材內容上，講啊講啊，全餐館最後就剩了我們這一桌，就聽見他在那兒滔滔不絕地說那本未來的《天安之城》！”

姜和平被他所講的內容迷住了。到他這本書出版，給姜和平寄來一本，她又成了中譯者。

給西方人寫的，中國人更應讀



賈斯帕·貝克著、姜和平譯《餓鬼：毛時代大饑荒揭秘》（明鏡出版社）

中國人通常說“三年自然災害”，但學者們多年研究，指出中國毛澤東時代的大饑荒實際上從 1958 年就已經開始，到 1962 年才恢復過來，前後持續五年；而且主要並不是“天災”，而是“人禍”。

出版於 1996 年的《餓鬼》，並不是敘述這一大饑荒的第一本書，此前旅美學者丁抒的《人禍》已經不脛而走，貝克的著作卻是用英文向世界介紹中國這一慘烈悲劇的第一本書。

一個英國人，為什麼會要投入大量精力心血寫這麼一部著作？貝克告訴《新史記》記者：我覺得中國的大饑荒是被人們忽視和錯誤理解的一場災難。他回憶自己剛到中國的時候，所有人控訴的都是“文化大革命”，貝克十分不解：大饑荒不是要慘烈得多嗎？不更應該公布真相嗎？

在他著手調查之始，官方的通行標準說法是中國連續三年遭到嚴重的“自然災害”，他也這麼以為。但是逐漸地，他越來越發現，這實際上是一場人為的大災難，是中國共產黨反人類的滔天罪行——而他們卻逃脫了所有罪責。

貝克寫這本書，本意是為外國人寫的，“我想幫助外國人瞭解中國，瞭解中國政府和官僚機構的行為，以及他們與農民的關係”。果然達到了效果，在英文世界贏得了好評：

《紐約時報書評》評論說：“在這部重要的力著中”，“可讀性強的、震撼人心地揭示本世紀發生在和平年代的最大災難的詳細報導”，“貝克先生成功地開始了填補當代中國歷史空白的工作——這是對死者執著的紀念和對生者良知的挑戰。”

《華爾街日報》也說：《餓鬼》“以強有力和震撼心靈的敘述再現了悲慘史實”。

倫敦《獨立報》則稱許，“細緻入微的考證和令人折服的記敘”，“賈斯柏·貝克先生在探索中國歷史上反復出現的饑餓主題方面展現了非凡的才華。他使讀者明白這個主題在中國人記憶中的真實份量以及大饑荒在政治戲劇中的悲劇作用”。

但後來，貝克希望這本書能被最重要的讀者群——中國人民看到。“身在中國的大多數人並不知曉過去發生了什麼，或為什麼會發生。”外國人不瞭解中國大饑荒，是因為無知；而中國人不瞭解大饑荒，是因為封鎖。所以他認為，人們需要有一個機會，對中共及其決策者多問一些為什麼以瞭解浩劫的真相——“這比外國人怎麼想、怎麼做，更重要得多”。

貝克告訴《新史記》記者，由於有許多後續者繼續深入調查挖掘，對大饑荒的真實情況和數據有了更多、更準確的披露，也由於受到民間和外界要求公布真相的壓力，中國當局關於大饑荒的統計數字也不得不地開始解密。

在《餓鬼》中他列舉了怵目驚心的被活活餓死的人數，中文版出版之後，“有中國學者告訴我，我在書裏寫的數字太保守了”，比如他在《餓鬼》中闢出專章重點敘述的河南，他說震驚全國的信陽事件中“有一百萬人死亡”，“實際上的死亡人數是 240 萬——其中一半是被打死的”。

四川也是他闢出專章，重點調查和敘述的省份。他在書中寫道：在李井泉領導下，以物產富足著稱的四川省竟成為中國大饑荒

的重災區，有 700 萬到 900 萬人死於飢餓。後來更多的材料，尤其是時任中共重慶市委辦公廳副主任兼共青團重慶市委書記廖伯康向楊尚昆匯報時，披露至少一千萬人死亡（當時重慶還不是直轄市，屬四川省），也超出了貝克的判斷。後來東夫所著《麥苗青 菜花黃》（香港田園書屋）更詳細記錄了川西“大躍進”、大饑荒慘絕人寰的真相。

貝克說：“自從十幾年前寫了《餓鬼》這本書，由姜和平翻譯成中文出版之後，我驚喜地發現，好多中國人讀過了，更高興的是，越來越多的人也投入對這段歷史的回憶、寫作和研究，許多普通人寫出了自己和家人慘痛的親身經歷。”

“人禍”：共識中也有爭論

2012 年，是這場大饑荒結束整整半個世紀。2 月 15 日、16 日，由美國傳統基金會亞洲研究中心和華盛頓勞改基金會，共同主辦了為期兩天的“見證與紀念：人類歷史上最大的一次大饑荒國際研討會”。已從北京舉家遷回英國定居的賈斯帕·貝克，與來自北京的原新華社高級記者、《墓碑》一書作者楊繼繩，來自香港的《毛澤東的大饑荒》一書作者馮客（Frank Dikotter）等人，在會上先後發言。

《共用的墓碑——一個中國人的家庭紀事》（明鏡出版社）一書作者李世華，原國務院農村政策研究室研究員姚監復，《悲情大地》（明鏡出版社）的作者姚蜀萍，也相繼在會上發言，回憶大饑荒、討論大饑荒，不是為了掀起仇恨，而是為了記住苦難，吸取教訓，讓這樣的悲劇不要重演。

研討會期間，放映了由馮客監製的《毛的大饑荒》和由年輕一代導演王兵導演的由作家楊顯惠作品改編的電影《夾邊溝》。

貝克告訴《新史記》記者，這次研討會上，對於這場大饑荒是“人禍”基本上已達成共識，但是對“人禍”的理解，仍然有很大爭論。有人強調，發動“大躍進”的毛澤東，應該對大饑荒承擔主要

罪責；另有一種意見則認為，主要應該歸咎於制度。

貝克則認為，這個制度不就是毛澤東創造的嗎？毛澤東雖然去世 30 多年，但他創造的中央集權制度卻基本上延續至今。若說不怪毛澤東，就像說殺害猶太人要怪納粹制度，不是希特勒的罪責一樣。

得知更多、更嚴重的真相之後，貝克對當今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的“唱紅”感到尤其不可容忍。他在接受採訪時說，“包括重慶在內的四川省，曾經因為中共的錯誤領導而造成一千萬人在大饑荒時期餓死，而像薄熙來這樣的領導人，卻還要重慶民眾唱‘紅歌’！這只能說明連薄熙來都不知道這段歷史，或者他根本就不在乎。無論是哪一種理由，都說明一個國家有這樣的領導是很可怕的。”

貝克告訴《新史記》記者：中國的大饑荒也引起了國際間的重視，“法國電視集團拍了一個小時的電視節目，專門介紹中國數千萬人因饑餓喪生的悲劇”。但中國官方仍然對研究這一悲劇及其成因的學者加以重重阻撓。據稱這次國際研討會，也有好幾位中國大饑荒的親歷者，最終因為被安全部門約談等種種原因，未能赴美出席。

許多人不解：這樣一個犯下如此罪行的政權，何以穩固至今？姜和平說：看了貝克的書，我最突出的感受就是：共產黨統治的秘訣就是兩條，一個是編造謊言，一個是高壓暴政。

北京重建——又一“大躍進”

繼《餓鬼》之後，貝克第二本被譯成中文的書，就是《天安之城》。作者用無限緬懷和思緒綿長的筆調，娓娓而談北京城的歷史和文化遺產的由來，以及是如何遭到毀滅性破壞。

這本書與前一本書的題材，在貝克眼裏，竟然被一個中國人耳熟能詳的詞而聯繫在一起，這個詞，就是“大躍進”。半個世紀之前的“大躍進”造成中國生產力的極大破壞，而這次對北京進行的超大規模的重建，貝克看到了又一個可怕的“大躍進”，對北京這座無

與倫比的歷史名城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摧毀。

獨特北京風貌毀滅的速度，超乎他的想像，也超乎他書寫的進度，他曾經對《新史記》記者黃舒心說過：“中國現代化剛開始的時候，北京還保留了很多古蹟，要保存這些古蹟還很有可能，在書稿即將完成的時候，我發現許多文化遺產都要絕跡了，所以我改動了很多內容。”因此《天安之城》耗費五年時間才付梓。

這本書涉及大量文史知識，不僅對貝克來講難度更大，對於翻譯者姜和平來講，也是更大挑戰。姜和平告訴《新史記》記者，她佩服作者的精神，也對這一話題深感興趣，所以樂於承擔。

當《新史記》記者告訴姜和平，中文讀者認為她的譯筆生動傳神，姜和平說：要說翻譯得好，很大的功勞要歸於校對者夏沛然——巫寧坤是他舅舅，是林培瑞（Perry Link）教授把他介紹給我的。他是芝加哥大學比較文學系的博士，擔任過30多年聯合國專業筆譯，現在已經退休了，他的中英文都特別棒！我跟他說請他校譯，他答應得特痛快。我告訴他：可能沒什麼報酬，他說，沒關係，我不在乎錢多錢少。

姜和平原來找過一些專家，有的答應得挺好，但過了一年，一個字也沒返回給她。“夏老師不僅語言功底厚實，而且文史知識特別豐富。我翻譯的時候，也不知道‘Hu Yinglin’究竟何許人也，中文名字是什麼，寫下譯音，夏老師馬上就告訴我，是‘胡應麟’。翻譯燈市口那段描述，夏老師指點我，應該到圖書館去找找胡應麟的書，那裡面的內容可作參考。他給我潤色的文字，文筆那叫一個棒！”

夏沛然雖然退休了，但實在太忙，“手裏老有四五本書等著他翻呢，我不好意思老催他。”後來姜和平找到原來《餓鬼》的校對者，完成了剩餘部分。

貝克在書中十分嘆惋：就算是法國城市規劃師奧斯曼男爵（Baron Haussmann）當初重建巴黎時，也留下了40%老建築。而北京，將只留下僅不到5%的老建築。1980年還有6100條胡同，現在只有幾百條舊街巷、少數寺廟和宅院得以保存；北京城裡44座王府當中，僅完整保存一座。他懷疑歷史上還有哪座古都能在這樣短

的時間裡，進行如此徹底的拆毀和重建。

他在書中寫道：“有時候，現代化工程是具有善良意願的變革，但也是專制的當權者毫不猶豫地用極端激烈的手段，從根基上剷除中國文化的過程。”

貝克在《餓鬼》中文版中提到，中國應該為大饑荒死難者建立一座紀念碑。姜和平說，實際上他這本書已經給死難者建立了一座紀念碑；而《天安之城》又為毀滅中的老北京建立了一座紀念碑。

四個“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

姜和平對於海外出版的其它有關中國大饑荒的書也非常感興趣。她告訴《新史記》記者，她還曾想翻譯馮客的《毛的大饑荒》呢，“給馮客寫信，他說我要求提晚了，已經有人翻譯了。現在中文版已經出來”。

貝克對馮客和楊繼繩的書評價都很高，他與馮客的個人關係也相當好。馮客曾告訴姜和平，貝克是我的好朋友，我寫每一章，都要讓貝克過目，提意見。

馮客比貝克年紀更輕，1961年出生於荷蘭，後來入了英國籍，精通中文，現任教於香港大學，他的這本《毛的大饑荒》獲得英國塞繆爾·約翰遜文學獎。姜和平告訴《新史記》記者，“馮客與貝克不同，貝克是記者出身，而馮客是歷史學家，他帶了一組研究生在中國做調查。跑了幾百個檔案館、統計局、公安局，得到第一手資料。因為奧運會前中國有一個短暫開放資料的時期，他們就抓住了這個難得的機會，也不說是研究‘大饑荒’，只說研究經濟史……”

姜和平回憶：前年秋天馮客到哈佛，牛津等英美著名大學演講，也來到普林斯頓大學，聽眾都是東亞系的研究生，她也去聽了。有個學生提問，中蘇大饑荒非常相似，不同點是什麼？馮客說，只有一點不同：蘇聯還允許外國記者去採訪，所以留下很多照片、資料；中國大饑荒，當局嚴密封鎖消息，不允許外界記者採訪，所以沒有留下照片。

姜和平對馮客所說的一段話印象深刻，鄭重轉述給《新史記》記者：中國大饑荒，不僅是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大饑荒，而且是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對私有財產的剝奪，也是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對生態環境的破壞，還是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對倫理道德、對人的尊嚴的踐踏。

關於中國昨天的書接著寫

我問貝克：《餓鬼》英文版出版 16 年來，關於大饑荒的真相又增添了很多史料，您還會再增補、擴充這本書嗎？他說，沒有這個打算。因為許多學者——尤其是越來越多中國人，已經被喚起了研究這一課題的熱情，自己的使命已經完成了。

去年以來，貝克寫了本關於中國富豪家族的新書。他本打算寫好幾個中國富豪各自的經歷，據說也有富豪家族委託他寫，目前只出版了一本，關於一個“棉紗大王”CC. 李，圖文並茂。他告訴《新史記》記者：自己現在的興趣和精力，集中在研究和寫作毛澤東派出大量軍隊輸出革命的選題上，除了世人熟知的到朝鮮，還講這些軍隊被派到柬埔寨、越南和緬甸等東南亞國家的史實。

姜和平對我補充說：這是個特好的題材，現在可能還沒有人寫呢。毛澤東派那麼多軍隊上這兒那兒，為什麼派？派去幹了些什麼？和當地人民的關係怎麼樣？他們後來的遭遇如何？我們中國一般讀者並不知道真相。等著看他的新著吧。“這是他的興趣之一，他還有很多別的打算——還寫小說呢！告訴我說，這次回英國，就將小說收尾了，好寫下面的書。”（《新史記》記者 高伐林）□

“我還能有什麼其他朋友？”周素子在 22 歲時就當了“右派”，因此身旁朋友也多為“右派”，這些人都待她相當好。周素子經常懷念他們，自然而然將他們當成筆下主角

“右派”的悲歡離合情感路 ——專訪作家周素子

儘管在不懂政治的年紀就被打成“右派”，儘管與丈夫長期分隔、於艱苦環境下撫養三名女兒，中國女作家周素子仍以寬容的心態、從正面的角度看待被打成“右派”的那些年。她在接受《新史記》專訪時說，樂觀是自己的天性，“反右”運動讓自己從一個不懂事的小姑娘，粹煉成一顆“銅扁豆”。

年紀輕輕當了“右派”

中國大戲劇家關漢卿有一句膾炙人口的名言：“我是個蒸不爛、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響噹噹一粒銅豌豆”。周素子的這句話，典出於此，讓人會心一笑。

目前旅居新西蘭的周素子，2011 年 11 月中趁著到洛杉磯探望女兒與外孫、再到紐約拜訪朋友之際，接受了《新史記》記者的專訪。擁有溫婉嗓音的周素子，受訪時臉上總掛著微笑，自稱是中共政治犧牲品的她，頻頻說自己不懂政治，很難想像周素子曾經歷過一段被劃為“右派”的艱苦日子。

1935 年出生的周素子為浙江樂清人，在母親的栽培下，周素子的兄弟姐妹均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周素子初中畢業後，進入杭



周素子在紐約。(柯宇倩攝)

州音專就讀，學習鋼琴與二胡，後考入福建師範學院藝術系修習鋼琴，因為彈得一手好琴，又到處演奏、開過獨奏音樂會，儼然是學校中的“才女”，但也因為出了風頭，加上“家庭出身不好”——家庭成份被劃為“地主”，父親又曾於國民黨內任過要職，1957年，還是一名學生的她就被打成“右派”，下放至林場勞改。

“以前我連報紙都沒看過，但當局要給你劃為‘右派’，沒有任何道理，可能就是看上你，也可能你家庭成分不好。”周素子對《新史記》說。

1958年，周素子請假離開農場，到北京與陳朗結婚。陳朗當時也被打成“右派”，流放到蘭州；“文革”時，陳朗又被打成“反革命”，被送到青海、甘肅、寧夏勞改，原帶著女兒到蘭州與丈夫一同生活的周素子，因為抄家頻仍、丈夫工資遭扣、遭判刑關押等因素，被迫離開城市，與三名尚年幼的女兒長途跋涉到陝西富平白村。雖然周素子在那裡做工換取糧食，仍吃不飽、穿不暖，孩子沒法正常受到教育，於是又輾轉經上海回到杭州，寄宿在同是“右派”的二姐家，孩子也因此與父親分別13年之久。

1978年，撥亂反正、落實政策後，周素子和丈夫都獲得平反，丈夫回北京中國戲劇家協會工作，周素子也被安排在浙江機械學校擔任古代文學和古漢語教師。周素子對《新史記》回憶，當時沒有單位可安插她，於是浙江省“右派”落實政策辦公室詢問她能否教書。“當時‘文化大革命’後青黃不接，像我這樣的人他們也用了。杭州是個文化薈萃之地，我就去教他們古代文學。”

她也在其他大學兼課講授詩詞、文學，吸引了許多非文學專業的學生後來也從事了這方面工作，令周素子很有成就感。1984年，周素子被調到杭州市的雜誌社《風景名勝》任編輯與記者。當時周素子將近50歲，年紀已經不小，並不是適合調動工作的年齡，但《風景名勝》的主編急於創刊，正缺人手，看了周素子的文章後，發現她是個合適人選，因此力勸她去。

雖已進入中年，但周素子身體強健、精力充沛，成天在外頭採訪，走遍全國各地。周素子愉快地說：“那時候的雜誌社很小，只有4、5個人，後來中央建設部要選一家雜誌在全國範圍內作為他們的刊物，我們作夢都沒想到會被選中。自此我們身價變了，變成建設部的記者。”

因緣際會出版第一本書

周素子於1993年退休，1995年，花甲之年移民新西蘭。

周素子對《新史記》表示，她原本並非專職寫作，沒讀過中文系，也沒想過出書，但因緣際會下促成了第一本書的問世。“我們全家都到新西蘭，家裡人多，又都是文化人，在那邊找不到工作，很多朋友就建議我們辦份報紙、拉拉廣告、收點廣告費。”

《新報》就這樣成立了，周素子主要擔任後勤工作，為一家人燒飯、洗衣，讓大夥專心打拚事業，沒有後顧之憂。周素子大女婿當總編，後來為岳父岳母在《新報》上開闢了一方版面，讓兩老“玩玩”，從此開啟了周素子的寫作之路。在這塊名為“朗素園”的專欄裡，周素子回憶了“右派”的生活與“右派”朋友。

“那時沒想到這（專欄）與‘右派’有什麼關係，只是我還能有什麼其他朋友？”周素子對《新史記》說，自己在22歲時就當了“右派”，因此身旁的朋友也多為“右派”，這些人都待她相當好。如今，這些朋友、師長中許多人都已去世，有些人是否還活著也不知道，周素子經常懷念他們，自然而然將他們當成“朗素園”裡的主角。

周素子謙稱這些故事就是“湊個版面”，由於家務繁忙，周素子的寫作速度不快，但一點一滴的結果，最終累積了70多位“右派”朋友的故事。一日，正在新西蘭的政治學者王軍濤上周素子家作客，建議周素子出書。儘管周素子的書稿並沒有太多的政治內容，但這麼多的“右派”人物集中起來，本身就夠“刺眼”了。考慮到“大陸出版社要你刪，香港出版社不囉唆”的因素，周素子找上了香港的田園書屋。

2007年，適逢“反右”運動50週年，周素子記錄72位“右派”朋友的第一本書《右派情蹤》也在紀念“反右”的氣氛下問世，並在銷售上獲得佳績。周素子對《新史記》說，自己不會用電腦，因此由女兒幫忙將這些“右派”故事貼上網，沒想到外界反響很大。

“我只寫生活瑣事，他們認為這好看，不像一般講政治的寫‘右派’的書，比較枯燥。”

田園書屋接著在2010年底推出周素子的《晦農舊事·老家的回憶》。寫過許多“右派”朋友的情感故事後，周素子在這本書裡才開始寫自己的家族。《晦農舊事·老家的回憶》的第一部分描述周素子家族的遭遇——周素子童年生活的舊宅稱為“晦農別墅”，故以此為書名；第二部分則講述了個人遭遇，包括周素子如何在顛沛生活中教養三名女兒、周素子母親的堅強一生、周素子探望在農場勞改丈夫的經過等；本書最後一部分則紀念了周素子的師長、學生、朋友。

目前，周素子的著作只有中文版，周素子對《新史記》表示，雖然很希望自己的書能打入英語市場，但一來不知找誰翻譯，二來翻譯她的書也存在難度。對音樂、戲劇、周易、老莊等皆有研究的

周素子，在書中做了許多引用，同時附有自己所作的古詩詞，因此要翻成英文相當不容易。

周素子不純粹記事，也相當注重文字美。周素子認為，寫作不光只寫故事，還要寫得體現出人品、修養。周素子在閱讀他人作品時也先看文采再看內容，對沒有文采的作品不感興趣。“我不會講大塊文章、大理論，只能從細緻處著手，我對每個字都很尊重，不會亂寫，沒有誇大、炫耀的東西，就是很真實敘述自己的親身感受，反映曾經歷的事物，讓沒到過我那時代的人也能體會到，同時有文學與美的享受。”

經歷“右派”苦日子仍樂觀

周素子對《新史記》指出，50 多年來發生了很多事，她所記下的，均是自認為很重要的細節。與一些透過採訪、錄音來寫作的作家不同的是，周素子與書中人物接觸時並沒有寫書的打算，因此也未以任何形式或工具記錄下對方的點滴，然而周素子書中卻鉅細靡遺地描述了每個人物的背景、生活故事。周素子說，自己寫作時沒有憑藉任何資料，全靠自己的記憶力。“我記性原來就很好，可以過目不忘，但後來整個被折騰得不聰明了。”

即使周素子經歷過“右派”的坎坷生活，她仍用正面的眼光看待那一段過去。被打成“右派”後，周素子曾靠撿破爛為生，女兒們則因為生活條件差身體虛弱，但周素子對《新史記》說，自己的父親是很溫和善良的佛教徒，母親很辛苦也很堅強，受父母的影響，她也保持著樂觀、堅強的個性。“我本來就是個非常幽默、快樂的人，不曉得什麼是愁苦，即使後來被折磨得那樣，還是沒垮，仍然是快樂的。”

周素子認為，當“右派”的那段日子並非一味的不好，因為這段粹煉將本來是脆弱、不懂事小姑娘的她，變成堅強的“銅扁豆”。

“我之前很用功讀書，如果沒被捲入“反右”運動，後來肯定在大學裡教鋼琴，可能生活過得比較優裕，就是所謂的人上人吧，但經

過這件事，它讓我懂事了，我堅強了，什麼事情都不怕，就像關漢卿說的‘銅扁豆’——煮不爛、砸不碎。”

中國女作家章詒和的《往事並不如煙》描寫了中國上層知識份子在“反右”和“文革”中的命運，不少人將周素子的作品與《往事並不如煙》相比。周素子對《新史記》表示，每個作家都有自己的風格，她倒希望不要做比較。“老拿我跟誰比，人家的社會地位跟我的根本不一樣，她自稱是‘最後的貴族’，我們是底層老百姓，我們的書不見得賣得那麼好。”周素子謙虛地說。

不懂政治、不寫政治

雖然寫的是一個充滿政治因子的年代、描述的是一名又一名遭遇政治災難的文化人，但周素子並未將重點放在政治，而是選擇從中華傳統文化的角度、以帶著文學性的筆調，描繪出一則則在困境下的曲折情感故事。

周素子對《新史記》表示，她一輩子不講政治，因為不懂政治，加上樂觀看待過去，因此書中沒談政治，一方面是自己本來就沒興趣，另一方面也因為沒那麼強烈的政治批判態度。

不過周素子對現在的中國情況與知識份子仍有話要說。“現在的中國沒有‘真’的東西，因為國內的知識份子不敢寫也不敢說，只能遠離。中國的知識份子非常安於現狀，退休工資夠花了，常常拿獎也覺得很好，不像我們希望自己永遠不落伍……”

文學評論家、作家李劫表示，周素子的作品能面世很不容易，因為對於時下大多數讀者來說，或是由於所處歷史背景和社會不同，或是由於逾半紀以來某種畸形的、逆潮的、詭異的、極端宗教化的“文化”肆虐所形成的隔膜，使得周素子的作品與他們存在“代溝”。

周素子並不認同這種看法。她對《新史記》記者舉例說，《紅樓夢》永遠是大家心中的經典作品，哪一代的年輕人都喜歡讀。她對自己的書很有自信，相信年輕人也會被吸引，尤其是對中國過

去感興趣、有頭腦的年輕人，不會存在“代溝”。

海外生活隨遇而安

周素子對《新史記》回憶，自己是個很愛生活的人，在中國時，有空閑就盡量享受，哪怕是個又小又破舊的地方，她依舊住得安穩，還能弄得相當漂亮，鮮花滿室。

身在海外、遠離故土，對寫作是否會有影響？周素子認為，對她的影響並不大，“如果我是搞史學卻在海外，那麼需要資料時很難得到；但我寫回憶文章，沒什麼大妨礙。”不過，移居新西蘭的奧克蘭，對於喜愛昆曲、徽劇、評彈等藝術的周素子來說，卻感到很大不便。“本來我生活在其中，所以我在中國很愉快，但是那兒政治上的東西很討厭；在這裏，我很喜歡的娛樂都沒有了，都離我很遙遠。”

雖然在新西蘭少了中國式的娛樂，但周素子已覺得自己非常幸福。“我們家三個女兒都到那兒，一共生了7個外孫，最大的24歲，最小的12歲，都是男孩，人丁興旺。”周素子二女兒在2001年獲得美國綠卡，但因為在《新報》的活兒丟不開手，因此一直拖到2007年綠卡瀕臨被取消之際，小家庭才飛往美國；剛開始，二女兒在美國各地遊走，尋找能謀生之處，最後在拉斯維加斯遇上中央美術學院的同學，此名同學在拉斯維加斯擁有一間雕塑店面，有雕塑專長的這位二女兒與丈夫便安居在拉斯維加斯，為店面接些雕塑生意。

二女兒一家離開新西蘭後，《新報》仍繼續辦了一段，但人手少了，加上不景氣，2010年終於支撐不下去。如今，周素子一家還有一份做電話簿廣告的生意。周素子對《新史記》表示，寫作以外，她的英語不行、外面沒什麼交往，因此便在新西蘭做做家務，周素子笑道：“我在國內不會燒飯，到新西蘭給他們燒飯，什麼事都做，很盡職。”

目前為紐西蘭漢學會會長的周素子，作品還包括《周素子詩詞

鈔》、《紐西蘭華人誌》。周素子的文章中經常可見到丈夫陳朗的身影。

即使曾分隔 13 年，周素子仍不離不棄帶著 3 名孩子，等著一家團圓那一天。她對《新史記》回憶，陳朗在農場“改造”不能回家，自己帶著孩子，生活很辛苦，何況當時還沒法確定陳朗是否能回得了家。但是與丈夫有很深的感情，他的人格又值得尊重，因此再艱苦也要堅持。“我 22 歲就成為‘階級敵人’，要擔心明天怎麼生活，沒有什麼工夫跟心情去談戀愛，但我沒想過跟他離婚，也不想帶著三個孩子再去嫁人——雖然我不相信（離婚就）活不下去，但我很理智：要受到傷害的，我傷害不起。”

周素子身在藝術家庭，兩個哥哥都是浙江美術學院教授，其中二哥周昌谷曾獲國際級的“世界青年節金質獎”，目前兩人都已過世；周素子也喜愛音樂、戲劇，能作詩賦詞。目前，周素子下一本書稿已經整理完畢，完全走文化路線，主要講述字畫、民居等藝術、建築領域的東西，仍以人物故事為主，不涉及任何政治因素，都是她在中國任建設部記者時接觸到的大量素材。周素子說，浙江是文物之邦，江南文化非常細膩，她在擔任記者期間，認識許多繪畫師、建築師、風水師，這些人物便是此部著作的主角。目前她正與出版社接洽中。

周素子對《新史記》說，自己不會寫小說，因為“一句虛構的話都不會寫”，因此往後的作品仍將以紀實的形式為主。周素子創作內容多元，除了寫“右派”、藝術外，她還曾在拜訪歐洲期間寫了《歐遊散記》，2000 年回到中國的周素子，創作了《回國日記》，另有 10 年在海外採訪的經歷《10 年鴻雪》，文章均已在《新報》發表過，預計未來結集正式出版。（《新史記》記者 柯宇倩）□

王亞志與李銀橋兩本書的對立觀點，區別不在“右”與“左”，而在“真”與“假”。一個在搜集大量確鑿的歷史文獻基礎上，進行事實論證；一個罔顧歷史真實，以“政治正確”為依據進行憑空臆造。用“黨性原則”“政治責任”製造出的“偉、光、正”才是真正的醜化和歪曲黨的歷史

毛岸英入朝和遇難真相 ——彭德懷秘書王亞志揭李銀橋彌天大謊

2000年七月，北京權威出版社新華出版社出版了《歷史真言——李銀橋在毛澤東身邊工作紀實》（以下簡稱《真言》）一書，由毛澤東衛士長李銀橋、韓桂馨夫婦口述，邸延生執筆，全書65萬言，809頁，其中毛澤東長子毛岸英赴朝遇難經過佔了10頁。2001年上海《文匯讀書週報》摘登了這10頁內容，流傳頗廣。前國防科工委幹部部部長王亞志看後驚訝不已。他買了一本《真言》備讀，還提筆寫了一篇簡單考證的辯駁稿，寄給《文匯讀書週報》，回答是“不便刊登”。

王亞志在朝鮮戰爭中任志願軍司令部參謀，戰爭結束調國防部長彭德懷辦公室任軍事秘書。3年後，到軍事學院學習。文革之後參與《彭德懷傳記》和《彭德懷年譜》的寫作，還擔任《周恩來軍事文集》四顧問之一，負責解放戰爭部分，是中共著名軍事專家。今年已經八十有五，三年前趁身體穩定，他將那篇“簡單考證辯駁稿”擴展成幾萬字的中篇書稿，依舊只針對《真言》一書的那10頁內容——對毛岸英志司遇難進行辯誣，起名《彌天大謊——毛岸英



毛澤東的兒子毛岸英。

之死竟歸罪彭德懷》。“刪繁就簡三秋樹”，至今還未等來“領異標新二月花”。眼下中共黨內、軍內的出版環境，一斑可窺全豹。

2010 年是韓戰爆發 60 週年，也是毛岸英遇難 60 週年，對毛岸英短促一生的評價，半個多世紀，竟然潮起潮落，隨中國政治大潮的浮動而變幻，從“主動請纓”，在“在其父面前死纏彭叔叔不放”，到“英勇赴朝，壯烈犧牲”；到文革“彭德懷老軍閥竟敢狗膽包天，公然違抗毛主席的軍令，使我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才能出眾的愛子毛岸英慘遭無畏的悲壯犧牲，反黨集團頭目彭德懷罪責難逃，罪惡滔天，僅憑這一項罪行，彭德懷就該碎屍萬段焚骨揚灰”；到今天“隨意浮躁，頤指氣使，目無組織紀律”，和廣為流傳的“雞蛋炒米飯”之說，都給中共黨史出了難題。

7 月 21 日中共中央召開了高規格的中央黨史工作會議。該會的小背景是當前有五、六個國家領導人的回憶錄，在中央待批，還有 50 多個省部級高幹要求查閱檔案，準備寫書。大背景是要為明年建黨 90 週年的宣傳把好關，不能再出《李鵬六四日記》這樣的重大紕漏。習近平做的“堅決反對任何歪曲和醜化黨的歷史的錯誤

傾向。這是黨史工作必須遵循的黨性原則，也是每一個黨史工作者應該履行的政治責任”的講話，國內外反響都極差，中央黨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石仲泉出面救急，他說：在對共產黨歷史的各類解讀中，有“歪曲黨的歷史”，也有“極左的說法”，“前者否定、醜化、妖魔化黨，後者則很僵化，有的網上文章甚至說要再來一次文化大革命。特別是海外有的傳媒，對我們黨的挑戰很厲害。”

王亞志與李銀橋兩本書的對立觀點，區別不在於“右”與“左”，而在於“真”與“假”。一個在搜集大量確鑿的歷史文獻基礎上，進行事實論證；一個罔顧歷史真實，以“政治正確”為依據進行憑空臆造。如此看來，無論身分多麼特殊，用“黨性原則”“政治責任”製造出的“偉、光、正”才是真正的醜化和歪曲黨的歷史。

毛岸英何時知道自己要入朝？

《真言》第 482、483 頁有這樣的描述：

8 月下旬的一天，在北京城裏工作的毛岸英來到中南海見他父親。在豐澤園，韓桂馨先見了毛岸英，立刻叫住他：“岸英，你過來！”

毛岸英笑著走近韓桂馨：“韓姨，有事嗎？”

“你幹什麼來了？”韓桂馨明知故問。

“我來看爸爸，看看江青媽媽。”毛岸英照直說。

“沒別的事兒？”韓桂馨又關切地追問了一句。

“就是同爸爸談談去朝鮮的事。”毛岸英輕聲對韓桂馨說，“韓姨，放心吧！我上過戰場，打過德國鬼子……”

韓桂馨還是不放心地說：“你李叔叔已經對我講了，我總也不放心；今天見了你爸爸，你就說思齊捨不得你去，你爸爸會重新考慮的。”

毛岸英笑了笑：“思齊她同意呢！她還鼓勵我……” |

韓桂馨有些著急地說：“傻孩子，你怎麼不明白我說的話呢？我是說你得找個藉口……”

“這個藉口我可不能找。”毛岸英安慰韓桂馨說，“我知道阿姨和李叔叔都很關心我，但請你們放心，我跟著彭德懷叔叔，不會有危險

的。”

“話可不能這麼說！”韓桂馨關切地說，“你爸爸決定了事，別人也難改變；你到了朝鮮可千萬千萬要小心，處處機靈著點兒，多打勝仗早回國……”

這段革命阿姨對偉大領袖即將赴朝的長子進行家長里短式的關懷，不瞭解“抗美援朝，保家衛國”歷史的讀者看了會不當回事，但是瞭解者、研究者都會像王亞志一樣“驚訝不已”，如同遭到戲弄。

毛澤東何時決定參戰的？又是何時決定毛岸英入朝的？

王亞志寫道：“1950年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後，到8月20日，朝鮮人民軍舉行了四次戰役攻勢，解放了南朝鮮90%的國土。敵軍被壓縮到洛東江東岸釜山防衛圈一隅頑抗，金日成於8月15日發布命令：‘要使8月成為完全解放朝鮮的月份。’（《人民日報》8月19日第一版）”

這個時候毛澤東會決定參戰嗎？會派自己的兒子去參戰嗎？李銀橋、韓桂馨、毛岸英和劉思齊8月怎麼能知道毛岸英要去朝鮮呢？

王亞志寫道：9月10日敵軍發起反擊，15日在仁川登陸，朝鮮戰局逆轉。洪學智回憶錄寫道：15日當天金日成派次相朴一禹要中國出兵支援。蘇聯大量解密檔案證明斯大林此時提議放棄朝鮮半島，讓金日成撤往瀋陽組織流亡政府；王亞志寫道：毛澤東於10月4日、5日主持兩天政治局擴大會，決定出兵朝鮮後，周恩來於10月6日上午在中南海居仁堂主持會議，軍委各總部、各軍兵種領導以及政務院公安、鐵道部領導等出席。周恩來傳達了中央出兵決策後即對各項準備工作一一作了部署。責成聶榮臻和作戰部長李濤從總部機關抽調工作人員為彭德懷組建一個精幹的指揮所。李濤於6日下午分別請情報部長劉志堅、通信部長王誼、軍委辦公廳主任張經武、機要局長李質忠等先後來中南海居仁堂李濤的辦公室，李濤向他們個別傳達了中央出兵朝鮮的決策和由彭德懷掛帥出征事，為此需從各單位抽調業務工作人員組建指揮所。作戰部



毛澤東的兒子毛岸英。

決定抽處長成普和參謀二人，由成普為指揮所領隊。各單位抽調人員名單 6 日下午報成普。

因蘇式里 - 2 型客機只能載 20 多人，首長專機載客不超過 70%，因此決定成普、龔傑、徐畝元、俄語翻譯 4 人隨彭德懷、高崗乘飛機去瀋陽，其餘人員乘火車到東北軍區報到。10 月 8 日 8 時，成普等 3 人到南苑機場登機後，俄語翻譯未來，卻看見毛岸英上了飛機。

事後得知：10 月 7 日下午，聶榮臻告李濤，辦公廳那位俄語翻譯不去了，改由毛岸英去。聽說他在天津，可電話告市長黃敬，要岸英趕回北京，明天隨彭總去東北。李濤經長途電話台要黃敬未

接通時，李克農（外交部副部長、中央軍委總情報部部長，1953年又任副總參謀長）來中南海居仁堂作戰室瞭解朝鮮戰場情況，問李濤何事找黃敬？回答說找毛岸英。李克農說：“岸英不在天津，已派他到北京機械廠做工，我知道電話。”於是向工廠找，正遇岸英臨時有事外出，李克農說，他回來後即告他立即到中南海居仁堂李濤部長處。岸英晚飯前來到居仁堂，李濤告訴他，中央決定出兵朝鮮，彭老總掛帥，原配一俄專畢業不久的俄語翻譯，現決定他不去了，由你隨彭老總去瀋陽，岸英聽說後說我願意去。

10月7日晚，毛澤東、彭德懷、毛岸英共進晚餐。飯後彭同毛談到深夜。張養吾秘書、郭洪光衛士在北京飯店等彭回來才就寢。

從上述可看到，10月7日前毛岸英知道中國出兵朝鮮是不可能的。保守機密守則規定，不准向無關人員（包括親屬）泄露機密，江青、毛岸英夫婦，都不可能提前知道中央出兵朝鮮的決策。

劉思齊 1952 年才知道毛岸英去了朝鮮

李銀橋夫婦書中 482、483 頁記述 1950 年 8 月毛岸英對韓桂馨說：“思齊她同意呢！她還鼓勵我……”更是無稽之談。

王亞志列舉劉思齊於 2000 年 11 月 25 日，毛岸英犧牲 50 週年時，在《人民日報》上著文《淚中的懷念》。其中記述了 1950 年 10 月 14 日岸英看望醫院中的劉思齊，說：“我外出了一次，並且第二天也要出差”。（注：毛岸英於 10 月 8 日隨彭德懷乘飛機去瀋陽，13 日隨彭回京，彭出席政治局會議。15 日又要乘飛機去安東。）“我怎能想到，這竟是我們的永訣。”

“1952 年的一天，我清楚地記得，那天侯波同志給了我一張照片，照片上赫然是戴著朝鮮人民軍軍帽微笑著的岸英……”他去了朝鮮？

王亞志說明：第一批入朝的 26 萬志願軍官兵都穿朝人民軍服裝（無軍銜），岸英也領了一套。侯波和她丈夫徐肖冰是中央辦公廳攝影科的工作人員。中央首長的公務、非公務活動多由他倆拍

照，那張照片是龔傑同毛岸英等在安東遊覽鎮江山公園時龔傑替他照的。1951年5月龔傑回北京把膠捲給了侯波，侯波洗印出來，可能在1952年請示過葉子龍後給劉思齊的。但毛岸英是否已入朝？尚無人告思齊確實信息。

劉思齊接著寫道：“1953年的夏天，我再也忍耐不住了，一天，我衝進父親的書房，劈頭蓋臉不顧一切地問父親：爸爸，岸英為什麼這麼長時間沒有來信？父親一下子呆住了，拿煙的手開始顫抖起來，我一切都明白了。”

此時已經停戰。

捏造三份密碼加急電報誣陷“這個彭德懷！”

《真言》第495至496頁載：

1950年11月23日，密切關注著朝鮮戰局的中國人民解放軍代總參謀長聶榮臻接到蘇聯方面發來的一封密碼電報，告知美軍近日將派飛機轟炸中國人民志願軍總部，提醒中國方面提高警惕、預做防備。

聶榮臻急忙趕到毛澤東的辦公室，向毛澤東報告了蘇聯的電報。毛澤東指示說：“立刻給彭德懷發電報，要他轉移司令部！敵情變化無



擔任俄語翻譯時的毛岸英（中）。

常，要防患於未然！”

“是！”聶榮臻答應後離去，即刻給彭德懷發電報了。

11月24日下午，毛澤東又親自擬寫了一封電報，用“AAAA”加急形式發了出去，提醒彭德懷近日將有敵機轟炸，要他設法轉移志願軍總部。

還說岸英罹難後，“彭德懷悲痛萬分，悲痛中深深懊悔自己沒有按照聶榮臻的提醒和毛澤東的電示急速將志願軍總部轉移了。”

《真言》第501頁載：

毛澤東得知志願軍總部被炸後：“這個彭德懷！”毛澤東生氣地說。“我拍了電報讓他轉移麼！”

以上是李銀橋口述的毛岸英遇難的原因。

王亞志認為：“聶榮臻接到蘇聯方面發來的一封密碼電報”，聶榮臻11月23日、毛澤東11月24日兩次告彭德懷轉移司令部的電報都屬於子虛烏有，全是憑空捏造的。王亞志以他豐富的軍事知識和經驗告訴讀者：

一，代理總參謀長的聶榮臻領導下的總參謀部，不可以接到“蘇聯方面發來的一封密碼電報”。

當時中蘇密碼電報往來途徑是：莫斯科來電（多是由斯大林名義發來）由駐北京蘇聯大使館譯出俄文後，派員專送到周恩來的辦公室，由通曉俄文的秘書馬列簽收立即譯出中文，俄文原電交使館來人帶走。因密碼電報在中國人手中，蘇聯處於失控狀態，因之力求縮短失控時間，收回由使館保存。

譯出中文後，自當先送周恩來閱，周根據來電內容，或帶上到毛澤東處面議，甚至由毛澤東主持，把劉少奇、朱德、陳雲等中央書記召來商辦。當然也可由周恩來在電報上批上自己的辦理意見送中央機要室主任葉子龍轉呈毛澤東，毛批上處置意見後，經劉少奇、朱德、陳雲閱後退周恩來辦。

如果來電內容是在國際外交上中蘇相互策應配合鬥爭，那周恩來就把外交部章漢夫副部長及有關司長、新聞總署署長召來研究提出方案，擬寫回復蘇聯的電稿；如是軍事問題則由周恩來主持

會議召集聶榮臻及軍委總部、軍兵種領導人。

當然，並不事事都由周恩來主持會議研究。也可以由周的外事秘書馬列帶上毛澤東批示的電報到外交部，口頭傳達周的指示由章漢夫主辦；也可由周的軍事秘書雷英夫或郭英會，帶上毛澤東批的電報，到聶榮臻處傳達指示，由聶主持辦理，但回覆蘇方的電稿仍按上述程序辦。

二，在抗美援朝戰爭中蘇聯是否曾向中國提供朝鮮戰場敵軍情況？

王亞志回答確實提供過。那是 1951 年 6 月朝鮮前線志願軍由運動戰轉為陣地戰，雙方對峙局勢趨向穩定期間，蘇方曾向中方提供過南朝鮮部隊軍、師位置及行動情報。

途徑是由蘇聯軍事總顧問團向總參機關通報。當時全軍各大軍區、北京各總部、各軍、兵種領導機關均聘請了蘇軍顧問。總顧問團部少數蘇軍顧問工作人員辦公地點在中南海居仁堂後樓二層樓上，樓下有軍委辦公廳外文秘書處。前樓一層是聶榮臻、作戰部



毛岸英之墓。

長李濤和作戰室的辦公處所。顧問團長是蘇駐華武官柯托夫中將，他平時在使館辦公。常到居仁堂來見聶榮臻、李濤，並到作戰室，對照地圖瞭解朝鮮戰場情況。

蘇軍的情報由顧問團送到樓下外文秘書處由俄文翻譯林秉元（林伯渠之女）譯出中文，蘇方人員把俄文情報收回樓上。

林秉元把情報送到前樓作戰室由值班員簽收後，即送作戰部情報處長江右書或作戰室主任張清化閱處。因都是過時情報不僅不給聶代總長閱，而且也不給李濤部長閱，只向李濤口頭報告，同一內容情報，兩天前我們已獲得並立即電告志司，順便時向聶代總長說明一下。

從蘇顧問團轉來的南朝鮮軍隊情報，判定是與中方情報部門同時收到，立即以最快速度在最短時間內通報給志司，同時以書面報毛澤東等中央首長和聶代總長等。並即在中南海居仁堂作戰室的敵我情況圖上作出顯示，蘇顧問團長柯托夫中將常來作戰室瞭解情況，有時聶代總長陪同，有時李濤部長陪同，由作戰室主任張清化介紹情況，柯托夫大概發現蘇方轉來的情報他早在中方作戰室已得悉，覺得這種情報因經過層層上報審批再轉給中國已無價值，而且蘇方也臉上無光，不久即不向中國提供這種過時情報了。

三，志司 1950 年 11 月 23 日沒有北京的來電。24 日確有毛澤東來電，但電文中絲毫沒有講為防轟炸應轉移司令部的字句。

密碼電報是核心機密，世界各國都是如此。從事譯電和接觸密碼電報的工作人員，都須經過嚴格審查，電報的辦理、閱看、回收、歸檔，每一環節都有嚴格、嚴密的紀律和簽字程序。以保證電報安全不被竊取、不致遺失。電報落入敵手，不僅電報內容失密，特別重要的是難免招致密碼編製方法、程式和規律被敵方破解，從而造成被敵方截收的大批密碼電報被全部破譯。電報按年月順序編號、機要部門隨時對收回的電報清點，倘發現缺號立即追查，如丟失則立即報告最高首長，務必徹底追查到底。遺失電報的當事人，不僅本人要受到嚴肅處理（記過，調動工作崗位乃至送保衛部門審查），當事人的直屬一、二層上級也要受到必要的處分和處

置。志願軍司令部收到的電報及發電都是總結戰史的第一手珍貴資料。朝鮮停戰後，軍委在瀋陽組織一批幹部總結志願軍作戰經驗，使用了志司的全部電報。五十年代寫出了初稿後，電報上交軍委機要局存檔。總結文件保存在軍事科學院。彭德懷對總結稿作了審查題寫了書名，鄧華主持編寫。廬山會議後被封存。六十年代後的志願軍戰史，迴避並歪曲彭德懷的貢獻。八十年代，軍科院戰史部重新編寫志願軍和中國人民抗美援朝戰史，1990年9月出版了《抗美援朝戰爭》公開發售。到軍委檔案館、中央檔案館可以查閱文電史料。因時限已過，大部分電報失去機密性，可以公開引用或全文發表，軍事科學院掌握了當年志司的全部電報，按年度月份編號齊全沒有缺號。。、

在1950年11月下旬23日、24日志司的收電中翻找，根本沒有所謂11月23日聶榮臻告轉移的電報，23日沒有北京的來電。24日確有毛澤東來電，但電文中絲毫沒有講為防轟炸應轉移司令部的字句。說明也不存在李銀橋說的24日毛澤東親自擬寫，用“AAAA”加急形式發的那封電報。

四，即使毛澤東當時確有電令彭德懷轉移駐地的電報，李銀橋也不可能閱看和聽到。

進入中央機關的幹部、戰士都進行保密守則教育，不該自己閱看的文電不閱，不該自己知道的機密事項不探問，首長和別人談機密時避開。當時毛澤東身邊的機要秘書一是徐業夫，老機要工作者；一是羅光祿，在延安時是軍委作戰局參謀，1948年到西柏坡後調毛身邊主管軍事機要業務，1960年羅到核工業工作。徐、羅秘書絕不會把電報給李銀橋看，因這是違反保密紀律的。如果徐、羅給李銀橋看電報，講機密事項（這種事情絕不可能發生，只是假定），那李銀橋當必向徐、羅提出批評指出違反保密規則（這雖是假設，但按李銀橋當時工作情況，是會如此辦的）。李銀橋當年不可能看到電報（如秘書不在，毛澤東把電報封好，要李送機要室是有可能的），也不可能聽到軍事機密。到八、九十年代，李銀橋口述回憶錄，認為需向中央和軍委檔案館查閱某些文電，以他的身分，

當有批准的可能。但可以肯定他和執筆人並沒有尋查當年的歷史文獻。

五, 1950 年 11 月 25 日是志願軍入朝第二次戰役發起的時間, 毛澤東絕不可能讓司令部前一天轉移。

王亞志認為首長談工作時, 身邊工作人員均主動離去避開。除非首長指示某人留下聽取。不能排除李銀橋或許有可能給首長送茶水時轉身離開前, 聽到聶榮臻和毛澤東對話, 但他不可能聽到不存在的對話。一個指揮一二百萬大軍的前線司令部搬家, 沒有幾天的充分準備是不可能的, 不像從一家旅館搬到另一家旅館。

洪學智救了彭德懷救不了毛岸英

毛岸英到安東後, 入朝時彭德懷讓他和 13 兵團政治部保衛部長任榮在一起到中路, 隨 39 軍從長甸河口入朝。到大榆洞後, 仍和任榮住在一處, 行政上由辦公室主任成普領導, 因翻譯任務不多, 毛岸英也參加辦公室的輪流值班。

成普、龔傑、徐畝元住在彭總的辦公室, 打地鋪, 白天捲起行李放在牆角。張養吾、楊風安、高瑞欣、毛岸英住附近民房。

王亞志披露志願軍入朝時, 美軍飛機總計 1100 餘架 (含艦載機) 機種齊全, 敵機對地面攻擊有三種類型。

第一種是支援地面部隊作戰。因而都是多批次輪番攻擊。

第二種是對朝中後方目標集中攻擊。如交通樞紐、指揮機關、橋樑、渡口、車站、重要城鎮、工廠、水電站等, 常炸。晝間或夜間出動 B - 29 重轟炸機編隊三、五架、十多架, 最多達到 90 架 (每機可載彈 9 噸), 集中轟炸目標。

第三種是零散性破壞。對朝中部隊控制地區, 美軍分為若干小區, 每天派出 2 機、4 架, 在其任務區內低空巡邏搜索, 不放過一部車輛, 不放過一個可疑物, 用機槍掃射, 發射火箭或投炸彈攻擊破壞。如炸彈投完, 燃油有餘, 則繼續偵察搜索, 發現目標或下午來攻擊或翌日來攻擊。

志願軍入朝的前五個月，用消極隱蔽方式防空，即使受到美機攻擊造成損失，也不以火力還擊，免得暴露目標，引來大批後續機群來攻擊，招致更大損失。因此敵機常是低空掠地飛行，志願軍官兵稱敵機行動為刮鬍子，摘帽子，“查戶口”，後者指敵機循公路上雪地的汽車輪跡跟蹤追入山溝，用螺旋槳氣浪吹走汽車上的柴草遮蓋物，再轉回來、發射火箭擊毀汽車。

彭德懷的志願軍總部，從入朝到停戰，先後在大榆洞、君子裏、上甘嶺、空寺洞、檜倉裏五個有礦洞的地方停駐，從未受到過敵機的集中轟炸。但零散的攻擊從未中斷過。當地居民說，志願軍的小車多、電線多、短槍多，即不是戰鬥部隊。

志願軍副司令洪學智的回憶錄有同樣的描述。1950年11月23日，毛澤東派高崗從瀋陽來到大榆洞志司，一來是瞭解前線的後勤供應，一是為了與金日成、彭總商量中朝聯軍的統一指揮問題。

高崗來到第二天下午（24號），敵機來了四架，在大榆洞上空轉了幾圈。轟炸襲擊了兩次，打壞了坡上的變電所。黃昏時，又飛來野馬式偵察機。。

洪學智說：“敵機不停地轉，引起了我的懷疑。因為敵機經常來，有經驗了，凡是敵人的飛機第一天在哪裏轉，第二天一定炸那。”

洪學智、鄧華、解沛然、杜平研究25日防空問題。決定三條：第一，要求志司機關幹部、戰士第二天天亮之前都要吃完早飯；第二，天亮之後都不准冒煙；第三，都要疏散。

這天夜裏，高崗回國去了。等彭德懷睡了，洪學智讓警衛員把他屋裏的作戰地圖取下，掛到防空洞裏。

彭總有個習慣，屋裏沒有地圖，他覺得難受。第二天清晨五點多，首長們吃完飯，都進防空洞裏，只有彭總沒進，派警衛員，參謀催了幾次，就是不去。大家讓洪學智去催。

洪到了彭總的木頭房子，他正生悶氣，一見洪就問：“洪大個兒，你把我的作戰地圖弄到哪去了？”兩個人吵了半天，是洪學智把彭德懷拉上山的。

關於毛岸英，洪學智只有一句話：“那天早飯吃得很早，飯後，毛主席的長子毛岸英同我們一起上了山疏散，後來不知道為什麼他又跑回屋裏去了。”

王亞志記述的詳細許多：25日成普留下帶班，毛岸英和高瑞新跑回辦公室，高剛來第七天，坐在南牆下，對照地圖默記敵我軍番號、位置和地名。毛岸英則在火爐邊取暖，吃烤脆的蘋果皮，不會冒煙。11時，防空哨發出警報，敵機四架凌空，四人跑出來，警報解除，四人又回去。不久又響起第二次防空警報，徐畝元先奔出室外，成普也隨即出來，成普仰視天空，陽光下許多白點，成普大叫不好，正欲進屋叫高、毛出來，汽油彈紛紛落地，1093度高溫使得木板房起火，鐵皮房頂迅速下塌，毛高兩人未能跑出。另一個李振基，兩次都沒出屋的，被鐵皮屋頂壓住，因為靠近西門，用手托起房頂角脫險。成普上衣起火，臉燒傷一塊。

警報解除，彭德懷辦公室的獨立房子餘火未熄。解方參謀長命令警衛連從溝底取水澆滅餘燼，給鐵皮房頂降溫，掀開房頂，從



毛岸英的侄子毛新宇及妻子、兒子在紀念毛岸英犧牲 55 周年座談會上。

手錶殘骸判明了毛岸英遺體（當時辦公室只岸英一人有手錶）。高瑞新只有 23 歲，是一名優秀的機要參謀，在大西北，是彭總的棋友，兩人總為了爭棋吵得不亦樂乎。他犧牲後 17 天，他的女兒出世。管理處副處長張仲三讓工兵製作了兩副棺木，裝殮遺體。管理員海波（朝鮮族，懂朝語）去同朝方當地負責人洽商，告以兩位戰友犧牲（為保密不講姓名）請協助找一合適墓地安葬，看了三個地方，張仲三到現場選定北山坡一平地，警衛連一個排來開挖墓穴。海波又奉命到朝鮮居民家找來兩個玻璃酒瓶，用白布分別寫上毛岸英、高瑞欣名字裝入用圓木塞上，置於棺蓋用鐵絲纏繞固定。堆起墳包後，又用磚分刻毛、高埋於墓前作標記。

25 日黃昏，第二次戰役正式開始。

有人問過王亞志所謂“蛋炒飯”一說，他回答那是沒有的事，彭總辦公室根本沒有鍋，也沒有米，在朝鮮都是發炒麵。彭總和副司令們有炊事員，其餘的人都到老鄉家，燒水就炒麵吃，有時帶瓶油，去炒個菜。

毛澤東什麼時候知道兒子死訊？

25 日，悲痛、負疚的震撼使彭德懷精神上失去平衡，中午不吃飯，一整天沒有說話，一個人坐在防空洞裏沉默不語。下午提筆擬電稿上報軍委。時寫時輟，114 個字，寫了一個多小時。他寫得極簡略，為了避免寫毛和高兩人沒有值班任務，卻跑回辦公室。

傍晚，洪學智叫彭總吃飯。他激動地抓住洪的手：“洪大個兒，我看你這個人還是個好人哪！”

洪說：“我本來就是好人，不是壞人！”

彭總：“今天不是你，老夫休矣。”

“以後再挖防空洞，你不要再罵了。”

彭總默默陷入沉思，停了好半天，他才說：“唉，為什麼偏偏把岸英炸死呢？”

中央機要室主任葉子龍收到電報後，首先送給周恩來閱。周



中國人民志願軍
模範指揮員毛岸英簡介
(朝鮮文)。

恩來閱後在電報上批：“劉（少奇）、朱（德）：因主席這兩天身體不好，故未給他看。”

37 天後，1951 年元旦次日，周恩來交代葉子龍把志司來電送毛澤東，並附上便函如下：

主席、江青同志：

毛岸英同志的犧牲是光榮的。當時我因你們都在感冒中，未將此電送閱，但已送少奇同志閱過。在此事發生前後，我曾連電志司黨委及彭，請他們注意指揮機關的安全問題，前方回來的人亦常提及此事。高瑞欣是一個很好的機要參謀。勝利之後，當在大榆洞及其它戰場多立些紀念中國人民志願軍的烈士墓碑。

周恩來 1 月 2 日

這個便函收入《周恩來書信選集》第 446 頁（《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 年 1 月出版）並摘入《周恩來年譜》上卷第 112 頁（《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 年 5 月出版）。

《楊尚昆日記》第 69 頁 1951 年 1 月 2 日載：“岸英死訊，今天已不能不告訴李得勝（注：毛澤東轉戰陝北時的化名）了。長嘆一聲之後，他說：犧牲的成千成萬，無法只顧及此一人。事已過去，不必說了。精神偉大，而實際打擊則不小！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有下鄉休息之意。”（《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 年 9 月出版）。

《葉子龍回憶錄》第 196 至 198 頁載：“彭德懷又給毛澤東發來一電，並提到上次電報中談到的戰事翻譯有誤。這一次，我把電報直接給周恩來送去。周恩來說：‘不要瞞了，總瞞著也不是辦法，報告主席吧。’

“我手拿兩封電報走進毛澤東的辦公室，他正在沙發上看報紙。我小聲叫了一聲：‘主席’，然後把電報交給他，然後默默地站在那裡。

“這時，我感覺空氣仿佛凝固了。

“毛澤東將那份簡短的電報，看了足足有三、四分鐘，他的頭埋得很深。當他抬起頭時，我看到他沒有流淚，沒有任何表情，但他的臉色非常難看，他向我擺了擺手，說：‘戰爭嘛，總會有犧牲，這沒有什麼！’

“我聽完後，小心翼翼地退了出來。第二天，江青得知了消息，她跑到毛澤東的辦公室裏哭鼻子。”

王亞志書中披露一組數字：志願軍先後入朝官兵共 190 餘萬人，其中陣亡、失蹤、負傷、生病官兵均列為減員，據統計共 978,122 人，佔總員額 51.5%。

犧牲的團職以上幹部，據不完全統計共 211 人。其中副軍長 2、軍參謀長 1、師長 5（內飛行師長 1）、團長 22（內飛行團長 4）、團政委 13 人。營、連、排職幹部犧牲數不明。

這是根據多年之後民政部的全國調查。毛澤東的兒子只佔 978,122 分之一。

《真言》的記述與上述周、揚、葉的都不同，它編了一個新故事。說 1950 年 11 月 25 日當天：

在中南海，葉子龍拿著彭德懷發來的電報，兩眼淌出熱淚，他想去

找李銀橋，可李銀橋侍衛著毛也到新六所去了……

葉子龍來到西花廳……周恩來的眼眶已經發紅了：“你到新六所去，先讓江青同志看一下這封電報，聽她怎麼說。”

來到新六所，葉子龍沒有直接找江青，而是先找到李銀橋：李竟一時驚得兩腿發軟，一下子坐了樓前的水泥地上。

好一會，葉子龍才將淚流滿面的李銀橋從地上攙扶起來。

江青看了電報，也被驚嚇地靠在了樓道的牆壁上。

李銀橋喃喃地說：“這麼大的事，不說也不行。”

見到主席，江青發話：“現在四個人正好一桌，咱們搓會兒麻將吧！”

毛澤東胡了好幾盤，推了一下麻將牌，起身說：“走麼，一起喫飯去！”

飯後，落入的餘輝映紅了北京西上空的半邊天。毛澤東、江青、李敏、李訥、葉子龍和李銀橋一起在新六所的院子裏散步。（11月底，正是北京白日最短的冬季，五點天就黑。請大家算一算此時應該是幾點鐘？看得到晚霞嗎？）

散步歸來毛澤東又帶眾人走進休息室打起乒乓球。

停下來休息，毛澤東坐在沙發上開始吸煙，還情不自禁唱起了京劇《大登殿》“一馬離了西涼界……”

江青示意葉子龍走向毛澤東。葉子龍：“主席，朝鮮戰場前後打了兩次戰役後，美帝國主義進行報復，派飛機用那個汽油彈炸了志願軍總部……”（此時志願軍第二戰役剛剛打響……）

“這個彭德懷！”毛澤東生氣地說，“我拍了電報讓他轉移麼！……”

葉子龍說：“岸英他……”

毛澤東的煙頭一下子掉轉了地上，靠坐在沙發上，兩眼直怔怔地看著面前的江青。

如此《真言》，倘若毛澤東在水晶棺中有知，該罵的應當是誰？

王亞志揭露：1951年2月21日，彭德懷從安東機場起飛，閃電式回北京，13時下飛機，直奔中南海菊香書屋，但毛此時在玉泉

山。彭立即趕往玉泉山靜明園，毛確實在午睡，李銀橋阻攔，彭德懷直闖進毛的臥室，毛即起床：“只有你老彭，才會在人家睡覺時候闖進來提意見。”

在《真言》503頁，這件人所共知的事情，又被竄改成：“離開朝鮮回國，到北京直奔中南海菊香書屋見毛澤東，因毛還在午睡，被持槍的李銀橋攔阻。”

醜類和小人著意美化自己，抬高自己，正是醜化和歪曲歷史的一貫伎倆。（柳江）□

潘海波與其他一萬四千名不願回大陸的志願軍戰俘，踏上台灣土地，曾體會過戰場殘酷，他始終抱持著看淡世事的態度，“我在台灣不能說過得很好，普普通通，”但心靈上，潘海波得到滿足：我總感覺自由比任何東西都可貴

韓戰戰俘潘海波的 豁達與思念

一個年少時的熱血念頭，成了潘海波的人生轉折點，因為韓戰，潘海波經歷了大大小小的生死關頭，也目睹了生命的脆弱。抵達台灣後，他走訪了世界各地，就是沒再回過大陸。雖然對於人生，潘海波豁達談論，但台灣海峽那一頭的家鄉，還是他心中最深的牽掛。

國共內戰加入國軍

1933年，潘海波在四川一個商人家庭中出生，沒多久，戰爭便闖入潘海波的人生。1937年，中國對日全面抗戰爆發，潘海波在戰火下進入小學就讀，同一時間，中國共產黨也在俄國武器的支持下，逐漸拓展勢力。

中國對日抗戰隨後演變成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組成部分，日本投降了，潘海波繼續完成小學學業之後，離開父母與兩個哥哥、一個妹妹，到成都學做皮鞋。戰爭過後的中國，百廢待興，但沒多久國共內戰正式引爆，中國再度陷入紛亂，而潘海波則憑著一股年少熱血，投



潘海波看淡世事，心靈上很滿足。

身國民黨軍隊，那年，他才 16 歲。

“那時候的老百姓沒有政治意識，但共產黨紅軍的兩萬五千里長征中，從四川、西康打到西北，聽說沿途在農村裡殺人，對有錢的人特別是地主很壞，所以四川人對共產黨普遍印象不好，心裏都怕怕的。”潘海波對明鏡記者回憶。

由於這種對共產黨的負面印象，潘海波在 1949 年穿起國民黨軍裝。當時蔣中正正在成都成立游擊幹部訓練班，簡稱游幹班，吸收四川和成都的幫派成員——洪幫到陸軍官校受訓。國民黨陸軍官校教務主任王學甫在蔣中正離開成都後，在當地成立了一個教導總隊，一共六個團，王學甫擔任主官，副主官則由洪幫大哥派出來的人擔任，這些人號召當地青年從軍，潘海波也順勢加入。由於潘海波認識的一位鄰居當教官，擔任通信任務，潘海波也就參加了通信連——當時所謂“通信”，就是有線電話。

潘海波自己並不是洪幫成員，他稱自己“只是個小孩子，什麼都不懂，沒有政治意識，只是不滿共產黨”。當時一心想對抗共產黨的潘海波，沒料到國民黨會節節敗退，自己甚至成為共產黨的戰俘。

編入“抗美援朝志願軍”

1949 年底，劉伯承率領他的第二野戰軍從南邊進攻四川，賀龍也帶著第一野戰軍從陝西進攻四川，“那時路線都講好，由王學甫帶我們六個團，從西康、緬甸撤到台灣”。但川軍 24 軍劉文輝投向中共，當時王學甫的隊伍還在成都溫江縣，完全不曉得劉文輝投共，解放軍從後邊追上來，包圍王學甫的六個團，六個團都過不了泯江，更沒法到台灣。

“那時候我們的武器都是不錯的，都來自軍校，有一批武器都沒有用過，像轉盤的機槍，蘇聯製的帶刺刀的步槍……都是二次大戰時蘇聯留在中國，由陸軍官校保管，然後分給六個團的。”只是，根本沒有打仗經驗、沒有受過正式軍事訓練的潘海波所在的部隊，拿到再好的武器也起不了作用。在共產黨軍打過來的時候，潘海波連仗都沒打，部隊就垮了，潘海波因為年輕力壯，被共產黨補充到 60 軍當通信兵。換上解放軍軍裝後，潘海波只能“當一天和尚敲一天鐘”，但仍舊沒遇過真正槍林彈雨的場面，只是參與地方上的“剿匪”行動。

共和國成立一年多，潘海波遇上了改變往後人生的轉折點——韓戰。“那時候共產黨稱‘抗美援朝’，我們 60 軍就離開四川，一路經西北、華北、東北，渡過鴨綠江到了朝鮮。”潘海波回憶，接獲參戰通知後沒想過要逃跑，因為逃跑若被抓回，可都是要槍斃的，而當時自己雖然身為通信兵，仍舊會走到戰爭最前線。“那時候一過了鴨綠江後，已無所謂前方後方，也有時晚上行軍，翻過去天亮後發現到了前線。”

潘海波回憶，在紛亂的年代，沒仔細思考“害怕”這件事，因為每天都得克服更實際的難題。當時毛澤東採取人海戰術，將大批“志願軍”送往戰場，第一線的部隊每人還能領到兩百發子彈，不過由於通信兵不是正規的作戰部隊，大家幾乎都沒有武器，醒來就是行軍與逃命，還要忍受飢餓的折磨。

“後面也在打仗，食物補給不上，我們有兩三個月根本沒有後面

的補給。”潘海波回憶說，為了活命，只好吃樹葉、吃草，就這樣撐了下來。

部隊為了躲避美軍的轟炸機，只能在晚上行軍，“我們的行軍沒有在白天走的，白天美軍的飛機都在天空，他們的偵察機很可怕，炮彈很快就到。”潘海波說，有天晚上軍隊爬一座大山，大夥下山後走山溝，過了山溝後，同袍中有個人開了一下手電筒，厄運立刻降臨。前面的七、八個士兵立即被落下的飛機炸彈中倒下，隔天一早，部隊沿著山腰準備撤退時，再度遭受炮彈攻擊，一群人拚命地逃，潘海波聽到有人嚷嚷著趴下，待他趴下，炮彈炸響後，他一抬頭，跟他隔著一塊石頭的副連長已經倒下，副連長一翻過來，肚破腸流的可怕景象映在潘海波眼底，但當時已自顧不暇，潘海波只能再度逃命。

潘海波也曾越過軍人最怕的機槍和炮彈封鎖線，敵方的機關槍與炮彈對準著封鎖線，誰要經過，就毫不留情地掃射，潘海波與同袍只能硬著頭皮衝過，遍祈禱不長眼睛的子彈別射中自己。沙場的無情，潘海波親眼見證。

沒打什麼仗就被美國人抓去

沒過多久，潘海波再次經歷身分的轉換。

“我們 1951 年 2 月在華北過農曆春節，3 月過鴨綠江，5 月份就被俘虜了。”潘海波說，那時他們沒打過什麼仗，到了前方，隨後遭美軍包圍，部隊垮掉，美軍追上，潘海波與一些同袍高舉雙手走向美軍，成為戰俘。

潘海波表示，有些曾經在國民黨軍隊幹過、後來變成解放軍，又被派往朝鮮的軍人，反而樂於成為戰俘；也有忍受不了飢餓和恐懼的士兵，主動向美軍投降。“我們在共產黨治下待了有一年多，覺得共產黨統治的生活不適合我們一般老百姓——他們推崇‘無產階級’，老百姓沒資產，所有土地都是國家的。”

成為戰俘後，剛過漢江，潘海波就被送往釜山，再坐船到巨濟島的俘虜收容所。當時的巨濟島俘虜收容所收留大部分的北朝鮮戰

俘，以及陸續被俘虜的 21300 多名中國戰俘，“中國部隊被美軍俘虜的有兩個聯隊，一個是 72 聯隊，一個是 86 聯隊，72 聯隊有兩個大隊，86 聯隊也有兩個大隊。後來兩個聯隊分成了一、二、三聯隊，一聯隊是原來的 72 聯隊，二聯隊是原來的 86 聯隊，三聯隊是從 72、86 兩個聯隊抽一些人成立的。”

潘海波當時身在 86 聯隊，之後在釜山成立一個中國人的工作大隊，準備由 86 聯隊派出 300 人加入這個大隊，因此，潘海波又回到釜山，在那待了一陣子，最後轉至濟州島，在濟州島幫助美軍處理物資，直到 1954 年聯軍成立遣送委員會，由瑞典、瑞士、波蘭、捷克、印度五個中立國代表組成，並在中立區召開甄別會，潘海波才獲得離開濟州島的機會。

“甄別會在帳棚裡舉行，問我們願不願意回中國大陸。我去了，裡面有印度、波蘭那五個國家的代表，還有中共、韓國、美國代表跟台灣翻譯人員。”潘海波回憶，一進門，中國大陸的代表就勸說這些軍人“回到祖國”，還宣揚共產黨的理念；但當時許多俘虜都曾在國民黨軍隊幹過，因此在戰俘營時，便一心想著到台灣。

“如果想去台灣，就從後面的門出去；要是願意回大陸，就從進來的門出去，有共產黨的人會把你接走。”潘海波回憶，當時他們喊得最熱烈的口號是“一顆心回台灣，一條命滅共匪”，“不管怎樣，我們到台灣後，享受到真正自由的可貴，共產黨的話，一切以黨中央的意思為意思，沒有自由。”

戰俘營中也有思念親人者，希望回中國大陸與家人團聚。但有人一旦表明想回大陸的立場，立刻遭到其他反共人士的報復。潘海波坦承，當時確實聽聞有人白天說想回大陸，晚上就被拖出去毆打，但他自己沒親眼見過。“戰俘營當然也有黑暗的一面，”潘海波說，營內打架的事件不是沒有，因而死亡的也大有人在。營內也搞聯歡表演，出了許多自己寫的歌曲和劇本。

戰俘營中的中國戰俘幾乎每個人的身上都刺了反共標語，潘海波也不例外，他的身上刺了“反共抗俄”、“效忠黨國”與國民黨黨徽。

“絕大部分的人都刺了字，都是每個人自願刺的，不是上面規定或被

逼的。”潘海波解釋，那時候參加戲劇演出的演員，有一部分人會選擇不刺，但也有很多人手臂、背上、腿上都刺滿了字，表明到台灣的決心，“是一種內心（對共產黨）不滿的反射。”潘海波說。

外傳當時台灣當局派人潛進戰俘營中，宣揚台灣政府的作為，拉攏戰俘到台灣。對於這點，潘海波表示不太可能。“那時候聯合國招聘了一部分台灣翻譯人員，要懂英文和中文的到那邊去，但他們沒跟我們一起生活。不過當時有所謂‘學校’，每天給我們放廣播，給我們宣講（國民黨的）這些東西。”

在戰俘營中的潘海波，餘暇時演演戲、唱唱歌，對於未來，不敢想太多，“那時想都是空想”，不過最後，他達成了一個心願。1954年1月，潘海波與其他一萬四千名台灣政府所謂的“反共義士”，一同踏上台灣土地。

抵台後沒過回家鄉

到台灣後，潘海波又隨著一萬四千名中的一千多人，一同進入海軍受訓，一路從上等兵、下士做到中士，1967年，潘海波赴美受訓，負責接收安陽18號軍艦的任務，隨後走過美國的阿拉斯加、羅德島、波士頓，接到艦後，又開到古巴的關塔那摩，在該地受訓，接著回到美國費城，再開過巴拿馬運河到夏威夷珍珠港。

回到台灣的潘海波一直在安陽艦上服務，直到1972年以中士位階退伍。退伍後，曾接受過商船船員訓練的潘海波，1973年又回到船上，跟著商船踏遍數十個國家，只有共產國家沒去過。“那時候在美國待的時間比較久，歐洲、日本也去過很多次。”潘海波認為歐洲好玩的地方很多，很值得去。

但是，走訪世界各地的潘海波，卻沒再回到家鄉，甚至在國外跑商船時，曾幫友人寄信回大陸，但自己卻沒有寄一封給家人。“那時候在台灣還不可以給大陸寫信，我在國外可以寫，但我沒寫過。”明鏡記者問他，難道不想念家人嗎？潘海波提高了音量：“一個人，尤其是親人，哪一個不想念自己的親人？這是天生的，親情比任何東西

都重要！”但潘海波看了太多負面例子，最後決定不去打擾在大陸的家人。

“我也考慮了很多，我沒有錢啊。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的時候，菲律賓比台灣富有太多，那時候台灣有親戚在菲律賓或美國，台灣的人就會高興得不得了——大陸的人也是這樣看我們啊。”潘海波說，那時候大陸比較貧窮，都認為在台灣的人發了財。“我沒錢，所以沒回去，我不是不想念我的家人，我有家人：1949年我父親已經70多歲，我母親已經去世，我家裡還有哥哥、妹妹，假如我有錢，我跟他們聯絡上，幫助他們一點，我心裡也高興，但我沒有，所以不想增加他們的困擾。”

開放探親後，潘海波看到許多老兵回到大陸去，把在台灣所有的錢財都搬了回去，結果因為財產分配不均，鬧得不愉快，甚至有人散盡積蓄，回到台灣來自殺。“看看那些人從大陸回來後，除了幾十封信其他都沒有，信裡只有一個要求：要錢。”因此，潘海波決定把對家人的思念深埋在心中。

在台灣不能說過得很好，但心靈滿足

1983年，潘海波卸下商船工作，幫朋友經營一間台中餐廳“老夫子”，當時的餐廳老闆是雲南人，由陸軍國防部情報單位退伍，與潘海波結為好友，直到2000年，潘海波才到位於台北三峽鎮的台北榮譽國民之家安養。

雖然潘海波已77歲，但談起話來仍中氣十足、侃侃而談，不時發出笑聲。曾體會過戰場殘酷的他，始終抱持著看淡世事的態度。

“我在台灣不能說過得很好，普普通通。”但心靈上，潘海波得到滿足。“人的一生短短幾十年，在這幾十年當中，我總感覺自由比任何東西都可貴，中國人過去常講一句話，只要我高興，有什麼不可以，但西方人說的是，每個人都要爭取自由，只是自由有範圍，在不妨害別人之下可盡量自由。經過韓戰到現在，到台灣，雖然共產黨沒殺到我家人，我家也不是地主，可是我對他們的制度始終不贊成。”

不贊成共產黨體制，不代表潘海波支持國民黨，雖然國民黨安置他到台灣，但潘海波仍認為所有的政黨都是“狐群狗黨”。“我從過去到現在沒參加過任何黨，我對任何政黨都稱之為‘狐群狗黨’，沒有一個好東西，台灣的國民黨與民進黨也是，哪個選上來是真正為老百姓、為國家做事？都是為了自己的黨、自己的利益胡說八道，所以我對政黨沒好感。”

潘海波至今仍獨身一人，但他在台灣不乏“親人”。陸軍輕航中隊中校李雄渾便是他最大的乾兒子，潘海波也另外認了一個小孫女。餘暇時，潘海波會唱歌、旅遊，也經常獲得榮民藝能競賽獎，手頭不闊綽的潘海波，在精神生活上，找到一片天。（《明鏡月刊》 陳恩）□

哈金認為，中國與西方對待戰俘的態度有差異，關鍵是個人和國家的關係不同。“在東方，個人為國家犧牲是無條件的，國家要你做什麼你就得做，要你犧牲你也得犧牲，西方不一樣，個人和國家是契約關係，國家不能隨便把個人出賣掉，否則誰以後去當兵呢？”

中國文化所造就的 “戰廢品”

“不論是戰俘還是罪犯，都應該作為‘人’來對待。”美籍華人作家哈金在接受明鏡專訪時如是說。韓戰至今過去 60 年，不只參戰國家蒙受巨大損失，身為戰俘的人，更是歷經天翻地覆的變化。然而，在中國“國家至上”的文化裡，不論他們曾經如何為國家付出、曾遭受何種不平等對待，他們都只是“被遺忘的一群人”。

戰爭中的“戰廢品”

1950 年，朝鮮半島爆發韓戰（中國大陸叫“抗美援朝”，韓國叫“六二五戰爭”），中國大陸派出大批志願軍奔赴朝鮮，協助金日成率領的朝鮮人民軍對抗韓國與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最後兩萬多名中國志願軍被俘，其中七千多人選擇遣返回中國大陸，另外一萬四千多人則前往台灣。

目前為美國波士頓大學英語系教授的哈金，為著名華裔作家，他在 2004 年出版的小說《戰廢品》（War Trash），將場景拉到朝



美國著名華裔作家哈金。

鮮戰爭，以回憶錄的方式，描述成都黃埔軍官學校畢業生俞元被派往朝鮮前線，使得他必須與母親和未婚妻相隔兩地，然而，原以為“美帝紙老虎一打就垮”的俞元，到了朝鮮後才發現美軍裝備精良，自己後來也成了美軍俘虜。在戰俘營中，俞元得面對支持共產黨和國民黨的中國人之間的明爭暗鬥，最後回到中國大陸的俞元，又得面對當局的懲罰、母親的逝世與未婚妻的斷絕往來——俞元成了這場戰爭中的“戰廢品”。

《戰廢品》很大一部分篇幅描寫中國戰俘在戰俘營中承受的身體與心理折磨，例如主人翁俞元一心想回鄉，但營中親國民黨者卻硬在他身上刺上“反共”字眼，要打消他回大陸的念頭。哈金在接受明鏡採訪時表示，當時的中國戰俘裡，當然有些人不是不想回大陸，而是因畏懼或在壓力下才選擇到台灣，也有人聽了國民黨的宣傳後，以為台灣的生活相當好，因而選擇抵台，後來感覺自己受騙上當，但是，大部分到台灣者仍是自願的。到台灣後，多數人仍

繼續從軍，跟普通的台灣士兵沒有太大區別，只是後來他們有很長一段時間回不了大陸，從此與家人兩地分離，絕大多數的人都思念家鄉的親人。

不過，比起選擇回大陸的戰俘，抵台的戰俘受到台灣政府熱烈歡迎，甚至特別設立“一二三自由日”（現改名為“世界自由日”）以資紀念，而回到大陸的志願軍戰俘多半被開除黨籍、團籍，受到政治審查和迫害。哈金介紹，當時的國民黨部隊很缺兵源，韓戰戰俘正好多少彌補了這個短缺，因此中華民國政府歡迎戰俘，至於回大陸的戰俘，很多被放到邊遠地方勞動改造或關進監獄，其中不少還被戴了帽子，成了壞份子，像《戰廢品》的主人翁俞元，只被開除黨籍、未婚妻避不見面，情況“還算比較好的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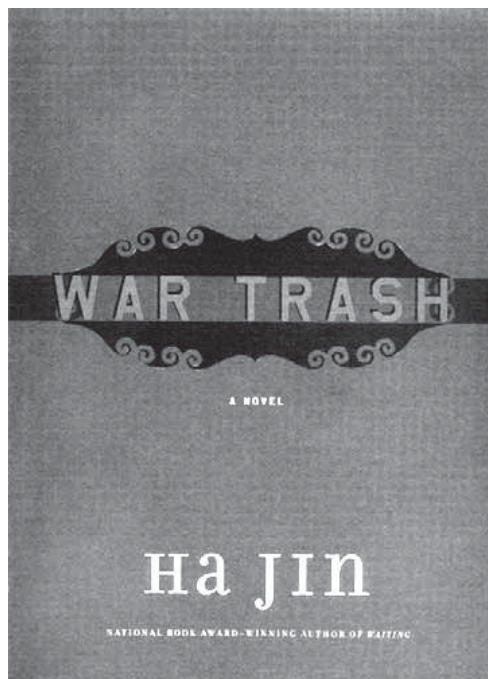
東西方對待戰俘大不同

14歲時參軍，曾在中國人民解放軍服役五年，並在朝鮮族村落駐紮過半年的哈金，認為戰士害怕當戰俘，比戰死沙場更令他們害怕。哈金指出，朝鮮戰爭中有不少志願軍原本是國軍官兵，在國共內戰戰場上“投誠”或者“起義”的；因此當他們被派到戰場時，有部分人反而希望透過戰俘這一渠道，回到國民黨管轄地區。但大部分的人還是希望回到家鄉。不過，成為戰俘後，有些人因為比較瞭解共產黨的規矩和文化，反而不敢回大陸了。

“他們覺得自己回去肯定會受到懲罰，當軍人時受的教育就是‘以身殉職’。越戰時候，有一種雞蛋大小的光榮彈，每個士兵發一個，要求如果被抓就引爆自殺——他們從沒受過當戰俘後應該怎樣處理情況，應該怎樣保持尊嚴的教育。”哈金說。

毛澤東有一句著名的話：“共產黨員連死都不怕，還怕困難嗎？”在“寧可戰死，不做俘虜”的觀念下，中國共產黨社會對待戰俘的方式，也與西方社會大不相同，西方社會對戰俘多半抱持理解與同情的態度，也經常熱烈歡迎返鄉的戰俘。哈金認為，東西方對待戰俘的態度有差異，關鍵是個人和國家的關係不同。“在東方，

哈金的長篇小說《戰廢品》(War Trash)，獲當年美國筆會／福克納獎，被《紐約時報》列為2004 年度十大好書之一。



個人為國家犧牲是無條件的，國家要你做什麼你就得做，要你犧牲你也得犧牲，西方不一樣，個人和國家有契約關係，美、英、法國都這樣，我服役不是沒有條件的，國家不能隨便把個人出賣掉，否則誰以後去當兵呢？西方比較尊重每個戰士，因為戰士都是為國家打仗的。”

哈金認為，西方尊重士兵的文化，與基督教有關係。基督教描述上帝創造人類，每個人人生來平等，國家不是由上帝創造，而是人類所創造，因而衍生出西方的個人主義，這也是民主的核心，但東方文化以集體為主，個人並不重要。

韓戰最後雙方都回到原點

《戰廢品》一書的副標題為：一場被遺忘的戰爭，一群被遺忘的人。中國大陸的教科書多年來將這場“抗美援朝”戰爭描述為“保家衛國”，稱：美國悍然派兵侵略朝鮮，一直打到鴨綠江邊，朝

鮮政府請求中華人民共和國出兵援助，最後中朝人民取得了反侵略戰爭的偉大勝利。

哈金指出，目前大量解密檔案披露，戰爭是由朝鮮當時的領導人金日成所發動，這也是各界普遍接受的說法。韓戰爆發後，聯合國安理會通過向韓國派兵的決議，並由美國指派聯合國軍司令，原本朝鮮人民軍已佔領了韓國首都漢城（現稱首爾），美軍為首的聯合國軍介入下，才扭轉戰局，迫使朝鮮軍隊往北撤退，而也就在此時，中國大陸決定出兵，因此不能說美國發動戰爭。

“中國教科書裡的那些都是宣傳，在我們看來，韓戰是一場打了兩、三年，雙方一共死傷兩百萬士兵，但最後都回到原點的戰爭，打跟沒打之前一樣，所以意義是什麼？雙方都沒有獲得任何好處，戰爭從一開始就是錯誤的，對中國來說不是偉大的勝利，美國人都承認這是在‘錯誤的時間、錯誤的地點，打的一場錯誤的戰爭’。”哈金補充，當時接替麥克阿瑟擔任韓戰聯合國軍司令的美國將軍李奇微表示，他們可以打到鴨綠江邊，但他們不願意犧牲更多的士兵，因而作罷。

在網路發達的今天，資訊取得更容易，但韓戰的歷史仍存在有待釐清之處，在歲月的沖刷下，韓戰也逐漸被現今一代人淡忘，幸而資訊的流通也開始讓中國人接觸到不同的訊息，漸漸清楚韓戰的原貌。

哈金認為，雖然至今為止出現許多韓戰的紀錄或文學作品，但仍只構築出一個歷史大框架，有些東西，例如朝鮮在戰爭中的傷亡人數仍舊不清楚。而現今一代的人，在共產黨教育下成長，沒出國之前，基本上不知道韓戰的真相，覺得好像是場勝利，平時也不大談論這件事，但慢慢有越來越多人瞭解到，這場戰爭對中國來說損失很大。

哈金表示，相較於現在的人，韓戰在當時那一代人的眼中看來，有精神上的意義。“當年的人覺得韓戰的意義就是革命，當時中華人民共和國剛建立，共產黨及跟隨他們的群眾覺得參戰很自豪，因為中國只是個弱國，才‘一歲多’就跟一個世界第一強國打了

個平手；中國通過這場戰爭，也在世界上謀取到了一個地位。但這種看法往往只代表領導人的看法——從‘集體利益’來看，他們不須考慮戰爭的代價和損失，他們認為就像毛澤東所說：‘中國人民站起來了。’這就是一切。確實，中國表現出‘站起來了’的姿態，但這只是精神上的勝利，根本沒有實質上的勝利可言。”

從人道主義看待戰俘

韓戰不只對朝鮮半島和中國大陸造成影響，也改變了國際間的格局。哈金分析說，在此之前，中國與美國之間沒打過仗，關係也可說相當友好，但這場戰爭把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美國從此劃成敵我雙方，彼此都有了敵意；其次，因為美國第七艦隊在韓戰時駛進台灣海峽協防台澎金馬，從此中國大陸沒有能力“解放”台灣；最後，中國大陸從此跟朝鮮拴在一起。

哈金的父親為“抗美援朝”的老兵，雖然沒當過戰俘，但曾被美軍圍困九個月，最後幸運逃出，“差一點就做了戰俘”。因為父親，因為曾見過韓戰戰俘，哈金深深體會到戰爭對一個人的影響與



《戰廢品》中文版被《亞洲周刊》評為2004年全球十大中文好書之一。

摧殘。“我曾在黑龍江一個農場見過從朝鮮回來的戰俘，在那裡做農工，”哈金表示，“理論上，國家和個人是平等的，國家應該報償個人，沒有理由將他們作為恥辱。”

《戰廢品》一書中，主人公俞元最大的希望就是自己的孫子未來能當醫生，能拋開政治的束縛，遵從人道主義原則對待病患。現實社會裡，哈金也希望外界以人道精神看待這些戰俘。“這些人都是在年輕力壯的青春年華，在應該體驗很多生活美好事物的時候就參戰了，因為國家涉入戰爭，他們的人生都毀了。”

“大家在談打仗前，一定要考慮到戰爭對普通人的影響與摧殘，很多是民族當中最好最優秀的年輕人，卻這樣拋撒了；其次，中國文化一直對個人壓抑與忽視，其實不論是戰俘還是罪犯，都應該作為‘人’來對待，最起碼，文化和社會要有一個道德底線。”哈金認為，這是世人對韓戰應有的反思。（《明鏡月刊》記者 陳恩）□

斯大林算盤雖精，但他既沒有欺騙金日成，也沒有欺騙毛澤東。對前者，他已經說明蘇軍不會參戰，如果美國介入就由中朝去承擔；對後者，他給了自主決定權——反復交代，只有得到中國同意，北韓才可開戰。中共如果不想介入，完全可以使用這一欽賜否決權。毛澤東是主動積極地當上冤大頭的

斯大林為何同意 金日成發動韓戰 ——兼與沈志華教授商榷

一、艾奇遜演說的風波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孤立主義思潮再度抬頭，想從全球事務中脫身出來。民主黨政府不但不援助中華民國政府，還一度對之實行武器禁運。就在中共席捲全國時，美國還從南韓撤回佔領軍。美軍的離去引起了南韓朝野的極大恐慌。李承晚總統在宣布美軍撤軍時間表的公開聲明中焦慮地說：“美國為我們留下的問題大到我們無法光靠自己去解決。……在共產黨人越過三八線進攻時如何援助我們的問題得到回答前，我們不相信美國會把它的剩餘部隊撤走。”儘管如此，美軍仍於 1949 年 6 月 30 日按計劃撤完，只留下了 400 多名顧問。對李承晚絕望的質問，美國人的回答是：“向聯合國求助。”（注 1）



1949年1月上任
的美國國務卿艾奇遜。

但此後中共勝利在美國引起了很大震動。共和黨人指責民主黨政府“丟掉了中國”，美國國務卿艾奇遜被迫發表白皮書自辯，說中共之所以上台，主要是國民黨腐敗了，不是軍事援助能夠解決的。從這個認識出發，他和杜魯門制定了相應的外交戰略，那就是向亞洲國家提供經濟援助，鼓勵其政治革新，搞好經濟，並以民族主義抵禦共黨在全球的擴張，而不是光靠美國以武力去保衛。根據這個戰略思想，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制定了 NSC 48/2 文件，準備向南韓提供經援。但美國國會卻否決了政府的相關提案。^(注2)

在此背景下，1950年1月12日，艾奇遜在美國全國新聞俱樂部發表演說，闡述了美國在亞洲的新戰略。他首先指出，亞洲正在勃興的獨立運動，不但成了人民從外國統治下爭取自由的象徵，也是人民從招致貧窮與苦難的暴政下爭取自由的象徵。

他以此解釋了中國發生的變化，再度為“丟失中國”辯解，說國

民黨是被人民拋棄的，政權是自動崩解的。他接著造謠說，蘇聯已快完全吞併了滿洲、內蒙與新疆，而此舉必將與中國的民族主義者發生衝突。因此，美國不要去進行愚蠢的冒險，那樣反而會把中國人民對俄國人的仇恨轉移到自己頭上來。

他接著介紹了美國在太平洋抵禦蘇聯擴張的防禦圈，這個防禦圈沿著阿留申群島到日本，然後再到琉球群島。美國將繼續控制這些重要地區。但美國不能為防禦圈外的地區提供軍事保證，這麼做既不明智也無必要。如果這些國家遭到進攻，必須首先依靠自己去抵禦它，然後再依靠在聯合國憲章指導下的整個文明世界的援助。這些國家有許多緊迫的問題，使得它們容易被顛覆和滲透，但這趨勢並不能以軍事手段去阻止。

據此，他強調指出，在亞洲新獨立國家中抵禦共產主義擴張最好的辦法，是幫助那些國家建立健全的政府，發展經濟，使得這些國家不再因人民無知、輕信虛假的諾言、或是因為苦難而被共產黨滲透。^(注3)

這個演說體現了艾奇遜的洞察力——他察覺到了第三世界民族獨立運動被莫斯科巧妙利用為“世界革命”工具，提出了反制措施。雖然這政策是在列寧提出“帝國主義與民族解放運動理論”幾十年後才提出的，但能看到這一點，總算是不錯了。

不幸的是，那演說有個重大疏忽——沒有把南韓和台灣劃在防禦圈內。他雖然要求國會通過法案援助南韓，卻又說美國對韓國的責任沒有對日本的那麼直接。更有甚者，他還說：“我們在那兒過去負有直接責任，也行動過，現在有著比更南面的國家更有效的機會。”這話給人的感覺就是，美國現在對韓國沒有直接責任，只是有機會。

當時中蘇都知道，美國放棄台灣已經是既定政策。現在艾奇遜既然間接宣布台灣與南韓都不在美國的防禦圈中，那就有可能誘使莫斯科相信，美國已經決定拋棄南韓。畢竟，當初中共席捲南中國時老美都沒有干涉，很難想像他們現在會為了個貧瘠的朝鮮半島大打出手。

朝鮮戰爭爆發後，艾奇遜演說在美國朝野激起了軒然大波，許多人指責它鼓勵了北韓侵略，美國國務院甚至不得不為此制定一份秘密文件，列舉演說中一些話語，要求有關人士引用它們去反駁指責者^(註4)。但責難的聲浪一直未平息。艾森豪威爾在1952年的競選演說中，指責艾奇遜的演說為北韓入侵“開了綠燈”^(註5)；麥克阿瑟說：“我覺得國務卿在遠東問題上聽取了糟糕的勸告”^(註6)；李奇微則說：“艾奇遜這種我們無意防守朝鮮的明顯表示，是絲毫也無助於動搖敵人採取行動的決心的(did nothing to give the enemy even momentary pause)。”^(註7)

蘇聯解體之前，大多數西方歷史學家都持此類觀點。例如 Robert Oliver 認為，戰爭之所以爆發，是因為美國官方聲明表明了美國不會保衛朝鮮^(註8)；David Rees 認為，艾奇遜的演說表明，西方因為虛弱和失算，將會容忍共產黨人在一個亞洲國家發動進攻^(註9)；Robert Donovan 認為，艾奇遜演說使得金日成、斯大林和毛更加相信冒險會取得成功^(註10)；Burton Kaufman 認為，艾奇遜的演說使金日成以為美國不會介入戰爭，而他則能得到蘇聯的持續援助^(註11)。即使比較謹慎的學者也認為，艾奇遜的演說至少是不明智的，例如 James Stokesbury 說：“除非看到北韓或蘇聯的檔案，誰也不能說那演說是綠燈，但可以有把握地認為，它不是紅燈，甚至也不是黃燈”^(註12)。類似地，Peter Lowe 說：“毫無疑問，傳播韓國可以被犧牲的印象是愚蠢的，它只會鼓勵北韓和蘇聯相信，如果北韓南下，去統一朝鮮半島，美國很可能不會採取有力的行動。”^(註13)

前蘇聯檔案解密後，許多學者仍持這一傳統看法，例如 Harry Summers 認為艾奇遜在其演說中明確表示美國已經徹底拋棄南韓，鼓勵了莫斯科與北京批准北韓的進攻^(註14)；Kenneth Lee 指責艾奇遜的演說是“公開邀請”共產黨發動進攻^(註15)；Michael Hickey 認為演說證實了美國已不再計劃保衛南韓^(註16)；Stanley Sandler 認為艾奇遜臭名昭著的演說鼓勵了平壤的侵略意圖^(註17)，等等。

二、艾奇遜演說與斯大林的考慮無關？

隨著蘇聯檔案解密，有的學者開始認為，斯大林同意北韓入侵南韓與艾奇遜的演說無關，並對斯大林的動機提出了新的解釋。據我有限閱讀所及，大致有三類看法。

第一種看法

第一種看法是沈志華教授在回答“鳳凰網”採訪時說的。他認為，斯大林決定發動韓戰的目的非常簡單，沒有人們想像的那麼複雜——是因為《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簽訂後，他在中國丟失了中長路、旅順港。蘇聯的太平洋艦隊沒有不凍港，失去了出海口，所以他要控制朝鮮半島，取得不凍港，“這樣做，又沒有大的政治和軍事風險”，所以就同意了金日成發動戰爭。^(注 18)

竊以為，此說恐難成立：

第一，它只是個猜測，既無直接證據亦無間接證據支持。

第二，它難以自洽：據我不完全的瞭解，北韓境內就有清津、興



沈志華教授認為：斯大林決定發動韓戰的目的非常簡單：他要控制朝鮮半島，取得不凍港。（高伐林攝）

南、南浦、金策、元山、雄基等六個港口，其中有四個港口冬季仍可航行，何必去南韓搶？

第三、它不符合斯大林的性格。斯大林最突出的特點，是極度謹慎，專門欺軟怕硬，避強凌弱，只在安全的前提下作最大限度的擴張。二戰前，他千方百計避免與德國和日本衝突，欺凌弱國卻無所不為。二戰後，他又千方百計避免與美國發生衝突，甚至不惜默默忍辱。

沈志華教授自己就揭示了這些事實：韓戰爆發後，美軍飛機多次侵犯蘇聯領空，甚至在 1950 年 9 月 4 日擊落了一架從旅順基地起飛進行訓練飛行的蘇聯轟炸機。蘇聯提出了抗議，但被美國拒絕。在進一步提出抗議前，斯大林還讓下面再次核實情況是否準確。美軍越過三八線的第二天，麥克阿瑟派兩架噴氣式戰鬥機襲擊了蘇聯濱海地區蘇哈亞市附近的一個機場，蘇聯作了唾面自乾的最大克制：既沒有派飛機升空迎敵，也沒有使用防空火力還擊。次日外長葛羅米柯召見美國參贊表示抗議，但美方拒絕接受抗議照會。蘇聯人只好把照會寄給美國大使館，卻又被美國大使館退回。斯大林不但忍氣吞聲，還把這看成是美國的警告，嚇得再不敢履行當初作出的派空軍為中國軍隊助戰的承諾了。（注 19）

如此慎重的人，怎麼可能為了取得一個不凍港就去輕率冒險？

第四，根據上述第三條可知，斯大林下決心的前提，一定是覺得北韓冒險不會引發與美國的直接衝突，亦即沈教授說的“這樣做，又沒有大的政治和軍事風險”。這個前提不滿足，則哪怕南韓有再好的港口，他也只會咽下饞涎。因此，想要不凍港不足以構成斯大林下決心的充分條件，更不可能是其必要條件。它當然有誘惑作用，但在他的利弊權衡中實在是無足輕重。

實際上，斯大林在很長時間內都在擔憂介入與美國的直接衝突。1950 年 1 月以前，斯大林一直禁止北韓向南韓啟釁，只許北韓自衛反擊。1949 年 9 月初，金日成向莫斯科請戰，準備奪占甕津半島及從甕津半島以東到開城附近的部分南朝鮮地區。如果國際局勢許可，就繼續向南方挺進，聲稱他們能夠在兩周、至多兩個月內

奪取南朝鮮^(注20)。斯大林於是命令蘇聯使館進行調查，評估雙方實力、南方人民對北方發動戰爭的可能反應，以及美國對北韓入侵的可能反應。蘇聯代辦調查後向莫斯科報告，人民軍實力不足以速勝，戰爭可能遷延不決，美國人很可能會介入，並利用它來作反蘇宣傳。即使光是奪下甕津都會使得戰事擴大，為美國人干涉提供藉口。^(注21)

據此，9月24日，蘇共政治局否決了北韓的入侵計劃，理由之一是它會向美國提供獲得聯合國授權派兵的法律依據，使得美國在朝鮮長期駐兵，推遲朝鮮的統一。^(注22)

10月30日，斯大林因蘇聯大使容許北韓沿著邊境進攻南韓位置而申斥了他，說：“這些挑釁對我們的利益是非常危險的，有可能使得敵人發動一場大戰。”^(注23)

因此，斯大林像當年生怕觸發與納粹的大戰一樣，小心翼翼地避免捲入與美國的直接對抗。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那個政治局指示準確地預見了後事。從這些證據來看，竊以為，為了個溫水港就輕率決定冒險，不像是這位不世出的戰略大師幹得出來的事。

斯大林的態度開始鬆動，乃是1950年1月底的事。1月17日，金日成向蘇聯大使哭訴，說若再不“解放”南韓，則他將失去朝鮮人民的信任，要求去見斯大林，獲得批准他進攻南韓的命令。若是斯大林不見他，他就要設法去見毛澤東。他強調說，毛澤東曾答應他在中國戰爭結束後將給予援助。^(注24)

1月30日，斯大林致電蘇聯駐朝大使：

“我理解金日成同志的不滿，但他應當理解，他想對南朝鮮採取如此大的舉措，是需要充分準備的。此舉必須組織得不冒太大風險。如果他想同我會談此事，那麼，我隨時準備接見他並同他談。請把此事轉告金日成並且告訴他，在這件事上我準備幫助他。”^(注25)

因此，儘管“幫助”的內容十分含混，斯大林畢竟是幾年來頭一次鬆了口。但3天后他又通知金日成，這事必須保持絕密，既不能告訴其他朝鮮領導人，也不能告訴中國同志^(注26)。直到3月18

日，他才同意向金日成提供軍火^(註27)。而他批准金日成發動戰爭，則是4月的事了。光從他花上這麼長的時間才打定了主意就能看出，這對他來說並非容易作出的決定。只是他後來覺得可以避開與美國交戰的危險，才最終有條件地批准了金日成的冒險。在與金日成的談話中，他把自己的考慮說得清清楚楚。

1950年3月30日至4月25日，金日成秘密訪問蘇聯。在此期間，他與斯大林會談了三次。根據聯共中央國際部的報告，有關韓戰的會談的部分紀要如下：

“斯大林同志向金日成證實，國際環境已變化到足以容許在朝鮮統一中採取更主動的態度。

在國際上，中共對國民黨取得的勝利，改善了在朝鮮行動的環境。中國不再忙於內戰，可以將注意力與能量用於援助朝鮮。如果有必要，中國可以將軍隊用於朝鮮，而不至於損害它的其他需要。中國勝利的心理影響也是重大的，它證明了亞洲革命者的強大，顯示了亞洲反動派及其西方與美國後台的虛弱。美國人離開了中國，不敢用武力去挑戰新中國政府。

因為現在中國已經與蘇聯簽訂了同盟條約，美國人將更不敢輕易挑戰亞洲的共產黨人。根據從美國來的消息，情況確實如此，普遍的心情是不要干涉。蘇聯有了原子彈以及我們在平壤的地位的鞏固，越發加重了這種心情。

但是，我們必須再一次全面衡量解放戰爭的利弊。首要問題是，美國人會不會干涉？其次，只有得到中國領導的批准，才能發動解放戰爭。

金日成認為，美國人不會干預。現在他們既然知道蘇聯和中國站在朝鮮後面並能援助它，美國人就不會冒一場大戰的風險。至於毛澤東同志，他從來都支持我們解放全國的願望。毛澤東同志說過幾次，在中國革命完成後，中國將援助我們，如有必要就派出軍隊。但我們想依靠自己的力量統一朝鮮，我們相信我們能做到。

斯大林同志強調必須進行徹底的戰爭準備：首先，部隊的準備必須提高到一個更高水平。你們必須組成精銳的攻擊師，並且組建

別的單位。師必須有更多的武器以及更加機械化的機動與作戰的手段。你們在這方面的要求將會得到全部滿足。

然後，必須制定一個詳盡的進攻計劃。基本上，進攻必須有三個階段：（1）將部隊集結在靠近三八線的指定位置；（2）由北朝鮮的最高權力機關提出新的和平統一建議，這些建議必將被另一方拒絕；（3）在和平提議被拒絕後，必須發動反攻。我同意你首先在甕津半島投入行動的想法，因為這有助於掩蓋是誰挑起了戰爭（蘆注：當時南北雙方頻頻在甕津衝突。北韓軍隊在那兒發動進攻，容易給人以邊境衝突擴大的錯覺）。你發動進攻、南方反攻，這就給你一個機會擴大戰線。戰爭必須迅速，使得南韓與美國人沒有時間去組織有力的抵抗和動員國際援助。

斯大林同志補充說，朝鮮同志不能指望蘇聯直接參加這場戰爭，因為蘇聯必須在別的地方特別是在西方應對嚴峻的挑戰。他再次敦促金日成去與毛澤東會商，說那位中國領袖頗懂東方的事務。斯大林重複說，蘇聯未準備好直接介入朝鮮事務，特別是如果美國人冒險派兵入朝的話。



斯大林是個精明的戰略大師。

金日成對美國為何不會干預作了更詳細的分析：進攻將是迅速的，三天就能贏得戰爭；南方游擊隊變得更強大了，大規模起義將會爆發。美國人將猝不及防，等到他們回過神來時，全體朝鮮人民都將熱烈支持新政府。”（注28）

在此，斯大林把他的思路說得水晶般清明透亮，他考慮的最主要的兩個問題是：“首要問題是，美國人會不會干涉？其次，只有得到中國領導的批准，才能發動解放戰爭。”

他對第一個問題的回答是，美國人干預的可能性不大，這是三個因素造成的：中國革命勝利使得中共可以全力支持朝鮮，包括必要時派兵；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的簽訂；蘇聯有了原子彈。因為這些變化得美國介入的可能性極大地降低了，根據他“在安全的前提下作最大限度的擴張”的戰略原則，他當然要覺得可以“在朝鮮統一中採取更主動的態度”。

對第二個問題，他也作了明確規定：中國的批准是發動戰爭的前提。這是因為萬一美國人干預，蘇聯不能直接介入，只能由中國派兵。很明顯，如果中國不派兵，那這場冒險就只會以災難收場。因此，他把中國是否批准當成開戰的先決條件。如果毛澤東批准，那就動手；如果毛不批准，那就不能開戰。中國因素在他的全盤考慮中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不但占了他列舉的國際形勢三個有利變化中的兩個，而且是他用以應對美國干涉的唯一手段。

正因為此，他才反復強調，萬一美國人干涉，蘇聯只能置身事外，反復強調開戰必須得到中國的批准，並一再敦促金日成去與毛會商。毛一旦批准金日成開戰，當然也就責無旁貸，必須在美國人干涉時挺身而出。

說穿了，斯大林的如意算盤，是把中國拉進來，將那批准變成中蘇聯合批准，使金日成的冒險事業變成三國聯合企業（英文的“聯合企業”co-venture 也就是“共同冒險”的意思）。利潤由蘇朝分享，風險由中朝承擔。如果美國人不動手，那當然就不必讓中國派兵，省得“備胎股東”變成事實股東；如果美國人動手，則他已經把話說在前頭，蘇聯只能袖手旁觀，而他已向金日成指出，中國人可以

心無旁騖地支持他們，包括派兵參戰。

斯大林這麼說，當然是有依據的。1949年5月毛在會見朝鮮人民軍政治部主任金一時曾明確表態：“如果北南朝鮮發生戰爭，我們將提供力所能及的一切”；“我們認為，類似北朝鮮進攻南方這樣的行動，只有在1950年初國際形勢有利於這一點時，才可以採取。當日軍入侵朝鮮時，我們能迅速派出自己的精銳部隊消滅日軍。”（注29）次年5月，毛澤東又對朝鮮駐華大使說，用和平方式是不能統一朝鮮的，統一朝鮮必須要用武力才行。對於美國人，不要怕他們。美國人不會為了這樣一塊小地盤就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注30）

5月間，金日成按斯大林的要求，秘密訪問中國，並於13日會見了毛澤東。在向毛傳達大老闆的指示時，他微妙地扭曲了斯大林的意思。根據蘇聯駐華大使羅申給斯大林的電報，他向毛傳達的話是：

“在與毛澤東同志交談中，朝鮮同志通知了菲利波夫同志（斯大林的代號）的如下指示：現在的形勢與過去不同了，北朝鮮可以開始行動；但是，這個問題必須同中國同志和毛澤東同志本人討論。”

這話給人的感覺是，斯大林已經批准，只需要再跟毛討論一下就行了。不僅口氣與斯大林的原話不大一樣，而且斯開出的“必須獲得中國批准才可開戰”的先決條件也被略去了。

毛的計劃是等攻佔了台灣再打南韓，因此對斯大林讓北韓先動手頗感意外。他當即中斷會談，讓周恩來去找蘇聯大使羅申，要他發電報向斯大林核實。斯大林的腦袋可不比毛的，非常清晰，立即於次日回電，補上了被金日成貪汙了的那一條，明確指出中國對此問題具有否決權：

“毛澤東同志！

在與朝鮮同志會談中，菲利波夫和他的朋友們提出，鑒於國際形勢已經改變，他們同意朝鮮人關於實現統一的建議。同時補充一點，這個問題最終必須由中國和朝鮮同志共同解決，如果中國同志不同意，則應重新討論解決這個問題。會談詳情可由朝鮮同志向您講述。

菲利波夫”(注 31)

因此，嚴格說來，金日成的騙術並未奏效，斯大林給中國的否決權未能被金吞沒。中國完全可以否決。韓戰是毛主動跳進去的，並不是斯大林推進去，也不是金日成拉進去的。

綜上所述，斯大林策劃此事時十分慎重。如果他只是為了取得溫水港去冒險，就不可能將否決權授給毛。他雖然低估了美國介入的風險，但這自始至終是他的隱憂，特地為此埋伏了後著。所以，嚴格說來，後來發生的事並未完全超出他的意料。

第二種看法

第二種解釋是 Kathryn Weathersby 作出的。她注意到，斯大林與金日成會談時說，“從美國來的消息”表明“普遍的心情是不干涉”，據此推斷，斯大林通過他的間諜唐納德·麥克冷 (Donald MacLean)，搞到了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於 1949 年 12 月下旬制定的 NSC-48 文件。該文件“將美國的防禦圈劃在日本和菲律賓的西面，將亞洲大陸排除在外”。斯大林因而決定在遠東推進，以填補美國人留下來的真空。朝鮮戰爭不過是這大戰略的一部分罷了。

她作出這一推測的依據是，NSC-48 是在 1949 年 12 月下旬制定的，此後斯大林的態度就發生了明顯改變：1949 年 12 月中旬，他還拒絕了毛澤東請求簽訂新的中蘇同盟條約以取代國府與蘇聯在 1945 年簽的同盟條約。但到了 1950 年 1 月 6 日，他卻同意了與毛簽新約。與此同時，他還指示日本共產黨採取推進戰略，並承認了胡志明政權。(注 32)

此說為基辛格採用，寫在他的新作《論中國》裏。此外，他也認為，促使斯大林改變態度的另一個原因，是中蘇條約規定蘇聯最終將失去旅順那個溫水港，“斯大林很可能認為，一個統一的共產黨朝鮮更能滿足蘇聯海軍的需要”。(注 33)

在 American RadioWorks 訪談錄中，Weathersby 重複了此說，並認為斯大林改了主意與艾奇遜演說無關，因為斯大林是在 1 月初改變主意的，而艾奇遜的演說是 1 月 12 日的事。(注 34)



金日成極力忽悠斯大林和毛澤東。

在我看來，此說破綻甚多，難以成立：

第一，她提到的 NSC 48 文件，應該是 NSC 48/2（基辛格在引用時作了改正）。美國國安會並沒有發過稱為 NSC 48 的文件，只有 NSC 48/1 與 NSC 48/2。NSC 48/1 是國安會 1949 年 12 月 23 日寫出來的的報告文稿，篇幅較長，其結論部分經過修改後，便成了 NSC 48/2，為杜魯門批准，於 1949 年 12 月 30 日下發。因此，真正有效的政府文件是 NSC 48/2，它概括了美國在亞洲應取的戰略以及相應的政策與措施。

問題是，在該文件中根本就找不到“防禦圈”這個詞。就連對美國的太平洋防線何在，它也未作具體描述。它的主旨是，在亞洲反共防共，不能光用軍事手段，要針對內部原因對症下藥，利用民族

主義去抵制共產主義，更要鼓勵亞洲國家政府革新政治，發展經濟，改善人民生活，從根本上消除這些國家在抵抗共黨顛覆滲透中暴露出來的內在的脆弱性。在這麼做時，美國一定要與殖民主義劃清界限，要讓這些國家的人民理解美國的善意，不要把它誤當成帝國主義。

該文件雖然說明美國將“在選定的亞洲非共國家中充分發展軍事實力”，並指明了日本、琉球群島與菲律賓是中選國，但同時也說要向其他受累國提供政治經濟軍事援助，還特地指明要對韓國繼續提供政治、技術、軍事與其他援助^(注 35)。它既未劃定防禦圈，也未說美國將區別對待圈內外的國家：圈內地區遭到入侵就直接出兵，而圈外地區遭到入侵就通過聯合國解決。這些都是艾奇遜在演說中提出來的，不是該文件的內容。艾的演說的基調雖然與 NSC 48/2 一致，但在若干重大地方，他超出該文件作了發揮。Weathersby 沒看過該文件，卻誤把艾奇遜的演說當成了它，而曾任美國國安會主任的基辛格竟也未發現這錯誤。

既然所謂“NSC 48 文件……將美國的防禦圈劃在日本和菲律賓的西面，將亞洲大陸排除在外”純屬虛構，那它又怎麼可能使得斯大林改了主意？

第二，所謂“斯大林通過間諜麥克冷弄到 NSC 48”不過是個猜測，沒有任何證據支持這一點。而且，杜魯門不久後就改行所謂“杜魯門主義”（Truman Doctrine），亦即在全球防堵共產勢力的擴張。1950 年 4 月 14 日，國安會發出 NSC 68 文件，奠定了美國的冷戰戰略，那就是以強硬的武力手段去迎擊蘇聯的擴張活動。文件提出要保衛盟國地區與動員基地，使得取勝所需的攻擊力量得以建立起來，以攻擊行動摧毀蘇聯的戰爭能力的關鍵要素，直到美國及其盟國全力反攻並取得勝利。^(注 36)

那個文件下發時，正值金日成為發動戰爭訪問莫斯科。既然斯大林能通過那萬能的麥克冷搞到 NSC 48/2，想來也能搞到這份更重要的情報。在這種情況下，他還會認為美國正在撤退，留下了大量真空，就等他去填補麼？

第三，該假說不能自洽。日本在艾奇遜描述的防禦圈之內，NSC 48/2 也強調要加強美國在該國的軍事實力與地位。既然斯大林根據該文件判定何處是真空，那他命令日本共產黨採取推進戰略又怎能用來作該假說的證據？“敵進我進”豈可作“趁虛而入”解？

第四，她用以論證該假說的其他線索也未必成立。例如她說，斯大林是在 1950 年 1 月 6 日通知毛準備與之簽訂新約的。但斯大林在此前就已經改了主意。1950 年元旦，斯大林派人將他為毛起草的《答塔斯社記者問》送到毛澤東處，其中說毛首先考慮的“是現有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問題”（注 37）。次日莫洛托夫與米高揚即來見毛，證實了斯大林想簽新約，令毛喜出望外（注 38）。NSC 48/2 是在 1949 年 12 月 30 日下發的。斯大林不可能在當天就看到它（華盛頓比莫斯科晚 8 個時區，該地的 30 日下午 4 點後即是莫斯科 31 日清晨），並因此改變主意，寫出那文字，並於次日送到毛澤東處。

因此，竊以為 Weathersby 的假說無法成立。

第三種看法

第三種解釋則是由 James Matry 提出的。他認為，斯大林發動韓戰，不是出於擴張欲，而是出於恐懼。他低估了北韓的武力，害怕南韓在未來大舉進攻並摧毀北韓政權。因此，韓戰其實是他為了先發制人以絕後患而發動的。他還否定了艾奇遜演說對斯大林決策的影響。（注 39）

此說不但缺乏證據，而且難以自洽。他舉出來的檔案證據，只能證明斯大林曾認為北韓武力不足以征服南方，因此制止了金日成輕舉妄動（這確為事實，檔案證據表明，至少在 1949 年 10 月 30 日以前，斯大林是這麼看的。見注 23），但並不能證明斯大林認為北韓會被南韓推翻，更不能證明他後來突然反轉了對雙方實力的評估，而這才是該假說最需要的關鍵證據。缺了這一證據，Matry 便不能不陷入自相矛盾：既然斯大林如此低估北韓武力，為何還會被金日成說服北韓可以速戰速決？出於恐懼而不顧實力對比、孤注一擲，從來不是他的性格，何況據 Matry 說：“直到朝鮮戰爭爆發，斯大

林都一直在擔心美國干預。”既然斯大林認為北韓連南韓都打不過，又一直在擔心美國干預，那他又怎麼可能批准這種註定要失敗的冒險呢？

他對斯大林為何改主意的解釋是：“1950年春，斯大林再也不能無視美國亞洲政策正在強硬起來的跡象”。這斷語與斯大林本人說的完全相反。如上所述，他不但告訴金日成“美國人將更不敢輕易挑戰亞洲共產黨人”，而且還把“我們在平壤的地位的鞏固”當成了原因之一。

Matry 否定艾奇遜演說對斯大林的決策的影響的理由是，檔案中提到該演說的唯一一處，是莫洛托夫和維辛斯基在 1950 年 1 月 17 日與毛會談時，引用了該演說中聲稱蘇聯正在吞併中國三北地區的那段話，要兩國外交部發表聲明駁斥。除此之外，斯大林在與金日成會談時，雙方都未提到過艾奇遜演說，與韓戰有關的其他文件也如此。

此論隱含的假定是：“如果艾奇遜演說對斯大林決策起到了作用，那斯大林就一定會在正式場合承認。”但這根本就不成立。如果斯大林真的這麼做，那就等於在下屬面前承認他輕信美帝放的煙幕彈，喪失了革命警惕性，且不說那暴露了他只能靠公開渠道來瞭解敵情。如果斯大林在正式場合承認美國國務卿的演說是他的決策依據，反倒是反常的事。

事實上，艾奇遜演說引起了斯大林的高度重視，因為艾奇遜指出，共產主義不過是俄國帝國主義的工具。莫斯科即將徹底併吞中國的三北地區。這些行徑在亞洲人民面前暴露了帝國主義真面目，而俄國人在中國扶持的傀儡終將難逃罪責，云云。這些話引起了斯大林的關注，以致他不僅命令莫洛托夫與維辛斯基特地為此去找毛澤東，要中國外交部闢謠，還為此事責備了毛。

據師哲回憶，1 月 17 日，莫洛托夫與維辛斯基到毛的住處見毛，莫洛托夫交給毛一份艾的演說，並建議中蘇蒙三國各自發表一項官方聲明，駁斥艾奇遜的無恥謾言。毛同意了，還高度重視此事，親自動筆，並將文稿連夜發回國內，於 21 日見報。可毛卻對國際慣

例一無所知，竟不知道莫洛托夫說的“官方”是什麼意思。於是，蘇蒙兩國發表的是外長聲明，而中方同日發表的卻是新聞署長胡喬木對新華社記者的談話。這樣毛便因無知而違背了自己作出的承諾。

斯大林因此把毛召去，先由莫洛托夫詢問毛是否已經履行了雙方的約定，用官方名義發表駁斥聲明。毛說發表了，是以新聞署長胡喬木的身分發表的。斯大林告訴毛，按國際慣例，以新聞記者個人身分發表的聲明一文不值。莫洛托夫接著給毛開課，告訴他新聞總署並非權威機關，代表不了政府，署長對記者的談話也代表不了官方的觀點，中國方面未按照商定的那樣去作，違反了彼此的協議，沒有達到他們預期的效果。不管中方是怎麼考慮的，但既已達成協議，就必須遵守，信守諾言是雙方合作的重要一條，云云。

毛深覺丟臉，卻又因為錯在己方而無從置辯，於是便使起小性來，一言不發。會後斯大林邀請他們去別墅赴宴，毛在整個宴會過程中始終沉默，弄得一人向隅，滿座為之不歡。^(注40)

由此可見斯大林對艾奇遜演說的重視。對於那個密切窺探美國動向的戰略大師來說，忽略了艾奇遜在演說中描述的美國亞洲戰略是根本不可能的。實際上，檔案證據已經洩露了此中消息。

前已述及，斯大林告訴金日成：“美國人將更不敢輕易挑戰亞洲的共產黨人。根據從美國來的消息，情況確實如此，普遍的心情是不要干涉。”在此，斯大林親口承認，“從美國來的消息”證實了他對美國戰略的基本估計。那“消息”（information）無非是兩類：公開的和／或秘密的。上文已經介紹過，當時美國並未秘密制定所謂“撒手戰略”（handoff strategy），NSC 48/2 只是提出了“治本之策”，並未說要放棄南韓。

當然，據李奇微披露：“早在1947年9月，參謀長聯席會議（李海、艾森豪威爾、尼米茲和期帕茨）曾根據杜魯門總統的指示進行過研究，最後向國務卿提交了一份備忘錄，其中這樣寫道：‘……從軍事安全的角度來看，美國保持目前在朝鮮的軍隊和基地並沒有什麼戰略價值……’”不能排除那文件落入了斯大林之手。不過，



莫洛托夫給毛開課：
新聞總署代表不了政府。

考慮到該文件早在 1947 年便已制定，而斯大林在美軍於 1949 年 6 月底撤走後，仍於同年 10 月 30 日嚴令駐朝大使不得批准金日成動武，以免觸發大戰，他說的不可能是那個文件。

因此，這消息不大可能是秘密情報，更可能是公開信息。能讓斯大林產生這種感覺的最權威的公開信息，當然只能是艾奇遜的政策演說。

綜上所述，竊以為，否定艾奇遜演說效應的幾種觀點都未必成立。為了從更全面的背景下分析斯大林的真實心思，在提出我自己的看法前，先來看看朝鮮戰爭中發生的一樁怪事。

三、斯大林為何坐視聯合國安理會通過派兵的決議？

朝鮮戰爭中的一個謎，就是蘇聯為何不否決聯合國出兵朝鮮的議案。從 1950 年 1 月 13 日起，蘇聯代表團就一直在拒絕出席安理會，以此抗議聯合國不驅逐中華民國、接納中華人民共和國。但韓戰爆發後再這麼做，就等於坐視安理會通過不利於北韓的決議。以斯大林那種外交大師，絕無可能看不出這點來，更何況他在批准發動韓戰前，一定會想到南韓定會去安理會哭訴。按理說，他在同

意金日成的計劃後，應該下令蘇聯代表團結束抵制，返回安理會。那樣做再自然不過：蘇聯已經抵制了5個多月。作為一個外交姿態，它早該結束了，不結束才是反常。

然而奇怪的是，韓戰爆發當晚，安理會召開緊急會議，蘇聯代表仍然拒絕參加，安理會於是通過82號決議，譴責北韓侵略，要求立即停止敵對行動，北韓軍隊撤回三八線以北，號召每個成員國都幫助安理會實施該決議，不要為北韓當局提供援助。6月27日，安理會再度開會並通過83號決議，建議成員國向大韓民國提供必要的援助，以擊退武裝進攻，恢復該地區的國際和平與安全^(注41)。

正是這兩個決議，賦予了美國等國組建聯合國軍參戰的國際法理依據。而在這期間內，擁有否決權的蘇聯代表團卻一直拒絕出席安理會。

更奇怪的是，戰爭爆發當天下午，美國駐蘇大使緊急求見蘇聯外長被拒絕，27日，他再次求見，仍未成功。同日中午，聯合國秘書長賴伊在與蘇聯代表馬立克共進午餐時，通知他下午安理會要開會，問馬立克去不去。在座的美國代表格羅斯急得要死，情知馬立克若去，上述那個授權聯合國成員國派兵的83號決議就要被他否決，但他又無法阻止馬立克。不料馬立克回答說不去。賴伊盡忠職守，又向馬立克說，我覺得為了貴國的利益，你最好還是去，卻再次遭到馬的拒絕。格羅斯這才如釋重負。^(注42)

由此可見，蘇聯代表是故意迴避安理會會議的，與所謂“驅逐中華民國案”毫無相干。上面已經說過了，蘇聯已經抵制了5個多月，何況又是出了那麼大的事，一個“負責任的大國”在此時返回安理會，誰都能理解。因此，只能說斯大林是故意讓安理會通過那兩個決議案的。

斯大林為何要這麼做？2007年披露的一份蘇聯密檔洩露了秘密。當時捷克斯洛伐克黨魁哥特瓦爾德對蘇聯這麼做很不理解，斯大林於1950年8月27日給蘇聯駐捷大使發了份密電，要他向哥特瓦爾德解釋：

“我們退出安理會的目的有四個：第一，表明蘇聯與新中國團

結一致；第二，強調美國的政策荒誕愚蠢，因為它承認國民黨政府這個稻草人是中國在安理會的代表，卻不允許中國的真正代表進入安理會；第三，認定安理會在兩個大國代表缺席的情況下做出的決定是非法的；第四，讓美國放開手腳，利用安理會中的多數再做些蠢事，從而在公眾輿論面前暴露美國政府的真實面目。

我認為，我們已經達到了所有這些目的。

我們退出安理會後，美國陷進了對朝鮮的軍事干涉，敗壞了自己在軍事和道義上的威望。現在沒有哪個正直的人還會懷疑，美國在朝鮮扮演了施暴者和侵略者的角色，在軍事上也不像它自己宣揚的那樣強大。此外，很明顯，美國的注意力從歐洲被引向了遠東。從國際力量對比的觀點來看，這一切是不是對我們有利呢？當然是。

假設美國政府還繼續被牽制在遠東，並使中國加入解放朝鮮和爭取本國獨立的鬥爭，那會是什麼樣的結果呢？

首先，美國像其他國家一樣，也不是擁有大批武裝力量的中國的對手。美國會在這場鬥爭中無力自拔。其次，美國在這裏被纏住後就不能在短時間內著手進行第三次世界大戰。那麼，第三次世界大戰就會不定期拖延，這就為鞏固歐洲的社會主義爭取了時間。更不要說美國和中國的鬥爭會在亞洲和整個遠東地區引發革命了。從國際力量對比的觀點來看，這一切是不是對我們有利呢？當然是。

可見，蘇聯是否參加安理會已經不是表面看來那麼簡單的問題。

綜上所述，我們沒有理由說‘民主陣營沒必要離開安理會’這樣的話。離開還是不離開是由具體情況決定的。我們可以再次離開安理會，也可以再回去，這都取決於國際局勢。

有人會問，為什麼我們現在又回到了安理會。為的是繼續揭露美國政府的侵略政策，防止它打著安理會的旗號掩蓋自己的侵略行徑。現在，在美國已經捲入朝鮮戰爭之際，在安理會中最容易實現這一目的。我認為，這很明白，不需要再作解釋了。”（注43）

竊以為，他在前面說的那三個目的，都是官話套話，後面講的才是真心話：他預見到了中國會參戰，而“美國會在這場鬥爭中無力自



聯合國安理會的五個常任理事國擁有否決權。

拔。……美國在這裏被纏住後就不能在短時間內著手進行第三次世界大戰。那麼，第三次世界大戰就會不定期拖延，這就為鞏固歐洲的社會主義爭取了時間。更不要說美國和中國的鬥爭會在亞洲和整個遠東地區引發革命了”。

然而沈志華教授卻認為斯大林此話“完全是言不由衷、掩人耳目”，目的是掩蓋他先前的失算。他認為，若要認為斯大林說的是真話，那必然要得出三個推論：“一，斯大林早在蘇聯代表退出聯合國安理會時就計劃發動朝鮮戰爭；二，斯大林在同意金日成的進攻計劃時就預計甚至希望美國干預這場戰爭；三，斯大林已經算定在美國介入戰爭後中國就會出兵朝鮮與美國軍隊作戰。”而這與已知史實不符。

因此，他推測，蘇聯之所以不參加安理會，是為了避免陷入兩難選擇——“不使用否決權就意味著對北朝鮮乃至社會主義陣營的背叛，使用否決權則等於承認在平壤的背後站著莫斯科，從而導致與美國和世界輿論的直接對立，而這都是斯大林不願看到的”。

愚以為，沈教授的論證未必成立。先看那三條：

第一，誠然，沒有證據提示，早在蘇聯代表開始抵制安理會時，斯大林就在計劃發動戰爭。相反，已有證據表明，直到 1950 年 3 月 18 日，他才同意為金日成提供軍火^(註 44)，提示他直到那時才最終打定了主意。但當初蘇聯抵制安理會的理由，並不能用來解釋它後來為何不在關鍵時刻重返安理會，否則似有刻舟求劍之嫌。尤其是在賴伊主動邀請馬立克開會之後，蘇聯還要堅持抵制，那就再不能用“抗議不驅逐蔣匪、接納新中國”來解釋了。而且，蘇聯外長避而不見美國大使，與此如出一轍，難道也是為了抗議不驅逐國府？

凡成功的戰略家都講究“因勢利導”，亦即隨時根據情況的變化，改變或完善原戰略。蘇聯當初抵制安理會，當然很可能是為了驅逐國府。但前已說過，斯大林同意金日成冒險之前，必然會擬想美國可能採取的一切反應。無論美帝派兵與否，去聯合國哭訴都是必幹的第一件事。在批准金日成的戰爭計劃後，斯大林還要讓代表團堅持抵制下去，當然是把它當成了應付將來美國在聯合國活動的招數。換言之，他蓄意延長了早就該結束的抵制，以便“讓美國放開手腳，利用安理會中的多數再做些蠢事”。

第二，斯大林並沒有“在同意金日成的進攻計劃時就預計甚至希望美國干預這場戰爭”。相反，上節反復說的就是，美國介入一直是他最大的隱憂，就是為此他才一直不准金日成輕舉妄動。後來改了主意，是因為他覺得美國干預的可能不大。即使如此，他也留下了中國作為應急預案。

但這些事實並不與他刻意縱容美國跳樑相矛盾。實際上，不管美國怎麼行動，他都不會輸：若是美國如他原來估計的那樣，不想出兵，只是在安理會發個決議譴責一下，坐視走狗李承晚匪幫被推翻，那就在世界上丟了臉；如果美國決定武力干預，卻又行動遲緩或是作戰不力，讓金日成獲得速勝，統一了朝鮮，造成既成事實，使得聯合國再也無法干預、只能灰溜溜偃旗息鼓（事實上，若是沒有沃克將軍，這結局已經發生了），則美國更是丟臉，第三世界的多米諾骨牌從此將更容易接連倒掉；若是美國打敗北韓，他已經留下了中國

那個備胎，用上就是了。一旦中國參戰，那美國將就此陷在遠東，無力再去西線與他爭奪，豈不更好？

第三，“斯大林已經算定在美國介入戰爭後中國就會出兵朝鮮與美國軍隊作戰”，那不是他算定的，是毛澤東向金日成幾次作出的承諾。儘管金日成在與斯大林會談時，代毛保證過，斯大林仍不放心，幾次強調必須有中國批准，金日成才能發動戰爭。直到最後一刻，他還電告毛：“這個問題最終必須由中國和朝鮮同志共同解決。”明說了打仗是中朝兩國的事，與蘇聯無關。而毛也完全明白他的心思，不但批准金去冒險，還正式對金承諾：萬一美軍參戰，中國將派兵幫助朝鮮，因為蘇聯與美國之間有關於三八線劃分的協定，不便參加戰鬥，但中國沒有這種義務，可以幫助朝鮮，還表示作戰是兩國的共同任務，中國將提供必要的援助^(注45)。這些情況斯大林當然知道，所以他才會自覺有備無患，同意金日成放手大幹，反正惹出禍來有中國人頂住。

實際上，在給哥特瓦爾德的電報裏，斯大林已經假想了“美國政府還繼續被牽制在遠東，並使中國加入解放朝鮮和爭取本國獨立的鬥爭”。請注意，當時聯合國軍尚未在仁川登陸，朝鮮“祖國解放戰爭”形勢還在一片大好，他就能擬想到中國出兵與美帝纏鬥的前景，不能不令人佩服他的瞻矚之高遠，心思之細密，真個是算無遺策。說是“算定”雖然太誇張，但雖不中，不遠矣。

至於沈教授說的斯大林面臨著“使用否決權則等於承認在平壤的背後站著莫斯科，從而導致與美國和世界輿論的直接對立”的困境，愚以為根本就不存在。誰都知道“平壤的背後站著莫斯科”——金日成政權本來就是蘇聯佔領軍用刺刀扶植起來的。不使用否決權，“世界輿論”也不會出現錯覺，以為莫斯科並非平壤的大老闆。而且，蘇聯雖然沒有行使否決權，但一直在譴責安理會那兩個決議，聲稱它們是非法的。在這麼做時，它為何又不怕“等於承認在平壤的背後站著莫斯科，從而導致與美國和世界輿論的直接對立”呢？

更何況俄國人信奉的是“軍刀說了算”。害怕強國、千方百計

避免與之發生衝突，倒確實是斯大林的特色，但“世界輿論”他卻是從來不怕的。當年蘇聯悍然入侵芬蘭，“導致”與英法等國“和世界輿論的直接對立”，蘇聯為此被驅逐出國聯，斯大林在乎過麼？

不僅如此，在抨擊安理會決議時，蘇聯人給出了一系列理由：83 號決議是根據韓國軍方提供的情報作出的，而那情報實際上來自於美國情報機構；北韓未被作為聯合國的臨時成員邀請與會，而這違反了《聯合國憲章》第 32 條；朝鮮戰爭超出了聯合國憲章的範圍，因為最初的南北邊境衝突曾被劃定為內戰^(註 46)。這些抗議都振振有詞，尤以第二條言之成理^(註 47)。如果蘇聯出席安理會，完全可以以此為由投否決票。這麼做貌似符合西方的程序正義，而且顯得不偏不倚，不但不是“等於承認在平壤的背後站著莫斯科”，還能蠱惑第三世界與西方左派，英美法也難以反駁。為什麼他們不這麼做，卻要站在會場外，徒勞無益地大聲嚷嚷呢？

其實這一切早在斯大林算中。前已述及，1949 年 9 月 24 日，蘇共政治局在駁回金日成的請戰書時就指出，人民軍進攻南方可能



1950 年 12 月，聯合國安理會就朝鮮戰場上中國軍隊撤軍問題表決，回到安理會的蘇聯代表雅各布·馬立克（舉手者）投了唯一的反對票。

給美國人以藉口，在聯合國大會上提出這一問題，指責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政府侵略，並要求聯合國大會同意美國軍隊進駐南朝鮮。美國軍隊進駐南朝鮮可能導致長期佔領這個國家的南部，因而拖延國家的統一。（注 48）

所以，早在那時，斯大林就已預見到了美國有可能要求聯合國授權出兵，而他並不想被逼到動用否決權去防止此事。正是為此，他才否決了金日成的請求。既然如此，那麼他後來同意金日成的請求，當然只可能是他覺得，哪怕最壞的情況發生，也有中國人頂住，所以再不必去動用否決權阻止美國人派兵。要默許美國人為所欲為，同時還要在“民主陣營”面前作出堅決反對美帝侵略的姿態，當然最便當的辦法便是延長那抵制活動，專在安理會會場外怒吼。

因此，竊以為，斯大林給哥特瓦爾德的電報，是他一生中絕無僅有的對自家心事的坦率解釋。接受這極為難得的供詞，不但不會導出與史實相矛盾的結論，還能使得一系列費解的現象脈絡畢現。反過來，否定這重大證詞非但缺乏證據，而且還無法解釋兩個史實：

第一個史實是，當北韓入侵軍隊在南方被擊潰後，聯合國軍在 10 月 1 日越過了三八線。10 月 7 日，聯合國大會通過決議，建議“採取一切適當措施以確保全朝鮮的穩定條件”以及“為在主權國家朝鮮中建立一個統一、獨立、民主的政府，採取一切合法的行動包括在聯合國主持下舉行選舉”（注 49），為此舉作了合法性追認。

查聯合國憲章第 12 條第一款：“當安全理事會對於任何爭端或情勢，正在執行本憲章所授予該會之職務時，大會非經安全理事會請求，對於該項爭端或情勢，不得提出任何建議。”（注 50）

當時蘇聯代表團已經返回安理會，為什麼不援引此條，聲稱安理會正在執行有關朝鮮爭端的職責，聯合國大會無權提出任何建議，動用否決權攔阻朝鮮問題進入大會議程，卻要坐視大會在實際上批准聯合國軍以武力統一朝鮮？莫非蘇聯怕這麼做就“等於承認在平壤的背後站著莫斯科”？那它為何又怕默認就“意味著對北朝鮮乃至社會主義陣營的背叛”呢？後者似乎比前者更嚴重吧？

第二個史實是，斯大林一直是朝鮮戰爭的熱心而執著的支持

者，哪怕後期金日成再也不想打了，哭鬧得比當年請戰還要凶，他仍然支持毛澤東死扛下去。要一直等到他死，新班子上了台，朝鮮才總算能停火了。如果不承認利用韓戰把美國拴死在遠東是斯大林的戰略意圖，而貝利亞、馬林科夫與赫魯曉夫等人並不贊成這一意圖，那就無法解釋斯大林死後立即發生的這一政策突變。

綜上，依愚見，沈教授否定斯大林證詞的理由似難成立。

四、毛澤東與艾奇遜幫助斯大林下了決心

從檔案證據來看，斯大林最後一次禁止金日成發動韓戰，是在1949年10月30日，而他的口氣開始鬆動，承諾幫助金日成，則是在1950年1月30日。那麼，這三個月內發生了什麼事，促使他的態度發生了改變？

斯大林本人其實已經給出了答案。朝鮮戰爭是史學研究中難得的案例，其中一方事實上的最高統帥兩次留下了秘密證言，詳盡解釋了他發動戰爭的考慮。作為直接證據，這兩份極為寶貴的證言應該是研究者們的分析重點，若無重大理由，不宜輕易否定。

第一份證言

在第一份證言中，斯大林論證了有限戰爭的可行性，亦即有可能發動局部戰爭而能避免世界大戰。這在當時是軍事學上的一個重大突破。李奇微坦承：

“到1949年，我們完全受到了這樣一種理論的支配，即將把美國捲入其中的下一場戰爭將是一場全球性的戰爭。在這場戰爭中，朝鮮的地位不太重要，而且，無論怎樣朝鮮都無法防守。我們所有的計劃、所有的官方聲明以及所有軍事上的決策，從根本上說都是出自這種看法。在我們的會議中從未提起過‘有限戰爭’的概念。我們對聯合國充滿了信心。原子彈又為我們築起了一道心理上的馬奇諾防線。這道防線使我國國民有更充分的理由強烈要求孩子們重返家園，軍隊遣散，刀槍入庫和陸海空三軍士兵復員。”（注51）

所以，在五角大樓的將軍們還在以“要麼世界大戰，要麼世界和平”的兩極思維展望未來時，斯大林便已構思並發動了核武器問世後的第一場有限戰爭，為此後幾十年的冷戰奠定了格局，不能不說，這確實體現了戰略大師的高瞻遠矚。

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斯大林“化無限為有限”的巧妙操作。他知道，進行這種有限戰爭的前提，是必須確保它不至於升級為蘇美全面衝突，這就是他考慮的關鍵問題。前已述及，1949年10月30日，他還在申飭駐朝大使：“這些挑釁對我們的利益是非常危險的，有可能使得敵人發動一場大戰。”（注23）說明他當時仍未找到避免觸發美蘇大戰的辦法。

但此後發生的國際形勢變化，讓斯大林認為是安全地進行有限戰爭的時候了。在與金日成的會談中，他列舉的那幾條因素中，原子彈一條不足取信：當時蘇聯試爆原子彈成功才半年多，要造出相當數量的用於實戰的炸彈尚需時間。最大的問題是，當時蘇聯沒有戰略轟炸機，無法將原子彈投擲到美國，因此沒有多少威懾作用。這個問題，終赫魯曉夫之治都未解決，所以他才會把核導彈運到古巴去。斯大林對此當然心中有數，因此這不可能成為他的決策依據。

最主要的因素還是兩條：

第一，中蘇結盟，尤其是毛澤東甫上台就萬里朝見，風塵僕僕前來拜壽，竭力向他證明自己是真正的馬列主義者，並不是他猜疑的那個東方鐵托，令他覺得若朝鮮半島衝突泛化，可以將南北韓對抗化為中美對抗，而蘇聯則能置身事外。此乃以代理戰爭來規避直接大戰的妙著。

這個因素才是斯大林發動戰爭的前提，他在不同場合反復強調，只有毛澤東批准才可開戰，甚至對毛明說：“這個問題最終必須由中國和朝鮮同志共同解決。”而毛澤東也不負所託，在1950年5月15日與金日成具體討論戰爭計劃時，不顧金日成的婉拒，主動承諾萬一美軍參戰，中國將派兵幫助朝鮮，並慷慨表示，作戰是兩國的共同任務，中國將提供必要的援助。（注52）在聯合國軍參戰後，1950

年7月2日，周恩來還對蘇聯大使羅申說，考慮到種種可能的情况，為防備萬一，中國政府準備在中朝邊境集中9個師的兵力。美軍不過三八線則罷，一旦越過了三八線，中國人民解放軍便以志願軍的形式入朝協助人民軍抗擊美國軍隊。周恩來提出，就這個問題，中國政府希望能夠聽取斯大林同志的意見，同時希望蘇聯空軍能夠對這些部隊提供空中掩護（注53）。1960年6月22日，彭真在與蘇共代表團在布加勒斯特會談時，也對赫魯曉夫承認：“朝鮮戰爭打起來以後，斯大林說，如果蘇聯出兵，就意味著世界大戰，因此才請中國出兵。因此我們才同意出兵的。”（注52）

因此，對斯大林“將可能出現的美蘇對抗轉嫁為中美對抗”的戰略，毛澤東其實心中有數，而斯大林也知道這一點，這就是他最終敢於批准金日成冒險的最重要的原因。

斯大林沒有料到的是，後來情勢危急，他要中共履行先前的承諾，毛澤東竟答覆羅申說中國不想派兵，因為派幾個師也會被打回來，還可能把蘇聯拉進戰爭。難怪羅申要在給斯大林的匯報中氣憤地說：

“在我看來，毛澤東的答覆證明中國領導人改變了對朝鮮問題的最初立場。這個答覆與以前毛澤東在同尤金（Yudin）、科托夫和孔諾夫，以及劉少奇在同我的談話（我已及時報告過）中表示的立場是矛盾的。他們在這些談話中指出，中國人民和解放軍決心幫助朝鮮人民；解放軍士氣高漲，如果需要，他們有能力打敗美軍，因為美軍要比日軍弱。”（注54）

雖然毛後來還是同意出兵了，但又向蘇方要求提供空軍掩護。據說斯大林先是同意了，但後來又說尚未準備好，致使中共軍隊在沒有空中掩護的情況下出國作戰，蘇聯空軍只是在後來才出動。此事我尚未查到可靠證據，但中方媒體中多見據此埋怨斯大林反悔的文字。即使事實如此，毛澤東也從未在最初策劃戰爭時提過這種請求。因此，同樣是違約，兩者有本質區別——合同開始執行後，一方又追加條件，另一方就是同意了再反悔，也還是說得過去的。

斯大林更沒料到的是，他死後多年，1960年6月22日，中蘇



針對金日成發動戰爭，聯合國組成聯軍反侵略。

兩黨在布加勒斯特會談時，赫魯曉夫幾次指出，朝鮮戰爭是斯大林和毛澤東兩個人共同決定的，彭真竟然反復否認，說他說的“完全不對”，“毛澤東同志是反對打的”（注52）。而中方媒體中還充斥著官方與半官方的宣傳，給大眾造成“蘇聯見死不救，中國見義勇為”的錯覺。

至於斯大林為何會在1950年1月30日對金日成首次鬆口，我的推測是（只能是合理推測，永無可能找到過硬證據，這就是史學研究的局限），1月17日，金日成向蘇聯大使要求去見斯大林，獲准進攻南韓。若是斯大林不見他，他就要設法去見毛澤東。他強調說，毛澤東曾答應他在中國戰爭結束後將給予援助（注55）。金日成的激將法可能給了斯大林靈感，讓他想到可以把這燙山芋扔給中共。這也是檢驗毛澤東的忠誠度的一個辦法。而且，毛一旦接下這燙山芋，就把中國的命運和蘇聯捆在一起，再無可能被美國拉過去

了。而毛澤東也對此心領神會，堅定地通過了考驗，用事實證明了他並不是斯大林猜疑的逆子鐵托。

第二個因素則是“從美國來的消息”證實“普遍的心情是不要干涉”。前文已作過分析，那“消息”不大可能是秘密情報，更可能是艾奇遜的演說。就算它不是斯大林唯一的消息來源，起碼也起到了強化斯大林既有印象的作用。因此，指責艾奇遜為斯大林開了綠燈，雖有誇張與簡單化之嫌，但畢竟不為無據。

因此，似乎可以說，是毛澤東給了斯大林發動歷史上第一次有限戰爭的底氣，而艾奇遜演說則助長了他的僥倖心理。

第二份證言

第二份證言則坦承了斯大林的戰略意圖，那就是將美國的注意力從歐洲引向遠東。使得它陷在與中國人的交戰中無力自拔，“美國在這裏被纏住後就不能在短時間內著手進行第三次世界大戰。那麼，第三次世界大戰就會不定期拖延，這就為鞏固歐洲的社會主義爭取了時間。更不要說美國和中國的鬥爭會在亞洲和整個遠東地區引發革命了。”

從當時的世界形勢來看，此話確實說出了他的需要。已有作者注意到了這一點，將“北約成立以及蘇聯與西方總的關係惡化”當成了斯大林發動戰爭的一個原因。^(注 56)

二戰後，蘇聯席捲了東歐，用刺刀建立了一系列衛星國。這構成了蘇聯與西方的矛盾焦點，是冷戰爆發最主要的原因。美蘇為柏林問題發生了劇烈衝突，斯大林對柏林進行了幾達一年的封鎖（1948年6月24日至1949年5月12日）。盟國佔領區與柏林的水陸交通被全部切斷，只有西德飛往柏林的三條空中通道未被封鎖。西方盟國不肯屈服，對柏林實施史上規模最大的空運，確保了柏林人民能生存下來。美軍與蘇軍還在地面上幾乎發生衝突，以蘇軍退讓告終。最後斯大林見封鎖無效，只好下令解封。

目睹歐洲被鐵幕分裂為對立的東西兩大陣營，為應對斯大林的擴張威脅，1948年9月，布魯塞爾條約締約國（英、法、比、

荷、盧）決定建立西方聯合防衛組織（Western Union Defence Organization），共同對抗蘇聯的擴張。但它們不久就意識到，自己不是強大的蘇聯的對手，必須把美國拉進來。1949年4月4日，美、英、法、加等11個國家在華盛頓簽署了《北大西洋公約》。該條約以蘇聯為假想敵，特地制定了防禦蘇聯對西方武裝進攻的第五條，規定對任何一個成員國的進攻，都將被視為對所有成員國的進攻。（注57）

這在斯大林眼中構成了嚴重威脅。在與金日成的會談中，他說“朝鮮同志不能指望蘇聯直接參加這場戰爭，因為蘇聯必須在別的地方特別是在西方應對嚴峻的挑戰。”確實如此，歐洲從來是他的爭奪重心，而東歐歷來被他視為維護本國安全的緩衝帶。但那些國家與西歐在歷史上屬於同一文化圈，斯大林用武力強加的統治不得民心，並不鞏固。面對北約的威脅，“民主陣營”顯得十分脆弱。



金日成的激將法可能給了斯大林靈感。

即使是共產黨黨魁也未必可靠。鐵托就是第一個反出教門另開香堂的叛徒。儘管斯大林曾自吹“我只要搖搖我的小指，鐵托就得完蛋，就得垮台”，可惜正如赫魯曉夫在秘密報告上說的：“但這並未發生在鐵托身上。不管斯大林搖多搖少，不僅搖了他的小指，而且搖了他能搖的一切，鐵托並沒有倒。”（註58）還跟美國套上了近乎，變成了獨立于蘇美兩大陣營的第三勢力。所以，如何“鞏固歐洲的社會主義”，消化東歐那個戰利品，將其變為帝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直是他的心病。

除了東歐外，希臘、土耳其等具有重大地緣政治戰略價值的地區也是蘇聯的覬覦對象。尤其是土耳其扼住了蘇聯黑海艦隊進入地中海的咽喉。當年斯大林就曾打算聯合軸心國向土耳其施壓，在達達尼爾海峽與博斯普魯斯海峽掠取軍事基地，但未能得逞（註59）。如今那兩個國家正處在風雨飄搖之中，政權搖搖欲墜。若是美國不及時伸出援手，那它們就很有可能瓜熟蒂落，落入“民主陣營”中。

因此，斯大林給哥特瓦爾德的密電確實說出了他的盤算：美國被拉入遠東的泥塘後，對歐洲的援助必然大為減弱，他心目中來自西線的威脅也就在很大程度上被消除了。他可以加強在東歐的鐵腕統治，甚至還有可能在近東地區擴張，而不用擔心美帝的強烈反彈。這就是他為何蓄意延長蘇聯代表團對安理會的抵制，以坐視聯合國通過那些決議，將美國誘入泥潭。

這其實是故伎重演。當年他千方百計挑起中日交戰，讓日本陷入中國泥塘不能自拔，使他得以專心對付西線來的威脅，使的就是同一個計策。就連受害的冤大頭都是同一個，不同的只是日本換成了美國。

當然，這不大可能是斯大林策劃戰爭的原初目的。他最初的期望，還是速戰速決，搶在美國干預前拿下南韓。對美國出兵他雖然早有應急預案，但沒有想到美國並未限於外交活動與口頭抗議，而是作出了超乎異常的迅速有力的反應。他這才因勢利導，將備著改為正著，蓄意誘導中美交戰。在戰局發生戲劇性逆轉，毛澤東又出乎意料地變卦後，他才真的氣急敗壞了。為激勵毛澤東出兵，他竟

然連“我也考慮過，美國儘管沒有做好大戰的準備，仍可能為了面子而被拖入大戰，這樣一來，自然中國將被拖入戰爭，蘇聯也將同時被拖入戰爭，因為它同中國簽有互助條約。對此應該害怕嗎？我認為不應該……。如果戰爭不可避免，那麼讓它現在就打”（注60）的豪言壯語都說出來了。字裏行間流露出來的焦躁，絕不是喪失了北韓那個蕞爾緩衝國可以解釋的。它其實反映了斯大林目睹他精心設計的“引敵東進”的世界大戰略面臨落空時的懊喪。

平心而論，斯大林這算盤雖精，但他既沒有欺騙金日成，也沒有欺騙毛澤東。對前者，他已經說明蘇軍不會參戰，如果美國介入就由中朝去承擔；對後者，他給了自主決定權——他已向金日成反復交代，只有得到中國同意，北韓才可開戰。中共如果不想介入，完全可以使用這一欽賜否決權。因此，毛澤東是自覺自願、主動積極地當上冤大頭的。當冤大頭也罷，毛至少可以在行使批准權前向斯大林要求軍援，包括提供空中掩護與重武器等等，不該臨渴掘井，待到火燒眉毛時才來扯這些事。

不過，我在《毛主席用兵真如神？》書中業已指出，毛的特點是思慮粗放，缺乏現代知識，乃是“實踐出真知”的“狹隘經驗論”者，沒見過的东西就不知道，因此要等到北韓被美國狂轟濫炸之後，才知道現代立體戰爭是怎麼回事。但與他當年在發動寧夏戰役、死人無算之後，才想起來未與蘇聯商定交接軍火細節相比（注61），這個重大遺漏是可以原諒的。

不可原諒的則是，他為了向父皇證明自己不是鐵托式逆子，對得起欽封的亞洲共運頭領的頭銜，不惜把中國拉入戰禍，造出了外交史上“大躍進”式奇跡，使得中國與全世界為敵，與聯合國軍交戰，被整個文明世界譴責為“侵略者”，被關在聯合國門外幾達30年，遭受了西方長期的禁運與抵制，從而徹底剝奪了自家的外交選擇與迴旋空間，只能把自己捆在蘇聯人的戰車上。最後毛又為爭當國際共運領袖與老大哥鬧翻，被人家革除教門，淪落到了全世界大多數國家都成了“帝修反”，“已是懸崖百丈冰，猶有花枝俏”的淒涼地步。這種不可思議的奇跡，在大國外交史上堪稱絕無僅有。

其發端，就是毛在 1949 年 7 月 1 日宣布的“一邊倒”，其深層原因，則是毛想當國際共運領袖的荒誕野心。（蘆笛） □

注釋

1 President Rhee's Press Statements, in Muccio to Secretary of State, May 7, 16, 19, and June 6, 1949,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hereafter, FRUS), 1949, vol. 7, pp. 1011-2, 1023-4, 1030-1, 1035-6, 1039. 本文引用的英語文獻都由作者譯出，若有誤譯之處，尚祈讀者教正。

2 James I. Matray, *The Reluctant Crusade: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 Korea, 1941-1950*, pp. 151-205,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85.

3 演說全文載於 Burton Ira Kaufman 所著的 *The Korean Conflict*, pp. 122-129, Greenwood Publishing Group, 1999.

4 Remarks by Dean Acheson Before the National Press Club, ca. 1950. Harry S. Truman Administration, Elsey Papers. http://www.trumanlibrary.org/whistlestop/study_collections/koreanwar/documents/index.php?documentdate=1950-00-00&documentid=kr-3-13&pagenumber=1

5 University times The faculty and staff newspaper of the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Volume 32 Number 21 , June 22, 2000.

6 Douglas MacArthur, *Reminiscences*, McGraw-Hill, 1964), p. 322;

7 馬修·B·李奇微：《朝鮮戰爭》，中文譯者不詳，電子書，無頁碼。

8 Robert T. Oliver, *Why War Came in Korea*, p. 8,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1950)

9 David Rees, *Korea: The Limited War*, p. 9, St. Martin's, 1964.

10 Robert J. Donovan, *Tumultuous Years: The Presidency of Harry S. Truman, 1949-1953*, p. 136, W.W. Norton, 1982.

11 Burton I. Kaufman, *The Korean War: Challenges in Crises, Credibility, and Command* (Philadelphia, pp. 27-33 ,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86.

12 James L. Stokesbury, *A Short History of the Korean War*, p. 35, William Morrow, 1985.

13 Peter Lowe: *The Origins of the Korean War*, p. 119, Longman, 1986.

14 Harry G. Summers, Jr., *The Korean War Almanac*, pp. 2, 13, Facts on File, 1990.

- 15 Kenneth B. Lee, *Korea and East Asia: The Story of the Phoenix*, p. 184, Greenwood, 1997.
- 16 Michael Hickey, *The Korean War: The West Confronts Communism, 1950-1953*, pp. 21, 29, John Murray, 1999.
- 17 Stanley Sandler, *The Korean War: No Victors, No Vanquished*, p. 42 University of Kentucky Press, 1999.
- 18 沈志華：《朝鮮戰爭“陰謀論”是斯大林編的》，http://phtv.ifeng.com/project/special/38junduandao/shishi/detail_2010_12/10/3447719_0.shtml
- 19 沈志華：《斯大林、毛澤東與朝鮮戰爭再議——根據俄國檔案文獻的最新證據》，《史學集刊》，2007年第1期
- 20 沈志華主編：《朝鮮戰爭：俄國檔案文件》，電子書，無頁碼。
- 21 Tunkin to the Soviet Foreign Ministry, 14 September 1949, in *Cold War Crises*,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hereafter CWIHPB), issues 6-7, p. 7. 1995/1996
- 22 Politburo Directive for Shtykov, 24 September 1949, *Cold War Crises*, CWIHPB, pp. 6-8.
- 23 Kathryn Weathersby, *The Soviet Role in the Early Phase of the Korean War: New Documentary Evidence*, *The Journal of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 2, no. 4, pp. 446-47.
- 24 Shtykov to Stalin, 19 January 1950, in *Cold War Crises*, CWIHPB, p. 8.
- 25 《斯大林關於同意會晤金日成討論統一問題致什特科夫電》，《朝鮮戰爭：俄國檔案文件》
- 26 Kathryn Weathersby, “Should We Fear This?": Stalin and the Korean War,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Working Paper Series*, working paper no. 39, p7.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July 2002.
- 27 《斯大林關於同意向人民軍提供所需裝備致什特科夫電》，1953年3月18日，《朝鮮戰爭：俄國檔案文件》。
- 28 Report on Kim Il Sung's visit to the USSR, March 30-April 25, 1950. Prepared by the International Department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All-Union Communist Party (Bolshevik), quoted in “Should We Fear This?”, pp 9-11.
- 29 《科瓦廖夫關於毛澤東通報與金一會談的情況致斯大林電》，1949年5月18日，《朝鮮戰爭：俄國檔案文件》。
- 30 《什特科夫關於金日成訪華計劃致維辛斯基電》，1950年5月12日，同上。
- 31 同上。

32 “Should We Fear This?”, p.11.

33 Henry Kissinger: On China, Penguin Press, 2011, 引自國內網人製作的電子書, 頁碼與原書不一致。

34 Kathryn Weathersby spoke with American RadioWorks Correspondent John Biewen. <http://americanradioworks.publicradio.org/features/korea/c1.html>

35 NSC 48/2, The Posi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With Respect to Asia,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 7, pp1115-1220, <http://digicoll.library.wisc.edu/cgi-bin/FRUS/FRUS-idx?type=turn&entity=FRUS.FRUS1949v07p2.p0529&id=FRUS.FRUS1949v07p2&isize=text>

36 NSC 68: United States Objectives and Programs for National Security, <http://www.fas.org/irp/offdocs/nsc-hst/nsc-68.htm>

37 《答塔斯社記者問》,《毛澤東外交文選》, <http://www.mzdthought.com/html/mxzz/mzdwjwx/2005/0905/5258.html>

38 楊奎松:《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300-301 頁,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 年。

39 James I. Matray:Dean Acheson's Press Club Speech Reexamined.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Studies, Vol. XXII, No. 1, 2002.

40 師哲:《在歷史巨人身邊》,453-458 頁,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 年。

41 UN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s: <http://daccess-dds-ny.un.org/doc/RESOLUTION/GEN/NR0/064/95/IMG/NR006495.pdf?OpenElement>

42 沈志華:《蘇聯未否決聯合國出兵朝鮮議案真相》,網絡版, <http://www.aisixiang.com/data/47362.html>。此處我是根據格羅斯的回憶寫的,但我找不到原來的資料了,無法給出來源,只好以沈文作為參考文獻。我的介紹細節與沈文略有不同。我記得賴伊兩次問馬立克都遭到拒絕,沈教授說的只是一次。

43 沈志華:《蘇聯未否決聯合國出兵朝鮮議案真相》。文中所謂“退出”,似應譯為“抵制”,英文是 boycott。

44 Stalin to Shtykov, 18 March 1950 and Shtykov to Vyshinsky, 21, 24 March 1950, The Cold War in Asia, CWHIPB, pp. 37-38.

45 楊奎松:《斯大林為什麼支持朝鮮戰爭?》, <http://www.shekeyuan.com/plus/view.php?aid=519>

46 Gross, Leo, Voting in the Security Council: Abstention from Voting and Absence from Meetings. The Yale Law Journal 60 (2): 209-57; 1951; Schick, F. B Videant Consules, The Western Political Quarterly 3 (3): 311-325, 1950.

47 《聯合國憲章》第 32 條:“聯合國會員國而非為安全理事會之理事國,或

非聯合國會員國之國家，如於安全理事會考慮中之爭端為當事國者，應被邀參加關於該項爭端之討論，但無投票權。安全理事會應規定其所認為公平之條件，以便非聯合國會員國之國家參加。” <http://www.un.org/zh/documents/charter/chapter5.shtml>

48 《莫洛托夫呈報的擬答覆金日成的指示稿》(附件第二稿),《朝鮮戰爭：俄國檔案文件》。

49 Cited in James F Schnabel: Policy and Direction: the First Year. United States Army in the Korean War.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2.

<http://www.history.army.mil/books/PD-C-11.HTM>

50 《聯合國憲章》，第12條，<http://www.un.org/zh/documents/charter/chapter4.shtml>

51 李奇微：《朝鮮戰爭》。

52 楊奎松：《斯大林為什麼支持朝鮮戰爭？》，<http://www.shekeyuan.com/plus/view.php?aid=519>

53 楊奎松：《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319-320頁，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

54 《羅申轉呈毛澤東關於中國暫不出兵的意見致斯大林電》，1950年10月3日，《朝鮮戰爭：俄國檔案文件》。

55 Shtykov to Stalin, 19 January 1950, Cold War Crises, CWIHPB, p. 8.

56 Evgueni Bajanov: Assessing the Politics of the Korean War, 1949-51, CWIHPB, pp54, 87.

57 North Atlantic Treaty, Wikipedia, http://en.wikipedia.org/wiki/North_Atlantic_Treaty

58 Khrushchev's Secret Speech, Strobe Talbott (translate and ed): Khrushchev Remembers, p612, Andre Deutsch Ltd, 1971.

59 Nazi-Soviet Relations, 1939-1941, pp258-259. <http://www.ibiblio.org/pha/nsr/nsr-preface.html>

60 《斯大林關於中國出兵問題致毛澤東電》，1950年10月5日，《朝鮮戰爭：俄國檔案文件》。

61 蘆笛：《毛主席用兵真如神》，216-218頁，明鏡出版社，2011年。

2011年是辛亥革命一百週年，自辛亥革命之後的許多重大歷史事件，蔣介石與蔣經國父子兩人都曾親身參與。就在武昌起義紀念日兩天後，“兩蔣日記”所有權官司也告一段落，未來，“兩蔣日記”預料將發揮更大的歷史影響力

“兩蔣日記”將持續 擴大影響力

“兩蔣日記”官司原訂10月31日蔣中正124歲冥誕時宣判，10月12日蔣家第四代蔣友梅已先透過律師撤告，聲明稱雙方都認同“兩蔣日記”為全體繼承人共同所有，因此沒有繼續訴訟的必要。

胡佛保管真跡，中研院將出書

官司告一段落後，根據蔣友梅的訴求，9名蔣家日記繼承人將共同與美國斯坦福大學的胡佛研究院重新簽約。當初促成“兩蔣日記”赴美的胡佛研究院研究員、前台灣總統府第一局副局長兼新聞秘書郭岱君在接受《新史記》採訪時表示，胡佛研究院目前並不清楚蔣家的情形，對於兩蔣日記涉及法律的部分，胡佛都不予評論。

“法律上的事是蔣家內部的事，家族內部的共識是什麼，該如何處理，我們不清楚。”

蔣介石於1975年4月5日逝世後，將日記留給兒子蔣經國；1988年蔣經國病逝前，將蔣介石與自己的日記一併交給小兒子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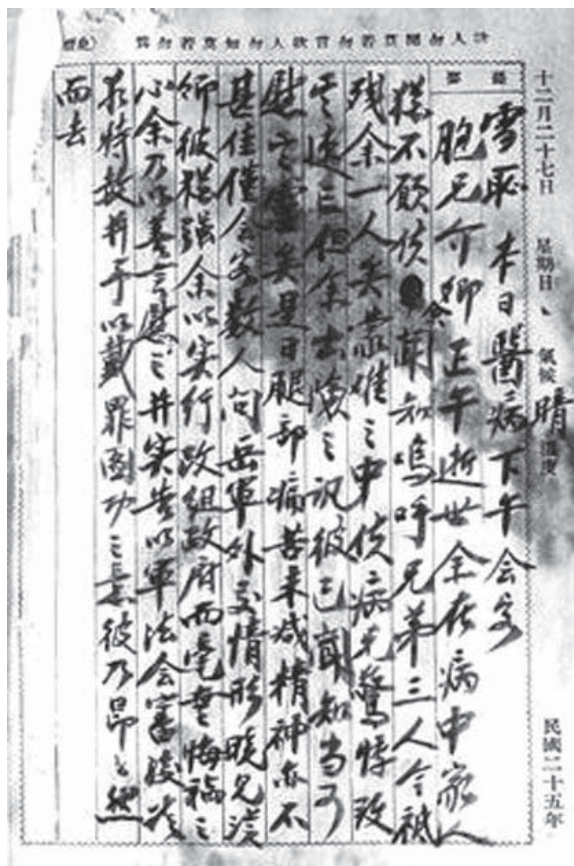


胡佛研究院研究員、前台灣總統府第一局副局長兼新聞秘書郭岱君。(郭岱君提供)

孝勇保存；1996年蔣孝勇臨終前，再將兩部日記託給自己的妻子蔣方智怡保管。

多年來，許多學術單位極力爭取“兩蔣日記”，美國胡佛研究院更是花了18個月的時間與蔣方智怡接洽，最終讓“兩蔣日記”暫存在胡佛。2005年2月16日，蔣家與胡佛共同宣布，“兩蔣日記”由胡佛暫為保管50年，並將逐步公開蔣介石日記，如今這部日記已全數對外開放，每日吸引無數學者前往閱讀。

為什麼選擇胡佛研究院？郭岱君告訴《新史記》，當初蔣方智怡希望為“兩蔣日記”尋找一個合適的存放之處，這樣的地方必須有國際聲譽、有學術地位、公正客觀、專業、並且安全，胡佛研究院檔案館歷史悠久，擁有世界一流的專業設備，也有國際學術聲望，此外，蔣方智怡也希望胡佛重視“兩蔣日記”，讓日記發揮該有的歷史價值。在說動蔣方智怡將日記交予胡佛保管的過程中，許多郭岱君的朋友、長輩都曾給與協助，尤其是台灣榮民總醫院院長彭芳谷，扮演了重要角色——彭院長曾參與治療蔣中正、蔣經國及蔣孝勇，蔣孝勇生前抱病到中國大陸祭祖，就是由彭院長陪同。



蔣介石日記原稿。

蔣中正日記自 2006 年開始陸續開放，立刻引起中外學術界的重視，但日記的所有權卻引發糾紛。蔣經國長孫女蔣友梅認為孀孀蔣方智怡不應自行將日記交由胡佛保管，因而在台北提告，確認“兩蔣日記”的所有權，台灣中研院出版蔣介石日記的計畫也因官司而停擺。如今官司告一段落，中研院可望在 9 位蔣家共同繼承人的授權下，從胡佛研究院取得蔣介石日記電子文檔，預計 2012 年先出版一部分日記，全套日記則希望 2、3 年內出版完畢。

蔣介石一生勤於動筆，不但寫日記，許多演講稿也都是自己親自撰寫，未找人代筆。蔣介石日記共 66 冊之多，始於 1917 年，終於 1972 年，全部日記以毛筆寫成。郭岱君對《新史記》介紹，蔣介石日記開放後，到胡佛閱讀的學者有數百位，許多學者一來就是一

年或數個月，這些學者來自中國大陸、台灣、日本、韓國、香港、美國、歐洲，另外也有媒體人員和一般民眾，蔣介石日記是胡佛最受歡迎的檔案。

根據蔣家的要求，閱讀蔣介石日記者只能抄寫，不能複印，因此至今還沒有一份出版品概括了完整的蔣介石日記，不過與蔣介石日記相關的著作已有不少問市，著有《找尋真實的蔣介石》等多部相關著作的歷史學家楊天石，是中國大陸第一位讀到蔣介石日記的學者。郭岱君對《新史記》指出，楊天石研究蔣介石已有二、三十年時間，其歷史、國學底子都相當深厚，眾人也都很敬重他的研究精神與成果，其著作不但受到學界的重視，也得到一般讀者的歡迎。

學者讀日記都感到“震撼”

蔣介石日記開放後，許多學者來到胡佛研究院，原先對蔣介石評價各有不同的學者們，看完日記後都有相同的感覺：“震撼”。郭岱君對《新史記》表示，每位學者根據自己的研究主題和多年來的關注重點不同，在閱讀蔣介石日記時都有不同的期望，有人特別想看西安事變、有人想看抗戰，有的人想知道蔣介石與宋美齡的關係，每位學者閱讀蔣介石日記後，也都有不同的心得，但每位看過蔣介石日記後，都對郭岱君說，他們感到震撼。

郭岱君舉例，一位正在英國牛津大學做訪問學者的加拿大教授，出生北京，他過去曾聽岳父隱約談過一些蔣介石的事蹟，但總是欲言又止，只是鼓勵他多讀、多看、多思考。事隔15年後看到蔣介石日記，才知道為何當年岳父只能隱約透露，“原來他有太多想說卻又不能說的事！我的岳父15年前就為我鋪了到胡佛的路！”這位學者說。一位目前正在胡佛看檔案的學者也有許多感慨，他驚訝蔣介石的毛筆字這麼工整。也有學者很佩服蔣介石先生每天寫日記的恒心與毅力。

而郭岱君自己最受震撼的，是從日本侵華開始一直到國共內戰的日記，深深顯示蔣介石的堅忍不拔，不畏艱難，堅持到最後的

精神。就是這樣的精神，才能帶領中國贏得對日抗戰。過去在很長時間內，有許多人指責蔣介石不抗日，但日記公開後，包括她自己在內，沒有一位學者認為蔣介石不抗戰。其實蔣介石不但主張抗戰，還積極備戰，在投入戰爭後反對與日和談。日記中諸如這種顛覆自己過去觀念之處還有很多。

郭岱君介紹，蔣介石年輕時留日，對日本有相當瞭解，1928年濟南“五三”慘案後，日記每天的開頭都寫了“恥”或“雪恥”，一直到他過世，且整部日記蔣介石都稱日本人為“倭”，或“日倭”，可看出蔣介石對日本沒有好印象。

而蔣介石看似不抗日的態度，其實是因為他瞭解日本的實力。1931年“九一八”事變的隔天，亦即9月19日的日記中，蔣介石寫道：“昨晚倭寇無故攻擊我瀋陽兵工廠，內亂不止，天災匪禍，相逼而來，速我唯亡乎。”當時在南京的蔣介石還將宋美齡送到上海避難，但宋美齡到上海後很生氣，希望與蔣介石共度國難，因此自己跑回了南京，蔣介石在之後的日記中寫道，宋美齡令他寬慰。

另一方面，一些人認為應該不顧一切抵抗日本，但蔣介石認為應該隱忍，暫時不該抵抗，兩方很快有了爭論，在自知中國貧窮落後、實力不如日本，但不抵抗又愧對先祖的情況下，日記展露蔣介石矛盾的心情。蔣介石寫道：“日本三日可亡我”、“日本三月可亡我”、“中國軍隊有敗無勝”，但又指出：“聞瀋陽、長春、營口被倭寇強佔，心神不寧，如喪考妣。苟為吾祖吾宗之子孫，則不收回東北，永無人格矣！”“以手造之國家，辛勞八年，死傷部下三十餘萬，猶親生扶長之子，欲使一旦放棄，不能相見。經國赴俄不歸，民國扶持未長，皆欲使我一旦棄去”；“於國為不忠，於母為不孝，於子為不慈，自覺愧怍”……當時，蔣介石甚至擬好遺囑，認為了不起就一條命，就去打日本吧。

1931年孫科、胡漢民等人在廣州另立中央，12月15日蔣介石決定提出辭呈，第二度下野。當時其實國民黨大部分人，如胡適、蔡元培、汪精衛、陳布雷、傅斯年，也都認為中國一時無法與日本對抗，除貧窮落後外，也因為軍閥割據。郭岱君說，蔣介石一生都無

法統治中國大陸，頂多只有沿海幾省，此時蔣介石心裡想的是，軍閥盤據，各有所謀，不先剿共、滅匪，則不能御侮。不先平內，則不能攘外。蔣介石認為“中日必將一戰”，但“此次對日作戰，其關係不在戰鬥之勝負，而在民族精神之消長，與夫國家人格之存亡……徒憑一時之興奮，不具長期的堅持，非與國無益，反速其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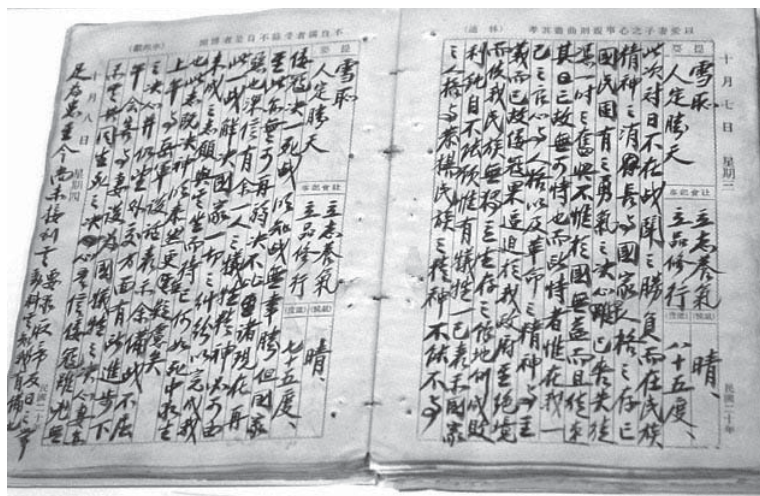
日記記錄“忍辱負重自強不息”

1933年，蔣介石採納德國軍事顧問及蔣百里的建議，決定了抗戰的策略：遷都西南，打持久戰；改變戰爭軸線，擴大戰場，拖死日本。根據這個戰略，首要遷都，將重慶作為陪都，其次是爭取時間備戰，第三要誘日軍南下，“以和日掩護外交，以交通掩護軍事，以實業掩護經濟，以教育掩護國防”。於是，中日簽訂塘沽協定，中國則蓋公路、成立工業委員會、推動“新生活運動”。蔣介石寫道：“我屈則國生，我伸則國屈，忍辱負重自強不息，但求於中國有益。”

當時四川、雲南、貴州均為軍閥割據之地，蔣介石認為很難進入西南，他想到一計：“藉剿共以收復西南”，先把共產黨除掉，再抗日。郭岱君指出，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安內”，更多的是安軍閥，其實1930年代初蔣介石並未將紅軍看在眼裡，因為紅軍在幾次圍剿後只剩2萬5000多人，蔣介石的計畫是故意留下紅軍，把他們從江西趕往西南，自己軍隊在後頭追，藉此進入四川、雲南、貴州。

蔣介石認為此時是“韜光養晦”時期，希望大家凝聚力量抗日，但當時青年學生、黨內、左派人士對他的戰略批評十分猛烈，甚至當面開罵，蔣介石的日記，顯露出他的委屈與無奈。“茹苦負屈，含冤忍辱，對外猶可，對內尤難，何黨國不幸！使余猶當此任也。”

蔣介石在1936年寫道，他計劃用6年時間訓練出60個德國的機械師，只是但人算不如天算，這個目標尚只達成一半就發生西安事變，令蔣介石在日記中埋怨：“漢卿（張學良）壞我一盤好棋”、



蔣介石日記原稿。

“漢卿誤我大事也”。

1937年對日抗戰正式展開，當時的中國實力大不如日本，連連失利，當時許多人，包括孔祥熙、于右任、胡適、汪精衛都主張和談，但抗戰前蔣介石堅持拖延，抗戰開始後，蔣介石則拒絕和議，當時的日本通過各種渠道希望與蔣介石和談，但始終未能如願。蔣介石認為應打持久戰，用空間換取時間，誘日軍南下，開闢戰場，“以堅韌、忍耐、延緩、持久之道，致其死命也”。蔣介石抗戰的方略就是“敗而不降”，只要能夠抵抗三年、五年，國際上總有新的變數，敵人國內也有新的變數，中國就有求生的一線希望。

蔣介石也一直期冀俄國參戰，因為日俄是宿敵。斯大林也總給中國參戰的希望，卻又遲遲沒有動作，因此蔣介石日記中經常指斥蘇聯：“以對俄問題處理為難，蓋國之患有隱有急，倭患急而易防，俄患隱而叵測也。”他很早就認為“中國之患在北（蘇俄）”。

蔣介石同時派官員至歐洲尋找各種援助，成就最顯著的是孔祥熙，他與德國簽訂秘密協定，同意中德間以貨易貨，中國提供正準備歐戰的德國鎢沙，德國則提供給中國軍事顧問，德國因此將法肯豪森上將派至中國，中國至此開始訓練軍隊。法肯豪森後被希特勒召回德國，擔任德國奧地利佔領區總司令，歐戰結束後，法肯豪森成為紐倫堡大審十大戰犯之一，後被蔣介石親筆函救了下來，

蔣介石的親筆函還救了日本的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岡村寧次大將。

1941年12月8日本偷襲珍珠港，將美國捲進戰爭，蔣介石相當高興，在日記中寫道，“抗戰政略之成就，本日達于極點，物極必反，能不戒懼？！”

但美國參戰後，中國仍打得嚴酷，死傷慘重，日記中可看出蔣介石承受巨大壓力。1943年11月的開羅會議，中美英三巨頭充滿笑容地合影，照片後面，羅斯福、邱吉爾對中國戰區的表現其實並不滿意。因此1944年衡陽會戰時，蔣介石非常希望得勝，他在日記中希望主保佑一戰勝利，倘若得勝，他將在衡山頂建一個世界最大的十字架予以酬謝；如果不幸失敗，他只有自殺謝罪。

開羅會議之後，羅斯福詢問美國陸軍上將史迪威有關中國戰區的情況，史迪威認為只有換掉蔣介石，中國戰區才有生機，羅斯福答道：“那麼時間也差不多了。”並詢問是否能找到更有活力的人選。史迪威回四川後，卻大膽“矯令”，交代參謀多恩(Frank Dorn)除掉蔣介石，幾日後，多恩提供三種方式：刺殺、毒殺、飛機事故，史迪威選定第三項，並指出不要特別考慮與美國人關係良好的宋美齡，更要求飛機上也得有美國人，如此才顯得“真實”。暗殺雖然最後並未實施，由此也可見史迪威與蔣介石彼此的衝突到了何種嚴重程度。

逃過了暗殺，卻逃不過羅斯福的親自下令。1944年9月30日羅斯福發了電報，由史迪威親自交與蔣介石，要求蔣介石把中國戰區的所有軍權都交給史迪威。史迪威在當天的日記中描述，見了“peanut”（史迪威對蔣介石的貶稱）後，他低頭不語，面色凝重，臉都綠了，什麼話都沒說，揮揮手叫史迪威出去。

史迪威出去後，蔣介石痛哭，認為這是畢生最大的屈辱，但蔣介石不能把自己國家的軍權交到美國人手裡，他也不相信史迪威有指揮中國戰區的能力，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余實已心碎筋疲，已不能久持”。蔣介石與宋子文商量後，認為最壞的情況就是中國單獨作戰。蔣介石堅持不能從命，反讓羅斯福退讓，因為美國不能沒有中國軍隊在中國戰場上拖住100萬日軍。羅斯福將史迪威召回

美國，改派魏德邁赴中國。

1945年8月10日，日本表達願意接受波茨坦宣言的意願，蔣介石當天早上正在禱告，突然聽到山下小學的鞭炮聲，得知日軍準備投降，他的文膽陳布雷其時正生病，因此蔣介石親自擬了一篇宣言：“不要心存報復，我們一貫聲言，只認日本贖武的軍閥為敵，不以日本的人民為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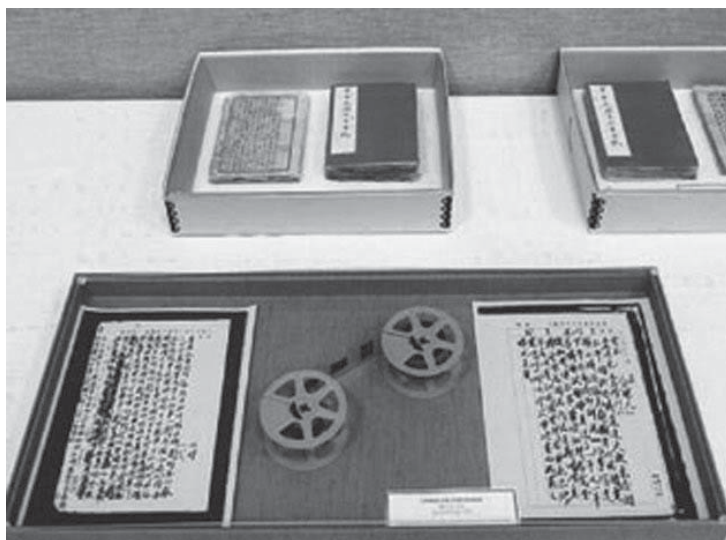
抗戰結束卻是內戰開始，國民黨在內戰中節節敗退、眾叛親離，蔣介石曉得國民黨黨員的結構有問題，在日記裡面寫下相當多這方面的檢討。他經常看中共的內部參考消息、讀毛澤東講話，認為幹部一定要下鄉，要在三年內造就十萬幹部。蔣介石也經常提及“耕者有其地”、“二五減租”等措施，曾想讓農民保有在抗戰期間拿到的地，但他這樣的解決土地問題的設想遇到很大的阻力，未能實施，最後到了台灣才有機會推動，終為台灣奠定民生、經濟基礎。

內心表白為歷史提供解答

郭岱君對《新史記》透露，蔣介石日記寫到的其它問題，尤其是一些有爭議問題，包括蔣介石與汪精衛和胡漢民的關係、蔣介石如何迅速在國民黨中崛起、蔣介石對外交的看法、“四一二”清黨等，都給了外界一番新的理解。

日記也生動寫出蔣介石對張學良的看法，當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闖下大禍，蔣介石重傷，張學良在回到南京時跑到蔣介石面前問起為何不改組政府之事：“是日腿部疼痛未減，精神不甚佳、僅會客數人。問岳軍（張群）外交情況。晚間漢卿（張學良），彼猶強余以實行改組政府，而毫無悔禍之心。”但蔣介石仍“善言慰之，並實告以軍法會審後於眾特赦並予以戴罪圖功之意”，張學良聽完後“昂昂然而去”。

郭岱君解釋，日記的好處，就是讀者能進入蔣介石的內心世界。這段話可以看出他沒有原諒張學良，而張學良卻真天真，闖了大禍還這樣強勢。



蔣介石日記
原稿，中間為微縮
膠捲。

許多人很好奇蔣介石是否真是基督徒。胡佛檔案館還保存了一部由法學家吳經熊手抄而成的聖經，蔣介石讀聖經很仔細，聖經上每字每句均有點批，蔣介石也在日記裡言必稱主，特別是抗戰和1949年失掉大陸到台灣後，對基督的倚賴和仰望更深。郭岱君表示，至今見過日記的數百人，沒有一人懷疑蔣介石是基督徒。

蔣介石日記讓外界見到歷史的另外一面，但從個人日記來還原歷史真相是否可靠？郭岱君對《新史記》指出，個人日記是非常主觀的，學者絕對不能只靠個人日記來看歷史，而是必須參考、比對各種資料，才能根據自己的觀察得出一個看法。

“但很多領導人物都寫日記，為什麼都不如蔣介石日記這麼受重視？第一個原因，蔣介石幾乎前後60年都是中國大陸、台灣政治的主導人，與中國近代政策有重要關係，他的一生正是中國面臨各種挑戰的時候，第二，他一生都寫日記，每天寫，而且每天的日記都寫得滿滿的，不浪費紙張，都是從右上寫到左下，總共數千萬字的浩瀚日記，是中國近代史上非常重要的資料。”郭岱君說。

知名人物的日記，有的僅為記錄自己的人生歷程，但有的則已知日記將公開於世，因此特別著重自我形象的塑造。郭岱君對《新

史記》表示，蔣介石日記經過數百位學者的閱讀，沒有人懷疑它的真實性，例如楊天石便稱，蔣介石寫日記很大一部分是自我反省用，日記沒有一處是騙人的。

“其實蔣介石年輕時根本不知道自己將來會做什麼，但是成為中國國民黨領導人後，他可能下筆比較有分寸，但基本上，從內容的直率、批評、真實這點上，看得出來日記仍是寫給自己看的。”郭岱君說。

蔣介石在日記中曾批評過許多人，宋子文、孔祥熙、胡漢民、孫科、李宗仁、白崇禧、何應欽等人之外，甚至連好友戴季陶、妻子宋美齡都沒能倖免，但脾氣不佳的蔣介石卻沒將內戰的失敗歸咎於共產黨，日記裡幾乎找不到罵共產黨的字眼。

蔣介石的直率，則可從他毫不掩飾自己的隱私這點上看出。蔣介石把逛青樓、喜愛一名叫介眉的妓女並與之來往的事都記錄了下來，蔣介石也透露了蔣緯國的身世，並記錄宋美齡懷孕後，因為被刺客嚇到而流產、從此不育的經過，打破了原本外傳蔣介石得了性病沒法生育的傳聞。

胡佛研究院持續擴充中文史料

對於另一部也相當受到關注的蔣經國日記，郭岱君對《新史記》介紹，這部日記還必須尊重家屬意見，對外公開的時間未定，目前只有受蔣宋孔三大家族委託的宋曹琍璇到胡佛看過，宋曹琍璇是宋美齡弟弟宋子安次子宋仲虎的夫人，目前也是胡佛研究所的訪問學者。其他人則必須遵守規定，都無法閱讀蔣經國日記。

蔣經國日記撰寫時間始於 1937 年，終於 1979 年，全篇也以毛筆寫成，郭岱君介紹，蔣經國日記的保存情況不錯，但蔣介石日記就損壞嚴重，隨處可見發霉、暈染，特別是 1920 年代早期的日記，送到胡佛研究所時都打不開，技術人員必須細心、耐心地運用先進技術，將日記一頁頁打開、保存。

目前，胡佛研究院蒐集的中文史料檔案相當豐富，如陳立夫、

陳潔如、胡適、殷海光、陳獨秀，以及中國共產黨早期的建黨資料。郭岱君告訴《新史記》，2005 年胡佛研究院將以前舊有的檔案與近年新的檔案合在一起，稱為“近代中國特藏檔案”，其中包括從興中會開始的 1894 年至 2000 年的中國國民黨檔案、兩蔣日記、宋子文、孔祥熙、曾琦、嚴立三、程天放、雷震、阮毅成、唐飛、王作榮等的個人資料。為了保存國民黨檔案，胡佛研究院空運了六台微縮膠捲 (microfilm) 機器到台北處理這些檔案，原始檔案仍放在台北，但處理過的微縮膠卷則公開給大家查閱。這種檔案可保存 800 年，預計所有的國民黨檔案總數將超過 300 多萬頁。

郭岱君說，進入胡佛的 10 年來，由她經手的中文檔案均整理好並已對外開放，“胡佛是一個專業檔案館，檔案進來後，按照國際標準流程管理，進行整理、消毒、修復、編目的步驟，最後逐步開放。胡佛比較特別的是它的專業客觀、沒有政治立場，檔案都是對外開放的，學者看過檔案後，胡佛也尊重學者的不同看法。”在史料保存上已享有盛名的胡佛，目前仍在繼續進行將中國國民黨史料做成微縮膠捲，以讓外界對中國近代史有更全面的瞭解。（《新史記》記者 柯宇倩） □

成千上萬本來淳樸善良、享有天倫之樂的普通農民，為什麼竟泯滅人性，饑不擇食，割屍體、殺活人、吃親人？

世上最可怕的事情 在這裡都發生了

與現居北京的《紐約時報》簽約攝影師、作家杜斌可算老相識了。兩年前，杜斌的一本拼貼式的圖書《毛主席的煉獄》在明鏡出版社出版，《新史記》發表了對他的採訪記。2013年元月底，得知杜斌又編了一本書《毛澤東的人肉政權》在明鏡出版社出版，《新史記》記者再次撥通了杜斌的電話越洋長談。

對上一本書，記者報導的題目，是《從荒誕中拼貼出真實》；
從他這本書，記者涌起的最深感慨是：從禮讚裡揭示出血腥。
他這本書，寫的是慘絕人寰的人吃人。

“人吃人”這句話，在中共治下生活的人，並不陌生。我們被教導著相信：“舊社會”（那指的是1949年中共建政之前的歲月）是一個“人吃人”的社會——這是在象徵、比喻的意義上，形容“舊社會”多麼不合理、不公道。我們何曾想到，人吃人這樣的事，果真在中國發生，而且，主要還並不是在“舊社會”，而就在我們與共和國一起成長的歲月，就在我們身邊，只不過，由於當局信息封鎖非常有效，我們一直懵然無知！

數年前，我曾經與一位學有根柢的老友談起中國的人吃人現象，這位老友指出，不能對中國的人吃人現象不分青紅皂白地貼上



杜斌

政治的、意識形態的單一標籤，應該從民族歷史、文化習俗乃至宗教信仰等層面和角度進行具體分析。我深以為然。不過，就杜斌編的這本書所蒐輯的從中共建政到“文革”，這近半個世紀以來中國大陸人吃人的慘痛故事而言，無可推諉，都指向一個核心原因，那就是：至高無上的開國領袖及其建立的制度，一手造成了普遍的極度饑餓；而極度的饑餓，驅使成千上萬本來淳樸善良、享有天倫之樂的普通農民，泯滅了人性，饑不擇食，割屍體、殺活人、吃親人……這樣的故事，講出一個來就讓聽者心靈顫慄，而杜斌的書匯集的，是十幾個、幾十個、上百個、無數個這樣的故事，讓人無法卒讀：我們的民族，我們的同胞，為什麼該遭受這樣的痛苦，為什麼竟陷入這樣悲慘

的淵藪！

杜斌本人，生於 1972 年，山東鄒城人。他是一個自學成材者，年輕時沒有讀過多少書，當過三年兵，復員後到家鄉一家工廠保衛科工作，後來來到北京。他在寫作上自己摸索，出版了《上訪者：中國以法治國下倖存的活化石》、《上海骷髏地》、《北京的鬼》、《牙刷》、《艾神》等多部小說和紀實作品；從來沒有誰教過他攝影，他拍出照片投稿，被中國幾乎所有重要媒體採用，後來又在美國《紐約時報》、《國際先驅論壇報》、《時代》雜誌、英國《衛報》、德國《明星》雜誌等國際著名媒體上刊登。

一個世紀之前的 1912 年，畢卡索創作出世界上第一件精緻拼貼藝術品；一個世紀之後的 2011 年，這位來自山東農村、不知“拼貼”為何物的杜斌，編出一本拼貼歷史《毛主席的煉獄》。杜斌說：

“可惜，還是有些很有意義的資料，不可能完全放進書裡。”

他的遺憾在《毛澤東的人肉政權》一書中得到了彌補。這本書的資料來源沒有前一本那麼雜，讓讀者更強烈感受的，是圖片與文字故事的尖銳對比：圖片，是當年御用媒體、響應官方號召的藝術家們的攝影和繪畫作品，謳歌“形勢大好”，“到處鶯歌燕舞”（毛澤東詞）；文字，則是一個個、一串串浸透血淚的人吃人故事。看一看這些圖片，再讀一讀這些文字，二者的反差構成的張力，讓讀者在慟哭與譏笑之間受到深刻的震撼。

如果說，畢卡索的拼貼創作打破了藝術中真實與幻象的區別，那麼杜斌的這本書就像上一本的續編、姊妹篇，堅決地劃清了謊言與真相的界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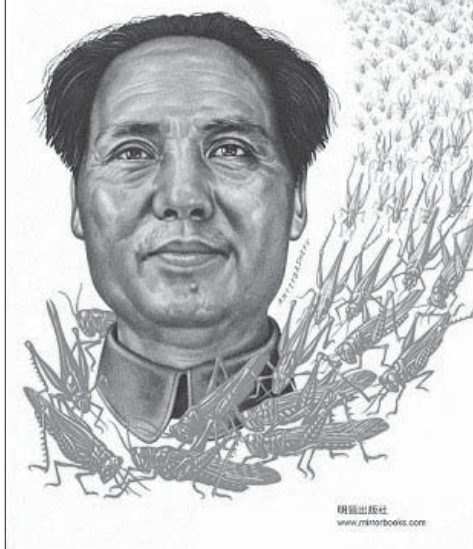
搜集到九萬多字史料

新史記：杜斌，你好！請問你是什麼時候、由什麼契機，對人吃人這個問題感興趣的？

杜斌：跟上一本《毛主席的煉獄》一樣，2004 年，我學會使用翻牆軟件之後，突破了網絡封鎖，可以自由瀏覽海外各種網站，可以

毛澤東的人肉政權

杜斌 繪



《毛澤東的人肉政權》
封面是杜斌自己設計的。

瞭解大量關於中共治下的真實情況了。開始，我是被六十年代初的大饑荒餓死人的規模震撼了，後來接觸了很多大饑荒中的具體情節，更感到驚悚。古代的人吃人離我們很遙遠了，而 1958 ~ 1962 年的人吃人，有許多目擊者、親歷者的證言。

新史記：你本人接觸過目擊者、親歷者嗎？

杜斌：有一位河南信陽的老師，本人就吃過人肉，我讀到他講述自己的慘痛經歷，就給他寫了一封信問：你說的是真的嗎？他回信說，完全是真的，你來了我可以介紹你去採訪。

但我評估過，他與妻子回鄉，跟村裡老人坐在一起慢慢聊，同村同姓同族，老人不會避諱他，可以談出當年的真實經歷，他錄下音來，整理出文字；我作為陌生人去採訪，人家就會有很大顧慮了，肯定是不敢說的——吃人的都有負罪感啊。再說，我作為攝影記者，沒有那麼充分的時間扎下去慢慢取得他們的信任啊。

不能直接採訪，我就想搜集這方面的資料。在輯錄《毛主席的

煉獄》一書時，我就注意搜集了不少。本來以為這麼慘烈的事，能找到一、兩萬字就算不錯了，沒想到最後蒐輯到了九萬多字！涉及很多省市。

可惜沒有辦法弄到直接反映這些血淋淋故事的圖片！原因就不用我說了。

與過去時代吃人有何異同？

新史記：我注意到，在你編的書中，“人肉政權”“人吃人”，包括著雙重含義：一個是象徵意義的、將整死人、餓死人都包括在內——有人將毛澤東治下比喻為“絞肉機”，也是這個意思；另一個，是真正的本來意義上的吃人，這是你的重點。人相食，自古以來就是非常慘痛、引起統治者和社會震動的悲劇，那麼，毛澤東時代的吃人，與過去時代的吃人，有什麼異同呢？

杜斌：古往今來，有很多因戰爭、饑荒、仇恨，甚至有吃人風俗等原因，導致人吃人。過去時代掌控人的生死的當權者，沒把他人、把臣民當成人去看，漠視他人作為一個生命體的存在，並不關心民衆死活。但是一旦知道有人吃人的事，從他們自己的利益和名聲著想，他們多半會採取緊急措施來緩解饑荒、來制止悲劇。至少，他們不會阻止老百姓的自救、互救。

毛澤東時代與古代不同的地方，就是 1958 到 1962 年，毛澤東和他的同事，有各種渠道能夠瞭解到真實慘劇——他們有各種內參、簡報嘛，我這兩本書中，都有講到饑荒真實情況通過各種途徑向上反映的實例。但是毛澤東和他手下那些維護權力運行的人，依舊向各省市官僚施加壓力，催逼他們繳納計劃內和計劃外的農產品。他們已經得知嚴重後果了，還是繼續這麼做，而且，禁止老百姓的自救和互救——這就是最大的不同之處！

毛澤東時代的饑荒與過去時代的饑荒的這種區別實在太明顯了：過去年代，斷糧了，老百姓可以逃荒，投親靠友，或者乞討，到別處找條活路——1942 年河南大饑荒，災民們就是這樣跑到陝西去。

而毛澤東時代不許逃荒！農民被囚禁在連草根樹皮都光溜溜的當地活活餓死。村頭路口都有人站崗放哨，外地人討飯來了，要麼送回去，要麼抓起來關到斷氣為止。

毛澤東是否“故意”

新史記：您上次在回答我的採訪中和這本書中，都提到一個引人注意的詞：毛澤東是故意……

杜斌：剛開始接觸大饑荒資料的時候，我就在苦苦思索這個問題，希望找到答案：毛澤東不可能不知道饑荒的嚴重，為什麼他不干預？

你想吧，毛澤東出生在農村，種過田，對一畝地能產多少糧食，他應該心中有數。像廣西放的那顆“特大衛星”，宣稱一畝地生產出 13 億斤糧食，文章上了《人民日報》頭版頭條，毛澤東不可能讀



慶豐收 趙宋生，水粉畫 1973

不到，他不可能相信這樣的神話——有一次下面跟他說，沒有糧食了，他就發脾氣：你沒有糧食，為什麼當初把牛皮吹得那麼大？這就說明，毛澤東很清楚下面的人搞什麼把戲。

毛澤東為什麼看著這麼多人餓死？不能靠自己分析，更不能僅憑猜測，必須要找到有關論據來支持。一年多前，我在香港××雜誌上，看到一批解密的前蘇聯檔案資料，其中說1950年毛澤東、周恩來去蘇聯，1950年2月14日簽了一個《中蘇友好同盟特別協定》，裡面有一句話：“中華人民共和國之人口，因目前資源缺乏，非減少一億，決不能支持，其詳細辦法，由中華人民共和國自行定之。”

這是形成文字的正式文件啊。我看了之後有恍然大悟的感覺，就像希特勒要將猶太人全部淘汰一樣，毛也想拋掉那些對他實現宏圖大略扯後腿的人，包括那些沒有文化的農民。他既然要當共產黨陣營的頭，中國的資源又無法支撐如此之多的人口，他希望帶領的是相對精幹的隊伍。搞大躍進累死多少人，大饑荒餓死多少人，毛澤東都無動於衷，他就是這種觀念：反正若干年後，人口數量就會又回來了。

我們無法真正鑽到毛澤東的心理去看，他是不會將自己內心最隱秘的說法表露出來的，只能通過毛的內部講話和資料來分析推測。

蘇聯在上個世紀二十年代發生大饑荒，也有人吃人的記錄，毛澤東不會不知道。這對他不在乎人命，也起到了示範效應——蘇聯當初不也是餓殍遍地嘛，後來不也是向前發展，成了跟美國平起平坐的超級大國嗎？誰還在乎當初餓死多少人？蘇聯既然沒事，我也應該沒事，這在國家向前發展的過程中，只是枝節問題而已。——蘇聯對高級將領和官員的清洗，對毛澤東也有影響，在政治運動尤其是“文革”中，他也吸取了蘇聯的經驗。

毛澤東講過很多次：打仗哪有不死人的？大躍進在他看來等於打仗。1958年他說過：“無時不死人，要有準備。”（1958年3月9日在成都會議講話）這種思想，一直往下傳到公社幹部、生產隊幹部，書中資料就寫到：縣委書記對死人毫不在乎地說：要是不死人，



毛主席指出了光明大道 李宗津，宣傳畫。1958

地球都裝不下！

而且在毛澤東的意識中，打仗的對手就是農民。大躍進造成糧食、副食、蔬菜緊張，毛澤東堅持認為這是農民抵制徵購造成的。1958年3月28日上海會議上，李先念報告說：“全國都是豐收的”，但有些省糧食還沒收上來，毛澤東插話：“為什麼別省未收起來？請各省學河南的辦法，先下手為強，後下手遭殃。”

新史記：毛澤東時代整死人、餓死人乃至人吃人，是無可迴避、無可抹殺的史實。但是這個後面，毛澤東的心態，他手下那些官員的心態，

究竟如何，還需更加嚴謹地探討、分析。你說的中蘇那個特別協定的文字原文是什麼、指的是什麼，我們還需要找到更權威的來源來證實或者證偽；還需要找更多的證據來探索毛澤東的內心世界：他究竟是為什麼看著這麼多人死去而無動於衷，還要去批彭德懷等人的“右傾”。

一對括號一個字：“略”

新史記：你找這些資料很費了一些工夫吧？記得以前你告訴過我，你去北京的潘家園淘書。

杜斌：是啊！還是經常去潘家園，另外，也上互聯網找。發現了書，馬上打電話過去，馬上下單支付。我到孔夫子舊書網檢索，發現不少有價值的資料，例如圍困長春餓死多少平民，我就找到一些長春檔案館和政協編輯的文史資料，是在吉林的網上舊書店找到買回來了，這些書，出版時不是公開發行，上面還印著“內部刊物”字樣。多半是文字資料，只是有的封面、封二、封三上有少量圖片。這些資料多是參與其事的人，包括國民黨官員被俘或投降之後，所寫的回憶，從他們的文字中，我們能夠分析揣測當時的狀況。像《長春文史資料》（內部發行，長春市政協編，1987年，紀念長春解放40週年）、《長春檔案史料》（內部發行，1998年，紀念長春解放50週年）……這些史料上一句對中共的負面文字都沒有——共產黨審查工作做得非常好，餓死人“一切都是我們國民黨的罪過”，與中共沒有關係。這些人經過多年改造，尤其是經過“文革”，已經被整得老老實實的了，口口聲聲美化共產黨——以他們的境況，不美化也不行啊。

反倒是官方公開發行的出版物藏頭露尾地漏出一星半點。共和國60週年大慶時，出了一本《解放長春》，長春檔案館編的，檔案出版社2009年出版，其中對圍困長春死了多少平民守口如瓶，但提到在圍困的時候的學生數字：中學生在圍困之前有5千人，戰爭結束之後只剩下1千人；小學生圍困之前有3萬5千人，只剩下4400人。這個數字就是一個雄辯的證詞。

裡面也有下級向上級匯報的檔案材料，不過，讓我非常傷心的

是，關於掩埋屍體的數量，用了一對括號一個字：“略”！

長春守城的黨政軍最高長官，東北剿總中將副總司令兼第一兵團司令官鄭洞國回憶，在城東南郊，兩軍對峙的空白地帶，掩埋的屍體就有“幾萬具”——涉及屍體數量的，就只有這一處模模糊糊地提到，其它都被審查掉了。

買一本舊書，花 50 元、100 元，只要能有一個數據、一句話有價值，能被引用，我覺得就非常值得了，就沒白買。能讓這些資料被更多的讀者看到，我非常欣慰。當然也有的書，買回來從頭看到尾，沒有找到有價值的史料。

新史記：這些圖是不是更難搜集？

杜斌：對，大海撈針，撈到之後，還要跟老闆討價還價。不過經常有喜出望外的收穫。有一幅畫，《還我家來，還我兒來》，是我到潘家園樓上一家舊書店找到的。沒有出版社、沒有署名，是一張手繪風格的印刷品，讓我看了很震驚。我問老闆，這張畫要多少錢？他開價 1200。我問能便宜點嗎？他不肯，說這張畫是很難弄到的。我覺得太貴，就走了，但是好幾天還想著這事，後來覺得，還是應該買下來，就又去了。老闆還是不肯讓價，我就咬咬牙買下來了。

買畫買資料要花錢，掃描又是一筆錢——不能用普通的掃描儀，我這些圖都是電分掃描（電子分色分層高精度掃描），掃描出來就跟原版差不多一樣清晰。我一去就是三四千元票子要拿出來，放在那兒一大摞呢。老闆可歡迎我去了，一個月也不一定能有我這樣一個大主顧。

有一張毛澤東教導要忙時吃乾閑時吃稀的宣傳畫，在搜集《毛主席的煉獄》那本書的資料時就看見了，當時賣主開價一千以上。我捨不得這麼多錢。書出來之後，我有點後悔，覺得這張圖還是應該買下來收進去。我又跑去問，他賣掉了，我就打招呼要他再留意。過了差不多一年吧，他告訴我，又弄到了一張，但是放在櫃子裡，被雨淋了。我要他拿出來看看。我一看，不僅是被雨淋打皺了，還有破損。但我還是要，給了他 150 元，就放進了這本書。

潘家園這種地方現在也管嚴了，“文革”等許多資料不讓賣，攤

主若賣了，查出來了，就給你貼上封條，不讓你擺攤了。加上淘東西的人也越來越多，所以好東西就越來越少了。

封面這張圖，是美國《時代》週刊的圖片，弄到這張圖片也費了些勁。我很喜歡《時代》週刊的圖，他們的藝術家個性非常鮮明。我就上他們的網站搜索，找到這張，是1950年12月刊出的，是一張很有質感、很生動的藝術品——當然也有他們的意識形態。我通過紐約的一個朋友幫忙——他曾經在北京實習，後來去紐約讀書，我請他到時代公司買下這張畫。我花了45美元。時代公司只能寄到美國的地址，正巧有個朋友要從美國回來，就幫我帶到北京。

圖片與文字的編排，構成尖銳的反諷，這就是我的再創造。

我們是人，不是牲畜！

新史記：從上一本到這一本，你編的書，選題都很淒慘。好像你的眼睛就一直盯著浩劫、悲劇？

杜斌：編這些書，天天要面對這麼悲慘的事，心裡很不好受。我那些記者同事對翻譯說，你看杜斌，成天樂呵呵的，編出的書卻這麼沈重！翻譯後來轉告我了。是的，我沒有辦法轉移我的心思。這一類書講的事情，多麼絕望：人無聲無息地就死了，不明不白地就被吃了，吃了他們的那些人，大部分也沒有活到大饑荒之後，連是否被掩埋，都不知道……多少年被遺忘，沒有得到安慰，沒有得到哀悼。我們活著的人，要是不為他們做點什麼，我感到都是有罪的。我雖然沒有經歷人吃人的那個年代，但我心裡還是感到非常沉重的內疚。不能忘記他們，因為他們是我們的兄弟姐妹，死得那麼慘，忘記他們就是再一次殺害他們；同時，也因為講出他們的故事，也就是要清算中共犯過的罪行。

我相信雖然我的讀者不算很多，但是只要看過這些書，就不會忘記那些在極度饑餓中死去的人。

編這本書，我最想告訴世人、告訴中國的統治者的，只是八個字：我們是人，不是牲畜！這就是我編這本書的意圖所在，也是這一



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侯一民、鄧澍、詹建俊、靳尚誼、羅工柳、袁浩，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 1972

段時間我所編、所寫的所有書的主題所在：我們是人，不是牲畜！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看來我的方式就是這樣了。這是我的國家啊，我用這種方式，促進我的國家永遠告別那些可怕的往事，朝好的方向走啊。

國家安全局邀我去開會發言

新史記：你這些選題雖然都是歷史，但在中國大陸也是很敏感的吧，得到“關照”了？

杜斌：得到關照了啊，連我的家人都受到干擾，不過，官方人士對我很客氣，唯一不客氣的只是我媳婦她爹，總覺得我思想是不是“反動”。他被中共洗腦洗了一輩子，把腦子給洗壞了！（笑）我要我媳婦轉告老人，請他上新浪微博看看，老百姓如今想的是什麼。

我編這本書，沒有告訴周圍親友。2013年元旦，英國《衛報》採訪寫《墓碑》的楊繼繩，報導中引用了一句我的話，說我有一本新書要出版。1月6日，北京市國家安全局給我打電話。那天我正要去朋友家吃飯，一位女士來電話說：您是《紐約時報》的杜斌嗎？我說，是啊，您哪位呀？她說，我是北京市國家安全局的。我說，您好，

有什麼事嗎？她說，我們有個國際研討會，邀請您參加，您能過來做個發言嗎？我當時就笑了，說，我哪有資格參加這個國際研討會發言啊。這些宏觀的問題，我不關心。她說，那您關心什麼問題？我說，我關心微觀故事。

剛在朋友家吃完飯，就接到我父親從山東老家打來的電話，說臨沂市的國家安全局人員剛剛來過找我父親，他們來的理由很充分：以前我出那本《毛主席的煉獄》，我拿回老家一本，他們看到了，說要拿去看看，“我們還沒看過呢，只在網上看到過一點介紹”。他們拿去之後很長時間沒有還回來，那天到我們家說是來還這本書。來後問我爸：好像你孩子又要出書了？——他們的消息真夠靈通的！

我在《紐約時報》的工作許可，外交部新聞司一直沒有給我。

新史記：為什麼呢？有多久了？

杜斌：2011年7月我去申請的，到現在17個月了。《紐約時報》聘請我，但是要得到中國政府有關部門的批准。具體辦理此事的是外交部下面的外交人員服務公司。拖了很久沒有音訊，我就去找他們，說，你們如果再不理，我就只好把這事發布到網上去了。後來我又去問，他們就打電話通知我：外交部新聞司說，你不符合相關歸口規定。我馬上去了外交人員服務公司，找到他們的經理。我說，外交部新聞司這個意見，你們為什麼不早告訴我？你們有我的手機，也有我辦公室的電話呀。他們不回答，只是拚命記錄。我說，我要一個書面答覆，說我不符合規定，是根據哪一年制訂、哪一年通過、哪一年實施的法律？是哪個部門制訂的？他們說，我們要向局裡匯報，再向部裡匯報。我說，從你們辦公室到外交部辦公室，十分鐘都用不了，你們兩天能給我答覆嗎？那位姑娘還問了一句：給你書面答覆，你能保密嗎？我說，這個答覆是國家機密嗎？為什麼不可以公布？要我保密，那請告訴我出於保密部門什麼規定。她不吭聲了。後來再沒下文。

美聯社、路透社聘請的攝影記者中都有中國人，都得有證件。在人民大會堂開會，他們能進，我沒有得到發下來的許可證，就進不去。為什麼我得不到許可？只有一個解釋：跟我編了、寫了幾本書有

關係。

《紐約時報》是我的雇主，當然就很緊張啦。當初《紐約時報》為我申請許可時，按規定將所有材料都交到外交部有關部門了：我有無犯罪的證明，我也沒有病，什麼問題都沒有，更沒有觸犯中國法律——在境內不許我出書，無法享有出版自由，我就在境外出，在香港總還有出版的權利吧！

新史記：《紐約時報》前一段時間報導溫家寶家族的財富，跟官方的關係變得很僵。

杜斌：《紐約時報》的報導只是最近的事啊，不過這篇報導對中共官方的衝擊很大，真正把他們激怒了。

黨史很輝煌，黨史很血腥



紅色恐怖萬歲！
作者不詳，宣傳畫

新史記：這本書出版了，你下一步有何打算？

杜斌：好幾個選題。我打算學著做記錄片，也打算再編書。我準備出一本關於上訪人的書。2007年我出了一本《上訪者》，是採訪了七年的成果的結晶；現在我採訪這些上訪人已經13年了，有了很多新的材料。我想編一本精選本。他們急需得到社會的高度關注。

新史記：他們的情況有什麼改變嗎？

杜斌：慘不忍睹。胡溫十年搞維穩，對他們愈演愈烈，他們的境遇每況愈下。對人的侵犯更嚴重更惡劣了！

我還編了一本關於天安門事件的書：那年6月3日晚到6月4日晨，在每一個時間節點上，在各個地點發生了什麼？人們在幹什麼？說什麼？看見了什麼？從各種人的眼睛，看當年究竟發生了什麼。我編這本書，獻給“六四”死難者，獻給所有參加喊出自己聲音的人，獻給北京的人民，獻給流亡在世界各地不能回國的人，獻給我們的已經出世和沒有出世的孩子。

中共在上個世紀二十年代、三十年代打土豪分田地的事也引起我的興趣。中共當時自己不種地，軍隊要吃飯，糧食從哪來？打仗要花錢，他們沒有工廠，也不做買賣，錢從哪裡來？那不就是搶土豪的嘛。我搜集到不少這類畫，有蘇區的，也有晚一點的。黨自己說偉大光榮正確，究竟是不是呢？好多東西應該讓現在的讀者知道。中共自己說，黨史很輝煌；但是在我看來，黨史很血腥！（《新史記》記者 高伐林）□

正在北極圈勞改的前中共湘鄂省委書記、前中共滿洲省委代理書記楊光華，因《星火燎原》的徵稿而改變命運，回到中國。早年的遭遇令人嘆惋，晚年的結局也讓人深思

被流放與被遺忘的 中共省委書記

因徵稿而找到的中共省委書記

1956年7月，為紀念建軍30週年，中央軍委決定出版一部反映中共建軍30年鬥爭歷史的回憶文集，此項任務交給了總政治部。時任總政治部副主任的肖華批示由總政宣傳部、文化部共同來完成這項工作。此時，為了給《星火燎原》撰寫革命回憶錄，賀龍組織原紅軍二、六軍團高級幹部20多人，在東交民巷他的私人宅邸專門座談。在賀老總的招呼下，王震、蕭克、王恩茂、余秋里、賀炳炎等很多高級將領從全國各地專程趕來。座談會上，賀老總問：“紅三軍成立時，還有誰在場？湘鄂兩個省委班子當時有哪些人？”當時許多人已經記不清那麼多細節了，於是賀龍轉頭問曾在紅三軍工作、時任內務部長的謝覺哉：“謝老啊，你要把我當時的省委書記找到，他可能就在蘇聯。”

後來，謝覺哉果真通過各種渠道，找到了這位正在北極圈勞改的前中共湘鄂省委書記、前中共滿洲省委代理書記。經過與蘇方交涉，這個早已經失去軍銜的前紅軍高級幹部在歷盡九死一生



楊光華

的磨難之後，因為《星火燎原》的徵稿而改變了命運，並回到了中國，他的名字叫楊光華。

湘鄂西根據地創始人之一

楊光華，曾化名子才、巴本、老周，1908年7月28日生於湖北省嘉魚縣，1926年在洪湖組織製扇工會，擔任糾察隊長，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1928年他參加沔陽秋收起義，組建洪湖地下黨組織，歷任賀龍領導的工農革命軍黨代表、中共沔陽縣委書記、中共湘鄂西臨時省委組織部長、代理省委書記、書記。1932年8月到上海中央局互濟總會工作，後任組織部部長。1933年6月至1934年3月任中共江蘇省委秘書長，1934年10月任中共滿洲省委代理書記。當時中共滿洲省委因為與中共中央中斷聯繫，直接歸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領導。1935年初，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電令滿洲省委，負

責人全部赴蘇聯，討論東北工作。楊光華 1935 年 4 月去蘇聯。受“左”傾機會主義迫害，於 1937 年 1 月被判處徒刑送進集中營。1946 年釋放後在蘇聯當工人，1956 年回國，先後遭受迫害長達 21 年之久。

1931 年春，夏曦作為中央代表來到洪湖，積極推行王明“左”傾冒險主義路線，否定湘鄂西黨和紅軍在長期艱苦鬥爭中取得的重大成績，撤銷了中共湘鄂西特委，指責湘鄂西特委執行了所謂“富農路線”，要把湘鄂西黨、紅軍和蘇維埃工作轉變到“國際路線”上，提出要自下而上地在“黨內發動改造黨的運動”，並把黨內不同意見的爭論與“改組派”聯繫起來，極力推行宗派主義幹部政策。湘鄂西省委連續發布文件，把“肅反”作為黨“最緊迫最突出的任務”，在全省範圍貫徹執行。隨之而來的便是“肅反”擴大化，大肆屠殺革命幹部，把黨內軍內正常分歧都當成“混進了大量的改組派、托派、AB 團、第三黨、取消派”，連續開展四次“肅反”運動。湘鄂西革命根據地的創建人如萬濤、段德昌、柳直荀、王炳南等均被殘忍殺害。僅在三萬多人的紅三軍，經過“肅反”後，加上犧牲和逃亡的，人數下降到不足三千人。夏曦殺人如麻，不問情由，他身邊 4 個警衛員，被他親手殺掉了 3 個。當年的紅三軍只剩下了夏曦、賀龍、關向應、盧冬生“三個半黨員”（盧冬生是交通員，屬於半個黨員）。最後連賀龍都哀求說：老夏，不能再殺了，再殺就殺光了，沒人打仗了。

當年作為湘鄂西代理省委書記的楊光華，角色是雙重的，與夏曦是既有合作也有分歧。早在瞿家灣的湘鄂西中央分局擴大會議上，楊光華等人與夏曦在幾個問題上就發生了爭論。如所謂反對前任書記鄧中夏的右傾逃跑主義問題上，楊光華認為，鄧中夏的主要錯誤是“左”傾，而逃跑是脫離根據地以後，在敵人壓迫下不得已而為之。又如成立貧農團，進行反富農鬥爭問題，夏曦指責周逸群領導的土改，沒收地主土地，平均分給無地或少地的農民是“富農路線”，要在土改復查中重新分配土地，實行“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的政策。楊光華指出，富農分壞田，如果富農有經營



夏曦大搞“肅反”，屠殺自己人。

土地的能力，兩三年後把壞田變成好田，要不要再分？雇農分得土地後，既無農具又無耕牛，他種不了這塊田，要出賣行不行？夏曦對這些實際問題都無法回答。在對無情殺戮的“肅反”問題上，楊光華曾不顧自身安危地問夏曦：“夏鬍子，我總是想不通一個道理，我們黨在白區的組織，只要被捕一個人，其他人就立即轉移，以免連續破壞。為什麼反革命在蘇區的組織，隨我們怎麼抓，一個轉移的也沒有，難道敵人就這樣愚笨嗎？”

1932年8月，蔣介石向湘鄂西蘇區發動第四次“圍剿”。當時，擔任軍委負責人的夏曦，在敵人進攻面前，還在繼續搞“肅反”。紅軍主力突圍以後，根據地只剩有七師、八師的一部分。由於連日轉戰疲憊不堪，再加上“肅反”中痛失戰友和心有餘悸，楊光華突發傷寒，病倒在小船上，高燒不退，水米不進。江陵縣委書記李家芬經過組織關係找了一位醫生，每天到船上給楊光華治病送藥，才使其病情逐漸好轉。當時，在洪湖一帶的小船上住著不少紅軍傷病員，楊光華決定發給這些傷病員一點經費，讓他們就地轉移，各自投親靠友，等待時機再尋找黨組織。安排完這批傷病員，楊光

華與宋一平扮成兩兄弟，乘船到了上海尋找到了黨中央，並給黨中央寫了一份《關於湘鄂西具體情況的報告》。中央看了楊光華的報告後，決定把他留在上海工作。對於這段經歷，也有人說湘鄂西省委書記楊光華是夏曦一手提拔的，在大敵當前的第四次“圍剿”中，他是隻身攜款、臨陣脫逃的。

在上海中央局兩年

1932年10月，楊光華被分配在中央組織局工作。1933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上海局改組江蘇省委，楊光華任秘書長。1934年3月1日，省委書記孔二和組織部長李實同時被捕，臨時省委書記由趙立人代理。不久，趙立人向楊光華傳達中央局新的組織方案，其內容是：以後不許開三人以上的會議，只用個別接頭的辦法，以免集體被捕。具體的接頭辦法是：中央局的代表到省委書記家，省委書記到各常委家，各常委到地方主管的各單位及區委書記家。楊光華表示反對這個新組織方案，認為這個接頭方法很有害，中間若發生問題會失去聯繫，特別是難以防止敵人從中搗亂。楊光華建議一個人只知道一個地方，如書記只知道組織部長家，組織部長只知道秘書長家，秘書長只知道宣傳部長家……這樣也體現了集體領導，可以防止敵人搞鬼。楊光華最後請趙立人向中央局轉達他的意見。

楊光華的意見被否定了，江蘇省委撤銷了楊光華的秘書長職務，送交中央局處理。3月16日，臨時江蘇省委作出《關於粉碎子才同志機會主義反黨陰謀的決議》，給子才（即楊光華）嚴重警告的處分和悔過自新的機會。中央局派楊光華去皖南巡視工作，一個月後，楊光華從皖南巡視回來的時候，江蘇臨時省委兩次遭到敵人破壞，同年7月，楊光華又接受中央局重建江蘇省委任務，並在中央局的直接領導下工作。不久，中央組織局李竹聲、盛中亮相繼被捕，江蘇省委也連遭破壞，楊光華已無法繼續在上海工作。中央局考慮楊光華搞過湘鄂西根據地工作，又搞過上海的白區工作，

決定派他到滿洲省委去。那裡既有抗日的武裝鬥爭，又有奉天、哈爾濱等大城市的地下工作，而中共滿洲省委則連遭破壞，需要重建。楊光華欣然從命。

弄假成真的革命夫婦

1934 年末，楊光華來赴哈爾濱代理滿洲省委書記，到中共滿洲省委所在地哈爾濱。前來接頭的竟是湘鄂西的老熟人譚國甫。譚國甫把楊光華帶到滿洲省委秘書長馮仲雲家裏。此時，馮仲雲被派往珠河抗日根據地，留在這裏工作的只有宣傳部長譚國甫和秘書（趙毅敏的妻子）及他的妹妹馮詠瑩。

馮詠瑩，1913 年出生於江蘇省武進縣。1934 年來到東北，到滿洲省委做地下工作。馮永瑩參加革命主要是受了其二哥的影響，其二哥就是叱吒風雲的東北抗日聯軍著名將領馮仲雲。1931 年“九一八”事變後，馮永瑩決定到哈爾濱去找二哥馮仲雲。到了哈爾濱，二哥提出由她來搜集情報，並負責處理中共滿洲省委的一些文件。1934 年，團省委書記劉明佛被捕叛變，省委機關遭到破壞。這年 10 月，中央派楊光華來哈爾濱代理中共滿洲省委書記後，為避免暴露身分，黨組織決定讓楊光華與馮永瑩同居一室，假扮夫妻。後來，因兩人之間有了感情，黨組織就批准兩人結了婚，成為中共黨史上著名的弄假成真的革命夫婦之一。

1934 年底，由於交通中斷，滿洲省委和上海中央局失去了聯繫，直接歸共產國際中國支部領導。1935 年 4 月，王明、康生以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名義給滿洲省委發來緊急電令，要滿洲省委派人到莫斯科去討論滿洲工作問題。內容有三條：一是要將滿洲省委的文件全部銷毀；二是滿洲省委所有負責同志全部到莫斯科討論滿洲工作問題；三是滿洲省委所管轄的全部內部組織交趙毅敏的妻子管理。接到電令後，楊光華召開緊急會議，大家一致認為：中共代表團已對滿洲省委產生懷疑，但如何才能消除這種不信任呢？有人認為，把有保存價值的歷史文件全部銷毀損失太大，將

來對滿洲省委是如何處理重大問題的情況將無據可查。因此在清理文件時可以保留一部分重要的文件轉送共產國際存檔。沒想到的是，偷帶文件的交通員順利抵蘇，文件卻在火車上被日軍截獲。爾後，敵人報紙上大肆宣傳得到了滿洲省委的重要情報。共產國際得知此事，非常生氣，在沒有證據的情況下認定省委書記楊光華就是內奸，於是，王明又重新下令：只許楊光華一人前往莫斯科。

1936 年春天，為了尋找丈夫，馮詠瑩拖著懷孕的身子也來到蘇聯。共產國際名義上安排她到莫斯科大学學習，實際上是對她進行監控。最讓馮詠瑩難過的是，她不但沒有見到楊光華，而且他們的孩子也在保育院中不幸死亡。1938 年，馮永瑩畢業後從蘇聯回到新疆，以小學教師的身分繼續為黨從事地下工作。1939 年與新疆日報社副社長汪小川（原滿洲省委宣傳部長、建國後曾任國家文物局黨組副書記、副局長）結婚。1941 年初因汪小川被組織上調去延安，馮也來到延安被服廠任會計。幾年後，二人婚姻破裂。1945 年，馮永瑩又離開延安去哈爾濱其二哥馮仲雲身邊，到熱河公安局工作。1948 年，調任東北烈士子弟學校校長。1952 年，調任東北烈士紀念館當館長。直到幾年後又重新與楊光華結縭。1962 年，隨丈夫一起回到武漢，調任湖北省政協秘書處副處長。1983 年離休。

70 年後的 2005 年，已是 92 歲老人的馮詠瑩在接受媒體採訪時，還清楚記得那時的一些往事。她對記者說：“楊光華絕對是正人君子，孤男寡女睡在一張床上幾個月，他從來都沒有碰過我一下，我也不碰他。後來，我們之間有了感情，黨組織就批准我們結了婚。”

在莫斯科蒙受不白之冤

回頭說楊光華，滿懷希望地來到莫斯科，可等待他的是冷遇。一個月後，楊光華終於被共產國際召見了，楊光華被帶到留克斯共產國際招待所的一間小會議室，見到王明與康生。王明說，我們今



陳雲參加了馮詠瑩的二哥馮仲雲骨灰安放儀式，慰問馮詠瑩和馮仲雲夫人薛文。

天讓你來要搞清幾個問題：一、你在上海被捕後是怎麼被釋放的？二、你在江蘇省委的反黨問題；三、在上海中央局老龔被隔離後，你為什麼還與他聯繫？四、身為滿洲省委書記，為什麼不執行代表團的電令，擅自決定把文件送往莫斯科，致使文件中途丟失？康生也神色俱厲地說：“中共代表團命令你們銷毀全部文件，沒有讓你們送文件到莫斯科來。你們擅自決定送文件，應負違反電令的主要責任。”楊光華對這裏的緊張氣氛感到震驚。他克制自己的情緒，認真聽完王明提出的四個問題，並鎮定地對四個問題一一作答。這樣，第一次會議也是第一次對他的審查便結束了。

1935年7月25日，共產國際在莫斯科召開了第七次代表大會。早在湘鄂西根據地時作為臨時省委書記的楊光華就被選定為出席這次代表大會的三人團團長。現在楊光華就在莫斯科，卻沒有讓他參加會議，只是會後把大會一些文件送給他看。楊光華在閱讀文件之後，給中央代表團寫了一份書面意見。大意是：儘管我

在工作中出現過這樣那樣的錯誤，但總不應當作敵人和奸細看待，對於一個受審查的人來說，我不應急於回國去工作，但在蘇聯這樣長期待下去也不是辦法，組織上應考慮給我安排一些適當工作。不久，楊光華接到通知，說王明要召開滿洲工作會議，讓他準備作關於滿洲工作的報告。為了避免錯誤和遺漏，楊光華在一個新的筆記本上寫下了報告的要點和提綱，做了充分準備。

然而，就在會議第二天，該招待所職工支部就傳出一條重要消息，說楊光華故意丟失一個秘密的本子，被招待所清掃工拾到送交共產國際監察委員會。接著，楊光華便被拘留審查，楊光華試圖解釋，卻受到不許誣衊王明同志的嚴重警告。這次被審查除了上述王明提出的四個問題外，又加上個“本子泄密事件”，性質更進一步升級。之後，楊光華又重新落入無人過問、但一直暗中被監視的境地。

據國內已故作家、《康生傳》的作者林青山遺稿記述，1937年1月14日，康生曾與王明反覆商議後，由他親自執筆，以王明、康生的名義向共產國際寫過一份書面材料，提出一個35個要立即解決的中國人名單，這些人均為托洛斯基（托洛茨基）分子、被東方大學開除黨籍和團籍的人員以及政治上不可靠的人員、還有腐化墮落的刑事犯罪分子。文中建議蘇方把這些人員隔離起來，“否則就應當將他們從蘇聯驅除出境”。名單呈送共產國際之後，等待名單上的35人命運幾乎全是酷刑、流放與死亡，無一幸免，後來十有八九都死在異國他鄉了。60年後，一位當時受害者的女兒、原在中央黨校工作後來移居美國的林英，為瞭解開這些35人之謎，她曾專程來到莫斯科，從當年克格勃的檔案裏查找到這份絕密文件的原件，才真相大白，原來那35個上了“黑名單”而遭受迫害的後人，一直被認為是蘇聯內務部幹的事情，現在才知道克格勃也不過是執行共產國際中國支部的指示而已。真正的罪魁禍首，原來就是康生，而原滿洲省委書記楊光華名字，正在這35個黑名單之中，也是遭到整肅的最高級別的中共幹部。

流放北冰洋 20 載

1936 年 10 月，楊光華在吳玉章主辦的於法國巴黎出版的中文報紙《救國時報》上看到一篇專論：《革命運動的發展和防止奸細的破壞》。文章說，上海在 1934 年以後已經沒有共產黨的組織，而公然出現一些人打著共產黨的旗號，在那裡招搖撞騙，文中並提到子才（即楊光華）是個階級異己分子，混進了黨內並爬到高級領導崗位。楊光華看過後，立即給中央代表團寫信進行質問，為什麼要否定上海黨的存在？為什麼要說自己是階級異己分子？這是一件讓親者痛、仇者快的事情。

信發出後不久，楊光華就被兩名蘇聯內務部的人員押解到莫斯科中央監獄，經過兩次特別審判，他以“間諜罪”被判處 5 年徒刑，並馬上發配到烏黑達列沃爾古達的鐵路建築工地，幹重體力勞動，幹了不到一個月，楊光華就暈倒在工地上。不久，楊光華又被轉送到森林伐木場。一天，楊光華被一棵被鋸倒的大樹砸傷，造成腳部粉碎性骨折。經過治療痊愈後，楊光華又被調到深山溝裏燒木炭。這裏每天勞作十四五個小時，導致楊光華眼睛紅腫潰爛，視力急劇下降。幸虧一位老布爾什維克把楊光華調到澡堂子幹活，楊光華的視力才得以恢復，身體才逐漸好轉。

刑期結束後，楊光華不僅未得獲釋，反又被調到更艱苦的深山裏繼續監督勞動，去焊接天然氣管道。由於楊光華身體弱，在不適宜人居住的北極圈很快處於奄奄一息的狀態。一位善良的立陶宛人把不省人事的楊光華用馬車送往醫院。在醫院裏，一位被同樣被流放的醫學博士精心為楊光華治療，並告訴他不能再參加重體力勞動。後來，楊光華就改在澡堂勞動。1946 年，楊光華被解除勞教，在澡堂當一名洗衣工人。一位在衛國戰爭中犧牲了丈夫的洗衣女工，與楊光華建立了感情，經過好心人的牽線，楊光華與這位女工結婚，過上了比較穩定的生活。

1949 年 10 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楊光華日夜思念著祖國，他想，在蘇聯雖然有了俄羅斯妻子和可愛的兒子，但這裏畢竟

不是自己的祖國，既然活下來了就要回到祖國去，只有回到祖國才能洗清自己的不白之冤，才能為建設社會主義新中國奉獻一份力量。他曾連續給中國駐蘇聯大使館發出回國申請書和申明書，均無下落。後來，在中方的過問下，楊光華的願望終於實現了。1956年初，楊光華收到了批准他回國的通知。欣喜若狂的楊光華設宴招待曾給予他幫助，救過他生命的立陶宛大哥、醫學博士和澡堂子的工人朋友，揮淚與他們告別。

沒有頭銜的將軍待遇

1956年6月初，九死一生的楊光華回到祖國首都北京，一位中央組織部副部長代表周恩來總理和賀龍副總理接待了他。這位在北冰洋流放都沒有落過淚的硬漢子，像孩子回到母親的懷抱一樣痛哭失聲。不久，經中央組織部審查，對楊光華的問題作出結論：“楊光華同志於1937年在蘇聯受流放處分係誤會，在全部流放期間與黨失掉聯繫，由組織負責。楊光華同志恢復組織關係。其黨齡從1927年5月轉為正式黨員算起。”楊光華對這個結論並不滿意，但為從大局出發，他沒有糾纏過去的恩怨，想儘快投入祖國建設的行列。

據也是從蘇聯肅反集中營逃出來、與楊光華熟知的蘇飛回憶錄記述，1956年，楊光華在被流放13年、又被蘇聯控制8年之後，終於回到祖國。上面為了照顧楊光華的身體，安排他到黑龍江省委宣傳部研究所任顧問。經他本人向上級申訴，後來中共當局答應給他一個軍級待遇條件，可以在北京居住，但條件是不授軍銜。書中回憶楊光華說，“賀老總找我談了話，答應給我一個將軍頭銜，一套四合院，一輛小臥車，一個司機，一個保姆，一部電話。”有人去過他的新居，果然氣派，獨門獨院，院裏鮮花滿園，有正房、廂房、車庫等等，從外表看，是舊式民居，內部卻重新裝修了，瓷磚鑲地，粉壁紗窗，有暖氣、廚房、衛生間、洗澡間，共計十多間房子。

楊光華當時的蘇聯夫人塔尼亞，女兒叫劉達，不是楊親生的，



賀龍

是蘇聯妻子帶過來的。回到北京後，雖然條件不錯，但塔尼亞住不慣，天天鬧著要回蘇聯，後來就回去了。之後，楊光華又在哈爾濱找到馮詠瑩，這一堆患難夫婦在歷盡坎坷曲折、勞燕分飛之後，又重新生活到了一起。

觸怒賀老總

在北京閑居無事，楊光華開始參與到紅二、六軍團的軍史創作組工作，並任顧問。編輯部與楊光華商討傳記的寫作，要把賀老總寫成完美無缺的英雄，可楊光華雖說經歷了那麼多苦難歲月，但個性還是那麼迂腐，只講起當年的真實情況，說老總是怎麼說的怎麼做的。可寫作人員聽了不滿意，說情況不應該是這樣的。楊光華急了，說：“當時是我參加的，還是你們參加的？你們既然知道經過，又何必來問我呢？你們有誰比我瞭解老總？他也是一點一點進步的嘛，當初還沒有那麼高的覺悟！”

爭議越來越大，自然也傳到了賀龍元帥的耳中，作為湘鄂西革命根據地這個山頭最大的代表，賀龍已經位極人臣，1954年6月起先後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國防委員會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1960年任軍委國防工業委員會主任。1963年9月起，開始主持軍委日常工作。組織人員撰寫湘鄂西革命鬥爭史，本來是為他歌功頌德和樹碑立傳，沒想到楊光華居然橫插一刀，添堵添亂。

一天，賀龍叫來了老戰友楊光華，寒暄之後，面帶慍色，切入主題：“老楊，你想拆我的台，在北京呆膩了吧？好吧，你去武漢吧，在那裡你好好休息去吧！”

賀老總發話了，楊光華不得不走，於是，新居沒住上幾年，楊光華就回到武漢去了。在與友人告別時，楊光華說，老總把我找去了，他看樣子很生氣，瞪著眼睛訓人。一個當年赫赫有名的兩任中共省委書記，在權勢與誣陷、苦難與迫害面前，已經完全喪失了往日的尊嚴，徹底成為一個悲劇式的人物。

這對夫婦回到武漢後，曾任湖北省政協委員，自此就大隱於市，默默無聞了。1979年2月，楊光華被增補為省政協常委。古稀之年的他一直為中共黨史和中國革命史盡自己的力量，寫下了不少回憶錄。1991年8月26日，楊光華因病在武漢逝世，享年83歲。而馮詠瑩年齡已屆百歲，至今尚在人間。（魯直人） □

要知道，革命本身並不是按照程序預設的、恒定不變的和純淨無瑕的，革命過程本身有著它多種可能性與可變性，革命總是會吞噬自己的兒子，作為革命的同路人恐怕更難幸免。

革命並不是恒定不變 和純淨無瑕的

瞿秋白九泉下仍遭受莫大凌辱

2010年，內地的《文史參考》雜誌刊發了瞿秋白的女兒瞿獨伊的回憶文章《瞿秋白九泉下仍遭受莫大凌辱》。文章揭露文革期間，瞿秋白遭受“四人幫”的迫害，一下子從無產階級革命家變為“貪生怕死的叛徒”，他的家屬以及生前好友均遭株連，不僅瞿秋白本人在八寶山革命公墓的墳墓被紅衛兵挖掘毀掉，甚至暴骨揚灰，就連他家鄉父母的墳墓，也都統統被摧毀踏平了。文章透露，那時候自己人整自己人，比當年國民黨整我們還厲害。很多在盛世才的新疆監獄裏都沒有受過刑的人，在“文革”的時候卻被整死了，其中包括她的母親楊之華，也是在“文革”中遭受迫害、含冤致死的。

是誰讓“瞿秋白九泉之下仍遭受莫大凌辱”的？文章的結論是“四人幫”為了改寫整部黨史，不顧事實，才硬把她父親打成“叛徒”、讓瞿秋白的英魂在九泉之下遭受莫大凌辱的。但歷史不容戲說，這樣的定論，依舊還是老一套概念化、公式化的政治結論，生拉硬扯，牽強附會，缺乏說服力，也直接影響了這篇文章的力度與可信



瞿秋白與楊之華婚後合影

度。其實，給瞿秋白戴上了叛徒帽子的不是別人，正是瞿秋白生前的親密戰友周恩來。文革期間，周恩來在不同場合下曾多次提到瞿秋白，每次都言之鑿鑿地說到瞿秋白是叛徒。正是因為他的多次談話與提議，八寶山革命烈士公墓裏的瞿秋白墓地被紅衛兵砸毀，屍骨無存。所以，瞿秋白被打成叛徒，周恩來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而且當此之時，“四人幫”這個所謂的“反革命”政治集團還沒有形成，除去毛澤東的夫人江青之外，王、張、姚還未進中央，何來的如瞿獨伊文章中所稱的“叛徒”帽子是“四人幫”強加給她父親的？如果說有人“強加”的話，那祇能是周恩來個人強加的；如果追訴歷史責任的話，源頭正在周恩來身上。

國內媒體都稱瞿獨伊是瞿秋白的獨女。瞿秋白去世時，她祇有14歲。其實，嚴格說來，瞿獨伊祇能算瞿秋白的繼女，母親楊之華與父親沈劍龍仳離再嫁瞿秋白的時候，她年僅5歲，到14歲從報紙上得知瞿秋白被殺害的消息，她在繼父身邊只生活了短短的4年。



小獨伊和父親瞿秋白、母親楊之華



瞿獨伊

據今年已屆 90 歲的瞿獨伊說，“這段充滿父愛和親情的時光，卻給她留下了刻骨銘心的人生記憶。”

沈定一生前死後都“神秘”

然而，瞿獨伊的爺爺，也就是生父沈劍龍的父親沈定一（字玄廬 1883—1928.8），卻是大名鼎鼎的中國共產黨的早期黨員和中國農民運動的“最先發軔者”，在沈定一的身上，生前死後都籠罩著一層神秘的色彩。1921 年 9 月，由他和劉大白、宣中華等組建的衙前農民協會，則是中國最早的農民協會，而號稱“農民運動大王”彭湃組建的廣州海陸豐總農會則是在次年的 6 月，所以，衙前的農民運動應該是共產黨領導下的第一個農民運動，先後有十多萬貧苦百姓投入到這場聲勢浩大的現代農民革命鬥爭的序幕之中。1924 年 1 月，國民黨“一大”召開，產生國民黨中樞即執行委員及候補執行委員共 41 名，其中的共產黨人佔 10 名，擁有近四分之一席次。沈定一名列榜中，其餘的為譚平山、李大釗、於樹德、林祖涵、毛澤東、於方舟、瞿秋白、韓麟符和張國燾。1928 年 8 月 28 日，沈定一被兩個不明身分的人暗殺於浙江蕭山縣衙前鎮家鄉。到了 40 年後的文革時期，沈定一的

墳墓又被當地的紅衛兵用炸藥炸得粉碎；而到了處處開發、經濟第一的 2006 年，殘存於蕭山鳳凰山上的沈定一墓地在轟隆隆的推土機下被徹底剷平毀棄。直到今天，當地的政府官員仍然把握不住是非分寸、依舊是模稜兩可地對外講：“我們真的不知道他是好人還是壞人？”

現在研究中共黨史，無論從官方角度的還是民間的立場，早就不提甚至是刻意迴避沈定一這個毀譽參半的名字了。《民國人物大辭典》中，則有一段語焉不詳、含混模糊的傳略：說沈在武昌起義後參加光復上海，二次革命失敗後又流亡日本，1916 年回國任浙江省議長，1919 年與戴季陶創辦《星期評論》，1920 年與陳獨秀等發起組建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即上海共產主義小組），成為中共早期黨員，後在家鄉衙前興辦農村教育，領導農民運動。1923 年加入國民黨任候補執委，1923 年孫中山逝世後破壞國共合作，1927 年“四·一二”後任浙江反省院院長，清黨委員會黨務委員。可見，作為一個早期參與中共建黨活動的革命者、大地主、政治家、新聞記者、教育家和國共兩黨的早期黨員、被孫中山評介為“浙江最有天賦之人”，到今天蓋棺被毀，但名分未論定。細查起來，沈定一還有著很多連個人傳記都未曾記載的個人歷史。他的父親是滿清的名進士，官至巡撫；自己則是滿清的末科秀才，在雲南廣通做過知縣、武定做過知州。辛亥革命後，身為知州的沈定一居然擅自剪去髮辮，被上司發現後棄官逃走，然後到日本留學，先是加入蔡元培的光復會，後又加入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在早期革命活動中，從主持報紙到組建黨部、領導抗租鬥爭、主持省議會、實行解決農民的自治計劃，沈定一都是在向權威挑戰。作為地主，他不惜損害自身利益，動員工農群眾起來造反，並領導了抗租運動；作為年輕的知縣，他甚至敢於公開鞭答自己當巡撫的父親；作為省議員，他敢於怒斥省督軍；作為另立山頭的西山會議派，他卻呼呼不怕犧牲，趕赴廣州爭奪權位；作為自立實踐的創辦者，他的這一切新思路和新觀念可以說都是驚世駭俗的，讓那些舊勢力們膽戰心驚、惶恐不安。

大罵共產黨為“拆白黨”

十月革命炮火傳到中國後，沈定一轉向篤信社會主義，曾受孫中山委託，到俄國去考察。1920年5月，沈定一與戴季陶、陳望道、沈雁冰（茅盾）、劉大白、俞秀松、施存統等人在上海成立共產主義小組。依照國內黨史專家丁弘的說法，這一天其實應該算作中共真正創建的日子。同年8月，又與陳獨秀、戴季陶、陳望道、李漢俊、施存統、俞秀松等七人成立中國共產黨臨時中央，並參與起草《中國共產黨黨綱》。9月，沈定一又在家鄉衙前鎮成立中國最早的農民協會，由他起草的宣言與章程，刊載於上海的《新青年》雜誌上，文章中大聲疾呼：“無產階級的人，大家起來呀！”。

《毛澤東選集》開宗明義的第一句話是“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這篇文章的發表的日期是1926年3月。而沈定一早於1921年8月19日在浙江蕭山龔山東蒼草庵的戲臺上的講演題目就提出了“誰是你的朋友”，據記載者形容，“當時聽者，擁擠不堪，大多數的農人工人，聽了他的話，感動到十二分，如見天日，這是因為他極力模仿那地方的土話，說出很明白的利害來，句句話都被農人工人聽懂了。”早在1913年浙江省議會成立時，作為議長的沈定一曾將家裏農田分送給佃戶，實行“耕者有其田”，他自己也下田耕作，並要求其他地主為農戶實行二五減租。對此，地方官吏則加以威逼利誘，誣指農民運動是“過激主義運動”，為此，沈定一於1921年11月9日在《民國日報》上發表《沈定一代農民問官吏》，特向地方官吏提出三條質問，並限省長八日內予以答復。可以說，當年的沈定一，說話一言九鼎，在浙江地段，是橫跨黨政兩界的顯赫人物，浙人稱其為名副其實的“定一”。

1923年6月，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而作為浙江代表的沈定一卻拒絕參加中共三大。同年9月，沈定一受孫中山先生委託，陪同蔣介石到莫斯科考察，曾與共產主義領袖列寧、托洛斯基會晤面談。1924年，國民黨在廣州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他當選為候補中委。1925年1月，沈定一出席有20名代表

參加的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同年5月，他赴廣州參加國民黨一屆三中全會，附和戴季陶提出的所謂純粹的三民主義，公開背叛中國共產黨的宗旨，被中共中央開除黨籍。還有一說，是他本人反對陳獨秀的家長作風而退黨。為此，他曾大罵共產黨為“拆白黨”，是年底，沈定一參加國民黨右派組織“西山會議派”，從極左轉向極右，併當上國民黨浙江省清黨委員會主任委員。據有關資料，沈定一擔任國民黨浙江省“清黨”委員會主任委員期間，全省1800多位革命者被捕，932位中共黨員被殺害，讓原來生氣勃勃的江南大地陷入了一片腥風血雨之中，僅此來說，沈定一的手上也沾滿了共產黨人和革命志士的鮮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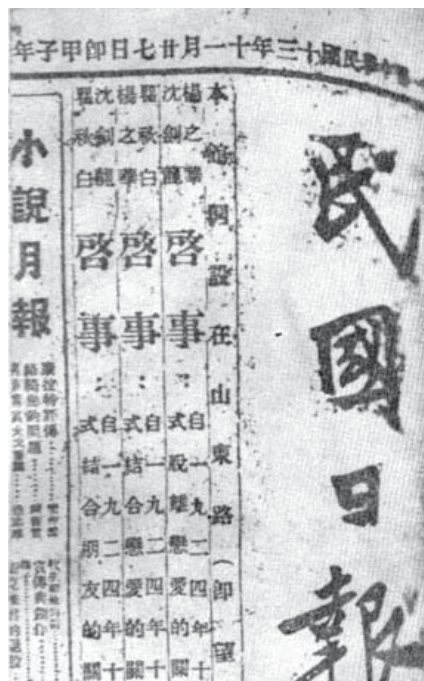
沈定一的一生，可以說充滿著光怪陸離、色彩斑斕的語言與行為，到今天都難以給一個中允的價值評判。曹聚仁評介說，“沈定一先生，雖已為社會淡忘，他卻是火一般熱烈有血性的人，直到他被暗殺為止，沒有一天不活潑潑地生活著。”據時人回憶，沈定一軀幹修偉，雙目有神，善飲酒而且學問廣博，聲音洪亮，能言善辯，演講極富說服力和煽動性，青年人多為之傾倒，江浙優秀的共產黨人如宣中華、徐梅坤等均是他一手提拔培養的。除此之外，此人還寫的一手好字，當年杭州大王巷王順興飯莊，曾懸有他一副擘窠大字的對聯：

“肚饑飯碗小，魚美酒腸寬”。沈定一與劉半農、劉大白等，同是新文化運動早期民歌詩體的代表人物，強調新詩應向民歌民謠學習。他死後的1930年，上海民智書局出版《玄廬文存》（詩集、論集），內中的詩歌揉入地方語言色彩，富於鄉土氣息，極具有童謠味。衙前農民協會被解散後，心情沈痛的沈定一曾賦詩一首：

杭州城裏一隻狗，跑到鄉間作獅吼；
鄉人眼小肚中饑，官倉老鼠大如鬥。
減租也，民開口；
軍隊也，民束手；
委員也，民逃走；
鐵索鐐銬攔在前，布告封條出其後，
豈是州官惡作劇，大戶人家不肯歇，



沈定一



沈劍龍的“啟事”

不肯歇，一畝田收一石租，
減租惡風開不得，人會人家斷煙炊。

沈定一的新詩主張，直接影響到 40 年代的民歌詩體派詩人如李季、袁水拍等人。文存中十一首組詩《十五娘》，被朱自清認為是“新文學中第一首敘事詩”。他本人的很多新詩，都琅琅上口，流布甚廣，最有名的是作於 1920 年的《對策》：

鏡中一個我，
鏡外一個我
打破了這鏡，
我不見了我。
破鏡碎紛紛，
生出紛紛我。
我把我打破，
一切鏡無我。
我把鏡打破，

還有破的我。

破的我也破，

不知多少我。

這首詩今天讀來，還頗有新意，大有佛家見心明性、開口破禪之意，大概能算上超現實主義的早期朦朧詩吧。

瞿秋白“橫刀奪愛”

另外，中共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瞿秋白的婚姻家事，與沈定一有關聯。瞿秋白的結髮夫人為王劍虹，四川酉陽人，原名王淑璠，其父王勃山，辛亥革命時期的老同盟會員，曾任孫中山廣州國民政府秘書；1924年7月，年僅20歲的中文系才女王劍虹，只與在上海大學任教的瞿秋白度過了半年多的甜蜜生活，就因患肺病在她的恩愛夫君“阿雙”（瞿秋白因頭頂有“雙旋”被父母取的乳名）的懷抱中長眠了，在瞿秋白珍藏的王劍虹的照片後面，有他題寫的一首詩，開頭的一句寫著“你的魂兒我的心！”同年11月，瞿秋白與來自蕭山的社會系學生楊之華結婚。楊之華原是沈定一的大兒子沈劍龍的妻子。這對夫妻當年一起在上海大學上學，恰逢正擔任上海大學社會系主任瞿秋白，其學識、口才、風度，引起楊之華的傾慕，二人接觸後互生情愫，而沈劍龍也是五四後的新派人物，於是便在1924年11月同一天的《民國日報》上刊出三則啟事：一是沈劍龍與楊之華聲明分離；二是瞿秋白與楊之華正式結婚；三是作為後夫與前夫的瞿、沈二人共同具名，結為好友，說“我們仍是親愛同志”。這樁好合好散的現代婚姻，當時曾是輿論嘩然、驚世駭俗一則新聞，在今天看來，亦可稱為佳話美談。據說，這公開刊載於報端的三則啟事，即是出自於他們的長輩沈定一之手。

原先被稱為十次機會主義路線鬥爭之一的“頭子”羅章龍，在回憶錄中這樣評介沈定一：“沈玄廬本身為官僚兼大地主，卻刻意深入勞動者中生活，其率先對佃戶李虎成實行退佃退租，並參加衙前農民鬥爭，因此引起大家刮目相看。我在滬杭甬鐵路開會時，沈聞訊騎

著自行車，頭戴雨帽，皂衣布鞋，暗夜中趕到郊外數十里道棚參加開會。沈在會上傾聽大家討論，併發言道‘我們很早就聽說過書記部和共產黨人來人到工人區去，便像春雨後竹林一樣，一夜工夫，毛竹就冒出苗頭來了。’隨後，沈把革命道理用當地土語譬解，深入淺出，聽者無不動容。在會完畢，沈手推腳踏車，步行隨大家走回城站，邊走邊談，好像完全忘了疲倦似的。”

1978年7月，著名作家茅盾在接受採訪時這樣談到沈定一：“這個人很特別。楊之華原先就是他的兒媳。他是蕭山縣的大地主，但思想開明，曾主動搞減租減息，還辦起第一個農民協會，在當時全國算是最早的一個。他很早就信奉共產主義，並加入了共產黨。後來他寫了封信，指責說，共產黨搞得太濫，什麼人都可以參加，連地痞流氓、拆白黨也拉進來了。還說什麼拐走他兒媳的，竟然也是共產黨員等等。總之，他表示不幹了，當然，這裏也有誤解和猜測。他的這種錯誤態度，當時曾受到黨內同志的批評。”

作為中共早期領導人彭述之的夫人、當年與瞿秋白、楊之華過從甚密的陳碧蘭也曾回憶說，1924年初，沈定一曾帶著他的兒媳婦楊之華來上海並訪問上海大學社會學系主任兼教授的瞿秋白，並要求瞿幫助楊之華進上海大學社會學系讀書，而平時不喜待人的瞿秋白卻對沈十分熱情。賓客宴請之後，楊之華還得以免考進校上課，並在學校入團入黨，這對楊之華來說，無疑是一種進步，即從大地主和官僚家庭的少奶奶生活裏解放出來。但沈定一卻因此向後退了，由於楊之華與瞿秋白結合，沈定一大起反感，甚至罵瞿秋白為流氓，因此他憤而脫離了共產黨。

兒媳被搶，毅然退黨

著名的“托派”領導人鄭超麟在描述中共早期領導人婚戀的《戀愛與革命》中，這樣回憶道：“那時，楊之華漂亮，溫柔，聰明，能幹，但已是沈玄廬的媳婦。在法國與我同屬於‘圖書館’的無名（吳明）於里昂大學運動中被驅逐回國，在上海主持青年團中央的工作。一

次，青年團召集什麼會議，上海不方便，沈玄廬叫他們去蕭山開。無名被楊之華的美色所迷，幾乎發瘋了，寫了許多絕望的情書。可是楊之華不理他。沈玄廬大發脾氣，說‘共產黨內有拆白黨’。沈玄廬第一次退出共產黨，與這件事不無關係。可是，他的兒子和媳婦並不相愛，沈劍龍愛了一個高麗姑娘，冷淡了楊之華，之華遂給她的女兒取名‘獨伊’，以表示她的悲哀，而且自己離家去上海大學讀書。秋白此時新喪偶，他的愛人姓王，是丁玲（當時名蔣冰之）的朋友，害肺病死了的。他和之華怎樣戀愛起來的，我們都不知道。有一天，約在黃仁案發生，秋白和何世楨同時離開上海大學以後不久，我們晨起讀報，忽然看見《民國日報》上有三個奇特的廣告：一是‘某年某月某日起，沈劍龍和楊之華脫離戀愛關係’。一是‘某年某月某日起，瞿秋白和楊之華結合戀愛關係’。一是‘某年某月某日起，沈劍龍和瞿秋白結合朋友關係’。那時，上海小報中最有名的《晶報》，由主筆張丹斧（丹翁）執筆評論此事，但把當事人的姓名都改換了。沈劍龍改為審刀虎，瞿秋白改為瞿春紅，楊之華改為柳是葉，沈玄廬改為審黑店，上海大學改為一江大學，商務印書館改為工業印書館。我們以後好久都叫秋白做春紅。有一天，我到秋白和之華的新家去，說話間來了一個人。他們介紹說：‘這位是劍龍’。秋白同他親密得如同老朋友。之華招待他，好像出嫁的妹妹招待嫡親的哥哥。後來，之華有一次對我說，劍龍為人高貴，優雅，她自慚庸俗，配不上他。沈玄廬則沒有兒子那種度量。玄廬背後罵秋白，‘這個人面孔狹窄，可知中心奸狡。’不久之後，玄廬再度退出共產黨了，不能說同這件事沒關係。但即使沒有這件事情，玄廬還是要退出共產黨的。”

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

“清黨”過後，沈定一因國民黨內部派別互相傾軋，辭職退出浙江省黨部，又回到他所熟悉的家鄉，在當地組織農會，結納農民，推行減租，試辦農村地方自治。其被刺身死時，得年44歲。這個被農民兄弟親切稱為“三先生”的沈定一，角色可謂複雜多變，撲朔

迷離，甚至連他的被暗殺都成了難解之謎。根據研究者分析，沈定一的被暗殺極有可能是國民黨人所為，因為沈定一的最後一次遠行是去莫幹山與國民黨的要人戴季陶、朱家驊、李濟深等人見面，會談的過程不很愉快，結果在下山返回蕭山的途中遇害，在那樣的兵荒馬亂的亂世，對凶手的追究最終也祇能是不了了之。而據沈定一的學生徐梅坤《九旬憶舊》記載，沈定一之死，是因為這年春蔣介石東山再起，重掌國民黨大權。沈玄廬則在戴季陶、張靜江等人的支持下，在衙前成立自治籌委會，集結舊友親信，分任要職，以圖推翻蔣介石統治，這引起了蔣介石的警覺和不安，所以“通過何應欽派刺客在衙前刺殺了沈玄廬。”沈定一的死在今天看來，不但是一個謎，也是一個歷史的悖論，表現在革命初始階段時的思想紛亂性與動搖性。要知道，革命本身並不是按照程序預設的、恒定不變的和純淨無瑕的，革命過程本身有著它多種可能性與可變性，革命總是會吞噬自己的兒子，作為革命的同路人恐怕更難幸免。當億萬農民從幾千年的傳統沈睡中驚醒，當社會上各種思潮一齊向人們湧來，當長夜漫漫，路在何方，左右廝殺，嘈雜浸亂，“城頭變幻大王旗”的時候，亦曾彷徨迷茫過的魯迅先生曾寫下過如此的一段《小雜感》：

“革命，反革命，不革命。

革命的被殺於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殺於革命的。不革命的或當作革命的而被殺於反革命的，或當作反革命的而被殺於革命的，或並不當作什麼而被殺於革命的或反革命的。

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

在中共大張旗鼓地紀念建黨 90 週年的時候，沈定一這個名字，早已不存在中國人的記憶中了。被毛澤東稱為“五四運動的總司令”、共產黨的創建人陳獨秀身上還蒙受著不少的誤解或遺忘，更難以指望能給沈定一一個公允的定論與說法了。瞿獨伊文章中說：“我雖然不是秋白的親生女兒，但是他對我比親生的還親。”是的，儘管瞿獨伊身上流淌著的是沈定一的血脈，但她對沈家的決絕，一如她的生身祖父沈定一當年對自己的官紳家庭和對共產主義的決絕一樣，都是那樣的義無反顧，從不動搖。（周山） □

丁中江向江澤民提出，規劃組織“張學良、蔣緯國兩位將軍攜手返鄉掃墓探親”，同遊西安，舉辦一場“回憶西安事變座談會”，由張、蔣主持，邀請海內外學者出席，對這段歷史，達成一個讓國共兩黨、全國人民都能接受的共識

江澤民突發問： 西安事變如何總結？

丁中江其人

丁懋德，字中江（1917——2004年），雲南賓川人。其父丁石僧先生追隨孫中山先生，為同盟會早期會員。丁本人雲南大學畢業，曾在法國巴黎大學進修文學。曾任雲南省代理秘書長，廣州《天地新聞日報》社社長、昆明《雲南平民日報》社社長、曼谷《民主日報》董事長、香港《中南日報》董事長，參與創辦香港《新聞天地》週刊。1961年10月，丁因涉嫌“從事反共活動”以及和“滇緬邊區游擊隊”有關係，被香港當局拘捕，並於1962年2月22日以“不受欢迎的反共知名人士”的名義驅除出境，遣送至台灣。

返台後，丁中江擔任中興大學外文系教授、系主任等職務，主講英國文學，也在文化大學任教過。之後在台視、中視、華視擔任政治評論員，影響頗著，成為家喻戶曉的政論家和近代史學家。丁中江晚年致力於海峽兩岸民間文化交流，矢志搭建兩岸同胞互愛、互敬互助之橋樑。1988年冬雲南耿馬大地震，丁先生率救災小組，

攜藥品、衣物、捐款赴雲南災區慰問，在海峽兩岸贏得“愛國老人”的稱譽。

丁中江生前曾出版回憶雜著《逝者如斯夫》，講述 80 餘年的流水歲月與所見所聞，披露了不少國民黨政權退居台灣後的政壇秘辛，內中有幾段與兩岸相關的史實，堪值一讀。

“滇邊反共救國軍”來歷

1949 年 12 月 9 日，國民黨雲南省政府主席盧漢在昆明率部起義，雲南和平解放。此時，擔任雲南《平民日報》社長、甘心追隨蔣家王朝的丁中江沿著滇緬公路倉皇出逃，在保山遭遇車禍，全車 24 人僅他一人幸免於難，就這樣九死一生地辭鄉去國，逃到了緬甸，後抵達香港。當時，除去台灣省外，全國都已經解放，但與一些頑固的國民黨高級要員一樣，丁中江也在做著“反共救國”的復辟美夢，一路逃亡路上，他看到了與雲南邊境毗鄰和交界的緬甸、老撾、泰國的金三角一帶，是一個易守難攻的打游擊地方，就開始奔走呼籲，有意在這一帶建立一個反共基地。當然，不少人對丁中江的建議嗤之以鼻，大潑冷水說，毛澤東就是游擊戰的高手，你一介書生，手無寸鐵，卻異想天開，想與毛澤東打游擊戰，豈不是不自量力，癡人說夢？

就在丁中江抵達香港幾天後，他的計劃有了志同道合者的回應，此人就是淮海戰役戰敗後隻身化妝逃脫、在雲南和平解放後又被國民黨任命為雲南省主席的國民黨將領李彌。傳主印象中的李彌此時依舊豪氣如雲，整天都在做著“反共救國”的美夢，還有著毀家紓難的氣度，把自己的十萬美元全部拿出來作為開創基金，李彌本人則潛回滇緬邊境，並以國民黨雲南省政府主席的身分，兼任雲南反共救國軍總指揮。

1950 年 3 月 8 日，“雲南反共救國軍總指揮部”正式成立。此後，又搜羅外逃的國民黨軍政人員、策動當地土司暴動，讓這支國民黨殘部成為讓全世界矚目的武裝力量。1951 年 5 月，李彌受



丁中江

台灣國防部的命令，在國美中央情報局的支持下，親自到緬北設立總指揮部，先後投入兵力 8 千餘人，先後兩次發動對雲南邊境的大規模軍事竄擾，但在人民解放軍的軍事打擊下均遭到重創。兩次竄擾雲南邊境失敗後，李彌把部隊集中在雲南境外的幾個基地上，分兵四處搶佔地盤，迅速佔領緬北薩爾溫江以北，雲南境外以南撣邦科康、佤邦、景棟三個省的大片地區，控制了該地的鴉片和貿易，收納賦稅，收繳公糧，使當地民族土司、頭人紛紛依附殘軍。到 1953 年 1 月，這支武裝已發展到 1.85 萬人，編為 1 個總部、1 個指揮部、3 個軍區、4 個師、16 個縱隊，活動地區北至緬甸昔董、南至耶縣，西至孟蘇、孟畔土司管轄區，東至老撾孟信，南北長達 530 公里，東西寬有 280 公里。

如丁中江所講，滇邊游擊隊一出現就面臨著國際上的巨大壓力。1953 年 1 月，緬甸政府向國民黨“反共救國軍”進行軍事行動的同時，在中共支持下，向聯合國控訴台灣國民黨軍隊侵略緬甸領土，危害緬甸主權與安全，同時向聯合國提供了大量國民黨軍隊侵

犯緬甸主權的照片、文件、實物。一支外國軍隊侵入了聯合國會員國的領土，這個外國還是對聯合國最有貢獻的五個創始會員國之一，這讓冠以“中華民國”稱號的台灣當局十分尷尬，因為儘管這支武裝力量是李彌自費籌資組建，但他本人畢竟還是國民政府明令頒布的雲南省政府主席和滇黔綏靖公署主任。4月23日，聯合國通過決議，要求國民黨殘軍撤回台灣或居住在指定的禁區內。壓力之下，美國政府也不得不被迫利用它的影響，於5月23日在曼谷召開美、泰、緬、台灣“四國軍事委員會”會議，經1個月的談判後，決定在緬甸的國民黨殘軍全部撤往台灣。書中記載，自1953年11月到1954年5月，半年裡，李彌從緬甸分三次撤軍，先後52批共計7800人來到台灣。餘下的殘部，有的歸順泰國軍方，有的解甲歸田，大部分則成為著名的鴉片種植地金三角的異鄉人。在商定撤軍期間，李彌看到自己幾年的反共心血毀於一旦，急火攻心，竟患腦溢血入院住療。1961年，李彌從香港到台灣定居，先後充任台灣國民黨國民大會代表、中央評議委員和“光復大陸設計研究委



丁中江回憶雜著：《逝者如斯夫》

員會”委員等職。1973年在台灣去世。

事後，丁中江則羈留香港12年，其間除籌劃幾張報紙如參與創辦香港《新聞天地》週刊外，自稱一事無成。

附帶說一句，為了回報緬甸幫助中共除去“滇緬邊界反共救國軍”這個心頭大患，繼續發展中緬友好，中共於1960年與緬甸簽訂邊境條約時，周恩來大筆一揮，十分慷慨地將原是中緬邊境中方的江心坡幾個縣約7萬平方公里土地，劃給緬甸政府，到今天成為中國人民心頭永遠的傷痛。還有，中緬邊境的江心坡地區，約13萬平方公里的面積被緬甸所佔。那是在1956年中緬邊界條約中劃給了緬甸，象徵性地收回了片馬三城，卻又把本來只是租出去的南坎也劃給了緬甸。這就等於把屬於雲南的18萬平方公里土地都讓給了緬甸，而緬甸全部國土面積才是67萬平方公里，中國是何等“大方”，一下子就送給對方四分之一的國土！

回憶于右任二三事

由於其父丁石僧追隨孫中山先生革命，丁中江與于右任多有接觸。于老說，民國元年，他任交通部次長，丁石僧在教育部任社會教育司長，宋教仁任法制局局長主持同盟會工作，我們三人最親近。宋教仁被刺後，是于右任將其送到醫院並最後聽見宋教仁臨死前所講述三個遺囑。宋教仁的墓座，刻有于右任的墓誌銘，原稿交由丁石僧保管，並問丁中江看到過沒有？說著，于老大聲背誦著銘文，並叫丁中江筆錄：“先生之死，天下惜之。先生之行，天下知之。吾又何記？為直筆乎？直筆人戮！為曲筆乎？曲筆天誅。於乎！九泉之淚，天下之血。老友之筆，賊人之鐵！勒之空山，期之良史。銘諸心肝，質諸天地。嗚呼！”

銘文慘烈沈痛，念到末句，于右任聲帶嗚咽地說：“我一直想為遜初（宋教仁字）寫一本傳，這個願望終未實現，如今已過了五十年，你父親也過世多年，我現在身體又這麼衰老，看來這個願望是不能實現了。”直到今天，到底是誰殺了宋教仁，眾多史書，眾說紛

紘，至少到現在為止，不得不遺憾地說，宋教仁被刺殺一案仍舊是一個謎，于右任先生在銘文中“勒之空山、期之良史”的願望，至今都沒有實現。

于右任自 1931 年出任國民政府監察院長，一直到去世，任內 34 年。丁中江說，好多人對做了 30 多年監察院長的于右任由燦爛歸於平淡，平時祇是吟詩寫字的現象感到奇怪。其實，這都是表象，因為許多大事無法對人說。如在抗戰期間，他老人家每天都記日記，這些日記積有一尺多厚，在日本投降的第二天，于老看也不看，卻叫人把日記全部燒掉。當時他也在場，覺得這些史料和墨寶被燒掉十分可惜，便央求留下，但于右任卻說“快點燒，快點燒，這些都是是非，我不能因為個人的好惡，在歷史上留下是非。”再從重慶回南京的飛機上，于右任追憶數十年的宦海往事，百感交集，不禁吟誦：“一拳打碎黃鶴樓，二水中分白鷺洲，八年苦戰今難受。望園陵，人白首，舊江山渾是新愁。念不盡神明大咒，說不清乾坤自由，聽不完楚漢春秋。”

于右任喜讀書，在他於 1964 年 11 月辭世後，家人從他的遺物中找到晚年的片段日記，與讀書相關的記述很多。如他常常因為忙、因為病不能讀書而自嘆自責；甚至有時因為一天只看了一種書，或者看的不多、不夠仔細而認為“實不應該”，比如在日記中寫著“今日未看書，歉甚！”“今天看陽明論學書真是博大。數日內未看他書，實在不應該。”“數日因事多未看經書，心中不安。”他甚至還在日記中記下讀書的警言：“在北投看通鑒，甚模糊。少年不看書，老年欲看而不能，實可哀也！不看書者，真為愚人，並為文明時代之愚人，可恥！”這些話，今天看了，也猶如晨鐘暮鼓，發人深省。

陸鏗入獄于右任痛哭

1949 年春，名記者陸鏗（字大聲，1919—2008）與報人丁中江、沈宗琳（後任中央社總編輯）、漆敬堯等人在廣州創辦《天地新聞日報》。由於這張報紙的言論非常犀利，反惡化反腐化，還準確

預測出解放軍渡江地點，被國府當局以“通匪”之嫌，將社長陸鏗和總編輯董品禎扣押入監獄，報紙也被查封。當時，于右任是這家報社的名譽董事長，1948年，于右任競選國民政府副總統時，陸鏗還當過他的競選發言人。此時，他老人家已隨南京政府遷來廣州，聽到這消息，大為震怒，一邊用手擊桌，一邊並連聲說：“胡鬧，真是胡鬧！”後來還是他與閻錫山同時出面，兩個月後，陸鏗與董品禎才得以保釋，陸鏗還當上了閻錫山內閣的新聞發言人。出獄之日，于右任要親自去監牢接他，眾人勸阻也不行，後來幸而于老的坐車壞了，才告作罷。當晚于右任邀請這家報社上一家小館，乘坐報社董事長丁中江的一輛破車，遇到下雨，車內也漏雨，陸鏗就與于老的隨從松子才一塊下來推車，車內的雨點一滴滴地滴在老人家的頭上和鬍子上。到了小館，于老興致勃勃，為陸鏗一行講述他當年在上海辦《民籲報》而坐牢的經過。

這兩個月的監獄生活使得陸鏗有了“坐過國民黨的牢”的資歷。半年後的1949年12月，正值盧漢在昆明宣布起義之際（12月9日），陸鏗卻飛抵昆明，理由是來接自己的漂亮老婆楊惜珍。在這種情況下，以陸鏗與閻錫山內閣的密切關係，當然使新政權疑竇重重，就以“代表閻錫山接管雲南”的名義，將陸鏗逮捕。此後，陸鏗在共產黨牢房中共計渡過了22年的光陰，直到1975年中共全部釋放國民黨縣團級以上的在押人員，陸鏗才再獲自由。1985年5月，陸鏗來到大陸，以香港《百姓》雜誌記者身分訪問中共總書記胡耀邦，並隨後發表《胡耀邦採訪記》，終於引發中共政壇的強烈地震，導致胡耀邦下台。

1951年春，丁中江到台北青田街于的寓所探視于右任，此時陸鏗已經在雲南深陷中共監牢。老人一見丁中江，未及握手，就以袖掩面，放聲大哭，口中喃喃說：“大聲，大聲，我想念他啊！”因為多年來，都是陸鏗與丁中江一起去謁見于老，此時卻剩下丁一人來看老人了。兩人相見，不覺相對而泣。于老在書桌上翻了半天，找出一份1949年陸鏗被查封那一天的《天地新聞日報》，攤開了在報紙的邊角寫道：“廿四斤行李中留此寶物，以贈中江，念大聲不已。”



于右任與蔣介石。

當寫到最末一句，禁不住又擲筆大哭起來！

陸鏗是一位當之無愧的報人。1979年，當美國的牛仔影星韋恩去世時，美國《華盛頓郵報》的大幅標題是“永別了，牛仔！”嘆息不會再有第二個像韋恩這樣飾演的角色了。隨著陸鏗辭世，“報人”一詞，在中國也幾成絕響了。

安排張學良蔣緯國返鄉

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之後，丁中江以“兩岸一挑夫”自況，致力於海峽兩岸民間文化交流。1991年12月5日上午，丁中江在北京治病期間，得以會晤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這次會晤，頗為神秘，中共官方根本不予報道，連國內出版的江澤民的各種傳記，都不予披露。看照片，江澤民二郎腿高翹，一手撫弄領帶，雙目仰視，根本不看對方，一副志滿意得、睥睨一切的樣子。

交談中，江澤民問道：“丁教授，在你的構想中，西安事變如何總結？”丁中江回答：“我的意見並不成熟，我認為西安事變促成了國共合作，達到了聯合抗日。雖然後來國共合作完全失敗，但是抗日是實現了。所以在歷史上是最重要的一頁，全體國人都應該肯定它的巨大貢獻。”其間，丁中江提出個人的一個想法，準備規劃組織“張學良、蔣緯國兩位將軍攜手返鄉掃墓探親”，內中還附帶了一項重要的行程，結束返鄉之行後，同遊西安，在西安舉辦一場“回憶西安事變座談會”，由張、蔣二位將軍主持，邀請海內外學者出席。座談會的目的，是對這段歷史，達成一個讓國共兩黨、全國人民都能接受的共識。

丁中江以為，此時提出這一構想未免有些唐突，但既然有機會能見到中國最高領導人，應該把握機會把這個大膽的建議提出來。然而出乎他的意料之外，江的反應非常積極友好，覺得問題是張、蔣二老如果接受這個建議，台灣會放行嗎？丁中江分析，張學良在台灣已經完全自由，如果提出到大陸來，台灣當局應該會同意的；只是蔣緯國還擔任著“國家安全會議”秘書長職務，現職高級官員到大陸來是被禁止的，但他卸下這個職務後，行動也就自由了。況且，蔣緯國是在蘇州長大的，曾多次表露過想回奉化溪口以及蘇州探親的心願。丁中江還建議，先請張、蔣二人遊日本，然後避開記者，逕赴羽田機場登上專機，飛赴瀋陽，再赴寧波轉溪口，如此二老掃墓探親就可以輕鬆自在。至於在西安舉行座談會的活動，則可以向媒體公開。江表示，這是一件好事，相信有很大難度，希望丁教授能努力完成，並且承諾派專機去接來人。

丁中江自北京返台後，即開始著手推動這項探親計劃，並把這22天旅程也規劃停當，稱之為“老人結伴還鄉專案”。他還計劃促請陳立夫能參加結伴還鄉，那就更是一件完美允當的盛事了。因為距離西安事變已近60年，幾個碩果僅存的當事人都已垂垂老矣。當丁中江把這個構想向蔣緯國本人提出後，他熱烈贊成，而且還要自報奮勇地去說服張學良同行。由於張將軍晚年聽力下降，向他表達全盤計劃很不容易，丁中江就用大字寫了一份說帖，方便他

閱讀。據蔣緯國描述，張學良反復看了這個說帖，用右手在他肩上拍了一下，大聲說：“好啊，老弟，咱們結伴回鄉掃墓，這是我 60 多年最大心願！”然後，又很嚴肅地說：“對這個計劃我要提三個條件。第一，咱們都是自費，自己花錢，不要任何一方出錢。第二，避免與官方接觸，掃墓就是掃墓。第三，我的太太一定要同行伴我。”當時，張將軍的夫人趙一荻女士患有嚴重骨質疏鬆症，需要治療。丁中江則認為，這個計劃並不急迫，需從長計議，還要等蔣緯國退休卸任之後再說，所以時間並不緊促，其間張將軍夫人也正好養病。

沒想到人事難料，蔣緯國後來突患心血管剝離症，兩度開刀，然後又是尿毒症透析，百病纏身，竟至一病不起。而趙一荻的骨質疏鬆症也日趨嚴重，最後與張學良二人都要依靠輪椅在夏威夷生活。就這樣，丁中江潛心謀劃的“兩將軍返鄉掃墓探親計劃”，未得如願成行，也就夢碎他鄉了。

《北洋軍閥史話》起波瀾



晚年陸鏗。（高伐林攝）

丁中江積 20 年心血結晶，撰成《北洋軍閥史話》一書，1962 年起在台北《大華晚報》逐日連載，膾炙人口。1964 年初版問世，自此前後共出版七次，一時洛陽紙貴，有人稱在世界各國大圖書館中，凡有中文藏書，必有《北洋軍閥史話》。在大陸，中國友誼出版公司也於 1996 年出版了簡體中文版。

前些年，有人提出質疑，說此書與國內陶菊隱的那本《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內容相比，相同之處居然高達 80% 之上，是不是丁剽竊了陶的原著？但也有人認為這種說法大謬不然，認為丁著只是採取了陶著的敘事方法，卻在陶著基礎上，增加了許多北洋軍閥如西南桂系、滇系、四川軍閥，國民黨人與當時政客、名流，社會賢達在歷史重大事件上的函電、通信、密詔、檔案、文件等，使得本書內容更全面，資料更翔實，觀點更豐富，議論更精彩。這對於研究北洋軍閥史和民國史的讀者來說，確實極為方便和有益。因為如果不是丁中江在內容上增添的那麼多第一手史料，一般讀者根本無法去從繁雜紛復、千頭萬緒的原始檔案裡去找尋的。比如民國初年期間所盛行的你往我來的電報戰，迄今都無法看到一個更為完整的版本。對於丁著看法，至今在國內學術界還仁者見仁、智者見智。

丁中江育有四個女兒，大女兒丁乃筠已經過世，她的靈魂伴侶就是台灣的民歌之父楊弦；二女兒丁乃竺嫁給了著名戲劇藝術工作者賴聲川；四女兒是台灣的著名演員、導演丁乃箏。（韓三洲） □

中國人的印象裡，這件事的經歷者好像就只有日本施暴者和中國受害者，但實際上西方人介入得很深，甚至最後在法庭上審判戰犯，也全靠外國人蒐集的資料，才能定案。所以南京大屠殺也是一個國際級的事件，我希望從這名美國傳教士的角度，將中國的事件變成國際的經驗

哈金：在南京大屠殺 史實中引入國際視角

《新史記》編者按：文學需要想像、虛構，史學強調實證，二者之間有一條不可逾越的界線，然而，美國多次獲獎的著名華裔作家哈金，在其最新的長篇小說《南京安魂曲》中，卻不僅描寫真實的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更追索史實之下的人性。他思考這一事件的角度也給關心歷史的人以啟發。

在今日美國文壇上佔有一席之地之哈金，當初決定以英語寫作時，曾經猶疑過，也曾經歷被多家出版社拒絕出版的一段日子。哈金在接受《新史記》記者專訪時表示，用英語寫作是為了在美國生存而做出的抉擇，如今他已很難回到中文寫作。不斷嘗試新題材、新寫法的哈金，未來將把西方讀者的注意力從中國拉回美國，讓讀者更瞭解在美國土地上發生的華人移民故事。

從西方人角度談南京大屠殺



哈金

不論是《等待》中橫跨的“文化大革命”，或是《戰廢品》裡縱貫的朝鮮戰爭（“抗美援朝”），哈金都深刻描繪出大事件底下人們的情感衝突與轉變。在哈金最新的作品中，他同樣選擇了一個中國人耳熟能詳的背景——南京大屠殺，但哈金並未側重描述屠殺場面，而是用更深沈的筆調去探索人性。

哈金的第六部長篇小說《南京安魂曲》的中文簡體字版和英文版，於 2011 年 10 月在中國大陸和美國同時推出，中文繁體字版也在 11 月於台灣推出，這是哈金繼 2002 年《等待》進軍大陸後，又一部“登陸”的小說。哈金認為，能够“登陸”可能跟描述的題材有關。

1937 年 12 月，蔣介石命令南京政府撤離到重慶；13 日，日軍攻入南京城，開啟了屠殺中國戰俘、百姓的血腥歷史。當時堅持留守南京的西方人中，有一位名叫明妮·魏特林（Minnie Vautrin）的美國傳教士，將金陵女子學院改建成國際安全區，收留了上萬名來

不及逃難的中國婦孺，金陵女子學院，正是《南京安魂曲》的主要場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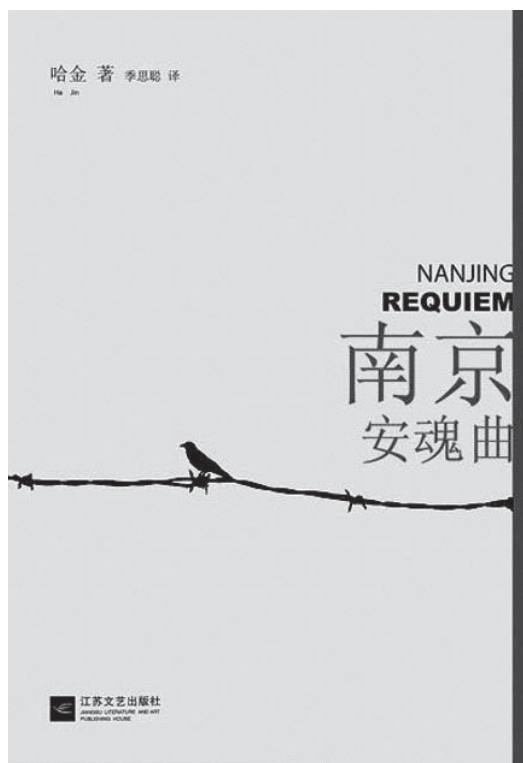
《南京安魂曲》以魏特林女助手高安玲的視角來描述這場災難，以及大屠殺後的心理壓力。美聯社在評價此書時，認為“不清楚南京發生過什麼事的人都該讀”。只用一個夜晚就讀完《南京安魂曲》書稿的著名作家余華，為該書寫序道：“他的敘述是如此的平靜，平靜得讓人沒有注意到敘述的存在，可是帶給讀者的閱讀衝擊卻是如此強烈……哈金一如既往的出色，他在看似龐雜無序的事件和人物裡，為我們開辟出了一條清晰的敘述之路，同時又寫出了悲劇面前的眾生萬象和複雜人性。”

哈金對《新史記》說，其實自己早年在大陸的時候，雖然聽說過南京大屠殺，但具體的情況並不清楚，很多細節從來都是模模糊糊的，出國後，見到美國華人不斷在紀念這件事、悼念受害者，開始關注南京大屠殺。

1997年，美國華裔女作家張純如的《南京暴行：被遺忘的大屠殺》出版，引起全球極大的重視，哈金也沒錯過這本書；讀了之後，他更覺得這是個重要事件，但當時文壇上卻沒見到太多與此事相關的書籍，因此他決定寫一本將背景建立在南京大屠殺基礎上的小說，把歷史事件用文學的形式表達出來，隨後陸續收集資料、醞釀情節，直到2008年才真正動筆寫作。

哈金對《新史記》表示，《南京安魂曲》的寫作資料以書面為主，“資料很容易收集，很多都存放在公有領域，網上都能找到。”雖然前置作業不難，但到了真正動筆後，哈金卻遇上瓶頸。“作品修改多次，關鍵是一開始的敘事結構找的不好，我用第三人稱說故事，改到第32遍的時候就再也改不動了，雖然一些細小的地方仍舊很有意思，但故事不能成一體，無法連貫。”

哈金下定決心另起爐灶，將整個故事重新寫過，在小說中加入一個虛構的人物安玲，從她的視角，用第一人稱說故事，最終將故事連貫起來，並且在完成後又改了8、9遍，這部總共修改40多遍的小說才終於誕生。



《南京安魂曲》中文簡體字版。

小說中除了安玲外，重要人物都有歷史上真實存在的原型，尤其是那些捨命拯救中國百姓的西方商人、教授、傳教士；主要情節也多來自於史實。沈重的歷史令哈金在寫作過程中經常感到沮喪。哈金告訴《新史記》記者，《南京安魂曲》應該算他所寫過的小說裡，最難寫的一部，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不能脫離這麼多許多真實存在過的人物去另外構想故事，虛構的局限性很大。

《紐約時報》在評價《南京安魂曲》時指出，哈金“從一個細微且有力的視角描述 20 世紀最殘暴的災難”。哈金對《新史記》解釋，他選擇用西方人的角度切入這個故事，是想凸顯南京大屠殺的國際性。“中國人的印象裡，這件事的經歷者好像就只有日本施暴者和中國受害者，但實際上西方人介入得很深，比如當時在安全區有 20 多萬中國人，日本人根本不把中國人當人，不准許中國人開車，只允許西方人開車，所以就是幾個西方人在四處給中國人運糧、運煤，還有許多其他事都是西方人幫忙。”

哈金說，最後在法庭上審判戰犯，也全靠外國人蒐集的資料、拍的照片、影片、文字記載，如醫療日記、個人日誌，才能定案，中國方面對南京大屠殺沒留下什麼證據。《南京安魂曲》中便描述了在華外國人將侵略者的暴行默默記下，在戰後的東京法庭上揭露的情節。

“所以南京大屠殺也是一個國際級的事件，我希望從這名美國傳教士的角度，將中國的事件變成國際的經驗。”哈金對《新史記》記者說。

《南京安魂曲》並未多著墨於日軍屠殺的場面，而是以冷靜的氛圍描寫人物的情感層面，以及書中人物事後的遭遇。雖然魏特林拯救了無數中國人，但也因為目睹太多暴行、背負太多無力救助更多人的愧疚，加上遭到妒忌、誤解和誹謗，返回美國後患上嚴重憂鬱症，最終自殺。而故事的講述者安玲，兒子在日本留學、娶了日本妻子，雖然反戰，但仍在戰爭期間被迫加入日軍來到中國，最後被游擊隊以“漢奸罪”處死。

哈金對《新史記》表示，《南京安魂曲》不可能反覆描寫屠殺場面，因為主要人物和故事都是在一個校園內上演，而且如果寫得血淋淋的，讀者也會受不了。“前六週的大屠殺很激烈、暴力，之後表面生活很平靜，但受害者的內傷其實很重，他們如何繼續生活下去？我主要想描寫他們的內傷，寫戰爭對人心理、精神的創傷。”

寫作之初投稿屢碰壁

在美國文壇裡，哈金和裘小龍可說繼湯婷婷、譚恩美、任璧蓮之後，新一代的知名華裔作家，但與任璧蓮等出生於美國的第二代華人不同的是，由於擁有在中國成長和長期生活的經歷，哈金對於中國的描寫更深入。

哈金的第一本短篇故事集《好兵》於1996年出版後，獲得了國際海明威獎，第二本短篇小說集《光天化日》也獲奧康納小說獎，1999年的長篇小說《等待》拿下美國國家圖書獎和福克納小說獎，

《新郎》則獲得亞裔美國文學獎；屢屢拿獎的哈金，被稱為“獲獎專門戶”。

其實，哈金剛開始寫的並非小說，而是詩歌。1956 年出生於遼寧一個中國軍人家庭的哈金，本名金雪飛，成長時期遇上“文革”的哈金，14 歲的時候隱瞞年齡加入解放軍。1977 年高考恢復，哈金第一志願填的是中文系，但最後考上的是黑龍江大學英語系，高考英文只拿 62 分的哈金也只好唸了，但這一唸，也唸出對美國文學的興趣。

1982 年，哈金考入山東大學英美文學研究所，取得碩士學位後，他爭取到美國麻州布蘭代斯大學（Brandeis University）的獎學金，成為改革開放後最早出國的留學生之一。哈金原本計畫拿到英美文學博士後回國教書，但 1989 年的天安門事件，讓這個至今計畫無法實現。

哈金對《新史記》回憶說，“六四”事件後，他被迫留在美國，但他不是一下子就決定要以英語寫作為生，而是經過很長一段時間才下定決心。“那時候連能不能在美國生存下來都不清楚。”一邊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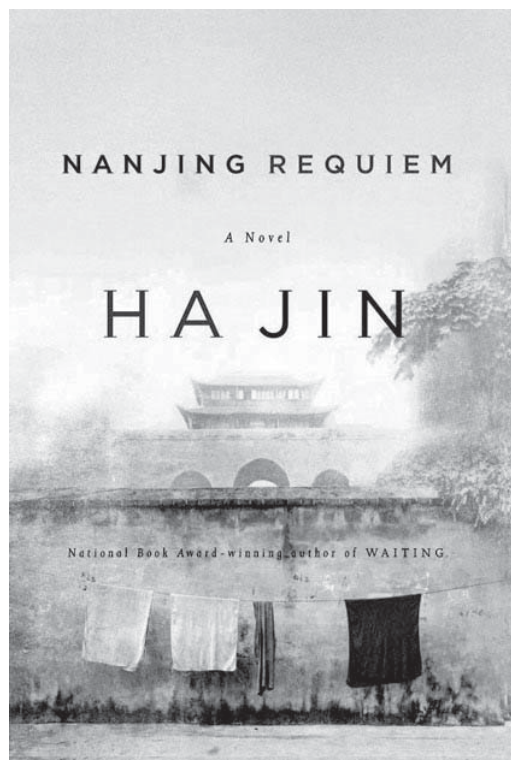
《南京安魂曲》
中文繁體字版。

望、一邊讀書的哈金，唸書之餘還得打工糊口，而此時他已開始以英文寫點詩歌。

一日，布蘭代斯大學來了一位訪問詩人，看了哈金寫的詩後覺得很不錯，欲將哈金的詩集結成冊，原來這名詩人正擔任芝加哥大學系列詩集的編輯，於是哈金的第一本詩集《沉默之間》就這樣於1990年出版了，並且獲得良好的評價。

第二本詩集的出版就沒這樣順利。取得博士學位後，哈金在同學紛紛轉換跑道的情況下，堅持留在文學道路上，期間，哈金曾進入波士頓大學寫作班學習。1993年，寫作班還沒畢業的哈金申請亞特蘭大艾默理大學（Emory University）的詩歌寫作助理教授，在200多申請者裡脫穎而出。但學術界評斷教授能力的重要依據之一，就是該教授的出版品，為了留住教職，哈金必須有作品問市。

“出版第二本書遇上困難，到處被拒絕，因為那時我已經有教



《南京安魂曲》英文版。

詩歌寫作的工作，對很多詩人來說，已經成為他們的對手，所以沒什麼人幫我。”哈金告訴《新史記》。在沒有作品出版的幾年間，哈金的壓力可想而知，他當時只能到處投稿，幾乎能投的出版社都投遍了，卻屢屢在信箱中發現出版社的退稿信，最後一家在紐約專門出詩歌的小出版社終於答應出版，1996年，哈金的《面對陰影》問市，之後的詩集《殘骸》也由同一家出版社推出。

哈金認為，中國作家如果要打入國際，不一定要用英語寫作，也有用中文寫成的有份量的作品，“一個作品如果寫的好，肯定會穿透語言障礙。”而他自己決定用英語寫作，一方面是因為走投無路、必須謀生，另一方面是為了讓自己活得更有意義。

“那時候，我總得有份工作，另一方面我也知道，在英語中有個偉大的傳統，就是一些外來、非以英文為母語的作家，也能在美國成為重要作家，所以我最後覺得，不管能不能生存下去，就做看看吧，看看有沒有這個運氣和能力了，當時有接受失敗的心理準備。”哈金對《新史記》說。

逐漸地，哈金發覺有些材料用小說來處理，比用詩歌來處理更好，加上詩集的出版不太容易，因此開始寫起短篇小說，慢慢地小說越寫越多，出版的數量開始比詩歌要多，哈金就這樣很自然地從寫詩轉換到寫小說。“小說和詩不一樣，小說每天都可以寫一點，會讓我覺得自己更像個作家。”

然而對於一個還沒建立任何讀者群的作家來說，想出版小說也非易事。哈金回憶說：“在美國要出版，關鍵是讀者群，出版商仍是商人，他們覺得你的書能賣，才會接受你，就有出版商說：‘我們憑什麼給你出？為什麼我要賠錢？’”

哈金別無選擇，只能到處投稿，幸而雖然遭到大出版社拒絕，但總有一些小出版社願意提供機會。哈金認為，或許非美國人卻用英語寫作，總是有些不同。短篇小說《好兵》與《光天化日》分別由兩家小型出版社出版，《好兵》的出版社隨後再推出哈金的長篇小說《池塘》，到了第二部長篇小說《等待》，哈金一舉拿下美國國家書卷獎（一譯“國家圖書獎”），成為至今唯一一位拿到這一美國

文學界最重要獎項的華人，從此打出知名度。

從屢被退稿，到獲得大出版社的青睞，哈金一路走來，妻子與兒子都相伴在旁、不時加油打氣，哈金 2007 年出版的《自由生活》便在開頭寫道：“To Lisha and Wen, who lived this book”，特別獻給他的妻子麗莎和兒子文。

從中國到美國，不斷嘗試新題材

2001 年，兒子北上求學，哈金也決定離開艾默理大學，到波士頓大學教授英語文學寫作。至今，哈金仍覺得以英語寫作有其挑戰性。“英語不是我的母語，不管什麼時候，都可能覺得寫起來很彆扭。一開始覺得英語寫作有種 uncertainty（不確定性），但後來也慢慢能接受這種不確定性。”哈金對《新史記》說出一番頗有哲理的看法：有時寫作就需要這樣的不確定性，如果有把握什麼都能做好，最後寫出來的作品肯定不好。

剛開始用英語寫作，哈金曾擔心被人看作“賣國賊”，如今哈金以平常心看待此事。“總有人說用英語寫作就是‘賣國賊’，但我不管他——那些事情我沒辦法掌握，每個人有每個人的想法，把我的書寫好就是了。”

裘小龍曾指出，以英文寫作時，會考慮到某些中國的歷史背景對英語讀者來說並不熟悉，因此必須在書中用適當方式加以介紹。哈金在這一點上沒遇上什麼問題，雖然他的故事情節經常涉及中國歷史，但寫作時，“我很少做解釋，即使涉及中國背景，我也盡量把小說寫得沒有中國文化背景的人也能讀懂。”哈金認為，寫作更關鍵的是什麼該說、什麼不該說，怎樣才能說得恰到好處，這與作品涉及的背景無關。

用英語寫作多年後，哈金認為自己很難再回到中文寫作。1997 年，哈金獲得美國公民身分，2004 年，在聽聞北京大學英語系有位教授詩歌的老師離職後，哈金曾向北大遞交申請信，卻未得到回應。

“我連回中國都不可能了，我母親最近病了，但我沒法回去，他們不

給我簽證。”

連回中國的盼望都無法實現，哈金認為更別說用中文寫作。

“要寫一部長篇，必須是很多年的準備和工作，但我不能回中國（做準備），而且用漢語寫作，中間如果有一個小事把你打斷就會前功盡棄。”

但自己將自己的小說翻成中文的可能性還是有的，哈金的短篇小說集《落地》就是親自翻譯成中文。他對《新史記》說，比起交給專職譯者，自己的作品當然最好還是由自己來翻譯，但畢竟有工作在身。因此時間允許的話，他較可能翻譯短篇作品，翻譯短篇報酬少又辛苦，還必須做得精，由他親自翻譯更能掌控品質。

哈金的作品多描寫從前中國與華人的生活，而非當今中國，記者問他，是否因為身在海外，對當今中國瞭解較少的原因，他承認這是一個因素。“在海外，對中國大的東西還是很清楚——甚至還會看得更清楚；但中國的‘小東西’，比如街上的氣味、新的方言，還有街道、房子的模樣，就很難掌握。”

哈金對《新史記》表示，如果真要寫現代中國，也可以有不同的寫法，但他想寫的不是現代的中國，現階段，華人移民美國的經

2010年元月台北國際書展期間，適逢哈金創作並自己譯成中文的短篇小說集《落地》出版，哈金在簽名售書儀式上簡短發言，旁為時報出版公司副總編輯葉美瑤。（高伐林攝）



驗對他來說更為重要，而北美華人的故事自然又會跟中國過去的歷史聯繫在一起。而美國讀者也並非對哪個特定時代的中國，或特定的中國事件格外感興趣，“關鍵是你故事講的好不好。”哈金說。

與許多人不同的是，哈金在成長過程中曾加入解放軍、入過黨，但他不認為這些經歷對寫作有太大的影響，差別可能只在有沒有文人氣息。“我跟中國大陸和台灣很多作家不一樣，我是從底層出來的、當兵出身的，比較少有文人的習慣、精神狀態，也很難跟他們融入到一塊。”

雖然哈金作品主要圍繞在中國、華人移民上，但堅持英語寫作多年、工作環境也幾乎完全使用英文，哈金認為自己既不是未融入主流社會，也並非已經美國化。“我應該是既中國又美國，在中間吧。”他笑道。

在寫作的路上，哈金不斷嘗試新寫法與新題材，如《自由生活》是哈金第一次寫華人移民的故事，而《落地》更可看出不同之處：以類似散文體描寫現代美國華人生活，許多故事透出超現實的氣氛。哈金對《新史記》解釋，他不像一些大陸、台灣或美國土生土長的作家，對於題材的選擇有明確的範圍界定，“其實我的每本書都是描寫一個新的地方，都是一個新的啟程。”

哈金說，未來也會做其他的嘗試，因為他不可能老寫中國大陸的事。目前哈金正在撰寫的故事，便是與美國東海岸華人移民相關的故事，預計兩年後完成。（《新史記》記者 柯宇倩） □

無論什麼樣的戰爭，犧牲最大、受害最深、遭遇最慘的就是婦女——她們是弱者啊。而在南京陷落之後的三個月，她們更墮入了無比殘酷的十八層地獄

怒火和淚水：專訪《南京大姦殺》作者素丹

素丹不算一個知名學者和作家，但是看了他主編的書，我相信，很多人會記住這個名字。這本書只有 283 頁，其中還有近 20 頁是文獻來源，封面內頁和封底內頁都是一片素白，書名並沒有特意加粗加大，就是那麼普普通通的五個黑字，卻自有一種怵目驚心的力量：

——“南京大姦殺”。

從這個書名，讀者可以想見其內容：用精選的 11 萬字第一手文字資料和近百幅照片，講述從 1937 年 12 月 13 日日寇攻占中華民國首都南京後，屠殺中國民衆，姦淫中國婦女的暴行。這本篇幅不大的書，歷史和感情重量卻沉甸甸。

與實錄相比，虛構作品那麼蒼白

2011 年秋天，哈金的長篇小說《南京安魂曲》和張藝謀導演的電影《金陵十三釵》相繼問世，隨後不久，《南京大姦殺》也在香港明鏡出版社出版。2012 年 2 月初，當《新史記》記者撥通了北京媒體人素丹的電話後，素丹說，這實在只能說是“不約而同”。

素丹沒有看張藝謀的影片，也沒有看哈金的小說。“我已經讀過



素丹編《南京大姦殺》（明鏡出版社）

那麼多的第一手實錄，我怎麼還有情緒去看虛構作品？與這些實錄、圖片相比，所有的虛構作品都那麼蒼白。”

或許這樣的斷言有一定偏激的色彩，但是《新史記》記者十分理解他的心情。在搜尋、閱讀這些血淚記錄中，他多少次悲憤難抑，潸然淚下。他認為，文學家藝術家運用真實的歷史素材，但在創作過程中，調動自己的生活與知識積累，融進自己獨特的理解，將這些真實素材改造成了高度個人化的作品。但是這些作品與實錄大不一樣——素丹更相信實錄的力量。

素丹告訴《新史記》記者，投入大量時間和精力來編輯這麼一本書，原因是由遠及近的。他在北方農村長大，父親在外地工作，身為人民公社女社員的母親沒有讀過什麼書，對這個淘氣貪玩的孩子管教十分簡單化，“抓住了我逃學，就沒有我的好果子吃了”，為逃避挨打，他常常躲藏在外，實在餓極了，趁母親下地了再偷偷溜回家抓點吃的。飢餓的感覺就烙在腦海裡了。長大了的素丹，一直對受迫害、受侮辱的小人物有一種發自內心的同情和關切。

素丹的同情和關切不只是光對同胞。“我看到二戰中 1939 年到 1945 年納粹滅絕猶太人的許多資料，特別敏感，這方面的資料，只要我看到，一定會細心地閱讀，或者乾脆買回家。納粹屠殺猶太人，讓我馬上想到了我們的南京。”——他覺得疑惑難解：“這麼重

大的事件，竟然這麼缺乏震撼人心的作品！”

史料不是沒有——恰恰相反，史料浩如煙海。素丹跑書店搜羅，也從中國的網站上訂購，有一次竟訂購了150多本書。素丹由衷地讚嘆：中國的史學界在搜集、整理、出版南京大屠殺史料方面，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財力，與中國近現代史上其他重大事件的史料比起來，稱得上相當完備和系統——“我們常常抨擊中共當局掩蓋歷史真相，但是這件事，他們做得非常好，像江蘇出版的南京大屠殺史料叢書，一本接一本。為什麼能做得這麼完善？南京大屠殺畢竟與中共關係很遠，當局可能對這個課題覺得礙不著他們的事吧，不僅沒有任何干預，還不惜重金。”素丹說。

但是問題也就在史料浩如煙海上。由於篇幅實在巨大，又多是原始史料，畢竟泥沙俱下，蕪雜散亂，反而讓當今一般讀者望而生畏，敬而遠之，不會去翻開它們了。“這麼有價值的書，人們很難看進去。這多可惜啊！”

素丹躍躍欲試。他決心精選其中的最撼動人心的片段和最畫龍點睛的語錄，編出一本篇幅不大的書來，讓讀者即使不瞭解整體，也可見一斑，從局部推斷全貌。

戰爭受害最深的就是婦女

從哪個角度編選呢？他冥思苦索，確定選取婦女在浩劫中的悲慘命運這一主題。素丹對《新史記》記者說：“無論什麼樣的戰爭，犧牲最大、受害最深、遭遇最慘的就是婦女——她們是弱者啊。像蘇聯紅軍攻佔德國、進入中國東北，也是無惡不作，姦淫婦女……”

確定了主題之後，素丹更有意識地搜集相關資料。素丹說，這段歷史過了這麼多年，已經是非常破碎、模糊了，甚至可以說是“碎片化”了。將之搜集整理出來，用“姦殺”這根線穿起來，就重新織成了一個有機的整體。

華裔女作家張純如寫《南京暴行：被遺忘的大屠殺》，選的時間段是六週，素丹查閱資料發現，六週強姦和屠殺之後，暴行的規模是

小了一些，但並沒有停止。於是素丹就將編選資料的時間段，定為從南京陷落的1937年12月13日，到日本華中方面軍最高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將因暴行曝光被免職召回國、戰鬥序列被撤銷的1938年2月13日，整整三個月。

素丹對《新史記》提到索爾·弗里德蘭德爾所著的歷史巨著《滅絕的年代（納粹德國與猶太人1939-1945）》對他的啟發：

“我去年買了一本《滅絕的年代》，這是第二卷，在此之前他還出了第一卷《迫害的年代（納粹德國與猶太人1933～1939）》。他用編年體，一天一天，將劊子手的書信、日記、幸存者等所有人的聲音都匯聚起來。其中提到許多小人物，他們的某些細節和某句話，讓我在腦海中難以磨滅。

素丹在大量閱讀中，逐漸體會出，歷史就是由一個一個細節構成的，一個僅僅兩行字的細節，效果勝過一大篇抽象論述。他列舉這些史料中讓他驚心動魄的細節：

“有個女孩坐進轎子出嫁，日本兵來，抬轎子的跑了，日本兵就要強姦新娘子，她堅決不從，日本兵就把她肚子剖開……”

“日本飛機來轟炸，一位婦女跑到美國大使館去避難，不巧一顆炸彈落下，身軀被炸得四分五裂，粘到牆上，挂在樹上……”

“《魏特林日記》沒有任何誇張，完全是平鋪直敘。她不僅是作為一個外國人，關懷中國人，更是作為一個人，關懷人！她寫道，日本兵闖進金陵女子學院搜查，門衛攔住，門衛是中國人，日本兵就用槍逼著要他們跪在地上；而她因為是美國人，就免了跪下，站在一旁。確信日本兵走遠了，中國人才敢站起來……”

素丹還給我念了一段日軍一等兵田所耕三的回憶：“我把一個女人綁在柳樹上，將捆在兩隻腳脖子上的繩子綁在兩匹馬的馬鞍上，分別給左右的馬一鞭子，人就從大腿處撕拉開了，一直撕裂到乳房那裡。部隊士兵觀看了整個過程，中隊長什麼都沒說……”

素丹認為，這比光是說“南京大屠殺慘絕人寰”云云，更像刀一樣刻在人們記憶之中。

中國人的頭顱——
1937年12月14日在南京淪陷的前一刻，被日軍放在帶刺的鐵絲路障上。由於天氣寒冷，頭顱保存完好，臉朝著南京市方向。日軍還在他的嘴裏塞了半塊餅乾。（美國《生活》畫報，1938年1月10日）



“不許可”的寫真最具歷史價值

不少專家、老師組織學生和志願者去訪問南京大姦殺的幸存者與見證人，打撈歷史。但是幸存的受害婦女往往不願回憶自己的屈辱可怕的經歷、再次血淋淋地撕開心頭傷痕；倒是在南京的外國人用打字機、照相機和筆記錄了日軍暴行，儘管很簡略。南京安全區主席拉貝和其他外國人的日記，美國駐南京大使館的報告，日本當年報紙的翻譯稿和照片……“在南京那時要不是有這些美國人德國人，南京老百姓就更遭殃了，日本兵想怎麼殺就怎麼殺！日本人一定恨死了這些外國人，給他們造成多大的輿論壓力！”

讓素丹驚喜的是，日本學者徵集到許多當年侵華官兵的書信日記，還有高級軍官的匯報、戰報，中間有不少第一手史料，甚至有參與強姦的士兵的日記，當然寫得很隱晦，一句話帶過。有些士兵死了，家人將其日記做了一些清理，給了專家學者。

這樣，素丹手裏就有了三方——受害人、施暴者和見證者多種視角的資料。穿插對比，就能比較完整、立體地反映南京大屠殺真實歷史。

《南京大姦殺》一書中，用了很多照片。素丹告訴《新史記》記者，尋找照片相當難：

國內資料、圖書上的圖片質量很差，不少照片又已為人熟知，沒有新鮮感。我去潘家園等舊貨市場，讓我驚喜的是，竟然買到了

1938年1月第一期美國《生活》畫報！這是美國第一次用圖片來報導南京大屠殺。我第一次看到看到那張著名的中國人的頭的照片，這張照片流傳久遠。《生活》畫報中還用了兩個頁碼來介紹南京人上船、上火車，逃離危城；還有兩個整頁是美國攝影師拍攝的南京陷落前兩天，長江上的美國軍艦被日軍炸了，美國人都跑到岸邊……大約不到一千字的報導寫得倒一般，照片可真非常珍貴，都是原版的啊！

我問賣主要多少錢，他說這一本要五百。雜誌沒有一點折痕，也沒人在上面批註、劃道，乾乾淨淨地落到我的手中。買下來之後，我感到慶幸：這些英文報刊，怎麼越過萬里大洋，來到中國？怎麼穿過70多年歲月，留傳到今天？又怎麼到了正巧需要它們的我的手中？

還有一次，素丹向他在日本的朋友提出要求：東京有舊貨市場吧？能不能幫我去看看，有沒有一本《日本的戰曆——從滿洲事變到太平洋戰爭》？這本書從日本寄到我的辦公室以後，連一個從美國大學歷史系畢業、研究東亞史的美國人看到了都非常驚訝：你怎麼買到的？當他得知我爲了掃描，不得不撕開它，惋惜得了不得——我也惋惜呀，但沒有辦法，只有撕開這一本，掃描圖片，才能讓更多中國的、西方的讀者看到啊……

素丹告訴《新史記》記者，當時日本往中國戰場派了很多戰地記者，例如《每日新聞》甚至派了80個記者，其中至少有十名攝影師。日本那些文字報導基本上都是假的，充滿偏見，“但照片就很難騙人。那些日本攝影師的水平都很高，但他們拍的許多照片，日本媒體似乎也沒發表，呈現出來的侵華戰爭，都是一片祥和，看不到殘忍場景，唯一例外，就是兩個日本兵殺人比賽那張照片。日本戰敗以後，軍方下通知要求這些沒發表的照片要全部銷毀——都是戰爭罪證啊。但是日本不少記者竟然把這些資料都收藏起來，不知怎麼就流到市場上，有的還被中國人得到了，印刷出版，作為日本侵華的罪證。

素丹在北京一個賣舊書的人那裡就買到一本日本的《不許可寫真史》。議定成交，賣書的人說給素丹用快遞寄過來，素丹說，別寄，你告訴我地址，我去取——這人住在北京郊區，好幾十公里遠呢，但

素丹寧願辛苦一趟，怕萬一寄丟了，就再也弄不到了。“可能南京大屠殺博物館都沒有這本畫冊呢，可我有！”

“不許可寫真”是怎麼回事呢？素丹解釋說，當年日本記者拍攝了照片後，要洗成五寸的，放在底片夾裏，送給軍方等三個機構審查，通過了才能刊登，不合格的就打上叉退回，有的還會注明“不許可”理由——例如，日軍在杭州灣登陸照片，有的日本兵穿著大褲衩，褲衩上就點上了紅筆，這意思很明白：有損皇軍形象！《不許可寫真史》裏就全是“不許可”的照片。

素丹愛好文學藝術，在選取文字和照片時，很注意可視可觸的鮮明性。他告訴《新史記》記者，在選定的時間段的最後一天——1938年2月13日，他摘錄了美國《視野》雜誌上一段根據傳教士日記整理的史實：因為三個日本兵被中國人打死，大批日軍趕來，“他們在該鎮外面拉起一道警戒線。300名居民，每6人或8人為一組，全部被捆綁起來，扔進結冰的河水中。隨後，日本士兵摧毀了這座小鎮，沒有留下一堵牆。”

“沒有留下一堵牆。”素丹對我重複著這句極富質感的話，“我這本書就在這裏結束了。”

成天接觸這樣的史料，是無比悲憤的痛苦經歷，難怪當年救助中國婦女兒童的美國人魏特林，寫出《南京暴行：被遺忘的大屠殺》的張純如，都承受不了，患抑鬱症自殺。素丹很理解她們，讀到和看到日本兵怎樣刺殺、強姦中國人的文字和圖片，他的心也在怒火和淚水中熬煎。

最讓素丹心酸的，是封面這張照片，也是這本書最後一張照片：一名中國年輕婦女懷抱著嬰兒被日軍砍下頭顱的瞬間——照片很小，但讓他的眼淚嘩嘩地流。

素丹非常佩服美國《紐約時報》記者，1937年12月18日，南京大屠殺的悲劇剛剛開場幾天，就站在歷史高度發出了預言：“日軍在南京的掠奪、強姦和屠殺已將攻陷南京變成日本的國家耻辱……它必將在歷史上寫下令日本舉國上下永遠悔恨的一頁。”他把這句話，印在了本書封面。（《新史記》記者 高伐林） □

“勝敗乃兵家常事”——中國人都知道這句俗話，但是中國人又常常以勝敗論英雄。中條山戰敗成為一顆難咽的苦果，致使在叢山峻嶺中挺立和倒下的十多萬將士也湮沒無聞。我們應該銘記他們——這些未能完成使命，卻無愧於民族、無愧於歷史的軍人

他們是失敗的英雄

爆發於 1941 年 5 月的中條山戰役，是抗日戰爭期間中國軍隊“走麥城”、敗得最慘烈的戰役之一，在重慶國民政府軍委會舉行的戰役檢討會上，蔣介石十分痛心地稱此役為“抗戰史上最大之恥辱”。日本侵略軍得意洋洋地稱“達到了消滅敵軍主力的目的，收到事變以來罕見的戰果”，統計說中國軍隊戰死被俘共近 8 萬餘人，遺棄屍體約 4 萬 2 千具，就敵我傷亡懸殊而言，可以說創了抗戰史上歷次戰役的記錄。幼年時曾親睹這場戰役的中央黨校退休教授楊聖清認為，日軍統計數字基本準確。

因為一位前國軍連長馬兆麟，於此役 60 多年後冒充該役中的“代軍長”“團長”，繪聲繪色地自述“英勇事跡”，中國軍人這道深深的恥辱創傷，被血淋淋地又撕裂開來。

但當我重新翻開泛黃的歷史檔案，訪問當年軍人的後代，透過奇恥大辱，湧上我心頭的更有光榮——無數中國將士在重圍中前仆後繼、視死如歸，無數官兵在絕境裏同仇敵愾、生死與共，無數民眾在槍口下捨生忘死、救助軍人……他們的精神感天動地。

中條山與中條山戰役



高桂滋中將。

中條山位於山西南部晉、豫、陝三省邊界，靠近黃河大轉捩處的北岸，是西安、潼關、洛陽的東北部屏障。華北淪陷後，中條山是中國軍隊在黃河以北唯一集中重兵據守的防區，成為華北、中原和西北的戰略樞紐，日寇要想南渡黃河，進擾西安，威脅陪都重慶，必先佔領中條山。

正像有人分不清“平型關大捷”和“平型關戰役”一樣，也有人將中條山抗日鬥爭與中條山戰役混為一談。今天談起中條山地區抗擊日寇，須分清幾個時間段：

——1938 年到 1940 年，這裏發生過多次激烈戰鬥。日寇為實現其南侵迷夢，13 次進攻中條山，其中六次進攻黃河的重要渡口垣曲（舊垣曲縣城現被小浪底水庫淹沒），每次集中一萬到數萬兵力，突破中方防線；中國軍隊組織反擊，迫使敵方敗退，又收復國土，如此反覆拉鋸。

——1941 年 5 月 7 日到 6 月中旬，這是戰史上所稱的“中條山戰役”（國民政府稱為“晉南會戰”）。戰役開始時，中方兵力約 17 萬；日軍則集中了 18 到 21 萬兵力，志在必得，終於全線攻破，中國軍隊敗退過了黃河。

——1941 年下半年以後，中國軍隊仍然在中條山出沒，但只是潛伏下來的零星部隊、從黃河南岸派遣過來的游擊隊，對敵襲擾，不

再有大規模作戰。

中條山戰役開始時，中方防線呈半圓形，寬達 160 公里，從西向東擺開 16 個師。軍隊編製複雜，頭緒繁多，我們將焦距集中在其中由高桂滋中將指揮的 17 軍 84 師——馬兆麟在其造假“回憶”中所冒充的，正是 17 軍“代軍長”。

帶出一支陝北子弟兵

對高桂滋這個名字，當今人們不太熟悉，但人們或許知道蔣介石在“西安事變”中被張學良軟禁在“高公館”吧——那正是高桂滋剛建好還未入住的公館，借給了張學良派用場。

高桂滋 1891 年生於陝西省定邊縣一個貧民家庭。1911 年加入中國同盟會，參加辛亥革命，後又參加過反袁護國和反段護法之役，1926 年與李大釗等聯絡，響應北伐。他沒上過幾天學，但就像那個年代所有關心時局的年輕人一樣，追求新知，懂得了不少愛國救國的大道理，在“城頭變幻大王旗”的混亂局面中，他帶起了一支由陝北子弟為主體的軍隊。

1933 年，他率 84 師參加長城抗戰，受命在冷口與喜峰口之間布防，付出 1800 多人的代價，頂住了日寇多次猛攻，毛澤東後來給他的信中對此稱讚說“國人同佩”；1934 年 10 月高桂滋被調回陝北“剿共”，毛澤東派人與他聯絡，簽訂“互不侵犯協定”。1937 年“七七”事變後，高桂滋請纓抗日，在南口、沙城、廣靈、平型關、忻口、太原等地打過多場惡仗；1938 年，他在太岳山區受 18 集團軍副司令彭德懷指揮，屢建戰功。

高桂滋是軍長兼師長，師長是實，軍長為虛：說實，84 師是他的子弟兵，官兵有戰火中淬煉的感情，他說話算話，部下也願潑了命跟他打鬼子；說虛，17 軍有時就只有 84 師一個師，有時上級臨時派來另一個師歸他指揮——“七七”抗戰軍興，蔣介石頭一封調兵電報就令 84 師到華北前線，高桂滋率兵趕到大同時，軍委會來電升其為 17 軍軍長兼 84 師師長，將蔣介石的嫡系、中央軍李仙洲 21 師由陝北



固守中條山時期的高桂滋。

調到察哈爾前線，劃歸 17 軍轄下。但高桂滋實際上很難指揮得動來頭不小的 21 師。該師後來又調走，高桂滋能管的，還是只有 84 師。

1939 年 4 月，高桂滋的部隊調防中條山，6 月就碰到日寇集中 37 師團全部和 20 師團部分兵力，發動攻勢，84 師浴血抵抗，至 6 月 25 日，收復全部失地。穩住陣腳後，受命守備中條山橫嶺關一帶，在這裏與日軍犬牙交錯互相對峙。那時有些部隊一直沒下決心修築較堅固的防禦工事，但高桂滋的人馬不同，白天陣地被日寇炮火覆蓋，夜晚士兵趕修防禦工事。兩年時光，在連綿十餘公里的防地，用石條、石塊修築了 200 多座碉堡，有獨碉、對碉、三角碉、梅花碉、子母碉及地堡，還用石條砌成一米厚的防坦克石壩。

1940 年，第一戰區司令長官衛立煌將晉軍新編第 2 師劃歸高桂滋的 17 軍，任命獨立第 5 旅旅長高增級為師長。獨 5 旅已經在中條山長期堅守，口碑不錯，但新 2 師卻是一支偽軍反正部隊，編制不足，武器低劣，戰鬥力差。從此，17 軍轄 84 師四個團及新 2 師三

個團。高桂滋命 84 師擔任橫嶺關西側主陣地防守，新 2 師為預備隊，軍部駐在柴家圪垛。

敵寇偵察細，我軍判斷錯

中條山朔風凜冽，軍中疫病流行，士兵逃亡嚴重，編制嚴重缺額，縱深配備薄弱，連軍事要害地點如渡口、司令部、倉庫等，都沒有專門守備兵力。官兵食不能果腹，衣不能禦寒，勞務繁重，背糧、磨面、砍柴、修築工事……每天兩餐，每月每人 30 餘斤毛糧，都要各軍隊派大量兵員到黃河北岸渡口去背。前沿距渡口幾十到百餘里，往返一趟要好幾天。看看高桂滋在中條山的照片就可見一斑：軍長瘦骨嶙峋，何況士兵！火力更不能與日軍相比了，高桂滋 17 軍用的漢陽造步槍，射程近、精度差，輕重機槍數量遠遠不如日軍，全軍一共才有山西土造山炮三門；而 17 軍當面之敵，為日寇 41 師團的主力池田旅團，山、野炮就有 20 餘門，還有 20 多輛坦克。

中條山守軍主體為來自各個派系的雜牌，只有少量中央軍。衛立煌發話，各部隊長官還能聽命；但敵人進攻前，衛立煌並不在洛陽的長官部，他到重慶去述職，受到蔣介石責備，心裏不痛快，到峨眉山去休息了。

衛立煌離開後，1941 年 4 月 18 日及 20 日，蔣介石派對中條山防務並不瞭解的軍政部長何應欽，在河南洛陽召集第一、第二及第五戰區軍長以上軍官兩次開會，討論敵我部署。

日寇在進攻前，派人化裝成小販過來偵察地形、配備，對中國指揮機關、糧庫、通訊中心、戰地醫院都瞭如指掌，甚至連許多軍、師、團、營長的名字也弄得一清二楚。中方各部隊也有諜報隊，不斷獵取敵情，探知日軍企圖，向戰區長官部上報，還曾向何應欽面陳，要求增兵固防，然而指揮中樞卻戰略判斷錯誤，斷定日軍意圖將是搶渡黃河，控制豫西，進窺西安。因此，自 1939 年起，從中條山地區陸續調出了宋哲元第二集團軍、有“中條山鐵柱子”之稱的孫蔚如第四集團軍，以及第五集團軍的 14 軍、第 36 集團軍的第 47 軍、76

軍等，到黃河南岸等地布防，將本來隸屬於第 36 集團軍的高桂滋，改為歸第五集團軍曾萬鍾司令指揮。中條山的一線兵力配置也不合理，竟將戰力低下、軍心不穩的 43 軍等部隊，部署在十分重要的地段。

蔣介石於戰役打響前三天的 5 日 4 日密電衛立煌，仍強調要把防禦重點放在日軍渡河上，終於鑄成大錯！

日蘇條約讓日寇解除後顧之憂

中條山戰役的直接誘因是 1941 年 4 月 13 日，日本和蘇聯簽訂的《日蘇中立條約》並附“宣言”：“蘇聯保證尊重滿洲國的領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保證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國的領土完整和不可侵犯。”——蘇聯為了自己的安全和利益，為了集中軍力對付來自西面德國的威脅，跟日本達成了一筆肮髒交易，向中國背上猛插了一刀！

日軍解除了來自蘇聯的後顧之憂，放心大膽地從東北調來 300 餘架作戰飛機，又抽調 21、35 兩個師團，第 3、第 9、16 三個旅團，會同原來已在晉南的 33、36、37、41 師團，還有野戰重炮第 2 旅團、騎兵第 4 旅團、山炮、化學及空降部隊等，以及所謂“大漢義軍”等部偽軍，要一舉拿下中條山。

日寇運用了孫子兵法中的“疑兵計”，1941 年 4 月中旬開始，每天南運渡河器材，揚言要渡黃河，進攻西安。4 月 20 日，日寇控制的同蒲鐵路停止客運，專供軍用，每天由臨汾、侯馬開出兩三列滿載日軍、渡河器材、鐵舟的列車，到風陵渡卸車。夜深人靜，又原車開回。如此循環一個多星期。

5 月 7 日下午，戰役全線陸續打響。日軍分東、西、北三路，實施現代化立體攻擊，不僅飛機輪番轟炸、大炮連續轟擊，還頻頻施放毒氣。日機覆蓋整個戰場，連一輛馬車、一艘渡船也不能幸存；而中國守軍不僅沒有飛機助戰，甚至沒有對空射擊武器，只能挺著挨炸。歌中唱道：“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但是磨磚合縫的城牆都被敵軍重武器摧毀，何況血肉之軀！

中國俗話說：“繩子斷在最細處。”日軍摸清了中方的虛實，看準了防禦的短板，選擇中方的結合部及薄弱環節撕開缺口後，大軍蜂擁而入，穿插分割，以黃河各渡口為先期攻佔目標。日軍事先潛伏的便衣隊攻擊我軍各級指揮部，破壞通訊設施，戰區長官部、集團軍部與各軍各師都失去聯絡。部隊只能各自為戰，被敵各個擊破，最後只得分散拚死突圍。戰役打響的第二天，5月8日19時，日寇南進快速部隊在傘兵配合下攻佔垣曲，封鎖了渡口，將中條山我軍防線分隔成兩半。12日，戰役打響的第七天，日寇完成對我軍的包圍，佔領黃河北岸垣曲東、西各渡口，切斷了我軍補給線及南渡退路。隨後在整個中條山戰區進行梳篦式反覆掃蕩，以全殲我軍有生力量。

橫垣大道（由山西絳縣橫水鎮，經橫嶺關至黃河北岸的垣曲縣）是日軍重點進攻地段，集中了三萬餘重兵。大道西側，由高桂滋 17 軍防守；東側，由晉軍趙世鈴 43 軍、及戰役打響前剛由黃河南岸陸續調來、正接 43 軍左翼防務的蔣介石嫡系 94 師防守。5 月 7 日下午 4 時，日軍同時攻擊橫垣大道東西兩側。5 月 8 日凌晨 2 時，日寇突破 43 軍賈家山陣地，9 時，攻陷望仙莊。17 軍左翼友軍也情況不妙：8 日日寇快速突破了最西南端的 80 軍防線，攻克泗交鎮，眼看要包抄正堅守陣地的高桂滋 17 軍的後路；另一股敵人南進至橫垣大道旁的王茅，對 17 軍的右後側構成威脅。剛調來的 94 師立足未穩就受到敵人攻擊，8 日凌晨其左家灣陣地也被日寇攻佔，隨後被敵迂回包圍，混戰至 11 日，師長劉明夏被俘，殘部分頭突圍南渡黃河。

至 6 月 10 日，戰役結束。

此役慘敗，社會反應強烈，指揮官衛立煌被撤職。

17 軍轉移中與日寇激戰

中條山戰役打響後的 17 軍戰報，今天讀來仍覺硝煙撲面，槍炮震天——

1941 年 5 月 7 日下午，敵軍向 17 軍 84 師防線全線猛烈炮擊，

一直到晚上也未停止。8日拂曉，兩千餘名日寇在七八門炮、20餘輛坦克掩護下，進攻84師的250團陣地。我軍憑藉堅固工事奮勇抵抗，並以集束手榴彈炸毀敵坦克一輛。敵傷亡慘重，至上午11時潰退。

這天上午10時，敵寇也向84師251團陣地轟擊；又在飛機炮火掩護下，向252團路家溝北山陣地進犯，未能得手，至晚21時潰退，我殲滅敵兵百餘名。

高桂滋的部隊守住了防線。鳳凰衛視2009年8月17日在《鳳凰大視野》推出“中條山之戰”系列節目，再現了這場慘烈的血戰。但是百密一疏，稱“開戰後，在日軍猛烈攻擊下，43軍和17軍很快招架不住，倉皇后撤，被日軍撕開了中條山防禦的口子”。

查有關資料，“17軍很快招架不住，倉皇后撤”與史實不符。當時的真實情況是：8日凌晨，右翼友軍94師左家灣陣地被敵突破，日寇向84師防線右後側澗底村、皋落鎮直插，致使84師腹背受敵。高桂滋命預備隊新2師進入西坡、石頭圪垛（現名長直鎮）第二線陣地，84師的野戰補充團在其右前方阻敵西進，激戰甚烈，入夜仍成膠著狀態。

8日13時，友軍94師潰退，高桂滋的部隊處境更加艱危；15時，高桂滋指揮的新2師，向西延伸，銜接野戰補充團陣地，與敵人激戰，掩護已接到上級轉移命令的軍部。

但是，8日凌晨2時就攻陷了友軍43軍賈家山的日寇，直插橫垣大道之王茅鎮，到黃昏時，新2師也腹背受敵。高桂滋當即命該師向西轉移，與野戰補充團共同阻止由朱家莊西來之敵。

17軍右翼之敵突入垣曲，左翼之敵侵入架桑、馬村，這樣，17軍被日寇包圍了！9日拂曉，高桂滋接到第一戰區長官部的命令：17軍轉移至夏縣皋落大道南側山地，繼續戰鬥，但這時戰況已經極為混亂，各團與軍、師部失去聯絡。84師的野戰補充團行至歪頭山，被敵追上，激戰一直到深夜。

9日晨到10日拂曉，17軍向西轉移的新2師三次被日寇包圍，又三次突圍，損失一千餘人，師長高增級負傷，副師長趙奎閣被俘，

最後化整為零，或藏匿深山，或南渡黃河。這個師的第四團一營在殷家莊被圍，拒絕投降，10日21時拚死突圍，11日8時再次被圍於柴家圪垛。至6月10日中條山戰役結束後，營長胡成鐸仍率領收集的殘兵三、四百人，在山中襲擾日寇，伺機渡河歸隊。

沒有軍長的部隊

10日，日寇以20餘門炮、三架飛機輪番向高桂滋的主力84師陣地全線進攻。11日拂曉，84師252團在余家山以南地區與敵千餘名激戰終日，晚23時轉進至金圪垛、前後焦之線，激戰四小時，衝出第一道封鎖線；251團和帶有四門炮的一千五六百敵寇激戰，到中午傷亡慘重，便向聞喜方向衝出重圍；250團與由架桑北上千餘名敵寇激戰終日，午夜4時也衝出了封鎖線；野戰補充團在橫皋大道南之焦家溝，被二千餘敵人包圍，上午11時，團長艾雅春向敵猛衝，中彈犧牲；團副楊世偉也受了炮傷，率領殘兵衝出重圍。

84師各團總算都衝出第一道封鎖線，但軍部卻下落不明，高桂滋查無消息。部隊只能自行判斷軍情、決定對策。幾位團長開會決定，部隊由聞喜縣東北突過鐵路，經新絳縣過汾河，向閻錫山二戰區駐地吉縣方向突圍。但是到了下馬關莊，又被日軍騎兵及機械化快速部隊追上。84師抵抗一天，得到老百姓送水送飯大力支持，並掘開河堤放水淹敵，他們乘夜撤離戰場，由泥峪口西渡黃河，奉令開赴河南新安整訓後，擔任黃河河防。

17軍殘部等來了擔負護衛軍部任務的特務營（即警衛營）突出重圍，但一問營長齊天然，原來已跟軍部失散，他也不知軍長下落，官兵們頓時都急了。高桂滋17軍有個“猛進劇團”，中尉團長是投筆從戎的原西安易俗社著名小生劉清華，曾演出弘揚民族氣節的劇目，如《蘇武牧羊》、《民族魂》等等。這時，他們派遣劇團的少年演員化裝成拾糞小孩，重回日寇攻佔的地區尋找高軍長，沒打聽到軍長的下落，只是弄清了他未曾被俘。

戰鬥最緊張的時刻，高桂滋在何處呢？是不是像那位冒牌“代

軍長”馬兆麟所說，是“決定去後方休養”、“帶著副官和秘書一起走了”呢？

沒有部隊的軍長

當 17 軍軍部右側後受到敵人直接威脅時，上級命令高桂滋向西南轉移至第五集團軍總部駐地馬村。5 月 8 日，高桂滋率軍部轉移，當晚駐馬村以北 15 華里的架桑村。5 月 9 日晨四時，第五集團軍總部派參謀趕來通知高桂滋，日軍從西南方逼近，正在攻擊馬村。

部下打散、失去聯絡的高桂滋決定率軍部向北尋找自己部隊的主力。北行途中，日軍已佔馬村，向高桂滋所率軍部人員炮擊並追擊。間不容髮，軍特務營營長齊天然率部抵抗追兵，以寡敵眾，掩護軍部北撤，在血戰中特務營損失了二百餘人，也在這時與軍部失散。

高桂滋率軍部北行至南溝，七架敵機前來轟炸，軍需處軍糧馱子及隨軍家屬損失最重，人仰馬翻，一片狼藉，慘不忍睹，未受傷的人也濺了滿身血跡和摻血的麵粉。

高桂滋等人走到西大山，南、東及北面槍聲密集。軍部殘餘人員已無部隊護衛，只有向西邊大山攀登才可能有生路，於是連同隨行難民，潮水般向西山湧去。突然，山上幾挺日本歪把子輕機槍掃射下來，高桂滋聽槍聲判斷西邊也是日寇，已被四面合圍，只好讓大家都棄馬鑽入密林之中躲藏。其實這是誤會：西山上是他的 84 師 250 團，所用機槍是繳獲日軍的戰利品，團長艾捷三誤認為湧過來的軍人和民眾是日軍化裝的便衣隊，下令開火——當年戰場上的混亂局面可見一斑！

高在密林中看見追過來的日軍向西山整天攻擊，直到深夜，還有日軍一千餘人由高桂滋藏身之處經過，皮鞋聲清晰可聞。

“我生是中國人，死是中國鬼！”

10日清晨，餓得前胸貼後背的高桂滋決定回南溝找吃食再做打算。剛剛抵達，日軍又由西邊搜索回來。高桂滋等人高一腳低一腳地向東南方的河西村撤退，剛到那兒，日軍就四面包圍上來。高桂滋及軍部數人隱藏在村南小溝裏，眼看拉網搜索的日軍逼近了！他向中尉隨從副官范國清要過手槍，準備自殺殉國。沒想到命不該絕：突然下起了瓢潑大雨，日軍沒發現蹤跡，撤走了。他們才進入村中烤衣、休息。

此後數天，日寇不時前來搜索，並駐紮在河西村，高桂滋等人分散躲藏，在山中小土窯碰到84師副師長高建白及17軍秘書長韓一帆；5月14日，高桂滋又和17軍副軍長劉弼祺、軍參謀長金崇印、副官處長王秀泉等人相逢。

東躲西藏中，金崇印和王秀泉兩人熬不住了，向高桂滋進言“另謀出路”。金崇印說：“目前我軍主力存亡不明，日寇正包圍搜山，情況危急，很難脫險。即使脫險回去，委員長對你早有宿怨，能饒恕你嗎？軍座北伐時和汪精衛有過交往，如果軍座不願直接和汪接洽，北平偽政權中有我的同學可代為牽線，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軍座應審時度勢作出決定。”高桂滋一聽，勃然大怒：“這次失敗，責任不在我，責任在左、右翼友軍的防線被突破，曾（萬鐘）司令完全知道。我相信我軍主力不會被敵人全殲。北伐時我和汪精衛是有過交往，當時他是國民政府領袖，現在他是日本的奴才、漢奸，而我是堂堂的中國抗日部隊的軍長，我能投奔他？我生是中國人，死是中國鬼！這次能脫險回去就好，再跟鬼子幹，否則我就自殺為國盡忠！”

金、王見軍長雷霆震怒，膽顫心驚，嚇得當即逃走了。

5月15日晚，高桂滋等人由北大坡又進了金圪垛村，燒水做飯之際，日寇又來包圍搜捕，大家再次分散隱藏。高桂滋和副軍長劉弼祺、軍秘書長韓一帆、軍醫湯中甫、軍需王子衡及副官范國清等人趁夜幕逃脫，韓、范兩人化裝進入石頭圪垛，找到鄉民鄭忠義相助，安排高桂滋等人隱藏在這裏的一座天主教堂內。

終於虎口脫險

17 軍殘部陸續脫險後，特務營長齊天然又率領便衣隊 20 人，穿上偽軍軍服，重新進入中條山淪陷區尋找軍長。他們看到日軍張貼的布告，懸賞十萬元搜捕高桂滋，不由得暗自高興：軍長並未落到敵人手裏！

便衣隊發現有位 17 軍伙伙的遺體體型高大，很像高軍長，就將其掩埋，用彈藥箱做了一個墓碑，寫上“陸軍第 17 軍中將軍長高桂滋之墓”，好迷惑日本人放棄搜捕。日軍發現這個墓碑，果然扒開該墓驗證，日軍這時也擄獲高桂滋的坐騎、公事包、私章等物，終於確信高桂滋已經戰死。敵偽天津《庸報》載：“據俘虜聲稱，第 17 軍高桂滋在垣曲西北方地區戰死。高桂滋軍長為陝西定邊人，講武堂出身，年 50 歲。又新編第二師副師長成為俘虜。因第 84 師四散，失去高軍長之第 17 軍，似完全潰滅之。”

高桂滋治軍相當嚴，很重視軍民關係。他在中條山駐防期間，修橋鋪路、賑災救貧，助民收割，戰爭間隙，還和老百姓搞軍民聯歡，在民眾中口碑甚好，所以在劫難中，得到眾多百姓相助。醫官湯中甫及軍需王子衡聯絡了鄉民郭金聲，將高等人藏在石頭圪垛天主教堂和郭家等處；日軍放鬆搜捕之後，他們又將高桂滋化裝成偽軍頭目的老太爺，送出了日軍封鎖區，於 6 月 10 日抵達吉縣克難坡（原名南村坡，閻錫山二戰區總部所在地）。

高桂滋離開郭家後，日寇還是發現了蹤跡，放火燒了郭金聲的房屋，還吊打了郭金聲的母親。高桂滋後來要其在天津的親戚給郭金聲匯了些錢重新蓋房。

84 師副師長高建白 5 月 15 日夜負傷，輾轉向北突圍。在他後來的回憶錄中記載了多位鄉民的名字，他說，靠他們照顧掩護，才於 5 月 20 日和來尋找軍長的特務營長齊天然相遇。6 月 10 日，他也到達克難坡，和軍長重逢，悲喜交集。高桂滋再次指責金崇印、王秀泉二人“表現不好，在北大坡極其困難的時候，他倆勸我另找出路，意思是勸我投降”。高建白一行 5 月底突圍到達郝莊時，得知金、王二人都在郝莊西邊一個小村隱蔽，便派人邀他們一同去找部隊，兩

人都不願走，最後被日軍俘虜。

6月10日，高桂滋在閩錫山總部給蔣介石、何應欽發電報告：

“職及副軍長劉弼祺和副師長高建白，由敵區衝圍出險，本日抵克難坡，謁閩長官後，即轉陝赴洛。所部師建補各團及直屬部隊之一部，已余淮渡河整頓，新二師殘部正陸續收容中。”

這一仗，17軍參戰官兵11675人，傷亡2663人，失蹤3408人。

更多將士流盡最後一滴血

高桂滋、高建白等人幸運脫險了，無數將士卻在戰場上流盡最後一滴血。

1941年5月9日，第80軍新編第27師師長王竣犧牲。王竣是陝西蒲城人，1924年冬考入黃埔軍校。1937年11月，太原淪陷後，率部擔任黃河防務，同日軍作戰。1940年春，奉命率部進駐中條山。

5月13日，第3軍軍長唐淮源在中條山戰役中率部與日軍浴血廝殺，戰至彈盡援絕，於大雨中在尖山山頂自戕殉國，時年57歲。唐是雲南江川人，雲南講武堂畢業。1911年加入同盟會，參加辛亥革命。盧溝橋事變後，參加高碑店、易水、涞源、保定等地作戰，並在娘子關戰役中與日軍鏖戰，戰功卓著。1939年，晉升為第3軍軍長。

壯烈殉國的還有第3軍第12師師長寸性奇。寸是雲南騰衝人，1909年考入雲南講武堂，1910年加入同盟會。抗日戰爭爆發後，任第3軍12師第34旅旅長，不久昇任12師師長，奉命調守中條山，堅持4年之久。5月11日夜，寸性奇突圍中與日軍戰於胡家嶺，寸及楊副師長負傷。5月13日，12師先頭部隊已越過胡家峪隘口，但師部於拂曉時被敵重兵包圍，寸性奇第二次受傷，腿被炸斷。“寸師長囑部下勿因自己而致軍隊於絕境，以稷王山為目標，向西突圍”。身中八彈的寸性奇殉國於該地，但第三軍殘部終於突圍抵達稷王山，又渡過了汾河。



1951年西北軍政委員會彭德懷、習仲勛等成員合影，左一為高桂滋。

梁希賢，陸軍第22師少將副師長，陝西同官人。梁率部在夏縣泗交至望原一線節節抵抗，出生入死十餘次。5月9日，退到臺寨村繼續抗擊日軍。梁見全師傷亡殆盡，遂投黃河殉國。

陳文杞，陸軍第24師少將參謀長，福建莆田人。5月9日下午，該師餘部轉移至臺寨村附近，與日軍展開激戰。在最危急的時刻，陳振臂大呼：“有我無敵，有敵無我！”率餘部與敵廝殺，壯烈犧牲。

以上僅列舉了幾位將官，更多的軍人英勇戰死，或者在彈盡糧絕之後不甘被俘，藏匿於深山老林中，寧願餓死。他們表現了中華民族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崇高氣節。

“勝敗乃兵家常事”——中國人都知道這句俗話，但是中國人又常常以勝敗論英雄。中條山戰敗成為一顆難咽的苦果，致使在叢山峻嶺中挺立和倒下的十多萬將士也湮沒無聞。今天，我們在謳歌立下豐功偉績的英雄的同時，也應該銘記他們——這些未能完成使命，卻雖敗猶榮，無愧於民族、無愧於歷史的軍人。

（本文註釋從略）（高伐林） □

平型關戰役，是國民政府轄下的中央軍、晉綏軍、西北軍等和中共領導的八路軍協同進行的，然而中國抗日戰爭史學會、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這樣一些本應具有超越黨派、全民性質的機構，卻只紀念和研討共產黨領導的部隊的戰鬥經過

平型關戰役的不實之詞 和易解之謎

《新史記》編者按：75 年前的 1937 年 9 月 25 日，林彪指揮八路軍 115 師，在山西平型關打了一個抗擊日寇的伏擊戰；75 年後的 2012 年 9 月 25 日，中國抗日戰爭史學會、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等幾個機構，舉行了為期兩天的平型關大捷學術研討會，與會人員並參觀了平型關大捷紀念館和戰場遺址。

八路軍 115 師的平型關大捷，是當時中國十多萬軍隊參與的平型關戰役的組成部分。平型關戰役，是國民政府轄下的中央軍、晉綏軍、西北軍等和中共領導的八路軍協同進行的，然而中國抗日戰爭史學會、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這樣一些本應具有超越黨派、全民性質的機構，卻只紀念和研討共產黨領導的部隊的戰鬥經過。不過，這次會議邀請了當時擔負正面阻擊日寇任務的國軍 17 軍軍長兼 84 師師長高桂滋中將的兒子和女兒高斌、高士潔兄妹，作為國軍將士的子女，參加這次研討會。本文為高氏兄妹向研討會提交的論文。

75 年前我們的父親高桂滋率領陸軍第 84 師 4290 名弟兄，參



學術研討會與會人員考察戰場遺址，來到平型關前。

加了平型關戰役。在這場戰役中，84 師和八路軍 115 師、晉軍獨 8 旅等部隊一起阻滯日本阪垣師團的侵華鐵蹄長達 10 日，為中國軍隊部署下一場戰役贏得寶貴的時間。但令我們不解的是，從 1985 年開始，高桂滋和 84 師遭到“擅自放棄團城口”的污蔑。為還原這場戰役的歷史真相，給抗日部隊正名；為紀念 84 師在平型關戰役中犧牲、重傷、失蹤的 2600 餘名將士，讓英雄們九泉之下得以安息，我們查尋了一些有關平型關戰役史料，希望得出正確的結論。

浴血拚命的五天五夜

第 17 軍 84 師自 1937 年 7 月 9 日參加抗戰以來，經歷南口、晉北火燒嶺等一系列戰鬥，傷亡較重，且未得到任何補充。

1937 年 9 月 21 日

早 10 時，17 軍接到了布防團城口—平型關一線的命令。84 師在僅有 4 千餘人的情況下，由團城口進入內長城沿線布防。17 軍暨 84 師師部駐繁峙上台莊，84 師前沿指揮所駐迷回村。

9月22日(養日)

申(早7-9)時, 17 軍奉命接防從東跑池 1886.4 高地(不含), 經團城口、霸河口、上寺、講堂村至 1981.4 高地防務。其中, 平型關(不含)以北經西跑池、團城口標高 2141.96 高地至西河口之沿長城線, 為第 84 師防禦陣地(總長 20 公里有餘); 左翼西河口(不含)沿長城線為 21 師李仙洲部防線(1)。84 師的右翼——平型關之太戲山為獨立步兵第 8 旅孟憲吉部、附新編步兵第十一團守備陣地, 獨 8 旅陣地迤南為第 73 師劉奉濱部(9)。

黃昏, 由於駐防平型關的守軍尚未到位, 84 師王新耀營臨時接替了平型關防務, 並出關破壞汽車路。此時, 敵尾追晉軍新 11 團而來, 與王新耀營斷路部隊在公路遭遇, 大戰由此開始(1)(3)(6)。為掩護新 11 團撤退, 王營傷亡過重不支, 亦退入關內(1)(6)。日軍在坦克車、裝甲車掩護下向平型關衝擊。84 師和獨八旅奮勇拒敵, 肉搏多次, 將敵擊退(2)。

9月23日(漾日)

漾曉, 敵約一師團(阪垣第五師團第 11、41、21 三個聯隊, 一個野炮中隊及偽蒙軍)(1)(6), 分兩路進攻平型關和團城口。敵以大炮、坦克、機槍的猛烈火力向東跑池附近陣地猛攻。獨 8 旅的兩個連犧牲殆盡被迫後退, 84 師 502 團積極迎敵, 激戰至寅時, 敵未得逞。艾捷三團長因調度不及, 親自率隊增援突破口時受重傷, 營長李榮光陣亡(5)(6)。此時, 已在關外布兵的八路軍 115 師師長林彪派聯絡參謀袁曉軒來見高桂滋。希望 84 師能堅守平型關三天, 八路軍定能包圍殲滅敵軍, 高毅然承諾 (13)。

阪垣師團係裝備優良的機械化部隊, 他們不僅擁有飛機大炮坦克等重武器, 單兵火力也非常強大。敵士兵一手拿著輕機關槍, 一手拿面小旗, 利用煙霧的掩護, 象螃蟹一樣爬近我們的陣地。我們士兵的主要武器則是北伐時期生產的漢陽造和山西土製手榴彈。只有待敵人走近時, 幾個手榴彈綁在一起扔出去, 才能有較大殺傷力(7)。一度, 84 師與獨 8 旅主動還主動出擊。追擊敵人十餘里, 繳獲機關槍六挺及其他的戰利品(6)(7)。但下午 5 時後, 敵阪垣師



當年殊死激戰的平型關戰役陣地。

團主力趕到，約五、六千人在飛機、大炮和數十輛坦克車助攻之下，不斷衝擊我方陣地。我方官兵因無堅固工事，多被彈片及炸開的石片傷及背部。黃昏，陰雲密布，細雨蒙蒙，繼而越下越大，士兵們沒有雨具，全身濕透浸泡在泥水裏。他們以血肉之軀堅守陣地。官兵們都知道這條線萬萬失不得，這裏既是山西的門戶，也是通向大後方的捷徑。高桂滋命令師預備隊 250 旅全部投入戰鬥，士氣大振(6)(7)。

敵攻 84 師陣地不得手，乃以全力攻東跑池以南獨 8 旅陣地，此地制高點 1886.4 高地旋被佔領。閻錫山懸賞一萬元奪回高地。為維持全局，84 師呂曉韜團選拔奮勇隊，奪回 1886.4 高地，仍交晉軍防守。團城口正面敵炮兵較多，23 日向 84 師陣地終日炮擊，並不斷以小部隊攻擊團城口附近高地(5)(6)(7)。

日軍軍史資料敘述說：“左翼方面的平岩大隊於 23 日拂曉暫且攻佔了三角山(1886.4 高地)，但是敵軍(指中國軍隊)佔據壓倒性優勢，因此為保住陣地已經到了死傷無數、彈盡糧絕的地步。此時，敵軍的一部分開始向我左翼迂迴，侵入後方。” (18)

入夜，日寇繼續攻擊 84 師防地，我營長楊學武亦受重傷。二戰區平型關會戰紀要說：僅此一日“我高軍傷亡團長副營長數員，

連排長 30 餘員，士兵千餘。”(5)。

這時，二戰區總預備軍 71 師已在火線後面的迷回村待命，該師 428 團官兵清晰聽見 84 師官兵作戰時的喊殺聲、槍炮聲(12)。

《大公報》前線記者孟秋江寫道：“山中一夜鏖戰，敵人想佔領東跑池。突破了這一點，雁門關的天險就宣告破產，整個的山西就可從此動搖，必然影響全盤戰局。高桂滋先生說：“這真的到了最後關頭！”(7)

9月24日(敬日)

拂曉，陰雨。敵又增兵五千餘，向平型關東西跑池 1886.4 高地、團城口及講堂村各陣地猛攻。戰鬥愈趨激烈，漸至肉搏。我陣地失而復得，激戰終日。這時，二戰區製定了一個當日出動 16 個團的作戰計劃，並印成命令紙下發，擬配合關外八路軍，以六倍兵力聚殲日軍。據此，84 師奉命將所守陣地向右延伸，即由平型關以北東西跑池、團城口、1980.49 高地(含)，平型關以北(不含 1886.4 高地)重要陣地均由 84 師防守(5)(6)(7)。

但是，原定於 6 時出擊的 16 個團，並未出動。115 師也在 23 日晚臨出發前接到電報取消行動。只有 84 師“全線的兵，好像栽蔥，栽上就拔不下來”(7)。

在“彈藥消耗已盡，待彈不至，士兵赤手肉搏，悲慘萬分”(1)的情況下，軍長兼師長的高桂滋無兵可派，只好對部下說：“別處給敵人突破，你們不能動，還是死守抵抗，打完了就算你們達到了任務。”高一面連電閻錫山和實際指揮這次戰役的第六集團軍副總司令孫楚：“陳明傷亡過重不能維持本日戰局，請增援固防。”(1)一面親赴迷回村督戰(6)(7)。

50 年後，團城口村民張正官仍清楚記得：“1937 年農曆 8 月，我們團城口村駐紮了高桂滋的部隊，不久展開了平型關戰役，戰鬥非常激烈，最激烈的地方是我們村東一華里處的臥羊台(團城口關前台地)和杏窪嶺(東跑池村西)……戰爭結束後，我們就清理戰場。發現山上約有數千屍體，大部分是高桂滋的士兵，也有日本

人……” (14)

“9月24日 第一大隊(尾家部隊)負責平荊關口左邊(實際是右邊)的1930號高地,第21聯隊第三大隊負責左邊的三角山,開始了攻擊,受到敵軍從左右小丘襲來的交叉炮火,24日、25日兩天,第三中隊長千田大尉等28人戰死,另有多名負傷者”。(20)

原定24日6時出擊的計劃已被延至夜12時,84師的高建白旅長拿著二戰區發下的命令紙去找晉軍71師前線指揮官202旅旅長陳光斗質問。陳光斗則拿出一張記錄著71師師長郭宗汾轉閻錫山電話的命令紙——“非有本長官電話,不得出擊。”(6)(7)

9月25日(有日)

凌晨2時,1886.4高地再度失守,84師的呂曉韜團長再選50名奮勇隊員奪回高地,生還者僅11名(6)(7)。

凌晨,東跑池附近500團3營陣地已經沒有能戰鬥的兵,日軍端著槍直衝到邵春起營長面前。邵營長拿起手槍自衛,大腿被敵彈貫穿,勤務兵抱著邵春起一起滾下山坡。而該營排長郁鳳祥以下數十名弟兄陣亡(10)。

日軍軍史記載:“25日,旅團終於佔領了該地附近約二公里長城線的正面”。(8)

“7時,大雨如注,晉軍出擊計劃又因雨推遲”。(6)“郭師行動因雨遲緩,午前8時,該師各部正在準備攻擊之時,84師團城口附近陣地,受敵猛攻不支,逐漸向後撤退”。(9)“同日拂曉,我調集重兵分路出擊。敵亦向我團城口以北高軍陣地猛攻”。

8時,八路軍115師在喬溝阻擊日軍支援部隊,取得輝煌勝利。但晉軍16個團仍然沒有出擊(6)(7)。

10時,敵乘雨反攻之際,陳光斗派來增援的兩個連終於來了。但這兩連援軍臨進陣地時,見敵我肉搏壯烈,立即後撤,以致84師代理團長杜文卿搶堵突破口時,壯烈犧牲(6)。

此時團城口陣地因傷亡而急速減員,也發生潰退。502團3營機槍連連長邱仰岳說:“於25日上午10時為止,李仙洲的部隊抽調不動,孫楚又不接替防務,炮兵不發射支援,我方陣地上之守兵

盡留了些焦頭爛額缺臂斷腿極少數的官兵。因而槍聲漸稀，敵人識破我們已無力再戰，又發起了最猛烈的進攻。到了此時，我們無可奈何中，放棄職責，撤退下來……” (11)

此時至下午 1 時，84 師全線數處被日寇攻破，下級軍官傷亡十之六、七，無人指揮。彈藥已經全部耗盡，身負輕重傷的士兵們槍管裏灌滿了淤泥雨水，只得憑手榴彈和石塊來堅守據點，各自為戰 (6)(7)。高桂滋再次向二戰區和第六集團軍求援，希望挽回敗局，但援軍始終未到 (1)。午後 3 時，1886.4 高地再度失陷，東跑池一帶制高點落入敵手 (5)(6)(7)。

二戰區戰報中說：“(25 日) 唯高軍出擊不利，仍退回原陣地以西固守”。

日軍軍史則說：“右翼方面的尾家大隊也在 23 日以後開始了對這一帶的制高點 1930 高地的進攻，遭到了敵軍的猛烈反擊，24 日第一中隊、第三中隊 (中隊長千田忠中尉陣亡) 蒙受了巨大損失，在此情況下仍於 25 日佔領了此處。” (18) “9 月 25 日，凌晨 3 點命令出發。雨還在不停地下，冷風涼颼颼的。部隊一步三滑地前進著。我們協助第四中隊，對撤退了 700—1000 米的敵軍進行 22 輪猛烈的掃射，而敵軍利用長城線頑固的抵抗。我軍傷亡較重，暫且集合，稍作停頓後向大營鎮方向出發。” (18)

9 月 26 日 (宥日)

晨，敵集中炮火，飛機協同，猛轟 84 師前沿指揮所所在地——迷回村。此時 84 師的多數官兵已在敵機炮火猛烈掃射下壯烈犧牲。下午，高建白旅長派奮勇隊接出深陷敵圍的呂曉韜團長，全師後撤 (6)。

9 月 27 日

84 師收容殘部後，向當面之敵反攻。因傷亡過重 (全師已不足二千人)，奉二戰區之命，轉移至靈丘西北的王成莊 (1)。

9 月 29 日，日軍從北邊的茹越口突破，中國軍隊有遭到包圍的危險，閻錫山下令全線撤退。平型關戰役最終失利。

在隨後的忻口戰役中，上級和其它友軍的長官劉茂恩、林蔚、



八路軍一一五師
埋伏殲敵的喬溝。

衛立煌等，均報告 84 師因傷亡過重，已喪失戰鬥力。

不實之詞和易解之謎

(一) 84 師沒有在 9 月 24 日夜“擅自放棄團城口陣地”

1、二戰區戰報、電報，均沒有高桂滋部隊在 24 日夜放棄團城口陣地的記錄。相反，二戰區平型關會戰紀要和電報均有 84 師在 25、26 日的作戰記錄。如：“唯高軍出擊不利，仍退回原陣地以西固守”(5)；“(26 日) 17 軍軍部及 84 師師部繁峙上台莊，250 旅、251 旅在團城口附近”(2)；“本午 84 師傷亡較重，全部潰退”(4)。

2、高桂滋部下從未有人證明高桂滋曾在 24 日晚下令撤退。相反，他們的親歷如：“25 日凌晨，84 師奮勇隊再次奪回 1886.4 高地……代理團長杜文卿為搶堵突破口壯烈犧牲……”(6)證明 84 師 25 日仍在苦戰。

3、當時的晉軍人員行定遠《戰鬥在平型關的第428團》一文記述：該團於25日晨“經84師陣地出關，後衛部隊經過團城口時，太陽已經出來……”⁽¹²⁾更證明84師25日還在戰鬥，並沒有在24日夜棄守。

因此，可以判斷，84師陣地在25日曾出現局部失守的原因，是傷亡過重，彈盡援絕，得不到相應的支持。所謂“高桂滋放棄團城口”以及84師為“報復”友軍沒有增援撤出陣地等等，純粹是某些人的臆斷和杜撰。

（二）為什麼日軍主力要進攻東跑池、團城口？

根據日軍《步兵第11聯隊史》：“迄今並無機會對山西軍實施徹底的打擊，因此得到情報的師團長認為這是個絕好的機會，將步兵三大隊交給步兵第21旅團長指揮，命令他將敵軍追擊至比大營鎮還要往西的繁峙縣”⁽¹⁸⁾。

1936年蔚代公路通車之後，從靈丘到大營鎮及繁峙的汽車並不是從平型關經過，而是經過東西跑池之間的杏窪梁，這一帶的制高點是東跑池村北的1886.4高地。阪垣師團是機械化部隊，所以他既然設定進攻目標是大營鎮和繁峙，就必定要通過東跑池，團城口也是通往大營鎮的一個隘口，團城口不能走汽車，卻有一條由渾源南下的大車路，可以任山炮通行。

以上兩條路恰恰都通過84師陣地。因此可以說，在平型關戰役前期（9月26日前）84師守禦著主陣地。在《二戰區平型關會戰紀要》：“23日晨，敵約一師團分兩路進攻平型關及團城口。以坦克車數十輛，沿汽車路進攻蔡家峪。”⁽⁵⁾《第七集團軍傳作義部南口會戰、至太原守城戰鬥詳報》：“敵今晨對平型關84師陣地攻擊甚急……團城口高師正面之敵係阪垣師團。似完全為機械化部隊，步炮約四千餘人……東跑池汽路附近我陣地受敵攻擊數次，但均被擊退⁽⁹⁾”。在這些戰報中，都可以清楚看到84師陣地的重要性。

84師在平型關戰役前期的堅守，既殲滅相當數量的日軍，又

為整個平型關戰役的運籌贏得寶貴時間，是對 115 師取得平型關大捷最重要的支持。

（三）陳長捷的《平型關戰役經過》究竟有哪些參考價值？

原晉軍將領陳長捷在天津戰役被解放軍俘獲後羈押多年，被特赦後，寫過一篇《平型關戰役經過》，雖然介紹了一些閻錫山策劃平型關戰役的情況，但時任 72 師師長的陳長捷，於 9 月 27 日才趕到戰場附近的大營，他對 27 日前的戰鬥情況並非親歷，因此所敘述的戰爭經過不是語焉不詳，就是錯誤頻出。比如：他說高桂滋在 24 日夜“由於錯覺而怨憤，擅自放棄團城口，鷓子澗、東西跑池各部亦均退迷回村”⁽¹⁹⁾，顯然與《第二戰區平型關會戰紀要及經過》大相徑庭。

再比如，陳長捷說“在郭軍到達前，高部的團城口、鷓子澗、西泡池間陣線，雖不斷受敵炮擊，守軍依托強固陣地，配備稍疏，尚無重大傷亡”。⁽¹⁹⁾而閻錫山卻在給蔣介石的密電中報告，僅 23 日一天“我高軍傷亡團長副營長數員，連排長 30 餘員，士兵千餘。”。然而，因為陳長捷畢竟也是平型關戰役的參加者，所以他的許多說法，被後世史家誤認為是權威見證。



陳長捷。（資料圖片）

陳長捷所謂“郭宗汾出擊被阻”究竟發生在哪一天？陳文：“軍主力經迷回村，越第 84 師陣地，直出團城口攻擊敵人。部隊於半夜出發，在靜謐行動中，絕不虞高部早已悄悄地放棄了陣地。(19)”衆所周知，林彪部隊伏擊敵寇的戰鬥，發生在 9 月 25 日，如果郭宗汾部是於 9 月 24 日半夜或 25 日凌晨出發，何來“時值八路軍於前一日抄擊敵後，於東河南以西地區，殲敵近一個聯隊(19)”？如果郭宗汾部在八路軍抄擊敵後之後的半夜即 25 日半夜出發。那麼，顯然郭宗汾就沒有執行 25 日凌晨出發的命令！

正如續範亭先生在當年傳誦一時的文章《三年不言之言》中所說：“×× 軍官到師部去看他（指郭宗汾）時，他還在被窩裏睡覺，並且說：‘昨夜天氣不好，所以未曾行動。’”(15)

不過，陳長捷也有說對了的，例如這一段話：“閻錫山和孫楚未能明瞭團城口高軍告急的真相，他們多少是不盡相信八路軍林師已插進敵後，造成了特別有利的形勢。在對全局情況的迷惘下，自認出於慎重處理，對高桂滋說：即派郭宗汾預備軍增援；對八路軍說：待預備軍到達平型關，即從北翼團城口出擊。實際只命郭宗汾的預備第二軍到大營，聽孫楚相機使用，仍留陳長捷的預備第一軍在代縣，而不以全力堅決出擊。舉措失著，致誤戰機。”

（四）平型關戰役失敗的原因

1、正如陳長捷所言，平型關戰役的失敗恰是二戰區最高指揮官—閻錫山“不以全力堅決出擊，舉措失著，致誤戰機”的結果。

證據一：陳光斗拿出一張記錄著郭宗汾轉達閻錫山電話的命令紙——“非有本長官電話，不得出擊”；證據二：總預備隊 71 師 428 團於 25 日晨出團城口後，明知八路軍已向日軍開火，卻不參加戰鬥，團長王榮爵謊稱前線戰況危急，反被郭宗汾表揚；可見，郭宗汾真正領會閻錫山的意圖——“出擊”是假，保存實力是真。

2、當時劃歸高桂滋指揮的中央軍 21 師師長李仙洲，9 月 25 日給蔣介石密電中指出：“此間作戰不利原因：（一）指揮官能力薄弱。（二）指揮不統一。（三）上下欠聯絡。（四）友軍互不相信，各不

相救，致敵各個擊破……晉軍戰鬥力較差，殊不可恃。”(4) 李仙洲所指的指揮官正是閻錫山，閻錫山既不甘心讓日本人搶走自己苦心經營幾十年的地盤，又不願意犧牲晉軍實力去保衛熱土。

另據《彭德懷大傳》披露，9月20日閻錫山曾動員八路軍115師與84師一起守平型關正面，被周恩來回絕了。閻錫山就是晉軍既不增援84師，又不遵守與八路軍的約定按時出擊的始作俑者。李仙洲建議中央，除增派五師以上精銳部隊外，還應派大員前來指導。南京軍令部採納了他的意見，派衛立煌來二戰區指揮忻口戰役，就是為避免閻錫山只把別人的部隊放在刀口上。

3、有人認為允許晉軍71師延後出擊是傅作義的失誤，這是不瞭解晉軍的“規矩”。記者孟秋江在《大戰平型關》中有一段話：“山西軍隊沒有縱的系統，一個團長可以與最高長官直接來往，指揮官不能夠絕對指揮，這是山西隊伍不能作戰原因之一。”(7) 9月23日午前5時，傅作義奉閻錫山命令協同第六集團軍正、副司令指揮平型關軍事後，“極端主張的，應乘敵增援未到之前，將總預備隊增加於團城口方面，連同平型關方面所有各部隊，全線出擊”(9)。但在24日晨第六集團軍總部的聯席會議上，他的主張被否決了。

4、是不是真的如孫楚所說“部隊都粘上了，哪有餘力出擊”？時任第六集團軍秘書長盧宣朗認為：“孟憲吉旅面臨敵人的壓力並不很大，但因它是孫楚的基本隊伍，所以孫也強調該處受壓很凶，同樣很危險”(16)。獨8旅第622團營長秦駟見八路軍已開始出擊，即給本營下命令，準備向當面敵人反攻。但始終沒有接到反攻命令(17)！

(五) 關於平型關戰役史料的秘密

1、二戰區為什麼要在1939年8月補寫平型關戰役經過？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中有兩份二戰區關於平型關戰役的戰報，一份是《第二戰區平型關會戰紀要及經過》，另一份是《平型關八次爭奪戰經過》。《平型關八次爭奪戰經過》的收發時間是民國

二十八年(1939年)8月22日補呈的。第一頁上有一個批語：“要件。11科妥為保管並將作戰經過概要酌予修改”。說明在這之前已經有一個作戰經過概要，需要修改。不僅這份是補呈的，《第六集團軍晉北平型關會戰戰鬥經過詳報》和《第71師平型關會戰戰報》，也是補呈的。因此，第二歷史檔案館沒有84師或17軍平型關會戰詳報，絕非偶然。

2、《晉綏抗戰》一書中的《在團城口抗戰的第17軍》和陝西政協文史資料第18輯中《由南口戰役到平型關大戰》有什麼不同？

這兩篇文章都出於高建白1964年的回憶錄，內容基本相同。但對照之後發現，《晉綏抗戰》中的《在團城口抗戰的第17軍》高建白原稿中的時間，全部往前改了一天，比如把9月25日改成24日，還加註了一些錯誤評語。該書編輯為什麼這樣做呢？因為《晉綏抗戰》是全國政協委託山西省政協編的，編者在1985年編山西政協文史資料匯編第40輯時，根據陳長捷“高桂滋24日放棄團城口”的說法，繪製了一幅平型關戰役示意圖。所以，他就是要把高建白回憶的文章往錯裏改。好在高建白的手稿已經找到，出版於1985年8月的陝西省政協文史資料第18輯《由南口戰役到平型關大戰》，是忠實於作者原稿的。

(本文圖片為高斌提供)(高斌 高士潔)□

附錄：國軍84師戰史

84師前身是國民革命軍第19軍(歸武漢政府指揮)，後改番號為第47軍。1928年日軍佔領濟南，“五三慘案”發生，47軍和日軍激烈交火，軍長高桂滋幾乎陷圍被俘。北伐成功後，47軍被整編為第133旅。1930年初高桂滋通電反蔣失敗，蟄伏山西。以後由張學良向蔣介石疏通，才被編為第32軍轄下的84師，參加了1933年初的長城抗戰。84師在長城抗戰中擔任29軍右翼—冷口一帶防務，此役，84師堅守陣地傷亡一千餘人。

1937年“七七事變”後，高桂滋請纓抗戰獲准。7月10日，全師除工兵連繼續綏德無定河橋工程和少數軍官因病不能隨隊外，經山西開赴南口戰場。8月7日，軍令部發表高桂滋陞任第17軍軍長的命令，轄84師（師長由高桂滋自兼）和中央軍21師（師長李仙洲），統歸湯恩伯指揮。平型關戰役結束後，21師脫離17軍建制。

84師在南口戰役中擔任13軍左翼防務。8月17日、20日，84師在赤城附近的井兒溝、喜峰砦全殲由沽源進犯的，由日本藤井少將指揮的偽蒙軍兩個教導團。斃敵六、七百名，俘敵280名，繳獲迫擊炮6門，輕重機槍13挺，步槍91支，手槍31支，戰馬120餘匹，日本旗幟5面，藤井僅以身免。這次戰鬥被李新、陳鐵健主編《全民抗戰氣壯山河》稱之為自抗戰開始以來的第一場勝利。

8月26日南口守軍全線撤退，84師擔任斷後任務，在沙城、長安嶺一線，掩護友軍。28日84師在10餘架敵機輪番轟炸和敵炮轟擊下突出重圍，唯張兼善營全營壯烈犧牲。該師官兵在涉渡桑乾河時，又遇山洪暴發，沖走成群官兵，全師尚餘4842人。

9月12日，84師在山西廣靈火燒嶺、大白山一帶，遭遇敵阪垣師團及偽蒙軍3000餘人進攻。雙方爭奪制高點大白山，戰況激烈。13日，敵猛攻火燒嶺陣地及木場高地，該師斃敵400餘名，將敵擊潰；但右翼因晉軍73師潰退，該師陷於包圍，不得不於20時奉命撤退。此役84師傷亡551人。

因此，84師剩下來參加平型關戰役的實際人數不超過4291人。

資料來源：

- 1 《抗日戰爭正面戰場》2005年版，第536頁高桂滋致蔣介石密電（1937年9月27日）。
- 2 《抗日戰爭正面戰場》2005年版，第529—543頁閻錫山與蔣介石往來密電。
- 3 《抗日戰爭正面戰場》2005年版，第530頁介景和致黃紹竑密電。
- 4 《抗日戰爭正面戰場》2005年版，第531—532頁李仙洲致蔣介石

密電(1937年9月25日)。

5 《第二戰區平型關會戰紀要及經過》，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館藏檔案。

6 《由南口戰役到平型關大戰》，陝西文史資料第18輯，133-134頁，高建白文。

7 孟秋江《大戰平型關》，1937年10月《大公報》。另見《西線風雲》2009版第125—126頁。

8 《中國事變陸軍作戰史》第一卷第二分冊，第51頁，日本防衛廳防衛研究所戰史室著。

9 《第七集團軍傅作義部南口會戰、至太原守城戰鬥詳報》，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館藏檔案。

10 邵春起《我對平型關大戰的回憶》，1985年8月《阜陽史話第五輯》79-82頁。

11 邱仰岳《抗日戰役中平型關戰鬥之一角》，原稿藏陝西省政協文史資料檔案室。

12 行定遠《戰鬥在平型關的第428團》--，山西文史資料第40輯第164-165頁。

13 齊天然、苗滋庶《高桂滋傳略》，陝西政協文史資料第22輯。

14 1988年11月繁峙縣政協文史資料。

15 續範亭《三年不言之言》，1944年8月6日延安版《解放日報》。

16 盧宣朗《第六集團軍總部見聞》，《晉綏抗戰》。

17 秦駟《獨八旅第622團平型關抗戰見聞》，山西省文史資料匯編第七輯。

18 日軍《步兵第11聯隊史》，靖國神社圖書館資料。

19 陳長捷《平型關戰役經過》，《晉綏抗戰》第25-54頁。

20 日軍《步兵第11聯隊第四中隊誌》，靖國神社圖書館資料。

我相信，未來某日，平型關大捷紀念館一定會更名為“平型關戰役紀念館”，八路軍的平型關大捷會是其中主要的內容，但不是唯一的內容

平型關大捷功勞簿上 不能只載八路軍

今天我們兄妹來到父親戰鬥過的地方，參加紀念平型關大捷75週年紀念活動，感到十分榮幸。

75年前，當日寇鐵蹄踐踏祖國大好河山的時候，當全國人民同仇敵愾、紛紛投入抵抗日寇侵略行列的時候，我們的軍人父親沒有退縮，他寫好遺囑，請纓抗戰，率84師數千弟兄跨黃河，出雁關，在南口赤城、晉北大同與敵激戰。在他的隊伍裏，有辭別高堂的兒子，有新婚不久的丈夫，有離開幼子的父親……他們在這場保家衛國的戰爭中，勇敢地站在正義一邊，以鮮血和生命捍衛了中國的尊嚴。

抗戰是全民族的抗戰

75年過去了，那條曾被鮮血染紅的河水依舊流淌，但已沒有血腥；那座曾經堆遍屍骨的高地依然巍峨，卻再也看不到英雄們身影。英雄們走了，走進了歷史，任世人評說；英雄們作古，把未來留給後人，任你怎樣塗抹。誰敢說這樣的犧牲沒有意義？誰願意回到中華民族受辱的日子？忘記就意味著背叛——這句名言時刻震響我們的



高斌、高士潔兄妹與山西繁峙縣人大前主任、現平型關大捷紀念館歷史顧問高鳳山(右)合影。(高斌提供)

腦海，我們不能忘，也不敢忘。

對於中國，歷史，特別是抗日戰爭史，激勵我們的子孫永遠自強不息，能讓我們後代銘記一寸山河一寸血。歷史學家們，我們尊敬你們，希望你們能為大眾揭示更多的抗日戰爭史真相。你們的鐵肩擔負著道義，你們任重而道遠。

作為平型關戰役參戰將領子女，我們本希望看到對英雄的緬懷，對正義的褒揚，但是卻遭遇預想不到的尷尬。我們的父親，被一個當時並不在場的見證人陳長捷指責為“在 1937 年 9 月 24 日夜下令放棄團城口”。為推翻這個沒有任何歷史依據的指責，我起訴紀實小說《血色雄關》損害我父親名譽，卻被《中國老年報》等媒體指責為“豈能為親者諱而篡改歷史”。而西安市中級法院卻在認定了“在 1937 年 9 月 22 日至 25 日平型關戰役的戰鬥中，高桂滋率部對入侵日寇進行了抵抗，傷亡兩千餘人後潰退”的事實後，仍然判我敗訴……

為什麼要打官司？我們這樣做，不只為維護我們父親的名譽權。它首先是對抗戰史實的尊重，對在平型關戰役中犧牲的所有中國軍人的紀念和哀悼。

2009年8月，一位84歲高齡的老人曾府生找到我，原來他是1937年9月23日犧牲在1886.4高地爭奪戰的獨8旅郎團一營營長曾紹信的兒子。他在我的博客裏看到二戰區《平型關八次爭奪戰經過》，才知道自己父親犧牲的事跡和準確地點。

在平型關戰役中，只有4291名將士的84師，傷亡、失蹤2600餘名。其中包括9月23日受重傷的502團團長艾捷三、受重傷的營長楊學武和陣亡營長李榮光，9月25日受重傷的營長邵春起；包括9月25日10時搶堵突破口時犧牲代理團長杜文卿；包括在第二次收復1886.4高地戰鬥中犧牲的39名奮勇隊員——50名奮勇隊員僅有11名生還啊！難道這些人就不是英雄？率領奮勇隊的501團呂曉韜團長，在南口、平型關、晉東南反九次圍剿戰中屢建戰功的呂曉韜團長，1938年在安澤犧牲時，18集團軍總司令朱德曾發出唁電。如今，呂曉韜團長竟默默地躺在他的家鄉——河北省河間縣，當地政府竟然不知道有這樣一位抗日英雄！

1998年我訪問父親的一位部下齊天然先生，時年92歲，是甘肅省參事室離休幹部。當我把陳長捷在回憶錄裏說的話告訴他時，他勃然大怒，怒斥陳長捷：“他放屁！”

曾經有兩位我非常敬重的抗戰史專家，馬仲廉先生和羅煥章先生，當我的問題使他們語塞時，他們都不約而同地對我說過：自己是研究八路軍、新四軍軍史的，對抗日戰爭正面戰場的史料接觸不多。可是，抗戰時，國、共是並肩戰鬥過的戰友，現在研究這段抗戰歷史，怎麼就把正面戰場和游擊戰場分得那麼清楚？再說，即使是游擊戰，也並不是共產黨一家打游擊呀？

這一切都因為，這麼多年來，我們沒有站在民族的角度，站在大中華的角度來探究和詮釋抗日戰爭。

2005年，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曾景忠先生在《大歷史觀下的抗戰史》一文中指出：“對抗日戰爭史的研究，存在一個從什麼



這是平型關一帶的舊長城。抗戰時，中國軍民曾用血肉築成新的長城。

視角來分析研究、考量的問題，即：是從對某一個政黨力量發展的利害出發，還是從全民族的利害出發來研究之區別”。我相信，廣大群眾希望看到一部真實的、客觀的抗日戰爭史；一部能存於史冊永不褪色，永遠激勵中華民族奮進的抗日戰爭史。

平型關大捷紀念館定會改名

以下提幾個具體問題：

一、我們今天參觀平型關大捷紀念館很有意義，因為八路軍115師大捷，是一場成功的以弱勝強的伏擊戰。但只紀念這一“大捷”，隻字不提其它軍隊的堅守和犧牲，甚至以“平型關大捷”取代規模大得多的“平型關戰役”，能讓處在信息時代裏的青年一代信服嗎？平型關戰役歷時10天，115師的平型關大捷只是其中幾個小時；中國軍隊在平型關傷亡成千上萬將士，115師只佔其中800餘名；平型關戰役阻滯了至少5～7千名日軍的進攻，平型關大捷面對幾何？我相信，未來某日，這個平型關大捷紀念館一定會更名為“平型關戰役紀念館”，八路軍的平型關大捷會是其中主要的內容，但不是唯一

的內容。

二、就說紀念平型關大捷，也不能只說 115 師。如果沒有 9 月 22 日至 9 月 25 日 84 師和獨 8 旅在東跑池、團城口的拚死防守，日寇早就直驅大營，115 師的這個伏擊戰還能打嗎？再者，從平型關戰役一開始，林彪就派聯絡參謀與 84 師和獨八旅聯絡。如果沒有 84 師的數日堅守，林彪怎麼能放心大膽地設伏出擊？從 1937 年 9 月 26 日起，中共宣傳口徑一直也說：“高桂滋將軍率領的一部分部隊阻斷了日軍的主要進軍路線，八路軍的兩個旅悄悄地包抄到日軍的後部，然後給阪垣的隊伍以出其不意的打擊。”84 師和 115 師是在同一時間、不同側面、共同戰鬥的兩支部隊，講平型關大捷，沒有理由不提 84 師的犧牲。

三、平型關大捷是八路軍參戰後的第一戰，又是發揮作用最大、顯示其作戰風格最好的一戰，應該說是抗日戰爭中最好的“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案例，但是在新華網的“抗日戰爭十大戰役”資料中，隻字未提在平型關大捷中的國共合作問題。而把“國共合作典型”的桂冠給了忻口戰役——難道，八路軍在忻口戰役中發揮的作用能比平型關戰役更大？

最後，讓我們一起對在抗日戰爭中犧牲的所有將士致敬、致哀，願他們在九泉之下安息。

（本文是 2012 年 9 月 25 日，作者參加在山西繁峙舉行的平型關大捷學術研討會的發言稿）（高士潔） □

魏斐德對我說，你明白我們為什麼要窮追不捨，到燈光昏暗的地下室、到空氣閉塞的閣樓翻找檔案了吧。沒有掃描儀，沒有複印機，全靠抄寫。為什麼堅持下來？就是這些檔案所透露的歷史奧秘吸引著我們啊！

歷史敘述的奧秘何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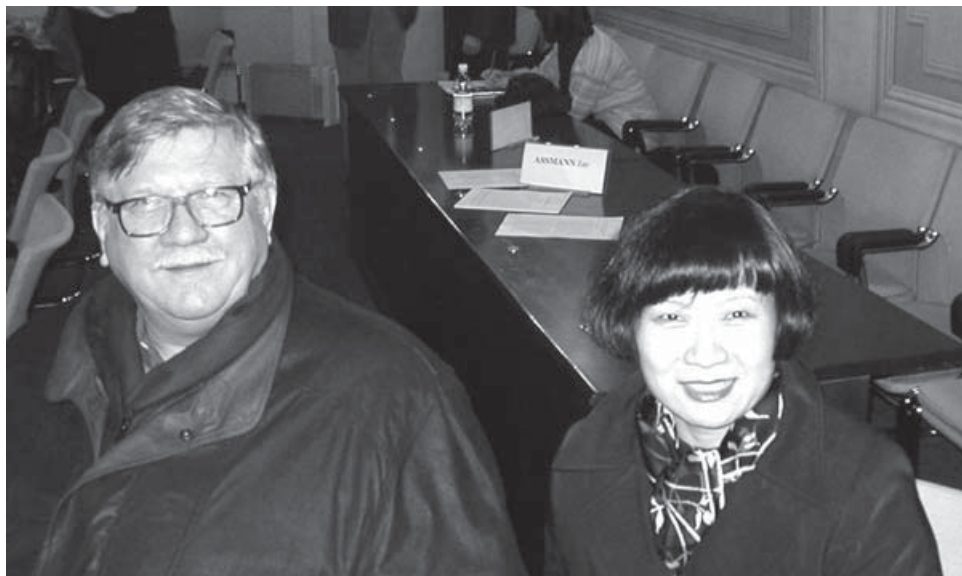
美國歷史學家魏斐德遺孀梁禾博士一席談

對魏斐德 (Frederic Wakeman Jr., 1937–2006) 這個名字，中國人不算陌生了，史學界人士更熟悉了這位已故柏克萊加州大學哈斯講座教授、東亞研究所所長。他不僅是美國當代最著名的歷史學家之一，曾任美國社會科學理事會主席、美國歷史家協會主席；而且也是中美文化交流的奠基人之一，他的學術成就主要是研究中國史——從清朝開國歷史，到戴笠和國民黨特工。近年來，隨著中國大陸出版魏斐德一部部專著，人們也慢慢熟悉了他晚年的伴侶、他的助手兼部分作品的中譯者梁禾。

2012年4月5日，《新史記》記者通過電話專訪居住在加州的梁禾博士。

梁禾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畢業於北京外國語大學，而後赴美留學獲意大利文學博士，在美國諸大學執教十多年，並長期從事意大利文和英文經典著作的翻譯和文學評論。魏斐德逝世後，她整理、翻譯其遺著，是中英文版《講述中國歷史》和《紅星照耀上海城》的主編。

與其說是對梁禾專訪，不如說是聽梁禾闡發。《新史記》記者提前準備了一個採訪提綱，用電子郵件發給梁禾，但在電話交談中，快人快



魏斐德與梁禾夫婦。

語的梁禾無須記者提問來開啓思路，無數感受、穎悟與印象在她胸中積攢了太久，仿佛決堤洪水，滔滔奔湧。

原來歷史可以這麼敘述

首先我得說，我是文學人，卻不是史學工作者，只是跟著先生，一點一點地懂了很多，對歷史敘述也有了感覺。

敘述一個憑空想象的故事，與歷史也就是“一線之隔”，這個“一線”，就是 possibility（可能性）。小說是寫出一種可能性，歷史就是可能性變成了現實。但是如何客觀地將史實敘述出來，很需要功夫——一線之隔的小說那一邊可以有充分的想象空間，歷史這一邊就有很多約束。

我本來對文學感興趣，進入歷史之後，歷史書讓我感到了份量和魅力。精彩的歷史敘述讓人們身臨其境，可把遙遠的故事帶到我們今天的生活之中，而這個敘事本身應該能向人闡明為什麼要

瞭解、要關注那一段過去歲月。這是我跟著先生——包括在他身後——學到的一點心得：歷史敘述的奧秘何在。

斐德非常有熱忱，他認為熱忱是人生的一種資源。但作為歷史學家，光有熱忱還不夠，還得有想像力和判斷力，置身於自己所研究的歷史場景之中，才能在筆下展現久遠的往昔。他講述元朝入侵中原，他寫康熙皇帝射箭膂力如何驚人，如何一定要出去騎馬，詳細描繪拉弓的力度，射箭的準確，馬如何強壯，人如何勇猛……想像力的來源，就是他對日常生活細節的興趣。他喜歡中國歷史，也喜歡中國人，體會到中國人不像西方人那樣溢於言表，謙卑的表象下很有深度，需要去挖掘——熱忱和想象，是史學家的要素。

很多史學界人士說，跟著魏教授才明白：原來歷史可以這麼敘述！我讀中學時老師一講歷史，我的腦子就不轉了——不是皇帝就是朝代，春秋戰國、焚書坑儒……跟我有什麼關係？記那些東西幹嘛？歷史對我來說，就是一堆僵死數據的羅列、或者博物館的刻板解說。歷史是我當時學得最差的一門課！

他忙他的歷史，我讀我的文學

我後來陶醉在文藝復興時期的雕塑、繪畫和音樂和論文裏，那些論文都寫得很美，對人性有很深洞察，絕不像中國那些八股。與斐德結婚之後，他忙他的歷史，我讀我的文學。後來跟他參加一些活動，在他引導下認識了一大批中國歷史學者和西方研究中國的學者。他寫了東西，會給我看，聊這些話題，一點一點將我吸引進去。

我與他認識，是在美國北卡一個國家人文中心（National Humanity Center），這個機構每年資助一些學者到這裏交流和研究。1990年時，我先生——那時還不是我的先生——受邀在那兒寫出了“上海三部曲”的第一部《上海警察》。我那時在位於北卡的杜克大學和北卡大學兩邊同時當講師，一邊還在寫博士論文，日程緊張得要命，個人生活壓縮到零……那時美國東岸研究中國的學者不多，魏斐德從加州來到這邊，中心讓我也參加接待。我開頭沒同意，

哪抽得出空兒啊。可他們不停打來電話堅持要我去，我只好去了。一進門，看見正坐在沙發上的斐德，一下就打動了我，可以說一見鍾情吧，儘管那時我有歸屬，有很愛我的丈夫。

魏斐德與東岸學者很不同，那些教授等級森嚴，打著領帶，褲縫筆挺，他穿著很隨意，一看就是充滿活力那種類型。我那時靠意大利語在學術圈生存，英文還在趕緊學，但他特別能理解我和另一個中國人的窘迫，也不管周圍很多教授，馬上就來照顧“弱勢群體”，跟我們講起中文——北京話。他的中文，先在美國的語言中心學了一點，然後到台灣待了四年，在那裡做研究，領導斯坦福大學在台灣語言中心，自己請了一位愛新覺羅家族的親屬、1949年之後流落到台灣的孫老師給他上中文課。他的國語發音比你我還標準，字正腔圓，一見中國人開口是這麼個味兒：“這位您怎麼樣啊？”他學了文言文，馬上就用，到布店裏就說：“吾欲買帛。”（笑）

與鄧小平握手說“醬油醬油”

他從哈佛畢業之後就到了法國政治學院拿到碩士。冷戰時期中美是敵對的，斐德認為，政治上的敵對，很多情況之下都是因為不瞭解。究竟是不是敵人？如何化解敵意？第一步是要去瞭解，這是知識群體首要的責任。他說，對太平洋彼岸一個遙遠、陌生的國家，敵對了半天，我們得先搞清楚啊。後來像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衝突，幾次試圖和解都失敗，他也說，可惜到了晚年，要是還年輕，我就去學阿拉伯文，把穆斯林文化搞清楚。

當年中國不允許美國人進去，他就從歷史開始：掌握他們的語言，看他們怎麼敘述自己的故事？他在法國不覺得有挑戰，他的法文說得跟法國人一樣好；他覺得還是學中文好，更有挑戰，更新鮮，別人也不會將他當中國人，長著一張西方面孔麼。

他最大的洋相是那次接待鄧小平，握手時想說“久仰久仰”，一不小心，說成“醬油醬油”了！鄧小平看著他，他想，壞了，這兩個詞又搞混了，趕快說“久仰”，鄧小平才釋然。

七十年代初，他出版《中華帝國的衰落》，經久不衰，到現在還是美國和西方大學的教材，中文版最近又出了簡、繁體版；關於中國當代，寫過論文總有幾百篇吧；五部書：“上海三部曲”，《間諜王——戴笠和國民黨特工》，還寫過《歷史與意志——毛澤東思想的哲學透視》。他說，中國上個世紀經歷過三次革命，建立三個政權：1911年推翻滿清之後袁世凱領導的共和國，1927年蔣介石與中共決裂之後領導的民國，1949年中共建立的新政權。他研究蔣介石政權南京十年的書，就是《上海警察》。斐德認為，政權的形成和解構、維持和崩潰，有很多方面值得探究，蔣介石的首都是在南京，但是經濟基礎是在國際性大都市上海。蔣管理統治的秘訣，體現在這裏。推翻政權，奪取政權，相對來說還比較容易，但是要維持政權，是更大的考驗。從這個意義上講，警察的作用就很重要了。

《上海警察》敘述的是1927年到1937年；第二部《上海歹土》雖然短，寫的是一個最複雜的汪精衛時期。“歹土”指的滬西一帶，當初很荒涼混亂，有英租界，法租界，也有中國人地盤，這裏有傀儡政府，李士群的“76號”，有國民黨和中共地下黨，政治暗殺十分血腥。警察如何在其中運作？

為汪精衛留下重新詮釋的空間

有意思的是，他完成這部書是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末，中國朝野對汪精衛有固定的看法：大漢奸，傀儡政府頭兒。但斐德憑著歷史學家的敏感，為汪精衛留下了一個重新定位和詮釋的空間：假若歷史資料全部公開，他並不是像人們想象的那樣就是一個徹頭徹尾的漢奸。這是斐德的睿智，他寫到汪精衛，認為不那麼簡單，“漢奸”是打引號的。汪的特務頭子李士群怎麼會定期向潘漢年、向中共通報情況？每當日本人要到江蘇一帶清剿，李士群就會通知中共安全轉移。這是一種有組織的合作，不是潘漢年的個人魅力、搞好私人關係能解釋的。斐德有自己的解讀，不過，除非尋找到史料來證實，他不會說。他對汪精衛政權與中共、與潘漢年的關係很感興趣，

可惜他沒做完。

斐德不做 small talk, 他關注宏大敘事, 對比國民黨和中共政權: 國民黨蔣介石那些人多是受過高等教育、留學外國, 有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理念的召喚, 有精忠報國的精神, 共產黨與國民黨是難兄難弟, 連口號都一樣, 為什麼幾次國共合作, 都崩了? 他一直苦苦追尋答案。

魏斐德寫上海的第三部《紅星照耀上海城》時, 發生了“911”, 隨後布什打響了伊拉克戰爭。美國軍隊很快打下了巴格達, 但我們都看到了, 真正的挑戰是打下之後怎麼辦? 中國的 1949 年, 是兩個政治勢力更複雜的博弈。上海市民雖然擁護共產黨, 但是這個城市畢竟在國民黨手裏管治了那麼多年。政權交替基本順利, 斐德非常關注, 怎麼做到的? 農村包圍城市, 最後怎麼征服城市? 他認為, 不亞於農村包圍城市重要性的, 就是城市的地下工作, 是周恩來、潘漢年他們領導的滲透和策反。

中共滲透之成功, 間諜之無孔不入, 策反對象之廣泛, 級別之高……是世間政治對壘中很少見的。湯恩伯的機要秘書, 竟然是周恩來的親信; 楊度是袁世凱的幕僚、杜月笙的座上客, 居然會是共產黨人; 我還看到材料, 呂正操去世前向中央報告: 張學良早就加入中共……

多少政權在崩潰時, 不甘心新政權來接管, 就全炸了燒了, 留下一片廢墟。可上海沒有這樣。若中共沒有打入警察內部, 潛伏多少年, 不斷地瞭解內情、進行宣傳、策反, 做好鋪墊, 怎能在解放關頭, 一舉接管全部警察?

中共出奇制勝的一招, 就是控制警察。到後來, 對軍警控制運用得非常專業化, 成為維持政權的關鍵。斐德從這裏看到的, 正是政權的維持、鞏固、崩壞的折射。

在寫“上海三部曲”的過程當中, 他寫了戴笠和國民黨特工。魏斐德的一位學生, 也是後來的柏克萊同事, 來自台灣政治人物家庭, 她為斐德打開了一些台灣的門窗, 他可以去查閱到別人無法看到的台灣部分機要資料。去年辛亥百年, 台灣當局公布了軍統全部

檔案，人們發現，全世界寫戴笠的書和文章那麼多，唯獨魏斐德的這本經得起檔案的驗證。

警察管治安，還管思想

你問到新舊時代警察的異同。汪精衛的警察與國民黨時期不同，因為那時有多種政治力量；共產黨的警察厲害在哪兒？全面地繼承了日本人的保甲制和警察職能，表現在警察與居委會的密切結合。戶籍警與戶口制比日本人統治還嚴格，最有效地控制了人口流動。“小腳偵緝隊”非常厲害，全方位地觀察所有市民家裏一舉一動。將張家長李家短都制度化了。他們匯報給誰？給警察。警察又被政治化了，不單是執行法律、維持治安，而是要控制思想，這與過去國民黨時期就很不同了。在過去、在其它國家，來了客人，是什麼政治觀點，與警察沒有什麼關係；但是在中共治下，警察要管你的思想，還要管你的客人的思想。

在今天，這種控制更加強了。警察的搜查、監控、盤查更任意化，還延伸到網絡空間。

我們跟大陸合作很長時間了，幾本書都在中國大陸出版過，但後來發現他們有刪節。刪節什麼呢？我先生是很嚴謹的學者，他敘述了中共改造警察、治理上海的成功之後，提出代價問題——取得任何成功，都要花代價。過去中共在上海潛伏、策反，當奪得上海之後，毛澤東猜度國民黨一定也這麼幹，潛伏、破壞，甚至滲透到我們高層。大軍進城時，地下黨起了很大作用，革命成功了，毛澤東不需要這些人了，白區地下黨人，就一個個被革命吞噬了、排除了。其中就有潘漢年。潘漢年領導了對國民黨警察的瓦解、策反，接管上海才如此平穩；但他的下場那麼慘！

歷史檔案魅力何在？

魏斐德關注潘漢年是早年埋下的種籽。八十年代，他曾經被

醞釀提名當美國駐華大使，後來因為共和黨和民主黨的黨派之爭，他被左審右審弄得很累，最後覺得搞政治，時間和空間的限制太嚴格，還是當學者吧。他在美國駐北京大使館籌建文化處，又被北大周培源校長親自請去，成了北大第一個教中國歷史的外國教授。他興奮得很，騎著自行車在北京大街小巷游逛，天冷了，他跟北京老百姓一樣，戴上大口罩，穿上厚厚幾層棉毛褲……他瞭解到大量文化習俗的細節——歷史是要靠細節來支撐的。

那時他的前妻在北京外國語學院做外籍專家，正寫一部關於中國知識分子的傳記。北外的助教小馬來當翻譯，小馬的父親是潘漢年手下的特工，在秦城監獄關押很久，剛剛放出來。小馬跟斐德講起家世，斐德覺得這很有挖頭：在政治鬥爭中殺對方的奸細是最狠的，當奸細也最危險，結果他們沒有倒在國民黨刀下，卻被自己這一方整得這麼慘！他從小馬的父親一步一步追索到潘漢年大案——斐德在北京關係也很多，跟方毅、章含之是好朋友，但大家談到潘漢年，都談虎色變，想看中組部的文件也看不著。越不讓看，就越要看！歷史學家最痛苦的就是檔案被封存不讓人看！他多方呼籲，又給檔案館長、給有關領導寫信，又在會上講會下講，促使中共開放資料。

他也從美國這方面找材料。當年的發小、同學，有的是美國蘇聯問題專家，斐德通過他們，獲得了克格勃的潘漢年、陳雲當年與共產國際聯繫的資料。後來我們還計劃到莫斯科去查檔案，但是葉利欽時代控制得很嚴，簽證特別複雜。到了普京時代，才發現這些資料很值錢，也可以交換。他這時已經只能坐輪椅了，到那些古老城市並不方便。後來對方寄過來很多資料，可惜他沒有來得及寫完。

潘漢年三十年代中期繞道抵達莫斯科，共產國際方面並不認識他，誰知道是什麼人派來的？要進行一系列 interview。看那份筆錄，我難以描述內心激動：我 1956 年出生時，故鄉的這位副市長就被抓走，誰也不知其下落，成為一個神秘甚至恐怖的疑團。突然我看到 20 多歲的潘漢年回答問題的筆跡！對方軟硬兼施要查他的

底細，他則想方設法贏得對方信任，又不能泄露自己黨的機密。在回答中他體現了尊嚴和很高的素質。我心潮澎湃。斐德對我說，你明白我們史學家為什麼要窮追不捨，到燈光昏暗的地下室、到空氣閉塞的閣樓翻找檔案了吧。沒有掃描儀，沒有複印機，全靠抄寫、拍照。為什麼我們堅持下來？就是這些檔案所透露的歷史奧秘吸引著我們啊！

沒有精神貴族，社會不會提升

斐德很大氣，很貴族氣——我說的不是裝束，而是精神上。每個人跟他打交道，都感覺是跟一個不凡的人打交道。他的文字也有一種貴族氣，中西方讀者都能感覺到。這來源於他深廣的知識底蘊，超越學院政治和各種利益的境界，還有精神上的大氣與豪邁：既然站到這個領域，就定要保持這個領域的高度。他踏實治學，不拉拉扯扯，不趨炎附勢，他認為搞裙帶呀、貓匿呀，專業質量就成了犧牲品。

所謂“貴族”，與“精英”概念還不一樣。有一定知識，就可以說是精英；但是貴族，是精神上的，氣質上的。斐德治學和做人緊密結合。他有理想，有做人原則，有責任感，有英雄主義。沒有精神貴族，這個社會是不會提升的！

1963年，他還在攻博士時，寫了篇小論文《一個歷史學家的肖像》，寫的是法國馬克·布勞克，布勞克對法國的深遠影響，不僅源於他本人對法國歷史的經典研究和培養了大批史學人才。1934年當布勞克終獲索邦大學經濟史講座教授席位，總算可以清靜地沉浸在專業生涯了，卻正如斐德告訴我們的：他作為榮譽軍團的騎兵出現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1939年，他雖已是六個孩子的父親，卻志願上前線抵抗德國法西斯，又參加了法國地下抵抗運動，最後被捕，被害。布勞克的精神一直激勵著斐德，從青年到老年。真誠熱愛史學的斐德堅定地認為：史學家必須要有良知，而不能只將歷史看成一個飯碗。

他認為，如果你有某種特別條件、渠道，能看到一些難得史料，披露出來，這只是一個工匠。談得上大師，得有通過敘事闡釋歷史的功力。後現代派有人認為，哪有什麼真實，真實都是人為的。但維柯在《新科學》中說，歷史是能夠探索真實的，因為歷史是我們自己走過的路途。學術並非道德至上、道德唯一，但是不能沒有道德的評判和堅守。

這種精神，在美國已經衰落，在中國就更匱乏了！

羅曼蒂克的傻瓜

斐德是一個真誠、憨厚的孩子。我跟他說，要吵架一定要用中文吵，若用英文吵，他就佔優勢；一開口用中文吵呢，他字正腔圓，我們就再也吵不下去了！

後現代的今天是不注重愛的時代，中國更每況愈下，30 年改革之後，商品經濟壓擠下，愛變得越來越生疏、越稀缺。但他自稱一輩子都是個羅曼蒂克的傻瓜，我跟他一樣，是個愛情至上主義者，為了愛情可以放棄一切既得利益，所以最終能走到一起。

剛才說，我們是一見鍾情，但我們當時各有羈絆，我的婚姻還沒結束——我前一次婚姻很溫馨，前夫非常優秀，對我非常好，他精通中英文，為我校譯……但我對他沒有那種 chemistry，我老認為自己情商比較低，不會愛，可又沒什麼理由去打破婚姻。斐德雖已經離婚，是獨身，但他這樣有魅力的男人很招女人愛，也在很麻煩的、痛苦的、藕斷絲連的關係中掙扎。他從小就跟著父母到處旅行，他是作為少年才子，進哈佛時才 16 歲。他認為自己的人生十分完滿，碰到我那會兒，愛情是他生活中唯一塌陷的角落，但他認命。我見到斐德，覺得冥冥中等待的人就在眼前，可我又覺得兩人太懸殊了，他是學術大師，我連博士都還沒拿到，在全世界勢利的眼光看來，想必我看上的是他的權力、地位、名聲……我很怕輿論！

這個時候發生了一件事：斐德開刀出了醫療事故，左腿一條神經被切斷了，他再也不能站立，只能坐輪椅。我為此焦慮痛苦，我

的前夫看到就說：三個人痛苦不如兩個人幸福，你去吧，我來處理善後。

很偶然地，斐德與前夫見面了，我做了介紹，他們談了十分鐘，分手之後，我坐上斐德的車，他沈默許久，對我說：你為我竟然放棄了這麼好的一個男人！真不敢相信！前夫給斐德的震撼遠超我的想象。

因為斐德殘疾，我們的生活當然受到限制；在心理上卻是無邊無際的。我真不知道我有這麼大的能耐，而且這麼快樂，為他做所有的事我都願意。別人也對他說：你失去一條腿，但是你找到了真的愛情。在一次學術年會上人們對斐德和我的新婚聚會祝賀，要斐德致辭，本來他是見慣大場面，很會講話的人，卻泣不成聲。我只好拿起話筒自我介紹：我不是學中文的，也不是他的學生，又拿自己開玩笑。沒想到人們熱烈鼓掌，排隊來跟我擁抱祝福……

斐德是個航海家，過去駕船的能力很強，他也有船，他不喜歡小港灣，喜歡到大海。他一條腿沒了，我就要彌補，要讓他恢復旅行能力。好在他是左腿壞了，右腿開車沒問題。我們北到溫哥華，南到墨西哥邊境、聖地亞哥，在加州一號公路上，一邊是懸崖峭壁，一邊是茫茫大海和田園農舍……世界如此壯觀，時光如此美麗！

那時我就預感到他的生命不會太長，他自己也知道。看到我教書跑去跑來，就問我：我們都不是很追求物質的人，如果你喜歡教書，那麼就去幹吧；但是你最喜歡做什麼？

我最喜歡寫作，最喜歡跟他在一起。而教書評職稱，就得忽略自己真正喜歡的東西，我們的生活也受到很大限制，何苦呢！與他在在一起的時間不是很多了，一天必須要當 48 小時來珍惜，我毅然辭掉了教職。自由了！我們到了台灣、里斯本……

許多人有愛的能力，但沒機會開發。而我潛在的愛被開掘了，我非常感激。可它又這麼短促！（《新史記》記者 高伐林）□

張東蓀的平生得意之筆，不是什麼學術成就，而是“倡議罷兵，以保全人民古物”，“一言得解”古都的兵燹之災，既消滅了傅作義那隻“老鼠”，又保存了北平那個“精美的花瓶”，於是特地把友人吹捧他的詩裱褙成幅，“留示子孫”。可惜這不過是彌天大謊

張東蓀 “保全北平人民古物”真相

張東蓀的“平生第一快事”

張東蓀是誰？今天的讀者可能沒幾個人知道，然而此人也曾在“天翻地覆慨而慷”之際，為中共上台立下了汗馬功勞，連《毛澤東年譜》都留下了他的芳名。

《毛澤東年譜》第一次提到他時這麼說：

“1941年12月10日，根據毛澤東對國社黨的估計，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對國社黨的策略的指示。指示說：最近國社黨張東蓀、湯薌銘等在北平向中共提出所謂兩黨合作抗戰綱領，主張經濟上以社會主義為原則，採取計劃經濟，實現農業集體化。這完全是托派的主張，是挑撥中共與地主資產階級的關係，以孤立我黨的陰謀。國社黨是一個極端投機取巧的集團，它有時以右的面貌出現，從國民黨方面挑撥國共關係；有時以‘左’的面貌出現，企圖從共產黨方面離間國共關係。因此，我們對於國社黨應嚴加警惕，不應與他們簽訂任何政治文件，但不在報紙上公開反對國社黨。”（注1）

所以，張東蓀讓毛痛罵，是因為他在中共尚在叫賣所謂“新民



張東蓀

主義”時，便搶先提出了共黨的治國綱領（毛所謂“托派的主張”也就是斯大林的主張，因而也就是毛澤東的主張，凡是看過拙著《野蠻的俄羅斯》的讀者想來都該知道這點），因此引來偉大領袖的嫉恨。

但《年譜》第二次提到張東蓀時，毛的態度就完全變了：

“1948年4月27日 寫信給晉察冀中央局城市工作部部長劉仁，請他經過妥善辦法告訴張東蓀、符定一，感謝他們的來信，對他們的一切愛國民主活動表示熱烈同情，並邀請他們二位及許德珩、吳晗等民主人士來解放區參加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的代表會議，討論召開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和關於加強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的合作及綱領政策問題。會議名稱擬稱為政治協商會議，開會地點在哈爾濱，開會時間在今年秋季。會議的決議必須參加會議的每一單位自願同意，不得強制。”

該條原注：

“張東蓀，燕京大學教授，曾是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常委。1946年參加中國民主社會黨，為主要領導人之一，11月因反對民社黨參加

偽國大，宣布退出該黨。”（注2）

在此信中，毛對張東蓀、符定一的特殊垂青，甚至超過了對當時更有名望的“民主黨派”領袖張瀾、沈鈞儒、黃炎培等人。這是為什麼？符定一還可解釋為毛念其與他的師生之情，張東蓀又是靠什麼掙到了這份殊榮？《年譜》的注解其實已洩露了此中消息。

國社黨是張君勱與張東蓀成立的，早在1938年便為國府承認，是參加國民參政會的黨派之一。張君勱是中華民國遷台前的最後一部憲法的主持起草人。該憲法雖不得不秉承孫文“五權憲法”思想，製造出迭床架屋的國家機構，但對人民的權利的界定與具體保護措施非常完備具體，在這方面堪稱中國有過的最理想的憲法，遠勝1923年的《中華民國憲法》。1941年，國社黨與其他政黨結成民盟（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抗戰勝利後，國社黨退出民盟，與民主憲政黨合併，改名“中國民主社會黨”，張君勱為黨主席，張東蓀也是主要負責人之一。1946年11月，該黨決定參加制憲國民大會。張東蓀為此與張君勱決裂，公開宣布退出民社黨，加入民盟，抵制國民大會。

張東蓀是在什麼時代背景下，作出這旗幟鮮明的政治表態的？

1946年1月10日，國共兩黨正式簽署停戰協定。協定明文規定：

“（一）一切戰鬥行動立即停止”；“（二）所有中國境內軍事調動一律停止”；“（三）破壞與阻礙一切交通線之行動必須停止”。但有一條關鍵但書：“上開停止衝突命令第二節，對國民政府軍隊，為恢復中國主權而開入東北九省或東北九省境內調動並不影響。”（注3）

停戰令於13日午夜生效。然而僅僅兩個月後，中共便在蘇聯人唆使下公然踐踏協定。3月17日，毛澤東電令東北局：“速與辰兄（蘆注：指蘇聯）接洽，將整個中東路（包括哈市）讓我駐兵，永遠占住，不讓國民黨駐一兵一卒”（注4）。共軍隨即攻佔已為國府依法接收的四平、長春、哈爾濱、齊齊哈爾等城市，並按毛的命令大肆破壞北寧路與長春路。林彪還執行了毛澤東死守四平的命令，在四平阻擊北上接收的國軍，揭開了全面內戰的序幕。

待到國軍大敗林彪後，毛為了報復國府，下令在關內大打，除命

令共軍在關內破路，還要求他們“破路應十分徹底，務使長期不能修復”，並指定必須攻佔的城市：山東共軍攻取泰安、大汶口、張店、周村、德州、棗莊等地，而晉冀魯豫的共軍則必須攻取長恒、考城、永年、聊城四處。（注 5）

這些行為公然踐踏了共產黨人簽字畫押的《停戰協定》，尤其是其中“破壞與阻礙一切交通線之行動必須停止”的規定。而這是任何一個主權政府都不能坐視的：鐵路交通一旦癱瘓，國府漫說再無可能向東北增兵完成接收，就連國民經濟都要崩潰。此令下後一個月，其強大威力就顯示出來了。6月19日，徐永昌在謁見蔣介石時就指出：“共黨果有意稍事相安，似應知難而止。否則我人當毅然進剿。今日不辦，僅就斷交通厄我經濟一事，即倒政府而有餘。”（注 6）

然而中共並未“知難而止”，卻在當天就發起了晉西戰役。毛澤東也在同一天決定在全國大打（注 7），緊接著就為共軍規定了“北線奪取三路四城，南線三軍奪取津浦線”的戰略目標（注 8）。全面內戰迅即開場，抗戰後和平民主建國的希望就此斷送。

當時的資訊是公開透明的，張東蓀應該完全知道共黨上述違約行為。在此情況下，他卻公開反對國府實行憲政，甚至不惜退出他參與創建與領導的民社黨，中共當然要心花怒放。周恩來就曾把“第三方面大部分人居然敢於反對蔣記國大，跟著我們走了”，視為“八年抗戰和最近一年來談判的成果”。（注 9）

到了1947年，中共乾脆拋下了“新民主主義”面具，在華北“村村點火，戶戶冒煙”，“在肉體上消滅地主，經濟上消滅富農”（注 10），大批難民湧入城市，無家可歸，啼饑號寒，反復向政府哭訴求援。張東蓀絕無可能對此一無所知，然而他卻在1948年4月間與符定一一道給毛寫信，令毛龍顏大悅。毛不僅在4月27日命令部下感謝張、符，邀請他們和其他“民主人士”到哈爾濱去出席政治協商會議，更在5月31日寫信給劉少奇等人，要他們將張東蓀、吳晗、許德珩等儘快從平、津接出來，選為華北行政機構的委員，並有一二人任部長，一二人任副部長。（注 11）



戴晴著《在如來佛掌中》。

那封信究竟寫了什麼，能如此立竿見影地為張東蓀掙來高官厚爵？

戴晴注意到，在此之前，毛用來拉攏“民主黨派”的口號一直是“民主聯合政府”，從未提到過召開政協。直到1948年5月25日，毛還在策劃邀請中間黨派與民眾團體代表人物到解放區，商討關於召開人民代表大會並成立臨時中央政府的問題，但兩天之後，在上引毛給劉仁的信中，這“人民代表大會”就突然變成了“政治協商會議”。此後中共就把“聯合政府”的口號悄悄收拾起來，再也不提了。戴晴據此推測，召開“新政協”這一主意，就是張東蓀在寫給毛的那封信裏提出的，而這就是毛後來為何要把“目擊、協調和平和談”的歷史榮譽“送”給他，那其實是以此作為對他獻策的答謝。（注12）

從考證角度來看，戴晴這一推斷極有說服力，而張東蓀給毛獻的這一密計，在政治策略上確實極為高明。無論是對中共還是對他本人都極為有利，當然要贏得毛的垂青。

1946年1月，根據《雙十協定》的有關規定，由各派政治勢力

參加的政治協商會議在重慶召開，準備成立民主聯合政府，並制定憲法。但因中共為維護其根據地的獨立，堅持要求地方制訂法規不需要中央事先設置原則，地方法官應由民選。雙方無法就此達成協議，談判遷延不決。內戰爆發後，政治協商會議無疾而終。

把毛原來擬議的“人民代表大會”，改為“政治協商會議”的名號，張東蓀就可以證明，他當年抵制國大的行為是正確的，國民黨才是政治協商會議的破壞者，只有在排除這一障礙後，才能實現和平民主建國的原定目標。

這一旗幟更能給中共帶來巨大的好處。中共不僅就此成了抗戰後為各黨各派熱心擁護的和平民主建國的正統傳人，而且可以藉此平滑地完成戰略任務轉換。當年中共之所以願意與國府和平協商分肥，是因為斯大林釜底抽薪，不許毛澤東發動內戰。毛自忖沒有蘇聯支持無法奪取天下，只好同意和談，與國民黨分享政權。但內戰打到1948年時，中共節節勝利，奪取全國已在望中，豈還會再對“聯合政府”有興趣？重新打出“政協”這個舊招牌，總算是在外表上保留了點原來的政治主張，使得自己的華麗轉身顯得不是那麼突兀，以免讓人覺得“子係山中狼，得志便猖狂”。

這個妙計的妙用還不僅此。待到中共掌權後，再“選”出個“人民代表大會”作為“最高權力機構”，政協也就自動喪失“立法權”，連橡皮圖章都沒資格當，只能變成廢品收購站。而當初為“民主政府”裝飾門面的“民主黨派人士”，當然也就自動喪失了“民意代表”身分，淪為被中共慷慨慈悲地“養起來”的廢物。

當然，最後這一條倒絕不可能是張東蓀獻策的意圖，其實為他始料未及。他的初衷，估計不過是要藉此洗刷中共與他本人聯手破壞和平民主建國的罪責，在歷史上留個好名聲罷了。

張東蓀為什麼要這麼做？在歷史的關鍵時刻，他為何要反對和平民主建國，為此不惜與幾十年的老友張君勱分道揚鑣，斷然退出了他與張君勱組建的社民黨，與民盟一致抵制“偽國大”，最後更公開投入中共懷抱？

這是一個令人簡直無法猜出的謎。如果說那是共黨搞的那套

恰與他本人“經濟上以社會主義為原則，採取計劃經濟，實現農業集體化”的“托派的主張”暗合，引起了他的共鳴的話，那麼，張君勱的抉擇又該作何解釋？張君勱與他的社會改革主張完全一致，同樣主張社會主義，同樣也對國民黨不滿，但仍然選擇了與國民黨合作，致力於憲政建設。他這麼做，當然是因為知道國共的根本區別：國民黨充其量也就是“不民主”，而共產黨則是“反民主”。不民主可以用和平手段改造為民主，而對反民主就再無辦法了（這就是中國今日陷入的不能自拔的困境）。

但張君勱知道這些，張東蓀又何嘗不知道？早在 20 年代，他就聲稱“吾知過激主義不來中國則已，來則必無法救藥矣。”（注 13）在 30 年代，他在公開講演中揭露抨擊蘇聯的文化專制制度，質問道：十八世紀教廷的荒謬固然應該攻擊，難道紅色政權如此荒謬就不應該揭穿麼？他反對主辦教育者為了自己的目的，就“隨便把人當作軟膏來捏”，譴責俄國是一個人性的“大試驗場”，歷數“無產階級專政學說”在理論上的荒謬，直斥：“豈非白晝見鬼之說耶？”他還指出，馬克思此論“只是一時情感的衝動，並不含理性在內，最可憐的是……俄國數千百萬生命遂斷送於此一言之中”，甚至犀利準確地指出，共產黨“對於黨外的人只講利用，指認為工具。換言之，即對於黨外無真誠只有詐偽。在我們看來，這種黨團作用實在是一個毀壞人類天真性情的東西”。（注 14）

很難想像一個對共產主義運動的理論與實踐有如此深入、冷靜、全面的認識的人，還會在那歷史的關鍵時刻作出這種完全違反既往認知的抉擇。早在 1934 年他就說出：“如有人要我在共產主義與法西斯主義兩者當中選擇其一，我就會覺得這無異於選擇槍斃與絞刑。”（注 15）那他怎麼又會在 10 多年後唾棄民主憲政（哪怕是假的也罷，畢竟還有假戲真做、弄假成真的可能，而在反民主的中共治下就連說說這倆字都是罪），主動選擇槍斃呢？

這是為什麼？是因為張東蓀權慾薰心，利令智昏，忘掉了共產黨“對於黨外無真誠只有詐偽”，錯誤地以為投共後更能青雲直上？還是因為他在抗戰期間坐過牢，從此心態嚴重失常，完全喪失了是非善



張君勱曾與張東蓀創建社民黨，最後分道揚鑣。

惡感，竟認為“如果在短期內，國民黨把共產黨剿平了，老百姓總可忍受；同樣共產黨如能很快把國民黨推翻，我們亦決不反對。解決總是好的，不拘哪一途”（注 16），只求內戰迅速結束，不問是非與後果如何？

這兩種原因可能都同時存在。張看來是個權欲薰心的人。中共特工要他去策反傅作義時，他提出的條件就是要成立華北聯合政府（注 17）；因為參與策反傅作義，他被毛澤東封為功臣，在民盟中地位陡升，為此非常得意，頗有“一闊臉就變”之風（見後）。直到 1950 年，他還一廂情願地認為共產黨是現實的，將來情形一變，民主人士必有見重的地方，甚至還圈定了他將來要“見重”的政協委員名單（注 18）。因此，為了功名利祿拋棄良知，對這位“哲學家”來說並不是不可能的事。

另一方面，在其政治活動中，張也確曾表現出縱橫捭闔、朝秦暮楚、毫無原則的鮮明特點。他在抗戰中與中共特工秘密勾結，送學生去參加八路軍，向中共提供國民黨的重大政治情報，圖謀策反山東偽軍，協助共軍阻擋國軍北上……在日本投降後還執行了毛澤東搶奪全國的大戰略，受命“聯絡當時北平的一些民主人士幫助中共受降”。舊政協召開後，他擔任軍事組召集人，每次找蔣介石談話都

要先徵求共產黨意見，完全是個沒有正式名分的中共特務；另一面，他又為國民黨搶佔東北出謀劃策，獻的計還非常高明，可惜未被國府聽取；轉過來，他又要美國去壓國民黨對中共讓步。待中共執政後，他又讓某個被他視為雙面間諜的人向美國人傳話：若日後打起仗來，希望美國不要打中國，美國應該把蔣匪阻住，不要它進來。此後他又向那位“兩面間諜”洩露國家財政機密，甚至洩露中共即將出兵朝鮮的軍事機密（注 19）。案發後，周恩來披露，張在“解放”前與美、日、蔣、共四方面都有聯繫（注 20）。這話未必全是捕風捉影。張的社會關係與秘密活動實在是太多太複雜了，而且根本就看不出其間貫穿著什麼不變的道義原則。

不管他的具體考慮如何，毛對張的投效非常欣賞。而張也不負君父之望，與中共特工聯手，參與了策反傅作義，更是令“天子非常賜顏色”。毛給了二張這對“現代管寧華歆”截然不同的待遇：張君勳成了被中共通緝的“戰犯”，不得不亡命天涯；而張東蓀則成了“資產階級左派”代表人物（注 21）與中共開國功臣。中共建國前，一次在頤和園開會，毛站起來翹起大拇指說：“北平和平解放，張先生第一功。”會後張找到毛，表示這樣說不合適，為北平和平解放盡力者大有人在，“這樣說，我要得罪許多人了”。毛答道：得罪人是我得罪人，和你無關。（注 22）

毛不但在會場上當眾欽賜“首功”的至榮，還是特地站起來翹著大拇指說的，而且還在會後拒絕張的謙辭。如此隆恩，在黨國內堪稱罕見。無怪乎張東蓀要為此醉意陶然。據張家的世交藍公武的公子藍英年披露：

“張東蓀見證了《會談紀要》草簽的過程，認為自己做了件了不起的大事，得意洋洋。返回燕京大學的當天晚上，張東蓀在燕大禮堂作了著名的《老鼠與花瓶》的演講：‘北平是個花瓶，傅作義是瓶子裏的老鼠。老鼠是可惡的，人人都想消滅它，但它卻躲在一個精美的花瓶中；既要消滅老鼠，又要不打碎花瓶，就不得不採用和平方式，用和談的辦法解決。’朋友們紛紛寫詩讚揚張東蓀的功績，他把這些詩以《圍城題記》為標題，親手抄錄下來，並寫了後記，準備留



1949年3月25日，毛澤東從河北省西柏坡到達北平。圖為毛同民主黨派負責人和其他民主人士在西苑機場。左二為張東蓀。

給子孫。他寫道：‘戊子冬，北平圍城。余與劉厚同、趙少伯、彭岳漁、張叢碧倡議罷兵，以保全人民古物。以余為雙方信任，使出城接洽。當時慮或不成，栗栗為懼，乃幸而一言得解。事後友人義之，有此題詠頌。余亦自謂生平著書十餘種，實不抵此一行也。因裝成幅，留示子孫。東蓀自識。’‘一言得解’，得意之情溢於言表。張東蓀不僅在知識分子眼中增加了威望，在民盟中的地位也躍升到第三位，僅次於張瀾和沈鈞儒，1949年9月30日被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張東蓀此時有些飄飄然了。建國後不久，父親到燕大東大地（燕東園34號）去看他，我也去了。午飯後，他上樓睡午覺，把父親擱下不管。儘管是多年老朋友，這樣做也算失禮。父親倒不計較，帶我到城府街遛彎，回到張府張東蓀才從樓上下來。”

（注23）

所以，作為一個讀書人，張東蓀的平生得意之筆，不是什麼學術成就，而是這“倡議罷兵，以保全人民古物”，因他“為雙方信任”，從而“一言得解”兵燹，既消滅了傅作義那隻“老鼠”，又保存了北平那

個“精美的花瓶”，所以認為“生平著書十餘種，實不抵此一行也”，於是特地把友人吹捧他的詩裱成幅，“留示子孫”，讓子子孫孫永遠為此驕傲下去。

可惜這不過是彌天大謊，北平的人民古物根本就不需要他去“保全”。他為中共立下的“第一功”，是幫著共軍消滅了傅作義那隻“可惡的老鼠”，使得國共實力對比出現了無法挽回的逆轉。

平津戰役前兩軍的戰略態勢

如所周知，國軍的主力是被“三大戰役”摧毀的。此前國軍雖迭遭共軍打擊，但主力尚未殘破，還可與共軍抗衡。最大的隱患是兵力分布太廣，因而其戰略態勢處於被動。當此之際，國府理應收縮兵力，縮短戰線，轉入戰略防禦，立足於南宋格局，確保淮河以南，力爭中原。

最主要的問題還是，國軍兵力當時的配置使用很不合理，四個重兵集團，一在東北（衛立煌集團），一在華北（傅作義集團），一在西北（胡宗南集團），一在中原（後來的劉峙－杜聿明集團）。其他三個集團都在與共軍的四個主力野戰軍交戰，只有華北集團處於閒置狀態。據官修軍史，國軍華北集團共 50 餘萬人，而據聶榮臻說則是 60 餘萬人，共 4 個兵團 12 個軍 43 個師，其中“蔣系”3 個兵團 8 個軍 25 個師，約占全部兵力的四分之三，而傅系有 1 個兵團 4 個軍 17 個師（旅）。傅作義坐擁 60 餘萬大軍，面對的不過是共軍三個兵團（注 24），因此實際上構成了國軍的戰略預備隊。

在此龐大的戰略預備隊投閒置散、無所事事之際，其他戰場的兵力卻十分吃緊，國共雙方其實都如此。淮海戰役是共軍動用兩個野戰軍打的，非常吃力，一度兵力嚴重不足。其所以獲勝，完全是因為是蔣介石中了劉斐與郭汝瑰的奸計，在國軍於 1948 年 11 月 30 日從徐州撤退後，又命令杜聿明率領的三個兵團共 30 多萬大軍停止向永城前進，轉向濉溪口，去解黃維兵團之圍，就此“豬羊走入屠宰家，一腳腳來尋死路”，自投羅網，被共軍包圍全殲。因此，共軍其實是



傅作義

險勝。

連外行都能看出，若是國府將傅作義集團的 60 萬大軍及時撤出華北，投入華中地區，拊華野後背，與劉峙集團南北策應，夾擊共軍，必將給正在全力進行淮海戰役的華野與中野以沉重打擊，於是華東國軍也就沒有必要撤出徐州，淮海戰役的結局就會完全兩樣。即使不能全殲或重創華野與中野，國軍的華北與華東兩個重兵集團會合後，固守淮河與長江，江南也不至於被共軍揮鞭而定。

毛澤東看出了這關鍵的一步棋。此前粟裕曾為他規劃了內戰大戰略，那就是集中兵力在中原打幾個大殲滅戰，力爭把國軍主力殲滅在江北。毛嘉納忠言，及時放棄了渡江冒險的戰略意圖，改為與蔣在中原逐鹿。此時他看出了國軍兵力分布的重大缺陷，很怕傅作義集團南撤。11 月 17 日，中央軍委發給東野、東北局與華北局的電報就說，“蔣系” 24 個師從華北海運江南，是蔣介石今天唯一可以使用的機動兵力。不論他將這個兵力使用於防守江南，還是先使用於淮海戰場，接出徐州劉峙集團主力，然後集中約 90 個師的兵力布防長江下游兩岸，對於延緩蔣介石反動統治的最後崩潰，自會起較大作用。因此，“我們的計劃應當放在他可能調動一點上”，目的是抑留蔣、傅兩系於華北，就地殲滅。（注 25）

但問題是，共軍根本沒有兵力阻擋傅集團南撤。當時華北是共

軍實力最薄弱的地區，共軍又普遍養成了害怕傅作義的心理。1948年2月23日，毛澤東致電聶榮臻、蕭克等人，要他們堅決克服幹部中怕傅作義的錯誤思想（注26）。連朱德都不得不承認：“在作戰上他（傅作義——引者注）學了日本人的一些辦法，也學了我們的一套，在華北方面他的力量現在遠比我們大，所以傅作義是比較不好打的。”（注27）因此，傅作義集團若是南撤，毛澤東只能幹瞪眼。既然不能武力制止，那就只有靠厚黑學，想法從內部攻破堡壘，而這才是毛真正的拿手好戲。

蔣介石也同樣看出了這步棋。在大眾心目中，國共兩黨用兵的區別，似乎就是國府只知道死守地盤，而共軍則不計一城一地得失，大踏步進退。這當然有一定事實依據。老蔣從建軍那天起，就只知道北伐式攻防戰，以擊潰敵軍、攻佔城市為勝利，沒有殲滅戰概念。而且，國民黨是執政黨，政府守土有責，又實行了憲政，必須對國民大會負責，因此不能罔顧民意，輕易拋棄防地。陳誠在東北打了敗仗後，國防部長白崇禧在國民大會作軍事報告時，全體代表不約而同大喊：“殺陳誠以謝國人！”（注28）因此，要老蔣如共軍那樣，只考慮保存國軍實力而不顧百姓死活，也確實有難處。

但蔣介石並非咱們想像的那個飯桶，論戰略眼光恐怕並不比毛差。他遠不如毛的，是不會玩弄陰謀詭計，更缺乏對部下的控制能力。1948年3月間，他決心放棄東北，令東北集團撤至錦州。若這計劃能按時實施，則國軍兩個集團就連在一起，可以集中兵力作戰，東北國軍也不至於被全殲。然而衛立煌卻抗命不從，蔣介石竟然奈何不得。雙方爭執不休，直到9月間遼沈戰役開始，國府竟然什麼決策都沒有拿出來。遼沈戰役開始後，衛立煌又百般破壞搗亂，再加上廖耀湘畏敵如虎，終至全軍覆沒。（注29）

東北一失，華北就再不可能保住了。遼沈戰役結束次日，國防部召開作戰會議，緊急商討華北作戰方針。國防部長何應欽提出兩個方案，一案是趁華東野戰軍正集中兵力準備舉行淮海戰役、濟南防守兵力空虛的有利時機，令傅作義部南下襲取濟南，以後即在山東地區作戰。此案的好處是既可撤出華北部隊，又可牽制華野，使

其不能全力進行淮海戰役，從而減輕徐州剿總劉峙集團的壓力，不利因素是從平津地區南下濟南，要經過近千里的淪共區，沿途會遭到較大損失；另一案則是將傅作義全軍南撤，第一步海運青島，第二步再海運江南。（注 30）

老蔣同意南撤，但他還得請傅作義許可，這位“大獨裁者”就這德性。他於次日電召傅作義進京。殊不料傅作義“另有打算：他的根據地在綏遠（注 31），他的軍事實力還完整無缺，而且他已有與中共和談的心思，所以在南京會議上，巧妙地同蔣介石唱反調，向蔣介石大肆吹噓，說整個華北尚有大軍 60 多萬，自己又有守城經驗，能戰能守，華北大好河山豈能放棄。蔣介石聽後有些猶豫了，張治中又主張放棄華北撤到江南，傅作義則始終堅持要據守華北。結果蔣介石還是依了傅作義，因為他還有依靠傅作義固守平津的幻想。”（注 32）

老蔣犯下這致命的錯誤，是因為他太相信人。大陸人中最常見的問題，便是以共黨的欺騙宣傳作為判斷歷史人物的依據，因此多以為老蔣氣量狹窄，不能容人，其實毛澤東才是這種人。而蔣介石之所以失敗，恰在於他效法王陽明、曾國藩，處處以誠待人，以致連對奸細與貳臣都“用人不疑”，直到最後一刻。

這人講究婦人之仁、缺乏殺伐決斷（遑論心狠手辣）到了如此地步：哪怕他後期準確地懷疑到國防部第三廳有共諜臥底後，其應對措施仍然令人瞠目結舌。據原天津市長杜建時說，1948 年 10 月 7 日，他見到蔣介石，“他（蔣）痛責王耀武失守濟南敗壞魯局，及孫連仲冀中的失敗，都是內部參謀作了間諜，沒有察覺而完全洩露了軍機所致。同時他還說明他親臨東北面授軍機，調度部隊，並不通過國防部第三廳，均由侍從參軍傳達意旨，都為的是極端慎重保守機密”。（注 33）

以這種消極被動辦法來對付內奸，只怕要為每個受過我黨“階級鬥爭教育”的人恥笑，可就連這他都沒做到。遼沈戰役的作戰計劃就是國防部第三廳廳長郭汝瑰制定的，淮海戰役就更別說了。這就是那個“殺人不眨眼”、實行“特務治國”、“白色恐怖”的“大獨

裁者”！

老蔣對傅作義又何嘗不如此？傅作義是道地的雜牌，與黃埔系八萬桿子打不著，但因為他用兵如神，確係將才，此前曾數次大敗共軍，令共軍魂飛膽落，老蔣便對他格外垂青，倍加信任。連共諜郭汝瑰都說，傅作義不但被蔣介石任命為華北剿匪總司令，“而且深得蔣介石的信賴。關於華北作戰事宜，除訓令指示企圖、方針外，悉由傅作義全權主持，不干涉其作戰部署。”就連他在平津戰役前夕作出的戰略部署，事前也不報告國防部。（注 34）

1948 年 2 月間，傅作義與其華北剿總副總司令陳繼承別苗頭，憤而向蔣介石辭職。儘管陳據說是軍統特務頭子，然而蔣介石竟然完全偏袒傅作義，不但撤了陳的職，還請傅作義舉薦人選代之。傅作義於是薦舉第 34 集團軍總司令周體仁擔任副總司令，使得華北剿總完全落在傅作義的控制之下。（注 35）直到 1948 年 11 月初，老蔣還在公開稱讚：“傅總司令作戰精神與戰略之運用，均極勇敢周備。”（注 36）

11 月 3 日，蔣在國防部作戰會議上正式宣布，任命傅為華東南軍政長官，要他將華北軍隊經海陸兩路全部南撤，全部軍隊都交給他指揮，可見蔣對老傅倚重之深，將東南半壁江山整個託付給他保衛。（注 37）

正因為老蔣對老傅格外信任與敬重，他才會在傅作義拍胸擔保守住華北之後，未以最高統帥身分直接下令讓他撤退，而是作了個折中決策，決定“暫守平津，控制海口”。但他還是要傅作義放棄察哈爾與綏遠（傅的老巢），將兵力轉移到平、津、塘，固守海口，不利時即自海道南撤。為此，蔣介石還特地授給傅作義以下大權：（1）直接接受美援的權力；（2）華北黨政軍以及經濟全權（包括中央銀行的支付權）；（3）編成渤海艦隊，在長山列島建立海軍據點，支援塘沽作戰；（4）派聯勤部工兵署署長到平津塘之間，設計陣地網。（注 38）其對老傅的信任與倚重，根本就是“天子門生”們無法夢見的。

然而老蔣做夢也沒想到，此前傅作義因為有張東蓀出面作保人，已動了投共的念頭。他已與心腹王克俊商定，準備按兵不動，坐待共軍將“蔣系”國軍包圍在北平城中，再借共軍的兵力裹脅他們投



蔣介石連對奸細與貳臣都“用人不疑”。

降，而這就是他為何要欺騙蔣介石，向他擔保自己一定能守住華北。
(注 39)

傅作義投共與張東蓀的功勞

傅作義之所以打這背時主意，是中共特工以及張東蓀聯手活動的結果。早在 1948 年 7 月初，共黨特工杜任之就從太原到了北平，因為他是傅作義的同鄉與朋友，而“舊”社會人情特別重，所以他不但得到傅作義庇護，還趁機刺探傅的態度與動向。

10 月中旬，杜任之得知傅作義因錦州陷落有些苦悶和憂鬱，因找到中共特工關世雄，說他準備策動傅作義與中共和談，要關向中共城工部彙報，並請城工部指示該如何進行。關即表示以後讓崔月犁親自指導這一工作。

此後杜找到了傅作義言聽計從的高級顧問劉厚同，對之進行遊說。劉告訴他，過去共產黨的劉仁曾經派人找過他，要他勸說傅作義效法吳化文，以“解放”濟南的方式“解放”北平。他回答那人說，

吳化文是投降將軍，傅作義是殺頭將軍，不會投降，那人再沒說什麼就走了。杜乃說，與中共和談“解放”北平不是投降，是起義。劉最後說，他可以建議傅與中共和談，先在華北組織聯合政府，通電全國推動全國和平，想來傅作義也能接受。杜任之心想，只要願意和談就好辦，那“組織聯合政府”之類夢話此刻不宜多說。

劉厚同與傅作義談過後，告訴杜任之，傅有意與中共和談，但為了調和雙方意見與將來執行和平協議，他認為需要有民主黨派參加談判。這說明老傅還是留了個心眼，想讓“第三勢力”作證人，免得日後共黨賴帳。杜任之當即答覆說，這事容易，他去找民盟中央在北平的負責人張東蓀參加談判。次日他即找到張東蓀，問他是否可以代表民盟作為第三者參加和談。“張東蓀聽了，喜出望外，表示很願意參加雙方和談，促成和平解放北平。”但他也提出與劉厚同相同的願望，即在和平“解放”北平後，組織華北聯合政府。杜任之以同樣的伎倆對付過去，“我當時認為重要的是在於能開始和談，只要和談開始，事情是會朝著有利於革命方面發展的，所以也沒有再和他談和平解放北平以後的問題”，隨即打電話給劉厚同，介紹張東蓀去與劉厚同見面。

張東蓀與劉厚同見面後，“有了中間人，劉厚同放心了，他答應轉告傅作義”。此後杜任之向崔月犁彙報了上述情況，並說劉厚同認為與中共和談之後，應通電全國倡導和平，召開政協會議。崔說，只要和談一開，事情就會演變。至於他們提出要有個民主黨派作為第三者參加，“你已經找過張東蓀了，我很同意。為了鄭重起見，我再去與他正式接談一下，請他代表民盟參加談判。”次日崔月犁找了張東蓀談話，與張談話後次日即去見劉厚同。劉後來告訴杜任之，崔月犁和他談得很好。（注40）

傅作義之所以動念叛蔣，是因為私心太重。他覺得老蔣大勢已去，跟老蔣幹再沒前途了，於是想另投明主。這人對共黨毫無起碼認知（民國的軍人還真像職業軍人，不問政治，不是共軍那種具有濃厚意識形態色彩的宗教軍隊），卻拿民國那套“反正”醜劇來套時事，以為他只需發個通電“易幟”，便能如張學良當年一般，不但能保留

私人軍隊，還能在新政府裏分一杯羹。他覺得若按蔣介石的方案部署，主動放棄北平，退守天津、塘沽一線，那就沒有“向共軍獻出古都之功”了。若是不能抵禦共軍，必須從海道南撤，到了江南後，他肯定要受到蔣介石的嫡系排擠，因此不如另投新主。

即使如此，傅作義仍免不得顧慮重重。據劉厚同說，傅作義老是懷疑中共能否信守談判協定（注 41）。此話不假，他過去曾見識過中共的“和談花招”，有過沉痛教訓，因而對中共的德行有一定認識，有他在 1946 年大同戰役後給毛澤東的電報為證：

“延安毛澤東先生，溯自去年日本投降，你們大舉進攻綏包，放出內戰第一槍，愚魯如我者，當時還以為這是你們一時的或一部分的衝動，決不會成為你們黨的政策，故曾於 11 月 24 日致電先生，作坦白懇切的呼籲。但一年來的慘痛事實，竟證明這是你們經過長期準備的計劃，並不是一個偶然的錯誤，因而和平商談永無結果，而全面戰事乃日益擴大。最近由於你們背棄諾言，圍攻大同，政府以和平解決的努力均告絕望之後，本戰區國軍才迫不得已採取行動，救援大同，但這是悲痛的，並不是快意的，其目的僅僅在於解救大同之



傅作義（左一）和蔣介石。

圍，解救大同二萬軍民。”（注 42）

就是為此，他才會特地提出要“民主黨派”作中人，以此為與中共和談的前提，而促使他最終下定決心的，正是民盟北平負責人張東蓀願意出面做這中人。他曾對杜任之說：“民主同盟是最大的民主黨派，在社會上有名望有威信，有民盟代表張東蓀參加談判很好。”（注 43）

就這樣，傅作義終於下定了與中共和談的決心，10月30日夜間12點，他與心腹王克俊密商，決定“需要待解放軍圍城之後，利用內外力量的配合，才能圓滿地實現整部走上人民的道路的目的。”（注 44）

其時東北戰事尚未結束，東北共軍尚未入關。共軍在華北的兵力極度空虛，周邊也就只有個楊羅耿（楊得志、羅瑞卿、耿彪）兵團。國軍要南撤並無太大困難，最起碼不會全軍覆沒，因為共軍根本沒有足夠兵力包圍之，頂多只能追擊騷擾。北平被圍是傅作義蓄意製造的，目的是挾持蔣系國軍跟他一道“走上人民的道路”。若是傅作義按國防部的建議行事，主動放棄北平，則古都根本就沒有兵燹之虞，並不需要張東蓀那位摩登魯仲連去“片言解紛”，“保全人民古物”。張東蓀寫成條幅“留示子孫”的，乃是彌天大謊。策反傅作義的戰略意義，根本不是什麼“保全人民古物”，而是使得國府60萬大軍被“扣留”於無用之地，未能在關鍵時刻投入關鍵戰場，贏得關鍵決戰，致使南中國人民難逃赤禍。

這就是為什麼毛澤東極度賞識張東蓀“片言解紛”。的確，張東蓀等輩以“第三勢力”面目出現，其作用絕不是中共特工能起到的。

扣留傅作義是厚黑學偉大勝利

我在《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一書中指出，毛是個陰謀家而不是軍事家，是個厚黑學大師而非合格的戰爭統帥。平津戰役就是這一論斷的雄辯證明。作為戰例，它顯示的不是毛澤東的軍事才能，而



平津戰役示意圖。

是他出神入化的厚黑學神功。

11月17日，傅作義通過共諜女兒傅冬菊，秘密致電中共，要求和談（注45），此舉立即給了毛一個誘騙傅作義上鉤、藉此將國軍抑留在平津一帶的機會。毛次日即致電林彪等人，告知此事，說“我們擬利用此機會穩定傅作義不走，以便迅速解決中央軍”，要東野提前入關，“突然包圍唐山、塘沽、天津三處敵人，不使逃跑，並爭取使中央軍不戰投降”（注46）。對毛來說，與傅作義暗通款曲的全部目的，就是以此穩住傅作義，令他滯留在北平。只要老傅心存幻想，由他指揮的60萬大軍也就會停留在華北不走，待四野入關後，要加以包圍殲滅易事耳。

為達到這個目的，毛故意遲遲不給傅作義回答。傅冬菊奉父命與地下黨負責人約好面談的時間地點，屆時卻無人如約而來（注47）。老傅不知道，毛定下的“基本方針是徹底解除他們的武裝”，“決不允許這些人保存其反動力量，談判和分化只是達到殲滅他們的一種手段”。傅“本人可赦免戰犯罪，保存私人財產，住在北平或

外邊由他自定。他的部屬的生命家財不予侵犯，除此之外，不能再允許給他什麼東西，亦不能稱為起義”（注 48）。毛要的是無條件投降，而且還必須是顏面掃地的投降，哪會容他與中共平等談判？

就在傅作義傻等之際，四野在 12 月中下旬大舉入關，然後才開始與傅作義談判。毛的算盤是：“我們應試圖利用傅作義及其集團內大批幹部對於自己的生命財產危險的恐懼（傅作義是戰犯，傅集團內某些人是華北人民十分痛恨的），以考慮允許減輕對於傅作義及其幹部的懲處和允許他們保存其私人財產為條件，而以傅作義下令全軍放下武器為交換條件。”“但我們第一個目的是解決中央軍。你們應向傅的代表試探，傅是否有命令中央軍繳械的權力，如果他沒有此種權力，則可向他提出讓路給我軍進城解決中央軍。”（注 49）

老傅這才發現，雙方條件相差太遠，因而心存悔意。他於是改變了原來的部署，把自家的基本隊伍部署在北平以西，將其他部隊（不能稱為“中央軍”，蓋抗戰後全國軍隊混編，已無“中央軍”“地方軍”之分，中共將原來的中央軍稱為“蔣系”或“中央系”）部署在北平城內及北平以東。如此則既可以用非嫡系部隊為他擋住入關的四野，又可借共軍圍城，脅迫非嫡系部隊隨同他一道投降，自家的嫡系部隊則放在北平以西，若是中共不接納他，則他還可以逃往綏遠，保留私人軍隊。

然而老共哪會由他反悔？12 月 26/27 日，中央軍委甚至指示林彪等人：“不要放走傅作義談判代表，並應停止其與傅作義通電。”

（注 50）連這種下作手段都能使出來，目的就是讓傅作義面前始終有個釣餌在晃動，而卻又始終不讓他看明白那釣鉤上穿的究竟是什麼好玩意。

何況老傅的周圍也早就被共諜滲透到超飽和的程度了。1948 年 10 月間，老傅想使出當年閃擊張家口的那招來，突襲中共中央所在地石家莊，還沒發兵，消息便被中共發表在新華社電訊以及報紙上，嚇得他半途而廢（這大概是毛抄襲《三國演義》中的空城計，其實當時石家莊相當空虛，傅作義若堅持打下去，定能一擊成功）。如今老傅的部署又豈能逃過中共的耳目？因此，他自作聰明調動的部隊當然

只能“落入解放軍的環圍”。

在此期間，老蔣連續派大員飛往北平，敦促傅作義南撤。12月15日，軍令部長徐永昌來到北平，轉告蔣介石的話：“千軍易得，一將難求，宜生一人歸來，勝似千軍萬馬”，力勸傅作義率部南撤或離平赴京。23日，蔣緯國攜蔣介石的親筆信到北平，信中說：西安事變上了共產黨的當，第二次國共合作是我生平一大教訓。現在你因處境又主張與共產黨合作，我要借此一勸，特派次子前來面陳，並許諾只要南撤，則有美軍援助；南撤後，將任命傅作義為華東南軍政長官，等等。1949年1月6日，蔣介石還派鄭介民到北平，除了重申徐永昌所說的話外，還表示在北平的軍統人員可以密切配合南撤。

最後一次則是美國西太平洋艦隊司令白吉爾到北平，聲稱今後美國要拋開蔣介石，完全支持傅作義，美海軍將在沿海援助南撤。蔣介石明明給了傅作義直接接受美援的權力，但傅作義卻謊稱自己是地方官員，無權接受美援，要白去跟南京政府說，白吉爾一再強調今後將拋棄蔣，直接支持傅，傅以內政不容干涉為由斷然拒絕，令白吉爾自討沒趣，敗興而去。（注51）

其實早在此前許久，胡適就曾與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一道去北平，勸傅作義退守青島一帶，以其為根據地，由傅作義自己解決兵員問題，由美國提供武器裝備，但軍需後勤必須由美國人監督，以防貪腐。那提議也被傅作義斷然拒絕。（注52）

老蔣對傅作義，不可謂不仁至義盡。1月16日晚，他給傅作義發了份電報，謂：相處多年，你現厄於形勢，自有主張，無可奈何。我現只要求一件事，於17日起派飛機到平，運走第13軍（也就是被傅作義有意陷在北平城內的非傅系部隊）少校以上軍官和必要的武器，約要一周，望念多年之契好，予以協助。傅作義覆電答應“遵照辦理”，隨即發電報給城外共軍，要求他們在飛機來時，以天壇祈年殿為目標，炮擊天壇臨時機場。國軍果然於17日派了飛機來，共軍當即猛烈炮擊天壇，使得飛機始終無法著陸，“如此四五天，終於粉碎了蔣最後企圖飛機運走這個嫡系‘精銳’兵團及裝備的夢想”。（注53）

您說這傅作義究竟是什麼下三濫？你自己要投共，投就是了，卻要為了增加自家身價，去玩弄這種陰謀詭計，害得不想投的將士也被陷在圍城中，不得不跟著投降。不過，比起他對老同學、老朋友、老部下陳長捷使的花招來，這還真算不了什麼。

黑中更有黑中手

時任第六集團軍總司令兼天津警備司令的陳長捷也是雜牌出身，曾與傅作義同窗，自保定軍校畢業後，即應傅之邀加入閻錫山的晉軍，與傅淵源至深。陳長捷當時的想法與蔣介石一致，都是放棄張家口，將主力逐步轉移到天津、塘沽、蘆台、唐山近海方面，確保海口，支撐華北，實在不行時，即從海上退往江南。當陳與傅作義密商時，傅作義表示完全同意，還決定將總部搬到天津去。但他卻將與中共的秘密勾結瞞得嚴嚴實實，根本就沒有按他與陳商定的部署調兵。

不僅如此，當他在第一次談判中發現共黨要價太高時，他又打主意給自己留下逃往綏遠的後路，於是不通知陳長捷便將自己的嫡系部署到北平以西，不但令駐守新保安的 35 軍突圍西去，動搖了將主力迅速轉移於津塘集結的原計劃，而且將暫編第 3 軍、第 4 軍推向懷來以西，就連已經部署好的第 92 軍、第 62 軍也調往南口、懷來方面，“這正是落入解放軍的環圍，把第 35 軍、暫編第 3 軍、暫編第 4 軍他的基本得力的十多萬本錢喪光，使得唐山、蘆台、楊村空虛了，塘沽、天津暴露出來，置於解放軍的直接攻圍之下”。（注 54）

據陳長捷說，遼沈戰役開始後，蔣介石親自去瀋陽、葫蘆島指揮，兩次路過天津。當傅作義報告實行平津塘分區防守布置時，蔣介石認為，天津與塘沽兩區兵力單薄，不如放棄天津，把兵力合併到塘沽區，以固守海口為主。因為陳長捷是雜牌出身，蔣怕將領不聽陳的指揮，還專門派副總長與總統府參軍攜帶他的親筆信到天津，分致陳長捷與各軍長，勉勵他們協力堅定固守，並叮囑各軍長一定要服從陳長捷的指揮。（注 55）

老蔣要老陳放棄天津撤往塘沽，說明他還是頗有點軍事眼光的。我在《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中指出，毛澤東不但靠看地圖策劃大戰略，而且是用老百姓的外行眼光看地圖，只看得見位置與距離，看不見地形地貌。因此，毛代表中央軍委制定的平津戰役計劃的原則是“先取兩頭，後取中間”，亦即先打西面的新保安與東面的塘沽，目的是既防止傅作義率嫡系西竄，又防止其他派系的部隊出海南逃。毛幾次強調指出，東線應“力爭先殲塘沽之敵，控制海口”。只要殲滅塘沽之敵，“控制海口於我手中，則全局勝算在望”。（注 56）

然而這不過是紙上談兵，毛根本沒有考慮到塘沽的特殊地形，就像他當年讓西路軍在河西走廊裏就地創建根據地一般，完全是構建空中樓閣。等到共軍奉命挺進到塘沽附近並準備攻擊後，才發現塘沽地形十分複雜，東臨渤海，其餘三面都是鹽鹼灘，地形開闊，河網密布。由於海潮漲落，冬季不結冰。既不便於展開兵力，又不便於構築工事，大兵團行動比較困難。而且國軍已經做好南撤準備，一旦受到攻擊就會乘船南下。12月26日，四野參謀長劉亞樓在塘沽詳盡勘察了地形，並與前線指揮員磋商後，于次日報告林彪：攻佔塘沽有把握，但全殲兩沽之敵則很不容易，最大可能是殲滅一部，大部逃竄，得失不合算，因此提出首先攻擊天津。29日，林彪與劉亞樓報告了新的作戰計劃，決定放棄打塘沽，首先攻擊天津。同日，軍委批准了該計劃。（注 57）

由此可見，若是老陳聽了老蔣的話，迅速放棄天津，撤往塘沽，雖有可能遭受共軍襲擊，蒙受一定損失，但天津距塘沽並不遠，要突到那兒是有可能的。即使不能固守，也可以從海道逃生，不至於到後來被全殲。老陳和下屬兩位軍長（守衛天津的只有兩個軍，而共軍攻城的有五個縱隊）商量了一夜，兩個軍長鑒於廖耀湘在東北大淩河轉進時全軍覆沒的教訓，怕突圍出去後被消滅，不敢執行，而陳長捷則關切傅作義的處境。他認為，他離開天津很可以卸責，但將更置北平於死地。當夜，他幾次電話請示傅作義，但傅作義不給任何指示，只是說：“待考慮考慮。”陳長捷說：“這個不指示等於已指示，我能領會。我當時的決心是一切應為傅負責，實踐他沒有變更的命

令，不嫌兵單，還恃‘陣固’，為北平免於孤立，以後好隨北平的局面同樣轉變，也為避免在轉移中一下子的被消滅，就決定堅守下去，不實行突圍。”

12月20日，共軍開始攻擊天津外圍據點。天津城內此前收容了大量潰兵，其總數竟達五六萬，超過作戰部隊。這些潰兵既無法收編，又騷擾民間，還得派部隊予以監視。此外，傷病兵也達萬把人。因此，天津城內雖有國軍官兵13萬之眾，作戰部隊其實只有5個師（還欠一個團），兵力嚴重不足。老陳也知道天津遲早要陷落，但他因為軍閥派系觀念嚴重，仍想作困獸之鬥。他見鄧寶珊到了北平，猜出了傅作義在向中共謀求和平的“政治解決”，因而以過去軍閥混戰那套類推時局，覺得“平津一體”，一榮俱榮，一損俱損，自己死守天津，能增加傅作義與中共討價還價的資本。若是自己不顧老長官投降了，就會影響華北的“政治問題”。當天津戰事日趨緊急時，傅總部的參謀長李世傑還頻頻傳達傅作義的指示：“堅守就有辦法。”這更助長了陳長捷的錯覺，讓他決定堅持到彈盡糧絕。當時市里的頭面人物頻頻見陳，詢問局勢，委婉敦促陳投降，陳還告訴他們，大局由傅作義主持，說他從鄧寶珊到北平一事中看出，傅已在與中共談判。平津是一體，傅作義不會置天津市於不顧。於是那些人派出代表，坐小飛機飛北平，去向傅作義本人請願，但傅作義始終未作答覆。

最混帳的是，1949年1月11日，共軍給陳長捷下了最後通牒，要他們放下武器投降，陳長捷報告北平，參謀長李世傑仍然回答說：“堅定守住，就有辦法。”13日，共軍全面發動猛攻，主陣地接連被突破。15日，陳長捷在圍城開始後首次也是唯一一次以無線電話向傅作義報告了戰情，傅作義答道：“可以接洽和平吧！”通完話後，陳長捷就被衝進指揮部的共軍俘虜了。（注58）

傅作義對老同學、老朋友、老部下玩的這一手，實在不是人能幹出來的：老陳本來可以從海道撤退，他不許人家撤，生怕與中共和談少了本錢。後來天津城內又有人勸降，他仍然不許降。老陳心心念念惦記著老長官的安危榮辱，不但怕自己撤退了，將更陷北平於危

局，而且就連及時“陣前起義”、圖個“寬大處理”都不願，寧願死守孤城直到彈盡糧絕，生怕自己投降了，損折了老長官的本錢，讓他的“華北聯合政府”辦不起來，或是在其中當不了高官。可惜落花有意，流水無情。他以為“平津一體”，老長官卻根本不把他當“一體”，自己可以投降，卻不許部下投降，一直把老陳蒙在鼓裏，欺騙他“堅定守住，就有辦法”，自己作了“和平解放北平”的功臣，老部下卻成了戰俘，身陷囹圄，足足坐了10年的牢，最後在“文革”中因不堪紅衛兵批鬥毒打侮辱，夫婦雙雙上吊自殺。這血債只能算在傅作義頭上，他不但害死了老朋友夫婦，而且還害死了自己的親弟弟。

不過，老傅的陰謀詭計，也只能坑害信任他的長官與部下，要跟老共尤其是老毛玩這套，就只能被毛玩弄於小指之間。他以為身擁重兵，就可以重演民國軍閥混戰那套，與中共和談後，成立“華北聯合政府”，卻不知道共產黨人從來是“徹底革命派”。馬列早就教導過，無產階級必須砸碎舊的國家機器，代之以自己建立的嶄新的國家機器。這就是無恥階級革命與辛亥革命的根本區別——只許“階級異己分子”乖乖投降，決不許“咸與維新”。

這就是毛為何要等到共軍打下了新保安與張家口，並包圍了天津，斷了傅作義的逃路後，才在1949年元旦那天指示林彪：“新保安、張家口之敵被殲以後，傅作義及其在北平直系部屬之地位已經起了變化，只有在此時，才能真正談得上我們和傅作義拉攏並使傅部為我所用。因此，你們應認真進行傅作義的工作。’你們應通過北平市黨委將下列各點直接告訴傅作義：……‘我們希望傅氏派一個有地位的能負責的代表偕同崔先生及張東蓀先生一道秘密出城談判。’”

（注59）

實際上，這是毛第二次點名要張東蓀參加談判了，僅僅在頭天，毛才致電林彪，要他覆電北平地下黨，轉告傅作義派有地位的能負責的代表和張東蓀一道出城去林彪那兒談判。（注60）接連兩天迫不及待地將授命，這在《毛澤東年譜》中還真找不到第二例，可見在毛的心目中，張在這事上起到何等重要的作用。

於是張東蓀便奉命出動了。1949年1月7日，他與周北峰秘密

出城到薊縣，見到了聶榮臻、林彪、羅榮桓等人。張東蓀向聶榮臻等人傳達了傅作義的要求：（一）北平、天津、塘沽、綏遠一齊解決；（二）要平、津以後能有其他報紙（意即不只是中共一家報）；（三）政府中要有進步人士；（四）軍隊不用投降或在城內繳槍的方式，採取調出城外分駐各地用整編等方式解決（注 61）。張接著說，他看傅作義已打不下去了，但傅要面子，得讓他體面投降。傅先生派他們來是希望儘快達成和平協議，以免北京毀于戰火，百姓遭受塗炭。（注 62）

次日，林彪、聶榮臻將這些條件電告中央軍委，毛十分惱怒，於 9 日回電：“傅作義派人出來談判，具有欺騙人民的作用，並有張東蓀在場，故我們應注意運用策略……你們應與周北峰討論實行此條的具體辦法，逼傅在 12 日開始實行，使張東蓀看了認為我方寬宏大量，完全是為保全平津人民的生命財產……如張東蓀不願久待，即可派車送他來中央所在地，並派人妥為照顧。”（注 63）同時還教林、聶怎麼去推搪傅作義那些光明正大的條件：

“你們應回答如下幾點：……政府中有進步人士，平、津報紙不只中共一家，是中共民主綱領中原來就有的，故不成為問題。”（注 64）

在見識過中共是如何遵守停戰協定之後，老傅還要與虎謀皮，向中共提出這種可笑的條件，毛除了龍顏大怒之外，大概只會鄙夷地冷笑。他應付這些要求的厚黑功夫令人歎為觀止：“政府中有進步人士”，當然有，即使在文革期間也有“愛國人士”；“平津報紙不只中共一家”，現在也不止中共一家，“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不是有份什麼《團結報》麼？還有網絡版呢。

毛內外有別的指示，正如張東蓀 10 多年前講的那樣：“對於黨外無真誠只有詐偽”。而毛為張在這次密謀活動中安排的角色，則是“群英會”上的蔣幹——既要利用他逼著傅作義在 12 日就出城投降，又要讓他“看了認為我方寬宏大量，完全是為保全平津人民的生命財產”，回到北平城後為我黨作義務宣傳。戴晴女士看出了這一點，指出：



1949年2月3日
解放軍舉行北平入城式。

“毛澤東要借重的，是張東蓀的分量與社會信譽，顯示共產黨‘北平和平交接’用心最光彩的一面：文明與仁義。他要借重張的親眼所見、親耳所聞——由他將共產黨形象傳達出。起碼毛當時認為，與新華社的報道相比，張教授親口說將更加服人。”（注 65）

雙方談完後，劉亞樓整理了個《會談紀要》出來。張東蓀本來是傳作義請來做中人的，猶如民事合同要找個證人簽字才算數一般，當年馬歇爾就曾作為中人在國共停戰協定上簽了字。張東蓀絕無可能不知道這先例。在林彪總結了會談內容、詢問他還有無意見時，他回答“我沒什麼意見”，但等到林、羅、聶在紀要上簽了字，請張簽字時，他卻聲稱周北峰是傳作義的代表，由他簽字就行了，於是周便簽了字。（注 66）

會談紀要簽字後，張東蓀返回燕京大學，接著就帶領費孝通與雷潔瓊夫婦去西柏坡朝見毛澤東，奠定了日後做官的基礎。毛投桃報李，在2月1日為新華社撰寫的時評中公開披露：“周北峰將軍是在1月8日由張東蓀教授引導出城和林彪將軍等談過一次的。”（注 67）這種做法，在中共的政治操作中堪稱絕無僅有，可見張東蓀當時是何等深得主上歡心，以致毛親自為他造勢。

傳作義得知中共要求後，通過中共特工向林、聶提出，部隊出城改編的時間與其他技術細節尚待雙方具體商定。毛聞訊大怒，認為傳“借詞推託，企圖拖延時間，實則別有陰謀”，企圖“迫我就範”；

傅不但撒謊欺騙中共，還“提出什麼報紙及政府用人等事，好像他們是代表人民說話，向我們要求民主權利”，要傅命令天津守軍於 13 日全部開出城聽候處理，否則共軍將於 14 日攻擊天津。（注 68）

老傅還在猶豫，共軍當即打下了天津，示之以威。至此，傅作法自斃：逃無法逃，戰也不能戰。直到此時，蔣介石還在勸他離開北平，於 1 月 16 日電傅作義，謂天津失守，死守塘沽已無意義，著侯鏡如兵團火速由海上撤走。最後希望傅作義早日脫離險地，飛回南京，共肩時艱，以報黨國（注 69）。但傅還是沒聽老蔣的話，最後竟裹脅全軍（包括由他指揮的原中央軍部隊），以“出城改編”的名義“體面”投降。

可惜我黨連一點面子都不給他留。1949 年 2 月 2 日，就在共軍舉行入城式前一天，《人民日報》還按照毛的指示，特地發表了毛於此前以林彪、羅榮桓的名義寫的命令傅作義投降的最後通牒，明明白白地告訴老傅，他不過是個戰爭罪犯，可指望的不過是我黨的寬大處理：

“貴將軍身為戰爭罪犯，如果尚欲獲得人民諒解，減輕由戰犯身分所應得之罪責，即應在此最後時機，遵照本軍指示，以求自贖。……如果貴將軍及貴屬竟敢悍然不顧本軍的提議，欲以此文化古城及二百萬市民財產為犧牲，堅決抵抗到底，則本軍為挽救此古城免受貴將軍及貴屬毀滅起見，將實行攻城。”（注 70）

據《毛澤東年譜》，那通牒是毛於 1 月 15 日寫的。但傅作義根本沒見到那通牒，只是在共軍進城那天，他才從報上得知，當下氣得半死（注 71），但此時人為刀俎我為魚肉，悔也來不及了。打了三百殺威棒後，毛又以寬宏大量的仁君面目出場，與他談話，於是世上又多了一個“斯德哥爾摩綜合症”患者。

以上所述，便是“北平和平解放”的真相。傅作義的蠢動，不但害了國家，害了人民（尤其是江南人民），害死了他的老同學、老部下與老朋友夫婦，害了大批被他陷在城中的國軍官兵，而且害死了他自己的親弟弟。而就是這千古鬧劇、醜劇兼悲劇，還被張東蓀誇耀為“平生第一快事”！（注 72）

在這“平生第一快事”中，張東蓀表現出來的私德與公德操守均頗令人不齒，例如他在北平和談中一面炫耀自己“為雙方信任”，一面又對青年學生罵傅作義是“人人都想消滅”的躲在花瓶裏的“可惡的老鼠”；以不偏不倚的“第三勢力”身分出面參與談判，卻在談判中背叛傅作義一方，一見到聶榮臻便對之告密邀寵，說他看傅作義已打不下去了，但傅要面子，得讓他體面投降；先是自報奮勇代表民盟作中人，而且傅作義正是因為有他出頭才下定和談決心的，到了關鍵時刻卻又不敢承擔責任，拒絕在會談紀要上簽字；最令人鄙夷的，還是他幾十年的至交張君勱被共黨宣布為第43名“戰犯”，其唯一“戰爭罪行”就是參加了制憲國大，並起草了中國有過的最好的憲法（略去孫文的“五權憲法”的干擾不計。因為弊病百出，這蛇足已被台灣修憲除去）。光這一點就足以暴露，中共絕對是以一黨私仇為天憲、毫無起碼是非觀念的土匪團夥。任何一個略有良知的人，哪怕與張君勱素昧平生，也當因此投袂而起，為抵禦那踐踏一切文明良知的土匪集團奮戰到底。可張東蓀就是有那本事，不但與張君勱分道揚鑣，更助紂為虐，幫助共軍輕易征服全國，為的不過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員”那個轉瞬就被奪走的官職。（蘆笛）□

註釋：

- 1,《毛澤東年譜》(中),電子書,無頁碼。
- 2,《毛澤東年譜》(下),電子書。
- 3,《中共代表與國民黨政府代表關於停止國內軍事衝突的協定》,《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6冊,17頁,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2年。
- 4,《毛澤東軍事年譜》,475頁。所刪字句根據楊奎松著《1946年國共四平之戰及其幕後》之引文補足。
- 5,《毛澤東軍事年譜》,487-488、491頁。
- 6,《徐永昌日記》第八冊,第289-290頁。
- 7,《毛澤東軍事文集》第三卷,277頁。
- 8,《毛澤東軍事文集》第三卷,283-284、292、301、305-306頁。
- 9,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共南京市委員會編:《周恩來一九四六年談判文選》,710頁,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
- 10,《聶榮臻傳》,電子書,無頁碼。

11,《毛澤東年譜》(下),電子書。

12,戴晴:《在如來佛掌中》,41-42 頁。

13,黃波:《“書生謀國直堪笑”——關於張東蓀》,《書屋》,2003 年第 7 期。

14,轉引自戴晴:《在如來佛掌中》,278-279、246 頁,中文大學出版社,2009 年。

15,轉引自戴晴:《在如來佛掌中》,393 頁。

16,轉引自戴晴:《在如來佛掌中》,282 頁。

17,杜任之:《和平解放北平之經過》,320、322-326 頁。

18,戴晴:《在如來佛掌中》,416 頁。

19,竊以為,戴晴對張東蓀叛國罪的辯護不能成立,中共是秘密出兵的,美國對此一無所知。哪怕在美軍抓到中國俘虜後,麥克阿瑟還拒絕相信中共軍隊已大舉滲入朝鮮,命令全軍大舉北上,這才中了彭德懷的埋伏。全靠沃克將軍謹慎,損失才不至於那麼慘重,但也輸得極為狼狽,一直敗退到三八線。不難想見,如果張東蓀找到的真是美國間諜,把這機密送到了五角大樓,則共軍也就不會有三次戰役的大捷了。張東蓀這種叛國罪,在任何一個國家都是要受到重罰的(一般是槍斃)。中共之所以沒有這麼做,看來還是看在他過去為中共立過大功的份上。

20,戴晴:《在如來佛掌中》,274、296、297、324、335、428 頁,中文大學出版社,2009 年。

21,同上,347 頁。

22,同上,100 頁。

23、62、63,藍英年:《話說張東蓀》。

24,《聶榮臻回憶錄》,697 頁。

25,《中國人民解放軍全國解放戰爭史》,第四卷,399 頁

26,《毛澤東年譜》(中),電子書。

27,《中國人民解放軍全國解放戰爭史》第四卷,372 頁。關於華北剿總的兵力,該書說的是 50 餘萬人,此處採用《聶榮臻回憶錄》提供的數字。

28,杜聿明:《遼瀋戰役概述》,《遼瀋戰役親歷記》,7 頁。

29,詳見拙著《毛主席用兵真如神?》,495-512 頁,明鏡出版社,2011 年

30,《中國人民解放軍全國解放戰爭史》,第四卷,382 頁。

31,今內蒙古自治區中西部。

32,杜任之:《和平解放北平之經過》,《平津戰役親歷記(原國民黨將領的回憶)》,326-327 頁,中國文史出版社,1989 年

33,《平津戰役親歷記》,213 頁。

34,《郭汝瑰回憶錄》,342、345 頁。

- 35,《平津戰役親歷記》,275-276 頁。
- 36,《中國人民解放軍全國解放戰爭史》第四卷,378 頁。
- 37,《平津戰役親歷記》,282 頁。
- 38,《平津戰役親歷記》,171、215 頁。
- 39,王克俊:《北平和平解放的經過》,《平津戰役親歷記》,279-280 頁。
- 40,杜任之:《和平解放北平之經過》,同上書,320、322-326 頁
- 41,杜任之:《和平解放北平之經過》,同上書,325 頁。
- 42,《大同集寧戰役》,百度百科, <http://baike.baidu.com/view/643133.htm>
- 43,《平津戰役親歷記》,330 頁。
- 44,王克俊:《北平和平解放的經過》,《平津戰役親歷記》,279-280 頁。
- 45、47 王克俊:《北平和平解放的經過》,同上書,281 頁。
- 48,《中國人民解放軍全國解放戰爭史》第四卷,472,476 頁。
- 46、49、60、61、64、68、70,《毛澤東年譜》(下),電子書。
- 50,《中國人民解放軍全國解放戰爭史》第四卷,449 頁。
- 51,《平津戰役親歷記》286-287 頁;《中國人民解放軍全國解放戰爭史》第四卷,474 頁。
- 52,《平津戰役親歷記》,293 頁。
- 53,《平津戰役親歷記》,287 頁。
- 54,《平津戰役親歷記》,173 頁。
- 55,同上,176 頁。
- 56,《毛澤東軍事文集》第 5 卷,第 361、359 頁。
- 57,中國人民解放軍全國解放戰爭史第四冊,447、449、450 頁。
- 58,《平津戰役親歷記》177、179、182、184 頁。
- 59,《中國人民解放軍全國解放戰爭史》第四冊,473 頁;《毛澤東年譜》(下),電子書。
- 65,戴晴:《在如來佛掌中》,31 頁。
- 66,周北峰:《北平和談紀實》,《平津戰役回憶錄》,299 頁。
- 67,轉引自戴晴:《在如來佛掌中》,23 頁。
- 69,方正之:《平津戰役記略》,《平津戰役親歷記(原國民黨將領的回憶)》,22、30 頁。
- 71,郝在今:《“布衣將軍”傅作義》,《同舟共進》月刊,2008 年第 9 期。
- 72,戴晴:《在如來佛掌中》,32 頁。

雖然溥儀自己沒有小孩，但他有許多侄子外甥和侄孫、外孫輩。因為“末代皇族”系列書籍的出版，他的一些後輩親屬短暫相聚。在他們眼中，溥儀是個懦弱無能又優柔寡斷的人，他既不懂得記帳，也不會搭公車，但他在跟小孩子玩鬧時倒是個有趣的人

沒沾過皇上的光， 只安於平民的樂

據《洛杉磯時報》報導，清朝的末代皇帝愛新覺羅·溥儀的皇族後輩，2012 年秋天在北京短暫重聚，慶祝關於皇室家族系列書籍的出版。

共產黨中國下的前皇族

溥儀的四位親戚，9 月 27 日在北京柳蔭湖邊的一座府邸、同時也是溥儀出生地聚首。

溥儀在兩歲時被慈禧太后指定為清朝王室的繼承人，登基為皇帝，六歲時辛亥革命爆發，被迫退位。日本侵佔中國東北期間，他又被日本拱為滿州國傀儡皇帝。

雖然他自己沒有小孩，但他有許多堂、表兄弟姐妹，也就有了許多侄子外甥和侄孫、外孫輩。在他的後輩親屬眼中，溥儀是個懦弱無能又優柔寡斷的人，他既不懂得記帳，也不會搭公車，但他在跟小孩子玩鬧時倒是個有趣的人。



溥儀

“他就像跟他玩耍的那些孩子一樣，” 76 歲的版畫家鄭爽這樣回憶她的大舅。

事實上，溥儀在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非常低調，以至於當鄭的弟弟被告知，他們一直以來稱為“大舅”的人，是中國的末代皇帝時，他幾乎不敢相信。溥儀於 1967 年過世時，並沒有多少人知道他的背景。

中國老百姓對宮廷生活、對前皇族遺老遺少們有很大的好奇心，娛樂業、飲食業和保健產品屢屢打出“宮廷祕聞”“皇室秘方”之類的招牌，來迎合民衆這種心理。但是這些真實的皇族後裔，卻並不像其他國家的皇室那般具有地位，也許是因為在共產中國，進行了幾十年的反帝、反封建教育下，他們的政治存在並不那麼被重視，皇族血統也不便拿來大肆宣傳。許多皇族親戚相當低調，鮮少相聚，更少在公開場合相聚。不過，這些人因為慶祝關於滿清皇室的新系列書籍，於 2012 年 9 月底相聚了。

他們的穿著並不華麗，女人們穿著普通的女士鞋和戴著大眼鏡。他們相聚的這個府邸曾經是他們小時玩耍的地方，但是他們在這個有皇室的黃色流蘇裝飾的燈籠和黃色厚重簾子的房間裡，顯得有些侷促不安。

溥儀的表妹金愛瑤（音譯，Jin Aiyao）說：“在我記憶裡這個地方更大一些，小時候我會在院子裡繞去繞來，迷了路。”她一邊這麼說著，一邊困惑地環視四周，試圖要找回一些童年記憶。78 歲的金，是個退休的學術人員。

1949 年共產黨在中國奪得政權後，政府從溥儀的父親醇親王那裡沒收了這間府邸。溥儀也因為接受日本的安排，當了滿州國皇帝，而受到中共的判刑監禁。他的親戚很多都捨棄了“愛新覺羅”這個姓氏並加入革命隊伍。

溥儀的外甥女郭曼若現年 67 歲，回憶她如何選了一個三代務農的老公。她非常自豪地表示，她的小家庭以前並沒有什麼好吃的，住在一個又小又暗的宿舍裡。她說：“我想要證明我是新中國、而不是清王朝的一份子。”她還說，過去她因為丈夫家的貧窮出身而受到讚揚。

然而，這些從前的皇室貴族還是有些特權的；毛主席和周恩來總理派人去探望和關照他們。郭曼若記得在 1950 年代末的大飢荒中，周總理曾經送給她一隻大火腿——她從來沒有吃過火腿這樣的食品呢。這些親戚們也被鼓勵常去探望在獄中服刑的溥儀。溥儀 1959 年被釋放後，中國政府給他安排了一個待遇不錯的閑差事。

撰寫了《末代皇帝的非常人生》，以及《末代皇妹韞穌》、《末代皇叔載濤》、《末代國舅潤麒》等四部“末代皇族”系列新作的北京



鄭爽

歷史學家賈英華，當天也來到現在是宋慶齡故居的前醇親王王府。他表示：“毛澤東想要展現他的地位，想要經由表現寬大來展現他的崇高，所以皇族一直受到特別的禮遇。”

慈禧太后的後代、也是專攻清代歷史的研究者那根正表示，在共產黨執政後他們家非常貧窮，儘管如此，他記得，在他姊姊要結婚時，他母親給了她一件中國傳統服飾，在裡頭還塞了一張小張的慈禧太后畫像——那是家族裡一直收藏著的紀念物。

親屬腦海中的末代皇帝

溥儀在成人時期是一個複雜而且很難相處的人。很多人相信他是個同性戀者，他也有過幾段不快樂的婚姻。由於早年生活在紫禁城裡，是被許多諂媚且服從的太監、僕從所圍繞和照顧，與外界完全隔絕，以致溥儀幾乎無法料理生活上的一般小事。

他的外甥女鄭爽回憶，溥儀有次試圖搭乘公共汽車，但由於他“展現紳士風度”，禮讓包括售票員在內的女性先上車，售票員誤以為他不是要上車，車子就開走了。另外還有一次，她與溥儀一起去植物園旁的一家商店，才發現他根本不知道怎麼用錢。

“大舅那時想買東西，但是他不知道要用哪張鈔票，他把錢掉了滿地。”鄭爽說，“當皇帝是很慘的，沒有機會過平凡生活。”

溥儀的人生最後階段，正是“文化大革命”爆發、毛澤東暴力清算精英的開端。雖然共產黨有意保護溥儀及家人，但末代皇帝當時還是收到了威脅信，他非常害怕，自己到醫院去檢查。“我認為他是被嚇死的。”賈英華說。

皇族親戚間關於溥儀的回憶是溫馨的，尤其是他與小孩子間的愉快相處。但是整體來說，他們都表示，他們並不因為身為溥儀的親屬或是有皇族血統，而感到特別驕傲。

“這是一個祕密——我並沒有告訴別人我是末代皇帝的親戚。”郭曼若說。郭差點拒絕了出席這次的重聚活動。“所以今天我其實並不想來，我只想做個普通人。”她說。（《新史記》編譯 蕭仔君）□

近百年來，凡是提到袁世凱搞君主立憲，只說“君主”，不提“立憲”，一律稱為“復辟”，“想當皇上”，沒有人向國民解釋過，“君主立憲”是以英國和日本為藍本，與清王朝的“君主專制”有本質區別

袁世凱百年沉冤， 原因在兩朝政權

認識袁世凱的曾孫、旅居加拿大的畫家原始（原名袁緝燕）已經很多年了。2004年他到紐約來舉辦畫展，我曾與他長談，後來又常與他通電話和通過電子郵件交流。他不斷創作出抽象風格油畫新作，參加袁氏家族聯誼會的活動，以及對他有名的曾祖父的看法的深化，都及時地讓我知曉。當辛亥百年紀念日即將到來、反思中國一個世紀曲折歷程的氣氛越來越濃之際，8月26日，《新史記》記者撥通了原始先生位於加拿大阿爾伯塔的寓所的電話。

影視作品中袁世凱形象在演變

新史記：原始先生，你好！

原始：你好！

新史記：辛亥百年臨近，袁世凱再次回到當今人們的視野，對他的功過討論得越來越熱烈了。

原始：是的。2004年你首次採訪我之後，短短七年，海內外學者對辛亥革命的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挖掘整理出了很多史料，對

袁世凱的評價日趨公正。借助於這些新的史料和論述，我更清楚地瞭解了我的曾祖父，對他做出的有益於中國社會進步的大量實事，感到驕傲；為他遭受的百年之冤，感到痛心；更讓我感到憂慮的是，我們的民族，為什麼能在兩個政黨、兩朝政權的先後控制之下，在長達百年的時間裏，新聞界、學術界，不能公正地展示歷史真相，讓國民自己判斷誰是誰非，讓國民自己選擇國體政體？

新史記：對袁世凱評價的變化，從許多影視文藝作品也反映出來了。像《知音》中英若誠飾演的袁世凱、《走向共和》中孫淳飾演的袁世凱，和今年《建黨偉業》中周潤發飾演的袁世凱，可以看出袁世凱形象演變的脈絡。你看過這些影視作品嗎？

原始：三十年來，許多文藝作品塑造過我的曾祖父的形象，我看過一些。《知音》這部影片是很多年前看的，它與那個年代其它電影一樣，通篇都是虛假的宣傳；《走向共和》這部電視劇，對慈禧、李鴻章、張之洞、袁世凱、孫中山的刻劃，都比較立體、比較人性化了，讓我們看到了接近真實的、有血有肉的歷史人物。對那段歷史時期，有了全新的詮釋，是一部難得的好影視作品。《建黨偉業》這部影片的名字，立刻就讓我想起了“文革”時期的那些電影，我敬而遠之，到現在不敢看，也不想看。

新史記：哦，《建黨偉業》我建議您如果有機會，還是不妨看看。我知道，袁家另一位後人袁偉東曾經給《建黨偉業》的編導者寫過信，批評片中關於袁世凱“與日本簽署了喪權辱國的 21 條”嚴重失實，還指出影片塑造你的祖父——袁世凱的長子袁克定的形象“嚴重錯誤”。我個人認為，這部片子的“歷史為政治需要服務”的指導思想確實很難令人接受，關於袁世凱簽訂 21 條問題也確實如袁偉東所說背離史實，不過，周潤發塑造的袁世凱這個形象，還不完全是漫畫式、臉譜化，在一定程度上，表現了袁世凱的複雜處境和矛盾性格。

原始：好，那我有機會就找來看看。

新史記：或許您看了之後，對於袁世凱這個形象的內涵，能有更多的感想。

我為什麼會問起這個問題呢？因為影視作品作為重要的大眾娛

樂方式，既是大眾觀點的折射，又直接訴諸大眾的感性，塑造他們的歷史觀。有時候，一部文藝作品所描繪的人物，竟能够使千百年來民衆的看法就此定型。現在老百姓的腦海中曹操的形象，不就是由羅貫中在《三國演義》中和後來許多“三國戲”中確定的基調麼？儘管這個形象與真實的曹操並不搭界。

可惜的是，我們都認為更深刻、更真實的《走向共和》，在中國央視播放不久就贏得了口碑，卻被當局很快封殺了！我得知，電影《辛亥革命》（又名“1911”）即將上映，還是由孫淳飾演袁世凱，我們拭目以待吧。

袁世凱成為史學界的熱門話題

新史記：近年來國內關於袁世凱的書和文章很多。你也看了不少吧。

原始：是的，尤其是最近三四年，傳記性的，研究性的，資料性的……據袁偉東搜集整理列出的，有一百多種。反響較大的，有：

張永東，甘肅省社科院研究員，在香港明鏡出版社出版的《百年之冤：替袁世凱翻案》；

張永久《袁世凱家族》；

安陽師範學院教授張華騰《北洋集團崛起研究》；

還有張社生的《袁世凱》……

新史記：張社生這本，完整書名應該叫《絕版袁世凱》，是由文匯出版社出版的“絕版晚清”系列中的一本。

原始：福建出版社出版了湯伏祥的《袁來如此：袁世凱與晚清七十年》——注意，書名上並不是錯別字，就是這個“袁”。

新史記：我明白，這是一語雙關。

原始：最重要的著作，是廣州社科院研究員駱寶善整理編輯、即將出版的《袁世凱全集》，據駱教授告訴我，有幾十冊。

新史記：我最近還讀到一些，例如廣西師大出版社出版了趙燏的《晚清有個袁世凱》。

這些學者，你也見到了一些？

原始：最近幾次回國參加袁氏宗族聯誼會活動，結識了不少對袁世凱深有研究的專家、學者，像中國社科院的馬勇先生、雷頤先生，安陽師院的李桂枝教授，民革中央的蔡永飛先生，中國人民大學的張鳴教授，還有張耀傑先生、范弘先生，陳遠先生，等等。

最令我感動的是駱寶善教授，30年前他在研究晚清與辛亥革命史的時候，發現許多史料記載的袁世凱所作所為，與幾十年來官方通過宣傳工具要我們相信的對袁世凱的評價，截然不同。從那時開始，他跑遍了中國、日本各大圖書館、檔案館，挖掘整理大量檔案，經過30年，搜集整理出來大批寶貴的史料，編輯了《袁世凱全集》。這位老先生已經80歲了，可我們袁氏家族聯誼會開了三次會，他就參加了兩次。

我很驚訝地看到，那麼多與袁家非親非故的專家學者，都在執著地研究袁世凱。他們的研究成果，啟發了我們要用實事求是的態度對待歷史，不能用意識形態、一黨私見任意地扭曲或粉飾歷史，我作為袁世凱的後人，理應對他有更多、更深入的思考和評價。歷史不能被隔斷，真相不可能永遠被埋葬，只有正視，才能讓我們和子孫後代避免重蹈覆轍，讓我們中華民族能夠走出延續了幾千年的專制輪迴。

故鄉的鄉親認為 袁世凱是位偉人

新史記：您所接觸的官方和民間人士，對袁世凱的看法有什麼樣的變化？袁世凱家鄉的河南、項城等地，民間輿論如何？袁氏後人和鄉民，與一般民眾是否有差距？

原始：我感覺，近年來官方與民間對袁世凱的評價有不小的變化。對學術界發表的歷史事實真相，官方不支持，但也不反對。今年辛亥革命一百週年，國內為袁世凱“正名”的文章很多，都沒有聽說官方進行干涉、打壓。不久前張耀傑先生發表了《宋教仁的刺殺者是孫中山》，就是一個證明。

在民間就更是如此了，當今稍有分析能力的人都悟出一個道理：官方編寫的歷史不可信，包括他們自己的黨史。據我瞭解，安陽、項城的百姓，以及袁氏後人，對袁世凱都很崇敬，認為是一位偉人，對中國當時的社會進步做了很多實事、好事。

2009年9月，在項城舉行袁氏家族聯誼會成立會的那一次，我們去祭拜袁甲三（袁世凱的從祖父，袁氏家族首位官居一品的朝廷大員）、袁寶中（袁世凱的生父）的墓，一位住在附近的農民走過來。當地政協副主席袁曉林——也是袁氏後人——向我們大家介紹，這位農民從袁寨時代到現在，幾代人為袁寶中照料墓地。我們圍過去與他握手表示感謝，也向他提問。我問他一個尖銳的問題：這麼多年來，上邊一直教育人們，地主老財無不盤剝欺壓窮苦農民，袁寨對你們家究竟怎麼樣？他說，那完全是胡說八道。我們幾代人為什麼一直在這裏看守、打掃、照管墓地？因為我們感激袁家人。他說，當年袁寨還存在的時候，一到外界兵荒馬亂或者水旱災害，很多難民流落到此，袁寨人給吃的給穿的，不想走的，就收留在這兒種地；要走的，就給點兒路費……我們家就是流落到此的。1966年“文革”鬧起來，紅衛兵到這裏來要扒這個墳，我們就阻止了。當時村裏還讓農民控訴袁家人如何虐待他們，但沒有人發言。被逼得狠了，有人還站起來說，人家幾代人對我們都很照顧，我們不能昧著良心說話。

家族聯誼會推動對袁世凱的研究

新史記：請講講你們項城袁氏家族聯誼會的情況吧。比如，這個聯誼會，是從什麼時候開始聯絡、召集，籌備成立的？目前主要有什麼活動？成員的人數和組成情況如何？

原始：項城袁氏家族聯誼會成立兩年了，搞了三次活動，每年一次。第一次，2009年，袁世凱誕辰150週年時，在袁世凱的出生地河南項城宣布成立；第二次，2000年，在他的發達地——天津小站舉行活動；第三次，是今年6月，在他的長眠地——河南安陽。

新史記：哦，三次活動選的地點都很有意義啊。

原始：三次活動，在海內外引起來不小的反響。

第一次活動，海內外有 40 多人參加，提議和組織者是袁偉東；聯絡人是項城的袁曉林，我哥哥袁萌臨也是積極的推動者。這次活動，項城市政府很支持，我們沒有遇到什麼困難。

在天津小站舉行的第二次活動，除了家族會議，還舉辦了我的油畫作品展義賣，也得到小站鎮政府的大力支持。

在安陽的袁公林舉行的第三次活動，內容就更豐富了，包括家族會議、袁氏後人在袁世凱去世 95 年來第一次集體祭拜，辛亥革命和袁世凱學術研討會，張華騰教授新書《1912 – 1915 年的袁世凱》發布會；還有原始油畫作品展義賣。當地電視臺、報社都派人來了，做了報導。

在這次研討會上，專家、學者的意見並不一致，發言踴躍，不同觀點激烈交鋒。有人就堅決認為，袁世凱稱帝，無論如何是做錯了；也有人認為，袁世凱稱帝是被逼無奈。各方都引經據典，研討會時間延長了，到了吃晚飯時間，還意猶未盡。主持人張華騰教授感慨：這是他經歷過的氣氛最活躍的研討會。

新史記：看來今後每年要開一次年會？

原始：這次在安陽，我們討論過今後的活動頻度。想到這麼多人，每年聚會，並不容易，籌備起來工作量太大；年年活動，新內容不多，也不必要。今後家族聯誼會每年舉行一次會長會議，三至五年召開一次全體會議。今年 12 月，安陽師範學院將舉辦全國性的辛亥革命和袁世凱學術研討會，家族聯誼會準備參與，推動對袁世凱的研究。再過五年，2016 年，是袁世凱逝世一百週年，我們再來一次全體聚會。

新史記：袁氏家族聯誼會主要負責人是誰？

原始：現任會長是袁偉東，他是袁世凱哥哥的後代，今年 52 歲，現任民革黑龍江省秘書長，也是孫中山研究會的理事，工作能力很強，對這段歷史很感興趣，發現袁世凱有很多被冤枉的地方，所以他要致力於澄清，寫了致《建黨偉業》導演的信。

袁氏家族聯誼會的名譽會長、會長、理事人很多，名單我另外給你吧。

在曾祖父身邊展示畫作

新史記：今年你們是怎麼祭拜袁世凱的呢？

原始：今年6月6日，是袁世凱逝世95週年，家族聯誼會在安陽袁公林舉行首次集體祭拜。上午9點開始，全體後人，能參加的都參加了，還有一些學者和媒體人士。

祭拜的程序是這樣的：默哀；向袁世凱墓三鞠躬；我宣讀祭詞；向袁世凱墓獻花；全體人士繞墓一週。簡單肅穆。

這次祭拜活動得到了安陽園林管理處大力支持和幫助，圓滿成功。

跟你講兩件奇怪的事——

當袁氏後人列隊祭拜之際，袁公林一個工作人員看到在陵墓旁有條蛇，立起身觀看——他們在這裏工作多年，從沒見過；祭拜儀式下午在袁公林禮堂開研討會，本來天空晴朗，瞬間烏雲密布，昏暗如夜，頃刻間雷鳴電閃，暴雨如注，20分鐘後雨過天晴。在場專家、學者、官員、來賓，無不稱奇。

我是不信迷信的無神論者，但親身經歷這兩件事，難免產生一些聯想：95年來第一次祭拜，袁世凱若九泉有靈，想必也是感慨系之吧。

安陽市長當天晚上宴請我們選出的六個家族代表，我也是其中之一；駱寶善、張華騰等學者代表、共識網和《領導者》雜誌負責人周志興等媒體代表。席間，大家也熱烈地討論對袁世凱研究的動態和新觀念。市長是位國畫愛好者，我倆就更有共同語言了，他當場要他的秘書去他的辦公室拿來了幾張他的作品，給大家欣賞。

新史記：這次在袁公林舉行的你的畫展義賣情況如何？

原始：開幕式剛剛結束，我的兩幅油畫就售出了，一幅是《春到燕郊》，一幅是《古都印象》，收藏者是國內一家企業，義賣所得十萬

人民幣，全部捐贈給家族聯誼會，用作活動基金。

你知道，我的一生頗為坎坷。在“文革”中最艱難的日子裏，我也沒有放棄繪畫，現在想起來，這份執著，這份責任感，這份毅力，除去對繪畫的癡迷，也有袁世凱的一份基因。在袁公林舉辦畫展的開幕式上，我激動地說起：習畫五十多年，今天實現了我的夢想，在曾祖父的身邊展示我的畫作，讓他看到他的後人像他一樣，也都是實實在在地做事的人。

新史記：想必祭拜又促發了你新的創作靈感？

原始：從安陽返回加拿大之後，這股激情一直不肯消退，我在這種情緒的激發下，創作了兩幅與祭拜先祖有關的油畫。

執政者的難言之隱？

新史記：您認為，目前對袁世凱研究的難點是什麼？

原始：眼下對袁世凱研究的難點，還是在於官方不支持。雖然在學界，對袁世凱的功過，有了趨於公正的評價，得到史料支持，但是民間，由於受到近百年的誤導，對袁世凱的評價還是負面居多。

新史記：突破的症結何在？

原始：突破這一症結的辦法，我看很簡單，就是公開辛亥革命前後的歷史檔案，讓國民看到歷史真相——是誰，在中國建立了現代陸軍、現代警察，興辦了工業、鐵路、貿易銀行；是誰，廢除了科舉，興辦了新學、女子學堂；是誰，運用掌管的軍事力量，迫使清王朝退位，並且史無前例地沒有殺戮皇室，給予清王室優厚的撫恤金，和平改朝換代……

與此同時，又是誰，為了籌集軍費推翻滿清，不惜與日本簽訂秘密協議，割讓東三省，為了建立自己的軍隊，而接受蘇俄的盧布、軍火與教官，引狼入室，最終將外蒙古等大片國土拱手讓人？

新史記：公開史料，讓國民看到歷史真相，這些雖然說起來簡單，但是很難做到啊。

原始：是啊，這樣將引發連鎖反應，幾十年來不允許談論的諸

多真相，都將浮出水面。這些都是國民黨、共產黨執政者所不願面對、不敢面對的。我認為，這就是袁世凱沉冤百年的原因。

我跟你對比袁世凱和孫中山的所作所為，並不是糾纏過去，而是以史為鑒，吸取教訓，讓民國以來各個時期的領袖和中國的各色人物，都得到公平、公正的評價。

三樁“劣跡”已真相大白

新史記：我拜讀了共識網對你的採訪，你講得很詳細。最近又有新的看法嗎？

原始：2011年6月，我在北京接受共識網採訪，由於時間倉促，有些問題沒有講清楚。例如袁世凱是怎樣一個人，這是他們記者問我的，但說了一半話頭岔開了。近年來，我閱讀了很多文章和史料之後，我認為，袁世凱在清朝末年，可稱為一個能臣。出使朝鮮，治理山東河北，小站練兵，推行新政，發展工業、金融和教育，在很多不同的領域都開創了中國的“第一”，是繼李鴻章之後推進中國現代化的重要人物。辛亥革命成功，袁世凱功不可沒，有黃興、黎元洪推舉袁世凱為首任大總統的親筆信為證。

近百年來，袁世凱備受指責的三件事，告密，簽訂 21 條和稱帝，經過衆多歷史學家的考證，可以說已經真相大白。

首先說戊戌變法時的“告密”。袁世凱即便是想告密，他也不具備作案時間哪——戊戌那年，可不像現在這麼方便，發個短信、撥個手機就把信息傳遞出去了。這個過程太複雜了，我不想在這裏囉囉嗦嗦，讀者有興趣，可以去查。

關於“簽訂 21 條”，袁世凱在日本的巨大壓力之下，想盡了各種辦法，拖延抗爭，最終簽訂的，是兩個條約共計 11 條，日本提出的旨在滅亡中國的第五號中的各條款，都被刪除了，根本就沒有列入討論。過去說“袁世凱簽訂 21 條，是為了換取日本支持他稱帝”，這是對歷史的完全無知：自袁世凱在朝鮮打敗日本人後，他就成了日本滅亡中國的最大障礙，必欲除之而後快。

關於稱帝，民國初年，百廢待興，袁世凱名為“大總統”，但是國會掌握在國民黨人手中。他所提出的議案，都遭到國會的否決，無法施政，無所作為。他是個幹實事的人，擔任大總統之後，反而幹不成事兒。當時的精英嚴復、梁啟超、楊度等人，為什麼支持袁世凱搞君主立憲？就是因為他們看到當時中國的國情，不適宜搞議會制，尤其是看到了孫中山任臨時大總統時，主張搞總統制；讓給袁世凱當了大總統之後，他又主張搞總理制。所以袁世凱搞君主立憲，是迫於形勢而無奈，也有一定民意支持。不過，從社會發展的角度看，剛剛推翻了滿清帝制，又搞君主立憲，這就有倒退歷史之嫌。此舉無疑是他人生中的敗筆。

近百年來，凡是提到袁世凱搞君主立憲，只說“君主”，不提“立憲”，一律稱為“復辟”，“想當皇上”，從來沒有人向國民解釋過，“君主立憲”是以英國和日本為藍本，與清王朝的“君主專制”有本質區別。在袁世凱的遺囑裏，推舉了三人為繼任者，其中並沒有袁家人，這也可以看出他並不想搞“父傳子”的“家天下”。

人常說，歷史功過任後人評說。一百年過去了，已經是第四代、第五代後人了，至今我們還不能公平、公正地評說袁世凱這段歷史，讓人感慨。難道，沉冤百年還不夠，還要再沉冤百年？但願打破我們的文化傳統中這個成王敗寇的千年怪圈！（《新史記》記者 高伐林）

□

項城袁氏家族聯誼會名單

名譽會長：

袁家楫（天津市政協委員，袁世凱二兒子袁克文之四子）

袁家淦（紐約大學教授，袁世凱八兒子袁克軫小女兒）

袁家瑋（台北，公務員，袁世凱六弟袁世彤之孫女）

會長：

袁家誠（天津醫院放射科主任，袁世凱十子袁克堅之子）

常務副會長：

袁偉東（哈爾濱，長門袁世昌後人，民革黑龍江省委秘書長、中國辛亥革命研究會常務理事）

副會長：

袁緝燕（加拿大籍畫家，袁世凱長子袁克定之孫）

袁曉林（項城市政協副主席，袁世凱六弟袁世彤曾孫）

袁道唯（美籍華人，愛立信駐大中華區諮詢總管，袁世凱五弟袁世鋪後人）

袁宏宇（天津供電局幹部，袁世凱六子袁克恒長孫）

袁宏信（天津工商局處長，袁世凱十五子袁克和之孫）

袁侃（北海工藝美術有限公司總經理，袁克文曾孫）

吳綺雯（上海，袁世凱五弟袁世鋪後人）

袁緒承（天津，袁世凱三子袁克良之孫）

袁啟和（美籍華人，外企高管，袁世凱長子袁克定曾孫）

袁啟明（鄭州管城中醫院，袁世凱六弟袁世彤後人）

秘書長：

袁偉東（兼）

副秘書長：

袁啟方（北京，袁家誠之子）

袁仿吾（美國，袁緝燕之子）

理事（名單略）

關於辛亥革命性質的界定，最不靠譜的是“軟弱的資產階級革命論”。這一說法，旨在證明無產階級比資產階級高明，共產黨比同盟會—國民黨正確，指責後者不敢發動工農，因而不敢和不能把戰火燒遍全國，導致辛亥革命失敗。這其實是昧於實際情況的宣傳語言

清末已在改革， 為何爆發革命？ ——答《新史記》記者高伐林

2011年10月3日，《新史記》高伐林先生提出以下8個問題，要筆者回答。這些都是當前辛亥革命研究中有爭議的問題。每個問題都應撰寫專文，才能說透。不敢拂逆高兄盛意，不揣淺陋，略獻芻蕘；不當和不及細論之處，敬請高兄和讀者指正和原諒！

辛亥革命是什麼性質的革命？

新史記：站在今天21世紀的高度，如何給百年前的辛亥革命定性最能體現其本質？對眼下“軟弱的資產階級革命論”、“未完成的自由民主革命論”、“在特殊有利條件下偶然成功的排滿民族主義革命論”這種種說法，您的看法如何？

袁偉時（以下簡稱“袁”）：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特別是歷史研究，需要紮紮實實搜集材料，認真分析；在概念上繞圈子，沒有多大意思。



中山大學教授袁偉時。
(Photo By Jonas)

辛亥革命有兩個定性簡單明瞭，是多數史家的共識：
就歷史任務而言，辛亥革命是“未完成的自由民主革命”。
就思想動力來說，它是“排滿民族主義革命”。

胡漢民說得好：“同盟會未嘗植其基礎於民眾，民眾所接受者，僅三民主義中之狹義的民族主義耳。正惟‘排滿’二字之口號，極簡明切要，易於普遍全國，而弱點亦在於此。民眾以為清室退位，即天下事大定”。（註1）

當年各省“獨立”，打出的旗號大都是“大漢軍政府”，“光復”之類，足以證明此言非虛。而最好的註腳則是孫文自己的言行。1912年1月12日，清室退位，15日孫文居然率文武百官爬上紫金山去拜祭明太祖朱元璋，宣讀祭文，說辛亥革命大功告成的原因：“實維我高皇帝光復大義，有以牖啟後人，成茲鴻業。”（註2）

以朱元璋驅除蒙古人、光復漢族皇室事業的繼承人自居，滑稽有趣之餘，充分袒露了這群人的內心世界。

1912年3月31日，孫文幹了三個月臨時大總統，要下台了。他在南京同盟會員餞別會上發表演說稱：

“今日滿清退位，中華民國成立，民族、民權兩主義俱達到，唯

有民生主義尚未著手，今後吾人所當努力的即在此事。”（註3）

於是，他把修鐵路視為自己的主要任務和實現民生主義的中心環節。

這些言行強有力地證明，孫文革命活動的最根本的動力，是光復漢族河山，把他說的“外國人”即“韃虜”趕出關外。不但民眾接受的是“狹義的民族主義”，連孫文這樣的革命主要領袖也未能免俗。這些言行同時證明他對民權的理解是十分膚淺的。

關於辛亥革命性質的界定，最不靠譜的是“軟弱的資產階級革命論”。

“軟弱”表現在哪裏？

胡漢民說：“故當時民眾心理，俱祝福於和議。逆之而行，乃至不易。……而亦為當日失敗之重要原因也。”（註4）

保障自己的人身和財產安全，是人性的本然。武力反抗暴政是迫不得已的最後手段；南北議和是人心所向。孫文及其支持者在協議基本達成後，仍然冀圖不惜代價借外債發動“北伐”戰爭，受到各界同胞抵制，是對錯誤決策的正常反應。由於革命派信譽度不足，借不到外債，無法支撐他們延續戰爭，迫使他們不得不接受和議。要是說被迫接受和議是“軟弱”的話，那是政治家的過錯，與“資產階級”有什麼關係？何況這些政治家也是無可奈何才接受和議的。

作為參與這一歷史事件的政治家，胡漢民責怪“民眾心理”導致辛亥革命失敗，無非證明自己缺少反思精神。

而就理應客觀地觀察歷史現象的學者而言，南北議和，減少生命財產損失，本是利國利民的大好事，反過來據此貶斥革命派軟弱，鼓勵不顧實際情況和後果去走極端，也是不足取的。

史家中有些人持這一說法，則旨在證明無產階級比資產階級高明，共產黨比同盟會——國民黨正確，指責後者不敢發動工農，因而不敢和不能把戰火燒遍全國，導致辛亥革命失敗。

這一論調其實是昧於實際情況的宣傳語言。

清室退位
後孫中山率文
武百官拜祭明
太祖朱元璋。



當時工農的主要組織形式是幫會或綠林好漢。辛亥革命，有數以百萬計的“民軍”捲入大潮，他們就是被革命黨人引入城市的工農。1911年9月7日開始圍攻成都和其他城市的“保路同志軍”，不就是袍哥領導下的工農大眾嗎？其他各省的“民軍”情況大同小異。不過，這些民軍為推倒舊政權立下汗馬功勞的同時，也以破壞治安、禍害百姓著稱於時。

其實，橫看當時中國各階層，最強大的是資產階級。豎觀百年中國史，辛亥前後亦是資產者影響最為強大、獨立性表現無遺的年代。

武昌起義，衝鋒在前的是新軍，而穩定社會，支持革命戰爭的是商會和資產階級。

“武昌首義期間，商會、商團資助民軍經費達100多萬元。……部隊膳食支出，由商會墊借五萬金，分配作臨時食費。漢口商務總會籌巨款供招新軍一鎮之薪餉，還推舉商董四員專業軍需，接濟糧台。”“當時民軍主力集中用於戰事方面，商團則維持社會治安，日夜操練，荷槍實彈，晝夜梭巡”。（註5）

軍政府組成後，湖北諮議局議長湯化龍負責民政工作，大批商人參加工作。

沒有商會和商人的支持、幫助，武昌起義後武漢三鎮的局面不

可能那麼快穩定下來，革命戰爭也很難堅持下去。

各地的商會都是商人自主、自治的組織，有的實際上是當地的自治政府。例如，1905年成立的城廂內外總工程局（1909年6月18日改稱上海城廂內外自治公所）就是一個地方自治政府，而且參與了上海起義的全過程。其他宣布獨立的各省商會也普遍參與了“光復”大業。軍閥混戰之際，軍隊流竄各地，保護地方，維護治安，免遭蹂躪的重責，通常也是由商會及其自治武裝——商團承擔的。

當時斷送建設現代民主自由國家偉業的是那些眼光短淺的政治家。他們玩弄政客伎倆，爭權奪利，把從實際情況出發，鞏固和完善三權分立的政治體制和保障公民自由的大業置諸腦後。資產階級不應該成為他們的替罪羊。

失敗主因是 沒牢固樹立法治觀念

新史記：對於中國從傳統社會轉型為現代社會而言，辛亥革命在哪些方面取得了成功，哪些方面遭遇了失敗？您曾提到，中國轉型艱難，“主要原因是中國傳統社會和傳統文化自身的缺陷。這與缺乏法治傳統息息相關，國民黨和北洋實力派，都沒有牢牢樹立法治觀念，而把奪取政權放在第一位”。現在有這樣一種議論，認為未能施行法治，非不為也，是不能也，法治不適合當時的國情，各方首先是試圖在法治的軌道上解決問題的，但屢屢碰壁。您認為是什麼原因導致他們不能“牢牢樹立法治觀念”？



陶成章



陳其美

袁：辛亥革命有三大收穫：

- 1, 建立了三權分立的政治體制。
- 2, 言論自由。
- 3, 三綱坍塌，宗法專制的思想體系開始瓦解。

失敗則在這些收穫沒有鞏固下來。主要原因是北洋實力派和國民黨都沒有牢固樹立法治觀念。他們口頭上也講法治，但行動上往往背道而馳。例如：

袁世凱居然成立軍政執法處，不經司法部門肆意抓人、殺人。

同盟會和國民黨呢？1, 動輒暗殺或捕殺和自己意見不合或被懷疑為政敵的人：陶成章（光復會領導人），陶駿保（革命軍江浙聯軍參謀長）、黃遠生（民初最著名的記者）、夏瑞芳（商務印書館創始人）等都先後死於他們槍下。

2, 一不如意，就起兵鬧事，用槍桿子解決矛盾。“二次革命”，“護法戰爭”，“北伐”，“東征”，“國民革命”，直到政權奪到自己手上為止。這些行動都被美化為不容置疑的“革命”，一一檢視，大都是權力或利益之爭。

任何一個制度的建立和鞏固都有一個過程。清末實行新政才開始建立新式法院系統，民國成立後，繼續推廣，但馬上碰到一個問題：人才不夠。司法總長梁啟超不得不下令收縮。他說：

“故立憲國必以司法獨立為第一要件……我國之行此制，亦既經年，乃頌聲不聞，而怨吁紛起，推原其故，第一由於法規之不適，第二由於法官之乏才。……今當草創之際，難期速成……其籌備未完諸地方，則審檢職務，暫責成行政官署兼攝，關員佐理。模範既立，乃圖恢張”。（註6）

這些情況多半出現在邊遠地區。除此之外，法治是現代社會的基本特徵，有法院之處，都應該有可以立即實行的規則，而沒有所謂“國情”的差別。國情特別論不過是專制統治者或暴民掩蓋其非法行為的藉口。

通過司法過程解決社會矛盾，通常會比較緩慢，但換來的是逐步養成人人依法辦事的習慣，社會賴以長治久安。以宋教仁被刺案

來說，當時司法審判為什麼不能正常進行？人們指責當局拖延。事實如何？

1. 主要犯罪嫌疑人或死或逃。

刺殺宋教仁的主凶武士英和這次暗殺的組織者應夔臣，都在法租界關押 20 多天後移交給中國當局。前者 6 天後卻離奇地在拘押的軍營暴斃；後者竟然成功越獄。另一主要嫌疑人、國務院內務部秘書洪述祖在宋教仁被刺後第六天（3 月 26 日）逃離北京，遁入青島租界，而德國當局拒絕引渡。

當時控制上海的是國民黨要員和青幫大頭目陳其美。人們普遍認為上海接連出現的犯罪嫌疑人暴斃和越獄的戲劇，是陳其美操縱下演出的。洪述祖逃逸則可能與趙秉鈞有關。調查清楚有關案情，作出公正審判，正是司法機關責任所在。缺席審判，世所常見。這些都不是中斷司法進程的理由。

2. 由地方法院審理，還是組織特別法庭審理？

江蘇都督程德全、民政長應德閔主張組織特別法庭審理；袁世凱覆電同意。但是應夔臣的辯護律師認為此舉違法。司法總長許世英也認為組織特別法庭沒有法理根據，不惜以去就力爭。司法部致電上海地方審檢廳說：

“宋前總長為民國偉人，本案審理自當格外慎重，程都督擬組特別法庭，即系此意。惟與《約法》、《編製法》不符，礙難照辦。本部斟酌再四，仍應由該廳負完全責任，審理所有一切。……該廳即速依法進行。”（註 7）

上海地方檢察廳亦已著手傳訊有關人員。就程序而言，沒有問題。

通過司法途徑解決糾紛，確實比較緩慢。從 1913 年 3 月 20 日刺宋到 7 月 12 日“二次革命”爆發，不足四個月，中間波瀾迭起，並不奇怪。無論有什麼障礙，如果國民黨方面堅持遵循司法途徑辦理此案，民國政治史就會重寫。

當時全國各界異口同聲，呼籲通過司法程序解決宋案，實行法治，維護社會穩定。這是最大的“國情”！可惜，但孫文等國民黨領

導人充耳不聞，先是冀圖暗殺袁世凱；繼而不顧黨內外反對，不自量力，一意孤行，發動“二次革命”，冀圖用槍桿子決是非，法治進程因此中斷，一個多月後，全軍覆沒。由此可見，出現這個局面，不是由於“國情特別”，也不是民眾水平低下，而是國民黨領袖尚未告別草莽英雄的氣概，染上革命幼稚病，抗拒法治，從而造成這樣的惡果。

應該指出，這是各國革命黨人的通病。糾正這些領導人的錯誤所付代價的大小，則與法治傳統強弱有關。

戰禍全由於《臨時約法》不良

新史記：與此相關的一個問題是，辛亥之後數十年的亂局，人們追溯到與《臨時約法》的嚴重制度缺陷有關，而這又是南北矛盾“因人設制”的結果，引發一波又一波嚴重政爭與分裂。您對《臨時約法》如何評價？

袁：1925年，民國元老熊希齡和胡適、馬君武等8人曾聯名沉痛地指出：“民國十三年來之戰禍，全由於《約法》之不良。府院之爭、行政立法之爭，無非《約法》所致。”（註8）這是身歷其境的政治家和知識分子的深刻反思，可以說是經得起推敲的定論。過去，史家們由於深陷意識形態陷阱而不覺，沒有注意他們這一重要經驗總結。

去年筆者曾撰文（今年一月發表），系統分析《臨時約法》的弊端。（註9）概括起來，要點是：

第一，制憲機構代表性不足，程序也有問題。

辛亥革命後，臨時政府成立的法理根據是1911年12月3日議決公布施行的《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組織大綱》。孫文和袁世凱都是依據這個憲法文件當上臨時大總統的。這個文件當然很不完備，但是，制定更完備的憲法文件需要智慧、知識和足夠的公信力。當時聚集在南京的17省代表恰恰忽視了這個重大問題。1912年1月28日臨時參議院宣布正式成立，它是由各省軍政府各指派三名代表組成的，共有參議員42名。臨時政府遷到北京後，根據《參議院法》，

臨時參議院改為每省區派出代表五人，原則上由省議會選出，參議員人數增至 122 人。為什麼不等待參議院更加完善或正式國會選出後，再來制定這麼重要的文件？

與此同時，制定如此重要的憲法文件，卻把當時最大的實力派、第二任臨時大總統袁世凱方面的代表排除在外，其公信力和未來實施的保障都不無疑問。

而從程序上看，也有問題。《臨時約法》是 1912 年 2 月 6 日開始審議，3 月 8 日通過的。2 月 12 日，清帝宣布退位；14 日，臨時參議院接受孫文辭職；15 日，袁世凱當選臨時大總統。審議開始後，袁世凱已是當選總統，卻從未徵求他的意見，也不由他簽署公布，卻授權已經被參議院批准辭職的總統在 3 月 11 日簽署公布，這是世界憲法史上極為奇特的現象。

第二，動機不純，過程粗糙，學識不夠，缺陷很多。

《臨時約法》按其內容來說，要點是把已經付諸實施的總統制突然改變為內閣制，釜底抽薪，削掉袁世凱當選時按規定應該掌握的大部分權力。由於動機不純，這個文件制定非常匆忙，從推定起草人到三讀通過，只費時 37 天！加上文件起草人學識和實踐經驗都不足，為國家長治久安的制度建設考慮不周，且沒有廣泛徵求各方和廣大公民的意見，最後通過的文本漏洞和失誤不少。



倉促制訂的《臨時約法》。

綜合眾多中國憲政史學者的研究，主要缺陷有如下五個：

1. 名不正。

究竟是總統制還是內閣制？

它規定“臨時大總統，代表臨時政府，總攬政務，公布法律。”儼然實行總統制；簽發這個文件的孫文 1918 年與參加“非常國會”的議員談話，仍然認為：“約法規定為元首制。”（註 10）。但它又規定“國務員於臨時大總統提出法律案，公布法律，及發布命令時，須副署之。”從而任何國務員（國務總理和各部總長）均有否決總統決定的權力。可是，作為內閣制去運行，它又沒有建立相應的必不可少的配套制度。諸如此類的缺陷，為日後政爭埋下了禍根。

2. 沒有確立保障公民自由的制度。

《臨時約法》的起草人，大都是留學日本尚未完成學業的年輕人。他們勇氣可嘉而學養和從政經驗都十分欠缺。這些 20 世紀初活躍在東亞最大國家的革命者，與第一部現代成文憲法——18 世紀的美國憲法制定者的素質差距實在太大了。他們沒有認識到自由對人類發展的關鍵作用，沒有像美國先驅們那樣在憲法上寫上：

“國會不得制定關於下列事項的法律：確立宗教或禁止信仰自由；剝奪人民言論或出版的自由；剝奪人民和平集會及向政府請願的權利。”（註 11）

他們跟在日本人的屁股後面照搬大陸法系，在列舉一堆“人民得享有下列自由權”之後，加上一條“得依法律限制之”的尾巴，從而為執政者制定剝奪公民自由的惡法打開後門，讓此後的中國史平添不知多少苦難和血淚。

與此同時，它沒有解決一個重大問題：如果行政當局肆意侵犯公民的自由，甚至拘捕公民，受害者通過什麼途徑保護自己？《臨時約法》一公布，留英歸來的法律學者章士釗就尖銳地提出這個問題。他建議應該仿效英國建立人身保護令制度，權利受到侵犯的公民或其親友，可以向法院申請人身保護令，強制有關機關把被拘留者移送法院，依法審查拘捕是否合法和依法辦案。

3. 國會與總統沒有互相制衡的制度，是一個殘缺的內閣制。

早就有學者指出：

“蓋純粹內閣制中有兩權焉：一為不信任案通過權，一為解散國會權。前者為國會借以監督行政之利器，後者為內閣抵抗國會訴諸人民以求公判之唯一途徑。……而《臨時約法》皆無之，不可謂非《約法》之大缺憾。”（註 12）

由於行政當局沒有國會解散權，國會議員肆無忌憚，隨之而來的是兩大惡果：一是行使職權時不顧後果，一意反對。另一是自身的腐敗愈演愈烈，最終以曹錕賄選的醜劇宣告自己的滅亡和國家更大的悲劇的開始。

4. 總統與總理各自的職權和相互關係不明確。

袁世凱可以利用“臨時大總統，代表臨時政府，總攬政務，公布法律”的規定，指揮一切。而袁世凱逝世後，段祺瑞當總理，也可以迫使黎元洪淪為蓋章總統。當黎氏心有不甘，冀圖反抗的時候，總統府和國務院權力之爭的終於導致張勳復辟。黎氏之後，府院之爭也史不絕書，成為民國亂局的一大根源。

5. 沒有建立違憲審查制度。

可能原先估計，正式憲法很快就要制定，沒有考慮會出現很多複雜的情況，根本沒有提及違反《臨時約法》的爭議如何解決。等於建好一座大廈，卻沒有配備消防設施。

說到底，這是革命幼稚病發作，使出一個連環計，把一手交出去的權力，換個手要回來。

這些失誤，一直影響民初政局的發展，直到 1928 年國民黨奪取全國政權，建立黨國體制為止，是各項紛爭的制度原因。

清末已在改革，為何爆發革命？

新史記：李澤厚先生最近再次延續他“告別革命”的思路，在接受採訪時說，要“告別辛亥革命”。余英時先生則認為，沒有什麼“清末新政”，清廷並無真正改革可言，所以逼出革命。您說過，晚清的當政者“是否能順應歷史潮流而採取改革與其步驟，這才是關鍵點。如果在

改革步驟上跟得上歷史潮流，中國轉型的成本就不會這樣高昂”。請問您對清末改革與革命的關係怎麼看？

袁：從 1840 年的鴉片戰爭到 1900 年義和團事件，60 年間付出巨大代價，解決了一個問題：中國要不要學習西方，接受現代文化？

1901 年開始的清末新政，進行了四大改革：

1. 教育改革。廢除了科舉，建立新的教育系統，學習內容與現代文明接軌，不再局限於中國傳統的經史。

2. 司法改革。斷然廢棄傳統的中華法系，接受大陸法系，制定新刑律、新民律和民事刑事訴訟法，取代之已久的《大清律例》；相應地著手建立獨立的審判廳系統，取代傳統的司法與行政統一的體制。

3. 啟動官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宣布自 1908 年開始為期九年的預備立憲計劃。在實際執行中，並非徒託空言。各省咨議局和資政院先後成立，初顯威力。取代傳統的縣知事一元化領導下的宗法專制體系，鄉鎮至縣一級的三權分立的地方自治正在進行。

4. 掃除阻礙工商業發展的種種限制，政府主動推動商會等非政治性的民間團體發展，經濟自由日益擴大，促進經濟進入了高速發展時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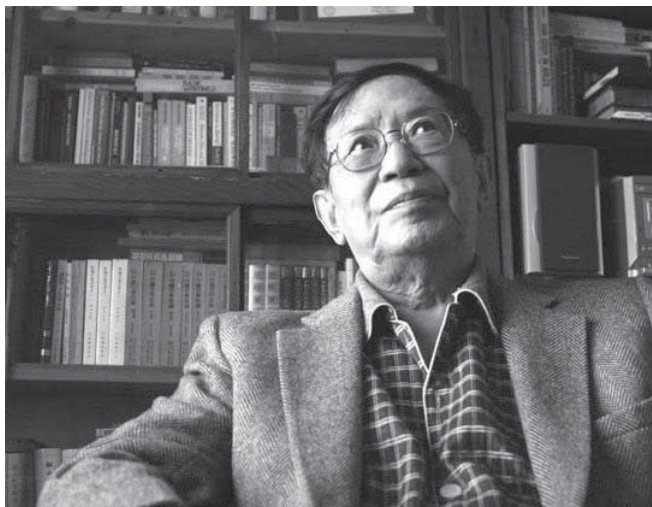
這些改革是重大的制度性變革，不但促進了當時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而且進入民國後後續效應十分明顯。那麼，為什麼會爆發革命呢？

一是對抗、打壓群眾請願運動。

1910 年初至 1911 年初爆發四次大規模的請開國會運動，清政府沒有順應民心，當機立斷，立即推行民主，實行憲政。反而羈押、遣送請願代表，只答應提前三年在 1913 年召開國會，實行憲政。

二是官制改革不進反退，1911 年 5 月 8 日宣布成立內閣。但是這是一個畸形的“皇族內閣”。內閣成員 13 人中，滿族 8 人，其中皇族又佔 5 人；蒙族 1 人；漢族只有 4 人！於是，士紳和中產階層對改革徹底失望，從反對革命轉向保持中立乃至同情或支持革命。

三是忘記洋務運動失敗的教訓，違反法令，把依法成立的民



一再直言必須“告別革命”的李澤厚教授。

營川漢鐵路公司經營的鐵路幹線收歸國有，激起強烈反抗後，又火上澆油，拘押保路運動領導人，開槍打死示威群眾 32 人，終於導致 1911 年 9 月 7 日開始，四川“保路同志軍”圍攻成都等地，內戰延續一個多月，促使武昌秘密革命組織——文學社和共進會乘機發動起義，引發各省獨立大潮，大清帝國坍塌。

三項抗拒歷史潮流的倒行逆施導致改革進程中斷，重建全國秩序的過程漫長、崎嶇，代價巨大。

李澤厚教授痛心疾首，一再直言必須“告別革命”，是他對這一歷史事件的經驗總結，值得人們深思。

中國有沒有“光榮革命”？

新史記：過去人們只認革命派為進步動力，又批評其“軟弱”“妥協”。在晚清辛亥革命的諸種力量中，對立憲派的作用，人們越來越給予肯定；最近又有學者高度評價清廷的“遜位”，認為如果單純的按照革命黨人的種族革命，很可能只是在漢族地域形成一個小中華，而廣大邊疆，例如內外蒙古、新疆、西藏，很快就會解體。清帝的遜位止住了解體趨勢，把一個完整的帝國移交給共和國。您認為，從推動中國在政治上

順利轉型的意義上，革命派、立憲派、清廷等等各有什麼正面和負面作用？

袁：高全喜教授對清帝《遜位詔》的法理學分析，說它是中國“光榮革命”的標幟，別具法眼，啟迪人們從新的視角思考辛亥革命，不失為學術上有益的探索。

不過，愚意以為辛亥革命後，除 1987 年後的台灣，中國沒有“光榮革命”。1987 年後，台灣社會轉型，被稱為“寧靜的革命”，確是東亞走向現代化的光榮革命。

翻開世界史，稱得上“光榮革命”的政權轉移，必須具備兩個特徵：

1. 過程是和平或基本上是和平的。
2. 結果是實現了法治，保障了公民的權利，推動經濟繁榮，國家進入了長治久安的軌道。

第一條，辛亥革命差強人意，流血不算太厲害。此次革命雖然種族革命的氣味很濃，但是，革命爆發後，各方快速調整思路，以“五族共和”取代“光復大漢江山”，除少數城市外，沒有出現滿漢或其他民族間的衝突，那麼大的政治變動，殺戮、流血，不算嚴重。

第二條則差距太大了。在一個百年來革命和戰火頻仍，民主、法治尚是奮鬥目標的國度，談論有過“光榮革命”，似乎想象的成分太大了。

大清帝國與中華民國之間的政權轉移，主要是革命派、立憲派和北洋實力派三方合力的結果。清廷在三大勢力夾擊下，順應潮流，和各方達成和平遜位的協議，讓戰火迅速熄滅，減少了社會震蕩，善莫大焉。《遜位詔》的積極意義應該肯定。

此舉多方共贏，對任何一方都沒有負面作用。以最激進的革命派來說，它在財政上瀕臨破產，協議達成正好給了它一條走出困境的康莊大道。

沒有《遜位詔》，中國會不會解體？推測意見，見仁見智，可資談助，實際意義不大。現實情況是除蒙古分出去以外，中國其他疆域基本完整，與同一時期的奧斯曼帝國、奧匈帝國土崩瓦解的狀況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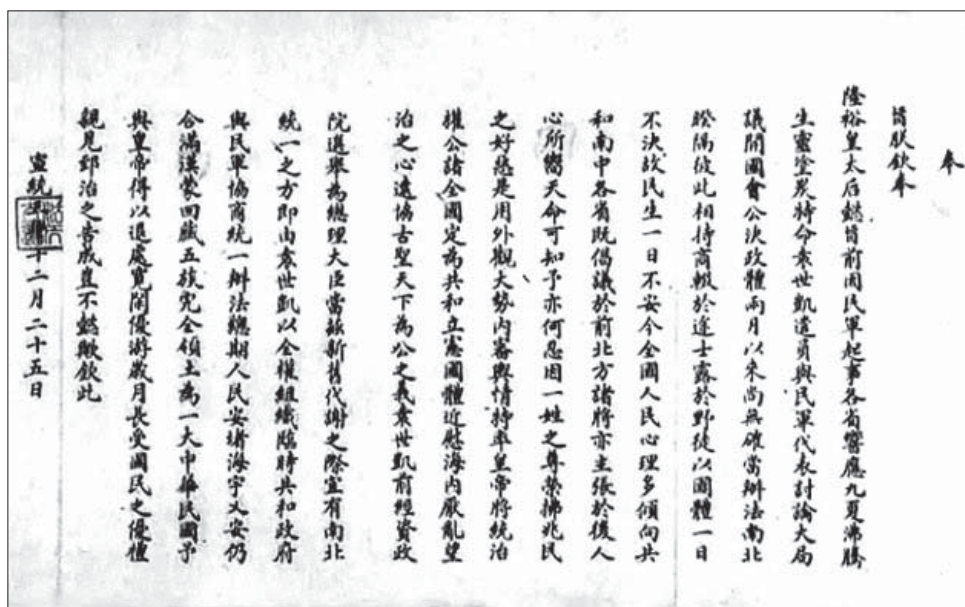
不相同。疆域和民族的分合，取決於多種內外因素，必須具體分析；一紙《遜位詔》，似乎沒有在其中起到什麼作用。

文化與制度不容混淆

新史記：從文化角度來看，辛亥有哪些方面是與傳統決裂，哪些方面延續了傳統，而今天，又有哪些方面與辛亥傳統斷裂，哪些方面是一脈相承？

您曾說過，“中國文化可分為制度層面和非制度層面。百年來文化討論糾纏不清，各不相讓，原因之一就是沒有注意這個區分”。能否更進一步說明，沒有注意這個區分，導致討論中怎樣的混亂和誤區？

袁：辛亥革命後，皇帝退位躲進紫禁城過日子，三綱的制度基礎坍塌。自由、平等、民主取代三綱成為公認的是非標準，這是與傳統最大的決裂。但是這一條不夠鞏固，成為後來政治和新舊文化衝突的重要根源。至於社會生活的其他方面，其演變是自發和漸進的，無所謂決裂問題。



清帝《遜位詔書》。

百年來，中國知識階層中有些人，老是不承認任何國家要成為現代國家，就必須堅定不移建立現代政治制度——自由、民主、法治、分權制約的憲政制度，現代經濟制度——市場經濟制度，以學術自由為核心的現代教育制度，以言論自由為核心的多元的文化制度；而這些制度不論任何國家都是大同小異的。至於非制度層面的文化，則蘿蔔青菜各有所愛，本來應該兼容並包，自由探討，自由演進，自然更替。

可是，有些人混淆文化與制度，一再冀圖用自己喜愛的某種思想文化觀點去修改現代社會制度。於是，在報刊上一再掀起陣陣波瀾。不過，在實際生活中作用甚微。比如，張君勱提出，根據中國的國情，要實行“均貧寡安”的“社會主義”，反對“偏重工商”；梁漱溟反對牟利；而實際生活並沒有按照他們的願望前進。現在有些人提出“儒家社會主義”、“儒家憲政主義”之類的主張，更是茶杯中的風暴而已。

這種社會現象有兩個特點：

1, 一代不如一代。

從康有為到張君勱，他們的政治和文化主張都非常明確。例如，康氏提出要定孔教為國教，國民須“各守名分”，滅掉回教、耶教；在他所策劃的大同世界中，無私產，實行計劃經濟；子民連陰毛都要剃掉，等級分明，嚴格監控個人的一舉一動，做愛也要得到醫生同意！國人著書則要交翰林院審定！白紙黑字，毫不含糊。

而甘願拜倒在他們腳下的當代論者，不但學養、社會影響力無法望其項背，說話也躲躲閃閃，與他們奉為偉大先驅的康有為、張君勱等人直書政見大異其趣。當代儒學鼓吹者除蔣慶提出“大儒”和“帝王”和“聖賢”的後裔擁有否決權的三院制的主張外，誰也不知道其他幾位的具體主張是什麼。是不是擔心亮出自己的具體主張後，會戳穿憲政外衣呢？且待下回分解吧！

2, 淪為前現代社會制度的紋飾。

現代社會是有共同標準的。不管主觀意圖如何，他們的主張和設計，正好符合要抵制社會制度現代化的政治家們的意願。

可是，“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如此等等，不過是社會現代化過程中泛起的浪花。歷史洪流無情地把康有為及其徒子徒孫沖刷到小港灣中自娛自樂，企盼有人鑒賞。

歷史人物失誤 兩個值得重視的原因

新史記：您如何評價晚清大變局中的孫中山、袁世凱等各派勢力的領軍人物？能否具體闡述一下，他們的思想缺陷如何具體與中國社會的深層結構有關？我們今天評價這些人物，應該抱著怎樣的態度，避免怎樣的誤差？

袁：孫中山、袁世凱這些人的成敗得失，包括我在內的中國近代史研究者已經再三論述，說來話長，不必在這裏贅述。

研究這些歷史人物，同研究一切歷史問題一樣，只要堅持三條就能得出經得起檢驗的學術結論：一是說真話，全面收集和分析史料。二是遵守學術規範，尊重學術自由，在自由探索、自由討論中推進學術。三是敢於懷疑已有的學術結論，提防掉進意識形態陷阱。這三條中，最後一條最為重要。時至今日，蓄意為某黨某派辯護的人自然還有，但公眾不認為他們是真正的學者。困難在於習非成是，許多錯誤的結論被一些人認為是不得侵犯的天經地義。其實，學術的發展是永恒的，哪裏有什麼天經地義？封孫中山為“國父”，子民只能拜倒在他腳下，對袁世凱則認定其為天生的賣國胚子，是國民黨美化黨國體制，肯定其威權統治合法性的宣傳伎倆；與經過嚴格論證的學術結論是兩碼事。

談到這些歷史人物的失誤，有兩個原因非常值得重視：

1, 傳統的重負。

為什麼孫中山竟然親手制定《中華革命黨總章》？秘密幫會的傳統躍然紙上。從康有為設計的《大同書》到毛澤東的《五七指示》，為什麼一代又一代的政治家總是熱衷於發明各種剝奪公民自由、抗拒現代文明的制度？他們總是自負地認為自己生長的土地有悠久和輝煌的文化。於是，歷史輝煌轉化為思想枷鎖和抵擋外來的現



袁世凱

代文化的堤壩。從孫中山的“畢其功於一役”、毛澤東的超英趕美，到形形色色的謀臣、策士，老是構想出一些超越現代文化已有高度的美妙藍圖，藉以顯示中國傳統文明和提倡者與眾不同，就是不肯首先紮紮實實吸納現代文明，為釋放中國人的創造力建築兼顧的社會制度平台。

2, 抽象的正義和多數人利益。

幾乎所有民族都有關於天國的美妙夢幻，但像中國那樣風靡幾代人，並長期付諸實踐的，卻世所罕見。那些民粹的論述是人們難於抵擋的。多少人為之拋頭顱、灑熱血，甘之如飴！後果卻是事與願違，血淚斑斑。

百年來，一個接一個的飛來橫禍，都是上述傳統包袱加民粹空想共治一爐為思想源頭的。

這些與經濟基礎有沒有關係？說到底，這些都是自然經濟的思想烙印，人們分不真空想和實際。在中國徹底融入世界一體化洪流以前，世界公民的眼光很難被多數中國人接受，這些問題還會一再困擾中國人和中國歷史的進程。與此同時，“賣國”帽子可以隨時戴到敢於質疑意識形態教條的人們頭上，儘管他們與權力和土地不沾邊，連賣幾平方宅基地的本事都沒有！

日本亂中取勝兩種策略並舉

新史記：辛亥革命是當時世界上的一件大事，各國關注，也紛紛施加影響。中國人最關心的是日本。日本當時對辛亥革命的態度如何？如何影響到後來的中日關係和中國政局的變化？

袁：義和團事件後，列強對華政策有兩種對立傾向：一是承認“門戶開放”，力圖擺脫過時的劃分勢力範圍政策。另一是有些國家不願放棄已得利益。

辛亥革命後，劃分勢力範圍的舉措再次高漲。日俄力圖攫取東北、蒙古。英國則覬覦西藏。特別凶惡的是日本。其策略是亂中取勝，支持革命黨人、勒索清政府二者並舉，精心計算，謀取最大利益。日本有些所謂“民間人士”，實際是執行政府政策的工具。

1912年7月8日，日俄締結密約，把內蒙古一分为二，東部劃歸日本勢力範圍，西部則屬俄國。英國和俄國則達成蒙古和西藏利益交換的諒解；於是，英國於1912年8月17日發出外交文書給中國政府，反對中國“干涉西藏內政”；10月21日俄國則與蒙古締結俄蒙協約；西藏、蒙古在他們支持下先後宣布獨立。

袁世凱政府成立後遏制了這一邊疆獨立的趨勢和侵略者的圖謀。日本自明治維新開始至1945年戰敗投降，一直沒有實現民主化，逐步演變為軍國主義的侵略國家。中日“二十一條”交涉，乃至日後的“九一八”事變和抗日戰爭，都是這些惡因的發展。這類國家的侵略行為是很難糾正的。而英國這類侵略國，國內實行的是憲政，相對說來，迫使它放棄侵略行徑，代價要小得多。

2011年12月2日星期五（袁偉時）□

注釋：

- 1, 《胡漢民自傳》，《近代史資料》1981年第2期第60頁，中國社會科

學出版社北京版。

- 2,《孫中山全集》第二卷第 95 頁,中華書局 1982 年北京版。
- 3,同上第 319 頁。
- 4,《胡漢民自傳》,《近代史資料》1981 年第 2 期第 60 頁。
- 5,皮明庥主編:《武昌起義史》第 162—163、164 頁,中國文史出版社 1991 年北京版。
- 6,《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九第 121—122 頁,中華書局北京影印版。
- 7,朱宗震、楊光輝編:《民初政爭與二次革命》第 241 頁,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 8,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善後會議》第 388 頁,檔案出版社 1985 年北京版。
- 9,袁偉時:《袁世凱與國民黨:兩極合力摧毀了民初憲政》,刪節後刊登於《品味·經典》2011 年第一期第 40—59 頁;《江淮文史》2011 年第 3 期第 4—30 頁全文刊登;《徐州師範大學學報》(雙月刊)2011 年第 4 期(7 月 15 日出版)起,以《民初憲政格局再審視》為題,分兩期刊發了全文。
- 10,《孫中山全集》第四卷第 442 頁,中華書局 1985 年北京版。
- 11,《世界人權約法總覽》第 285 頁,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0 年成都版。
- 12,陳茹玄:《增訂中國憲法史》,文海出版社 1985 年台灣影印版,轉引自《近代中國憲政歷程:史料薈萃》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2004 年北京版第 160 頁。

袁偉時小檔案

袁偉時,1931 年 12 月生,廣東興寧人。中山大學教授。已結集出版的著作有《中國現代哲學史稿》、《晚清大變局中的思潮與人物》、《路標與靈魂的拷問》等。主編《現代與傳統叢書》、《荒原學術文叢》、《牛虻文叢》等。

由於強盛的國力和高超的技術與經濟發展，中國自古來就在東南亞國家間扮演領導角色，但這樣的關係是一種獨特的“朝貢體系”。中國從不企圖統治或佔有這些國家，顯然有異於西方國家的“征服”模式

中國的崛起不遵循西方的血腥征服模式

對大多數中國人而言，歷代傳言的“盛世”可說是耳熟能詳。7世紀唐太宗在位期間，政治清明，社會安定，人民安居樂業，且對外用兵經略四方，使唐朝國威遠播，太宗被西北諸國尊為“天可汗”，成為當時東方世界的國際盟主，史稱“貞觀之治”；稍微近代一點的例子則是清朝的“康雍乾盛世”，從康熙平定三藩之亂起，中國經濟繁榮、國力興盛，直至乾隆中期平定新疆，大清版圖空前擴張，也是清朝統治的最高峰，長達 110 多年。

這些輝煌的成就，不只是教科書上學習的知識、中國人民族自豪的來源，也是鼓舞中國人迎來新的盛世的參照系和推動力。在歷經鴉片戰爭以來的低潮之後，21 世紀的中國正在崛起，勢必挑戰目前第一強權美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就預測，2016 年中國實際購買力將超過美國，《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 也指出，2019 年中國國內生產總額 (GDP) 將超越美國。當代中國，似乎正在追隨前人腳步，開創屬於自己這一代的盛世。然而，中國的崛起也令人擔心：一黨專制、不透明的政治制度及內部愈演愈烈的社會

問題，是否會把中國推向一個窮兵黷武的大國，造成國際動蕩？中國究竟會成為怎樣的強權呢？

以“朝貢”取代“征服”

許多人認為，中國崛起的方式與 20 世紀初的美國相同，但因中國不是民主國家，所以可能會為世界帶來緊張，負面影響勝過正面。英國廣播公司（BBC）選擇從民族性和文化來分析，指出這一說法並不公允。

首先，中國和美國或西方國家不同，它“從未殖民統治過任何海外地區”。15 世紀初，明朝國力強盛，擁有龐大資源和先進船隻，遠洋能力遠遠勝過歐洲國家，它本可殖民東南亞，攫取更多利益，可是歷史告訴我們，中國並沒有這麼做。

英國廣播公司認為，這不意味著中國無視他們的鄰居，相反地，由於強盛的國力和高超的技術與經濟發展，中國自古來就在東南亞國家間扮演領導角色，但這樣的關係並非建立在殖民者—被殖民者上，而是一種獨特的“朝貢體系”。中國從不企圖統治或佔有這些國家，各國藉由獻上豐富貢品，換取各種形式的保護，開啟商業貿易，中國皇帝將進貢禮物視為自身優越的象徵。這顯然有異於西方國家的“征服”模式。

朝貢系統幾乎涵蓋整個東亞區域——當今世界的三分之一的人口居住在此，從日本和韓國延伸到中南半島，以及印尼的部分地區。英國廣播公司認為，朝貢體系持久且穩定，至少持續了近 2000 年，直到 20 世紀初期才畫下句點。

這就是西方世界與中國的顯著不同。歐洲和後來的美國，習慣於將國家力量投射在世界各地，以軍事行動與武力征服，實現殖民統治。就在距今不遠的 19 世紀、20 世紀時期，全球有很大一部分疆域被歐洲所控制，歐洲人身為高高在上的殖民者，強迫被殖民者接受他們的文化、語言、教育和宗教。



各國向中國朝貢盛況。

“向內看”而非“向外看”

與之相反，中國人寧願留在國內。他們相信中國之所以為“中國”，就是世界的中心，就是文明的最高殿堂。那又何必走入其他野蠻國家呢？英國廣播公司以鄭和下西洋為例，鄭和的艦隊在1405年到1433年間曾多次遠航，足跡遍及南海，甚至橫跨印度洋抵達東非，他們僅對這些蠻荒之地展示了中國的榮耀，並未表現征服野心——離開中國定居在東南亞，被視為是離開文明之舉。

英國廣播公司指出，中國人傾向留在本國的另外一個原因，是該國本身擁有的廣袤疆域和多元種族文化，使得統治者在管理上面臨極大的挑戰，他們的當務之急是如何維持社會秩序穩定，以確保權力延續。即使到了今天，這一點仍是中共施政的優先考慮。因此，中國領導人多數時候必須“向內看”，而非“向外看”。

歷史證明，歐洲民族一向具有侵略性，光是歐洲大陸，就歷經了大大小小難以計數的戰爭，更遑論殖民擴張時期所引爆的血腥衝

突和兩次世界大戰，他們偏好以武力的方式向世界炫耀國家實力。美國的祖先來自歐洲拓荒者，也繼承了這些特點。不過，英國廣播公司認為，中國並非如此，這與他們悠遠的文化不符。在上位者關心自己權力的維持勝過尋求支配他國，當習近平 2012 年 11 月接掌中國最高權柄之後，最大挑戰將來自國內艱困的改革和社會動盪，而非國外。

中國成為全球強權已是指日可待之事，但中國的影響力一如傳統，覆蓋經濟和文化層面，它不像美國，美國每年在軍事發展上耗費驚人的成本，以卓越的戰鬥力來使自己變得強大。隨著時間推移，中國的經濟實力和人口規模將是巨大無比，超過美國。即使目前中國還稱不上是“已開發國家”，整體發展水平也比不上歐美，但它已是世界各地許多國家的主要貿易夥伴。伴隨著經濟力量而來的就是政治實力，如果中國願意，它有能力讓他國照著自己的意願行事。

文化對中國也很重要。英國廣播公司認為，中國是一個了不起的文明，唐宋之間，中國在水利工程、農業、建築、藥學、數學和製圖等領域都有耀眼的研究成果，也推動了世界的進步。中國人非常自豪這些歷史成就，有些人甚至認為，他們是最偉大的文明。

中國人有自己的歷史優越感，但不表示他們會急躁地想快速崛起。英國廣播公司舉例，當 1972 年中國前總理周恩來被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問及對法國大革命的看法時，他說：“下結論為時尚早”。因此，中國看待時間的概念與西方人完全不同，美國人會覺得一個世紀很長，但中國擁有長遠數千年的歷史，一個世紀對他們而言是很短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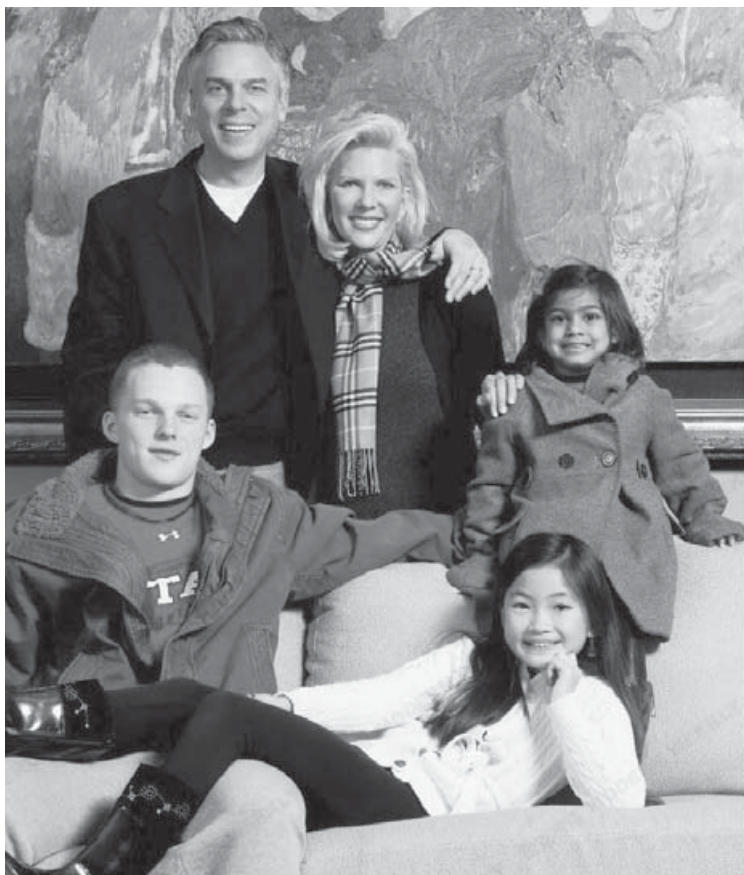
伯羅奔尼薩戰爭再現？

即便英國廣播公司從歷史觀察，推斷中國應無大動干戈、侵略他國之意圖，但畢竟時空背景已全然不同，且全球化體系下國與國互動更為頻繁緊密，前美國駐華大使洪博培（Jon Huntsman）就

警告，中國的崛起是美國的“危機”——既意味著“危險”也意味著“轉機”。

《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U.S News & World Report)雜誌報導，曾參與初選爭取美國總統大選共和黨候選人提名的洪博培認為，長遠來看，美國和中國潛在的衝突是一個“真正”的危險，兩國正處於一種“伯羅奔尼薩情結”(Peloponnesian complex)中。雅典和斯巴達的衝突維持了25至30年，最終消滅了兩國的文明和繁榮。他認為，美中應避免重蹈歷史覆轍。

洪博培指出，中國崛起勢在必行，而美國也備感威脅，緊張的趨勢在升高，兩國一旦碰撞就會激發出不可預知的火花，更糟的是軍事衝突可能成真，如何預防仰賴兩國領導人細膩且敏感的外交手段。



洪博培深具中國情結、收養一名中國女兒，又曾任美國駐華大使，對中國有自己的見解。

確保利益大過維護國際秩序

洪博培在接受《外交政策》雜誌(Foreign Policy)專訪時說,美國必須務實地與中國強化關係,但前提是美國要先將國內事務搞好。這些事情包含良好的經濟基礎、對國際金融的專注、加強基礎設施及改善學校等。它們無法一蹴而就,但要擁有一個更為互利的美中雙邊關係。必須先從這裡開始,鞏固美國核心價值,才能創造有利的談判條件。洪博培認為很多美國人都知道這一點,但候選人顯然較少涉及這方面之議題。

根據美國“有線電視新聞金錢網”(CNNMoney.com),洪博培指出,中國要想維持競爭力,特別是經濟競爭力,高層決策者必須體認到網絡的重要性。如果他們忽視網絡,或繼續對網絡實施嚴密監控,那中國便不可能轉型成一個勇於創新並競爭激烈的社會。洪博培說,網絡不只將世界各地不同的人連接起來,也為商業發展帶來了新的局面。網絡世界存有無限可能,但該接受它抑或封閉它,中共明顯還處在兩難之中。

而談到軍事武力,洪博培將中美做了比較。中國的軍費開支每年可能超過 1000 億美元,但跟美國相比仍是小巫見大巫,美國每年軍事花費高達 7000 億美元,這些錢有很大一部分花在阿富汗和伊拉克,且還在持續失血中。

與英國廣播公司的觀點相似,洪博培也指出了中國並無擔任世界秩序維護者的傳統,它不像美國為履行這些所謂的“國際義務”而血本無歸。中國大多將軍費投注在制海能力和導彈計畫上。中國的導彈計畫進步神速,但與其說侵佔他人的利益,毋寧說中國的目的還是在保護自己,無論是陸上或海上的資產。發展軍事以確保貿易路線的穩定,洪博培認為,乃是中國的長遠計畫。

習近平將帶來新活力

政治上,洪博培也認同中國政治的核心動力就是“保持穩定”,

也就是說，讓共產黨繼續執政的前提下，達成高層間的共識和製定政策；但是，中國無可避免地將走向全球化，洪博培相信，中共會採取一些改變措施來適應。他甚至大膽預測，民主的精神有可能在黨內實現，通過領導群體內部的不記名投票，讓政治人物競爭中央政治局委員與常委的席次，使政治局的運作不再黑幕重重。

北京方面自 2008 年舉辦奧運以後，對人權的侵犯愈加嚴重且未有好轉跡象，2012 年 11 月以後，新的十八屆中央政治局是否有機會改善中國受人詬病的人權狀況？洪博培認為，習近平肯定會面對外界巨大的壓力，但他沒辦法一個人決定。過去 10 年來中央政治局一直以“妥協”和“共識”的方式在決策，因而很多改革窒礙難行，局面變得保守、停滯不前。新的政治局常委包含習近平在內為 7 人，洪博培預測，習近平本身的政治手腕，或許能帶給政治局新的活力。因此接下來 10 年，該關心的不是中共會不會改變，而是中共改變了多少，以及在哪些領域變得不一樣。

八大攀升秘訣

然而，相較於中國對外展示了和平崛起的決心，但對內，身為一個共產黨員，想爬到中共權力的最高峰，免不了要經歷無數場腥風血雨。中央政治局可說是全世界最嚴格的威權體系，英國廣播公司分析，要攀上權力頂峰有八大秘訣，而且只要稍有不慎，就會與權力絕緣。

第一，是“起步要早”，如果一個政治人物 20 多歲還沒有被決定為提拔的對象，那可能為時已晚。習近平和李克強都在 21 歲加入共產黨。現在的中國孩子可以從很小就開始接觸政治，18 歲就具有加入中共的資格。一位女黨員告訴英國廣播公司：“如果你加入了共產黨，就表明你是‘優秀的學生’，而且當大家都加入時，你不加入就是異類。”

第二，要“選對靠山”。中國政治免不了裙帶關係和用人唯親，換言之，靠山有多大，優勢就多大。只要有良好的關係就能在

權力階層快速爬升，習近平身為太子黨的一員，深厚的家庭人脈關係，在他的成功裡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

第三，是“講究道德”。這是中國優良的傳統，歷史上的帝王或上位者常背負著各種道德責任，被人民期待公平執政，儘管現在已非帝制時代，但官員若是表現謙卑，並牢記黨“為人民服務”的口號，也能為自己加分不少。

第四是“不要炫耀”。隨著經濟快速發展，“炫富”行為也越來越常見，但別忘了，中國人民對中共政權最大的不滿來自於腐敗與貪汙。

第五是“身為男性”。中共有 8300 萬名黨員，僅四分之一是女性，十七屆政治局 24 位委員中，只有劉延東一名女性席位。很顯然地，在這個以男性為主導的國家，女性要爬到權力顛峰困難重重。

第六是“別出風頭”，過去毛澤東和鄧小平是有魅力的夢想家，幾乎是單槍匹馬決定國家未來，但現在中共糾結不清的官僚體系要求的卻是全體徹底服從，因此，有些分析家認為薄熙來真正的罪行是挑戰既有的政治遊戲規則，而英國廣播公司也建議，政治人物最好穿著深色西裝和留黑色頭髮，在群體間便能看起來不突兀。

第七是“到貧苦地區工作”，用以建立“了解民間疾苦”的優良形象，胡錦濤在西藏工作過四年，而習近平也曾在落後的正定縣擔任縣委書記，鄉下或農村的工作經歷，有助於提升公眾印象。

最後一點，第八，是“冷酷無情”，任何政治制度都是無情的，但在中國更得心狠手辣，所以英國廣播公司推薦野心勃勃的領導者必先熟讀《厚黑學》，使自己臉皮厚如城牆、心黑如煤炭。（《新史記》編譯 蕭憲聰）□

後記

本書內容主要來源於《明鏡月刊》、《新史記》，也引用了一些媒體資料，對所引用的資料儘可能都註明其出處和來源，但個別文章在網上幾經轉載，難以辨清其原創來源。如有錯漏，特表歉意，並懇請來函說明，本書再版時補正。

李清鋒

2013年6月



